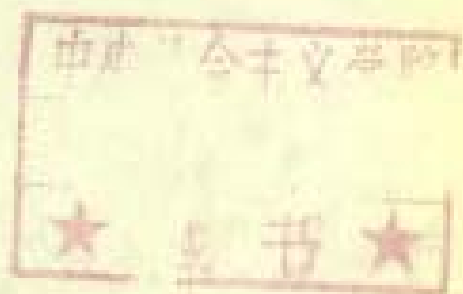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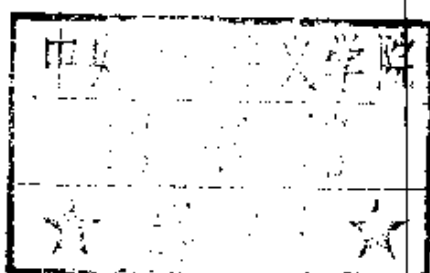
李大釗文集



: 157487

李大釗文集

下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马少展

李大钊文集

LIDAZHAO WENJI

(下)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30.5印张 645,000字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500

书号 3001·1884 定价 4.55 元

目 录

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八日)	1
黑暗的东方(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4
太上政府(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5
第五师军人(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6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九一九年六月一日)	7
牢狱的生活(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10
不要再说吉祥话(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11
新华门前的血泪(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12
改造(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13
哭的笑的(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14
威先生感慨何如?(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15
阶级竞争与互助(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	16
赤色的世界(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	20
最危险的东西(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	21
光明权(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	22
我与世界(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	23
忠告黎明会(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24
黑暗与光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25
真正的解放(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26

战栗(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27
万恶之原(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28
灰色的中国(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29
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30
日本人听者(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31
再论问题与主义(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七日)·····	32
五峰游记(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七日)·····	39
“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	42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月)·····	46
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86
赤色青色(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89
难兄难弟(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90
秘密……杀人(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91
大笑话(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92
黑暗运动(一九一九年十月五日)·····	93
新鲜名词(一九一九年十月五日)·····	94
圣人与皇帝(一九一九年十月五日)·····	95
双十字上的新生活(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二日)·····	96
文治国庆(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二日)·····	98
武装祭孔(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二日)·····	99
面包运动(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二日)·····	100
在《国民》杂志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一九一九年 十月十二日)·····	101
妇女解放与 Democracy(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五日)·····	102
时代的落伍者(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104

应考的遗传性(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105
东西村落生活的异点(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106
双十与五四(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107
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答高承元君)(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108
时间浪费者(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日)	113
最有力的调和者——时代(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日)	114
人与禽兽(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日)	115
参战军呢?(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日)	116
谁是“有实力”者?(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117
牺牲(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118
妨害治安(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119
出卖官吏——蹂躏人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120
掠夺物品的遗迹(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121
死(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122
寺内死了(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123
“鼓吹共产主义”(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124
联人社会(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125
圣裔的恤金(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126
那里还有自由(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127
一个自杀的青年(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28
被裁的兵士(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29
归国的工人(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30
“一心一德”(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131
“五星联珠”“文运大昌”(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132
“用民政治”(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133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	134
青年厌世自杀问题(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	153
“中日亲善”(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七日)	161
主义(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七日)	162
“辫子”(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七日)	163
什么是新文学(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八日)	164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演说辞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166
什么是歪史(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169
禁止说话(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170
工读(一)(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71
工读(二)(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72
互助(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73
大联合(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74
生活神圣(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75
物质和精神(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76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一九二〇年一月一日)	177
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九二〇年一月)	185
又是一年(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	199
忏悔的人(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	200
哭冯国璋(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	201
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202
低级劳动者(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八日)	204
整顿学风(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八日)	205

真是梦话(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206
“特别体恤”(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207
知识阶级的胜利(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208
好一对兄弟国家!(一九二〇年二月八日)	209
山穷水尽的青年(一九二〇年二月八日)	210
精神解放!(一九二〇年二月八日)	211
都市上工读团底缺点(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	212
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一九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213
“五一”May Day 运动史(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	216
红萝卜党(一九二〇年五月三十日)	232
乱七八糟(一九二〇年五月三十日)	233
自然与人生(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日)	234
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七日)	239
变革的原动力(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七日)	242
人治与自治(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七日)	243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一九二〇年)	244
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九二〇年)	249
史观(一九二〇年)	264
今与古(一九二〇年)	269
鲍丹的历史思想(一九二〇年)	284
鲁雷(Louis Le Roy)的历史思想(一九二〇年)	298
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历史思想(一九二〇年)	300
韦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及其历史思想 (一九二〇年)	321
孔道西(Condorcet)的历史思想(一九二〇年)	327

桑西门(Saint-Simon)的历史思想(一九二〇年)	333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一九二〇年)	345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九二〇年)	359
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一九二〇年)	366
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九二〇年)	371
自由与秩序(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437
近来的倒戈运动(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日)	439
堕落的法兰西文明(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日)	440
民众的新年(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日)	441
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九二一年三月)	442
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一九二一年三月)	445
北京贫民生活的一瞥(一九二一年三月五日)	447
黄昏时候的哭声(一九二一年三月五日)	448
山西(一九二一年三月五日)	449
各国的妇女参政运动(续)(一九二一年三月五日)	450
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一九二一年 三月二十日)	454
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一九二一年 三月二十一日)	456
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一九二一年五月四日)	464
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	465
《西洋大历史》序(一九二一年七月)	490
美国图书馆员之训练(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一日)	491
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五 ——十七日)	501

今与古(一九二二年一月八日)·····	508
现代的女权运动(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八日)·····	513
论自杀(一九二二年一月三十日)·····	517
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	537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	540
胶济铁路略史(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	548
《黄庞流血记》序(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551
失恋与结婚自由(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	552
宗教妨碍进步(一九二二年四月九日)·····	555
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	557
马克思与第一国际(一九二二年五月六日)·····	562
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一九二二年六月)·····	566
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Democracy and Ergatocracy) (一九二二年七月一日)·····	569
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国际少年日纪念会”上 的演说词(一九二二年九月三日)·····	575
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七日)·····	577
国际的资本主义下的中国(旧国际共管与新国际共管)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579
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一九二二年十二月 十七日)·····	583
社会问题与政治(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584
平民主义(一九二三年一月)·····	588

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	610
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康妙恩”(五十年的回顾 社会 革命的先声)(一九二三年二月)	615
李大钊君讲演女权运动(一九二三年二月四日)	626
马克思经济学说(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二日)	629
演化与进步(内容简述)(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	634
史学与哲学(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十九日)	635
普遍全国的国民党(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八日)	647
工人国际运动略史(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	649
纪念五月四日(一九二三年五月四日)	656
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七日)	657
中日俄三国关系日益接近(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	660
“大国民”的外交(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	663
时(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一日)	665
社会主义释疑(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670
研究历史的任务(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673
劳动问题的祸源(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四日)	679
王著《货币论》书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八日)	687
《清代通史》序(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689
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691
十八年来之回顾(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693
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一九二四年一月)	703
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	707
列宁不死(一九二四年三月三十日)	709
这一周(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	711

史学要论(一九二四年五月)	713
人种问题(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三日)	766
新闻的侵略(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	774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 报告(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	776
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一九二四年九月 二十四日)	782
上海的童工问题(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787
吴佩孚压迫京汉劳工运动的原因(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	794
挽孙中山联(一九二五年三月)	796
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一九二五年八月)	797
从印度航路发见以至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侵入东方 大势年表(一九二五年九月九日)	804
民众势力发展中的国内战局(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819
土地与农民(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	822
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	837
新帝国主义战争的酝酿(一九二六年一月六日)	841
在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844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847
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一九二六年五月)	855
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一九二六年 七月二十二日)	866

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一九二六年八月八日)	871
守常政治报告(一九二六年九月八日)	878
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881
守同志来信(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	884
狱中自述(一九二七年四月)	888

诗 歌

登楼杂感	897
哭蒋卫平	899
岁晚寄友	901
题蒋卫平遗像	903
筱舫、寿山将往阿尔泰，诗以赠之	904
前意未尽更赋一律	905
咏玉泉	906
有感	907
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	908
吊圆明园故址	910
黄种歌	911
乙卯残腊，由横滨搭法轮赴春申， 在太平洋舟中作	912
神州风雨楼	914
送相无	915
寄霍侣白	916
复辟变后寄友人	917
山中即景	918

悲犬	920
岭上的羊	921
山峰	922
山中落雨	923
欢迎独秀出狱	924
歌谣选	926
谚语	927

书 信

致庶务主任李辛白先生	931
致李辛白	932
送呈李辛白先生	933
致李辛白先生	934
致北京大学学余俱乐部函	935
致胡适	936
复注册部	937
致沈士远先生	938
致胡适	939
致若愚、慕韩	940
致郁宪章	941
为哲学系学生刘仁静缓交学宿等费 写的担保条	942
致宫崎龙介	943
致宫崎龙介	944
面递宫崎龙介先生	945

致启明·····	946
致注册部·····	948
复胡适·····	949
致胡适·····	951
致周太玄·····	952
致蒋梦麟·····	953
为图书馆职员马家骧改薪函·····	954
致胡适·····	955
致胡适·····	956
致胡适·····	957
致柏文蔚、王法勤、徐谦、顾孟余函·····	958

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八日)

凡是世界上的土地，只要是世界上知道人的道理的人在那里过人的生活，我们决不把他认作私有物，拒绝他人。但是强盗政府们要根据着秘密外交拿人类正当生活的地方，当作他们私相授受的礼物，或送给那一个强盗国家、强盗政府，作扩张他那强盗势力的根据，无论是山东，是山北，是世界上的什么地方，我们都不承认，都要抗拒的。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

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作梦，说什么人道、平和得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采色了。谁知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

威尔逊这位书生，天天在那里对那些强盗说“正义”、“人道”的话，组织“国际联盟”哪，希望“永久平和”哪，这真是对牛弹琴。只落得那些强盗们对他瞪眼，他自己也是对他们呕气，希望他的人灰心。

威尔逊君！你不是反对秘密外交吗？为什么他们解决山东问题，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伦敦密约，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某某军阀间的秘密协定？须知这些东西都是将来扰乱世界平和的种子。象这样的平和会议，那有丝毫价值！人家为保障一国的强盗权利，还有退出和会的决心勇气，你为保障世界平和，贯彻自己的主张，竟没有退出和会的决心勇气。你自己的主张计画如今全是大炮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我实为你惭愧！我实为你悲伤！

常向我们说和我们有同种同文的情谊的日本人啊！你们把这块山东土地拚命拿在手中究竟于你们民族的生活上有什么好处？添什么幸福？依我看来，也不过多养活几个丑业妇、无赖汉、吗啡客，在人类社会上多造些罪恶，作些冤孽，给日本民族多留些耻辱的痕迹罢了。这话并不是我太刻薄，试一翻日本人的移民史，那一处不是这几色人先到？除去这几色人还有什么人？——那背包卖药的还是第一等的——在这等地方的商人、绅士、官吏、军人，也都渐渐丢失了他们的人性，只增长他那残暴、狡诈、嫉妒、贪淫的性质。结果更要巩固国内军阀财阀的势力，来压制一般人民，永远不能翻身。这又何苦呢！

我们历来对外的信条，总是“以夷制夷”；对内的信条，总是“依重特殊势力”。这都是根本的大错。不知道有几多耻辱、哀痛、失败、伤心的陈迹，在这两句话里包藏。而从他一方面，又把民族的弱点、惰性、狡诈、卑鄙，都从这两句话里暴露出来。这回青岛问题，发生在群“夷”相争，一“夷”得手的时候。当时我们若是不甘屈辱，和他反抗，就作了比利时，也不过一时受些苦痛有些牺牲，到了今日，或者能得点正义人道的援助。那时既低声下

气，今日却希望旁人援手，要知这种没骨头没志气的人，就是正义人道昌明的时代，不能自助的人，也不能受人的帮助，况在强盗世界的里面，更应该受点罪孽。我们还在这里天天做梦，希望他人帮助。这种丧失自立性的耻辱，比丧失土地山河的耻辱，更要沉痛万倍！

大家都骂曹、章、陆这一班人为卖国贼，恨他们入骨髓，都说政府送掉山东，是我们莫大的耻辱，这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是我们莫大的仇敌。我却以为世界上的事，不是那样简单的。这作恶的人，不仅是曹、章、陆一班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世界啊！日本人要我们的山东，政府答应送给他，都还不算我们顶大的耻辱。我们还是没有自立性，没有自决的胆子，仍然希望共同管理，在那“以夷制夷”四个大字下讨一种偷安苟且的生活，这真是民族的莫大耻辱啊！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那么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的三大信誓是：

改造强盗世界，
不认秘密外交，
实行民族自决。

1919年5月18日
《每周评论》第22号

署名：常

黑暗的东方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天明了，曙光现了，光明的境界，没有强盗恶魔们立足之地了，一个一个的都跑到黑暗的东方来。所以边疆上就有谢米诺夫、霍尔瓦特这一流人扰乱治安，内地就有一种外国的外交官替崇拜强权的国家政府捕拿国事犯，摧残出版和言论的自由。呵！好了！我只替你们祝福。祝你们永远不要回归你们那光明的故土，祝你们永远有个黑暗的东方作你们的遁逃藪。

1919年5月26日

《每周评论》第23号

署名：常

太 上 政 府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呵!我如今才晓得东交民巷里有我们的太上政府。你居然拿出命令的、自尊的、傲慢的口吻来,说什么“怵”、“不怵”。你居然干涉我们的言论自由,说什么“警告”、“取缔”、“限期答复”。呵!你是用惯了那年五月七日的袁的美敦书。呵!我如今才晓得你是要作我们的太上政府。

1919年5月26日
《每周评论》第23号

署名:常

第五师军人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益世报》载：近畿陆军第五师步马炮工辎全师目兵胡龙舒等一万零八十八名通电：“除国贼，……御外侮，……愿以铁血为后盾。”像这种爱国自卫的精神，断断不可以拿干涉政治的话责备他们。

1919年5月26日

《每周评论》第23号

署名：常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一九一九年六月一日)

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

近来——自古已然——有许多人听见几个未曾听过、未能了解的名辞，便大惊小怪起来，说是危险思想。问他们这些思想有什么危险，为什么危险，他们认为危险思想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他们都不能说出。象这种的人，我们和他共同生活，真是危险万分。

前些年科学的应用刚刚传入中国，一般愚暗的人都说是异端邪教。看待那些应用科学的发明的人，如同洪水猛兽一样。不晓得他们也是和我们同在一个世界上一样生存而且比我们进化的人类同胞，却说他们是“鬼子”，是“夷狄”。由此看来，到底是知识思想危险呢？还是愚暗无知危险呢？

听说日本有位议长，说俄国的布尔扎维克是实行托尔斯泰的学说，彼邦有识的人已经惊为奇谈。现在又出了一位明白公使，说我国人鼓吹爱国是无政府主义。他自己果然是这样愚暗无知，这更是可怜可笑的话。有人说他这话不过是利用我们政府的愚暗无知和恐怖的心理，故意来开玩笑。噫呀！那更是我们莫大的耻辱！

原来恐怖和愚暗有密切的关系。青天白日，有眼的人在深池旁边走路，是一点也没有危险的。深池和走路的行为都不含着危险的性质。若是“盲人瞎马，夜半深池”那就危险万分，那就是最可恐怖的事情。可见危险和恐怖，都是愚昧造出来的，都是黑暗造出来的。

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与真实。只要得了光明与真实，什么东西、什么境界都不危险。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愚暗是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障碍，也就是人生发展的障碍。

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

说某种主义、学说是异端邪说的人，第一要知道他自己所排斥的主义、学说是什么东西，然后把这种主义、学说的真象，尽量传播，使人人都能认识他是异端邪说，大家自然不去信他，不至受他的害。若是自己未曾认清，只是强行禁止，就犯了泯没真实的罪恶。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合，我们硬要禁止他，不许公然传布，那是绝对无效。因为他的原素仍然在情理之中，情理不灭，这种学说也终不灭。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蔽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

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世间本来没有“天经地义”与“异端邪说”这样东西。就说是有的，也要听人去自由知识，自由信仰。就是错知识了、错信仰了所谓邪说异端，只要他的知

识与信仰，是本于他思想的自由、知念的真实，一则得了自信，二则免了欺人，都是有益于人生的，都比那无知的排斥、自欺的顺从远好得多。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他们，超越他们。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这些东西，在思想中全没有一点价值，没有一点权威。

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我奉劝禁遏言论、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

1919年6月1日
《每周评论》第24号
署名：常

牢 狱 的 生 活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现代的生活，还都是牢狱的生活啊！象这样的世界、国家、社会、家庭，那一样不是我们的一层一层的牢狱，一扣一扣的铁锁！倒是为运动解放入了牢狱的人，还算得了一块自由的小天地！

1919年6月29日

《每周评论》第28号

署名：常

不要再说吉祥话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明明是相杀的世界，偏要说什么“互助”。明明是黑暗的世界，偏要说什么“光明”。明明是压缚的世界，偏要说什么“解放”。明明是兽行的世界，偏要说什么“人道”。明明是强权的世界，偏要说什么“正义”。这正是我们的大罪。

1919年6月29日
《每周评论》第28号
署名：带

新华门前的血泪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这样的炎天酷日，大家又跑到新华门前，一滴血一滴泪的哭。唉！可怜！这斑斑的血泪，只是空湿了新华门前的一片尘土！

1919年6月29日
《每周评论》第28号
署名：常

改 造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交通部的大门，因为曹汝霖被学生们攻击去职，部员都说他的方向不利，请勘舆家为之改造。海军部的围墙，也因为有勘舆家说他不吉利，故近来各处舰队时起风波，听说也要改造。我说中国近年南北争哄，民生困苦，到这步田地，也是因为一种大门——阙——建立的不好，也应该改造。可惜我又不是勘舆家，没有人信我的话！

1919年6月29日
《每周评论》第28号
署名：常

哭 的 笑 的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今天(二十八日)是和约签字的日子,巴黎的欢声必能送入全世人的耳鼓。可是我们应该常纪念着今年今日新华门的哭声。

1919年6月29日
《每周评论》第28号
署名:常

威先生感慨何如？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昨日(二十七日)巴黎的白宫宴会,法总统举觞祝贺威尔逊及各代表。我不知那位威先生在那庆祝伪平和的席上,如何下咽,感慨如何?

1919年6月29日
《每周评论》第28号
署名:常

阶级竞争与互助

(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

Ruskin说过：“竞争的法则，常是死亡的法则。协合的法则，常是生存法则。” William Morris也说：“有友谊是天堂，没有友谊是地狱”。这都是互助的理想。

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

我们要晓得人间社会的生活，永远受这个普遍法则的支配，就可以发见出来社会主义者共同一致认定的基础，何时何处，都有他潜在。不论他是梦想的，或是科学的，都随着他的知识与能力，把他的概念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这基础就是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精神。

我们试一翻 Kropotkin 的“互助论”(“Mutual Aid”),必可晓得“由人类以至禽兽都有他的生存权，依协合与友谊的精神构成社会本身的法则”的道理。我们在生物学上寻出来许多证据。自虫鸟牲畜乃至人类，都是依互助而进化的，不是依战争而进化的。由此可以看出人类的进化，是由个人主义向协合与平等的方面走的一个长路程。

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

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这是我们确信不疑的道理。依人类最高的努力，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我信这是必然的事实。

与这“互助论”仿佛相反的，还有那“阶级竞争”（“Class Struggle”）说。

这个阶级竞争说，是 Karl Marx 倡的，和他那经济的历史观很有关系。他说人类的生产方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人类的社会关系又随着人类生产方法的变化而变化，人类的精神的文化更随着人类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组织固然可以说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但是社会组织的改造，必须假手于其社会内的多数人。而为改造运动的基础势力，又必发源于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下立于不利地位的阶级。那些居于有利地位的阶级，除去少数有志的人，必都反对改造。一阶级运动改造，一阶级反对改造，遂以造成阶级竞争的形势。他在《共产宣言》里说过：“所有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又说：“从来社会的历史都在阶级对立中进行。”他的意思就是说，自太古土地共有制崩坏以来，凡过去的历史，社会的经济构造，都建设在阶级对立之上。所谓阶级，就是指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具体讲出来，地主、资本家是有生产手段的阶级，工人、农夫是没有生产手段的阶级。在原始社会，经济上的技术不很发达，一个人的劳动只能自给，并无余裕，所以不发生阶级。后来技术日精，经济上发展日进，一人的劳动渐有余裕。这个余裕，就是剩余劳工。剩余劳工，渐次增加，持有生产手段的起来乘机夺取，遂造成阶级对立的社会。到了生产力非常发展的时候，与现存的社会组织不相应，最后的阶级争斗，就成了改造社会、消灭阶级的

最后手段。

有许多人听见这阶级竞争说，很觉可怕。以为人类的生活，若是常此争夺、强掠、残杀，必没有光明的希望，拿着阶级竞争作改造社会的手段，结果怕造不出光明社会来。所以对于此说，很抱疑虑。

但是 Marx 明明的说：“所有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又说：“资本家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生产方法采敌对形态者的最后。”又说：“人类历史的前史，以今日的社会组织终。”可见他并不是承认人类的全历史，通过去、未来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阶级竞争说，不过是把他的经济史观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一段，不是通用于人类历史的全体。他是确信人类真历史的第一页，当与互助的经济组织同时肇启。他是确信继人类历史的前史，应该辟一个真历史的新纪元。

现在的世界，黑暗到了极点。我们为继续人类的历史，当然要起一个大变化。这个大变化，就是诺亚以后的大洪水，把从前阶级竞争的世界洗得干干净净，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

在那人类历史的前史时代，互助的精神并未灭绝，但因有与互助相反的社会组织，他在世间，遂不断的被毁。人类的真历史开始以后，那自私自利的恶萌，也不敢说就全然灭尽。但是互助的社会组织既然实现，那互助精神的火光，可以烧他，使他不能发生。

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

致的改造。

总结一句话：我信人类不是争斗着、掠夺着生活的，总应该是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阶级的竞争，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现了。我们可以觉悟了。

1919年7月6日
《每周评论》第29号
署名：守常

赤色的世界

(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

今天一个消息，说某处创了一个劳农共和国。明天一个消息，说某国立了一个共产党的政府。他们的旗，都是“赤旗”。他们的兵，都是“赤军”。这种的革命，人都叫作“赤革命”。这样演下去，恐怕世界都要变成赤色。请问这个赤色，是什么东西染成的？

1919年7月6日
《每周评论》第29号
署名：守常

最危险的東西

(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

我常和友人在北京市里步行，每过那颓废墙下，很觉可怕。怕他倒了，把行路的人活活压死。请问世间最危险的东西，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

1919年7月6日
《每周评论》第29号
署名：守常

光 明 权

(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

北京市民对于电灯公司颇不满意,说电光不足,很妨害市民的“光明权”。嗟!在这黑暗世界中任是生活的那一方面,一线的光明,都没有希望。我们当真要求光明权,应该不止对于电灯公司。

1919年7月6日

《每周评论》第29号

署名:守常

我 与 世 界

(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

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

1919年7月6日
《每周评论》第29号
署名：守常

忠告黎明会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日本的黎明运动,总算是一线曙光的影子。我们对于他们,很有希望。但是看了福田博士的议论,仿佛他还在迷信侵略主义,简直找不出半点光明来,很令人失望。怪不得堺利彦一辈主撰的《新社会》,老早就劝他们于黎明日本以前,先要把自己的脑子黎明一下。我也劝黎明会中的真正黎明分子,先要在黎明会中作一回黎明运动。

1919年7月13日

《每周评论》第30号

署名:守常

黑暗与光明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在日本的黎明会里，也可以分黑暗与光明两个层级。大概已竟在社会上享有相当地位声望的一流人的思想，比较的不澈底，议论、态度，比较的暧昧。还是新人会一派的青年，较有朝气。他们的议论、思想，很有光明磊落的样子。这也是青年胜过老人的地方，也就是光明与黑暗的分点。

1919年7月13日
《每周评论》第30号
署名：守常

真正的解放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1919年7月13日
《每周评论》第30号
署名：守常

战栗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美国出了怪炸弹案，我听了很替他们战栗。现在日本又跟着出了这样的情事，并且听说主犯是现在的高等警官。嗟呀！高等警官，不是维持治安的么？现在也来作这种危险的运动，这真算是大变人心了！真正令人战栗！

1919年7月13日
《每周评论》第30号
署名：守常

万 恶 之 原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中国现在的社会，万恶之原，都在家族制度。一个人要是有点知识聪明，一般的亲族戚属，总是希望他去做官僚式的强盗，牺牲了他一个人，供他们大家的荒淫作乐。这样子待人，分明是莫大的冤仇，那里有丝毫的亲义！

1919年7月13日
《每周评论》第30号
署名：守常

灰色的中国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人说政治革命是白革命，社会革命是赤革命。我说无论是白是赤，总在本质稍有光明的国家，才能发现这样鲜明的颜色。象我们中国这样黑暗的国家，对于世界革命的潮流，不问他是白是赤，一味作盲目的抗拒。等到潮流逼进了门，大家仍是昏沈沈的在黑尘中乱滚，白革命会变成灰色，赤革命会变成黑色。辛亥以后的军阀政客，已竟把个中国弄成灰色了，盼望以后你们不要把中国再弄成黑色才好。

1919年7月13日
《每周评论》第30号
署名：守常

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有一位爱读本报的人来信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亏了贵报的‘只眼’，常常给我们点光明。我们实在感谢。现在好久不见‘只眼’了。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

1919年7月13日
《每周评论》第30号
署名：守常

日 本 人 听 者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法国文学博士李霞儿在东京所开第三回人类的差别撤废期成大会演说，有几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在亚细亚内有奴隶国的期间，其他亚细亚诸国亦决不是自由国。在亚细亚内有受轻蔑的国的期间，其他亚细亚诸国亦决不能得人尊敬。诸君真愿得世界的尊敬，诸君不可不使其他亚细亚诸国，也为可被尊敬的国。而为他日一切的亚细亚诸国得自由，诸君子不可不先作最初的解放者。因为束缚他人同时自己也受束缚。”药石之言，日本人听者！

1919年7月20日
《每周评论》第31号
署名：守常

再论问题与主义

(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七日)

适之先生：

我出京的时候，读了先生在本报31号发表的那篇论文，题目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发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他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

一、“主义”与“问题” 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

却没有甚么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无论失败与成功，在人类的精神里，终能留下个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灭。从前信奉英国的 Owen 的主义的人，和信奉法国 Fourier 的主义的人，在美洲新大陆上都组织过一种新村落、新团体。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组织了一个“新村”。这都是世人指为空想家的实验，都是他们的实际运动中最有兴味的事实，都是他们同志中的有志者或继承者集合起来组织一个团体在那里实现他们所理想的社会组织，作一个关于理想社会的标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这新社会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实现世界的改造的计划。Owen 派与 Fourier 派在美洲的运动，虽然因为离开了多数人民去传播他们的理想，就象在那没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种子的一样，归于失败了。而 Noyes 作《美国社会主义史》却批评他们说，Owen 主义的新村落，Fourier 主义的新团体，差不多生下来就死掉了。现在人都把他们忘了。可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永远存留在国民生命之中。如今在那几百万不曾参加他们的实验生活，又不是 Owen 主义者，又不是 Fourier 主义者，只是没有理论的社会主义者，只信社会有科学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人中，还有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犹尚伊存。这日向的“新村”，有许多点象那在美洲新大陆上已成旧梦的新村。而日本的学者及社会，却很注意。河上肇博士说：他们的企画中所含的社会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永存在人人心中。最近本社仲密先生自日本来信也说：“此次东行在日向颇觉愉快。”可见就是这种高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验，不把他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

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

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在清朝时,我们可用民主主义作工具去推翻爱亲党罗家的皇统。在今日,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军阀的势力。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

二、假冒牌号的危险 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亚丹·斯密史留下了一

部书，人人都称赞他，却没有人读他。马查士留下了一部书，没有一个人读他，大家却都来滥用他。英人邦纳(Bonar)氏早已发过这种感慨。况在今日群众运动的时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多半是群众运动的隐语、旗帜，多半带着些招牌的性质。既然带着招牌的性质，就难免招假冒牌号的危险。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群众的赞许，就有旺麻子等来混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叶得了群众的照顾，就有汪正大等来混他的招牌。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辞，很在社会上流行，就有安福派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这种假冒招牌的现象，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淆乱真实也诚然淆乱真实。可是这种现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就闭了他的剪铺。王正大不能因为汪正大等也来贩茶叶，就歇了他的茶庄。开荒的人，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的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鸚鵡、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三、所谓过激主义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当时听说孟和先生因为对于

布尔扎维克不满意，对于我的对于布尔扎维克的态度也很不满意（孟和先生欧游归来，思想有无变动，此时不敢断定）。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不过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所以一听人说他们实行“妇女国有”，就按情理断定是人家给他们造的谣言。后来看见美国《New Republ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这话果然是种谣言，原是布尔扎维克政府给俄国某城的无政府党人造的。以后展转传说，人又给他们加上了。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报发表的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几篇论文，很可以供我们研究俄事的参考，更可以证明妇女国有的话全然无根了。后来又听人说他们把克鲁泡脱金氏枪毙了，又疑这话也是谣言。据近来欧美各报的消息，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无恙。在我们这盲目的社会，他们那里知道 Bolshevism 是什么东西？这个名辞怎么解释？不过因为迷这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日本人把他译作过激主义，他们看“过激”这两个字很带着些危险，所以顺手拿来，乱给人戴。看见先生们的文学改革论，激烈一点，他们就说先生是过激党。看见章太炎、孙伯兰的政治论，激烈一点，他们又说这两位先生是过激党。这个口吻是根据我们四千年先圣先贤道统的薪传。那“扬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逻辑，就是他们唯一的经典。现在就没有“过激党”这个新名辞，他们也不难把那旧武器拿出来攻击我们。什么“邪说异端”哪，“洪水猛兽”

哪，也都可以给我们随便戴上。若说这是谈主义的不是，我们就谈贞操问题，他们又来说我们主张处女应该与人私通。我们译了一篇社会问题的小说，他们又来说我们提倡私生子可以杀他父母。在这种浅薄无知的社会里，发言论事，简直的是万难，东也不是，西也不是。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鸚鵡、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那有闲工夫去理他！

四、根本解决 “根本解决”这个话，很容易使人闲却了现在不去努力，这实在是一个危险。但这也不可一概而论。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

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天天只是在群众里传布那集产制必然的降临的福音，结果除去等着集产制必然的成熟以外，一点的预备也没有作，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以上拉杂写来，有的和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已经占了很多的篇幅了。如有未当，请赐指教。以后再谈吧。

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

1919年8月17日

《每周评论》第35号

五 峰 游 记

(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七日)

我向来惯过“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的日子，一切日常生活的经过，都记不住时日。

我们那晚八时顷，由京奉线出发，次日早晨曙光刚发的时候，到滦州车站。此地是辛亥年，张绍曾将军督率第二十镇停军不发，拿十九信条要胁清廷的地方。后来到底有一标在此起义，以众寡不敌失败，营长施从云王金铭、参谋长白亚雨等殉难。这是历史上的纪念地。

车站在滦州城北五里许，紧靠着横山。横山东北下临滦河的地方，有一个行宫，地势很险，风景却佳。而今作了我们老百姓旅行游览的地方。

由横山往北，四十里可达卢龙。山路崎岖，水路两岸万山重叠，暗崖很多，行舟最要留神，而景致绝美。由横山往南，滦河曲折南流入海，以陆路计约有百数十里。

我们在此雇了一只小舟，顺流而南。两岸都是平原，遍地的禾苗，都很茂盛，但已觉受旱。禾苗的种类，以高粱为多，因为滦河一带，主要的食粮，就是高粱。谷黍豆类也有。滦水每年泛滥，河身移徙无定，居民都以为苦。其实滦河经过的地方，虽有时受害，而大体看来，却很富厚，因为他的破坏中，却带来了许多

的新生活种子、原料。房屋老了，经他一番破坏，新的便可产生。土质乏了，经他一回滩淤，肥的就会出现。这条滦河，简直是这一方的旧生活破坏者，新生活创造者。可惜人都是苟安，但看见他的破坏，看不见他的建设，却很冤枉了他。

河里小舟飘着。一片斜阳射在水面，一种金色的浅光，衬着那岸上的绿野。景色真是好看。

天到黄昏，我们还未上岸。从舟人摇橹的声中，隐约透出了远村的犬吠，知道要到我们上岸的村落了。

到了家乡，才知道境内很不安静。正有“绑票”^①的土匪，在各村骚扰。还有“花会”^②照旧开设。

过了两三日，我便带一个小孩，来到昌黎的五峰。是由陆路来的，约有八十里。从前昌黎的铁路警察，因在车站干涉日本驻屯军的无礼的行动，曾有五警士为日兵惨毙。这也算是一个纪念地。

五峰是碣石山的一部，离车站十余里，在昌黎城北。我们清早雇骡车运行李到山下，车不能行了，只好步行上山。一路石径崎岖，曲折的很，两旁松林密布，间或有一两人家很清妙的几间屋，筑在山上，大概窗前都有果园。泉水从石上流着，潺潺作响。当日恰遇着微雨，山景格外的新鲜。走了约四里许，才到五峰的

① “绑票”就是把人绑了去向他家里要钱，钱到可以把他赎回，如不来赎或是钱不足额，就把被绑的人杀了，叫作“撕票”。——作者注

② 乐亭有“花会”的恶风，系一种赌局，有三十六门，每日两次，由三十六门中圈出一门叫做“出会”，中者一文可得三十文。各村都有叫做“跑封”的人，把押会人的封和钱送到会局，中了的封也由他把钱从会局带来交给押会的人。收封时会局给他抽头，押中了时会人给他抽头。各村男女小孩都如疯狂似狂的押会，荒废正业，败坏风俗，倾家荡产的常有，妇女因输钱过多，迫而卖淫、自尽的也有。——作者注

韩公祠。

五峰有个胜境，就在山腹。望海、锦绣、平斗、飞来、挂月五个山峰环抱如椅。好事的人，在此建了一座韩文公祠。下临深涧，涧中树木丛森。东南可望渤海，碧波万顷，一览无尽。我们就在此借居了。

看守祠宇的，是一双老夫妇，年事都在六十岁以上，却很健康。此外一狗、一猫、两只母鸡，构成他们那山居的生活。我们在此，老夫妇很替我们操作。

祠内有两个山泉可饮。煮饭烹茶，都从那里取水，用松枝作柴，颇有一种趣味。

山中松树最多，果树有苹果、桃、杏、梨、葡萄、黑枣、胡桃等。今年果收都不佳。

来游的人却也常有，但是来到山中，不是吃喝，便是赌博，真是大杀风景。

山中没有野兽，没有盗贼，我们可以夜不闭户，高枕而眠。

久旱乡间多求雨的，都很热闹。这是中国人的群众运动。

昨日山中落雨，云气把全山包围。树里风声雨声，有波涛澎湃的样子。水自山间流下，却成了瀑布。雨后大有秋意。

1919年8月31日、9月7日
《新生活》第2、3期

署名：孤松

“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

我们的理想，是在创造一个“少年中国”。

“少年中国”能不能创造成立，全看我们的“少年运动”如何。

我们“少年中国”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创造；不是铸定的偶像，是活动的生活。我想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人人理想中必定都有一个他自己所欲创造而且正在创造的“少年中国”。你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不必相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又和他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未必一致。可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朋友，毕竟都在携手同行，沿着那一线清新的曙光，向光明方面走。那光明里一定有我们的“少年中国”在。我们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那就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少年中国”。仿佛象一部洁白未曾写过的历史空页，我们大家你写一页，我写一页，才完成了这一部“少年中国”史。

我现在只说我自己理想中的“少年中国”。

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

为创造我们理想的“少年中国”，我很希望这一班与我们理想相同的少年好友，大家都把自己的少年精神拿出来，努力去作

我们的“少年运动”。我们“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要作两种的文化运动：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个是物质改造的运动。

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把那占据的冲动，变为创造的冲动；把那残杀的生活，变为友爱的生活；把那侵夺的习惯，变为同劳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为公善的心理。这个精神的改造，实在是要与物质的改造一致进行，而在物质的改造开始的时期，更是要紧。因为人类在马克思所谓“前史”的期间，习染恶性很深，物质的改造虽然成功，人心内部的恶，若不剔除净尽，他在新社会新生活里依然还要复萌，这改造的社会组织，终于受他的害，保持不住。

物质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那劳工的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饭。因为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在从前的经济组织里，何尝没有人讲过“博爱”、“互助”的道理，不过这表面构造（就是一切文化的构造）的力量，到底比不上基础构造（就是经济构造）的力量大。你只管讲你的道理，他时时从根本上破坏你的道理，使他永远不能实现。

“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呵！我们的一生生涯，是向“少年中国”进行的一条长路程。我们为达到这条路程的终点，应该把这两种文化运动，当作车的两轮，鸟的双翼，用全生涯的努力鼓舞着向前进行，向前飞跃。

“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呵！我们要作这两种文化运动，不该常常漂泊在这都市上，在工作社会以外作一种文化的游民；应

该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劳农的伴侣。吸烟休息的时间，田间篱下的场所，都有我们开发他们，慰安他们的机会。须知“劳工神圣”的话，断断不配那一点不作手足劳动的人讲的；那不劳而食的知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中国今日的情形，都市和村落完全打成两橛，几乎是两个世界一样。都市上所发生的问题，所传播的文化，村落里的人，毫不发生一点关系；村落里的生活，都市上的人，大概也是漠不关心，或者全不知道他是什么状况。这全是交通阻塞的缘故。交通阻塞的意义，有两个解释：一是物质的交通阻塞，用邮电舟车可以救济的；一是文化的交通阻塞，非用一种文化的交通机关不能救济的。在文化较高的国家，一般劳农容受文化的质量多，只要物质的交通没有阻塞，出版物可以传递，文化的传播，就能达到这个地方；而在文化较低的国家，全仗自觉少年的宣传运动，在这个地方，文化的交通机关，就是在山林里村落里与那些劳农共同劳动自觉的少年。只要山林里村落里有了我们的足迹，那精神改造的种子，因为得了洁美的自然，深厚的土壤，自然可以发育起来。那些天天和自然界相接的农民，自然都成了人道主义的信徒。不但在共同劳作的生活里可以感化传播于无形，就是在都市上产生的文化利器，——出版物类——也必随着少年的足迹，尽量输入到山林里村落里去。我们应该学那闲暇的时候就来都市里著书，农忙的时候就在田间工作的陶士泰先生，文化的空气才能与山林里村落里的树影炊烟联成一气，那些静沉沉的老村落才能变成活泼泼的新村落。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

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啊！我们既然是二十世纪的少

年，就该把眼光放的远些，不要受腐败家庭的束缚，不要受狭隘爱国心的拘牵。我们的新生活，小到完成我的个性，大到企图世界的幸福。我们的家庭范围，已经扩充到全世界了，其余都是进化轨道上的遗迹，都该打破。我们应该拿世界的生活作家庭的生活，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我们的“少年中国”观，决不是要把中国这个国家，作少年的舞台，去在列国竞争场里争个胜负，乃是要把中国这个地域，当作世界的一部分，由我们居住这个地域的少年朋友们下手改造，以尽我们对于世界改造一部分的责任。我们“少年运动”的范围，决不止于中国；有时与其他亚细亚的少年握手，作亚细亚少年的共同运动；有时与世界的少年握手，作世界少年的共同运动，也都是我们“少年中国主义”分内的事。

总结几句话，就是：

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致改造的运动，是打破知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是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组织的运动，是以世界为家庭扩充大联合的运动。

少年中国的少年呵！少年中国的运动，就是世界改造的运动，少年中国的少年，都应该是世界的少年。

1919年9月15日

《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

署名：李大钊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月)

(一)

一个德国人说过，五十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因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他那名著《资本论》三卷，合计二千一百三十五页，其中第一卷是马氏生存时刊行的，第二、第三两卷是马氏死后他的朋友昂格思替他刊行的。这第一卷和二、三两卷中间，难免有些冲突矛盾的地方，马氏的书本来难解，添上这一层越发难解了。加以他的遗著未曾刊行的还有很多，拚上半生的工夫来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我平素对于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今天硬想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僭越的很。但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

* 这篇文章分上下两篇，先后刊登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和第六号上。《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刊面标的出版时间是一九一九年五月，但从当时报刊上刊登的《新青年》出版广告看，实际出版时间应是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再从文中引用了一九一九年八月三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欧游记者明生君通信”来看，八月份，此文的上篇还在写作中（参见刘维：《一个必要的考据》，一九六〇年八月四日《光明日报》）。——编者

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一九一八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万一因为作者的知能鄙陋，有误解马氏学说的地方，亲爱的读者肯赐以指正，那是作者所最希望的。

(二)

我于评述“马克思主义”以前，先把“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占若何的地位，略说一说。

由经济思想史上观察经济学的派别，可分为三大系，就是个人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与人道主义经济学。

个人主义经济学，也可以叫作资本主义经济学。三系中以此为最古。著《原富》的亚丹·斯密(Adam Smith)是这一系的鼻祖。亚丹·斯密以下，若马查士(Malthus)、李嘉图(Ricardo)、杰慕士·穆勒(James Mill)等，都属于这一系。把这一系的经济学发挥光大，就成了正系的经济学，普通称为正统学派。因为这个学派是在模范的资本家国的英国成立的，所以英国以外的学者也称他为英国学派。这个学派的根本思想是承认现在的经济组织为是，并且承认在此经济组织内，各个人利己的活动为是。他们以为现在的经济组织，就是个人营利主义的组织，是最

巧最妙、最经济不过的组织。从生产一面讲，各人为自己的利益，自由以营经济的活动，自然努力以致自己的利益于最大的程度。其结果：社会全体的利益不期增而自增。譬如各人所有的资本，自然都知道把他由利益较少的事业，移到利益较多的事业上去。社会全体的资本，自然也都舍了那利益较少的事业，投到利益较多的事业上去。所以用不着什么政治家的干涉，自由竞争的结果，社会上资本的全量自然都利用到社会全体最有利的方面去。而事业家为使他自己的利益达于最大的程度，自然努力以使他自己的制品全体的价增大，努力以求其商品全体的卖出额换回很多的价来。社会全体的富是积个人的富而成的。个人不断的为增加自己的富去努力，你这样作，他也这样作，那社会全体的富也不期增而日增了。再从消费一面讲，我们日用的一切物品，都不是在自己家内生产的，都是人家各自为营利、为商卖而生产的。自己要得一种物品：米、盐、酱、醋，乃至布匹、伞、履、新闻、杂志之属，都不是空手向人家讨得来的。依今日的经济组织，都是各人把物卖钱，各人拿钱买货。各人按着自己最方便的法子去活动，比较着旁人为自己代谋代办，亲切的多，方便的多，经济的多。总而言之，他们对于今日以各人自由求各自利益为原则的经济组织，很满足，很以为妥当。他们主张维持他，不主张改造他。这是个人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的经济学。

以上所述个人主义经济学，有二个要点：其一是承认现在的经济组织为是；其二是承认在这经济组织内，各个人利己的活动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正反对他那第一点。人道主义经济学正反对他那第二点。人道主义经济学者以为无论经济组织改造到

怎么好的地步，人心不改造仍是现在这样的贪私无厌，社会仍是没有改善的希望，于是否认经济上个人利己的活动，欲以爱他的动机代那利己的动机；不置重于经济组织改造的一方面，而置重于改造在那组织下活动的各个人的动机。社会主义经济学者以为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了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于是否认现在的经济组织，而主张根本改造。人道主义经济学者持人心改造论，故其目的在道德的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学者持组织改造论，故其目的在社会的革命。这两系都是反对个人主义经济学的，但人道主义者同时为社会主义者的也有。

现在世界改造的机运，已经从俄、德诸国闪出了一道曙光。从前经济学的正统，是在个人主义。现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经济学，将要取此正统的位系，而代个人主义以起了。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这正是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

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如何重要，也就可以知道了。

本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并非自马氏始的，马氏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主张，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至于马氏才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立，而别树一帜，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故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不能不推马克思。

(三)

“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价值，既如上述，我当更进而就他的学说的体系略为大体的分析，以便研究。

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豫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命运；然后更根据这个豫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为研究上便利起见，就他的学说各方面分别观察，大概如此。其实他的学说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都有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关系。

(四)

请先论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他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与前世纪初，在生物学上发现过的运动，有些相类。在那个时候是用以说明各种形态学上的特征、关系的重要，志在得一个种的自然分类，与关于生物学上有机体生活现象更广的知识。这种运动既经指出那内部最深的构造，比外部明显的建造，若何重要，唯物史观就站起来反抗那些历史家与历史哲学家，把他们多年所推崇为非常重要的外部的社会构造，都列于第二的次序；而那久经历史家辈蔑视，认为卑微暧昧的现象的，历史的唯物论者却认为于研究这很复杂的社会生活全部的构造与进化，有莫大的价值。

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自己不能变化的，也不能使别的现象变化。其他一切非经济的物质的要件，如人种的要件、地理的要件等等，本来变化很少，因之及于社会现象的影响也很小，但于他那最少的变化范围内，多少也能与人类社会的行程以影响。在原始未开时代的社会，人类所用的劳作工具，极其粗笨，几乎完全受制于自然。而在新发见的地方，向来没有什么意味的地理特征，也成了非常重大的条件。所以历史的唯物论者，于那些经济以外的一切物质的条件，也认他于人类社会有意义，有影响。不过因为他的影响甚微，而且随着人类的进化日益

减退，结局只把他们看作经济的要件的支流罢了。因为这个缘故，有许多人主张改称唯物史观为经济史观。

唯物史观，也不是由马氏创的。自孔道西(Condorcet)依着器械论的典型，想把历史作成一科学，而期发见出一普遍的力，把那变幻无极的历史现象，一以贯之，已经开了唯物史观的端绪。故孔道西算是唯物史观的开创者。至桑西门(Saint-Simon)把经济的要素，比精神的要素看得更重。十八世纪时有一种想象说，说法兰西历史的内容不过是佛兰坎人与加利亚人间的人种竞争。他受了此说的影响，谓最近数世纪间的法国历史不外封建制度与产业的竞争，其争以大革命期达于绝顶。而产业初与君国制联合，以固专制的基础，基础既成又扑灭王国制。产业的进步是历史的决定条件，科学的进步又为辅助他的条件。Thierry、Mignet 及 Guizot 辈继起，袭桑西门氏的见解，谓一时代的理想、教义、宪法等，毕竟不外当时经济情形的反映。关于所有权的法制，是尤其重要的。蒲鲁东亦以国民经济为解释历史的钥匙，信前者为因，后者为果。至于马氏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

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经济现象虽用他自己的模型，制定形成全社会的表面构造（如法律、政治、伦理，及种种理想上、精神上的现象都是），但这些构造中的那一个也不能影响他一点。受人类意思的影响，在他是永远不能的。就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法律他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中最直接的表示，也只能受经济现象的

影响,不能与丝毫的影响于经济现象。换言之,就是经济现象只能由他一面与其他社会现象以影响,而不能与其他社会现象发生相互的影响,或单受别的社会现象的影响。

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但这经济构造的本身,又按他每个进化的程级,为他那最高动因的连续体式所决定。这最高动因,依其性质,必须不断的变迁,必然的与社会的经济的进化以诱导。

这最高动因究为何物,却又因人而异。Loria所认为最高动因的,是人口的稠庶。人口不断的增加,曾经决定过去四个连续的根本状态,就是集合、奴隶所有、奴仆(Servile)、佣工。以后将次发生的现象,也该由此决定。马克思则以“物质的生产力”为最高动因:由家庭经济变为资本家的经济,由小产业制变为工场组织制,就是由生产力的变动而决定的。其他学者所认为最高动因的,又为他物。但他们有一个根本相同的论点,就是:经济的构造,依他内部的势力自己进化,渐于适应的状态中,变更全社会的表面构造,此等表面构造,无论用何方法,不能影响到他这一方面,就是这表面构造中最重要法律,也不能与他以丝毫的影响。

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是合理的。我们晓得有许多法律,在经济现象的面前,暴露出来他的无能。十七、八世纪间那些维持商业平准,奖励金块输入的商法,与那最近英国禁遏脱拉斯(Trust)的法律都归无效,就是法律的力量不能加影响于经济趋势的明证。也有些法律,当初即没有力量与经济现象竞争,而后来他所适用的范围,却自一点一点的减缩,至于乌有。这全是经济现象所自致的迁移,无与于法律的影响。

响。例如欧洲中世纪时禁抑暴利的法律，最初就无力与那高利率的经济现象竞争，后来到了利润自然低落，钱利也跟着自然低落的时候，他还继续存在，但他始终没有一点效果。他虽然形式上在些时候维持他的存在，实际上久已无用，久已成为废物。他的存在全是法律上的惰性，只足以证明法律现象远追不上他所欲限制的经济现象，却只在他的脚后一步一步的走，结局惟有服从而已。潜深的社会变动，惟依他自身可以产生，法律是无从与知的。当罗马帝国衰颓时代，一方面呈出奴隶缺乏，奴价腾贵的现象；一方面那一大部分很多而且必要的寄生阶级造成一个自由民，与新自由民的无产阶级。他们的贫困日益加甚，自然渐由农业上的奴仆劳动、工业上的佣工劳动，生出来奴隶制度的代替，因为这两种劳动全于经济上有很多的便利。若是把废奴的事业全委之于当时的基督教、人类同胞主义的理想，那是绝无效果的。十八世纪间英人曾标榜过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的宗教。到了资本家经济上需要奴隶的时候，他们却把奴制输入到美洲殖民地，并且设法维持他。这类的事例不胜枚举，要皆足以证明法律现象只能随着经济现象走，不能越过他，不能加他以限制，不能与他以影响。而欲以法律现象奖励或禁遏一种经济现象的，都没有一点效果。那社会的表面构造中最重要法律，尚且如此，其他如综合的理想等等，更不能与经济现象抗衡。

(五)

迄兹所陈是历史的唯物论者共同一致的论旨。今当更进而述马氏独特的唯物史观。

马氏的经济论，因有他的名著《资本论》详为阐发，所以人都知道他的社会主义系根据于一定的经济论的。至于他的唯物史观，因为没有专书论这个问题，所以人都不甚注意。他的《资本论》，虽然彻头彻尾以他那特有的历史观作基础，而却不见有理论的揭出他的历史观的地方。他那历史观的纲要，稍见于一八四七年公刊的《哲学的贫困》，及一八四八年公布的《共产者宣言》。而以一定的公式表出他的历史观，还在那一八五九年他作的那《经济学批评》的序文中。现在把这几样著作里包含他那历史观的主要部分，节译于下，以供研究的资料。

(一)见于《哲学的贫困》中的：

“经济学者蒲鲁东氏，把人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下制造罗纱、麻布、绢布的事情，理解的极其明了。可是这一定的社会关系，也和罗纱、麻布等一样，是人类的生产物，他还没有理解。社会关系与生产力有密切的连络。人类随着获得新生产力，变化其生产方法；又随着变化生产方法，——随着变化他们得生活资料的方法——他们全变化他们的社会关系。手臼造出有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造出有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而这样顺应他们的物质的生产方法，以建设其社会关系的人类，同时又顺应他们的社会关系，以作出其主义、思想、范畴。”

(二)见于《共产者宣言》中的：

“凡以前存在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希腊的自由民与奴隶，罗马的贵族与平民，中世的领主与农奴，同业组合的主人与职工，简单的说，就是压制者与被压制者，自古以来，常相反目，而续行或隐然，或公然，不断的争

斗总是以全社会革命的变革，或以相争两阶级的共倒结局的一切争斗。试翻昔时的历史，社会全被区别为种种身分者，社会的地位有多样的等差，这类现象我们殆到处可以发见。在古代罗马则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则有封建诸侯、家臣、同业组合的主人、职工、农奴，且于此等阶级内更各分很多的等级。由封建的社会的崩坏，产出来的近世的社会，仍没把阶级的对立废止。他不过带来了新阶级、新压制手段、新争斗的形式，以代旧的罢了。

“可是到了我们的时代，就是有产者本位的时代，却把阶级的对立简单了。全社会越来越分裂为互相敌视的两大阵营，为相逼对峙的两大阶级：就是有产者与无产者。

“……依以上所述考之，资本家阶级所拿他作基础以至勃兴的生产手段及交通手段，是已经在封建社会作出来的。此等生产手段及交通手段的发展达于一定阶段的时候，封建的社会所依以营生产及交换的关系，就是关于农业及工业封建的组织，简单一句话就是封建的所有关系，对于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久已不能适应了。此等关系，现在不但不能奖励生产，却妨碍生产，变成了许多的障碍物，所以此等关系不能不被破坏，果然又被破坏了。

“那自由竞争就随着于他适合的社会及政治的制度，随着有产者阶级的经济的及政治的支配，代之而起了。

“有产者阶级，于其不满百年的阶级支配之下，就造出比合起所有过去时代曾造的还厚且巨的生产力。自然力的征服，机械、工业及农业上的化学应用，轮船、火车、电报，全大陆的开垦，河川的开通，如同用魔法唤起的这些人类——

在前世纪谁能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能包容在社会的劳动里呢？

“把这样伟大的生产手段及交通手段，象用魔法一般唤起来的资本家的生产关系及交通关系，——资本家的所有关系——现代的资本家的社会，如今恰与那魔术师自念咒语唤起诸下界的力量，而自己却无制御他们的力量了的情事相等。数十年的工商史，只是现代的生产力，对于现代的生产关系，对于那不外有产者的生活条件及其支配力的所有关系，试行谋叛的历史。我们但举那商业上的恐慌——因隔一定期间便反复来袭，常常胁迫有产社会的全存在的商业恐慌——即足以作个证明。……有产者阶级颠覆封建制度的武器，今乃转而向有产者阶级自身。

“有产者阶级不但锻炼致自己于死的武器，并且产出去挥使那些武器的人——现代的劳动阶级、无产者就是。

“人人的观念、意见及概念，简单一句话，就是凡是属于人间意识的东西，都随着人人的生活关系，随着其社会的存在，随着其社会的存在，一齐变化。这是不用深究就可以知道的。那思想的历史所证明的，非精神上的生产随着物质上的生产一齐变化而何？”

(三)见于《经济学批评》序文中的：

“人类必须加入那于他们生活上必要的社会的生产，一定的、必然的、离于他们的意志而独立的关系，就是那适应他们物质的生产力一定的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此等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的构造——法制上及政治上所依以成立的、一定的社会的意识形态所适应的真实基

础——物质的生活的生产方法，一般给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过程，加上条件。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其存在，他们的社会的存在反是决定其意识的东西。

“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于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与他从来所在那里面活动当时的生产关系，与那不过是法制上的表现的所有关系冲突。这个关系，这样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而为束缚。于是乎社会革命的时代来。巨大的表面构造的全部，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或徐，或激，都变革了。

“当那样变革的观察，吾人非常把那在得以自然科学的论证的经济的生产条件之上所起的物质的变革，与那人类意识此冲突且至决战的，法制上、政治上、宗教上、艺术上、哲学上的形态，简单说就是观念上的形态，区别不可。想把那样变革时代，由其时代的意识判断，恰如照着一个人怎样想他自己的事，以判断其人一样，不但没有所得，意识这个东西宁是由物质生活的矛盾，就是存在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冲突，才能说明的。

“一社会组织，非到他的全生产力，在其组织内发展的一点余地也没有了以后，决不能颠覆去了。这新的，比从前还高的生产关系，在这个东西的物质的生存条件于旧社会的母胎内孵化完了以前，决不能产生出来。人类是常只以自能解决的问题为问题的。因为拿极正确的眼光去看，凡为问题的，惟于其解决所必要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也在成立过程中的时会，才能发生。

“综其大体而论，吾人得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及现代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为社会经济的组织进步的阶段。而

在此中，资本家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之采敌对形态的最后。——此处所谓敌对，非个人的敌对之意，是由各个人生活的社会的条件而生的敌对之意，——可是在资本家社会的母胎内发展的生产力，同时作成于此敌对的解决必要的物质条件。人类历史的前史，就以此社会组织终。”

（以上的译语，从河上肇博士。）

据以上所引，我们可以略窥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领了。现在更把这个要领简单写出，以期易于了解。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为主动；属于人类意识的东西，丝毫不能加他以影响；他却可以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思想，使他们必须适应他的行程。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手臼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而这生产力虽在那束缚他、妨碍他的社会组织中，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

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应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可是这个生产力，非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那社会组织是万万不能打破。而这在旧社会组织内，长成他那生存条件的新社会组织，非到自然脱离母胎，有了独立生存的运命，也是万万不能发生。恰如孵卵的情形一样，人为的助长，打破卵壳的行动，是万万无效的，是万万不可能的。

以上是马克思独特的唯物史观。

(六)

与他的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那阶级竞争说。

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他们所以牵入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由历史的唯物论者的眼光去看，十字军之役也含着经济的意味。当时繁盛的义大利共和国中，特如 Venice 的统治阶级，实欲自保其东方的繁富市场。宗教革新的运动，虽然戴着路德的名义，其时的民众中，也似乎有一大部分是意在免去罗马用种种方法征课的重税（那最后有道理的赎罪符也包在内）。基督教的传布，也是应无产阶级的要求作一种实际的运动。把首都由罗马迁至 Byzantium（就是现在的康士坦丁堡），与那定基督教为官教，也是经济的关系。这两件事都是为

取罗马帝国从来的重心而代之。因为当时的中产阶级，实为东方富有财势的商贾阶级，势力很厚。他们和那基督教的无产阶级相合，以与罗马寄生的贵族政治分持平衡的势力，而破坏之。法国大革命也全是因为资本家的中级势力，渐渐可以压迫拥有土地的贵族，其间的平衡久已不固，偶然破裂，遂有这个结果。就是法国历史上迭起层兴的政治危机，单由观念学去研究终于神秘难解。象那拿破仑派咧，布尔康家正统派咧，欧尔林家派咧，共和党咧，平民直接执政党咧，他们背后都藏着很复杂的经济意味。不过打着这些旗帜互相争战，以图压服他的反对阶级，而保自己阶级经济上的利益就是了。这类的政治变动，由马克思解释，其根本原因都在殊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我们看那马克思与昂格思的《共产者宣言》中“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的话，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批评》序文中，也说“从来的历史尽是在阶级对立——固然在种种时代呈种种形式——中进行的”，就可以证明他的阶级竞争说，与他的唯物史观有密切关系了。

就这阶级竞争的现象，我们可以晓得，这经济上有共同利害自觉的社会团体，都有毁损别的社会团体以增加自己团体利益的倾向。这个倾向，斯宾塞谓是本于个人的利己心。他在《社会学研究》中说：“个人的利己心引出由他们作成的阶级的利己心，于分别的努力以外，还要发生一种协同的努力，去从那社会活动的总收入中，取些过度的领分。这种综合的倾向，在每阶级中这样发展，必须由其他诸阶级类似的综合的倾向来维持其平衡。”由此以观，这阶级竞争在社会的有机体中，恰与 Wilhelm Roux 所发见的“各不同的部分官能组织细胞间的竞争，在各有

机体中进行不已”的原则相当。宇宙间一切生命都向“自己发展”(Self-expansion)活动不已。“自己发展”是生物学上、社会学上一切有机的进化全体根本的动机,是生物界普遍无敌的倾向。阶级竞争是这种倾向的无量表现与结果中的一个。而在马克思则谓阶级竞争之所由起,全因为土地共有制崩坏以后,经济的构造都建在阶级对立之上。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家的,这些生产方法出现的次第,可作经济组织进化的阶段,而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中采敌对形式的最后。阶级竞争也将与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同时告终。至于社会为什么呈出阶级对立的现象呢?马氏的意见以为全是因为一个社会团体,依生产手段的独占,掠夺他人的余工余值(余工余值说详后)的原故。但这两种阶级,最初不过对于他一阶级,可称一个阶级,实则阶级的本身还没有成个阶级,还没有阶级的自觉。后来属于一阶级的,知道他们对于别的阶级,到底是立于不相容的地位,阶级竞争是他们不能避的命运,就是有了阶级的自觉,阶级间就起了竞争。当初只是经济的竞争,争经济上的利益,后来更进而为政治的竞争,争政治上的权力,直至那建在阶级对立上的经济的构造自己进化,发生了一种新变化为止。这样看来,马氏并非承认这阶级竞争是与人类历史相终始的,他只把他的阶级竞争说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与其说他的阶级竞争说是他的唯物史观的要素,不如

说是对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

(七)

马氏的唯物史观及其阶级竞争说，既已略具梗概，现在更把对于其说的评论，举出几点，并述我的意见。

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无论是直接在经济现象本身上的活动，是间接由财产法或一般法制上的限制，常可以有些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Eugenio Rignano 驳他道：“既认各阶级间有为保其最大经济利益的竞争存在，因之经济现象亦自可以随这个或那个阶级的优越，在一方面或他一方面受些限制，又说经济的行程象那天体中行星的轨道一样的不变，从着他那不能免的进路前进，人类的什么影响都不能相加。那么那主要目的在变更经济行程的阶级竞争，因为没有什么可争，好久就不能存在了。在太阳常行的轨道上，有了一定的变更，一定可以贡献很大的经济利益于北方民族，而大不利于南方民族。但我想在历史纪录中，寻找一种族或一阶级的竞争，把改变太阳使他离了常轨作目的的，是一件无益的事。”这一段话可谓中了要扼。不过这个明显的矛盾，在马氏学说中，也有自圆的说法。他说自从土地共有制崩坏以来，经济的

构造都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生产力一有变动，这社会关系也跟着变动。可是社会关系的变动，就有赖于当时在经济上占不利地位的阶级的活动。这样看来，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但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

这全因为一个学说最初成立的时候，每每陷于夸张过大的原故。但是他那唯物史观，纵有这个夸张过大的地方，于社会学上的进步，究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因为他发见那阶级竞争的根本法则；因为他指出那从前全被误解或蔑视的经济现象，在社会学的现象中是顶重要的；因为他把于决定法律现象有力的部分归于经济现象，因而知道用法律现象去决定经济现象是逆势的行为；因为他借助于这些根本的原则，努力以图说明过去现在全体社会学上的现象。就是这个，已足以认他在人类思想有效果的概念中，占优尚的位置，于学术界思想界有相当的影响。小小的瑕疵，不能掩了他那莫大的功绩。

有人说，历史的唯物论者以经济行程的进路为必然的、不能免的，给他加上了一种定命的采色，后来马克思派的社会党，因为信了这个定命说，除去等着集产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议也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以致现代各国社会党都遇见很大的危机。这固然可以说是马氏唯物史观的流弊，然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者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无论

赞否马氏别的学说的人，对于此点，都该首肯。而在《社会主义者评论》(«Socialist Review») 第一号揭载的昂格思函牍中，昂氏自己说，他很喜欢看见美国的工人，在于政治信条之下，作出一种组织，可见他们也并不是坐待集产制自然成熟，一点不去活动的。而在别一方面，也可以拿这社会主义有必然性的说，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信他必然发生，于宣传社会主义上，的确有如耶教福音经典的效力。

历史的唯物论者说经济现象可以变更法律现象，法律现象不能变更经济现象，也有些人起了疑问。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承认一阶级的团体活动，可以改造经济组织，那么一阶级的团体活动，虽未至能改造经济组织的程度，而有时亦未尝没有变更经济行程趋势的力量。于此有个显例，就是现代劳工阶级的联合活动，屡见成功，居然能够屈服经济行程的趋势。这种劳工结合，首推英国的工联(Trade unions)为最有效果，他们所争在增加劳银。当时经济现象的趋势是导工人于益困益卑的地位，而工联的活动竟能反害为利。大战起来以后，工联一时虽停止活动，战事既息，他们又重张旗鼓。听说铁路人员总会、交通劳动者(专指海上劳动者)联合会，和矿工联合会三种工联，联合起来，向政府及资本家要求种种条件，声势甚猛(参照《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欧游记者明生君通信)，将来的效果必可更大。这自觉的团体活动，还没有取得法律的性质，已经证明他可以改变经济现象的趋势，假使把这种活动的效力，用普通法律，或用那可以塞住经济现象全进路的财产法，保障起来，巩固起来，延长他那效力的期间，他那改变经济现象趋势的效力，不且更大么？试把英、法二国的土地所有制比较来看：在英国则诺曼的侵略者及

其子孙，依战胜余威，获据此全土，而与其余人口相较，为数甚少，故利在制定限嗣财产制与脱拉斯制，以保其独占权，结果由此维持住大地产制。在法国则经数世纪的时间，贵族及僧侣阶级的财产为革命的中产阶级所剥夺，这剥夺他们的中级人民人口的数，又占全体的大部，故利在分割而不在独占，适与英国的诺曼侵略者及其子孙相反，于是中级人民催着通过特别遗书遗产法，以防大财产制的再见。他们二国的财产法和防遏或辅助田间经济现象趋势的法制，这样不同，所以导他们经济的表现与进化于不同的境界。一则发生很大的领地财产、隐居主义、为害田禾的牧业、全国的人口减少、农村人口的放逐与财富的分配极不平均种种现象。一则发生土地过于割裂、所有者自治其田畴、强盛的农业、节俭之风盛行、分配平均种种现象。这样看来，经济现象和法律现象，都是社会的原动力，他们可以互相影响，都于我们所求的那正当决定的情状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历史的唯物论者所说经济现象有不屈不挠的性质，就是团体的意思、团体的活动，在他面前都得低头的話，也不能认为正确了。但是此等团体的活动，乃至法律，仍是在那可以容他发生的经济构造以上的现象，仍是随着经济的趋势走的，不是反着经济的趋势走的。例如现代的经济现象，一方面劳工阶级的生活境遇日趋于困难；一方面益以促其阶级的自觉，益增其阶级活动的必要，益使其活动的效果足以自卫。这都是现在资本主义制下自然的趋势，应有的现象，不能作足以证明法律现象可以屈抑经济趋势的理据；与其说是团体行动，或法律遏抑经济趋势的结果，毋宁说是经济本身变化的行程。英、法二国财产制之著效，也是在他们依政治的势力，在经济上得占优势，得为权力阶级；以后的事，也

全是阶级竞争的结果。假使在英国当时定要施行一种防遏大地产制的法律,在法国当时定要施行一种禁抑小财产制的法律,恐怕没有什么效果。在经济构造上建立的一切表面构造,如法律等,不是绝对的不能加些影响于各个的经济现象,但是他们都是随着经济全进路的大势走的,都是辅助着经济内部变化的,就是有时可以抑制各个的经济现象,也不能反抗经济全进路的大势。我们可以拿团体行动、法律、财产法三个连续的法则,补足阶级竞争的法则,不能拿他们推翻马氏唯物史观的全体。

有许多人所以深病“马克思主义”的原故,都因为他的学说全把伦理的观念抹煞一切,他那阶级竞争说尤足以使人头痛。但他并不排斥这个人高尚的愿望,他不过认定单是全体分子最普通的伦理特质的平均所反映的道德态度,不能加影响于那经济上利害相同自觉的团体行动。我们看在这建立于阶级对立的经济构造的社会,那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实在一天也没有消灭,只因有阶级竞争的经济现象,天天在那里破坏,所以总不能实现。但这一段历史,马氏已把他划入人类历史的前史,断定他将与这最后的敌对形式的生产方法,并那最后的阶级竞争一齐告终。而马氏所理想的人类真正历史,也就从此开始。马氏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于伦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的倾向,这也未必不是社会改造的曙光,人类真正历史的前兆。我们于此可以断定,在这经济构造建立于阶级对立的时期,这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也未曾有过一日消灭,不过因他常为经济构造所毁灭,终至不能实现。这是马氏学说

中所含的真理。到了经济构造建立于人类互助的时期，这伦理的观念可以不至如从前为经济构造所毁灭。可是当这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划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

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总之，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马氏的唯物史观，何以不产生于十八世纪以前，也不产生于今日，而独产生于马氏时代呢？因为当时他的环境，有使他创立这种学说的必要和机会。十八世纪以前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势力，比经济的势力强，所谓社会势力从经济上袭来的很少。因为原始社会的经济组织是仅求自足的靠着自然的地方居多，靠着人力的地方还少，所以宗教和政治的势力较大。譬如南美土人，只伸出一张口，只等面包树、咖啡树给他吃喝，所以他们只有宗教的感谢，没有经济的竞争。到了英国产业革命后的机械生产时代，人类脱离自然而独立，达到自营自给的经济生活，社会情形为之一变，宗教政治的势力全然扫地，经济势力异军苍头特起支配当时的社会了。有了这种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而马氏自己却忘了此点。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

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却也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十字军之役，固然不必全拿那历史的唯物论者所说，全是经济的意味去解释，但当那僧侣彼得煽动群众营救圣墓的时候，彼得与其群众虽然没有经济的意味参杂其间，或者纯是驱于宗教的狂信，而那自觉的经济阶级，实在晓得利用这无意识的反动，达他们有意识的经济上的目的。从前的历史家，完全把经济的意味蔑视了，也实未当。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

(八)

我于上篇，既将马氏的“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说”略为评述，现在要述他的“经济论”了。马氏的“经济论”有二要点：一“余工余值说”，二“资本集中说”。前说的基础，在交易价值的特别概念。后说的基础，在经济进化的特别学理。用孔德的术语说，就是一属于经济静学，一属于经济动学。

今先述“余工余值说”。

马氏的目的，在指出有产阶级的生活，全系靠着无产阶级的劳工。这并不是马氏新发明的理论，从前 Sismondi、Saint-Simon、Proudhon、Rodbertus 诸人，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曾有过这种议论。不过他们的批评，与其说是经济的，毋宁说是社会的。私有财产制及其不公，是他们攻击的标的。马氏则不然，他郑重的归咎于经济科学的本身，特别归咎于交易观念。他所极力证明这私营事业必须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这是交易不能免的结果。——一个经济上的必要，贵族与平民都须服从的。

马氏的“余工余值说”，是从他那“劳工价值论”演出来的。

马氏说劳工不只是价值的标准与理由，并且是价值的本体。从前 Ricardo 也曾有过类似的概念，但他未能决然采用。马氏于此，毅然采取其说，不象 Ricardo 的踌躇。

马氏也决不否认“效用是价值的必要条件”。由效用的价值而论，这的确是唯一的理由，但他以为单拿效用这一点说明交易的价值，理据尚不充足。每在一个交易的行为，两个物品间必含着共同的原素，一致的等级。此种一致，决不是效用的结果，因为效用的等级，在每个物品中均不相同。而所以构成交易这件事存在的理由的，就是这个不同。在那些性质各异的物品中所含的共同原素，不是效用，乃是那些物品中所含劳工分量的大小。每个物品的价值，应该纯是物品中所含人类劳工结晶的全量。物品价值的分别，全依劳工的分量而异。此等劳工，是于生产这些物品有社会的必要的东西。

例如有一工人在一种产业里作工，一日工作十小时，什么是他的生产物的交易价值呢？这交易价值，应该是他那十小时劳工的等量。他所生产的，是布，是煤，或是他物，都不必问。按工银交易的条件，资本家把处分物品的权保留在自己手中，而按实在的价值出售。这实在的价值，就是十小时劳工的等量。

工人的工力(Labour force)为工银所买，与其本人断绝关系。工银专以代表资本家偿他工力的物价，而资本家即保持自由处分这个物品（指工力）的权利于自己手中。工力价值的决定，与别的可以交易的物品相同。工力恰是一种物品，他的价值也是由那于他的生产所必需的劳工时间数目决定。

生产工力所必需的工量(Labour quantity)，是一种稍觉奇

异的话，初究马氏学说的人，最难领会其旨趣。但是必须领会，才得了解马氏的经济学说。实在稍加研究，觉得这种见解也并没有什么稀奇。设若拿一个机械的活动代替一个工人的劳工，执一个工程师，问他这架机械要多少维持费？他决不以为奇，并且立答以每时每日需多少吨煤炭，而煤炭的价值，又纯是代表那采掘煤炭的一定人工的总积。我们把煤炭换成劳工去说明他，又有什么难懂呢？

工银制下的工人，纯是一种机械。所不同的地方，维持机械的财物是在他处由他人的劳工生产出来的，维持工人的财物是由他自己的劳工生产的一小部分。一时间的劳作，或一日的辛苦，其价值均可以在那个时间保持那个工人使他能够完全维持他的生产力所必需的需要为标准。无论资本家以物品以金钱偿他的工值，都是代表那必要费的价值。

维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价值，永不能与那工力的生产的价值相等。例如一日维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价值，决不能与十小时工力的价值相等，或且不抵五小时。在模范状态下的人类工力，常足以生产比他所单纯消费的物品价值多。

工人所生产的价值，全部移入资本家的手中，完全归他处分。而以其一小部分用工银的名目还给工人，其量仅足以支应他在生产此项物品的期间所消用的食品，余则尽数归入资本家的囊中。生产物的售出，其价与十小时的工力相等，而工人所得，则止抵五小时工力的价值。其余五小时工力的价值，马氏叫作“余值”(Surplus value)。

这样办去，资本家获得工人十小时的工力，而仅以五小时的代价还给工人。其余五小时的工力，在工人毫不值钱。前五小

时间工人所生产的，等于他的工值。第五时以后他所做的工，于他什么也不值了。这生产“余值”的额外时间，于工人本身一文不值的工力，马氏叫作“余工”(Surplus labour)。

余值既全为资本家的掠夺品，那工人分外的工作，就是余工，便一点报偿也没有。刚是对工人的能力课额外的汗血税，而为资本家增加幸运，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这是资本主义下资本家掠夺劳工生产的方式。

因为这个原故，资本家的利益，就在增大余值。他们想了种种方法，达这个目的。解析这些方法，揭破资本主义的秘密，就是马氏学说特色之一。依马氏的解析，资本家增大余值的方法有二要着：

一、尽力延长工作时间，以求增加余工时间的数目。假使工作时间的数目，可以由十小时增至十二小时，这余工时间，自然可以由五小时增至七小时。企业家常谋为此。虽有工场立法，强制些产业限制工作时间，于阻止余值的增长多少有点效果，但推行的范围，究竟限于少数产业，所以“八时间工作”的运动，仍不能不纷纷四起。

二、尽力缩短生产工人必要生活费的时间。假令生产工人必要生活费的工作时间，由五小时缩短至三小时，那余工时间自然由五小时增至七小时了。此种缩短，是可以由产业组织的完全或由生活费的减少作得到的。生活费减少，常为由协力(Co-operation)的影响所生的结果。资本家每依建立慈善院或雇用比成人生活费较少的妇幼劳工以图此利益。妇幼离开家庭，那一切家事乃至煮饭洗衣等等，都留给男子去做。但若有维持女工工银与男工相等的方法或限制妇幼劳工的法律，此种战略，也就

完全失败了。

马氏的论旨，不在诉说资本家的贪婪，而在揭破资本主义的不公。因为掠夺工人的，并不是资本家，乃是资本主义，工银交易的条件，资本家已经全然履行。你得一份钱，他买一份货，也算是公平交易。既然许资本主义与自由竞争行于经济界，这种结果是必不能免的。资本家于此，固极愿购此便宜物品，因为他能生产比他自身所含价值还多的东西。惟有这一班可怜的工人，自己把自己的工力象机械一般贱价给人家，所得的价格，仅抵自己生产价值之半，或且不及其半，在法律上经济上全没有自卫之道，而自己却视若固然。这不是资本家的无情，全是资本主义的罪恶！

(九)

前节所述，是马氏“价值论”的要旨。而与其“价值论”最有关系的“平均利润率论”，也不可不为说明。

今于说明“平均利润率论”以前，须先说一说那余值怎么变成利润的道理。余值本是由劳工生产的价值中除去他的必要生活费所余的价值。这必要生活费就是可变资本。是资本的一部分，不是资本的全部。余值的发生，是单由于可变资本，不是由于资本全部。但因生产物品时支出的费用都出自资本（这些费用，马氏叫作费用价格），而于费用价格的表形，不能认可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间有何等区别，就把那仅与可变资本有关系的余值作成与全资本都有关系的樣子。工力的价格就变成工银，工力生产的余值就变成利润了。我们可用下列的论式表明这个道

理：

1. 全资本(C)由不变资本(c)与可变资本(v)而成,
2. 可变资本生出余值(m),
3. 余值对于可变资本的比例 $\left(\frac{m}{v}\right)$ 叫作余值率,用 m' 代他,
4. 因而得 $\frac{m}{v} = m'$ 的公式,
5. 又生 $m = m'v$ 的公式,
6. 今不令余值仅关系于可变资本,而使关系于全资本,把他叫作利润(P),
7. 余值对于全资本(C)的关系 $\left(\frac{m}{C}\right)$ 为利润率,用 P' 代他,
8. 从而得 $P' = \frac{m}{C} = \frac{m}{c+v}$ 的公式,
9. 若把 m 换成 $m'v$ 又得 $P' = m' \frac{v}{c} = m' \frac{v}{c+v}$ 的新公式,
10. 再把他换成比例式,断得 $P':m' = v:c$ 的公式。

依此我们可以证明利润率之于余值率的关系,与可变资本之于全资本的关系相等。我们又可断定利润率(P')常比余值率(m')小,因为可变资本(v)常比全资本(C)小($C = c + v$)。

资本主义把那仅与可变资本有关系的余值,变成与全资本有关系的利润,把那对于可变资本的比例的余值率,变成对于全资本的比例的利润率。在这神秘的形态中,把余值用利润的名义尽行掠去的真象,就是如此。

依以上所述的原理,余值随可变资本而增减,全与不变资本的多少无关。但实际上无论可变不变二种资本的比例如何变动,利润率常为同一。这是一个显然的矛盾。为使理论愈益明

显,分析解说如下:

1. 余值准可变资本的多少而增减,可变资本多则余值多,可变资本少则余值少。

2. 利润率是把余值以对于全资本(合不变与可变二种)的比例表明的东西,故可变资本多则利润率高,少则利润率低。

3. 然于实际,不拘可变资本分的多少,同一的全资本额有同一的平均利润率。

依马氏可变资本分多则利润率高,少则低的定理,应如下表:

C (全资本)	c (不变)	v (可变)	m' 余 值 率	m 余 值	P' 利 润 率
100	= 80	+ 20	100%	20	20%
100	= 70	+ 30	100%	30	30%
100	= 60	+ 40	100%	40	40%
100	= 85	+ 15	100%	15	15%
100	= 95	+ 5	100%	5	5%

而于实际,这五种产业的利润率都为同一,与价值原则绝不相容。这就是“平均利润率的谜”。

昂格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文中曾说,这个矛盾,Ricardo 已经看出而未能解释, Rodbertus 也曾注意而未能解决,至于马氏,在他的《经济学批评》里,已经解决过这个问题,而在《资本论》第三卷始完全与以解答。故解释“平均利润率的谜”,在马氏书中是一个最著名的点,而因为解释此谜的原故,把他的“劳工价值论”几乎根本推翻。他的学说本身,发生一绝大矛盾,故又是一个最大弱点。

马氏解谜的键,并没有什么稀奇的道理,不过是:

一、商品若能按其价值被买卖,利润率必生种种差别。

二、然于实际,商品不能按其价值被买卖。

三、即于实际,以按不变可变两资本平均结合比例以上的比例结合的资本生产的商品,于其价值以上被买卖。以平均以下的比例的资本生产的商品,于其价值以下被买卖。

马氏以下表说明这个道理:

	资本结合 比例	余值	已经消费 的资本	商品的		商品 卖价	利润率	价值与卖 价的差
				价值	费用 价格			
I	80c-20v	20	50	90	70	92	22%	+ 2
II	70c-30v	30	51	111	81	103	22%	- 8
III	60c-40v	40	51	131	91	113	22%	-18
IV	85c+15v	15	40	70	55	77	22%	+ 7
V	95c+ 5v	5	10	20	15	37	22%	+17

我们再把此表细加说明如下:

一、I例 不变资本 80 可变资本 20 合计 100

II例 不变资本 70 可变资本 30 合计 100

III例 不变资本 60 可变资本 40 合计 100

IV例 不变资本 85 可变资本 15 合计 100

V例 不变资本 95 可变资本 5 合计 100

二、余值率($\frac{m}{v}$ 即 m')依马氏的定理皆为同一。兹假定余值率为100%,

三、那么

I例,对于可变资本 20 其 100%的余值为 20,

II例,对于可变资本 30 其 100%的余值为 30,

III 例, 对于可变资本 40 其 100% 的余值为 40,

IV 例, 对于可变资本 15 其 100% 的余值为 15,

V 例, 对于可变资本 5 其 100% 的余值为 5,

四、费用价格, 即生产费, 应该与恰足收回(1)可变资本的全部及(2)不变资本中被消费的部分二者的数相当。那不变资本中被消费的部分, 假定 I 例为 50, II 例为 51, III 例为 51, IV 例为 40, V 例为 10,

五、那么费用价格的额, 应如下表:

	可变资本		消费资本额		费用价格
I	20	+	50	=	70
II	30	+	51	=	81
III	40	+	51	=	91
IV	15	+	40	=	55
V	5	+	10	=	15

六、商品的价值, 等于把余值与上表所举的费用价格合算起来的数。就是 I $70 + 20 = 90$ II $81 + 30 = 111$ III $91 + 40 = 131$ IV $55 + 15 = 70$ V $15 + 5 = 20$

七、商品若能按其价值买卖, 其卖价应如下表:

I	II	III	IV	V
90	111	131	70	20

八、而于实际, 商品不能按其价值买卖, 而以对于平均结合比例所生的余值与费用价格的合计为卖价。用不变资本在平均结合比例以上时, 其卖价在上表所列的价值以上。用不变资本在平均结合比例以下时, 其卖价在上表所列的价值以下。

九、今为看出这个平均结合比例, 应该把第一至第五的资本总括起来, 算出不变可变两种资本的百分比例。就是:

$$\text{资本总额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500$$

$$\text{不变资本总额 } 80 + 70 + 60 + 85 + 95 = 390$$

$$\text{可变资本总额 } 20 + 30 + 40 + 15 + 5 = 110$$

把这二种资本总额变成百分比例，得式如下：

$$\frac{390}{500} = 78\% \quad \frac{110}{500} = 22\%$$

$$\text{而余值总额为 } 20 + 30 + 40 + 15 + 5 = 110$$

$$\frac{110}{500} = 22\%$$

十、这 22% 就是对于平均结合比例 $78c + 22v = 100$ ，所生的余值就是对于全资本额的平均利润率。

十一、那么实在的卖价，应是：

$$\text{I } 70 + 22 = 92 \quad \text{II } 81 + 22 = 103 \quad \text{III } 91 + 22 = 113$$

$$\text{IV } 55 + 22 = 77 \quad \text{V } 15 + 22 = 37$$

十二、随着资本结合的比例不同，有的得其价值以上的卖价，有的得其以下的卖价。现在把这五个例的卖价与其价值的差额算出如下：

第一例，卖价比价值多二，

第二例，卖价比价值少八，

第三例，卖价比价值少十八，

第四例，卖价比价值多七，

第五例，卖价比价值多十七，

十三、再把这五个例的差额合算起来 $2 - 8 - 18 + 7 + 17 = 0$ ，各个的差异正负相消，由全体上看，卖价与价值仍无二致。

这就是马氏的平均利润率论。

由马氏的平均利润率论看起来，他所说的生产价格——就是实际卖价——和他所说的价值全非同物。但于价值以外，又有一种实际卖价，为供求竞争的关系所支配，与生产物品所使用的工量全不相干。结果又与一般经济学者所主张的竞争价格论有什么区别？物品的实际价格既为竞争所支配，那劳工价值论就有根本动摇的危险。劳工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基础一有动摇，学说全体为之震撼。这究不能不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遗憾。

(十)

马氏的余值说与他的资本说很有关系。他的名著就是以“资本”这个名辞被其全编，也可以看出他的资本说在他的全学说中占如何重要的位置。我所以把他略为介绍于此。

马氏分资本为不变与可变两种。原来资本有二个作用：一是自存，一是增殖。资本用于生产并不消失，而能于生产物中为再生产，足以维持他当初的价值，这叫资本的自存。而资本又不止于自存，生产的结果，更于他本来价值以上生出新价值，这叫资本的增殖。马氏称自存的资本为不变资本(Constant capital)，称增殖的资本为可变资本(Variable capital)。能生增殖的，惟有劳力。故惟资本家对于劳工所给的劳银或生活必需品，是可变资本，其余生产工具，都是不变资本。

马氏所说的不变资本，也不是说形态的不变，是说价值的不变。在一生产经过中变其形态的资本，为流通资本，不变其形态的资本，为固定资本。然几经生产以后，就是固定资本，也不能

不变其形态。没有永久不变形态的资本。永久不变的，只是他的价值。一万元的资本，千百年前是一万元，千百年后还是一万元。这项资本中永久不变的东西，就是这一万元的价值。

不变资本不能产出余值，只能产出他的价值的等值，他的价值，就是生产他的时候所吸入的价值的总额。

不变资本也是由劳力结晶而成的生产物。他的价值也是依劳工时间而决定，与别的生产物全是一样。

马氏为什么分资本为不变与可变二种呢？就是因为以利息普遍率说为前提。利息普遍率说是由来经济学的通说。其说谓凡资本都能自存，不能自存的，不是资本，是消费财。这个自存，不因事业的性质使用者的能力而异，全离开人格超越环围而行。这就是利息所以有普遍率的原故。一万元的资本，用到农业上商业上均是一万元。这一万元因把他用于生产上生出利息。这个利息为资本自存的价值，随时随地有一定普遍的率，决没有甲的一万元生一分利息，乙的一万元生二分利息的道理。有之就是把别的所得，在利息名义之下混合来的。然在实际上，同是值一万元的资本，他的生产效能决不一样。房屋与机器同是值一万元的东西，而房屋与机器的生产效能不同。同是用一万元买的机器，而甲机器与乙机器的生产效能各异。可是生产分配分的利息普遍均等。有的学者说这个差异不是资本的作用，全是企业能力的关系，富于企业能力的去经营，所得的生产效果多，否则少，故主张以此项差额归入企业的利润。马氏以为不然，他说所以有这个差额的原故，全是因为自存的资本以外有增殖的资本。自存的资本，当然受一定普遍的利率，以外的剩余，都是增殖的资本所生的。增殖的资本，就是资本中有生这个剩余的力量的。

有这个力量的资本,只是那用作劳工生活维持料的资本。资本的所有者应该以自存就算满足,应该作不变资本的所得承受利息。那可变资本所得的增殖,全该归生出这个的工人领受,要是把这个归于资本家或企业家,就是掠夺劳工的正当权利,企业的利润,就是赃物的别名。

只有价值决不能生产,必有劳工运用他才能有生产的结果,因为劳工是资本的渊源。可是只有劳工没有维持他们生活的可变资本,还是不能生产。我们从此可以看出劳工与资本也应该有些结合。

于此我们应加特别注意的,就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学鼻祖的马克思与那为个人主义经济学鼻祖的亚丹·斯密氏两人的资本论颇有一致的点,且不是偶然一致,他们实在有系统的立于共同思想上的地方。

马克思分资本为不变与可变二种,亚丹·斯密则分资本为固定与流通二种。亚丹·斯密的固定资本,适当马克思的不变资本,流通资本适当可变资本。其相同的点一。

他们都认随着产业的种类这二种资本配合的比例也不一样。其相同的点二。

马克思主张惟可变资本才能于收回自己的本来价值以外生产余值,余值率常依可变资本的多少为正比例。亚丹·斯密主张固定资本不能自己生出收益,必赖流通资本的助力始生收益的剩余。其相同的点三。

马克思说惟有用作维持劳工生活料的资本是可变资本。亚丹·斯密列举流通资本的内容,也以维持劳工生活的资料为主。其相同的点四。

可是马克思的可变资本与亚丹·斯密的流通资本，其内容也并非全同。亚丹·斯密的流通资本中，实含有1. 止于收回自己本来价值的，2. 以外还生出剩余的二部分。就是把马克思的1. 被消费的不变资本的部分，2. 可变资本的全部，二者合称为流通资本。那么亚丹·斯密的所谓收益(Revenue)，其实也把自己收回分包含在内，就是于马克思的所谓余值以外，并括有生产费在内。

马克思主张劳工价值说，亚丹·斯密主张生产费价值说，二人的出发点不同。可是马克思终于依了生产费价值说才能维持他的平均利润率说，又有殊途同归的势子。

总之，不变可变资本说是支撑马氏余值论的柱子，余值论又是他的全经济学说的根本观念，这资本说被人攻破，马氏经济学说必受非常的打击。然而他的不变可变资本说与亚丹·斯密的固定流通资本说大致相同。而在亚丹·斯密的固定流通资本说，则人人祖述奉为典型，以为是不能动摇的定理。而在马克思的不变可变资本说，则很多人攻击，甚或加以痛诋，我们殊为马氏不平！

(十一)

宗马氏的说，入十六世纪初期，才有了资本。因为他所谓资本，含有一种新意义，就是指那些能够生出使用费的东西。这个使用费，却不是资本家自己劳力的结果，乃是他人辛苦的结果。由此意义以释“资本”，十六世纪以前，可以说并没有资本与资本家。若本着经济上的旧意义说资本单是生产的工具，那么就是

十六世纪以前，也何尝没有他存在？不过在那个时代，基尔特制（Guild system）下的工人，多半自己有自己的工具，与马氏用一种新意义解释的资本不同。

马氏根据他那“社会组织进化论”，发见这种含有新意义的资本，渐有集中的趋势，就构成了他的“资本集中论”。

请述他的“资本集中论”的要旨。近代科学勃兴，发明了许多重要机械，致人类的生产力逐渐增加，从前的社会组织，不能供他回翔，封建制度的遗迹，遂全被废灭。代他而起的，乃为近代的国家。于是添了许多新的交通手段，辟了许多新的市场。这种增大的生产力，得了适应他的社会组织，得了适应他的新市场。随着公债的成立，又发生了好多的银行和商业公司，更足助进产业界的发展。从前的些小工业都渐渐的被大产业压倒，也就渐渐的被大产业吸收了。譬如 Trusts 与 Cartels 这些组织，在马氏当时，虽未发生，到了现在，却是作马氏学说的佐证。这 Trusts 与 Cartels 的组织，不止吸收小独立产主，并且把中级产主都吸收来，把资本都集中于一处，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于是产业界的权威，遂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

上节所说，是资本家一方面的情形。工人这一方面呢？因受这种新经济势力的压迫，不能不和他们从前的财产断绝关系，不能不出卖他自己的劳力，不能不敲资本家的大门卖他自己的人身。因为他们从前卖自己手造的货品的日子过去了，封建制度和基尔特制度的遗迹都消灭了，他们不卖自己的筋力别无东西可卖了！这些工人出卖的劳力，可以产出很多的余值，一班资本家又能在公开市场里自由购买，这真是资本家们创造新样财产的好机会。但是这种新样财产的造成，全是基于别人的汗血，

别人的辛苦。他们新式财产之成功，就是从前基于自己劳力而成的旧式财产之破灭。少数资本家的工厂，就是多数无产阶级的大营。从前的有产阶级，为了这个事业，不知费了多少心力，奔走呼号了三世纪之久，他们所标榜的“人权”、“工人自由”的要求，正是他们胜利的凯歌。因为他们要想在市场里收买这种便宜货品，必须使这些工人脱离以前的关系，能够自由有权以出售他自己。他们的事业成功了，工人的运命也就沉落在地底了！

资本主义是这样发长的，也是这样灭亡的。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的敌兵，有加无已，就是那无产阶级。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现今各国经济的形势，大概都向这一方面走。大规模的产业组织的扩张，就是大规模的无产阶级的制造。过度生产又足以缩小市场，市场缩小，就是工人超过需要，渐渐成了产业上的预备军，惟资本家之命是听，呼之来便来，挥之去便去。因为小产主的消灭与牧业代替农业的结果，农村的人口也渐集中于都市，这也是助长无产阶级增长的一个原因。无产阶级愈增愈多，资本愈集中，资本家的人数愈少。从前资本家夺取小手工小产业的生产工具，现在工人要夺取资本家的生产工具了。从前的资本家收用手工和小产业的生产工具，是以少数吸收多数压倒多数，现在工人收用资本家的生产工具，是以多数驱逐少数，比从前更容易了。因为无产阶级的贫困，资本家在资本主义下已失救济的能力，阶级的竞争因而益烈。竞争的结果，把这集中的资本收归公有，又是很简单的事情。“善泅者死于水，善战者死于兵。”凡物发达之极，他的发展的境界，就是他的灭亡的途径。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然之势，也是不可免之数了。从前个人自有生产工

具,所以个人生产的货品当归私有,现在生产的形式已经变为社会的,这分配的方法,也该随着改变应归公有了。资本主义的破坏,就是私有财产制的破坏。因为这种财产,不是由自己的劳工得来的,是用资本主义神秘的方法掠夺他人的辛苦得来的,应该令他消灭于集产制度之下,在资本主义未行以前,个人所有的财产,的确是依个人的劳工而得的。现在只能以社会的形式令这种制度的精神复活,不能返于古昔个人的形式了。因为在这大规模的分工的生产之下,再复古制是绝对不可能。只能把生产工具由资本家的手中夺来,仍以还给工人,但是集合的,不是个人的,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得和他劳工相等的份就是了。到了那时,余工余值都随着资本主义自然消灭了。

以上系马氏“经济论”的概要,本篇暂结于此。

1919年5月、11月

《新青年》第6卷第5、6号

署名:李大钊

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苦闷、干燥、污秽、迟滞、不方便、不经济、不卫生、没有趣味，是今日北京市民生活的内容。

我们要是长久生活在这种生活里，恐怕要死；就是不死，也没有什么生趣。我们急切的很要求一种新生活。

新生活的创造，一半由于政治的设备，一半由于社会的设备。那不是北京市民所能单独要求的，暂且不讲。我要讲讲北京市民可以办到的、应该要求的单独需要。

我把北京市民生活应该改良的地方，捡那重要的，一条一条的写在下面：

一，我们要注意那崇文门税关，于我们市民生活有什么影响？我们应该调查他，监督他。要是于我们生活上有重大的影响，就该有一种市民的活动对付他。

二，初租房的要出三月份租金和那买东西要门底钱，都是恶习惯，都该打破。

三，试办消费公社。

四，多办市立的图书馆，通俗的尤其要紧。图书馆宜一律公开不收费。

五，多立劳工教育机关(如夜校、半日学校等)。

六，多立贫民学校、贫民工厂、孤儿院、恤老院。街上的乞丐应当禁止；幼年的儿童，送入贫民学校或孤儿院，由校或院给他衣食，教养成人，去自营生业；中年的人，送入贫民工厂作工，贫民工厂应该是公立的，或对私立的加以严重的监督，以防资本家借慈善为名从中取利；衰老的人，送入恤老院。

七，扩充济良所，有愿入所的娼妓，不问她受虐待与否；一概收容。济良所应该是教育机关兼着工厂的组织。

八，报纸配送，都很迟缓。应由报界公会和一般阅报的市民合力要求送报人改良。在电车未设以前，可利用脚踏车。

九，汽车在行人拥挤或街道狭隘的地方横走乱冲，很是危险。因为没有电车，一条逼窄的马路上，有许多马车、人力车、骡车、手推的车等等，并步行的人、担货的人，来往不绝。汽车尽其速力通行，很容易轧伤行人。且汽车过处，汽笛怒鸣，黑尘腾飞，殊与人以不快之感。应该：（甲）限制汽车的速度；（乙）加重汽车使用税；（丙）随时把汽车所有者的人名、住址和他汽车上的号数编成表簿，听公民自由领取，以便路上看见某号汽车有不法违章的事情，就可以告发或用邮片直接诘责。实行人民警察，以补官吏警察之所不及。

十，赶快修造市营的电车，使我们小民少在路上费些可贵的时间，吃些污秽的尘土，作同类的牛马，膏汽车的轮皮。

十一，电车没有修成以前，人力车夫的生活，也应该改善：（一）令车主随车设备卫生口袋（备车夫带在嘴上的）一具，雨衣雨帽各一具；（二）车夫的衣服，应令勤加洗涤；（三）供车夫寄居的小店，应加监督，并令附设简易而且清洁的浴所。

十二，宜由市设立价廉而且清洁的平民浴所多处。

十三，宜由市设立平民食堂多处，使小食店赁居其中，以免劳工社会露天饮食的苦。

十四，街口巷里的屎尿，应严加取缔。臭气熏天的厕所，应该改造。设备适于清洁的厕所，应该添设。

十五，粪夫团体，应由警厅加以编制，为之设备一切器具及一切卫生设施。下水沟亦须改善，以图公众卫生。

十六，公立医院太少，应该多设。

十七，介绍佣工所，应与以严重的监督。注意女工住居的清洁，及勒索女工的事情。

十八，电灯电话的设备，应勤加修理，以防危险。电灯价值太贵，电光不足，市民对于电灯公司，应有正当的要求。电话司机人不勤敏，不亲切，应改用女工。

十九，公园一律公开，不许索费，并将北海、景山等名所一概开放。每个公园里，均设一极大的运动场。街旁的树木，应该多栽。酒街多用水车。

二十，妨害卫生及清静的工厂，不许设在住宅区域附近（我的理想的都市，文化区域、工业区域、政治区域、住宅区域，应该分开）。

此外应加改良的事，必然还有很多，今天我只想起这些，其余的还要我们大家去想。

1919年9月21日

《新生活》第5期

署名：守常

赤 色 青 色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世界上的军阀财阀，怕赤(赤军的赤)色。中国现在的官僚政府怕青(青年的青)色。这都是他们眼里的危险颜色。

1919年9月28日

《新生活》第6期

署名：孤松

难 兄 难 弟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中国的元老，要亲到大成殿磕头，日本的元老，想在东三省建立一座伊势大神宫。中国政府忙办文法官考试，日本政府忙设国民文艺会。都是为防止他们眼里口里的过激思想。真是难兄难弟的国家。

1919年9月28日

《新生活》第6期

署名：孤松

秘密……杀人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中国政府什么事都秘密。现在近畿一带瘟疫流行，死亡很多，官吏都严守秘密，听其自然传染。唉！这秘密二字下，不知又添了多少冤魂！

瘟疫是自然的恶呢，还是人为的恶呢？很是一个疑问。要说是自然的恶，何以死的大半是无产阶级和妇女？

1919年9月28日
《新生活》第6期
署名：孤松

大 笑 话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听说政府近来很麻烦“联合会”这几个字，所以图书馆联合会在教育部立案，也被批驳了。这真是一个大笑话。

1919年9月28日

《新生活》第6期

署名：孤松

黑暗运动

(一九一九年十月五日)

前年有一位元老，半夜三更叩清宫的大门，拉出小宣统来，演了一出滑稽剧。今年又有一位元老，半夜三更跑到大成殿里磕头。这都是支那元老黑暗运动！

1919年10月5日

《新生活》第7期

署名：孤松

新鲜名词

(一九一九年十月五日)

近来出了许多新鲜名词。例如日本的“帝国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社会主义”，中国某君的“军国民教育社会主义”，德国新组织的“共和帝国”都是。

1919年10月5日

《新生活》第7期

署名：孤松

圣人与皇帝

(一九一九年十月五日)

我总觉得中国的圣人与皇帝有些关系。洪宪皇帝出现以前，先有尊孔祭天的事；南海圣人与辫子大帅同时来京，就发生皇帝回任的事。现在又有人拚命在圣人上作工夫，我很骇怕，我很替中华民国担忧！

1919年10月5日

《新生活》第7期

署名：孤松

双十字上的新生活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二日)

民国建了八年了，《新生活》出了八期了。用《新生活》的第八期祝民国八年的国庆，两数相合，这样奇巧，足见“新生活”的命运，便是民国的命运，民国的纪元，便是“新生活”的纪元。

民国的国庆日，也叫双十节。凑巧《新生活》的封面上印着一个连环式的双十字。我们就拿这个连环式的双十字，祝我中华民国的双十节。年年岁岁，循环递嬗，永世相承，以至于无穷。

在《新生活》连环式的双十字上，有四大精神，就是博爱、自由、平等、牺牲。这是我们创造“新生活”的基础，也就是我们建立民国的基础。

我们相信人间的关系只是一个“爱”字。我们相信我能爱人，人必爱我，故爱人即所以爱我。

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国，爱世界的人类，都是这一个“爱”。爱力愈大，所爱愈博。充博爱的精神，应该爱世界的人类都像爱自己的同胞一般，断断不可把这个“爱”字关在一个小的范围内。总该知道爱世界人类的全体比爱一部分人更要紧，总该知道爱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

人间共同生活的关系既是以爱为基础，那么人类相互之间，自然要各尊重各的个性。各自的个性，不受外界的伤害、束缚、

压制、剥夺，便是自由。真实的自由，都是建立在“爱”字上的。

博爱的生活，是无差别的生活，是平等的生活。在“爱”的水平线上，人人都立于平等的地位，没有阶级悬异的关系。

这样说来，自由、平等的生活，都是以爱为基础的生活。

实行这个“爱”字，必须有牺牲的精神。爱人道，便该为人道牺牲。爱真理，便该为真理牺牲。爱自由，便该为自由牺牲。爱平等，便该为平等牺牲。爱共和，便该为共和牺牲。爱的方法便是牺牲，牺牲的精神便是爱。

有一种美景物、美境域在我们眼前，我们不可把他拿来作我们的牺牲。因为牺牲了他，决不是爱了他。我们当真爱他，应该把我们自己牺牲给他。把我们自己牺牲给他，他的美善，才真能为我们所享受，所获得。爱的法则，即是牺牲的法则。

我们今天所庆祝的民国，究竟从何处来的？是由先烈们博爱的精神创造来的，是用先烈们为自由平等而牺牲的血培植成的。我们纪念双十节，应该纪念《新生活》上的连环双十字。

双十字上的“新生活”，是不断的创造。《新生活》上的双十字，是无尽的循环。愿民国的双十节和这双十字一样循环无尽！愿今年双十节看《新生活》的人，都永远抱着《新生活》封面连环双十字上的四大精神：博爱、自由、平等、牺牲——去不断的创造新生活！

1919年10月12日

《新生活》第8期

署名：守常

文 治 国 庆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二日)

武人专制的政治——也可以叫作武乱——已经把我们害得很苦。好容易有一位文治派的总统出来，挂了文治主义的招牌，吾侪小民以为一定可以有点希望了，一定可以免“武乱”的痛苦，享“文治”的幸福了。但是盼到如今，只看见了两件大事，就是秋丁祭孔，国庆日不阅兵。大概文治主义作到这样，也算是尽其能事了！

1919年10月12日

《新生活》第8期

署名：孤松

武 装 祭 孔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二日)

“偃武修文”本来是一件好事，国庆日不阅兵，是我们所不反对的。但是前几天祭孔的时候，却调来很多的武装兵士，把个孔庙团团围住，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1919年10月12日

《新生活》第8期

署名：孤松

面包运动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二日)

什么爱国咧，什么共和咧，什么政治改良咧，什么社会改造咧，口头上的话你们只管去说，吾侪小民，只是吃饭要紧。

1919年10月12日

《新生活》第8期

署名：孤松

在《国民》杂志 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二日)

此次“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强权压迫公理者，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诸君本此进行，将来对于世界造福不浅，勉旃！

1919年11月1日
《国民》杂志第2卷
第1号

妇女解放与Democracy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五日)

妇女解放与 Democracy 很有关系。有了妇女解放，真正的 Democracy 才能实现。没有妇女解放的 Democracy，断不是真正的 Democracy。我们若是要求真正的 Democracy，必须要求妇女解放。

这里我有两个理由：

第一，一个社会里如果只有男子活动的机会，把那一半的妇女关闭起来，不许他们在社会上活动，几于排出于社会生活以外，那个社会一定是个专制、刚愎、横暴、冷酷、干燥的社会，断没有 Democracy 的精神。因为男子的气质，包含着专制的份子很多，全赖那半数妇女的平和、优美、慈爱的气质相与调剂，才能保住人类气质的自然均等，才能显出 Democracy 的精神。我们中国人的一切社会的生活，都不许妇女加入，男女的界限很严，致成男子专制的社会。不独是男子对于妇女专制的社会，就在男子相互间也是一个专制的社会。生活的内容，冷酷无情，干燥无味，那些平和、优美、博爱的精神，都没有机会可以表见。我们若想真正的 Democracy 在中国的社会就能够实现，必须先作妇女解放的运动，使那妇女的平和、美爱的精神，在一切生活里有可以感化男子专暴的机会，积久成习，必能变化于无形，必能变专

制的社会,为Democracy的社会。

第二,现代欧美的Democracy,仍然不是真正的Democracy。因为他们一切的运动,立法、言论、思想都还是以男子为本位,那一半妇女的利害关系,他们都漠不关心。就是关心那人代为谋的利益,也决不是他们的利益,决不像他们自己为谋的恳切。“人民”这个名词,决不是男子所得独占的,那半数的妇女一定也包含在内。Brougham Villiers说的好:“The formula of democracy is no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man but by the people”。译他的大意,就是那真正的Democracy不是男子所行的民权民主的政治,乃是人民全体所行的民权民主的政治。这里所谓人民全体,就是包含男女两性在内。社会上一切阶级都可变动,富者可变为贫,贫者可变为富,地主、资主可变为工人,工人可转为地主、资主,社会若经过适当的改造,这等阶级都可归于消泯,独有男女两性是一个永久的界限,不能改变,所以两性间的Democracy比什么都要紧。我们要是要求两性间的Democracy,这妇女解放的运动,也比什么都要紧。

1919年10月15日

《少年中国》第1卷第4期

“妇女号”

署名:李大钊

时代的落伍者

(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时代是最惨酷的东西，时代的落伍者是最可怜的人。时代的进行像电光一样的快，人间的思想总是在过去和现在上恋着。这个中间，就发生了许多的落伍者。他们的生活与时代不相应，就发生了许多的怨恨。怨恨时代，怨恨时代的思想、制度、文学、艺术及至人身。唉！他们实在是悲哀、苦痛、可怜呵！

1919年10月26日

《新生活》第10期

署名：孤松

应考的遗传性

(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中国人有一种遗传性，就是应考的遗传性。什么运动，什么文学，什么制度，什么事业，都带着些应考的性质，就是迎合当时主考的意旨，说些不是发自本心的话。甚至把时代思潮、文化运动、社会心理，都看作主考一样。所说的话、作的文，都是揣摩主考的一种墨卷，与他的实生活都不生关系。是甚么残酷的制度，把我的民族性弄成这样的不自然！

1919年10月26日

《新生活》第10期

署名：孤松

东西村落生活的异点

(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有人从美国来说，美国的村落生活，有三个东西是不可少的，就是图书馆、邮局、礼拜堂。我们家乡的村落生活，也有三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乃是子曰铺、鸦片馆、庙宇。

1919年10月26日

《新生活》第10期

署名：孤松

双十与五四

(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双十”与“五四”这两个数，在算术上是相等的数。这两个日子，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有同一价值的纪念日。真正奇巧。

1919年10月26日

《新生活》第10期

署名：孤松

再论新亚细亚主义

(答高承元君)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一九一九年元旦，我作了《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在《国民杂志》第一卷第二号发表。论友高承元君不弃，著论驳之（见《法政学报》第十期）。提出文中“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并吞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三，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几句话，更述他听了这话起来的疑问，就是“为甚么不主张世界各民族直接联合起来，造成世界的联邦，却要各洲的小联合作个基础？”又承他替我想出两个答案：（1）“为联合便利上”；（2）“怕欧美人用势力来压迫亚洲民族”。因此我不能不再把我的主张申明一回，以释承元君的疑，并以质诸读者。

第一，我并没有不主张世界各民族直接联合起来造成世界的联邦。我所主张的亚洲的联合，连欧美人旅居亚洲的也包在内。不过以地域论，亚洲终是亚洲，非洲终是非洲，是无可如何的事实。以民族论，各洲的民族多是安土重迁，居亚洲的终是亚人为最多，居欧洲的终是欧人为最众。据现在的情势看来，各洲有了小联合，就是各民族直接联合起来造成世界的联邦的第一

步。

第二，我主张依各洲的小合作基础造世界的联邦，实在是为联合便利上起见，承元君替我想的，的确不错。但是承元君说这个答案自然不能成立，我却不敢肯认。就承元君所举那交通上的例子，实在也有商榷的余地。“由小亚细亚到异洲的君士坦丁”固然“不过隔一海峡”，可是亚细亚境内各地方对于欧罗巴境内各地方的关系，不全是小亚细亚与君士坦丁的关系，且除去一个小亚细亚与君士坦丁的关系以外，几全不是这样的关系。“由小亚细亚到同洲的青海、西藏”的关系，固然不如“由小亚细亚到异洲的君士坦丁”的关系较近，但是亚细亚境内各地方间的关系，不全是“由小亚细亚到青海、西藏”的关系，且除去一个小亚细亚与青海、西藏的关系，几全不是这样的关系。若就民情差异的远近说，香港、广州的民情和异洲的欧美相较，与和同洲或同国的蒙古、西藏相较，那个远，那个近，还是一个疑问。那一点远，那一点近，应该分别言之。今古暂置不论，就令承认承元君的说，香港、广州的民情与异洲欧美相近，却与同洲的蒙藏相远。试问亚洲境内，大多数地方的民情对于欧美，都是香港、广州的民情对于欧美的比例吗？亚洲境内大多数地方间的民情的差异，都是香港、广州与蒙古、西藏的比例吗？我很愿承元君细想一想！

第三，我主张的新亚细亚主义是为反抗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而倡的，不是为怕欧美人用势力来压迫亚洲民族而倡的。我们因为受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压迫，我们才要揭起新亚细亚主义的大旗，为亚洲民族解放的运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步，是对内的，不是对外的；是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不是对

欧、美的排亚主义的。读者倘阅过我那篇论文，必都能看出我的意思的。我的意思以为：亚细亚境内亚人对亚人的强权不除，亚细亚境内他洲人对亚人的强权绝没有撤退的希望。亚细亚境内亚人对亚人的强权打破以后，他洲人的强权自然归于消灭。法国文学博士李霞儿在东京日人所开第三回人类的差别撤废期成会演说：“在亚细亚境内有奴隶国的期间，其他亚细亚诸国亦决不是自由国。在亚洲境内有受人轻蔑的国的期间，其他亚细亚诸国亦决不能得人尊敬。诸君真愿得世界的尊敬，诸君不可不使其他亚细亚诸国也为可被尊敬的国。为他日一切亚细亚诸国得自由计，诸君尤不可不先作最初的解放者。束缚他人的，同时自己也受束缚。”这是欧人对日本人的忠告。在他们固然应该这样措辞，在我们只有希望亚人大家起来，扫除大亚细亚主义，破坏大亚细亚主义。这个责任，不只在中国人、朝鲜人身上，凡是亚细亚人——就是觉悟的日本人，——也是该负起一分的。

第四，我的新亚细亚主义，不是“有亲疏差别的亚细亚主义”，乃是“适应世界的组织创造世界联合一部分的亚细亚主义”；不是背反世界主义的，乃是顺应世界主义的。压迫亚人的亚人，我们固是反对，压迫亚人的非亚洲人我们也是反对；压迫非亚洲人的非亚洲人，我们固是反对，压迫非亚洲人的亚人，我们也是反对。强权是我们的敌，公理是我们的友。亚细亚是我们划出改造世界先行着手的一部分，不是亚人独占的舞台。人类都是我们的同胞，没有我们的仇敌，那么承元君所说“不管旧的不管新的，不管是日本人倡导的，也不管是中国人倡导的，一律要反对”的“有亲疏差别的亚细亚主义”，断断不是我所倡的那新亚细亚主义。设若有方法，比各洲民族先有小联合还捷便，我

之主张世界人类普遍的联合，各民族间无亲疏的差别，实不让于承元君。

第五，我的新亚细亚主义，是“自治主义”，是把地域民族都化为民主的组织的主义，不是“排外主义”，不是“闭锁主义”。我们相信最善的世界组织都应该是自治的，是民主化的，是尊重个性的。凡欧美的人民在亚细亚境内生活的我们都不排斥。不但不是不让他们来讲公道话，并且愿意与他们共同生活。

第六，我的新亚细亚主义，有两个意义：一是在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没有破坏以前，我们亚洲的弱小民族应该联合起来共同破坏这大亚细亚主义；一是在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既经破毁以后，亚洲全民众联合起来加入世界的组织——假如世界的组织那时可以成立。用承元君的话，我是主张要小孩们把那个大人化成小孩，然后和他在一块平等吃东西，不是主张把小孩们和一个大人放在一块，关起门来吃东西，不是主张请求那个大人让小孩们，和他同吃东西。因为新亚细亚主义是反抗大亚细亚主义而起的，若不破坏大亚细亚主义，新亚细亚主义就没有意义；大亚细亚主义若不破坏，新亚细亚主义就无从完成。那么“中日陆海军共同防敌的军事协定”、“日本人提倡的亚细亚学生会”、“日本人的蒙古的自决”，种种怪现象、诡把戏，都是今日大亚细亚主义下的产物，断断不是新亚细亚主义下的产物。

最后我有两点，须郑重的与承元君相商量的：一，就是不要震于日本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势力，轻视弱小民族和那军国主义、资本主义下的民众势力。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象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闳，他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

我们应该在那威势煊赫的中间，看出真理的威权，因而发生一种勇气与确信，敢与他搏战，信他必可摧拉。二，就是我们应该信赖民族自决的力量，去解决一切纠纷，不可再蹈从前“以夷制夷”的复辙。“以夷制夷”这句话里，不但含着许多失败、失望的痛史，并且实在可以表现民族的卑弱耻辱。无论以人制人，虎去狼来，受祸还是一样。就是幸而依人能求苟活，这种卑陋的生活，也终于自灭而已。试看从前的外交陈迹，那样不是这样失败的！最可耻的就是最近青岛之役，所欲“以”的“夷”不可靠赖，就任这一“夷”横行，不敢一作声色。看看比利时以小国而抗强德的例子，能不愧然？到了现在，一般人的心理，还是不脱故辙，并且变相到依外力为靠背，杀残自己同胞的程度了！及今犹不痛自振拔，痛自忏悔，求个自决的途径，真是没有骨力的民族性，不可救药了！我决不希望苟且偷生于国际诈虞之间、强力相抵之下。因为挟国际猜忌、利权竞争的私心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论他是东方的、欧美的，绝讲不出公道话来。世界上无论何种族何国民，只要立于人类同胞的地位，用那真正 Democracy 的精神，来扶持公理，反抗强权的人，我们都认他为至亲切的弟兄。我们情愿和他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平等、自由、没有远近亲疏的世界。这是我主张的新亚细亚主义的精神。

1919年11月1日

《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

署名：李大钊

时间浪费者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日)

中国人都是时间浪费者，都是生命牺牲者。若叫中国人牺牲他的生命，他是万万不肯的。可是他天天都在牺牲，终身都在牺牲，却一点也不爱惜。时间就是生命，浪费了时间就是牺牲了生命。我们每日生活的时间，平均总是自己浪费了一半，别人为我浪费了一半。在我自己浪费时间的时候，还要浪费些别人的时间。这样核算起来，全社会浪费的时间该有多少？全民族的生命牺牲的该有多少？唉！中国人的生命，真贱啊！

1919年11月2日

《新生活》第11期

署名：孤松

最有力的调和者——时代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日)

时代不仁，演出新旧，惹得主张调和的人天天忙，天天担忧，天天夹在新旧之间，受些闲气，结果还是两不讨好。我劝主张调和的人歇歇罢！那进行不息的时代，才有调和的真本领呢！戊戌前后的康有为，人都嫌他太新，可是时代变了，能把他弄旧。枯黄的树叶还想在树枝上占着来春新叶的位置，秋风起了，可以请他走开。

主张调和的人，自问若没有这么大的本领，请把这件功业让给时代罢！

1919年11月2日

《新生活》第11期

署名：孤松

人与禽兽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日)

人类的妄自尊大，真是讨厌，动不动拿禽兽来形容他的高超。这种非科学的态度、口吻，实在不对。以我所知，禽兽里比人类德性优良的很多，人类比不上这些优良禽兽的更多。现在我们作伪的黑幕，已竟揭穿了。不要再拿那些良善的生物，形容我们自己的优越，欺骗同类了！

1919年11月2日

《新生活》第11期

署名：孤松

参战军呢？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日）

宣统年的禁卫军，替溥仪守门去了。洪宪朝的拱卫军，替袁世凯守墓去了。参战军呢？将来不知又作什么去？

1919年11月2日

《新生活》第11期

署名：孤松

谁是“有实力”者？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有人说“胜利终归有实力者”，这话诚然不错。可是到底谁是“有实力者”呢？是那些有钱的人么？若是工人不甘作他的奴隶了，他那“实力”又在那里？是那些带兵的人么？若是兵士不愿听他的指挥了，他那“实力”又在那里？

1919年11月9日

《新生活》第12期

署名：孤松

牺 牲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1919年11月9日

《新生活》第12期

署名：孤松

妨害治安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妨害治安!”“妨害治安!”在这句话的声音里,常常有言论出版的自由被剥夺了,有自由公民被囚禁了。但我要问,这个“治安”,究竟是谁的“治安”?妨害大多数“治安”的,到底是谁?我们大多数人的“治安”,并不泰奢,并不过分,也只求个穿衣吃饭而已。

我们“治安”范围,减到穿衣吃饭,应该无可再减了。你们还不答应,还要把我们穿衣吃饭的“治安”都牺牲了,供你们少数人奢侈淫乐的“治安”。你们拍拍良心,到底是谁妨害谁的“治安”?

1919年11月9日

《新生活》第12期

署名:孤松

出卖官吏——蹂躏人格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文官考试，听说三千元可以买得一个。你愿得官，我愿得钱，日中为市，交易而退，也算是一个公平买卖，我们没得可说。独有那应考诸君的神圣人格，被蹂躏到这步田地，我实在为他们抱憾！

1919年11月9日

《新生活》第12期

署名：孤松

掠夺物品的遗迹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一群告化子拥着一顶红轿，帘幕封得紧紧的，几个人抬着飞跑，好象掠夺来的物品一样。这是中国结婚的仪式！这是中国女子的人格！

1919年11月9日

《新生活》第12期

署名：孤松

死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胆小的人总是怕死，卑劣无聊的人总是盼反对他的人死，咒反对他的人死，阴贼阴狠的人总是想法把反对他的人置于死地。死是什么东西？死是这样可怕的么？死是这样有用的么？罗素说过：“你可以杀一个艺术家或思想家，但你不能得他的艺术或思想。你可以因为一个人爱他的同类把他置于死地，但你不能由这样的行为得到造成他的愉快的爱。”死不是那样可怕的啊！置人于死，于你不是那样有用啊！造谣咒人死，更是卑劣无聊之极啊！

1919年11月9日

《新生活》第12期

署名：孤松

寺内死了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寺内是日本军阀的元老，他生前作的罪恶不少。用军阀的势力压服他本国的平民，用酷厉的手段虐待朝鲜的民族，最后他的内阁更与我们军阀勾结，弄得我们南北交鬭，生民涂炭。而今寺内虽死，他那一把罪恶的枯骨，还在为我军阀所凭依。这一段孽缘，不知到何年何月才能了结！

1919年11月9日

《新生活》第12期

署名：孤松

“鼓吹共产主义”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近来有很多的印刷物，被政府用“鼓吹共产主义”的罪名禁止了。可是政府举行的文官考试，却出了“共产主义”的题目，给考试文官的人以大鼓吹而特鼓吹的权。我侪小民，真有“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感慨了！有人说那是官家的共产主义、孔子的共产主义，毫不带着危险的性质，与你们小百姓们所研究的不同。我想这话也不错！

1919年11月16日

《新生活》第13期

署名：孤松

联 人 社 会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从前常听有“联邦政府”的话，近来又恍惚有“联省政府”的声音。什么名词，尽由你们去说，我总是梦想那联人社会。

1919年11月16日

《新生活》第13期

署名：孤松

圣裔的恤金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圣裔死了，听说政府又要发给恤金了。何以吾侪小民痛心疾首的五折票子，还没有提高一点的消息呢？

1919年11月16日

《新生活》第13期

署名：孤松

那里还有自由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约法”上明明有言论自由，可是记者可以随便被捕，报馆可以随便被封。“约法”上明明有出版自由，可是印刷局可以随便被干涉，背反“约法”的管理印刷法可以随便颁布，邮局收下的印刷物可以随便扣留。“约法”上明明有书信秘密的自由，可是邮电可以随时随意派人检查。可怜中国人呵！你那里还有“约法”！那里还有自由！

1919年11月16日

《新生活》第13期

署名：孤松

一个自杀的青年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听说北大有位学生，在万生园投水自沉。他的自杀的原因，是病苦，烦闷，救国运动的积劳，境遇的困迫种种。这些都是由社会制度的缺陷暴露出来的。一个活泼泼的青年，既然认识了生命的崇高，决不愿受这卑污苦恼的生活的束缚。哎！社会制度的缺陷，不知道逼死了多少有高尚志趣的青年啊！

1919年11月23日

《新生活》第14期

署名：孤松

被裁的兵士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裁兵是一件好事，因为驱可怜的同胞去杀可怜的同胞，是我们最痛心的。不过我们要问，这兵究竟是谁招的？招了为甚么又要裁呢？呵！我知道了，招兵的人，现在官也到手了，财也发足了，国家的粮饷也弄空了，现在你们才知道要裁兵了。但是裁兵后兵士的生活问题，你们也曾想过没有呢？

1919年11月23日

《新生活》第14期

署名：孤松

归国的工人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海外的华工渐渐被人家送回来了，加上被裁的兵士，人数很是不少。这一大批失业的人，骤然散布在社会里，发生甚么影响？应该怎样安插？很是一个大问题。我很盼望官僚式的政客、新闻记者先生们，破一点工夫来研究研究，不要单是摆着架子说什么“隐忧”、“隐患”、“大乱之道”啊！

1919年11月23日

《新生活》第14期

署名：孤松

“一心一德”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参谋部的大参案,结果是把几个告发的部员免职,并且下了一道谆谆告诫的命令,令他们“一心一德”。这个意思,就是叫全国的大官小吏,都要“一心一德”的保住官僚团体,“一心一德”的……,不要揭破自家的黑幕。

1919年11月30日

《新生活》第15期

署名:孤松

“五星联珠”“文运大昌”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近日观象台有人报告说，“五星联珠”的天象，主“文运大昌”。我听了此话，联想到“五世其昌”、“文治派”两句话，就想这不分明是一幅活人造的新推背图么？他们并引据历史说，“汉高入关时，五星聚东井”，“宋艺祖开国，五星聚奎”的故事，来证明如今五星由东南方向西北方成一直线，长约二丈，“分明是南北统一的意思”，“分明是五族共和，不可涣散的意思”，“从明年起，文运大昌，国家富强，昇平约有六十年”。这些吉祥话、鬼话、梦话，我倒不愿批评他。但是我却担心着又要有“入关的汉高帝”，“开国的宋艺祖”啊！但是我的担心，却又不是从“天垂象”看出来的。前些日子，地上忽然铺了黄土，孔庙忽然开了大门，我就早有这个忧虑了！

1919年11月30日

《新生活》第15期

署名：孤松

“用民政治”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用民政治”这个名词，是山西的产物。我看见了他，就很以为奇怪。因为在“民治”的国家，有人出来要行“用民政治”，这不但可以令人奇怪，并且觉着危险万分。可是“用民政治”这个名词，到底是怎么解释？用民的人是谁？用民要作什么？我还是不知。我只听他们说“用民政治”，就是“道德金钱主义的政治”，只知道这是山西阎锡山氏特别发明，得文治总统头奖的制品。

1919年11月30日

《新生活》第15期

署名：孤松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

(一)

近几年来常常听关心世道人心的人，谈到道德问题。有的人说现在旧道德已竟破灭，新道德尚未建设，这个青黄不接人心荒乱的时候真正可忧。有的人说，别的东西或者有新旧，道德万没有新旧。又有人说，大战以后欧洲之所应为一面开新，一面必当复旧，物质上开新之局或急于复旧，而道德上复旧之必要必甚于开新。这些话都很可以启发我的研究兴味，我于是想用一番严密的思索去研究这道德问题。

我当研究道德问题的时候，发了几个疑问：第一问道德是甚么东西？第二问道德的内容是永久不变的，还是常常变化的？第三问道德有没有新旧？第四问道德与物质是怎样的关系？

以上诸问，都是从希腊哲学以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因为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道德心的存在却是极明了的事实，不能不承认的。我们遇见种种事体在我们心中自然而然发出一种有权威的声音，说这是善或是恶，我们只有从着这种声音的命令往善这一方面走，往光明一方面走，自然作出“爱他”、“牺牲”等等的行为。在这有权威的声音指挥之下，“忠信”、

“正直”、“公平”诸种德性都能表现于我们身上。我们若是不听从他，我们受自己良心的责斥，我们自己若作了恶事，就是他人不知，我们也自觉悔悟，自感羞耻，全因为我们心中有道德心的要求，义务的要求。这自然发现、自有权威的点就是道德的特质。自然科学哪、法律哪、政治哪、宗教哪、哲学哪，都是学而后能知的东西，决不是自然有权威的东西。惟有道德，才是这样自然有权威的东西。

但是这道德心究竟是怎样发生出来的呢？有人归之于个人的经验；有人归之于教育；有人归之于习惯礼俗；有人归之于求快乐、求幸福的念望；又有人归之于精练的利己心，或对于他人的同情心。这些都不能说明人心中的声音——牺牲自己爱他人的行为。

道德这个东西，既是无论如何由人间现实的生活都不能说明，于是就有些人抛了地上的生活、人间的生活，逃入宗教的灵界，因为宗教是一个无知的隐遁地方。在超自然的地方，在人间现实生活以外的地方，求道德的根原，就是说，善心是神特地给人间的，恶心是由人间的肉欲生的，是由物质界生的，是由罪孽生的。本来善恶根原的不可解，就是宗教发生的一个原因。人类对于自然界，或人间现象不能理解的地方，便归之于神。道德心、善恶心的不可思议，也苦过很多的哲人。这些哲人都觉得解释说明这不可思议的现象非借重神灵不可，所以柏拉图、康德之流都努力建设超自然的灵界。直到十九世纪后半，这最高道德的要求之本质才有了正确的说明。为此说明的两位学者就是达尔文与马克思。达尔文研究道德之动物的起原，马克思研究道德之历史的变迁。道德的种种问题至此遂得了一个解决的方

法。

(二)

我们先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解答道德是什么的问题。

人类的道德心不是超自然的，也不是神赐的，乃是社会的本能。这社会的本能，也不是人类特有的，乃是动物界所同有的。有些人类以外的动物，虽依动物的种类，依其生活状态的差异，社会的本能也有种种的差异。但是他们因为生存竞争，与其环周的自然抗战，也都有他们社会的本能。占生物界一大群合的动物生存竞争、天然淘汰的结果，使他们诸种本能——若自发运动，若认识能力，若自己保存，若种族蕃殖，若母爱本能等等——日渐发达。社会的本能也和这些本能有同一的渊源，为同一的发展。而在有社会的共同生活的动物，象那一种的肉食兽、很多的草食兽、反嚼兽、猿猴等类，社会的本能尤其发达。人类也和上举诸兽相同，非为社会的共同生活，则不能立足于自然界。故人类之社会的本能也很发达。

社会的本能也有多种。有几种社会的本能确是社会生活存续的必要条件，没有这种本能，社会生活，无论如何，不能存续。这种本能，在不与人类一样为社会的结合便不能生活的动物种属间，也颇发达。这种本能果为何物呢？第一就是为社会全体，舍弃自己的牺牲心。若是群居的动物没有这种本能，各自顾各自的生活，不肯把社会全体放在自己以上，他的社会必受环周的自然力与外敌的压迫而归于灭亡。譬如一群水牛为虎所袭的时候，其中各个分子如没有为一群全体死战的决心，各自惜命纷纷

逃散，那水牛的群合必归灭亡。故自己牺牲，在这种动物的群合，是第一不可缺的社会的本能。在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此外还有拥护共同利益的勇气，对于社会的忠诚，对于全体意志的服从，顾恤毁誉褒贬的名誉心，都是社会的本能，都曾发见于动物社会极高度的发达的也很多。这些社会的本能和那被称为至高无上灵妙不可思议的人类道德，全是一个东西。但是“公平”这一样道德，在动物界恐怕没有。因为在动物的社会里，虽有天然生理上的不平等，却没有由社会的关系生出的不平等，从而没有要求社会的平等之必要，也没有公平这一样道德存在的理由。所以公平只是人类社会特有的道德。

这样看来，道德原来是动物界的产物。人类的道德，从人类还不过是一种群居的动物时代，就是还没有进化到现今的人类时代，既已存在。人类为抵抗他的环境，适应他的周围，维持他的生存，不能不靠着多数的协力，群合的互助，去征服自然。这协力互助的精神，这道德心，这社会的本能，是能够使人类进步的，而且随着人类的进步，他的内容也益益发达。

因为人类的道德心，从最古的人类生活时代，既是一种强烈之社会的本能，在人人心中发一种有权威的声音，到了如今我们的心中仍然有此声响，带着一种神秘的性质，不因外界何等的刺激，不因何等的利害关系，他能自然挟着权威发动出来。他那神秘的性质和性欲的神秘、母爱的神秘、牺牲心的神秘、乃至其他生物界一般的神秘是一样的东西，绝不是超自然的力，绝不是神的力。

正惟道德心是动物的本能，和自己保存种族蕃殖等本能有同一的根源，所以才有使我们毫不踌躇、立即听从的力量，所以

我们遇见什么事情才能即时判断他的善恶邪正，所以我们才于我们的道德判断有强大的确信力，所以探求他的活动的理法，分解他，说明他，愈颇困难。

明白了这个道德，“义务”是什么，“良心”是什么，也都可以明白了。所谓义务，所谓良心，毕竟是社会的本能的呼声。然“自己保存”的本能、“种族蕃殖”的本能也有与此呼声同时发生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这二种本能常常反抗社会的本能，结果这二种本能或得相当的满足，可是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不久归于镇静，社会的本能发出更强的声音，就是愧悔的一念。有人以良心为对于共同生活伴侣间的恐怖——就是对于同类所与的摈斥或刑罚的恐怖——之声音。但是大错了。良心之起，于对他人全不知觉的事也起，对于四围的人都夸奖赞叹的事也起，甚至对于因为对于同类及同类间的舆论的恐怖而作的行为也起。可见良心的威力全系自发的，非因被动的。至于舆论的褒贬固然也是确与人的行为以很大影响的要素，然舆论所以能有影响的原故，全因为先有一种名誉心的社会的本能存在。舆论怎样督责，假使没有注意褒贬的名誉心的社会的本能，当不能有什么影响。舆论作出社会的本能的事，是作不到的。

依了这样说明，我们可以晓得道德这个东西不是超自然的东西，不是超物质以上的东西，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他的本原不在天神的宠赐，也不在圣贤的经传，实在我们人间的动物的地上的生活之中。他的基础就是自然，就是物质，就是生活的要求。简单一句话，道德就是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之社会的本能。

(三)

达尔文的理论可以把道德的本质阐发明白了。可是道德何以因时因地而生种种变动？以何缘故社会的本能之活动发生种种差别？说明这个道理，我们要用马克思一派的唯物史观了。

马克思一派唯物史观的要旨，就是说：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在物理上物质的分量和性质虽无增减变动，而在经济上物质的结合和位置则常常变动。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

我们先说宗教与哲学。一切宗教没有不受生产技术进步的左右的，没有不随着他变迁的。上古时代，人类的生产技术还未能征服自然力，自然几乎完全支配人类，人类劳作的器具，只是取存于自然界的物质原形而利用之，还没有自制器具的知识和能力。那时的人类只是崇拜自然力，太阳、天、电光、火、山川、草木、动物等，人类都看作最重要的物件，故崇拜之为神灵。拜火拜物诸教均发生于此时。直到现在，蛮人社会还是如此。纽基尼亚人奉一种长食的椰子为神，认自己的种族是从椰子生下来的，就是一个显例。

后来生产技术稍稍进步，农业渐起，军人宗祝这一类的人渐握权力，从前受制于自然，现在受制于地位较高的人类了。因为这时的社会已经分出治者与被治者阶级，这时的宗教又生一大

变化。从前是崇拜自然物的原形，现在是把自然物当作一个有力的人去崇拜他了。在希腊何美尔（Homer）的诗中所表现的神，都是男女有力的君长，都是智勇美爱的化身。因为生产技术与人以权力的结果，自然神就化为伟大的人了。后来希腊人的生产技术益有进步，商工勃兴，智勇美爱肉体的属性又失了重大的位置，有神变不可思议的万能力的乃在精神。因为在商业竞争的社会里，人类的精神是最重大的要素，计算数量的也是他，创作新发明的也是他，营谋利益的也是他，精神实是那时商业社会人类生活的中心。故当时哲家若梭格拉的，若柏拉图，都说自然界久已不足引我们的注意了，引我们注意的只是思想上及精神上的现象。这种变迁明明白白是生产技术进步的结果。但是人类精神里有很多奇妙不可思议的现象，就象道德心是什么东西，善恶的观念是从何发生，柏拉图诸哲家也不能解释。由自然界的知识与经验不能说明，结局仍是归之于神，归之于天界。故当时多数人仍把道德的精神认作神，认他有超自然的渊源。

各国分立，经济上政治上全不统一的时代——就是各国还未组成一个大商业社会的时代，——尚有多神及自然神存在的余地。自希腊之世界的商业发达以来，罗马竟在地中海沿岸的全部建一商业的世界帝国。这种经济上的变动反映到当时思想上，遂以唯一精神的神说明当时的全世界及存于其中的疑问，使所有的自然神全归于消灭。驱逐这些自然神的固然是柏拉图及士多亚派哲学上的一神论，而一神论的背景，毕竟是当时罗马的具有绝大威力的生产技术，罗马的商业交通，罗马的商业大社会。

到了罗马帝政时代，大经济组织、大商业社会正要崩坏的时候

候，恰有一种适合当时社会关系的一神教进来，就是耶稣教了。耶稣教把希腊原来的一神论吸收进去，把所有的势力归于一个精神，归于一个神。

罗马商业的大社会崩坏之后，从前各个分立的自然经济又复出现。中世纪的经济组织次第发展，耶稣教也不能保持他的本来面目，他的内容自然发生了变动。中世纪的社会是分有土地的封建制度、领主制度的社会，社会的阶级象梯子段一样，一层一层的互相隶属，最高的是皇帝，皇帝之下有王公，王公之下有诸侯，诸侯之下有小领主，百姓农奴被践踏在地底。教会本来是共产的组合，到了此时这种阶级的经济组织又反映到教会的组织，渐次发达，也成了个掠夺组织、阶级组织。最高的是教皇，教皇之下有大僧正、僧正等，僧正之下有高僧，由高僧至普通僧民的中间还有种种僧官的阶级。百姓农奴伏在地底，又多受一层践踏。这种阶级的经济组织又反映到耶教的实质，天上也不是一个神住着。最高的是神，神之下有神子，有精灵，其下更有种种的天使，堕落的天使，又有恶魔。神的一族，恰和皇帝教皇及其属隶相照应；人在诸神之下，恰和百姓居社会之最下层相照应。人类的精神把地上的实物写映于天上，没有比这个例子再明白的了。

后来都市渐渐发达，宗教上又生一变化。意大利、南德意志、法兰西、英吉利、荷兰诸国都市上的居民，因其工商业的关系，渐立于有权力的地位，对于贵族、僧侣有了自由独立的位置。随着他们对于社会的观念的变动，对于宇宙的观念也变了。于是要求一种新宗教。他们既在经济上不认自己以上的势力，又在政治上作了独立的市民、独立的资本家、独立的商人，立于自由的地

位，他们觉着自己与宇宙的中间，自己与神的中间，也不须有中间人介绍人存在了。所以他们蔑视教皇，蔑视僧官，自己作自己的牧师，直接与神相见，这就是路德及加尔文所倡的新教。这样看来，宗教革新的运动全是近世资本家阶级自觉其经济的实力的结果。资本家是个人反映出来的，所以新宗教也是个人的。

美洲及印度发见以后，资本主义的制度愈颇强大，工商贸易愈颇发达，人与人的关系几乎没有了，几乎全是物品与物品的关系了。一切物品于其各个实质的使用价值以外，又有一般共通抽象的交换价值，所以这时的人也互认为抽象的东西，因而所信的神也变成一个抽象的概念了。又因资本主义制度发达之下，贫困日见增加，在这种惨烈的竞争场里，社会现象迷乱复杂的程度有加无已，人若想求慰安与幸福，除了内观、冥想、灵化而外，殆不可能。而资本家的个人的表象照映于精神界，就成了一个绝大的孤立的神。十七世纪的哲学家，若笛卡儿、斯宾挪撒等都认神是有绝大精神的绝大体，能自动自考，就是这个原故。又因生产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制度的发达对于自然界的知识骤见增大，十七世纪间自然现象的不可解大概已渐消灭，但于精神科学尚未能加以解释。这时的宗教渐渐离开自然界和物质，神遂全为离于现实界的不可思议的灵体。基督教贱肉的思想，与夫精神劳动与手足劳动分业的结果，也加了许多势子。这时的哲家，若康德，则说时间的空间的事物是单纯的现象，没有真实的存在；若菲西的，则只认精神的主观就是我的。实在都是受了当时物质界经济界的影响，才有这种学说。就是因为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使每个人都成孤立，都成灵化，反映到宗教哲学上去，也就成一种孤立的抽象的精神。

蒸汽机发明以后,生产力益加增大,交通机关及生产技术益加发达,对于自然的研究益有进步。自然现象的法则渐为人智所获得,超自然的存在一类神秘的事遂消灭于自然界。同时人类社会的实质也因交通机关生产技术发达的结果,乃有有史以前、有史以后的种种研究,或深入地底,研究地层地质;或远探蛮荒,研究原始社会的状况。又得了种种搜集历史统计材料的方法,而由接着暴力的生产过程而生的社会问题,更促人竭力研究人类社会的实质。以是原因,自然现象、人类社会都脱去神秘的暗云,赤裸裸的立在科学知识之上,见了光明。以美育代宗教的学说,他就发生于现代了。

资本阶级固然脱出神秘宗教的范围了,就是劳工阶级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天天在工厂作工,天天役使自然,利用自然,所以他们也了解自然了。自然现象于他们也没有什么神秘不可解的权威了。至于人类社会的实质,他们也都了解,他们知道现在资本主义制度是使他们贫困的唯一原因,知道现在的法律是阶级的法律,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社会是阶级的社会。他们对于社会实质的了解,恐怕比绅士阀的学者还要彻底,还要明白。太阳出来了,没有打着灯笼走路的人了。

以上所论,可以证明宗教、哲学都是随着物质变动而变动的。

(四)

再看风俗与习惯。社会上风俗习惯的演成,也与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物质与经济有密切的关系。例如老人和妇女在社会上

的地位，也因时因地而异，这也是因为经济的关系。在狩猎时代，食物常告缺乏，当时的人总是由此处到彼处的迁徙流转，老人在这社会里很是一种社会的累赘，所以常常被弃被杀被食。如今的蛮人社会也常常见此风俗。日本古代有老舍山的话，相传是当时舍弃老人的地方。中央亚非利加的土人将与他部落开战的时候，必先食其亲，因为怕战事一经开始，老人很容易为敌人所捕获，或遭虐待，或被虐杀，所以老人反以为自己的儿子所食为福，儿子亦以食其亲为孝。马来群岛的布尔聂伊附近，某岛中人遇着达于一定年龄的老人必穷追他，使他爬上大木，部落的青年群集木下摇之使他落下，活活跌死。耶士魁牟的女子亦以把他比邻罹病垂危的老太婆带到投弃老人的地方，由崖上把他推下，为爱他比邻、怜他比邻的行为。到了畜牧时代、农业时代，衣食的资料渐渐富裕，敬老的事渐视为重要。而以种种经验与知识渐为社会所需要，当时还没有文字的发明，老人就是知识经验的宝库，遂为社会所宝贵。近来生产技术进步的结果，一切事象日新月异，古代传说反足以阻碍进步，社会之尊重老人遂又与前大不相同。不专因为他的衰老就尊重他，乃因为他能终其生涯和少年一样奋斗，为社会作出了许多生产的事业、创造的功绩。因为他不但不拿他的旧知识妨害进步，并且能够吸入新思潮，才尊重他。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随着经济状况变动，也和老人一样。在游猎时代，狩猎与战争是男子的专门事业，当时的妇女虽未必不及男子骁勇，而因负怀孕哺乳育儿的重大责任，此类事体终非妇女所宜，遂渐渐止于一定的处所，在附近居处的田地里作些耕作，在家内作些烧煮的事情。因为狩猎的效果不能一定，而农作比较着有一定效果，且甚安全，所以当时妇女的地位比男子

情好小利，女子的奢侈，也是物质变动的结果。男子在战争时期中，精神上物质上都经了很多的困乏，加以生活难、工作难的影响，精神上自然要发生变动。游惰哪，好小利哪，都是因为这个原故。将来物质若是丰裕，经济组织若有相当的改造，精神上不会发现这种卑苦的现象。女子骤然得到工作的，自然要比从前奢侈些，也是当然的现象。固然战后的人口增加，或者加猛加速，女子过庶的不平均，或者可以调剂许多，而经济的组织生产的方法则已大有改动。故就物质论，只有开新，断无复旧；就道德与物质的关系论，只有适应，断无背驰。道德是精神现象的一种，精神现象是物质的反映，物质既不复旧，道德断无单独复旧的道理，物质既须急于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因为物质与精神是一体的，因为道德的要求是适应物质上社会的要求而成的。耶士魁牟的女子本性上不能多产多生，所以他们的风俗就不以未婚的妇人产生及怀孕的处女为耻辱，所以在他们的社会多生多产的德比贞操的德重。女子贞操问题也是随着物质变动而为变动。在男子狩猎女子耕作的时期，女子的地位高于男子，女子生理上性欲的要求强于男子，所以贞操问题绝不发生，而且有一妻多夫的风俗。到了牧畜、农业为男子独占职业的时期，女子的地位低落下去，女子靠着男子生活，男子就由弱者地位转到强者地位，女子的贞操问题从而发生，且是绝对的、强制的、片面的。又因农业经济需要人口，一夫多妻之风盛行。到了工业时期，人口愈增，人类的欲望愈颇复杂，虽因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的数量增加，而资本主义的产业组织分配的方法极不平均，造成了很多的无产阶级。贫困迫人日益加甚，女子非出来工作不可。男子若不解放女子，使他们出来在社会上和男子一样工作，就不能

养贍他们。女子的贞操,就由绝对的变为相对的,由片面的变为双方的,由强制的变为自由的。从前重“从一而终”,现在可以离婚了;从前重守节殉死,现在夫死可以再嫁了。将来资本主义必然崩坏。崩坏之后,经济上生大变动,生产的方法由私据的变为公有的,分配的方法由独占的变为公平的,男女的关系也必日趋于自由平等的境界。只有人的关系,没有男女的界限。贞操的内容也必大有变动了。家族制度的变动也是如此。狩猎时代及劣等农作时代,因土地共有共同耕作的关系,氏族制度才能成立。后来人口渐增,氏族中的个人自进而开辟山林,垦治荒芜的人所在多有,因而对于个人辛苦经营的地面,不能不承认个人的私有。既经承认了个人的私有,那些勤勉有为的人大都努力去开辟地面,私有的地面逐日增大,从前氏族制度的经济基础就从而动摇了。到了高等农作时代,因为私有制度的发达,农业经济的勃兴,父权家长制的大家族制度遂继氏族制度而兴起。后来生产技术进步的结果,由农业时代入了工商时代,分业及交通机关日见发达,经济上有了新变动,大家族制度逐渐就崩坏。这个时期就发生了一夫一妻制的小家族制度,以适应当时的经济状态。可是到了现代,机械工业、工厂工业又复压倒了手工业、徒弟工业,大产业组织的下边造成多数的无产阶级,生活日趋贫困,妇女亦不得不出来工作,加以义务教育、儿童公育等制度推行日广,亲子关系日趋薄弱,这种小家庭制度,也离崩坏的运命不远了。

由此类推,可见风俗习惯的变动,也是随着经济情形的变动为转移的。

(五)

再看政策与主义。一切的政策，一切的主义，都在物质上经济上有他的根源。Louis Boudin 氏在他的《社会主义与战争》里说了许多很精透的道理，我们可以借来说明一种政策或主义与物质经济的关系。他说资本主义发达的历史，可以分作三个时期：第一是少年时期，是奋进的时代，富有好战的气质。第二时期，是成年时期，是全盛的时代，专务为内部的整顿，气质渐化为平和。第三是衰老时期，是崩颓的时代，急转直下，如丸滚坡，气质又变为性急好战的状态。这种变动，在英国历史上最易看出。由耶利撒别士即位到七年战争，二百年间，英国确是一个好战的国，东冲西突，转战不休。因为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方在少年时期，经了二百年间的苦战，才立下了世界第一商工业国的基础。七年战争以后，英国的资本主义已经确立，遂顿归平和。拿破仑战争全是别的原因，不是英国的资本主义惹起来的。直到这次大战以前，英国的资本阶级总是爱重平和，世界上帝国主义的魁雄不在英而转在德。美国独立所以成功，不全是因为美洲独立军的勇武，华盛顿的天才，英国不愿出很大的牺牲争此殖民地，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固然英国也未尝不欲得此土地，但因此起大战争，他们以为很不值得。当时英国政家巴客大声疾呼，主张美国民有独立的权利。表面的言辞说来很是好听，骨子里面也不过是亚丹斯密氏殖民政策的应用罢了。亚丹·斯密氏主张母国与殖民地之间，若行排他的贸易，不但于殖民地及世界一般有害，即于母国亦大不利。故母国应使其殖民地自由平等，与世界

通商。美国所以能够独立的原故，毕竟是因为正值英国持平和政策的时期。以后英国在南非又承认波亚人组织的二共和国，也是这个原故。过了十五年，波亚人又与英国开战，二共和国就全为英国所压服了。那时英国的态度全然一变。最初波亚人与英国开战时候，英国正是正统经济学的国，自由贸易的国，满切士特(Manchester)学派的国，亚丹·斯密氏殖民政策的国，新帝国主义的波浪还未打将进来。到了第二战争，英国已经不是从前的英国了，是新帝国主义的英国，是张伯伦氏新殖民政策的英国了。使英国的主义、政策起这样变化的经济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从前的时代是织物时代，现在的时代是钢铁时代了。英国的工业当初最盛者首推织物，织物实占近世产业的主要部分。英国织物产业的中心，却在满切士特，满切士特的织物产业为世界产业的焦点，亚丹·斯密氏的自由贸易主义，就以满切士特为根据，成了满切士特学派。郭伯敦之蹶起反对谷物条例，反对保护税，在自由平和一些美名之下，为新兴的商工阶级奋斗，也是因为这个原故。

当时的英国既以织物类的生产为主要的产业，其销路殆遍于全世界，以握海上霸权、工业设备极其完密的英国，自无用兵力扩张的必要。且以低廉的价格出卖精良的货物，也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自由贸易主义、平和主义、殖民地无用论，都发生在这个时代。以后各半开化国及各殖民地工业渐能独立；象织物类的单纯工业不须仰给于英国，英国要想供给他们，必须另行创制益加精巧的工业。恰好各后进国工业新兴，很需要机械一类的东西，于是英国的产业就由纺纱时代，入了钢铁时代了。英国销行世界的产物，就由织物类变为机械类了。英国的产业中

心,就由满切士特移到泊明港了。泊明港是钢铁的产地,张伯伦是生于泊明港的人,所以张伯伦代表泊明港的钢铁,代表英国钢铁产业时代物质上的要求、经济上的要求,主张一种的新殖民政策、新帝国主义。张伯伦初次入阁的时候,自己要作殖民总长,大家都很以为奇怪,因为从前的殖民部是一个闲部,张伯伦是一代政雄,何以选这闲部?那里知道当时的殖民部已经应经济的变化,发生重大意义了。但是机械的贩卖,与织物类的贩卖不同,贩卖织物类只须借传教士的力量,使那半开化国和殖民地的人民接洽文明生活的趣味,就能奏功,而贩卖机械,则非和他的政府官厅与资产阶级交涉不可。那么政治的、外交的、军事的策略,就很要紧了。以是因缘,自由贸易的祖国也变为保护政策的主张,平和主义的国家也着了帝国主义的彩色。

德国的产业进步比英国稍晚。英国正当成年时期,德国方在少年时期,好战的气质极盛,还没有到平和时期,又正逢着第二次的好战时期。最近十年内英德两国的产铁额大有变动。当初德国的产业仅当英国的什一,到大战以前,德国的产额已经超过英国了。观此可以知道德国为世界帝国主义的魁雄的原因,也就可以知道这回大战的原因了。

综观以上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使当时新兴商工阶级打破封建制度束缚的物质的要求,向上而为国民文化主义;第二时期是使当时织物贩卖的物质的要求向上,而为自由主义、世界的人道主义;第三时期是使机械贩卖的物质的要求向上而为帝国主义。有了那种物质的要求,才有那种精神的道德的要求。

(六)

总结本篇的论旨，我们得了几个纲领，写在下面：一、道德是有动物的基础之社会的本能，与自己保存、种族繁殖、性欲母爱种种本能是一样的东西。这种本能是随着那种动物的生活的状态、生活的要求有所差异，断断不是什么神明的赏赐物。人类正不必以万物之灵自高，亦不必以有道德心自夸。二、道德既是社会的本能，那就适应生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变革。因为生活状态，社会要求既经变动，人类社会的本能自然也要变动。拿陈死人的经训抗拒活人类之社会的本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三、道德既是因时因地而常有变动，那么道德就也有新旧的问题发生。适应从前的生活和社会而发生的道德，到了那种生活和社会有了变动的时候，自然失了他的运命和价值，那就成了旧道德了。这新发生的新生活新社会必然要求一种适应他的新道德出来，新道德的发生就是社会的本能的变化，断断不能遏抑的。四、新道德既是随着生活的状态和社会的要求发生的，就是随着物质的变动而有变动的，那么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道德亦必跟着复旧。因为物质与精神原是一体，断无自相矛盾、自相背驰的道理。可是宇宙进化的大路，只是一个健行不息的长流，只有前进，没有反顾；只有开新，没有复旧；有时旧的毁灭，新的再兴。这只是重生，只是再造，也断断不能说是复

旧。物质上,道德上,均没有复旧的道理!

这次的世界大战,是从前遗留下的一些不能适应现在新生活新社会的旧物的总崩颓。由今以后的新生活新社会,应是一种内容扩大的生活和社会——就是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我们所要求的新道德,就是适应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之道德。从前家族主义、国家主义的道德,因为他是家族经济,国家经济时代发生的东西,断不能存在于世界经济时代的。今日不但应该废弃,并且必然废弃。我们今日所需要的道德,不是神的道德、宗教的道德、古典的道德、阶级的道德、私营的道德、占据的道德;乃是人的道德、美化的道德、实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创造的道德!

1919年12月1日·
《新潮》第2卷第2号
署名:李大钊

青年厌世自杀问题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

自林德扬君自杀，一时论坛对此问题颇有所讨论。因此，我也把我近来对于青年自杀的意见写出来和大家商榷。

我于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有几个要点要预先声明。

第一，自杀的情形因各个事件而有不同，我们不能够泛就自杀而下笼统的判断。我们应该分别自杀的种类，个别的论断他的是非。

第二，自杀流行的社会，一定是一种苦恼烦闷的社会。自杀现象背后藏着的背景，一定有社会的缺陷存在。

第三，我们应该承认一个人于不直接妨害社会，迷惑他人的范围内，有自己处决他自己的生命的自由权。

第四，我们只能批评自杀者的人生观，说他是或非，指导一般生存的青年向人生进路的趋向，不能责备自杀者的个人，说他道德不道德，罪恶不罪恶；惟因自杀直接予人以迷惑，予社会以妨害的，又当别论。

把这四点认定，才可论青年厌世自杀问题。

本来自杀是人类生活特有的现象，人类以外的动物，不发生自杀的现象，因为自杀是智慧的结果。野蛮人多有不了解自杀是怎样一回事，牙岗人和安德曼岛的土人，看见白人有在他们部

落内自杀的，他们一定想是被别人杀的，嘲着要大索犯人。你若向中部澳洲的土人说自杀的事，他一定说你是说笑话，万不相信。可是这也有例外，那康甲卡人和赫士人又有胡乱自杀的倾向：媳妇因为婆母不吃他做的饭，也自杀；老年人因为身子衰怠，也自杀；小姑娘脸上一发赤就得严加监视，直到伊全然忘记了伊害羞的事而后已。加冷人晚间饮酒的时候，夫妻有三言两语的不合，明朝夫或妻必有一人在树枝上自缢。这或者是因为这些人种生理上、心理上，或他们所住的地方地理上、气候上有特别的原因。大体看来，智慧多的人容易自杀，自杀的现象多盛行于教育阶级、智识阶级中。那有关于自杀的名著的意大利人摩塞里，曾于意国发见自杀最多者为从事科学文学的人，百万人中有六百十四人，其次就是从事国防的四百零四人，从事教育的三百五十五人，从事行政的三百二十四人，商人二百七十七人，司法官二百十八人，医师二百零一人，从事工业的八十人，从事原料制造的二十五人。法国亦然，奴婢八十三人，商人及运送业者九十八人，原料制造者百十一人，工业家百五十九人，从事所谓自由职业的五百十人。其余统计家所得的结果，虽也有与此不同的，但自杀在生活状态简单者最少，与生活状态复杂的程度递加，几乎是一个普通的原则。

文明进步的结果，生活状态愈趋于复杂。人类的生活，去原始的自然生活、劳动生活日远，而偏于耗用脑智精神，因而过劳；又因生活上的欲望增高，内容扩大，往往招来失望和灾难；所以自杀的激增是十九世纪内各国普遍的现象。我们可以说自杀是十九世纪的时代病，我们可以说十九世纪是“自杀时代”！

意大利人摩塞里著有《自杀论》。他说：十九世纪间，欧洲各

国的泰半，不但自杀的数都是增加，而且增加的比例略同。法国由千八百二十六年至千八百七十五年五十年间，一年自杀的平均数，由人口百万中五十四人升到百五十四人。普国由千八百十六年至千八百七十七年，由七十人二分升到百七十三人五分。日尔曼和奥大利增加更甚。惟有英国和挪威不见增加：英国每百万人中平均在六十五人左右，挪威由八十人降到七十人，这是一个例外。

日本近年自杀者的增加，尤为可惊。据他们警视厅的调查，就在他所管的地方，东京市十五区与六郡八岛的自杀者，明治四十三年一一一二人，四十四年一一五七人；大正元年一二六八人，二年一三一二人，三年一三八九人；——合计自杀既遂者和未遂者——全国合计起来，明治四十四年一万零七百五十三人，大正元年一万一千百二十八人。

中国全国的自杀统计，虽然未必精确，然亦可以看出增加的趋势。各省的统计表，我还未搜集完全，暂且不论。但据内务部的《内务统计》京师人口之部和京师警察厅的《京师警务一览图表》里面所载北京内外城自杀的统计：前清光绪三十三年，男四十六，女三十四，合计八十人。光绪三十四年，男五十三，女三十七，合计九十人。宣统元年，男五十九，女三十四，合计九十三人。宣统二年，男三十九，女二十二，合计六十一人。宣统三年，男五十八，女三十二，合计九十人。民国元年，男五十，女三十六，合计八十六人。民国二年，男女合计八十三人。民国三年，五十四人。民国四年，男六十八，女四十二，合计一百一十人。民国五年，自杀已遂者，男五十五，女三十，合计八十五人；未遂者，男四十，女五十七，合计九十七人。民国六年，自杀已遂者，男九

十三,女三十三,合计一百二十六人;未遂者,男四十六,女三十八,合计八十四人。亦足以证明自杀者增加的趋势。

普通说,夏季是“自杀季节”,因为太阳的光线刺激人的神经。挑拨人的感情,足以扰乱人心的安定,使人的心理上精神上起一种变化。在这个时候,凡是生活上失意的人,绝望的人,或是对于人生问题怀疑的人,对于社会现状苦闷的人,往往被诱到死路上去。近来生活困难的结果,年关也成了生活上的生死关头,也成了一种“自杀季节”,不过这是由人事的关系发生的,不是由自然的影响发生的。这“自杀时代”诱引人逼迫人上自杀的途径去,也和“自杀季节”的诱引与逼迫一样。因为十九世纪末年的世界,已经充满了颓废的气氛,物质文明渐渐走入死境,所以牵着人也到死路上去。各人生活上塞满了烦闷,苦恼,疲倦,颓废,失望,怀疑。青年的神经锐敏,很容易感受刺激,所以有许多青年,作了“自杀时代”的牺牲。

自杀的原因不一,所以自杀者的类别也不同:有因犯了罪恶愧悔而自杀的,有因穷饿所迫而自杀的,有因失恋而自杀的,有因殉情而自杀的,有因家庭不和而自杀的,有因考试落第而自杀的,有因社会政治不良而自杀的,有因职务上不能如意执行而自杀的,有因神经失常而自杀的,有因避病苦而自杀的,有因哲学上对于人生起了烦闷怀疑而自杀的,有因坚持自己的主义信仰保全自己的人格名誉而自杀的,有因宗教上的迷信而自杀的,有因外界自然的诱引,或受他人的暗示(模仿)而偶然自杀的。这些样的自杀,个别的原因虽然不同,而时代文明与社会制度的缺陷,实在是他们的根本原因,共同原因。社会制度若是没有经济上的不平,不会发生因穷饿而自杀的人。社会制度若是不迫人

犯罪,不会发生因愧悔而自杀的人。若是婚姻制度没有弊病,不会发生因失恋殉情而自杀的人。若是家庭制度有解放个性的精神,不会发生因家庭不和而自杀的人。若是学校制度、教育制度没有缺陷,不会发生考试落第,或因课业过劳患神经病而自杀的青年。若是政治制度明良,不会有因愤世,或因不能自由执行职务而自杀的人。就是病苦的人,也与日常生活的安与不安,很有关系。就是那些因哲学上对于人生起了怀疑与夫那些为主义、信仰、人格、名誉、甘愿牺牲而自杀的人,也多发生在黑暗社会里,或黑暗势力的下面。千八百五十年顷的俄罗斯专制的黑暗势力,把人民的生活趣味,完全遮断。社会一切现象,都呈出死气。那时的文学家,只有讴歌“死”、描写“死”的庄严、“死”的美善。那时的青年,只有“死”、只有自杀是他们的天国。就有不自杀的,也没有什么生趣了,这就是一个显例。至于模仿的自杀,也多发生于自杀流行的社会。为自然诱引的自杀,也多发生于怀有隐痛的人。看那日本的青年,自从叫藤村操的一位青年,因哲学上的怀疑投入华严泷以后,投华严泷自杀而死的年以数十计。警察设种种方法防阻自杀的人,终不奏效。这一个景致绝美的瀑,几乎成了“死之瀑”,成了日本人的唯一死所。其他投入浅间山喷火口,或在富士山巅自杀的青年,尚在接踵而起。请问这些青年,全是模仿藤村操的么?都是为湖光山色所诱引的么?他们自杀的原因,模仿、诱引而外,果然没有生活上的苦痛么?我想往那里去的人,去时虽然未必有自杀的决心,但是在那里自杀的人,生活上未必没有可以供他自杀的隐痛,不过加上一层模仿与诱引,更容易促他实行就是了。这样看来,与其说自杀的行为是罪恶的行为,不如说自杀流行的社会,是罪恶的社会;

与其责难自杀的人，不如补救促起自杀流行的社会缺陷。志希君论林德扬君的自杀标题曰：《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盖含有沉痛的意义！

各宗教对于自杀的是非观，亦有不同的地方。回教以自杀为逆神的命令，比杀人的罪更重，故教中悬为厉禁。耶教十戒中，有禁杀一条，不但禁止杀人，并且禁止自杀。儒教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匹夫匹妇，自经沟渎”的话，大概也是反对自杀。佛教于一定的事情，许人自杀，但通常都以为自杀者，死后受惨苦，是前世的罪孽。惟波罗门教因有死后灵魂可以祟敌的信仰，故认因为复仇而自杀为勇敢行为。

哲学家对于自杀的意见，也不一样。康德以自杀为轻蔑存于人中的人道。菲西的以欲保生命，欲生是吾人的义务。海格尔以人能左右自己的生命的权利为绝大的矛盾，所以自杀是一种罪恶。陶马士·穆阿主张人若罹不治的病，很以为苦的，得牧师或长官的同意可以自杀。但牧师或长官须照自杀志愿者的志愿与病状，务求合于他的希望。美国某州已采取此说，公认罹不治难医的病的，可以自杀。柏拉图说，不可非难因苦运命或难堪的耻辱而自杀的人。耶比邱拉士说待死与自杀孰宜，不可不加以考究。这是很有含蓄的话。

关于自杀的道德观，又因国因民族而有差异，在东洋牺牲个性的消极的厌世的静的文明，多可认自杀。有时认自杀为无上的道德。中国之旌表节烈，日本以切腹为武士道的要素，都是例证。在西洋保存个性的积极的乐天的动的文明，多否认自杀。以自杀者为犯了罪恶，认他是杀人罪的被害者，同时又是加害者。英国以前不许自杀者葬普通的坟墓。

中国自潘宗礼、杨笃生、陈星台相继蹈海而后，各处青年厌世自裁的，渐渐有了。民国二三年顷，湘中少年有因外交失败而自杀者，我当时适在日本，曾致书《甲寅》，与章行严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我以为少年不应自杀，应该留此身以为奋斗之用。行严先生复书颇有几句沉痛的话，他说：“吾国之所大患，亦偷生苟容之习而已。自杀之风果昌，尚能矫起一二”；“匹夫沟渎之言，乃先民半面的教训，古今几多冯道、吴广^①之辈，依此以藏其身”；“无自杀之决心者，未必即能立效命之宏愿。往者曾涤生败于靖港，愤投湘江，吾家价人负之以起。负之以起，非涤生所及料也，尔后成功，即卜于此”；“今吾国之所患，不在厌世而在不厌世。有真厌世者，一方由极而反，可以入世收舍己救人之功，一方还其故我，与浊世生死辞，极廉顽立懦之致。”如今思之，他的话实含有至理。中国社会，到了今日黑暗算是达于极点。中国若有血气、有理想、有精神的青年，对于这种黑暗的社会，没有趣味的生活，当然不满意、失望、悲观。将来青年的理想，日高一日，这种不满意、失望、悲观，也必日多一日；青年厌世自杀的风，恐怕也日盛一日。我们对于这种自杀而死的不幸青年，当然要流几点同情的热泪，因为他们实在不是醉生梦死的青年。然而对于他们的自杀，终不能不抱一点遗憾，因为他们只知厌倦卑污的生活，不知创造高尚的生活，他们只知道向死里逃避旧生活，不知道向死里寻找新生活。我希望活泼泼的青年们，拿出自杀的决心，牺牲的精神，反抗这颓废的时代文明，改造这缺陷的社会制度，创造一种有趣味有理想的生活。我们应该拿出那日本

^① 吴广，疑为东汉时的“胡广”之误。——编者

人情死的精神，与我们的新生活相抱合，任他是车轮，是白刃，是华严泐的水，是喷火山的火，我们也要前进，与我们理想的新生活握手。我们断断不可只为厌世，为生苦而不怕死，应该为造世为求乐而不怕死。

由此说来，青年自杀的流行，是青年觉醒的第一步，是迷乱社会颓废时代里的曙光一闪。我们应该认定这一道曙光的影子，努力向前冲出这个关头，再进一步，接近我们的新生命。诸君须知创造今日的新俄罗斯的，是由千八百五十年顷自杀的血泡中闯出去的青年。创造将来的新中国的，也必是由今日自杀的血泡里闯出去的青年。我悯吊这厌世自杀的青年，我不能不希望那造世不怕死的青年！我不愿青年为旧生活的逃避者，而愿青年为旧生活的反抗者！不愿青年为新生活的绝灭者，而愿青年为新生活的创造者！

1919年12月1日
《新潮》第2卷第2号
署名：守常

“中日亲善”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七日)

日本人的吗啡针,和中国人的肉皮亲善。日本人的商品,和中国人的金钱亲善。日本人的铁棍手枪,和中国人的头颅血肉亲善。日本的侵略主义,和中国的土地亲善。日本的军舰,和中国的福建亲善。这就叫“中日亲善”。

1919年12月7日

《新生活》第16期

署名:孤松

主 义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七日)

我们谈主义罢，王揖唐也来谈主义；我们非主义罢，阎錡山又来非主义。究竟如何是好呢？

1919年12月7日

《新生活》第16期

署名：孤松

“裤子”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七日)

日本尾崎行雄对堺利彦说：“我以后要和你走一条路。”堺答他道：“好！但是请你先把裤子脱下去。”中国的无裤党魁，却要和那武装戴鸡毛的人一路走，不知他那裤子是几时穿上的？

1919年12月7日

《新生活》第16期

署名：孤松

什么是新文学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八日)

现在大家都讲新文学，都作新文学了。我要问大家：“什么是新文学？”

我的意思以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刚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辞，也算不得新文学。

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

现在的新文学作品，合于我们这种要求的，固然也有，但是终占少数。一般最流行的文学中，实含有很多缺点。概括讲来，就是浅薄，没有真爱真美的质素。不过摭拾了几点新知新物，用白话文写出来，作者的心理中，还含着科举的、商贾的旧毒新毒，不知不觉的造出一种广告的文学。试把现在流行的新文学的大部分解剖来看，字里行间，映出许多恶劣心理的斑点，夹托在新思潮、新文艺的里边。……刻薄、狂傲、狭隘、夸躁，种种气氛充塞满幅。长此相嘘以气，必致中乾，种种运动，终于一空，适以为挑起反动的引子。此是今日文学界、思想界莫大的危机，吾

辈应速为一大反省!

我们若愿园中花木长得美茂,必须有深厚的土壤培植他们。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新运动的土壤、根基。在没有深厚美腴的土壤的地方培植的花木,偶然一现,虽是一阵热闹,外力一加摧凌,恐怕立萎!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八日自北京寄

1920年1月4日

《星期日周刊》“社会问题号”

署名:守常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演说辞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今天是贵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日，兄弟得参与盛会，觉得非常荣幸。我今天虽然谈到图书馆教育的事情，可是教育是诸位专门的学业。我对于教育没有特别研究，所以说的，或则是很肤浅。

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想教育发展，一定要使全国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换一句话说，就是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是研究室。但是想达到这种完美教育的方针，不是依赖图书馆不可。

图书馆有两种：一是社会的，一是学校的。社会图书馆的对象是社会一般人民，学校图书馆的对象是学生。这两种的性质不同，所以形式也不一样。我对于图书馆没有什么研究，不过现在担任北京大学的事情，所以谈一谈学校图书馆。

图书馆的历史，在中国和西洋，都是很久。老子曾经当过柱下史，这就是现在管理图书馆的人。可是古代图书馆和现在的性质完全不同，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管理员不过是守书的人。他们不叫书籍损失，就算尽了他们的职务。现在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只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

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

现在图书馆已经不是藏书的地方,而为教育的机关,所以和教授法有密切的关系。教授法若是变更,那么图书馆也不能不变。从前旧教授法是以教师为主体的,现在不满意这种制度,在教科书和讲堂以外,还由教师指出许多的参考书作学生自动的材料。按这种新教授法去实行,若没有完备的图书馆,藏了许多的参考书,决不能发生效果。所以现在图书馆主张复本增加,就是主要的书不仅只一本,而备了许多本。美国某大学设了助教制度,从前只有一个教师的,现在添了许多助教,这班助教不必上讲堂授课,只在图书馆里搜罗书籍供学生参考。这种制度有两层利益:一层可以消除师生间的隔阂,一层可以鼓励研究的兴趣。因是实行这种制度,所以图书馆的复本不能不增加。

旧图书馆采文库式,取书的手续非常麻烦。阅书的人不能亲自拿书,只能在目录里查出书名填在单子上叫管理员拿来;若是拿来的不合用,又要按从前手续去换。现在欧美各国为节省无谓的手续和虚费的时间,并且给阅览的人一种选择的便利,所以多主张开架式。但是开架式有一层弊处,就是损失较多。不过这是少数金钱的损失,算不得什么。据美国的统计,开架式所得的利益比损失大得多。英国有安全开架式,比较稍好一点。此外,又因为开架式发生目录的问题。从前的目录是字典式,就是以书名的A、B、C、D排列,这种目录很宜于文库式,因为可以使管理的人便利。但是开架式的目录宜于分类,就是依书籍的性质去分别。因为图书馆就是研究室,阅览的能随时翻阅才好,若是用字典式,那就太不方便了。

以上说的两层:一是复本增加,一是开架式。这都是图书馆

的新趋势。

北京大学图书馆从前是开架式，不过设备很不完全。后来移到一座新地点，这地点本来是作学生寄宿舍的，所以房子很小，全不合图书馆的建筑。近来没有法子，只得拿小的房子当文库，大的当阅览室，把合于新趋势的制度反而废掉了。从前敝校想移到西山去，恐怕不能成为事实。所以现在想法子废去文库式，采用开架式，但是开架式最重要的是公德心。敝校读书的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就是借去的书籍，往往不按期交还。图书馆的职员虽然很多，但是天天办的都是些借书的手续。所以这个图书馆不是研究室，变成借书所了。现在打算从明年起，无论谁都不许借书，减少这些办无聊手续的职员，添聘些助教式的学生，那么于图书馆的新趋势，或则接近一点了。

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和社会教育更有关系。贵校是研究教育的，所以我希望贵校添设图书馆专科，或是简易的传习所，使管理图书的都有图书馆教育的知识。这是我个人的希望，觉得贵校是最相宜的。从前清华学校拟设图书馆专科，后来因经济不够，所以不办。他想明年暑假办一个图书馆教育传习所，但是他在城外，也有许多的不便利，所以我仍是希望贵校举行。这是关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请诸位注意。

1919年12月13日
《平民教育》第10号

署名：李守常讲
子同笔记

什么是歪史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前几天看见文治总统出了一道命令，说某人作的《元史》，是“名山盛业”，“应列入正史”。我想出版自由，载在“约法”，判断一切史传文书良否，自有社会上公允的批评在。不但不劳政府当局，用法令来断定那个是“正史”，那个是歪史，而且政府当局，实在没有这个权力。如果政府硬要妄行此种权力，以文饰文治的昌运，那就无异于侵犯人民的著作自由权、出版自由权，我们不可把这事看作无关轻重的事情。

1919年12月14日

《新生活》第17期

署名：孤松

禁止说话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报载某督军请政府禁止白话文, 广义的解释, 就是禁止人说话了。秦政是一代的专制魔王, 不过禁止偶语, 如今并白话也要禁止, 真是秦政的知己。

1919年12月14日

《新生活》第17期

署名: 孤松

工 读(一)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中国乡村里有句旧话说得很好，就是“耕读传家”。现在家族制度渐就崩坏，“传家”二字已没用了，可以改为“耕读作人”。是一句绝好的新格言。

1919年12月21日

《新生活》第18期

署名：孤松

工 读(二)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现在世界上的工人运动，都主张缩小工作的时间。从前还主张八小时，现在有主张六小时的了。在我们懒惰的人看来，多以为省出来的时间，只是为休息休息，那知人家工作以外，还要读书。省出来的时间愈多，就是读书的时间愈多，使工不误读，读不误工，工读打成片，才是真正人的生活。

1919年12月21日

《新生活》第18期

署名：孤松

互 助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中国乡村里多悬着“守望相助”的旗子，路上推的那一轮车上，也常贴着那“借光二哥”的纸条。这都是“互助”的精神，可惜他只在旗子上和车子上罢了！

1919年12月21日

《新生活》第18期

署名：孤松

大 联 合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五四”、“六三”以来，全国学生已成了一个大联合。最近北京各校教职员也发起了一个联合，对于全国教育的根本和个人的生存权，有所运动。我很盼望全国的教职员，也组织一个大联合。更与学生联合联络起来，造成一个教育界的大联合。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础。

1919年12月28日

《新生活》第19期

署名：孤松

生 活 神 圣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此次教职员因薪水问题罢业，许多人还是拿冠冕堂皇的话来责备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也有些人觉着因为吃饭问题罢业不好意思似的。我以为到是光明磊落的要求生活权，是一件很体面很正当的事。不要套些假面具，把生活神圣的光华遮盖了。

1919年12月28日

《新生活》第19期

署名：孤松

物质和精神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当然要有相当的物质维持他们的生存。不然，饥寒所驱，必至改业或兼业他务。久而久之，将丧失独立的人格。精神界的权威，也保持不住了。

1919年12月28日

《新生活》第19期

署名：孤松

由经济上解释 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一九二〇年一月一日)

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现在只把中国现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由经济上解释解释。

人类生活的开幕，实以欧罗细亚为演奏的舞台。欧罗细亚就是欧亚两大陆的总称。在欧罗细亚的中央有一凸地，叫作 Tableland。此地的山脉不是南北纵延的，乃是东西横亘的。因为有东西横亘的山脉，南北交通遂以阻隔，人类祖先的分布移动，遂分为南道和北道两条进路，人类的文明遂分为南道文明——东洋文明——和北道文明——西洋文明——两大系统。中国本部、日本、印度支那、马来半岛诸国、俾露麻、印度、阿富汗尼士坦、俾而齐士坦、波斯、土耳其、埃及等，是南道文明的要路；蒙古、满洲、西伯利亚、俄罗斯、德意志、荷兰、比利时、丹麦、士坎送拿威亚、英吉利、法兰西、瑞士、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奥士地利亚、巴尔干半岛等，是北道文明的要路。南道的民族，因为太阳的恩惠厚，自然的供给丰，故以农业为本位，而为定住的；北道的民族，因为太阳的恩惠薄，自然的供给啬，故以工商为本位，而为移住的。农业本位的民族，因为常定住于一处，所以家族繁

衍，而成大家族制度——家族主义；工商本位的民族，因为常转徙于各地，所以家族简单，而成小家族制度——个人主义。前者因聚族而居，易有妇女过庶的倾向，所以成重男轻女一夫多妻的风俗；后者因转徙无定，恒有妇女缺乏的忧虑，所以成尊重妇女一夫一妻的习惯。前者因为富于自然，所以与自然调和，与同类调和；后者因为乏于自然，所以与自然竞争，与同类竞争。简单一句话，东洋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洋文明是动的文明。

中国以农业立国，在东洋诸农业本位国中，占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大家族制度在中国特别发达。原来家族团体，一面是血统的结合，一面又是经济的结合。在古代原人社会，经济上男女分业互助的要求，恐怕比性欲要求强些，所以家族团体所含经济的结合之性质，恐怕比血统的结合之性质多些。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那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那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那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所以孔子的政治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全是“以修身为本”；又是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牺牲个性的第一步就是尽“孝”。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孝”的放大体，因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至于夫妇关系，更把女性完全浸却；女子要守贞操，而男子可以多妻蓄妾；女子要一而终，而男子可以细故出妻；女子要为已死的丈夫守节，而男子

可以再娶。就是亲子关系的“孝”，母的一方还不能完全享受，因为伊是隶属于父权之下的；所以女德重“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总观孔门的伦理道德，于君臣关系，只用一个“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君；于父子关系，只用一个“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于夫妇关系，只用几个“顺”、“从”、“贞节”的名辞，使妻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的义务的道德。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这样相沿下来，中国的学术思想，都与那静沈沈的农村生活相映照，停滞在静止的状态中，呈现出一种死寂的现象。不但中国，就是日本、高丽、越南等国，因为他们的农业经济组织和中国大体相似，也受了孔门伦理的影响不少。

时代变了！西洋动的文明打进来了！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因为西洋文明是建立在工商经济上的构造，具有一种动的精神，常求以人为克制自然，时时进步，时时创造。到了近世，科学日见昌明，机械发明的结果，促起了工业革命。交通机关日益发达，产业规模日益宏大，他们一方不能不扩张市场，一方不能不搜求原料，这种经济上的需要，驱着西洋的商人，来叩东洋沈静的大门。一六三五年顷，已竟有荷兰的商人到了日本，以后 Perry Harris

与 Lord Elgin 诸人相继东来，以其商业上的使命，开拓东洋的门径，而日本，而中国，东洋农业本位的各国，都受了西洋工业经济的压迫。日本国小地薄，人口又多，担不住这种压迫，首先起了变动，促成明治维新，采用了西洋的物质文明，产业上起了革命——如今还正在革命中——由农业国一变而为工业国，不但可以自保，近来且有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的势力了。日本的农业经济组织既经有了变动，欧洲的文明、思想又随着他的经济势力以俱来，思想界也就起了绝大的变动。近来 Democracy 的声音震荡全国，日本人夸为“国粹”之万世一系的皇统，也有动摇的势子；从前由中国传入的孔子伦理，现在全失了效力了。

中国地大物博，农业经济的基础较深，虽然受了西洋工业经济的压迫，经济上的变动却不能骤然表见出来。但中国人于有意无意间也似乎了解这工商经济的势力加于中国人生活上的压迫实在是厉害，所以极端仇视他们，排斥他们，不但排斥他们的人，并且排斥他们的器物。但看东西交通的初期，中国只是拒绝和他们通商，说他们科学上的发明是“奇技淫巧”，痛恨他们造的铁轨，把他投弃海中。义和团虽发于仇教的心理，而于西洋人的一切器物一概烧毁，这都含着经济上的意味，都有几分是工业经济压迫的反动，不全是政治上、宗教上、人种上、文化上的冲突。

欧洲各国的资本制度一天盛似一天，中国所受他们经济上的压迫也就一天甚似一天。中国虽曾用政治上的势力抗拒过几回，结果都是败辱。把全国沿海的重要通商口岸都租借给人，割让给人了，关税铁路等等权力，也都归了人家的掌握。这时的日本崛起，资本制度发达的结果，不但西洋的经济力不能侵入，且要把他的势力扩张到别国。但日本以新兴的工业国，骤起

崩颓粉碎的，就是大家族制度了。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结晶体。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命运，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

试看中国今日种种思潮运动，解放运动，那一样不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那一样不是打破孔子主义的运动？

第一、政治上民主主义(Democracy)的运动，乃是推翻父权的君主专制政治之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忠君主义之运动。这个运动，形式上已算有了一部分的成功。联治主义和自治主义，也都是民主主义精神的表现，是打破随着君主专制发生的中央集权制的运动。这种运动的发动，一方因为经济上受了外来的压迫，国民的生活，极感不安，因而归咎于政治的不良、政治当局的无能，而力谋改造。一方因为欧美各国 Democracy 的思潮随着经济的势力传入东方，政治思想上也起了一种响应。

第二、社会上种种解放的运动，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是打破父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夫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男子专制社会的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父主义、顺夫主义、贱女主义的运动。如家庭问题中的亲子关系问题、短丧问题，社会问题中的私生子问题、儿童公育问题，妇女问题中的贞操问题、节烈问题、女子教育问题、女子职业问题、女子参政问题，法律上男女权利平等问题(如承继遗产权利问题等)、婚姻问题——自由结婚、离婚、再嫁、一夫一妻制、乃至自由恋爱、婚姻废止——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都是从前大家族制下断断不许发生、现在断断不能不发生的问题。原来中国的社会只是一群家族的集团，个人的个性、权利、自由都束缚禁锢在家族之中，断不

许他有表现的机会。所以从前的中国，可以说是没有国家，没有个人，只有家族的社会。现在因为经济上的压迫，大家族制的本身已竟不能维持，而随着新经济势力输入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又复冲入家庭的领土，他的崩颓破灭，也是不能逃避的运数。不但子弟向亲长要求解放，便是亲长也渐要解放子弟了；不但妇女向男子要求解放，便是男子也渐要解放妇女了。因为经济上困难的结果，家长也要为减轻他自己的担负，听他们去自由活动，自立生活了。从前农业经济时代，把他们包容在一个大家族里，于经济上很有益处，现在不但无益，抑且视为重累了。至于妇女，因为近代工业进步的结果，添出了很多宜于妇女的工作，也是助他们解放运动的一个原因。

欧洲中世也曾经过大家族制度的阶级，后来因为国家主义和基督教的势力勃兴，受了痛切的打击，又加上经济情形发生变动，工商勃兴，分业及交通机关发达的结果，大家族制度，遂立就瓦解。新起的小家族制度，其中只包含一夫一妻及未成年的子女，如今因为产业进步、妇女劳动、儿童公育种种关系，崩解的气运，将来也必然不远了。

中国的劳动运动，也是打破孔子阶级主义的运动。孔派的学说，对于劳动阶级，总是把他们放在被治者的地位，作治者阶级的牺牲。“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些话，可以代表孔门贱视劳工的心理。现代的经济组织，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应合社会的新要求，就发生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这也是新经济组织上必然发生的构造。

总结以上的论点：第一，我们可以晓得孔子主义（就是中国人所谓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

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师表”。他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就有几个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礼，天天戴上洪宪衣冠去祭孔，到处建筑些孔教堂，到处传布“子曰”的福音，也断断不能抵住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了。第二，我们可以晓得中国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都是建立在大家族制上的东西。中国思想的变动，就是家族制度崩坏的征候。第三，我们可以晓得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第四，我们可以正告那些钳制新思想的人，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代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会发生。你们若是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

1920年1月1日

《新青年》第7卷第2号

署名：李大钊

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

(一九二〇年一月)

自从好望角周航新大陆发见以来，欧人一方得窥东方的门户，发见其奇妙而且丰富的文明以增长其冒险远拓的勇气与趣味；一方于新大陆又得着广大丰腴曾未有主的新天地，欧洲诸国遂争相奋励其民以事拓殖。结果把欧洲内部的商业变成了世界的商业。实业渐次崛起，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基尔特制”(Guild System)已不能抵抗此世界的市场的势力而为工厂产业所压倒。未到十八世纪下半叶，产业界已经有一大改进了。在此时期，发生了许多人类史上未曾有的重要事情，机械的新发明，日见其多，人类的生产效能，比起从前来，增加何止千百倍！

随着这种产业的大进步，人类社会自然添了许多幸福，可是同时也添了很多的困难。因为资本集中的结果，造成了大多数的阶级，使他们不能不受象机械一样为少数富豪所役使的痛苦；他们阶级的自觉，也渐发生了。结局社会上立起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演成阶级战争的局势。

许多明智而且慈悲的人，不忍见社会上有这样悲惨的现象，乃想出好多救济这种社会的方法和学说，社会主义于是乎产生。社会主义一语，有很多的解释，现在因怕冗长了本志的篇幅，不细论，简单一句话说出他的普通概念来，就是反对现在经济组织

的精神和运动。各家的学说虽有殊异，而于此点，却大抵相同。因为这种经济变动，是发生于欧洲的，所以救济这种社会的学说和人物，也多产生于欧洲各国，有些也渐渐流入美利坚了。但在欧洲有统治阶级反对社会改造学说和方法，而且他们也不易寻出一片土壤来，试验这社会改造的学说和方法，这种学说和方法，在欧洲遂没有得着适当的机会以为充分的试验。而在美利坚纯然一个新天地，既有丰富而且低廉的土地足以供他们的试验；又没有象在欧土的反势力来阻挠他们，所以他们得以自由试验他们的理想。

流入美利坚的社会主义，也可分为两大派别：一是乌托邦派；一是历史派。乌托邦派是离开现在的社会组织一种理想的社会，示人以合理的生活模范，欧文派和傅利耶派都是此类。历史派是在现存的社会里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阶级的战争，纯以马克思的学说为经典。乌托邦派有种种的新村运动，以试验他们的理想；历史派有种种的政治运动，以达他们的目的。本文是想把乌托邦派在美利坚所为新村运动的历史和成绩，略为介绍，以贡今日热心新村运动者的参考。

乌托邦派的学说多由欧人传入美利坚，他们的试验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大体可分为四大派：（一）宗教的新村，（二）欧文派的新村，（三）傅利耶派的新村，（四）伊加利派的新村（Icarian Communities）。

（一）宗教的新村

宗教的新村，是在美利坚试验的新村中最有成绩的，有些直到如今还在存在，我且把那较为著名的团体略述如左：

（1）耶美拉达村（The Ephrada Community）

耶芙拉达村在盆西梵尼亚州兰加士特府 (County of Lancaster) 是一七一二年贝塞尔 (Conrad Beissel) 创的。贝氏心性偏癖, 导他入了退隐的生活, 但有些和他同情的人, 也随着他隐居和外界断绝关系。传说会员有一时达过三百多人。贝氏死后 (一七八六年) 村中的会员骤减, 事业的繁昌也就由此停落。但此小村到一九〇〇年还在那里奄存。听说只剩十七个会员了。

(2) 谢克尔村 (The Society of Shakers)

此村为一英国无识的妇人名叫安李娘 (Mother Ann Lee) 的所发起。伊因在英受宗教上的压迫, 乃于一七七四年偕几个同志移居美洲。二年以后, 在纽约州特立附近瓦特佛立组织一种新村, 名叫“谢克尔”村。

继安李娘的为怀泰克尔 (James Whitaker)、米钦 (Yoseph Meachan)、莱特 (Luoy Wright) 诸人, 他们经营这个团体很有成效, 会员和败产均很繁盛, 扩张了很多的支部。极盛的时候, 会员到过五千人, 现在还有五百人左右, 有十五 (或云十四) 个村散在梅因、新汉坡士海尔、马塞求塞斯、康内克提加、纽约、奥孝、坎塔克、佛洛利达诸州。败产总额以数万计。所有土地约十万英亩。

“谢克尔”村员分为三级: 一为诺维谢特教徒 (The Novisiate), 在团体外自营生活, 自理俗务, 只为谢克尔教堂的交通员; 一为后进会员 (The Turniors), 是在试验中的会员, 住在团体内, 暂时抛弃他们个人的财产, 但是他们无论何时, 故得退出团体, 回复自己的财产; 一为先进会员 (The Seniors), 此类会员有分配团体财产的权利, 为谢克尔教会服务, 终身不变。

谢克尔村以家族为组织的单位, 其中男女共同生活, 人数由

最少数至百人以上。他们有共同的眷属。安李娘曾经验过最不幸的婚姻，所以伊于独身主义至坚。在伊创立的团体和伊一派的团体中，均绝对的禁止婚姻。他们例于农业以外，兼事一种以上的工业，以为经济上的补助。

数个家族——通常是四个——构成一团(Society)，一家族关于精神上的事情，由长者(Elders)去办；关于俗务，由执事(Diacons)去办；中央设一执行部，由长兄二人和长姊二人组织之。执行部领袖，称领袖长者；各执事和各产业机关内的监工等，均由执行部委任。领袖长者，得补任执行的缺额，并得指任他的继任者。村中各职，无论管理神务、俗务的人，均直接听命于其上级人员。男女一律平等，得任各种职务。

谢克尔村员，领导一种极有秩序而且卫生的模范生活，每日五时起床，九时眠息，六时早餐，十二时午餐，六时晚餐。他们的饮食简单而足用，他们最得意的食品，是野菜和水果。在一个普通食堂里用膳，男女分座。寝室、食堂和工厂，均异常清洁，秩序严整。

他们的娱乐很少，而且是不妨害安静秩序的。用器具的音乐，他们不甚喜欢。读书只限于有用的和含有教训性质的。唱圣歌说教都在会议室举行，后来才有在户外安静地方的娱乐，象野外会食和庭球之类。

共产主义也是他们的教义的一部分，不过只行于一家族中，而不行于全团体。甲家族的财产，可以丰于乙家族。

(3) 哈曼尼村(Harmony Society)

“哈曼尼”村是拉普(George Rapp)创的。拉氏生于德之沃颠堡，是一个塞巴拉提士派(Soharatst)的领袖。因不堪德国僧

倡和政府的压迫，乃于一八〇四年率门徒六百人离德之美。这六百人中的主要部分，多为农夫和机械师，里边也有受过自由教育的人。那拉氏的义子莱谢儿君，就富艺术的天才，办事的能干。

他们组织的第一个团体就是“哈曼尼”村，在盆西梵尼亚州来康明府。数年内便建了很多的住室、教堂、校舍、制粉场、工场，并且垦了几百英亩田地。

他们所经营的事业，虽是这样繁昌，但是因为择选的地方不大完善，不能不向别处迁移。他们于是把那些田地，加上改良费，共值十万美金，全部卖出，移至印颠那州保塞府，在那里他们购买了三万英亩的地方，这是一八一四年的事情。

他们的新家庭，既经修筑完善，并且变成附近地方的重要事业的中心。他们的财产和势力均渐发展，这时又从德国到了很多的会员，直到一八二四年，他们的会员额，说是达于千人左右了。

那年他们又迁移了，因为有一种猛烈的热病，侵入了他们村落，使他们不能不卖掉他们的居处。后来遇见了一个售主，就是欧文（Robert Owen），他们又迁回盆西梵尼亚州的耶康诺米地方。

他们新村的进步怎样的速，从魏谟公（The Duke of Saxe Weimar）的报告可以看出来。他曾于一八二六年访问过这个新村，盛称村中极其清静，秩序亦甚良美，乃至屋宇的建筑、工厂的配置、居留者的快乐，均足令人羡慕不置。

他们的平和生活，曾经有过一次扰乱，就是在一八三一年忽然有一个名叫Count De Leon的人，来到耶康诺米。衣冠很华

美，随从的人也很多，他假装出很赞成村人的宗教观的样子，声言愿与他们联合。这些心地坦白的村人，误信他是一个好人，不加什么考察，就欢迎他入村了。可是他的真名姓，不是 Count De Leon，乃是 Bernhasd Miller。他是一个大骗子，刚入了村就起首颠覆这哈曼氏派信徒的信念，主张世俗的快乐。依他的狡猾手段，得多数会员的援助，于是村中会员分为两派，有五百人愿仍属于拉普，有二百五十余人愿属于这少数分离的会员，由公共财产中分得十万零五千元美金，偕着他们的新领袖，移至菲利士堡，想在那里组织他们的新社会。但是他们的首领，忽然弃了他们，携着基金，逃到红河沿岸的亚利山德利亚去了。他一八三三年在那里患虎烈拉死了。这些分离的会员，也就是散了。

在这个时候耶康诺米的会员，回复他们的繁昌很快。南北战争初起时，他们有在五千元美金的铜币。为收藏安固起见，他们把这些铜币都埋在院中的地下，直到战事终了，才掘出来。

哈曼尼村员当他们的生活的开始，并没有主张独身主义，到了一八〇七年村中男女一齐决定解散他们婚姻的束缚。自此以后，在哈曼尼村中没有增加的婚姻和小孩了。

除去独身以外，他们并不是苦行者。也吃佳肴，也饮美酒，在他们历史的初期，他们的人数正在繁盛，年岁正在青年的时代，曾度过美丽而且欢乐的生活。

共产主义，也和谢克尔村一样是他们教义的一部分。但只限于各小团体和教堂内，并不行于大团体间。当他们人口众多产业微少的时候，他们并不雇用社外的劳工。到了人口减少产业发达的时候，他们雇用工人，有时超过会员额十分之一。

到了本世纪初，这个团体已经变成了一群有土地、油井、铁

路股份、银行、矿山的资本家的有限公司了。因为他们不许加入新会员，也没有小孩，原来的会员渐渐死去，团体就归于消灭。在一九〇四年该村形式上解散了，他的财产为少数残存的会员所均分。

(4) 左阿村(Zoar)

德国的沃颠堡，可以说是共产主义者的出产地。创立左阿村的人，也是塞巴拉提士派的一团，因为不堪本国宗教上的压迫，于一八一七年避往美洲。人数约二百人。以鲍米拉氏为首领，在奥孝州屠士加洛注府组织一个名新村叫左阿。在那里购了几千英亩土地，开垦盖房，都是会员们共同劳作。若有余假还去为附近农人作工，得些工资，补助村中经济。

起初他们本来没有意思组织一个共产团体，后来因为会员中有些老弱的人，自觉专赖自己劳动，所得的工资，难以维持生活，这样做去，马上就有分散的可虑，非有别立基础的改组，前功势必尽弃。到了一八一九年的四月，经了一次透彻的讨论，他们决定行努力和物品均属共有的制度。自此以后，他们就日见繁昌了。他们组织了木工、铁工等工厂，饲养了些家畜，更由为邻近的农夫作工，得点酬资。

也是他们一点难得的运气，可巧一八二七年修造运河，正经过他们的地域。他们就获得了一件工作的契约，承办一部分的工程，并且得了他们产物的市场。在很短的期内，他们拿所有的财产作抵当增购了些土地。

左阿村所以成功的原故，多半是鲍米拉氏经营得法的功。鲍氏稍受过点教育，却有天赋的才能，他于俗事上、精神上都是团体的领袖，监督一切事务，应付一切外界的关系，都是靠他。逢

礼拜日为会员说教，孜孜不倦，他死后门徒把他的演稿汇集成三大厚册，很为他的住者所宝贵。

左阿村里，当初也禁止婚姻；他们过了十年或十二年独身生活之后，忽然把这个禁止取消了。

左阿村的组织，设三个评议员，管理全村的事务。凡各种产业的监督员，都由他们委任，各会员应作的工，也由他们指定。他们常常考察各会员的性向和特能，设由五人组成的常设仲裁委员会，处理团体内发生的一切争议。每年开村会议时，村中到了法定年龄的会员，不分男女，举行一次投票选举。

一八三二年他们的各团体联合成一个团体，取名为“左阿塞巴拉提士会”。联合以后，日见发达，其时会员超过五百人，是该村的极盛时代。一八七四年，会员还有三百人左右。据伊利博士所记，当一八八六年的时候，他们的财产，实达百五十万元美金，平均每人有五千元美金的财产。较之美利坚全国人民平均富力，才千元美金，实五倍之。可见共产制下，富力不但不减，且增加数倍。左阿村就是一个题例了。

左阿村当艰难困苦的时候，团结很坚，后来财产渐多，遂日就涣散。许多会员，运动解散团体，直到一八九八年村会议，就决定解散了。

(5) 亚马拿村(Amana Society)

亚马拿村人是十八世纪在德国发生的一宗派，后来因为避德国权力者的压迫，梅慈君首先于一八四二年，偕着四个会员往美之纽约，在巴菲楼附近，买了约五千英亩的土地。翌年，他们结伴而来的德国同胞，不下六百人，就住在梅慈所买的地域内。

亚马拿村人和左阿村人一样，原来没有打算组织一个共产

的社会。因为他们同来的伴侣多作惯了工厂劳动，却于农业不很相宜。遂不能不在那里建设些工厂，却不能不赖大家的共同努力和器具了。他们于是开始了共产的生活。

他们的会员增加很速，马上就不能不扩张土地，以适应那日见发长的社会了。他们于是决定向西部迁移。一八五五年，他们在爱俄华州达温堡附近，买了一万八千英亩的土地，在那里创了一个新村，就是亚马拿村，较前益盛。现有七个分村：一名亚马拿村；一名东亚马拿村；一名中亚马拿村；一名近山亚马拿村；一名东亚马拿村^①；一名南亚马拿村；一名和母士提特村（Homestead）。他们的中间距离约有一英里半。各有各的校舍、消费公社、酒店、工厂，各村自办各村的事务，各立各的簿录，每年送亚马拿村本部，以备检查。村中的监工和长者，日必集会一次，商议种种事务，排定明日的工作。按节序的必要，指定各部的工作。由十三个评议员，组织中央执行机关。评议员每年内由村中的男会员投票公举。由十三个评议员互选一个议长。七村的人口共有一千八百人。

各家族分立居所，但有公共食堂，每村普遍都有数个会员，在那里会食，男女分席而坐。

为供给会员衣服，由村中予各会员以一定的给与，每成年的男子每年可得由四十元至百元的美金，使他们按自己的地位和职业去自制衣服。每成年的女子，每年可得由二十五元至三十元的美金。儿童可得由五元至十元的美金。

村中的消费公社，备置一切村人所用的东西。凡会员都可

^① 七个分村中有两个东亚马拿村，原文如此。——编者

随意取用，直到所用物价至他应受给予的限度为止。如会员于应取的费用尚有余存，就把他存在次年簿记中该会员的名下。

他们的学校，也是注重初级教育和手工训练。由七岁至十四岁的儿童，终年到校；由十四岁至二十岁，只是冬季入校。

他们的衣食很简单，却很实在。每日有五次丰餐。他们都很愿工作，在秋收的时候，也雇很多的工人，来助他们的忙。

他们并不禁止婚姻，也不奖励婚姻，凡婚姻须经评议员认可，新郎必须达二十四岁以上，结婚的仪式很盛。

(6) 北塞儿村及奥洛拉村(Bethel and Arora)

北塞儿村在米苏里州西尔比府，奥洛拉村在奥利岗州坡特兰附近。他们是两个姊妹村，都是基尔医生创立的。基尔医生是普鲁士人，生于一八一二年，他的一生经了许多变化，未曾渡美以前，营些卑贱的职业，到美后在纽约经了很短的停留，便移居皮特士堡了。他在那里声称他是医生，能用磁气学的治疗法，并说些他有一部用人血写的药方奇书，种种鬼话来骗人。他到三十岁的时候忽然大变，焚了他的奇书，入梅藻地士提教会(Methodist Church)，不久又出会，招集了些天真烂漫的人，去自立一派。其中有德国人，盆西梵尼亚的荷兰人和那些跟着骗子 Count De Leon 从哈曼尼村脱出又为他所弃的人。

在那个时候，基尔和他的门徒已经有组织共产社会的理想。就在米苏里州西尔比府购了二千五百英亩的土地。这就是北塞儿村的发轫了。他们的资具虽然空乏，但是他们的勤勉忍苦却是无尽藏。过了不多年，他们的土地居然有一大部分垦成耕地了。他们并且建筑了一个羊毛制造厂，一个碾米厂，一个锯木厂，几个别的工厂，一个教堂，一个消费公社。等到他的财产又

增加了一千五百英亩的时候，政府为他们设了一所邮局。十年以内，他们的居处，就发达成一个人口有六百五十的市镇了。

但是基尔的不懈的精神，又勉励他去作一种新试验。一八五五年，他领了约有八十位北塞儿村人，赴太平洋沿岸寻求价廉而且肥沃的土地。次年他们就在奥利冈州组织一个奥罗拉村。这新村里的会员，半是新从外边加入的，半是由北塞儿村移来的，不久就有四百多人了。这些人有一万八千英亩的土地，散在奥利冈州各府。大约倍于在北塞儿所办的一切产业，并且培植了保存了些果实。

这两村的组织和生活，大体相同。基尔是两村共同的议长，由一个评议部助他办理两村的事务。直到一八七二年，两村的财产还都在基尔个人的名下。是年他才把土地分配给各会员，并发给他们证书。但是这回的分配，只是一个形式，村里的事务，仍然存留着共产的精神，和从前一样。

村里的会员，许自择职业，并许随意变换，没有一定的工作时间，也没有实际的监督。工头和监工人，都归于天然淘汰了。

村里不但默许婚姻，并且奖励婚姻，保持严正的家族生活。每家族各有自己的房舍，饲养猪牛的数使足以应用，面粉和他种食品，由团体供给，如其所需。一切物品，均储存于消费公社，各会员如有请求，即便发给。簿录系为对外关系而设的。团体和会员间的授受，不设簿录。

他们的生活，非常平静，从来没有过争斗的事。有少数外来的加盟，也不曾害了本来会员的安睦。有一次一位会员，声言愿脱离，团体也允准了他，并给他应分的财产。

这两村在所有的宗教的新村中，是最自由的组织。他们所

以能够团结，纯是受创立者人格的影响。所以一八七七年基尔医生一死，一八八〇年北塞儿村便解散了。一八八一年奥洛拉村也解散了。

(7) 温尼达村(The Oneida Community)

温尼达村是美利坚最著名的一个新村。他的创立者，就是美利坚共产主义的历史家的第一人 诺爱士(Gohn Humphrey Noyes)。诺氏是美利坚渥蒙特州布拉特尔柔的人，生于一八八一年，初习法律，毕业于达尔提茅士大学，后又改习宗教学，在安道佛耶路等授受课。他研究宗教的结果，自创了 Perfectionism 一派。

一八三四年，他回到巴特尼(Putney)。那里就是他父母所居的地方，渐渐招集了些信从他的教义的人。最初是他的母亲，次他的两个姊妹，一个兄弟；又次他自己的妻，他兄弟的妻，和他姊妹的丈夫；又次又来了些别人。到了一八四七年，他已有四十个信徒了。他们的运动，最初纯粹是宗教的。后来因为看了《先驱》和些别的傅利耶派的出版物，渐渐趋于共产主义了。一八四八年，诺氏就在纽约州的温尼达地方组织了一个共产村。

第一年的试验，遭了很大的困难，努力奋斗的结果，才有极贫弱的成功。诺氏及其门徒，其中多系富户。直到一八五七年一月一日，统计他们投入村中的资本，共有美金十万〇七千元，据那一天的计算，他们的财产，总额只有美金六万七千元有奇，亏损约在美金四万元之谱。但是在那个期间，他们已得了很有价值的经验，并且立稳了他们产业的基础。他们制些铜器，旅行用的鞞囊，保存果实，制造丝类，凡造一物，必精慎办理。所以他们的制品，马上在市场得了很美的赞誉。一八五〇年的清算，就

有少量的剩余了。又十年间，他们的纯益，已超过美金十八万元了。在这个期间，他们买了很多的土地，又得了些新会员。一八七四年，他们所有的土地，约九百英亩，会员约三百人。

他们当初有几个团体，到了一八五七年，他们把所有的会员，都集合于温氏达、瓦林埠、康奈提卡三处。

以上所举的新村，除谢克尔村外，全不是美利坚本土的人创立的。独有此村，是纯粹美利坚人组织成的。其中含有纽英伦的农夫和机械师，大多数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医师、律师、僧侣、教师——，他们的修养和教育，都超过平均程度以上。

他们设二十一名常设委员，四十八名产业部长，处理一切事务。他们的组织，虽很复杂，但是都合于民主的精神，推行的成绩很好。

本村有二个特点：（一）是“共同恋爱”。他们以为排他的婚姻，和排他的私有财产制，犯了一样的罪恶。但在本人未许恋爱自由以前，犯了淫行，他们认为莫大的罪恶。小孩未离乳以前，归他母亲照管，离乳以后，就送入看护院，由看护妇育养。后来纽约州的僧侣，大不以此为然，竟至以法律禁止。他们遂于一八七八年废止“共同恋爱”的制度。（二）是“相互批评”。村员定期集会，关于村员的品行涵养，当面互相批评。而村员间的感情，并不以此而损伤。他们相处多年，只有一个被驱逐出村的会员。

他们有很好的学校制度，有许多青年入校受适应他们那种团体生活的教训。他们为传布主义，发刊了许多印刷物，最流行的是《Oneida Circular》周刊。印刷装订，均极精良。阅者分为三等：一是不能纳费者，可以自由取阅；一是每卷只能纳美金二元者；一是每卷须纳美金二元以上者。用第三类以补充第一类

的费用。

此村成立三十余年，那纽约州法律的干涉，就是他消灭的朕兆。他们受了法律干涉以后，各自选择结婚。诺氏率其最忠实的信者去之坎拿大。一八八六年他就死在那里了。一八八〇年该村的共产制，完全解散，变为一大合资公司。这个公司，现在还很富，所有的产业，均还存在。会员对于这公共的财产，均享有股份的权利。而今过旧时共产村的人，只见公共图书馆、读书室、盥洗所和那林中的空地，相对着过那荒凉的日子。那就是当日的新村的遗迹了！

我本来想把四派的新村运动，都介绍于读者诸君，谁知只写完了宗教的新村运动一部分，就占了这么多的篇幅，而且时间又不许我全写，只好暂结于此。其余俟之他日罢，幸诸君见谅。

1920年1月

《星期评论》第31号（“新年号”）

署名：李大钊

又 是 一 年

(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

时光似箭，糊里糊涂的又是一年！我们身当这无终无始大自然的冲流的断续关头，觉得杂着些悲哀、恐惧和欢喜。我们看许多的朋友们，因为走的步数稍微慢了一点，就赶不上进步的潮流，成了过去的人了。过去的人，看着现在和将来，都和他的生活不合；现在和将来，也没有一点的幸福和希望给他，所能给他的只是些悲哀、烦闷和苦痛。我们眼望着他们落后，受些悲哀、烦闷和苦痛，也觉得十分悲痛，十分伤感。我们实在怜惜他们，精神上已成了过去的人啊！我们自己呢？也是危险的很。时间总是在我们前面走，总不停留，我们的惰性总是想不跟着他走，一不小心，也和我们所悲痛的那些朋友们一样作了时代的落伍者，岂不可怜！岂不可怕！一年是一段生活的结束，我们应该有一回总计算。一时一刻，也不该令他零下去，我们的生活，才能和大生命联结上。不零下去的方法，就是不断的创造新生活。我今天只有欢天喜地的祝福诸位又开始了一段新生活！

· 1920年1月4日
《新生活》第20期
署名：孤松

忏 悔 的 人

(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

最可敬的是忏悔的人，因为他是从罪恶里逃出来的，所以他对于罪恶的本体和自己堕落的生活，都有一层深严而且透彻的认识。以后任是罪恶怎样来诱惑他，他绝不会再上当了。我们对于忏悔的人，十分尊敬。我们觉得忏悔的文字，十分沉痛、严肃，有光华，有声响，实在是一种神圣的人生福音。

1920年1月4日
《新生活》第20期
署名：孤松

哭 冯 国 璋

(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

冯国璋死了！我对于他的死，十分哀痛！冯氏一生的成绩，遗留在世界上的，除去汉阳的焦土，新华宫的残梦，和些累赘子孙的金钱，还有甚么！冯氏的人生，也是一幅很洁白的画幅，怎么糟蹋到这样！而且就是这样结局了！回头看来，我们总觉得他是空空的掷掉了一生，我们总觉得他的身后，只剩了空虚和寂寞。什么丧礼咧，国葬咧，大人先生的哀吊咧，全国公私机关的下旗咧，那里和冯国璋的真人生有丝毫的关系！我真不禁为冯国璋痛哭！更为别的冯国璋痛哭！

1920年1月4日

《新生活》第20期

署名：孤松

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

(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从前的社会组织是纵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横的组织。从前的社会组织是分上下阶级竖立系统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打破上下阶级为平等联合的组织。从前的社会组织是以力统属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以爱结合的组织。

例如政治，从前是以君纲臣，以官治民，以中央统驭地方，是纵的组织。现在民众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推翻君主官吏的势力，各地方联合起来，抗制中央集权。

次如经济，从前是以富佣贫，以资主掠夺劳工，以地主奴役佃户，是纵的组织。现在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反抗富权阶级、资本阶级。

次如社会，从前是贵劳心者，贱劳力者；贵君子，贱野人；贵阀阅，贱平民；贵男性，贱女性，是纵的组织。现在劳力者阶级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反抗劳心者阶级，野人阶级反抗君子阶级，女性阶级反抗男性阶级。

次如家族，从前是以家长统治家属，以父兄统治子弟，以夫纲妻，是纵的组织。现在子弟要脱离家长的势力，妻要脱离夫的势力，离开家庭，加入青年团体、妇女团体，就变为横的组织了。

这个变动的主因，就在经济上有了变动。从前的经济组织是纵的组织，所以其他一切社会组织也都随着他是纵的组织。现在的经济组织，正在向变为横的组织方向进行，所以其他一切社会组织也都随着他向横的组织方面进行。

看现今世界的趋势，纵的组织日见崩坏，横的组织日见增多扩大，就是中土各种民众的自治联合，也从此发轫了。将来学生有学生的联合，教职员有教职员的联合，商界有商界的联合，工人有工人的联合，农民有农民的联合，妇女有妇女的联合，乃至各行各业都有联合，乃至超越国界种界而加入世界的大联合，合全世界而为一横的联合。在此一大横的联合中，各个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爱助，就是大同的景运。

在纵的组织中，被压服在下级地位的个性，都为自居于上级地位者所束缚、践踏、屈抑、凌虐，下级的个性完全供上级的牺牲。有了横的组织以后，下级的个性才得依互助的精神，团结一大势力，以反抗纵的组织中的有力阶级，回复他们个性的权威。由此看来，我们的解放运动就是打破纵的组织的运动，我们的改造运动就是建立横的组织的运动。

纵的组织的基础在力，横的组织的基础在爱。我们的至高理想在使人间一切关系都脱去力的关系，而纯为爱的关系，使人间一切生活全不是争的生活，而纯是爱的生活。

1920年1月15日

《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2号

署名：守常

低级劳动者

(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八日)

有一种自命为绅士的人说：“智识阶级的运动，不可学低级劳动者的行为。”这话很是奇怪。我请问低级高级从哪里分别？凡是劳作的人，都是高尚的，都是神圣的，都比你们这些吃人血不作人事的绅士、贤人、政客们强得多。

1920年1月18日

《新生活》第22期

署名：孤松

整 顿 学 风

(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八日)

“五四”以来，学界的自由思想风起云涌。有些卑鄙无良的人，觉得这种思想的变动，终于他们作恶的生活不甚方便，乃妙想天开，说要整顿学风。我说：你们胆子好大，居然要整顿超越一切的思想了！好！我且看你们整顿的结果如何！

1920年1月18日
《新生活》第22期
署名：孤松

真是梦话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上海某报说：“俄国的兵力，可以当数国至二年之久。”这真是梦中的梦话。若论兵力，从前德国的兵力恐怕比现在赤军的兵力强大得多，何以终于瓦解冰消了。须知战胜强德的，绝不是协约国的兵力；战胜联军的，也不是俄罗斯的兵力。看他使日本的军队退却的，不是赤军的枪弹，乃是日文的传单，就可以知道了。

1920年1月25日

《新生活》第23期

署名：孤松

“特别体恤”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傅嶽荃复北大校长论薪水发现事的信里，有一句“特别体恤”的话。这全和那“开导……”的话是同一口吻。我现在奉劝傅先生！教职员的精神上知识上比你丰富的多，恐怕你老先生配不上说开导他们呢！他们劳精瘁口，教育这一班青年，很辛苦的。公家给的薪水，是他们高尚劳作的代价，是他们当然的权利，谁配对他们说“体恤”的话？国家银行发出的纸币不能兑现，他们忍受了好几年了。他们真是“特别体恤”了你们！

1920年1月25日
《新生活》第23期

署名：孤松

知识阶级的胜利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已。到了现在，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

1920年1月25日

《新生活》第23期

署名：孤松

好一对兄弟国家!

(一九二〇年二月八日)

中国的最高学府，闹过新旧思想的冲突；现在日本的最高学府，也闹新旧思想的冲突。中国的学生和警察格斗，日本的学生也和警察格斗。中国和日本真正是兄弟国家！可是军阀的兄弟，财阀的兄弟，官僚的兄弟，曲学阿世的兄弟，他们已经亲亲热热的在那里携手或作同一步骤向同一方面走；独有那心地纯净的老农、工人，一班老实兄弟们，和那天真烂漫的青年学子，一班小兄弟们，还不知道互相携手，还在甘心作军阀学究的奴隶，反对自己的兄弟。噯！你们到什么时候才觉悟啊！

1920年2月8日
《新生活》第25期

署名：孤松

山穷水尽的青年

(一九二〇年二月八日)

如今各处的青年运动，已竟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再没有可走的路了。象我这种爱力不厚的人，只是替青年灰心！可是青年兄弟们，还是一点不懈，在无路的地方寻路。他们的爱力固然很厚，但是我要问大家一句：“那全是他们的责任么？”

1920年2月8日
《新生活》第25期
署名：孤松

精 神 解 放!

(一九二〇年二月八日)

现在是解放时代了! 解放的声音, 天天传入我们的耳鼓。但是我以为一切解放的基础, 都在精神解放。我们觉得人间一切生活上的不安、不快, 都是因为用了许多制度、习惯, 把人间相互的好意隔绝, 使社会成了一个精神孤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 个人的生活, 无一处不感孤独的悲哀、苦痛; 什么国, 什么家, 什么礼防, 什么制度, 都是束缚各个人精神上自由活动的东西, 都是隔绝各个人间相互表示好意、同情、爱慕的东西。人类活泼泼的生活, 受惯了这些积久的束缚、隔绝, 自然渐成一种猜忌、嫉妒、仇视、怨恨的心理。这种病的心理, 更反映到社会制度上, 越颇加一层黑暗、障蔽, 把愉快、幸福的光华完全排出, 完全消灭。这种生活, 我们岂能长此忍受! 所以我们的解放运动第一声, 就是“精神解放!”

1920年2月8日
《新生活》第25期

署名: 孤松

都市上工读团底缺点*

(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

北京的工读互助团精神上已不能团结，经济上也不能维持，看看有消灭的样子。我的意见有一半和适之相同。他说应该取纯粹的工读主义，不要别挂新生活的招牌。我想这话不错。我以为在都市上的工读团，取共同生产的组织，是我们根本的错误。都市的地皮、房租这样富贵，我们要靠资本家给劳动者的工资和商卖小业的蝇头，维持半日读书半日作工的生活，那里能够？……我觉得工读团要想维持，还是采取纯粹的工读主义才是。其有一部分欲实行一种新生活的人，可以在乡下购点价廉的地皮，先从农作入手。

1920年4月1日

《新青年》第7卷第5号

署名：李守常

* 本文在《新青年》发表时，篇末原注写道：“这一段是我从李先生给我的信上摘录下来的。独秀附识”。——编者

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

(一九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今日亚细亚诸民族的青年运动，皆是由黑暗向光明的运动。

中华青年的反抗强权运动，日本青年的普选运动、劳工运动，朝鲜青年的自治运动，表面上、形式上虽有不同，且有互相冲突的地方，而精神上、实质上皆本于同一的精神，向同一的方向进行。

亚细亚青年的改造运动，既有相同的渊源，又在同一的方向进行。亚细亚的青年，就该打破种族和国家的界限，把那强者阶级给我们造下的嫌怨、隔阂，一概抛去，一概冲开，打出一道光明，使我们亲爱的兄弟们，在真实的光辉之下，开诚心，布公道，商量一个共同改造的方略，起一个共同改造的运动，断不可再受那些特权阶级的愚弄、挑拨、隔阂、遮蔽。中华的青年应该和全亚细亚的青年联成一大同盟，本着全亚改造的方针，发起一联合大运动。

我们画出亚细亚来，不是要分什么黄白人种的界限，只是提出我们所居的世界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改造的区域，就是远东的俄罗斯青年，也该包括在亚细亚青年以内。

亚细亚的权力中心，集中在日本的军国主义、资本的侵略主义，是不可掩的事实。亚细亚青年的解放运动、改造运动、光明

运动，自然要从破坏亚细亚境内的军国主义、资本的侵略主义下手，也是自明的道理。

请看！在朝鲜境内造成民族的仇怨、施行残忍的政治的是什么东西？在西伯利亚造成民族的仇怨、演成民族的战争的是什么东西？在中华大陆造成民族的仇怨、酝酿未来世界的战争的是什么东西？不用说，是日本的军国主义、资本的侵略主义了。要想扫除这些怨仇、祸患，全亚细亚的青年都该负重大的责任。

日本人说，中华的学生运动是排日运动，我们固然不能承认；中华人说，中华的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我们也不能承认。我们爱日本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和爱自国或他国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一样诚挚，一样恳切。我们不觉得国家有什么可爱的道理，我们觉得为爱国去杀人生命，掠人土地，是强盗的行为，是背人道反理性的行为。我们只承认中华的学生运动，是反抗强权的运动。

最近俄罗斯劳农政府，声明把从前罗曼诺夫朝从中华掠夺去的权利一概退还，中华的青年非常感佩他们这样伟大的精神。但我们决不是因为收回一点物质的权利才去感谢他们的，我们是因为他们能在这强权世界中，表显他们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的精神，才去钦服他们的。假使日本的人民，一旦声明承认朝鲜民族的自由，我们的欢欣，我们的钦佩，比对于劳农政府的对华通牒，还要增加十倍。因为这个精神，和俄人的精神一样伟大；这个事实，影响于人类生活更要重大。

我们相信人类都有劳动权，都有生存权，只要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世界上的地方都许世界上的人劳动生存，我们大家安安宁

宁的工作起来，只有互助，无须相争，只有友情，那有仇怨。

世界都是光明啊！

人类都是同胞啊！

愿我全亚细亚的青年努力！

1920年4月30日在北京

1920年8月15日

《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

署名：李大钊

“五一”May Day运动史

(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

(一)

大凡一个纪念日，是吉祥的日子，也是痛苦的日子；因为可纪念的胜利，都是从奋斗中悲剧中得来的。“五一”纪念日，也是如此。

“五一”纪念日，是一日工作八小时的运动胜利的纪念日。他的起源，是一八八四年十月七日在芝加角(Chicago)所开国际的并国民的八大联合(Union)大会里，决议以每年五月一日为期，举行以一日工作八小时制度实行为目的的示威运动——总同盟罢工，指定一八八六年的五月一日为第一回示威运动的日子。参与这次决议的，不只是美国，坎拿大也在其中。

这个运动，是因为政府屡次扬言改善劳工条件而不实行起来的。民众知道，希望不诚实的政府是绝望的事，要想达到目的，非靠自己努力不可，乃决定排去一切向人请愿的行动，对于资本家取直接行动，以图收预定的效果。所以“五一”纪念日，是由民众势力集中的协同团体涌现出来的。他的起源，全在劳工组合主义；他的发起人等的志向，全在毫不带政治臭味的纯粹经济运动。

一八八五年，由十一月至十二月间，差不多同时开会的劳工组合(Knight of Labor, 一八三四年在美国发生的)会，并美国劳工同盟会的大会，决议使八小时工作运动愈盛，全国劳工以翌年五月一日为期向雇主要求八小时工作，万一不听便断然罢工，从那一日起决不作八小时以上的工。这个运动，从这时直到翌年五月一日，继续着进行很猛。

他们的运动那样猛烈，有许多的雇主，不到五月一日那一天，就屈服了。一八八六年的四月中旬以降，已竟有出和从前一样的工钱，实行八小时工作的不少了。

一八八六年的五月一日到了！美国全国所有从事于各种职业的工人，都停了工，合声唱着

“从今以后，一个工人，
也不可作八小时以上的工作！
工作八小时！
休息八小时！
教育八小时！”

的歌，在街市上游行。

这回运动的结果，居然获得可惊的胜利。五月一日以后，不过数日间，已有十二万五千人得了八小时运动的成功。一个月后，成功的人数，增加到二十万。

一八八六年的五月一日，这样成了全美劳工大胜利的纪念日。

美国还有一个劳动节，就是Labor Day，每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日举行。但这是法定的纪念日，和那特别与八小时工作运动有关系的劳工自决得了胜利的“五一”纪念日迥乎不同。

(二)

“五一”纪念日为欧洲劳工团体所采用，是在一八八九年在巴黎开会的万国社会党大会里决定的；因为他在美国得了很大的成功，给欧洲劳工界以很大的刺激，使他们信欧美两大陆一致的大示威运动，必定有更大的效果。

一九〇〇年的“五一”纪念日，欧美各国大小无数的工业都市，一齐起来，举行这个大运动。伦敦海德公园里的大示威运动，与会的总数，不下二十五万人，设了演坛十六处，为二十年来未曾有的大示威运动。

是年所开的第五次万国社会党大会，议决此后每年继续不断的在五月一日举行这种大运动。

一九〇四年，在盎士铁尔丹所开的第六次万国社会党大会，最后一天，也议决了每年五月一日的停工和示威运动。也有在五月的第一星期日举行的国，但是普通以五月一日举行的为多。

一九〇六年，万国社会党本部，刊行一本小册子，题曰《五月一日万国联合示威运动》。这是用英、德、法三国语写的，内容就是八小时工作权的获得，诉于万国工人的宣言。节录于下：

“万国社会党择定五月一日为有阶级的自觉的万国工人停工举行示威运动的日子。

这个示威运动，是对于资本家制度的定期警告；劳工阶级拿这个表明他们要求解放的确切信念，并且宣言这个信念决不能被象国际战争那样的诱惑和迷乱。

这个统一的运动，是万国平民一致结合始能获得胜利，

始能使劳工阶级赋与平和与自由于全世界的事情。

各国团结的劳工，以法定的最长工作时间限于一日八小时，为自己阶级解放的根本条件之一，相信依劳工组合的活动和立法的手段能取得之。（中略）

产业愈发达，结果愈使工人结合，工作剧重，生产状态单一，因而作成使工作时间的限制有越发必要，越发容易的倾向。

八小时工作，可作给劳动力以新活气，防止人种衰弱，并使平民大多数入人类知识的生活的手段。这个道理，如今越发明白了。（中略）

我们希望工人们参加这迫切的示威运动以求实现此希望的意思更加巩固。

于五月一日停工啊！

于五月一日举行示威运动啊！

祝福劳工啊！”

由是以来，美欧各国的工人，年年在五月一日举行示威运动。资本家阶级，都战战兢兢的过他们的厄日。到一九一四年，大战勃发，劳工阶级解放的信念，一时遭了爱国主义马蹄的蹂躏；各国社会党，多有为爱国的狂潮所卷而效忠于资本家政府之前的。大规模的“五一”运动，似乎一时中止；可是有少数信念最笃的志士，仍然利用那一天举行休战的示威运动。一九一六年德国社会党首领李卜奈西特(Karl Liebknecht)的被捕入狱，就是因为他的“五一”宣言和演说。关于此事的始末，本志另有专篇纪述，我只把他的“五一”宣言，译在此处罢了。

李卜奈西特的“五一”宣言（《May Day Manifesto》）：

贫困和灾难，需要和饥馑，正在管治着日耳曼、比利时、波兰和塞尔维亚。他们的血，帝国主义的凶鬼正在吮吸，他们好象大坟墓。全世界，很受赞美的欧洲文明，被此次世界大战造出来的荒乱，剥落尽了。

那些由战争获利的人们，将要同合众国战。或者明天他们便命我们用那无情的武器，去敌我们同胞中的新群合，去敌我们合众国的劳工好友，也攻打美洲起来。我们应该仔细思量这件事：限于我们日尔曼民族不站起来，不用那由自己意思指导的势力，这个民族的暗杀，仍将继续不已。千万人的声音，都高叫：“打破无耻的灭人族类的政策！推倒那些犯此罪行的祸首！”我们的仇敌，不是英国人，不是法国人，也不是俄国人；是那大日尔曼的地主，是日尔曼的资本家，和他们的执行委员会。

前进！我们要同这政府战！我们要同这一切自由底不共戴天的仇敌战！我们要为凡是劳工阶级将来的胜利战！为人类和文明的将来战！

工人们！朋友们！女界同胞们！切不可令这次的“五一”纪念日——战争以来的第二个“五一”纪念日——一点不反抗帝国主义的屠户，就空空过去了。“五一”这一天，我们要万众同声的高叫：“扫荡灭亡民族的罪恶行为！推倒那些主战的祸首！”

一九一八年，俄京莫斯科的“五一”纪念日，更是一个盛典。因为那一天是劳农共和组织成立后的第一纪念日，是举行马克思铜像除幕式的纪念日，接着五月五日又是马克思诞生百年的纪念日。

(三)

“五一”这一天，劳工阶级固然得了很多的收获，但是也曾出了很大的牺牲。一八八六年的芝加哥(Chicago)悲剧，就是一段极惨的事件。

在一八七七年的时候，美国诸大城市，充满了多数失业的工人，芝城更是不少。那里的国际社会党人，召集了多次的群众大会，他们的宣传运动，很得这一班贫苦工人的信从。一八八四年的感恩节(Thanksgiving Day，普通是在十一月中最后的星期四日)，他们举行了一次游街示威运动。芝城《The Arbeiter—Zeitung》、《The Vorbote》、《The Fackel》、《The Alarm》诸报，都鼓吹工人赶快武装起来。有一位 Most 君，编了一本小册子，题为《战争底革命科学》(《Revolutionary Science of War》)。许多报馆，把他重印出来，传布很广。

自从一八八四年，决议以一八八六年的五月一日为八小时制实行的日子，美国全国的工人，都起来参与这激烈的运动。芝城的运动，更是猛烈。一八八五年，八小时会由 George A. Schilling 君及其他有志者的提议，组织成功。职工会议(The Trade and Labor Assembly)，是芝城中最有组织的劳工团体的中心，也立刻整饬了阵容，准备作战。中央劳工联合会(The Central Labor Union)也接踵而起。

芝城的国际社会党人，最初对于这种运动，还守中立的态度，后来看见八小时运动，得了大部分的同情，而且成了劳工界的中心问题，他们才渐渐变了宗旨，起来助进这个运动。象 Par-

sons、Spies、Fielden、Schwab 等一流雄辩家，都在八小时集会里作了说士，很受欢迎。他们大都劝说工人预备在五月一日那一天武装起来。

是年的“五一”运动，芝城的工人，达到八小时工作的目的者，占大多数，但那没有达到目的者，还有四万人左右。他们只得继续着同盟罢工，以图贯彻他们的要求。最激烈的纷扰，实起于 McCormick 农具制造厂罢工的工人。他们由二月间已竟被迫出厂，因为厂主雇来三百多武装侦探，保护那班破坏罢工同盟的工人，雇主和工人间的战斗益烈。五月三日的早晨，罢工的工人在 McCormick 工厂附近，集合了一个群众大会，讨论回复工作的平和条件。Spies 君出头演说，会场的光景，却很平静。不意 McCormick 工厂的铃忽然响了，那些破坏同盟的工人出现了。有约一百五十人的群众，动了怒气，离开大会，向那些破坏同盟的工人面前进发。双方相见，就大起冲突，巷战起来，互以石子掷击。警察看势不佳，便去急打电话。不多时，一个巡官的马车飞过街市而来。又不多时，有七十五名警察，步行随着那辆车子走来。还有四五辆巡官的马车，在警察后面。这些巡官一被他们用石块抛击，便向群众开枪乱打。无辜的男、女、儿童，受伤的很多。

民众非常激怒了。Spies 君急忙回到 «Arbeiter—Zeitung» 报馆，草了一篇对于芝城工人的宣言。后来人叫这做“复仇檄文”，因为这宣言的首句，就是“复仇！”劝工人们起来报他们同胞惨遭杀戮的仇。这篇宣言印了五千份，用英文和德文写的，分布各街。

次晚，在 Haymarket 地方又召集了一个群众大会，追悼他

们惨遭杀戮的工界朋友。到会的约有二千人，Spies、Parsons、Fielden 诸君，都有演说。

这次集会，官府在白天并没有干涉。到了晚十点钟的时候，芝城市长 Harrison 氏离了会场，这个会议实际上已竟算是闭会了。因为眼看着云气低重，有大风雨将至的样子，至少有三分之二都散去了，只剩下数百人，Fielden 君还在那里给他们演说。演了十余分钟，就有一百七十六名警察，由 Ward 大佐督队，急奔这一部分余众而来，严令解散。Fielden 君答复说，这个集会是很平和的，并没有什么危险。在这个时候，忽然由一个附近的小路，掷进来一个炸弹，正落在第一个警士和第二个警士的中间，轰然炸裂，发出可怕的声音，炸毙一个警士，受伤的很多。双方立刻开枪乱射，延到两分钟之久，没有间断。结果警察方面，死了七人，伤了约六十人；工人方面，死了四人，伤了约五十人。

抛炸弹的人到底是谁呢？这是一个大疑问。有一位 Rudolph Schnaubelt 君，是 Schwab 君的妻兄弟，他当时很受嫌疑。Haymarket 悲剧发生以后，他便即时逃走了。可是他在欧洲报纸上，却屡次声明，他和这事没有关系。此外还有两说，亦颇盛传：一说谓这个炸弹，是平日为警察所陷害的人的亲友放的，是为报复私仇；又一说谓当时八小时运动很占势力，所以官府使人暗掷炸弹，以便得所借口，好把这一班指导这个运动的中心人物一网打尽。从法庭审判此案故意罗织很不公平看起来，似乎最后一说，也颇可信。

事实纵然如此，但是反对党到底要把这桩罪案栽到社会党人身上。于是所有的工人会都被解散，*«Arbeiter—Zeitung»* 报馆也受警察严重的检查，Haymarket 大会中发言的人和 *«Ar-*

beiter—Zeitung» 报馆印刷部编辑部中的重要分子，都被逮捕。五月十七日预审陪审官以投掷炸弹炸死警察 M. J. Degan 的罪状，控告 August Spies、Michael Schwab、Samuel Fielden、Albert R. Parsons、Adolph Fischer、George Engel、Louis Lingg、Oscar W. Neebe、Rudolph Schnaubelt 和 William Seligar 等十人。除 Schnaubelt 在逃，Seligar 以告密免罪外，其余八人均付审讯。

审讯的手续既不合法，证据也不充分，并且有伪造的嫌疑。任被告人若何申辩，律师若何辩护，法官终是不睬。因为他们早有成见，此案不过是一个口实。有人说都是他们作出来的恶剧。到了八月二十日，判决书下了。Spies、Schwab、Parsons、Fielden、Fischer、Engel、Lingg 七人判了死刑，Neebe 十五年监禁。他们到州高级法庭去上告，仍然认可原判；到合众国高级法庭控诉，他们说没有审理此案的审判权，却之不理。山穷水尽，只剩下了一条路：就是请求政府特赦，或减刑。有的被告取了这个方法，结果只把 Schwab、Fielden 两人减为终身监禁，Lingg 仰药自尽，Spies、Parsons、Fischer、Engel 于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惨遭绞刑。他们死义的时候，都很悲壮。Spies 君当那绞绳放在颈上的时候，有一句临终的宣言，说“我们在坟墓中的沉默比我们的演说更能动人的时候快来了”。Parsons 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民众的声音得被听见”。Fischer 的死状，尤其壮快，他以踊跃的跳步，光明的颜色，上了断头台，高呼“这是我一生最快的一刹那”。这样构成了这一段冤狱！

过了六年，John P. Altgeld 被选为 Illinois 州长，冒许多困难，精查此案的真相，得到他们八人确实无罪的证据，才把还在

生存的 Fielden、Neebe、Schwab 三人释放出来，并声告当时审理此案的检查官、审判官、警官等，以贿赂关系同谋捏造证据的种种事实。这段冤狱，算是得了昭雪。但是死者已矣！他们的牺牲的精神，冤枉的罪案，只有引起后人的同情罢了！

我再把这八位悲剧中的人物的略传，纪在下面：

August Spies，那时才三十一岁。生于德国，一八七二年移居到美国。一八七七年为社会工党(Socialist Labor Party)的会员。他曾作过实业经理人，后来在《Arbeiter—Zeitung》报充当编辑长，直到他被捕的时候。社会革命俱乐部成立，他便加入这种运动。他是马克思派的学者。用英、德文作文，都是一样的。在八人中是最有学识的人。

Albert R. Parsons，一八四四年生于美国Alabama州Montgomery 地方。十五岁时，曾习排字术。南北战争时，曾在南部联盟方面当过兵役，但他在一八六八年刊行一种报纸，专鼓吹保障有色人种的权利，因此颇招他的亲底嫉恨。一八七五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一年后又组织芝加角劳工组合的织工会议，他是首先加入一八八〇年社会革命运动的一个人。一八八四年后，发刊《The Alarm》报。他是一个有辩才且有魔力的说士，是一个有才能的组织家。由一八七五年至一八八六年间，他曾在群众大会里演说过不下一千次。他为组织社会工党(Socialist Labor Party)，后又为组织万国工人会(International Working-people's Association)，奔走各处，足迹遍十六州。

Michael Schwab 的才能，比 Spies、Parsons 的才能略逊，但他也是一个受过良教育的德国人。年三十三岁，被捕时来美

已八年了。那时他正辅助 Spies 作编辑部员，他虽不是创造的作者，却也很明通，演说也很畅利。他所以于劳工运动很有影响的原故，全在他那对于劳工阶级利益伟大的热心，无限的献身。

George Engel，是八人中最年长的。一八三六年生于德国 Kassel 地方。艰难困苦的生涯，使他养成了一种惨厉的精神。他酷恨这现在的社会，是原于个人的感情，不是社会哲学的结果。他一到美国，便加入社会改造的运动，为一最热心的献身者。

Louis Lingg，年只二十二岁，是一个笃诚狂热的社会运动者。

Samuel Fielden，一八四七年生于英伦，当过织工、车夫，并是一个辞职的 Methodist 宣教师。他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大部分得自报章上的论述和公开的讨论。他的演说，直截了当，也有雄辩的煽动的气味，群众很欢迎他。

Adolph Fischer 比 Lingg 长两岁，生于德国，十五岁时移居美国。他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受自他的父母。他被捕的前数年，才倾信无政府主义，是一个百折不挠的社会运动家。

Oscar Neebe，一八四九年生于纽约，一八六六年来芝加哥居住。从那时以后，就和各方面劳工运动发生关系。他曾当过一回国民劳工联合的代表，后来加入社会工党和万国工人会。他未曾作过无政府党人的宣传运动，始终在工联运动上尽力。在一八八六年的八小时运动中，也占首要的地位。

(四)

法国的“五一”纪念日，也曾受过鲜血的洗礼，染印在他的历

史上。

一八九一年四月下旬，礼路地方的织物工业中心地雇有二万多工人的福尔梅市，起了同盟罢工的风潮。一直延到“五一”纪念日，还没有平息。

欧洲旧俗，五月一日本来是一个令节。是日，士女都出游野外，摘取鲜花，欢欣歌舞。这一天福尔梅市的青年男女，也结队成群的出游原野，拿美丽的花，装饰在身上，笑语而归。

忽然满街起了杀气，军警和工人起了冲突，把工人捕去了数人。出游回来的青年士女，看见军警暴乱的样子，很是愤慨，便一齐唱着悲壮的歌，喧譁起来。在前引道的，是一双青年男女：女年十八岁，名叫玛利亚·卜伦德，手拿着一枝白桑茶西花；男年十九岁，名叫多孟德·季洛特，手拿着三色旗。民众并没有什么武器，不过空声骚动罢了。

军警的指挥官，再三用刀枪袭击群众，结果只是增加他们的愤慨，愈加激昂起来。军官又发开枪的命令。按法国的法律，在这个时候，必须击三次大鼓，以为开枪的警告，乃军官不守法律遽发枪击的命令，实在是违法的行为。

在这次非法的暴行之下，死了九人，伤了二十四人。也有在咖啡店里吃饭的客中流弹而死的。那引导群众的一双青年男女，一个血溅着三色旗，一个血溅着白桑茶西花枝，都作了这次血祭的牺牲。此外还有少女三人，青年男子四人，听说其中还有一个年才十岁的小孩。

这一天在塞奴的都市苦里西，官吏对于民众也有虐杀的事情。

苦里西的电报局员，早起把赤旗带在胸前，不多时就被警官

夺去了。午前，工人成群结队的等候着演说的机会，直到正午，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可是警探已竟布满了街衢。

午后二时，鲁法罗呵的同志团体，忽然涌入苦里西；他们要以自由独立的意气，纪念这个日子。

他们高呼着“自由万岁”，在街上游行，和警官小有冲突。

他们以后又进到一个酒店里，高声合唱工人解放的歌。警察署长闻而大怒，发令袭击酒店。警官或用刀或用手枪，直奔酒店，汹汹而来，工人乃不得不出于正当防卫。结果警官方面，伤了六人，暂行退却。

于是又为第二次的袭击。这回警官得了胜利，工人大部分逃去，只捕住狄侃、达尔达尔、鲁菲优三人。

三人的裁判，过了四个月才确定了。检察官要求死刑，但陪审官很公平持正，判决鲁菲优无罪，达尔达尔三年监禁，狄侃五年监禁。

最近一九一九年的“五一”纪念日，法国巴黎也曾起了骚动。是日巴黎市民，照例举行大示威运动，参加者多系少年，并且有外国人很多。午后，军队和群众发生了大冲突，军队遮断群众前进的道路，群众拚命冲破警戒线，消防队欲用水龙击散群众，群众仍悍然前进，警察用棍棒乱打。群众过 Opera House 前，齐呼“推倒政府”。入夜形势更险，骑兵和群众又大冲突，群众用手枪自卫，死十八岁少年一人，警察受伤的四百二十三人，其中受重伤的二百五十人。这一天巴黎全市罢工，又值阴雨，光景更觉凄惨。

(五)

我写了这一段“五一”运动史，不禁起了好些感想。现在把他写出来，作本文的结论。

二、三年前，《劳动》杂志上有过一个题目：《不入支那人清梦之五月一日》。那时中国人对于这“劳工神圣”的纪念日，何等淡漠！到了去年，北京《晨报》在五月一日那一天，居然出了一个“劳动节”纪念号，一般人才渐渐知道这个纪念日的意义。到了今年，不但本志大吹大擂的作这“五一”祝典，别的同志的同业，同声庆祝的，也有了好几家，不似从前那样孤零落寞了！可是到了今天，中国人的“五一”纪念日，仍然不是劳工社会的纪念日，只是几家报馆的纪念日；中国人的“五一”运动，仍然不是劳工阶级的运动，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不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这是我们第一个遗憾！

“五一”运动的历史，胚胎于八小时工作问题，已如上述。去年华盛顿的劳工会议，对于工作时间问题，居然规定了下列四项：

甲、一日八时间，一星期四十八时间。

乙、只有在特别紧急的时候，才准有法定时间外的作工。

丙、法定时间外的作工，须另加百分之二十五的工银。

丁、关系法定时间外的作工，有工人团体的地方，须与工人团体协议。此协议的结果，有法律上的效力。无工人团体的地方，由政府决定。

以上四项，都是确定八小时工作制的规定，不能不说是这次

劳工会议一件很大的成绩了。可是这个成绩，是三十年来，工人依自己阶级直接行动的努力，早已得到的。“五一”运动，已经发生了一种新意义。英美的工人，早已更进一步，作“六小时”、“三十六小时”的运动了。劳工会议的规定，还只是先进国劳工依自己阶级的努力已经获得的收获，或其以下。难怪意大利和别国的工人代表灰心失望！这是我们第二个遗憾！

华盛顿劳工会议的成绩，虽然不能满足我们的希望，然而要他那四项——适用到我们的劳工社会来，我们那些苦工人，也许可以得享些幸福。谁知中国和日本、印度等国，又被他们认作特殊国除为例外了！那关于日本、印度等国的，我且不提，单把那关于中国的特殊规定，写在下面：

甲、每星期休息一日。

乙、以一日十时间、一星期六十时间为原则。对于不满十五岁的人，以一日八时间、一星期四十八时间为原则。

丙、对于使用百人以上的工场，适用工场法。

丁、在各国租界内，亦适用同一规定。

再让一步，就是这种特殊规定，果然能够实行，也未始不是这一班苦人的幸福。无奈他们的愚昧，真是可怜！就是这个，他们也不知道起来设法使他实行。这是我们第三个遗憾！

我们在今年的“五一”纪念日，对于中国的劳工同胞，并不敢存若何的奢望，只要他们认今年的“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

我们在今年的“五一”纪念日，对于世界的劳工同胞，希望很大。希望他们由“八小时”、“四十八小时”的运动，到“六小时”、“三十六小时”的运动，给“五一”纪念日加一新意义，为“五一”运

动开一新纪元。

我们最后对于“五一”纪念日的自身，希望他早日完成那“八小时”运动的使命，更进而负起“六小时”运动的新使命来。

起！起！！起！！！ 锄劳辛苦的工人！今天是你门觉醒的日子了！

我这篇纪述，是根据下列诸书作成的：

1. Morris Hillquit——History of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P.209—221

2. 《解放》创刊号山川菊荣著《五月祭与八时间劳动的话》

3. 《改造》大正八年九月号新妻伊都子著《致不真面目的劳动论者》和山川菊荣著《答新妻氏》

4. Karl Liebknecht——The Future belongs to The People. P.126—128

1920年5月1日

《新青年》第7卷第6号

署名：李大钊

红 萝 苣 党

(一九二〇年五月三十日)

俄国的真正红党，说那和日本订立协约的海参崴政府，是“红萝苣党”。这个意思，就是说那海参崴的红党，是似是而非的；外面挂上一层红皮，里面却全是白的。这句话可算是“谗而虐”了。遥望中国境内，春风春雨中，仿佛新生出一层小植物，都带着一层红皮，将来难保不是一片红萝苣！

1920年5月30日

《新生活》第37期

署名：孤松

乱 七 八 糟

(一九二〇年五月三十日)

西南七总裁，自己捣起乱来了。恰好又有北方的八省联盟出来，和西南的残局唱对台戏。真是“不南不北”，“乱七八糟”。

1920年5月30日

《新生活》第37期

署名：孤松

自然与人生

(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日)

(一)

有一天早晨，天刚破晓，我的小女在窗外放出一群她所最爱的小鸡小鸭来。她便对他们说、笑，表示一种不知怎样爱怜他们的样子。

一个天真的小孩子，对着些无知的小动物，说些没有意味的话，倒觉得很有趣味！

她进房来，我便问她为什么那样爱那些小动物？她答道：“什么东西都是小的好。小的时候，才讨人欢喜，一长大了，就不讨人欢喜了。”

不讨人欢喜的东西，自己也没有欢喜，没有趣味，只剩下悲哀和苦痛。

一切生命，都是由幼小向老大、死亡里走。

中央公园里带着枯枝的老柏对着几株含蕊欲放的花，显出他那生的悲哀，孤独的悲哀，衰老的悲哀。

(二)

迟迟的春日，占领了静寂的农村。篱下雄鸡，一声长鸣，活

绘出那懒睡的春的姿容。

街头院内，更听不着别的声音，只有那算命的瞽者吹的笛子，一阵一阵的响。

“打春的瞎子，开河的鸭子。”这是我们乡土的谚语。

鸭出现了，知道春江的水暖了；瞽者的笛响了，知道乡村的春来了。

“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家家都有在外的人，或者在关外营商，或者在边城作客。一到春天，思人的感更深，诸姑姊妹们坐在一团，都要问起在外的人有没有信来。母亲思念儿子，妻子思念丈夫，更是恳切；倘若几个月没有书信，不知道怎样的忧虑。

那街头的笛韵，吹动了她们思人的感怀，不由的不向那吹笛的人问卜。

也有那命薄的女子，受尽了家庭痛苦，尝尽了孤零况味。满怀的哀怨，没有诉处，没有人能替她说出；只有那算命的瞽者，却能了解那些乡村女子的普遍心理，却能把她们的哀怨，随着他的歌词弦调，一一弹奏出来，一一弹入她们的心曲，令她们得个片刻的慰安。那么，乡村里吹笛游街的瞽者，不只是妇女们的命运占卜者，实在是她们的痛苦同情者，悲哀弹奏者了。

(三)

我在乡里住了几日，有一天在一邻人家里，遇见一位和藹的少年，他已竟有二十岁左右了。

我不认识他，他倒认识我。向我叫一声“叔”，并且自己说出他的乳名。

沉了一会儿，我才想起他是谁了。他是一个孤苦零丁的孩子，他是一个可怜的孤儿。

他的父亲早已去世了，那时他是一个不知世事的孩子。

他父亲死的时候，除去欠人家的零星债务，只抛下一个可怜的寡妇，和一个可怜的孤儿。

他的母亲耐了三年的困苦，才带着他改嫁了。因为不改嫁，就要饿死。

他的母亲照养他成人以后，他又归他本家的叔父母，不久便随他叔父到关外学习生意，如今他是第一次回家了。我问他道：“你去看你的母亲了吗？”

他说：“没有。”

我说：“你的母亲照养你一回，听说你回家了，一定盼望你去看她，你怎么不去看看她呢？”

他说：“怕我叔婶知道了不大好。”

唉！亲爱的母子别了多年，如今近在咫尺，却又不能相见！是人情的凉薄呢？还是风俗习惯的残酷呢？

(四)

死！死！死！

自从稍知人事的时候，提起这个字来，就起一种恐怖心。

去年夏天在五峰避暑。下山的时候，瘟疫正在猖獗。路经四五十里，村里尽是哭声，村边都是新塚，死的现象，几乎把我包围了。

我当时在这种悲哀恐怖的境界里走，对于“死”的本质，发生

很深刻的思索。

死是怎么一回事？死真是可恐怖的么？死了的人，还有什么悲哀痛苦么？这些问题，都从我脑海的底下翻浮上来。

我当时的感想是：

“死与生同是全生命的一部，生死相间，才成无始无终的大生命，大生命就是大自然，死同生一样是大自然中的自然的现象。”

“对于自然的现象的‘生’，既不感什么可以恐怖；那么，对于自然的现象的‘死’，也不应该感什么可以恐怖。我们直可以断定死是没有什么可以恐怖的。”

“死既与生同是自然的现象，那么，死如果是可悲哀的，生也是可悲哀的；死如果是有苦痛的，生也是有苦痛的。生死相较，没有多大的区别。”

人为什么都乐生怕死呢？这都是依恋的缘故。

物理上有一种“惰性”，人性亦然。由天津往上海迁居，对于故居，总不免有些依恋，其实上海的新居，未必比天津旧居有什么苦痛。冬天早起，临行冷水浴，望见冷水总觉得有些战慄。跳入其中，沐浴顷刻，也还有一种的佳境。出浴后，更觉得严寒的空气与春风一样和暖。人对着死依恋生，也是一样的心理。

赤裸裸的人生，总不要有所依恋，总不要穿上惰性的衣裳。

我们行了海水浴，行了春风浴，还要时时行自然浴。

死的池，死的岭，都是联络人生与自然的途径。

匆匆又是一年了。我再过昌黎的时候，去年的新塚，已经丛了一层荒草；遥看那荒草里，仿佛又现了青青的颜色了。

东坟一个老妪，西坟一个少妇，都跪在地下哭。那种悲声，

和烧纸的飞灰，似乎一样的高低上下。

啊！今日是寒食节了！

我细听他们的哭声，里边都有怨诉的话。大概都是说死者抛了生者去了，死者无知，而生者苦了。

这样看来，在死人前的哭，不是哭死者，乃是哭生者；不是吊坟里的人，乃是吊坟外的人；那山前山后的野哭，不是死亡的悲声，乃是生活的哀调。

1920年6月20日

《新生活》第38期

署名：孤松

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七日)

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在民众本身，尤应自觉其权威而毅然以张用之。

时至今日，一切历史上传留下来的势力，都一天一天的粉碎了。什么宗教咧，皇统咧，军阀咧，政阀咧，不遇民众的势力则已，遇则必降伏拜倒于其前；不犯则已，犯则必遭其殄灭。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礎。满清三百余年的皇基，当不得民众主动的革命军。一世怪杰的袁世凯，以附和民意而再起者，卒以伪造民意而亡。最近如军阀魁领的段祺瑞，赞成共和则胜利，讨伐复辟则胜利，一至反抗民众，则纵有外国军阀的后援，亦终归于一败涂地。这真是眼前的好教训！

我们认定这次战争的胜利者，究竟是民众；这次战争的失败者，究竟是败于民众的面前。这次战争，完全是五四运动的精神动荡中的过程，也就是辛亥以还革命运动的持续，方将日进而未已，断断不可仅认作军阀自残的战争，没却自己的势力。固然有些私利的关系，因缘附凑于其间，但是真实胜利者，只是我们民众，其余的分子，不过是攀缘他的一种附属品。倘若这种附属品不自知此理，而僭夺民众的胜利以自豪，则其覆亡之速，比袁、段更甚。我们应该自凭其胜利而勇进，以建树未竟的事业。我们

要这次战争的军前胜利者，自己了解他不过是一个效忠于民众大本营前的先驱，以后要始终听民众的指挥，为民众效命。

吴子玉将军提倡的国民大会，不过是秉承我们民众的意思，不许这些在政治机关上的人干涉我们集会。我们应该赶快随时随地自由集合国民大会。这种国民大会，不拘一定形式，不待政府召集，全国公民要自动的愤起，竖起民众万能的大旗，把目前解决时局的办法，简单而且重要的标出几条，交给南北政府去办，他们如不按民意去办，我们可以给他们一种制裁。安福国会，是非法的东西，当然无效。旧国会时期经过太长，中更迭次变乱，其中分子早已七零八落，不足代表我们了。我们可以本着选举的权源，召还他们，但不可请求那个政府解散他们。如果他们不听我们的召还，那是他们自己表明他们不是我们的代表，任他受若何的处置，也与我们民意机关的尊严无损，那时什么人去解散他们，我们都不管了。其余必要的办法，都可一一列举出来。此外我们还要本着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工神圣诸大精神，发布一种神圣的民权宣言。我们全国的市民，要随时到处自由会合，取应有尽有的手段，作我们的运动，非达到目的不止。我想只有这种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才是真正的国民大会。只要真正的国民大会，自动起来，那就依一种改造的选举法召集一种国民大会也好，依旧存的选举法召集二届国会也好，他们都要受这真实的国民大会表示的意思所支配。他们不过把已经粗具的概括的表现的民意，依一定的形式，精详的整理出来，做民众的打字机罢了。大家不要说这种不合一定形式的国民大会没有效力，五四以来，罢免曹、陆，乃至此次打破一派军阀，摧除安福，那一件不是这种国民大会的效力！若不自动的集合国民大会，专

等少数代表的国民大会去做，其结果必与洪宪参议院、安福国会等。

最后还有一句话，要郑重的请大家注意！望大家愤起，把已有的职业团体改造起来，没有团体的职业也该速速联合同业，组织起来。这就是永久的人民大会的基础。

民众啊！只有你们是永久的胜利者！

1920年8月17日

《晨报》

署名：李守常

变革的原动力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七日)

饥饿是变革的原动力。法兰西大革命，饥饿是重要的原因；俄罗斯大革命，饥饿也是重要的原因。今年北方旱蝗并作，灾区很广，才是初秋，已经饿殍满野了，等到明春，更不知惨到甚么样子！军阀、财阀、政客们，还是旁观坐视，依样横行。将来恐不免要造一回大变革。

1920年10月17日

《新生活》第41期

署名：孤松

人治与自治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七日)

近来流行一种“某省人治某省”的运动，鄂人有“鄂人治鄂”的运动，苏人有“苏人治苏”的运动，其他各省，也都有这种倾向。这总算是有点进步的动机了。可惜只脱不净“人治”的观念！为什么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争省自治呢？为什么还要一个本省的人来治大众呢？

1920年10月17日

《新生活》第41期

署名：孤松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

(一九二〇年)

东西文明根本上的异点，吾既详细的论过了，于此而更从经济思想上发见东西人有根本特异的地方。即西方人的经济思想，既于欲望的是非邪正，一概不加择别，而惟尽力以求其满足，而满足的手段，亦复不加以选择；东方人的经济思想，于欲望既须加以严正的择别，于一定的限度内认为必要的欲望，可以使之满足，此外则必须加以节制，而于满足欲望的手段，亦须守正当的轨范。所以西方的经济思想，其要点在于应欲与从欲，在于适用与足用；东方的经济思想，其要点在于无欲与寡欲，在于节用与俭用。这亦似是因为受了自然环境的影响才有这样的不同。自然的费与啬，故人间的欲望奢，欲望奢则必竭力以求应欲而尽用；自然的费与丰，故人间的欲望小，欲望小则必竭力以求寡欲而节用。这是东西洋经济思想不同的特点。

现在把中国古代的经济论，略述一二，亦或足以窥见其一斑。

老子的经济学说：

“民之饥者，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是以饥。民之难治者，以其上之有为也，是以难治。民之轻死者，以其上求生之厚也，是以轻死。”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国家滋昏；民多知慧，而奇物滋起；法令滋章，而盗贼多有。”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也，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憯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儒家的经济学说：

“后稷教民稼穡，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篇》）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篇》）

“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篇》）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篇》）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篇》）

“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

“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孟子·告子》）

“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礼记·曲礼》）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

“专欲无成。”（同上）

“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易·损卦》）

“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易·谦卦》）

“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易·节》）

卦》)

“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篇》)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篇》)

“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孟子·告子》)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大学》)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大学》)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篇》)

“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篇》)“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篇》)

管子的经济学说：

“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管子·八观篇》)

“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损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管子·枢言篇》)

“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其间，则上下相疾也。”(《管子·权修篇》)

“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篇》)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中略)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管子·牧民篇》)

韩非子的经济学说：

“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俾农夫之利。”（《韩非子·五蠹篇》）

墨子的经济学说：

“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墨子·亲士篇》）

“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墨子·节用上篇》。案：《墨子》《节葬》、《节用》、《非乐》等篇，均以节用去奢为主旨）

荀子的经济论：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篇》）

“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荀子·荣辱篇》）

“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埶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荀子·荣辱篇》）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荀子·礼论》）（未完，下缺）

1920年“北大讲义”

按《守常文集》刊印

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 之唯物的反映

(一九二〇年)

原人社会的经济情形，常与原人社会的文字书契以明著的反映。故今日吾人研究古代的社会情形，每能从文字的孳乳演蜕之迹得着确实的证据。

人类生存于宇宙之间，每于不知不觉之间受宇宙自然的法则的支配。原人的“秩序”、“恒久”的观念，大概得自太阳的出没和地球在太阳系中与其余诸星相保持的关系。远海的航舟，靠星位得以平安。至于画疆分野，亦须上考星位。中国古歌有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又云：“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可见云气的变幻，日月的运转，颇能与人以谐和、华丽、秩序、恒久的观念。

古代的刻石的记号，多作圆环形。此种情形，东西相同，几成为各部族的通象。由此可以断定人类实有些共通的观念与思想。但是这个观念何自而来？颇为考古学者所聚讼。有些有价值的考古学者说，这是天文的印象，即是太阳的记号。但这种推想，在纯粹的象征主义（特别是 Scandinavian 的例证），如☉☽等讲不通。更有些人说，在英伦三岛和印度寻出的记号，似是普通宗教上的象征主义，是一种神秘的键。由此说来，这种记号可

认为世界上原始宗教中的一个的表意的表示。此宗教流被甚广，如今在印度还有留存者。

但是这种宗教的解释，还有许多点未能说明，那些圆环每每接触的很巧，似是表明什么意义。将来这种奇特的记录必有愈益明了的一日。

在苏格兰 Ayr 郡 Coilsford 地方发见的石柜镌有记号。这种记号是绘画文字的起原。由绘画文字更进而为象形文字。上古时文字都象形。墨西哥的古文、埃及的古碑、中国古代的文字（如洪崖石刻，在今贵州永宁州），马画马形，牛画牛形，都是象形。“日”字，篆文作日[⊙]，外象体圆，内象日中黑影（古人有日中一黑影之说）。“月”字篆文作月[⊙]，月缺时多盈时少，故象缺形。其中一画，象大地山河的影子（古人谓月中有大地山河的影子）。“气”作气[⊙]，象云气低重的样子。“雨”作雨[⊙]，象落雨的样子。“山”作山[⊙]，“水”作水[⊙]（古文作三坎卦形），“田”作田[⊙]，“目”作目[⊙]，□象目匡，八象眉，○象黑睛，●象瞳子。“吕”作吕[⊙]，象背骨相连的样子。余如马、鸟、虎、犬、鹿、鼠都是象形。来、禾、米、瓜、韭、竹、草、林、木等亦是象形。心、耳、口、手、爪、户、皿、瓦、弋、弓亦都是象形。象形文字始于方圆，“环”字作环[⊙]，“中”字作中[⊙]，“日”、“月”等字皆○形的变体。“国”、“田”等字亦是□、○的变动增易。因为古人图画始于□、○，故文字亦始于□、○。

史传伏羲画卦，即是记号文字的开始。“天”字草书似三，坤字古文作三[⊙]，即三的倒形（西文谓伏羲画卦出于巴比伦楔形文字）。

Assyria 人和 Babylonia 人的楔形文字，多刻在石牌、石柱或铜像上，Rosetta（埃及的港市）的，刻三国语的楔形文字算是

与世界终古了。

原人的记号，有结绳为符的，有刻在骨上的，有刻在贝壳上的，有刻在龟版上的，有刻在宝石上的，有刻在金类上的，亦有刻在木竿、木板上的。

古代中国传说，在神农时代结绳为治。在那个时代大概是因为渔猎时代网罟为用，而弋获的物品必须用绳缚之，所以将此观念推演而为结绳的文字。这种结绳的文字，如今虽不可考，然“一”、“二”、“三”等字，古文作“弋”、“弌”、“弌”，足以证明在渔猎时代于其所获物旁结绳以记数。结绳的文字不过是些方圆平直极简单的画数罢了。

古代 Peru 的 Incas(国王的称谓)，结有色的绳为记录，各省分都有专官管治此事。每年将此等结果送存首都，以备存考。这种结绳的记录，叫作 Quipu(结)。司此的官名曰 Quipu Camayas。他们所保存的记录，就是那个地方人民的统计。这结绳的文字，如用小绳绕一大纲上，或绕一木棍上，形成一组纓纒的样子。结的位置可以表示数目，由绳上的一小片的颜色表明人身的阶级，结绳文的解释很不容易。有人解释着，说红色意指战争，黄色指金，白色指平和或银，这不过是推测的事。太平洋诸岛的部族，亦有用此为记号的。

人类最初的家庭是森林，后来遇见了一个冰期，变更了气候，人类遂转徙河岸海滨去。

在森林附近生活的人，往往在木棍、木板上刻些记号，以当纪录，或以纪其杀人的数目，或将格言咒语刻于其上。战争用的斧枪柄上及马具上，都是刻记号的绝好处所。亦有些人种刻木作历书，Scandinavian 就是一个显例。

埃及古文，以椰树每年生枝，即以椰树的叶表年数。中国以农立国，而周朝复以农开基（始祖为后稷），故以谷熟为年（《尔雅·释天》云：“周曰年”）。《说文》季字下云：“谷熟也，从禾千声”，年字从千，取稼穡众多的意义。《诗》：“岁取十千”，“乃求千斯仓”，禾年义相通，古代以有禾为有年。《诗》曰：“自古有年”；《春秋》云：“大有年”。又以禾熟有一定的期间，故借为年龄之年。期字《说文》作稊，释曰：“稊复其时也，从禾其声。”《虞书》曰：“稊三百有六句”，是期与年同。《论语》宰我曰：“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以旧谷没新谷升为一期，正可以说明期字古文从禾的理由。歷字中有秝，歷与曆通用。歷有推往知来之义，故从二禾，取年岁众多之义，故称多年为歷年。

“燧”是取火的物具，亦称“夫遂”，又称“阳遂”，皆是取火的器具。《周礼》秋官司寇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又《考工记》：“金锡半谓之鉴遂之齐”，郑注：“鉴、遂取水火于日月之器也。”《礼记·内则篇》：“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左右佩用，左佩纷、帨、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玦、捍、管、遘、大觶、木燧。”“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左佩纷、帨、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箴管、线纆、施鬋裘、大觶、木燧。”《淮南子·天文训》：“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高诱注：“阳燧，金也。取金杯无缘者，熟摩令热。日中时，以当日下，以艾承之，则燃得火”。《淮南子·览冥训》：“夫燧取火于日，方诸取露于月。……水火可立致者，阴阳同气相动也。”又云：“夫燧之取火于日，磁石之引铁，蟹之败漆，葵之向日，虽有明智，弗能然也。”综合以上所引的记载并解释，我们可以知道“夫燧”是中国古代人取火的器具，最初是用木遂取火于木，后

来入了铜器时代，便用铜锡各半制成的金属器亦名曰“遂”。同时又有名为“鉴”的一物，与之相伴，而被发明，与使用“遂”用以取火于日，“鉴”用以取水于月，此时一般人遂称取火于日的遂为“阳遂”，而称取水于月的“鉴”为“阴遂”。“阴遂”即是“鉴”，即是“方诸”。木遂的发明远在上古，后世传说有燧人氏者，钻火教人火食，这年代远不可考了。木遂必系摩擦木类以取火的器具，金遂的发明当在铜器时代。周秦之际，已入了铜器时代，金遂必是此时发生的。金遂想系借太阳光线反射的作用以取火的器具，比木遂一定便利的多。可是金遂只能在晴天时用，阴天则仍须用木遂。但自我们推想起来，在石器时代已经应该知道以燧石与金类相击得火的方法。何以到了周秦时代还只用那木遂、金遂的笨法子呢？我想这或者是专供祭祀时取明火、明水的法则，是习俗相沿颇不易改，是汉民族富于保守性的征象，断乎不会有并用燧石取火的方法而亦不知的事。

《论语》宰我说的“钻燧改火”，系指木遂而言。改火是说“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仲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改火一周，便是阅岁一周，这可见古代有以“钻燧改火”为历岁一周的记号的习惯了。

中国古代以“黄”色为重，其始祖为“黄帝”，亦是农业经济时代的反映。《易》曰：“天玄而地黄。”《说文》：“黄地之色也，从田从萑，萑亦声。”中国宅域土壤为黄色故黄。亦训“光”地之光，即地之色，农业之民，土地为重，故崇地之黄色为正色。其首长亦取地的光色尚黄，其民即尊之为黄帝。

“主”字为“炷”字的古文，从火，象形从王，火盛貌，后世借为君主之主，别作炷字以代之。由唯物史观以察之，君主之义，亦

与用火有关。火为人类生活史上第一个大发明，故那时的人们对于精于用火者，即奉为君主。故有祝融氏、燧人氏之称，神农亦称炎帝，一号烈山。

人类当转徙到海滨河岸的地方，依贝鱼以为食物。在那里生活的时间很久，遗留下所食的鱼、的贝壳堆积地上占很广的面积，这种堆积在每个大陆沿着河滨海岸都可以寻得。考古学者，称这种堆积为“贝陵”(Shell-heaps)，又称“贝冢”(Kitchen-middens)。古代滨海的人民多喜用贝作货币的材料，地中海沿岸诸民族皆有用贝的遗迹，就是现今印度洋、南太平洋诸岛人还多用贝。北美土人有一种“贝珠壳带”(Wampum belts)最初用作货币，后来有时以为历史的纪录。这种带是用丝或皮带将白色的和紫色的贝壳串缀成的，有时白地紫画，有时紫地白画，Wampum即“白”意，普通白色的居多，而紫色的则甚难得。这种图案有时亦甚易解释，像那表明 Iroquois League 的带，就是以中心的腹部为统治民族，而以每个四方代表联合诸民族，用绳联成一气，最有趣而且精妙的贝壳珠带是那在一六八二年 Lenni-Lenape 的酋长订立《大约章》(«Great Treaty») 时纪那创立彭塞尔凡尼亚州的 William Penn 的友谊的，做的极其精致。带的中央是 Penn，和首领酋长握手协商的形象。此物至今保存于 Philadelphia 的历史学会。

中国古代用贝为货币的遗迹，尤其彰著。《说文》：“贝，海介虫也。居陆名蜃，在水名蚶，象形，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现于经济上的用语，几全由贝字孳乳而成。足证在中国石器时代以贝壳为主要的货币(考古学者说，在那些贝陵里，除贝壳外，还有些木炭的屑片，并些石作的、骨作的器

皿，可见那时已经用火，已经是石器时代了)。

许氏《说文》貝部所解的字如下：

賁 賄 財 貨 資 賑 賢 賀 貢 贊 賈 齋 貨
 賈 賂 賸 贈 賜 賚 賞 贏 賴 負 貯 貳 賓
 賒 賁 賚 質 質 賈 費 責 賈 販 買 貴 賤
 賦 貪 貶 貧 賃 賕 購 賈

徐氏新添的字如下：

賈 賄 賽 賺 貼 賂 賈 賂

此外还有数字如 賊 寶 賣 積 贊 貫 實 亦都是经济上的用语。这些字不必都起于一时，是渐次孳乳的。

古代中国以贝为货币，还有更明显的例证。《说文》：“员，物数也，从贝口声。”《说文》：“口，回也，象回币之形。”金坛段氏释员字云：“从贝，古以贝为货物之重者也。”足证古代以贝为计算货物的标准，员即是以贝计物的单位，与现今以圆计算货物的价值相类。《说文》：“卣，穿物持之也，从一横贯，象寶货之形。”是卣已象两贝相并之形。《说文》：“贯，钱贝之贯，从卣贝。”乃后来发生的字。《易》有云：“或益之十朋之龟。”《诗·小雅》：“既见君子，锡我百朋。”《汉书·食货志》说：大贝、壮贝、幺贝、小贝，都以二枚为一朋。郑康成诗笺又说，五贝为朋。但都可以证明“朋”是二贝以上的一位。

殷的时代还在石器时代，故由殷墟发掘出来的殷代遗物中可得鉴定。而为货币的只发见些以石或骨仿造贝形的东西。依中国古代经济上的用语多从贝的事实，可断定贝在中国古代曾经通用为货币。依此更可以推断这些以石或骨仿造贝形的东西，确乎亦是当时流行的货币。

殷虚古器物中，不但绝无金属铸造货币，即金属器物，亦可以说未曾发见。再查发掘物中的龟版文字，迄今所能辨读者多为贝字，或从贝的字，至于金字或从金的字则未有一，由此可以断定殷代尚为贝币通用时代，尚为石器时代。

有人说，据一部分的发掘物解释当时的社会状态的全体，这种方法不无危险，但在今日舍此更无确实的证据。而且是等发掘物实从曾为殷朝的都城的地方发掘出来的，据以推测当时的社会状态的一般，亦没有很大的危险。再从较为可靠的一部分的《尚书》和《诗经》中亦可寻出些旁证，证明殷周二代的不同。《尚书》中的《商书》五篇，虽有贝字及从贝的字，而金字及从金的字一个亦没有。有金字从金的字，自《尚书》中的《周书》及《诗经》开始。《尚书·盘庚》：“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不说金玉，而说贝玉。《诗·大雅·棫朴篇》：“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却说金玉，不说贝玉了。又考《商书》中全不见金属器物的名称。至于《诗经》则金属器物的名称数见不鲜，例如《关雎》：“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臣工》：“庠乃钱镈，奄观铎艾。”足证周代已有金属制的乐器、农器，已入铜器时代了。

《说文》云，“古者货贝而宝龟”，《礼记》说，“诸侯以龟为宝”，《史记·平准书》说，“人用莫如龟”，《汉书·食货志》亦说，“货谓布、帛……及金、刀、龟、贝”，更以《易经》“益之十朋之龟”来相参证，足见古代中国有以龟为货币的事实。杜氏《通典》说，神农时代已用龟为货币；《汉书·食货志》亦说，秦并天下，凡龟贝皆不为币。可知龟贝用作货币，自石器时代已然。直到秦并天下早已入了铜器时代的时候，才不用作货币了。

近年以来，出土的龟版日多，此项发掘物皆铸有象形文字，

大都出于河南。河南为殷代故墟，故可认为殷代遗物。中外人士藏拓而研究之者，亦日益众。观此则龟版为用，在当时或不仅为币，以之为种种纪录亦未可知。

由渔猎时代到畜牧时代，兽皮亦是一种重要财货。贵族间的馈赠礼聘都用兽皮，婚礼亦用“俚皮”纳征。

由“家”、“牢”二字，可以推断古代中国的家庭农业经济团体的意味很重。盖豕所以产肥料且以供食品，牛则事运转，都是农业上必须的家畜。

牛在原始社会亦为重要的财产。英文称资本为 Capital, Capital 本训为头，故称首都亦云。经济学者有认此为古代用牛为货币——至少为重要的财产——的证据者。《说文》：“半，物中分也。从八，从牛，牛为物大可以分也。”又“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依我解释，这二字都可证明牛在中国古代社会为重要财产，因为牛在农业经济社会是主要的家畜，故中分物件为半从牛，物亦从牛。

羊在中国古代社会为最美的食品，故养字从羊。因此一切吉祥美善的名辞，都从羊，如“美”、“善”、“羨”、“祥”等字都是。

汉武帝铸币，镌马形于其上，希腊古币，镌牝牛形，足见于原始社会有以家畜为货币的。地中海沿岸的人民使用的银币，有作鱼形的，印度洋沿岸的人民使用的铜币，有作海藻形的，足证该地古代有用鱼用海藻作货币的遗迹。

入了铜器时代，有用兵器或农器作货币的事，印度洋沿岸的人民所用铜币亦有作刀形者，中国古代称钱为刀，齐铸法货犹作刀形，因在当时社会部落的战争很烈，兵器为人人所必须的物品，故能作交易的媒介。

农业盛行的时代，有以农器为货币者。中国的钱字初见于《诗经·臣工》“庠乃钱鏹”，“毛传”云：“钱铍也。”铍字，《尔雅》释器作鏹，郭注云，古锹字。《方言》云：“鏹谓今锹也。”足证钱为一种农器，在农业社会，农器为人人必需的物件，故亦能用为货币。

到了纺织技术发达的时代，有以布或帛作货币的。中国古代钱谓之布货，幣的“幣”字即是帛。

中国古代的文字书于竹帛，竹书在先，帛书稍后。竹书经后人所发掘者，西晋时有汲冢竹书，南齐、北宋均曾有掘地得竹简、木简的事实，最近清光绪末年英、法人在甘肃燉煌附近发见石室藏有古代简牍很多，考罗（振玉）、王（国维）合著的《流沙坠简考》，释帛简都在新莽（纪元二十三年）以前，纸简都在两晋（纪元四百一十九年）以后。又《汉书·艺文志》各书目，以篇计的十有七八，以卷计的十有二三，而以卷计的，又概为汉代中叶以后的著作。又考《史记》、《汉书》，可知那时公私文牍率用竹简或木简，足证纸未发明以前先用竹木，次用帛。

从文字上考察，“简”、“策”、“篇”皆从竹，系竹书时代所造的字。策与册同，册系象形字，册在大上为典，亦系象形。“方”、“版”、“牍”皆系木书，初竹木并用，故曰“载在方策”。后竹帛并用，故曰“垂诸竹帛”。用木时有尺牍一语，用帛时便改称尺素。素即是缣，素竹木书以“篇”计，帛书始以“卷”计。

史称：后汉蔡伦造纸，“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和帝元兴元年奏上之，自是莫不从用焉，天下咸称“蔡侯纸”。后汉和帝元兴元年，为西历纪元一百零五年，然《前汉书·外戚传》有所谓“赫蹏书”者，应劭以为薄小纸，或者蔡伦以前已有纸的发明，因蔡伦所发明的更为精良便利，故能通用于社会了。

帛书虽较竹书后起，而帛价贵，不如竹木易得。故必有竹帛并用的一时期。当时写字的人，或系一种专门的职业，在竹木上用刀刻或漆书，在帛上用笔墨书，这种专门业者必刀笔并用，故古有“刀笔吏”。到了纸发明以后，书法才渐渐普及了。

纸是中国人的发明已经成了史学上的铁案了。今且假定纸的发明者为蔡伦，那么自纪元一百零五年中国已有了纸的发明了。但纸是何时输入到欧洲去的？这一段史的事实，却很有关系。我在英人 Cyril Davenport 著的《The Book: It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里找出一段纪载很可以供史学家考证的资料。现在把他的大要，引译于此：

“在第八世纪的中叶——纪元七百五十一年在中国与波斯交界的地方起了部族的纷争。这些纷争的部族中有乞援于中国者，然中国的援兵竟败于 Samarkand（土尔其斯坦的首都）。亚拉伯人的首长把中国的俘虏带回到那城中，这些人里有熟于中国人的造纸术的，亚拉伯人和波斯人就从此中国俘虏学得造纸术，后又由亚拉伯人传入了欧洲。”

西文 Paper 一语本来并不是纸，此语实源于 Papyrus。Papyrus 是生在尼罗（Nile）河岸的一种很好看的芦苇的内皮，或用护膜或用尼罗河泥粘结起来，用软笔书字于其上，但质很脆弱，很易破碎，把许多 Papyrus 联结起来很长，故须卷成卷轴方易藏置，西书亦以“卷”（Volume）计，即源于此。Volume 是从 Volvere 一语转化而来，即“卷起”（to roll up）之意。又 Bible 一语，本从希腊语 βιβλοι 而来，即芦苇的内皮之意。

造纸术由亚拉伯人输入于欧人，大约在十字军兴的时顷。中世末期欧洲得了两种新发明，一是造纸术，一是印刷术，遂以召

起文艺复兴的大运动。

古代有一期为母系时代，昔人亦有言及者。《亢仓子》曰：“凡蓬氏之有天下也，天下之人，惟知有母，不知有父。”故姓从女生。《舜典》云：别生分，类生姓也。《传》曰：姓者生也。释文女生曰姓。姓谓子也。《说文》：“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古代的姓多从女，如姬、姜、嬴、姒、媯、妫、姑、妘、姻、始、姪、嫪、姚等皆是。昔人的解释都说是“居于姚墟者赐姓姚，居于嬴滨者赐姓嬴，居于姜水者赐姓姜，居于妫水者赐姓妫”。这是因为后世有因居赐姓的事而生的推测，绝非当时的事实。我以为地实因人而得名，不是人因地而得姓。倘是人因地而得姓，何以地名水名都从女旁？既是地名水名都从女旁，必系那个地方因居于其地的人的姓而得名无疑。例如姚墟，必系因有姓姚的人居住才名为姚墟，不是那居于姚墟的人因为所居的地方名为姚墟，才姓姚的。嬴滨、姬水、姜水、妫水亦然。由此可以证明那时的社会实为母系制，故生子从母姓，故为姓的字都从女边。种种地名，亦系因有某姓的母系氏族居住该地而命名。

中国的姓颇与图腾(totem)近似。J.G. Frazer 氏解释图腾的起原，取感生说(Conceptional Theory)，中国的感生传说颇为不少，兹举数例于下：

《帝王世纪》：“黄帝时有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感，生少昊，是为玄囂。”

《竹书纪年》：“帝顓頊高阳氏母曰枢，见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己于幽房之宫，生顓頊于若水。”

《史记·三皇本纪》：“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峤

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

《帝王世纪》：“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

《诗经·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郑玄《〈月令〉注》：“高辛氏之世，玄鸟遗卵，娥简吞之而生契。”

《帝王世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

《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诗经·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以上都是感生的传说，远古且无论，即以三代的祖姓而言，相传禹姓姒，祖载夙昌意，以蕙苡生；殷姓子，祖以玄鸟子生；周姓姬，祖以履大人迹生。这固然亦是荒渺的传说，但在原人社会对于生育的理实，不能了解，而在女子妊娠的时期，精神上尤易发生异状。或偶遇一种事实或梦见怪异景象而生感动，因疑诞生的事，与此偶遇的事实或梦见的景象有特别关系，这是感生观念的由来。

图腾制，同图腾者不相结婚。中国古时亦有同姓不婚的习惯，亦足以证姓与图腾有相类似。

图腾 (totem) 一语，原系由美利坚印度人 Ojibway 族的 totem 一语转化而成。或曰 totam，或曰 todain，或曰 adodam，都是此

语。其语源为 ote, 即家族或部族之义。

女权的衰落, 大约起于畜牧时代。而男性的优越, 实大成于农业经济时代。因为畜牧时代男子出外游牧, 寻得水草丰沃的地方, 便携女子以同往, 定居于其处, 而女子遂以渐次远离于母系团体了。到了农业经济时代, 男子便专从事于农作, 在经济上占优越的地位, 女子遂退处于家庭以内, 作些洒扫的琐事, 现在从文字上亦可以看出是等痕迹。“男”, 《说文》: “男, 丈夫也。从田从力, 言男用力于田也。”“妇”, 《说文》: “妇, 服也。从女, 持帚洒扫也。”男女的分工, 并男女地位的优劣, 于此均可概见。

乾父坤母、男尊女卑的观念与伦教, 均成立于此时。“女”象人跪形, 音与如同。“如”, 《说文》: “如, 从随也。”《白虎通》: “女者, 如也。”又曰: “妇者, 服也。服于家事也。”《大戴礼·本命篇》: “女子者, 言如男子之教, 而长其义理者也, 故谓之妇人。妇人者, 伏于人也。”晏从女, 从日。段玉裁曰: “女系日下阴统于阳也。妇从夫则安”。这都是男子在经济上占了优越地位以后发生的文义与解释。

女权消失以后, 便发生了掠夺与买卖两种婚姻。看那奴字从女, 便知有女子被掠夺而为奴隶的事。婚字从女, 从昏, 便知掠夺女子必在昏时。娶字从女, 从取; 嫁字, 从女, 从家, 便知嫁娶是女子为人所取携离家适人的事, 都可以认出掠夺婚姻的痕迹。

古代婚礼有纳采、纳币、纳雁等事, 皆含有身价的意味。纳雁的风俗, 或云古宾主相见, 皆有贄, 雁是大夫所执的贄, 婚礼有摄盛之例, 故士婚礼用雁, 实系越一等用大夫所执的贄。或云用雁, 采取不再偶之义。以我观之, 前说颇近理, 是古代买卖婚姻

的遗迹。

《孔子家语》曰：“霜降而妇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农业起，婚礼杀于此。”《毛诗正义》曰：“东门之杨，传言男女失时，不逮秋冬，则秋冬嫁娶正时矣。”古代交易都在物资丰富的期间行之，买卖婚姻的时期，亦因经济上的理由而有定限。印度、希腊、日耳曼、斯拉夫族的买卖婚姻多由晚秋至冬季间行之。中国古代的婚姻时期，亦似在秋冬之交。《周礼》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殆因农业经济社会交易物品，必在秋收冬藏之际，婚姻既含有买卖的性质，故亦在同时举行。且妇女在农家亦有其必要的工作。农忙既毕，女家始肯令之适人，而在农隙举行，可以不至妨及农事。

以上所征，虽零散无纪，要足以证从文字语言上，亦可以考察古代社会生活的遗迹，并可以考察当代社会生活的背景实在当代社会的经济情状了。

1920年“北大讲义”
按《守常文集》刊印

史 观*

(一九二〇年)

人类的历史，果何自始？曰，不知所自始。果何由终？曰，不知所由终。在此无始无终，奔驰前涌的历史长流中，乃有我，乃有我的生活。前途渺渺，后顾茫茫，苟不明察历史的性象，以知所趋向，则我之人生，将毫无意义，靡所适从，有如荒海穷洋，孤舟泛泊，而失所归依。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

吾兹之所谓历史，非指过去的陈编而言。过去的陈编，汗牛充栋，于治史学者亦诚不失为丰富资考的资料，然绝非吾兹所谓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吾兹所云，乃与“社会”同质而异观的历史。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

* 本文和《今与古》、《鲍丹的历史思想》、《鲁雷(Louis Le Roy)的历史思想》、《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历史思想》、《韦柯(Giambattista Vico)及其历史思想》、《孔道西(Condorcet)的历史思想》、《桑西门(Saint Simon)的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十一篇文章都见于一九二〇年的《史学思想史讲义》，现按《讲义》原来编排的次序收入《文集》。其中有些文章曾在《新青年》、《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过，校订时主要依据《讲义》，同时也参照了在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稿。又：《史学思想史讲义》的目录中没有《鲁雷(Louis Le Roy)的历史思想》这个题目，这里单列一个题目是根据了《讲义》的内容。——编者

王者的历史观，有英雄的历史观，有知识的历史观，有政治的历史观，有经济的历史观，有生物的历史观，有地理的历史观。将此种依四种的分类法括而纳之：曰，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与进步的历史观；曰，个人的历史观与社会的历史观；曰，精神的历史观与物质的历史观；曰，神教的历史观与人生的历史观。前者以历史行程的价值的本位为准，后三者则以历史进展的动因为准。以历史行程的价值的本位为准者，或曰，社会的演展乃由昌盛而日趋衰落；或曰，社会的演展乃如循于一环，周而复始；或曰，社会的演展乃由野僇而日跻开明。以历史进展的动因为准者，则曰，史之进展必有动因。至于动因何在，则又言人人殊：或曰，在个人，如英雄、王者是；或曰，在社会，如知识、经济是；或曰，在精神，如圣神、德化、理念是；或曰，在物质，如地理、人种、经济是；或曰，在神权，如天命、神意是；或曰，在人生，如社会的生产方法，或社会的知识程度是。

历史观本身亦有其历史，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倾向。大体言之，由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人生的历史观，由精神的历史观进而为物质的历史观，由个人的历史观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由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历史观，多带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历史观，则多带进步的历史观的倾向。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则可称为新史观。

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纪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

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

中国自古昔圣哲，即习为托古之说，以自矜重；孔孟之徒，言必称尧舜；老庄之徒，言必称黄帝；墨翟之徒，言必称大禹；许行之徒，言必称神农。此风既倡，后世逸民高歌，诗人梦想，大抵概念黄、农、虞、夏、无怀、葛天的黄金时代，以重寄其怀古的幽情，而退落的历史观，遂以隐中于人心。其或征诛誓诰，则称帝命；衰乱行吟，则呼昊天；生逢不辰，遭时多故，则思王者，思英雄。而王者英雄之拯世救民，又皆为应运而生、天亶天纵的聪明圣智，而中国哲学家的历史观，遂全为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所结晶。一部整个的中国史，迄兹以前，遂全为是等史观所支配，以潜入于人心，深固而不可拔除。时至今日，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历史，犹有复活反动的倾势。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吾愿与治斯学者共策勉之。

今 与 古*

(一九二〇年)

宇宙的命运,人间的历史,都可以看作无始无终的大实在的瀑流,不断的奔驰,不断的流转,过去的一往不还,未来的万劫不已。于是时有今古,人有今古,乃至文学、诗歌、科学、艺术、礼、俗、政、教,都有今古。今古的质态既殊,今古的争论遂起。

有一派人,对于现在的一切现象都不满足,觉得现今的境象,都是黑暗、堕落、恶浊、卑污,一切今的,都是恶的,一切古的,都是好的,政治、法律、道德、风俗、诗歌、文学等等,全是今不如古。他们往往发伤时的慨叹,动怀古的幽情,说些“世道日衰”、“人心不古”的话,遐想无怀、葛天、黄、农、虞、夏的黄金时代的景象,把终生的情感心神,都用在过去的怀思。这一派人可以叫作怀古派。

又有一派人,对于现在及将来抱乐观的希望,以为过去的成功,都流注于现在,古人的劳绩,都遗赠于后人。无限的古代,都以现今为归宿,无限的将来,都以现今为胚胎。人类的知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扩大,不断的增加,一切今的,都胜于古的,优于古的,即如诗歌艺术,今人所作,亦并不劣于古人,所谓无

* 这篇文章曾于一九二三年二月在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过,署名李大钊。——编者

怀、葛天、黄、农、虞、夏，不过是些浅化初开的时代，并不那样值得我们的怀思与景仰，我们惟有讴歌现代，颂祷今人，以今世为未来新时代的基础，而以乐天的精神，尽其承受古人、启发来者的责任。这一派人可以叫作崇今派。

崇今派与怀古派间，往往发生激烈的论战。欧洲当十七世纪顷，关于今古优劣的比较，亦曾引起文学上的战争，此争绵亘约百年间，在法如是，在英亦如是。

今古的激战，于文学(特别是诗歌)为最烈，又最易引起公众热烈的兴趣。长于此等论战的人，又将其范围推广至于知识。许多人以今古的争论，为文学史上的枝节问题。首先以此等论争，为有更广的关系，而唤起人们的注意者，厥为孔德(August Comte)。

今古的争论，在思想上实有相当的意义，这是对于文艺复兴的衡轭一部分的反抗。崇今派立于攻击者的地位，想令批评主义由死人的权威解放出来。他们争论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现今的人犹能与显烈的古人抗衡否，抑或在智力上实劣于古人？这还包含着更大的问题，就是：自然已否竭尽其力？他是否久已不能再生脑力与元气等于他曾经产生的人们了？人性是否已经疲竭，抑或他的势力是否永存而不尽？

崇今派的战士，主张自然的势力永远存在，直接反对人类退落说，此说所以不能见信于人。崇今派的贡献独多，知识上的进步说获有一个最初的明确论证，实为今古的争论所唤起的结果。

今古的激战，虽自十七世纪初叶开幕，而在十六世纪末叶，已有一位崇今派的战士，首先跃起作崇今派的先驱。其人为谁？

即鲍丹(Jean Bodin)是。

鲍丹学说的重要,不在他的君政论,而在他企图立一普遍历史的新学说,以代中世时史学界流行的黄金时代说(Theory of Golden Age)。主张黄金时代说者,大抵以为古代有一个黄金时代,化美俗良,德福并茂,真是人间的天国;后来日渐堕落,由金时代降而为银时代,而铜,而铁;这就是说“世道人心江河日下”了。此说盛行于欧土中世神学者流,鲍丹独起而否认之。鲍丹认自然永是均一,拟想自然能在一时代产出黄金时代说所指的那个人那个境遇,在别一时代便不能产生他们,是不合理的。换句话说,鲍丹确认自然动力永在与不灭的原则,以为在一时代所能产生的人或境遇,在别一时代亦能产生。从人类的原始时代以后,人间的光景有很大的变动,设使他们之所谓黄金时代可以召唤回来,而与现今一为比较,现今反倒是金,他反倒是铁,亦未可知。历史是由人的意思造成的,人的意思是永在变动中的,无论俗界教界,时时刻刻有新法律,新装束,新制度,随着亦有些新错误涌现出来,但在这变动不居的光景中,亦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来,就是震动的法则(Law of Oscillation);一起一仆,一仆一起,拟想人类永是退落的,是一个错误;倘真如此,人类早已达于灾害罪患的穷途,而无噍类了!人类不但不是永远退落的,而且在震动不已的循环中,渐渐的升高,这就是螺旋状的进步;他们昧然指为金为银的时代的人,全去禽兽未远,由那个状态慢慢的演进,才有今日的人类生活、社会秩序。古人的发明,固然值得我们的赞誉,但今人亦有今人的新发明,其功绩与古人的一样伟大而重要。有了航海南针的发明,才能成就周航地球、世界通商的事业,由是而世界一家了。他如地理学天文学上的进步、火药

的发明、毛织业并其他实业的发展，都在在与全世界以极大的影响；即单就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而论，已足以抗颜古人而无愧。

继鲍丹而起者则有倍根 (Francis Bacon)。倍根对于古人表相当的尊敬，并且熟于古人的著作；但他认古人的权威，于科学进步上，是一致命的障碍，故亦努力于解除古人权威的衡轭。他以为真理不是于任何时的好机会中可以寻得的，真理的达到，全视经验与他们的经验所限制之如何；在他们的时代，时间与世界的知识均极有限而贫乏，他们没有千年的历史足当那个名称，不过是些传说与口碑罢了。除去世界中一小部分的境界与国家，他们全不熟悉。在所有他们的系统与科学的想象中，难有一个单纯的经验，有助益人类的倾向的。他们的理论，是立在意见上的，从而科学在最近两千年间，静止的停留；而立在自然与经验上的机械的艺术，则渐长而增高。

倍根指出 Antiquity 一语迷误的义解，他说我们称为古代而那样常与以崇敬者，乃为世界的少年时期，真值得称为古代的是世界的老年与增加的年代，就是我们现在生于其中的年代。论世界的年龄，我们实是古人，那些希腊人、罗马人比我们年少得多，如同我们看重一个老年人，因为他的关于世界的知识，比一个青年人的大。所以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盼望由我们自己的时代，得到比由古代所得者更多的东西；因为在我们自己的时代，知识的储藏为无量数的考察与经验所增积，时间是伟大的发明者，真理是时间的产儿，不是权威的产儿。

印刷术、火药、罗盘针三大发明，是古人所不知道的。这些发明变更了全世界的情形，先文学，次战争，最后航海，引起了无数的变迁，影响及于人事，没有比这些机械的发明再大的。或者

航海及未知地的发见，与倍根以感印者，比与鲍丹者多。

倍根认地球通路的开辟与知识的增长，为同时代的产物。此等事业，在今世大部分业已成就，晚近的学术，并不劣于从前两个学术上的时代——希腊人的时代、罗马人的时代。希腊、罗马及现在是历史上三大时代，希腊、罗马为世界上文教法度最昌明的国家，但在那些时代，自然哲学亦未有何进步。在希腊是道德的、政治的空想吸收了人们的精神；在罗马是沉思与努力都耗用在道德的哲学上，最大的智力，都贡献于市民的事务。在第三期，西欧民族的精力，又都为神学的研究占去了。古初实在有些最有用的发明，到了冥想与理论的科学的开始，这等有用的事业就停止了。在过去的人类史上，许多事物的进步是迟缓的，不定的，偶然的，人如能觉察过去的发明的错误而求所以免除之，现在很有确固的进步的希望。

倍根认循环说为知识发展上最大的障碍，每致人们失所信赖与希望。进步之不确定与不继续，全因偏见与错误妨人致力于正轨。进步的艰难，不是起于人力所不逮的事物，而基于人类的误解，此误解耗费时间于不当的目的。妨阻过去的过失，即是创辟将来的希望。

但他的新时代将来的进展是否无限，他于此未加研考。

今古论战的舞台虽在法兰西，而此问题实为一个义大利人所提起。此人为谁？就是那首著名的描绘当时叙事诗人讽刺诗（*La Secchia rapita*）的作者塔桑尼（Alessandro Tassoni）。他喜于暴露他的时代的偏见，而倡言新学说，他因为攻击 *Petrarch*、*Homer*、*Aristotle* 诸人，在义大利招了很大的诽谤。最早的古今人功绩的比较发见于《*Miscellaneous Thoughts*》，这是他

在一六二〇年刊行的。他说此问题是当时流行的争论事件。他对此争论，于理论的、空想的、实用的各方面，立一透彻的比较，与以公平的裁断。

有一派人，主张艺术依经验与长久的工夫能致完善，所以现代必有此利益。塔桑尼对于此说首先加以批评，他说此理由不甚坚固，因为同一的艺术与学问，不永是不间断的为最高智慧所追求，而有时传入劣者手中，所以渐趋退落，甚且至于消灭。例如罗马帝国衰亡时的义大利，当时有很多世纪，觉艺术降在平凡以下了。换句话说，只有假定没有连续的断裂，此说当可承认。

他作出一种比较，以明他不是任何一方的拥护者；他许古人以星星点点的优越，同时今人在全体上远胜于古人；他所考察的范围，比那些自限于文学艺术的争论者广，文化的物质方面，甚至于服装，均在他所考察的范围内。

他所著的《Thoughts》一书被译成法文，此书恐已为白衣士罗伯(Boisrobert)所及知。白氏是一位剧学家，以曾参与创立法兰西学院(Academie Francaise)为人所知。忆一六三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此学院既成，他即刻当着那些集众讲出一段议论，猛烈的恶口的攻击Homer，这一段议论在法兰西煽起了争论，并且引起特别的注意。Homer自经塔桑尼攻击以后，成了崇今派集矢的特别鹄的。他们以为，假如他们不信任Homer的主张能够贯彻，他们便可以得到胜利。

当文艺复兴的时期，希腊人、罗马人的权威在思想界极其优越。为便于促进自由的发展，此权威非大加削弱不可。培根及其他诸人，已竟开始了此种伟大的运动，以期廓清摧陷此等虐力。但是笛卡儿(Descartes)的影响愈益严重，愈益坚决，他的

态度愈趋于不易调和的程度，他没有一点象倍根的对于古典文学的尊敬，他颇以忘却幼年时曾经学过的希腊文自夸，他的著作的感化力，乃在对于过去严格的完全的打断，并一个完全不借重于古人的组织观念的系统。他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发明的基础上，期望将来知识上的进展，从而他认知这个智力的进展，将有很远的效果及于人类的境遇。他最初名他的《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以“一个可以提高人性到完全最高度的普遍科学的设计”。他视道德的物质的改进，为对于哲学与科学的倚赖。

根据世界现今是较为高龄、较为成熟的见地，是认对古人独立的态度，已竟成了很流行的观念。倍根、笛卡儿并许多受笛派影响的人们都是这样。

巴士库儿(Pascal)是一位科学家而改信笛派的理想者，表示的尤其明显。他说，当那么多的世纪间，人类的全联续，应看作一个单独的人而不断的生存，不断的学问；在他的生活的每一阶段，此普遍的人，为他在从前的阶段曾经获得的知识所惠利，而他现在是在老年时期了。

对于责笛氏以对古代思想家不敬的人们，他曾为答辩，说他拒否他们的权威，便是还他们以模仿的敬礼，便是按照他们的精神，做比那些一味奴隶的随从他们的人们好得多。巴氏又说：待遇我们的古人，比他们所示以待其先辈者益加隆敬，待遇他们以一种他们值得受自我们的不可信的隆敬上，因他们未曾对那些在他们上享有同样利益的人们与以那样的看待。天下宁有比此还不公平的事么？

巴氏亦承认我们应该感念古人，因为我们在知识的增长上

能优于他们。他们已达于一定的点，使我们能以最少的努力跻于最高的程位。所以我们自知我们立在较高的平面上，少艰难亦少荣誉。

最优越的崇今派，便是那些同化于笛派理想的人们。白衣士罗伯的议论出世后好些年，圣骚林(Desmarets de Saint Sorlin)又起来作崇今派的战士。那时他已成了一个梦想派的基督教徒，这也是他痛恨古人的一个理由。他和白衣士罗伯同是劣下的诗人。他说基督教的历史贡给些文辞，比那些曾为 Homer 及 Sophocles(希腊悲剧诗人)所论的，很可以感动一个诗人。他有几首诗是战胜 Homer 的示威运动。约在同时，在英兰亦有一首叙事诗响应圣骚林的争论。

圣骚林已略知此问题含有更广的范围。他说：古代不是那样的快乐，那样的有学问，那样的富裕，那样的堂皇，如同现代一样；现代实是成熟的老年，正如他是世界的秋，得有所有过去世纪的果实与战利品，并有力以判断先辈的发明经验与错误而利用之；古代的世界，是个只有少许的花的春。固然，“自然”在一切时代都产生完全的事业，但他(自然)关于人的创造却不是这样，这必须要改正；那些生于最近时的人们，在幸福与知识上，必超过以前的人。他的话里含有两个要点。一为自然力永在的断言，一为现代比古代有益，正如老年之于幼稚一样的观念。这是倍根诸人所曾经论过的。

圣骚林拥护今人的挑战引起了白衣卢(Boileau)拥护古人的迎敌。圣骚林濒死之前，很郑重的以为今人战的责任托之于一位青年，此位青年名叫帕劳耳(Charles Perrault)，即此可以看出今古的争论如何激烈了。

路易十四王朝时的法兰西，一般的气压很于崇今派有利。人们觉着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可与罗马帝国最初的皇帝奥加士大(Augustas)的时代比美的，没有什么人发出“我生不辰”的叹声。他们的文学的艺术家，若 Corneille、若 Racine、若 Molière 合于他们的嗜性那样的强烈，所以除了第一位，他们不愿给他们以别的等位，他们不耐听那希腊人、罗马人进到不能达到的优越的断言。Molière 说：“古人毕竟是古人，我们是现今的人。”这可以表示当时一般的感情了。

一六八七年帕劳耳以《路易大王的时代》的名称，印行他的诗歌。现代的启蒙，优于古代，是他的论旨。

帕氏对于古人取比圣骚林更为有礼的态度，而其批评论尤巧。他说，希腊罗马的天才，在他们自己的时代都很好，或者可以使我们祖先崇为神圣，但在现今，柏拉图宁觉可厌了；而那不能模仿的 Homer，设若生于路易大王的朝代，当能作更好的叙事诗。在帕氏诗中，有确认自然的永远势力在每一时代产生同等才能的人的语句。

《路易大王的时代》，是一个简短的信仰宣言。帕氏接续着又发表一篇澈底的著作，就是《古人与今人的比较》，是在一六八八——一六九六年间以四部分出现的，艺术、雄辩、诗歌、科学及他们的实际的应用，都详加讨论了。他以二人对话的形式发表这个讨论，这对话的人们，一为热心拥护现代的战士，他作崇今的论战；一为拥护古代的献身者，他是一个明知难以否认他的反对者的议论，犹且顽强的固执他自己的见解。

帕氏认知识与时间经验以俱展，完全不是必须伴随古代的；最近的来者承袭了他们先辈的基业，而加上他们自己的新获

得。

这后人较善、来者胜今的前提，似与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不相容：在知识上、艺术上，我们优于黑暗时代的人们，这固当承认，但你能说第十世纪的人们是优于希腊人与罗马人们么？塔桑尼已经涉及此问题，帕氏答此问题曰：“一定不能”，因为联接中常有断裂的原故；科学与艺术同于河流，他的进路的一部潜流于地下，忽而开发奔流，向前跳跃，其丰沃与在地下跳跃一样。譬如长期的战争，可以迫制人民们蔑视学问，把所有他们的元气都掷于自保的益觉迫切的必要，一个无知的时期可以延续，但随着平和与福祚，知识与发明，将重行开始为进一步的发展。

他不主张今人在才能上或脑力上有何优越，在《路易大王的时代》中，他确认自然不朽的原则，自然犹且产生象他曾生过的人们一样伟大的人，但他不能产生更伟大的人，非洲沙漠的狮子，他的狞猛，在我们今日并与在亚历山大大王时代没有什么区别。一切时代，最善的人在气力上是平等的，但他们的功业与作品是不平等的，若与以同等的势便的情形，最近的是最好的，因为科学与艺术，都靠知识的积聚，知识必然的与时俱增。

但此论能用之于诗歌与文学的艺术么？诗歌与文学的艺术界，是交战者（帕氏亦包在内）最有兴味的范域。此可证明现代能产生些诗家文学家，其优越不亚于古昔先师，但此能证他们的事业一定超于古人么？此驳论逼得帕氏不得脱逃，而帕氏答复则颇巧妙：娱人心情是诗歌与雄辩的职分，而欲有以娱之，必先有以知之，是否洞察人心的奥秘比洞察自然的奥秘较为容易么？或者洞察人心的奥秘费时较少么？关于人心的情感与念望常作出些新发见，只以 *Corneille* 的悲剧而论，你在那里可以寻得比

古代书籍的更微妙更细致的关于野心仇怨与嫉妒的映绘。在他的“比较论”的结尾，他宣言今人的普通的优越的时候，他为维持平和起见，论到诗歌与雄辩，暂作一个保留。

帕氏的讨论，陷于缺乏体现完全的进步的观念，他不只专注意知识上的进步，但他不注意将来；对于将来，没有什么兴味；他受最近的过去知识上的发展感印甚深，故他几不能悬想再有更益向前的进步。他说：“试读英法的报章而一察那些王国的学院的出版，将使你信最近二十年或三十年内，在自然科学界作出的发明，比遍有学问的古代的全期都多，我自己想很幸的知道我们所享的幸福，考查所有过去的时代，在那里我们可以看见一切事物的生长与进步；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一种事物没有受过一个新的增加与光采的；我们的时代，在些种类上曾达到完全的绝顶，从有些年间以后，进步率很迟，想到差不多没有很多的事物可以使我们羡慕将来的时代是很可喜的。”

对于将来的冷淡，即是关于将来的怀疑，是上述语句的注释，而与世界已达于他的衰老时期的观念相合，故吾言帕氏的知识进步的观念，尚不完全。

于法兰西以外，英国亦忽然起了今古的论战。

一个神学家名叫黑克威尔(George Hakewill)刊行了一本六百页的书，以诘责当时普通的错误——宇宙衰朽的错误。他并他那呼吸在十六世纪气压下的书，全为人所忘却，他虽刊行了三版，而除些神学家外，难能引起多人的注意。著者的目的，在证明在世界的政府里，上帝的权威与天命。这与当时流行的见解不相容，当时流行的见解，就是物质的宇宙、天体、原子，均渐趋于衰朽，并那人于物质的、精神的、道德的各方面，正在退落的见

解。他的议论多获益于读鲍丹、培根诸人的书，可见他们的思想已经激动神学家的精神了。

一个今古间的比较起于衰朽说的拒驳，与自然力确固的问题起于今古间的比较，一样是自然的结果。黑氏反对过分的推崇古代，正为此说可以助世界衰朽说张目。他所讨论的范围，比法国争论者的较广；他所争论的范围，不止含有科学、艺术与文学，并及物质与道德。他求所以证明精神上物质上没有衰朽，并那现代基督教国的道德，大优于异教时代的那些国家，基于基督教有社会的进步，在艺术上知识上亦有发展。

黑氏亦如塔桑尼研考一切艺术与科学，断定今人在诗歌上与古人相等，其他诸事，亦都能超越古人。

他认退落说可以腐痹人的元气，世界普遍衰朽论，销沉了人的希望，钝滞了人的努力的锐利。他的言外的意思，是改良世界的努力，为我们对于后人所该尽的义务。

他说：“于是我们不要为世界定命的衰朽的虚影所阻拦，以使我们既不后顾那些可敬的先辈的楷模，又不向前预为后人谋。如我们先辈有价值的预为我们谋者，使我们的子若孙，亦以预为之谋者颂祝吾辈。如何的世代将以延续于我们，尚未确定，亦如未来的世代之在前世之于那些先辈一样。”

黑氏想他生在世界的末年，但他不能延长多久，是一未决的问题；但他有一个考虑可以慰安他自己并读者，就是世界的终结，尚未临近。

自然不衰朽，人类不退落，固可确认了，但那世界的终结，不依自然法，并那人类文化的发长，任在何顷，均可为神的命令所斩断的学说，其足以销沉人的希望，钝滞人的努力的锐利的影

响，亦并不小。

黑氏持论的意义，在把阻碍进步学说的退落说，弄成一个特别研究的问题。他的书揭明此说与关于今古争论间的密切关系，不能说他与鲍丹、倍根诸子关于文明进步的理论有所增益。他所企图的历史的普通综合法，全与他们的相等。他说明知识艺术的历史与此外一切事务，如同纵览一种循环的进步；他说他们都有一个发生、滋长、繁荣、废落与萎谢，于是经过一个时期后，又有一个复苏与再兴；以此进步的方法，学问的光明，由一民族传到别一民族，由东洋而希腊，由希腊而罗马，既已为蛮人所不见者千有余岁，而又为 Petrarch 及其当代人所复活。黑氏所陈循环进步的观念，颇与倍根所指摘的循环说相近。

倍根及十七世纪的思想家，自限其过去进步的观察于知的范围内，而黑氏对于古代的仪容道德，不惮与以攻击，能预见这社会的进步较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必要来到十八世纪阵头的。这是黑说值得我们注意的点。

黑氏的书出世以后，我们又得到格兰威尔 (Glanvill) 所著的《加的过度》(«Plus ultra»), 又称《亚里士多德时代后知识的发展》。此书于一六六八年出版，宗旨在拥护成立未久的“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该会在当时颇受攻击，谓为有害于宗教及真实学问的兴趣。格氏愤古典派对于皇家学会的压迫，乃起而树拥护的旗帜。他说他对于无名的罗盘针的发明者的感佩，比对于一千个亚历山大与恺撒，一万个亚里士多德的感佩还深且多。在这几句话里，可以看见他的精神了。

他说皇家学会的职分，就是企图人类的设计，置在自然的最深底蕴那样低，达到宇宙最上层那样高，扩张到广大世界的一切

变化，目的在普遍人类的惠利。那样一种事业，只能以不能知觉的度数，慢慢的进行。这是一个累代的人均与有关的事业，我们自己的时代，只能希望作一点点，以移去些无用的片屑，预备些材料，安排些东西，以备建筑。我们定须寻求与搜集，观察与考验，为将来的时代预储一个积聚。

神学的考虑，曾经重压过黑氏的思想，而格氏则显然未为所困惑。看了二人的不同，便可以看出这四十年间世界进行的经路了。

斯普拉特 (Sprat) 是一个牧师，他于格氏的书出世以前不久，出版一本《皇家学会史》。他认科学可以扩张于世界，此事全靠西方文化扩张其地域，基督教国的文化亦可扩到其他文化国及半开化国，他希望将来的改宗者，可以有青出于蓝的优越，希腊人胜过他们东方的先师，现代欧人从罗马人承受了光明，而幸福繁昌，倍于古人所遗留于他们的。

皇家学会建立于一六六〇年，科学院建立于一六六六年，使物质的科学，在伦敦与巴黎很流行。各阶级，都为此流行的情感所激起，若骑士，若圆颅党，若牧师，若清教徒，都联合起来，若神学家，若法律家，若政治家，若贵族，若世爵，都夸扬倍根哲学的胜利，倍根播的种子，终究成熟了。那些建立与赞美皇家学会的人们，对倍根有完全的信用。考雷 (Cowley) 上皇家学会的赞歌，可以名为赞扬倍根的赞歌，亦可以说是人类的精神，由权威的束制解放的圣歌。

我们很高兴的写这一篇崇今派荣誉的战史，我们很感谢崇今派暗示给我们的乐天努力的历史观人生观，我们不要学着唱那怀古派“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

下”的诗歌，应该朗诵着耶马孙的名言：“你若爱千古，你当爱现在，昨日不能唤回，明日还不确实，你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当明日两天”，为今人奋力，为来者前驱。

鲍丹的历史思想

(一九二〇年)

鲍丹(Jean Bodin, 1530—1596)为法国政治学者,兼历史学者。承继文艺复兴期而以《国家论》开始近世社会学的研究的是他,在法兰西首先倡始历史哲学的研究的亦是他。鲍氏精研政治哲学,当世实无伦比,至少在孟德斯鸠未生以前未有能济及之者。所著《国家论》(Republic)六种出版于一五六七年,为他的最大杰作。主张君主政治,反对马基亚威理主义(Machiavelism),是其政治主张的特点。自马氏以迄鲍氏,其间才杰不作,法国学术界呈销沉之象者已久。至于鲍氏,正值法兰西历史上多事之秋,实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纷争扰攘变革迁移的运会。此等纷争与变革,导深思之士以入于政理的研究,殆亦自然的趋势。盖至此时,法国学术界,已有渐次复兴的景象。其时名家辈出,类皆穷思殚虑,以政治与社会为所研治的主题;然解喻之明,探索之深,预见之验,未有如鲍氏者也。

鲍氏的《历史方法论》(《Historic Method Methodus ad facilem historiarum cognitionem》)出版于一五六六年,亦是他的很重要的著作,其余历史哲学研究者的趣益,实越《国家论》而上之。但此既非历史哲学,亦非为历史哲学置其基础者。如此书之所自白,这不是历史哲学,乃是研究与领会历史的方法。

是书出世，去马氏之死，已四十余年矣！他的眼光及方法，与马氏迥乎不同。鲍氏思想的范围，比马氏广；马氏的精神，只集中于政治学说，而鲍氏学说的重要，不在他的主张君主政治的政治论，而在图立一普遍的历史的新学说，以代中世所流行者。

十六世纪，遍乎全欧，有一研究历史的兴趣普遍的觉醒的征象。此征象维何？即有些关于历史文艺的著述出世是也。中有少许，在鲍氏论著未出以前，即已问世。最早者，如 Mylaeus 的《Theatrum scribendae historiae Unimversae》则于一五四八年在 Florence 出版了。最广行而有趣味者，如 Patrizi 的《Della Storia dialoghi X》则于一五六〇年在 Venice 出版了。自兹以还，经十六世纪乃至几乎全十七世纪，此等著作的潜流，继续未已。至一五七四年顷，《Pensns srtis Historicae》已出版于 Basle。是书由十八篇关于历史的文著合集而成，其中除去二三例外，皆为属于十六世纪者。鲍氏论著，所与当时其他历史方法不同者，不在原则，亦在企于只在于其实用的指导中含有科学价值的考勘而已。其目的仅在教人以历史应如何在秩序的、独立的、有利的状态中以为研究，不在寻找一种科学，更不在竭力作成一种科学。以此种事业，至极艰钜，即有天才，亦惟在情境足以助其成功的时遇方能为力；而其业之底于有成，亦惟赖以精诚专一之力以自效而企于致之实行也。虽然，吾人于鲍氏论著中，盖亦不无有趣益于治历史科学者之理想之可寻焉。

《方法论》初成，首卷即冠以绪言一篇。鲍氏于此，即论历史研究的容易、娱快与有利。那样历史的颂辞，其在当时，几成为一时的风尚，此风至少至一百五十年后，尚流行而未已。一六〇九年，Casanbon 的《Polybius》的绪言，或者今尚为人所忆及，此

绪言把荣誉主要的归之于其拉丁语法的功绩。此等颂辞的实在现存的价值，只是时代的征象于其中表现出来罢了。但此等颂辞，颇能示吾人以由如何的动机，以如何的希望与旨趣而为之者。十六七世纪的人们对于历史的著述与研读这样的热心，鲍氏及其时人对于历史这样的热心，不是为的说明历史的运动或确定历史的法则，乃是为的于其中寻求智力的受用与实际的指导、文学的与学问的资料，尤其是道德的与政治的生活的助益而已。换句话说，他们认知历史的智识，不当作科学的积极的本质，但以之为达历史本身以外某种目的的工具而已。所以鲍氏信历史的研究为容易，虽为错误的见解，但此不足以惊骇吾人；因此为当时历史的作者、读者共有之流行的迷想也。一旦人们开始充分的实现历史上最高的真实的要求，他们便即刻停止作那关于历史效用的颂辞了，同时他们便知道历史的真实是最难达到的了，然在鲍氏之世，尚未达于此境也。

《方法论》包有十章，他在此书中，与我们以人类史的性质与位置的说明。历史原是以真实的描写与叙述表现出来的。历史得分为人类、自然、神明三者，人类史以人为其主题，亦如自然史以物理的世界为其主题，神明史以上帝为其主题者然。再明白一点讲，人类史的材料是人们的自由行为，此行为一语是最广义的，包含所有人类的智慧言行。人类史特有的形象，是他的主题不断的在变迁中；而上帝与自然，则毫无变迁。他们永是一样，而人类史则无一刹那停留在一样的状态中的。此种历史的根本物质，即是不断的变动，与人以一种“没有贯澈历史的原则，在历史中没有秩序可寻，象宇宙间其余的现象和他种的智识一样”的信念。但此信念，虽为旧有而普行者，然此终为错误的。因人

是一个精神与一个躯体联合而成的，是一个永在的精神浸入于物质中的。所以经由物质的影响，虽在人的行为中，有许多纷混与矛盾；但在行动中，亦有些永在的原则表示一种与神性有关的精神。此等原则，是人所能喻解的。或者有人想没有在人类史中寻求是等原则的必要，因为此等原则乃在神明史中最易直接的为人所喻解者；但此说非是。不从人类起以达于神明，而由神明以降于人类，以求理喻，是颠倒了研究的真秩序，而执终以为始。人当以研究自己肇始，而渐跻于最高至极之本原；因人是一个灵魂与躯体，精神的与物质的复合的生物，所以他的历史，与自然及上帝的历史并有关联；由地理学与自然有关，由宗教与上帝有关。人的历史家，必须审慎的说明人的复杂的组织与关系，溯寻人的历史如何依精神的与物理的势力为上帝与自然所影响。那么于一个能使人满足的人类普遍史的达成有二种科学，实为必要：天地学(Cosmography 包含星学、地理学、地质学)与普通的或比较的宗教科学是。

鲍氏论研究历史，当依先总纲后特目的次序进行。由普遍史的简约的观察，渐至他的各部分的详澈的研究；如斯作去，各部分相互间的关系，各部分与全体间的关系，均能认出无误。

鲍氏自觉的实认史律的存在，他觉得历史实为律法所贯澈。他的此种信念，实得力于法律的研究。此等研究，致其研究思索的精神，无一俄顷不在历史；同时明认法律与历史自始至终应联为一体，不可分开；倘或将其一与其他的全体分开，则二者之任何一方，都不能圆满了解。他在最初，在刚刚献身于历史方法的时候，便自奋而指导并宣言反对那些自命为哲学的法理家，而且自限其全体的注意于罗马法者。他自己发大愿所欲为的是一个

哲学的法理家，而不象 Cujas 只是一个拉丁原文解释者。他攻击那些有声闻的他的同代人的狭隘，不象 Hotman 所曾作的那样甚，为实用象为科学的真理一样。他说即使怎样完全与充分，罗马法的研究，于法律的部分的解释以外，不能更有所与于吾人者。使罗马法与普通法一致，或为其标准，是荒诞的事。于此有一普遍法焉，于普遍法中，一切法典，皆有他们的根柢与理论，这些法典，不过是些属于普遍法的部分的多样的表示。欲达到此法则，须谘询于法理家，同样亦须谘询于历史家，于二者间固不应有所轩轻，以使波斯人、希腊人、埃及人、希伯来人、西班牙人、英吉利人、日尔曼人，均可在罗马人旁，觅一相当的位置。此普遍法的观念，其智识只能经由一个整个的历史的方法的研究，方可达到者，今则集中于鲍氏；而在我们的法律家深思的考虑上，即其最普通的形式，斯亦为尚待促进者也。鲍氏所曾说明之者，只为最普通的形式，例如自然法与人为法间的概念，任在何处亦未明晰的分别为彼所引出。他把人事的经行是一个秩序的行程，或为自然的、道德的所限制、所执律的发展一点看得很清楚，但他的历史法则的概念或含有任何一定的意义的法律的概念则极暧昧。

欧洲中世时，史学界盛行一种“黄金时代”(Golden Age)说。为此说者，大抵以为“世道日衰”“人心不古”，常发些伤时的慨叹，动些怀古的幽情，遐想古代有一个“黄金时代”，化美俗良，德福并茂，真是人间的天国；后来日渐堕落，由金时代，降而为银时代，而铜，而铁，这就是说“人心世道江河日下了！”此说盛行于欧土中世学者流，而皆以丹捏尔(Daniel)的预言为基础。他们把历史的径路分为四个时期；即是巴比伦(Babyloniau)、波斯(Pers-

ian)、马基顿(Macedonian)与罗马(Roman)四王国最后者,持续到末日裁判为止。鲍丹于此,另行提议一种分期法。他把历史的径路分为三大时期:第一是东南方民族占优势的时期,约经二千年之久,以基督的诞生终结;第二是中部民族即地中海一带的民族占优势的时期,为期亦约二千年,以条顿人的侵入终结;第三是北方民族推翻罗马而在文化上为导领的时期。三个时期,依于三方民族心理上的特性而各有其特色:第一的特色是宗教,长于知识与聪慧的艺能;第二期是实用的智慧,富有政治的能力与商业的活动;第三期是战争与产业或发明的技能。这个分法,实足以预见黑格儿(Hegel)的综合法。(黑格儿的分法是[一]东洋的,[二]甲希腊、乙罗马,[三]日尔曼语系的世界)他那最有趣味的点,乃在人种的考察,地理与气候,亦算在内。这便是鲍氏的唯物史观。鲍氏的全体说明,虽有粗荒之嫌;而其混入占星术的议论(Astronomical argument),亦足证他没有全脱神学的影响;但在历史研究上,总算开了一个新步骤了。鲍氏否认黄金时代说的理据,乃在他认自然永是均一,拟想自然能在一时代产出黄金时代说所指的那个人,那个境遇,在别一时代便不能产生他们,是不合理的。换句话说,鲍氏确认自然动力永在与不灭的原则,以为在一个时代所能产生的人或境遇,在别一时代亦能产生。从人类的原始时代以后,人间的光景有很大的变动;设使他们之所谓黄金时代可以召唤回来,而与现今一为比较;现今反倒是金,他反倒是铁,亦未可知。历史是全靠人的意思而成的,人的意思是永在变动中的。无论俗界与教界时时刻刻都有新法律,新装束,新制度;随着亦有些新错误涌现出来。但在这变动不居的光景中,我们亦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来,就是震动的法

则(law of oscillation)。一起一仆，一仆一起，拟想人类永是退落的，是一个错误；倘真如此，人类早已达于灾害罪患的穷途，而无噍类矣。人类不但不是永远退落的，而且在震动不已的循环中，渐渐的升高。这就是螺旋状的进步。他们昧然指目为金为银的时代的人，全去禽兽不远，由那状态慢慢的演进，才有今日的人类生活，社会秩序。鲍氏又说，一切知识、文学、艺术，都有他们的变迁；他们的变迁的经过，就是兴起、增长、繁荣、衰颓，乃至死灭。罗马崩颓以后，随着一个休息的时期；经此期后，随着一个学术的复活、智力的产生，开往古未有的新局。古人的发明，固然值得我们赞誉，但今人亦并不是仅仅放点燭火以补古人的日月照临之所不及的。今人亦有今人的新发明，其功绩与古人的一样伟大而重要。例如有了航海南针的发明，才能成就周航地球、世界通商的事业，由是而世界变为一家了。他如地理学、天文学上的进步，火药的发明，毛织业并其他实业的发展，都在与全世界以极大的影响。即单就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而论，已足以抗颜古人而有余。

鲍氏确认历史是整个的一个进步的径路。他在他的《方法论》第七章里，即论此特殊而永久的势力的要旨。这第一部分，是论那预言家(Daniel)的“四王国说”无论怎样解释都可(鲍氏自言一切解释，他都不满足)，但这断不是历史是一个智力的、道德的退落的、长径路的意思。比四王国，不论什么都可以指，但他们断不是象有些人所提示的蛮荒的古代四个世代。本章的自余所论，乃为驳斥基于四个世代的荒渺无稽的历史发展的见解。此种见解，乃谓人类是在不断的退落的运动中的，由金时代退到铁时代，时境愈益艰难，善愈荒而恶益著。鲍氏谓此与《圣

经》的历史，大相矛盾。《圣经》的历史之所垂告于吾人者，若洪水，若 Babel 塔（古时巴比伦人所造的塔，将以上通于天者，工未竟而中止），等等，为时乃如彼其遥远也；由所谓黄金时代的异教诗人及神与英雄的荒诞传说者之所报告于吾人者观之，那个时代，似曾为真实的铁时代；许多在希腊、罗马盛时所流行的残暴不公的习惯，渐渐的显出他们真实道德的光明了；基督教之广被兹世也，亦挟其方在化育世界的新道德以与之俱来；即彼蛮人的侵入亦可以被看出，是曾实行一个天命的意志；逮乎今世，象罗盘针、印刷术那样的发明，亦能应吾人之要求而有所成就；又曾发见了一个新世界，大大的改进了天文学、自然史、医药及产业；凡此种种，皆足见历史的经过，全是进步的径路。鲍氏把那些人类不断的退落论者（那些怕学术、人性、公道方达于从大地上消灭以回转于他们固有之天的人们），比于病苦凄惨衰懦的老年人，他们自己的疾患的重负，导引他们相信自从他们的少年时日以后，世界已经丧失他的一切德、美、善了；又比于那些舟子们，当舟由港向洋海出发的时候，他们会幻想着这是岬与山岭，房子与城市，正在向后退回了。

鲍氏认在过去有一普遍的进步，此观念决非新创，就是耶比库鲁派(Epicureans)旧有的观念。惟自耶比库鲁(Epicurus)哲学失了生存以后，多已消灭于兹世矣。鲍氏于此，又多考察了一千二百年间的新变化。

本鲍氏之说而推之，将来的进展，亦必依震动的法则而与过去及现在，等在进步的运动中；将来的新发明，新发见，亦必不减于既往。但鲍氏立论，只限于过去及现在，并未推论及于将来的变动，特未为世界末日等说的幻影所迷蔽已耳。

一个伟大理想之生成建立也，其进行必极迟缓，经久而始臻于完成。今鲍丹把普遍于过去的进步，认识的如彼其清楚，而任在何处，独未确认在未来中亦有进步；以现代之读者综其理论之全程而观之，似应含有此确认，且必须有此确认，而竟无之；不惟无之，抑且有些语句（此等语句，固然极少，而且暧昧而非决定的），表示一种信念，宁可以说是怀疑，谓人事或将回转于其所自始，或将以周环轮转（固然含有螺旋进步的意味）；在不知伟大理想之生成建立如何迟缓者，必且以为奇怪；然若稔察历史之遗迹，则知后之视昔，今人之所平淡无奇而能知之为之者，而在古人，则必经几何世代，几何穷研，而始克达于兹境者，盖往往而然也。以鲍丹察知过去之明，而未见及将来，亦此类耳。盖鲍氏之说，只于过去为公允，即彼几为所有宗教或哲学的改革家所误解、所诋诽的中世，彼亦极尊重之；而独于未来，则漠然看过，终以其业留待三十年后有一位更伟大的人物出，以完成进步之说而补鲍丹之所未及。斯人为谁？即培根（Lord Bacon）是也。Bacon 最不公允于过去，而专注其深感大望于将来，与其当代伟人声闻学业足与伯仲如笛卡尔（Descartes）其人，同为轻蔑古代世界，而惟注其目光于新世界预言的光景之照耀于其前者。鲍丹之注重过去，亦犹培根之注重未来，皆能窥见半面的真理，分之则得其一偏，合之则得其全体；必二子之相待，而后进步之真理之全，乃以大明于兹世。呜呼，何其巧也！

鲍氏不自足于仅陈普通的观念而止，更进而以解明实在的事情为鹄的；他不自止于抽象，且进而试为说明实体；他于复杂的史象中，寻求那些原因，并努力以追溯那些原因的动作。他特别的努力以明二类原因的影响——物理的与政治的原因。

他在《方法论》的第五章中，及在《国家论》的第五卷第一章中，论物理的原因，均极详备。风土有一种影响于一民族的品性，地理与一个民族的历史间有一个一定的适应，其事至明；所以在远古之世，即能为人所察知，而 Hippocrates、Plato、Aristote、Polybius、Galen 辈，陈述此等事实，亦皆能明确乎其言之。然以彼辈之物理的境遇创造与限制民族性的原理的普通陈述，与鲍氏之竭智尽能以求应用之广漠众多之事例者同日而语，则又失之不平矣。

鲍氏既分民族为北方的、中部的、南方的，他乃以异常周备的知识，研究风土的地理的情状，如何影响于他们的住民的体力、勇气、智力、人性与贞操，简言之，即精神、道德与态度，与夫山岭、风候、土壤的差异，与于个人及社会以何影响。他提出数多普通的见解，其中固有许多是虚伪的，亦有许多是真实的。

有为鲍丹与孟德斯鸠之比较者，如 Hallam 之所云，则仅谓鲍氏在《国家论》论风土的章中，与孟氏有些类似的地方。此种论评，于鲍氏一方，殊觉稍欠公允。若谓孟氏《法意》由十四卷至十八卷中间所主张的论旨之一半，已经写在鲍氏论风土章中，或尚为符于真实也。《Ibn khaldun》可以除外，因鲍氏不娴于他的著作；鲍氏之所附益于其前人者，视孟氏之所成就为多。设若二人之时间的间隔，与夫必的积聚相当智识的机会之不同，为人所记忆；鲍丹关于此问题的议论，必当被认为二者中之最显著者。即使精巧不如孟氏，而缜密则与之等，同时亦必不以晦昧了此伟大的真理见责。此伟大的真理者何？即人是自由的，依他的为道德与教育所益固的自由，能抵制外界的作用力也。

鲍氏关于政治的原因运动的知识，得自亚理士多德者颇多。

但他纳用深邃的思想家锐敏的观察者之所教，而能免于为他们的奴隶；他能由他自己的反省，他的历史的娴熟，他的多变的躬逢的阅历，在他们的学说上，扩而充之增入些新道理；所以他能不失他自己的独立的地位。他分政治为民主政治、贵族政治、君主政治三种，并试为指出每种政治的特色与情状，以示他们怎样的起原与发长，怎样的强大与固结，怎样的衰落与废灭。他把革命与无政府分别的很清，革命是由一种政治到别一种政治的变革，而无政府则是政治的废灭。因为政制的各别的形式有三，他于是寻出革命的类别有六，每一种政制能变成两种别的政制。所有各种革命，可以起于些不同的原因，亦可以用种种方法防阻，至少亦可以延缓。他以细心与洞见，研究革命的、反动的多样的原因，他以判断力的高深，任在何处，都不为占星术的迷信引导他失了正路。

为考他的关于物理的原因的见解，《方法论》第六章，亦须与《国家论》第二、三、四卷对读；因为前者可以说是后者的摘要（*résumé*）。

在别一方面，《方法论》所可引起历史科学工作者的兴趣的，是在第八、九两章中，有 Dugald Stuart 所谓推测的或理论的历史的样本。第八章，是世界的起原与时间的世代的研究；第九章，是民族起原的研究。鲍氏把此种研究过于看得重要，至少亦错认了他的正当的位置，至谓历史起原的真实观念，是一条只有他能导吾人以通过历史的迷阵的线索。但此观念，全是暧昧的必须留在最久的不能说明中的。论到他所施用的研索的方式，亦只是可赞者半可讥者半而已。

鲍丹亦论到研究语原学的价值，谓遇有关于那些事实，或无

文书可稽，或仅有虚伪荒诞的纪载；则语原学的研究，颇足为考证事实之一助。

鲍丹主张世界将有一个终结，并且指出证明于大数学家 Copernicus、Reinhold、Stadius 所与的信地球将在一个时间的经过，落在太阳上的理由。

鲍丹之世，距倍根(Rogor Bacon)已三百年。此三百年，可称为人文主义(Humanism)的三世纪。虽经三世纪间反抗中世主义(medievalism)的努力，而其流风所被，犹有存者。加以由文艺复兴成就的希腊人、罗马人的权威，虽未实行，而已重压于如鲍丹一流的不踌躇的自由，以批评古代作者的思想家。故当其周虑以图寻得一解释普遍历史的线索，彼乃为过去的遗物，神学的并宇宙的学说所束缚。当他研讨科学和文学的时代的衰颓，他便提议那当是基于上帝的直接行动，以责罚那些恶用有益的科学于人类的残毁的人们；他指明世界的起原，乃为上帝在恰好的时候自由的创造，谓摩西的说明是真实的，谓世界必须在九月中被创造，历史上最大事变，亦皆发生于九月中。

鲍丹的冥想，是特别为占星术的信念所混合而成者。这种占星术的信念，虽经 Petrarch、Aeneas、Sylvius、Pico 等一流人文派的努力，以明其不足征信；而巨乎文艺复兴期间，许多优尚的或则自由的思想家，犹且重被其影响。鲍丹于此，是 machiavelli 和 Lord Bacon 之流亚。但他不满足那星象影响人事的学说，而别寻一解释历史的变动系受数的影响的键；再兴 Pythagoras 与 Plato 的观念，而自立一方式以出之。他列举许多名人的生存期，以示他们可为七与九两数的力量所表示，或为七与九两数的产物。还有别的有效能的数，如十二等数是。他举出很

多的例，以证这些神秘的数决定帝国的生存期而为历史年表的基础。例如东方王国(Oriental monarchies)的存在期，由 Ninus 到亚历山大王(Alexander the Great)征服波斯，共有 1728 年，其数等于 12^3 ；又如罗马共和国由罗马建立到 Actium 战役共有 729 年，其数等于 9^3 。明达如鲍氏，虽致疑于独断的宗教而犹不能自脱于轻信星术之神秘，信乎其时代的不合理的偏执之力之大也。

从那样一种信星数而带有神学影响的学说的人，似难觅出进步的影子；但就他的星数的历史的解释，鲍丹亦算把历史置于与宇宙的他部分最相接近的地位，建一个全世界是被建立在一个神的计划上各部分，依此亲密的互相关系的学说。但他很谨慎的避免宿命主义(fatalism)。他说历史大部分是基于人类意思的。他较他以前的一切人与进步的观念愈益接近。我们若把他那占星术的与 Pythagoras 派的冥想，并那些不足以累其学说的神学的插句，排除净尽，他的著作，实在可以表示一种新历史观。此新史观，抱乐观主义(Optimism)的态度看人类在地球上的境遇，而不管将来的命数如何。

鲍氏的历史观，有三大特点，于后来进步论的发长上，有很重要的关系：(一)他否认人类退落说；(二)他主张今决不劣于古，而且优于古；(三)他认地球上的人民都有相互共同的利害关系。这个概念与古代希腊人、罗马人的“世界的观念”(ecumenical idea)相合；而经过许多现代航海者的发见，又添了些新兴趣。他屡说世界是一个普遍的国家，各种种族各依他们的特别嗜性以贡献于全体的公善这个人民的合同的概念，实为进步论发长上的重要原素。

鲍丹的新历史观，在史学上的贡献，如此其大，我们不能抹煞他的伟大的功绩，而于研索唯物史观起原的时，尤不可遗忘了此人。

鲁雷(Louis Le Roy)的历史思想

(一九二〇年)

鲁雷氏(Louis Le Roy)法国人。为古典学者，译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甚夥。在所著《宇宙事物的变化》(«On the Vicissitude or Variety of the Things in the Universe»)中，亦陈与鲍说类似的见解。他考察历史上的陈迹，谓战术、雄辩、哲学、数学、美术等，在一时代，盛则俱盛，衰则俱衰。他们终不免于衰落，人间事物不是永久的。一切都是经过一样的周环——兴起、繁昌、完成、衰颓、终结的周环。但此不能说明世界中帝国的连续。繁昌的景象，在殊异的民族间，递更代嬗。鲁雷归其原因于天命的安排。他信上帝注意到宇宙的各部分，而分配文化武功的优越于各方各族，使之相代而兴，不使独偏于一隅。由亚而欧，而美，而非，令道德与罪恶，知识与愚昧，相代而旅行于各国。让他们都享过幸运与噩运，没有一个长享繁昌而自诩其为天之骄子者。

他说西欧的现代，全与过去的昌明时代相等；有些方面，现代尚较为优越。差不多有所曾经丧失约千二百年的古代的，自由的，并机械的艺术，都被回复。并且于些新发明，特别是印刷术、罗盘针，乃至火药（但此与其说是为人类的利用而发明，宁似为毁灭而发明，与印刷术、罗盘针不同。然其及于人类生活的影响，实不减于二者）。我们的天文学与天地学(Cosmography)的知

识，都超越古人，我们可以肯定现在世界全体人类一切种族，都能相与闻知。他们能互易其物品，互供其需要，如同市，就是世界的国家(World-state)的住民，于是财富乃大有增益。

鲁雷虽把盛衰代序的原动归之于天命，而能自逃于悲观以转于乐观。主张我们应尽人力之能事，把过去曾经成就的繁昌转运过来，而且超越之。知识是无穷尽的，我们不要那样简单信古人能知能言一切物，而一无所遗于其后裔。就是说自然把良善的秩序都给古人而遗后世以荒野。他于此取鲍丹氏“自然力的永在”的原理。他说自然在现在能产生伟大的聪智，与曾经产生者一样。原素有同一的势力，星位依旧，人质全同。古代能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现代一样能产生此类人物。

他对于史学上的贡献，有三要点，全与鲍丹相同。就是一、世界未曾退落；二、现代不劣于古典的古代；三、全世界的人种现在形成一个世界共和国(Mundane republic)。

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历史思想

(一九二〇年)

十七世纪中,法兰西的史学名著,首推包绥(Bossuet)的《普遍史论》(«Discours sur l'Histoire Universalle»)。是书出版于一六八一年。包绥曾为法国皇太子(Dauphin of France)的教师,故此书乃为授皇太子而作者。包绥是一位笃诚的信者,信《圣经》,信教会,崇拜皇帝为偶像,为独裁主义的拥护者。凡《圣经》之所垂告,彼皆深信而不之疑;故其思想绝不能超越于其时代以上,而有涉及将来的预见。他把权威看得过高,把自由看得过轻。他作朝廷的官吏,作牧师,作得太多;作平民,作市民,作得太少。他解释历史,始终以《圣经》为秘键,纯为一种宗教的历史观。他的《普遍史论》,包含着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创世以远迄于夏烈曼朝历史事变的编年的分期;第二部分,是真实宗教的程途的撮要;第三部分,是帝国兴衰的考察。他在他的著作第一部分里,把历史分为十二期:第一期,由亚当(Adam)的创造起(B. C. 4004);第二期,由诺阿(Nôah)的洪水起(B. C. 2348);第三期,由亚布拉哈母(Abraham犹太人之祖,见《圣经》)的招请起(B. C. 1921);第四期,由摩西(Moses)律法的授与起(B. C. 1491);第五期,由特雷(Troy小亚细亚西北部的一个旧城)的占领起(B. C. 1124);第六期,由娑罗门(Solomon Israel王)庙的供奉起(B.

C.1004); 第七期, 由罗马的建立起(B.C.784); 第八期, 由塞拉斯(Cyrus波斯王)的谕旨犹太的恢复起(B. C.536); 第九期, 由加太基(Carthage)为席飘(Scipio罗马的将军)所略取起(B.C.200); 第十期, 由耶稣的诞生起; 第十一期, 由康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罗马皇帝)的国家采用基督教起(A.D.312); 第十二期, 由廖教皇(Pope Leo)为夏烈曼(Charlemagne)举行罗马皇帝戴冠式起(A. D.800)。他又把这十二期缩约而为七代: 第一代以亚当始; 第二代, 以诺阿始; 第三代, 以亚布拉哈母始; 第四代, 以摩西始; 第五代, 以娑罗门始; 第六代, 以塞拉斯始; 第七代, 以耶稣始。把这些期(epoch)与代(age)又总括而为三大世(great-period); 摩西以前, 为自然法期, 是为第一世; 由摩西至耶稣, 为成文法期, 是为第二世; 耶稣以降, 则为天惠期(Period of grace), 是为第三世。他的分期, 纯按《圣经》之所示就Israel人的幸运为标准。他的《普遍史论》的名实不符甚远, 观此可以瞭然。其论宗教的径路与帝国的兴衰也, 亦皆以《圣经》为宝典, 而以天命为归, 乌足语于历史哲学之价值乎?

迄于兹时, 历史中一定的秩序与统一, 为基督教的天命论最终原因论所寻出; 至十八世纪此原则又为唯理主义所推翻; 于是史学界遂有一大革命的运动的酝酿。此种运动, 乃须于历史中寻出秩序与统一的新原则, 以代基督教的旧原则。科学的进展, 全赖物理的现象服赖于不变的法则的假定; 历史亦然, 假使有何等结论由历史中引出, 则关于社会现象的类似的假定, 亦所必须。果也, 在十八世纪中叶, 此新研究的线路, 即于是乎肇开, 以导向社会学、文明史、历史哲学而进也。现代社会科学最显著的著作如孟德斯鸠的《法律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 及于人

兰诸国,以期熟悉是等诸国的风俗、制度。由一七二九年十月,以迄一七三一年八月,他滞居英伦。一七三四年,他的《罗马兴亡论》(«*Considérations sur la grandeur et la décadence des Romains*»)出世。此作或可视为《法律的精神》的一部分,因为他的幅帙过长而分离出来的。他自成一个既那样的完全,又有那样性质的殊异,则分别刊行,亦良为适宜。这是我们所有的孟氏的唯一严格的历史著作,因为那《路易十一世史》(«*Histoire de Louis XI*»),即使已经完全,未遭回禄,至少亦尚未为吾人所觅获也。这并且是第一部著作,于其中曾为一绵密的企图,以指出事变与历史的径路,如何为物理的与道德的原因所决定者。即至今日,在罗马史的优胜的趣味所奋兴的无数研究中,斯犹为其最显著者。凡能注意到前此诸作之论同一题目者,均能看出此书的创造力也。关于《罗马史乘》人可充分的和他与马基亚威理(Machiavelli)、韦柯(Vico)之所教者对照,但人不能充分的以之与马、韦二子之所教者相比较。Saint-Evremand与Saint-Réal皆可提出少许的观察之为是书所含有者,但彼等似未曾为之,彼等至多亦不过仅与以少许耳。包绥的大方案,在他的类形上,或可较之孟氏的方案为更可赞美;但此为迥乎不同的类形,其所取之观察点,不在历史中,而在超越乎历史以上也。固然,在吾人知识之现状,《兴士论》关于事实的陈述与夫所有一切的说明,均不能为吾人所承认;然即使是书的特别罪过,更有远逾乎此者,一个希世的史学上的功绩与价值的产生,亦正未可以此泯后也。

十六年后,《法律的精神》出现了。在是书的题辞里,把他的缘起叙说明白。此种制作的秘密,已披露于其绪言的数语中了:“我曾屡思着手于此作,而旋即弃去者屡矣,我曾掷此书成之叶

于飘风中者不知其几千次矣，我恒觉我累世相传之技能即此而衰矣。我曾随从于我目的之后而未制成一种计画也，我不曾知有规绳与例外也，我曾寻得此真理而旋复失之也；但当我一旦发见我的原则时，凡我所寻求者皆陈于我之前矣。经过二十年之久我才见我业之开始、长成，向完全进展而终结矣。”他的二十年间之辛劳，其结果盖有以卒偿之而致其辛劳于不虛者。《法律的精神》之作，固不止于十八个月间经过二十一版，享当时瞬间的流行；不止在当时发生了伟大而有利的实际的影响；其巨大论题的论述的绵密、透澈与天才，在足以促进而移易科学莫大之艰难的少数著作中，固将永留一高贵的位置也。虽然，犹不能逃于偏刻者之肆其讥评，此孟氏的光华的讽刺的《Défense de l'Esprit des Lois》之作，所由不获已也。是书出版于一七五〇年，此后遂无复重要之著作矣。一七五五年二月十日，卒于巴黎。

关于他的创造力，议论纷纷，言人人殊。平心论之，孟氏实禀有一种最有价值的创造力，此种创造力可以使一个人从最有变化的渊源中引出独立，按他自己的—种计画，些个原则与为他自己的一种目的，用彼之所获得。他实在有亚理士多德与亚当斯密史的创造力。亦有人焉，致疑于孟德斯鸠的学说，多得自韦柯，而自隐匿其责任。但此种怀疑，适以证其于此等著者均未深知。孟德斯鸠或可以读过韦柯的著作，韦柯的《新科学论》（《Scienza Nuova》），当孟氏在意大利时，或已入其手中；抑或嗣后又从学于其友The Abbé de Guasco 以期知习此书；此虽皆无佐证的推测，然亦非不可能也。即令彼实曾读过此书，而彼之所得于此书，即此书之所影响于彼者，亦甚有限。他的最重大的缺点，正是那些关于韦柯的精审的研究可以移易之者；今孟氏最重大

的缺点，固依然未或移易，是知给韦柯在历史科学上一种殊荣的位置的思想，即使于孟氏有所闻知，而亦并未为彼所了解，不生影响于其著作也。实则谓孟氏实有负于韦柯的全体议论，皆基于关于由政体析分那使之发生的事实与使之施行的原则，韦柯实在孟氏以前的事情。此一思想家的理论，为另一思想家所先见，实为极明了的事实。奉韦柯以何等荣誉，皆可以此为依据；而由孟氏一方言之，固不能执为剽窃附会之证也。而况以此言责任，则责任之范围亦复甚广；凡古典的作者，十六世纪的新教徒的小册子作者，如 Hotman、Languet 等，Bodin、Charron、Machiavelli、Gravina、笛卡尔及其学派，洛克与别的美国的作者，特别是关于政治的，乃至物理学者、旅行者等等，将无不在孟氏对之所当负有责任之列也。

孟德斯鸠的大作(«Magnum opus»)的称誉，足以表示此著的中心的与贯彻的概念。此著是企于发见法律的精神，说明他们，迹寻他们如何关系于风俗、气候、信条、政体等；这是一种在所有的先景中，尽他们能被观察的量度，去观察他们的企图，如此以明他们如何发生，如何受限制，如何活动于私的品性上，家庭的生活上，社会形式与制度上；简言之，即如此以显露他们的完满的意义也。于此可以看出此概念与包绥的概念全不相同。包绥用一个神学的学说开始，试以示全历史如何曾为此说的例证；他以一个不是他取自历史的学说，而此学说乃为彼所引入于历史中而作为一种说明的原则者出发，这实大异于孟德斯鸠。孟氏不主张不属于历史的学说，而以历史的事实本身开始；而以在大地上不是现在有的，便是曾经有过的人为的法律开始。他求着纯粹的当作那么多历史的事实去说明那些法律。这两种概念

间的差异很大，限于科学所关的范围内，孟氏的概念视包氏的概念进步远矣。由科学的言之，包绶的方法，是植端的错误；而孟氏的方法，在当时他所达到之境，可谓善矣。

孟氏如何苦心孤诣以成此概念，并实用此概念呢？他曾以伟大的成功与能力，在各种方面去这样子作。他有一种为历史本身的历史的纯爱，一种特殊的历史的洞见；他有一种静穆，无偏执，公平的心。他以感情与判断的大量与温和著称，此种大量与温和，同时不曾排除一个为人类福利的热心，给他以他的题目所需要的观察的广，固及公平的明晰。与孟氏同时的人们，大抵都有一个公共的过误，偏私，哲学的分派，因为轻蔑他们，或为达一党一派的目的，往往颠倒事实，此为其时代的通病。独孟氏中此时弊最少，故至少能达于纷纭众多的社会现象的近似的说明。

虽然，终有一个危险，横在孟氏面前而卒未能逃过；这一个艰难，孟氏终究未能越过，就是太把法律看作孤立的事实，看作独立的现象，看作静止的与完全的存在了。这是不但不知道一个法律对于别一法律的关系，并且不知道一个法律的阶段对于别一阶段的关系，并且不知道法律的每一阶段与系统，对于宗教、艺术、科学与产业的共同存在，及同时代的阶段与系统的关系。社会现象如法律者不能如自然哲学与化学的纯粹物理的现象以为说明。他们所有的最殊异的特质，存于他们的不断的演化或发展的能力；惟有依他们的演化的研究，依他们的相衔接的情状的比较，并那无情状和社会的共同存在的普通情形的比较，我们才能合理的希望达到一个他们的法则的充分的智识。于此我们找出孟德斯鸠的弱点来了。

孟氏最勤于事实的搜集，而有异常敏捷的直觉以喻此等事

实的意义；但他没有适当的科学方法，没有历史现象特殊性所致必要的演绎程序的限制之一定解释，他少用或不用那是历史哲学的方便者，这即是共存的与衔接的社会情状的比较。他恒少注意或竟全不注意于他的事实的编年，然此是那些事实的比较最要紧的条件。其故乃在于他不曾注意比较那些事实之重要，经由他们演进的全程，以溯迹他们之重要。换句话说，这点是他想建立一种科学，而不自求助于只有由他科学才能建立的惟一的方法。虽此于其系统成为其所研治的一类社会现象的完全说明为不幸，然严责孟氏以错误，亦殊为不公。因为鲍丹在此根本上，固然曾有更绵密的，更哲学的观察；而同时吾人亦允宜谅解十八世纪的任何一人，斯因其未喻。盖比较立法的科学之最完全者，与宗教的比较研究相类，同为十九世纪之创造也。

缺一个真实的研究的方法，除去任之于偶然的机，孟氏斯不能发见联接诸事实的普通法则。历史的法则是发展的法则；吾人设若不解任何事实的发展，将永不能发见此法则。此事实之成为现在，即依此法则而来者也。然则孟氏所曾发见者为何？不是这些事实的普通法则，乃是这些事实的一些一定的特别理由。虽然忽视了社会现象的殊异的特质，而斯则在一定的程度，于孟氏为可能。一个普通法则之所不能达者，一种智力在其直觉上若彼其锐敏，或尚可以看出于一种势力或多种势力中，某项一定的法律与习惯有他的渊源；而此即孟氏曾为之而以希有的程度告厥程功者也。他的认识的迅捷思想的醒快熟悉于人类活动的活动，他的关于历史、旅行、自然科学研究的广博，皆足与彼以异常的推测力，而致彼能达于在一大批事例中社会的用法与法律的近似的说明，他人于此，固将束手也。虽然，推测的材能，

纵极高妙；亦未有能供给科学方法的地位或引出非最卑微的历史哲学者。即令偶或可遇，如于孟德斯鸠者然；而其饶于一种真理者，亦终不免又饶于幻妄；即或常能捉住真实，亦将同样自欺以冥想也。只有一个完全无疵的方法，其力乃足以统一一贯，辨别真妄；此于孟氏之例，即足以完全证明其中之富于伪妄，与正确的推论正复相等。盖皆真妄互见，其量维均，凡于孟氏著作有严正的研究者，殆不否认此说也。

缺乏研究的科学的方法，亦为是书安排错混，结构紊乱之源。固亦有人焉，不承认此缺点。既经拒否此缺点存在，且更进而赞誉此种方法，实简而大。但此只以证明他仅在表面上研究孟氏著作而已。有一种松缓的外部的秩序与一种秩序的显现，但他所有的秩序都是外表的，而混乱却是内部的，而且彻头彻尾，都是如此，故考查亦不能寻得结果。那些思想是并置的，不是组织的联结的，因他们曾纯为勤的搜集与暗示之丰饶所积聚，非为科学的方法所表明与集合者。

科学的方法的缺乏，及其以零屑的孤立的现象待遇法律与习惯的结果，并他们对于特别原因而非对于普通的法则的关系，把孟氏披露于最共同的责备之前。责他以事实与权利相混合，即以一事物的说明与其是认相混合。此之归罪，往往表示的过度。由大体观之，此事并无何种证据被罪孟氏，或未为见。那一句反复常言的话“当是”（“Ought to be”），是暧昧而可以驳拒的。然其意义，定非表示道德的、合理的必要；不过是一种恒在一个原因与其结果中间的实际的必要。虽然，他的研究的方式，倾向于归咎于他的严重的紊乱，彼恒不能自守审慎以离于陷入此紊乱的疑境也。

君主制的性质与结果,我们依归纳法以进行也可,依演绎法以进行也亦可。用归纳法,则必竭力以由一切君主制的考察于专属于君主制的性质中,综概其共通于君主制间者,而求得其通性;用演绎法,则必由一定义出发,此定义也,即体现吾人所假定为君主制的特殊性质,而逻辑的发展其所包含者。设取前法,则其归纳,必须充分的扩延而详审;若取后法,则其含于定义中的假定须正确,而其演绎亦必为严格的。此二种方法的结果,当一致以与相互的验证。但为为此,这二种程叙,须分别的清清楚楚。归纳之行也,必须别于演绎;而演绎之行也,亦必须别于归纳。理想的与经验的,除非他们相遇于一定的联合点——根本的实在,必不许相与结合。设使孟氏或是这样作,或是墨守于二个方法中之一,将永不能达到那样多的普通定理。以每个归纳的基础的延长,每个严重验证的努力,彼将察得那些定理中有许多无复存在的余地;从而知指出为政体之纯粹结果的特质,其事固极难也。孟氏的理论,大部分为由于假设的前提的演绎结果。他的推论,除去限于所假定的假设是符于事实者,纵令正当的引出,亦只有逻辑的而非实在的正当。他将自觉不能不严格的研究他们是如此与否,将迅速的认识像为他所说明的君主制、专制制、共和制等,只有一个理想的存在。他所下的定义,与他们所依据的分类,在过去的历史、在现在,除非是最遥远的,没有适合于他们的。这是因为他既不自守于归纳,又不能自循于演绎,只是由一程叙通过到别一程叙,或把一个程叙同别一个程叙以不合法的办法混杂起来,他所得的结论,所以如彼其易也。惟其然也,所以一方当他作些殆皆抽象的确认时,他能自信在他的叙述中抽出并集中人类立法的经验;一方把很狭隘的经验的统合,提到几

乎和必然的真理平列的地位。故把法国君主制的特殊性，变成君主制的根本的属性；把东洋的专制制的特殊性，变成专制制的普遍的属性；把希腊的共和国，变成共和制的普遍的属性了。

当孟氏论政治论到他们自己的本性并他们相互间的关系时，他未曾像亚理士多德与鲍丹，努力以溯迹他们的革命与变迁；他未曾陈述人性的总运动的理论，亦未曾尝试过普遍史的行程的任何考察。

关于政治的组织、市民的安固并租税等法律对于自由的关系，是十一、十二、十三卷的主题，是皆精心结构以为之者。尤以第十一卷特别用力，为其三权论——立法、行政、司法——应用于英伦宪法之解释也，为其英伦宪法之褒扬也。三权的普通理论，并为洛克(Locke)及孟氏所采自亚理士多德者。孟氏之应用此说也，或为洛克的《政论第二集》(《Second Treatise Concerning Government》)及在乔治二世(George II)时保守与进步两党(Whigs and Tories)的小册子所暗示；但洛克及英之两党中任何小册子的作者，均未曾作得那样明显。H. Janson 说孟氏之权论的渊源，为 Swift 的《雅典与罗马的贵族与平民间争轧论》(《Discourse of the Contests and Dissensions between the Nobles and the Commons in Athens and Rome》)，此见解亦错了。孟氏论英国宪法，并未替他的观念要求独创权；而大陆及英之作者，辄以是归之，而无所于驳难焉。Blackstone 在他的《纪录》(《Commentaries》(1765))里，Delolme 在他的《英国宪法论》(《Constitution of England》(1775))里，相继益张其说；以迄于今，仍为论英国宪法制者之所许。

孟氏之褒扬英宪，往往为人所误解，所虚诬。其褒扬不过仅

指其对于政治自由的关系，仅指其所作成的法律下的安固而已。孟氏曾有甚不赞成英人的政治、道德、荣誉的意见，并且注意到平等。拟想他以为政治的自由平等运用政治的组织便可获得，是毫无依据的。使孟氏或显或隐果曾教人以移植英宪于法国，足为法国的弊害的一个适当的救济者，则彼且犯最矛盾之大嫌矣。人为的制度与法律，是一个民族性的效果，而不是他的原因。希望由移植一民族的法律制度于人种精神的、道德的质性，历史的往例，与物理的境遇，异于是邦之他一民族，而能得有任何利益者，必绝无效果。是乃孟氏法理的、政治的学说的真正的神髓。

其次的四卷，论物理的作用的效力及于社会的制度及变迁。什么是那些其姿态最易于法律习惯中为一个没有好过孟氏所曾有的研究方法的思想家所指出的影响呢？这里只能有一个唯一的答案，曰：物理的影响耳。在影响及于人而范成他的运命的势力中，没有是那样显着的，那样明了的。孟氏求所以说明历史者，重要的即由这些物理的影响。文明如何为外界的行动所限制，一个民族的法律和那个民族的社会与道德的生活的成果，如何与温度、土壤及食物相关联，这于孟氏是根本的问题，他尽其全力以解决此根本的问题。

谓彼已经解决了这根本的问题，是无稽之谈。即至于今，物理作用及于人的发展的影响，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很不完全的一点。气象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人种学家，以及政治经济学家，在历史哲学家关于此大而重要的问题，将能宣告一个适当的断定以前，都还有很多要去发见的。孟氏所曾陷入的错误，似有主要的两点：他在物理的原因的直接与间接影响间，未曾引出断

然的分别,这是一个实在根本的分别。气候、土壤与食品的直接动力,恐植微弱,而其活动,亦极暧昧,人之知之也,亦微小而不明;或者即一个关于此的单独的普通肯定,因尚未有确乎成立者也。反而观之,那间接的影响,即物理的作用经由他们所激动的社会的欲望与活动的媒介以行的影响,则为极大。自孟氏以还,关于追溯此影响之所成就在者,殊非鲜也。例如在一方面,有地理知识的进步;在另一方面,亦有政治经济科学的进步。今皆容许吾人以孟氏之时所不能梦见者之透澈与明晰,考究地理的与经济的事实间的全范围与关系;而一切社会现象较高的类目,皆密切的与经济的事实相伴随,其理将无人能否认也。

适才所揭的错误,与他一错误相关联。那物理的作用的直接动力,很明显的是动力的必然的样式。这是离于意志的动力。在此动力中,人是被动的。反之间接的动力,则假定人的方面的一个反动,一个人性的发展,在些欲望兴奋之下,依活动的力量以适宜于他。此两种动力的形式的交混,斯易暧昧了人类自由的重大的事实,孟氏即蹈于此弊者也。固然,他亦明白的确认过他的对于自由的作用的信念,而亦拒辟过宿命论。但他在他的实用上,有时忘记了此种陈白。即使不曾简直的表明,至少亦曾常常的暗示过法律是风土的创造物的推论;又曾披露过人性在外的影响之下,是塑型的、被动的、远逾乎人性本然的实在;在凡此者,皆孟氏所不能告无罪者也。惟其然也,所以他表明那热带区域的民族,如遭刑制于物理的势力重压之下,而堕于无能免的奴僇与灾害也。夫物理的境遇之与热带国家的奴僇灾害,良有很大的关系,今已无容或疑;而外界自然丰伟可怖之所,自然乃易施压迫、腐痺、制御于人,而财富之不平的分配,过度的

空想，于社会有害的迷信的普行，亦受自然之赐而于焉以起矣。使此事而果然也，这亦不过为真理之半，此外尚有与之相关的真理焉。物理的势力之及于人类生活者，不是绝对的，而是关系的其种人之有益或害也，全视其所及于影响之人的财富与智识，尤其是元气与品德如何而定。那有罪过的，不曾是自然，而恒为人类。使其真理之半与其相关的真理分开，则实际上并那真理之半而亦成为虚妄矣。康必业说过：“在印度太大的，不是自然。不是自然他是过度了，而是人他是太小了，人他是太缺乏了。人没有什么他应当作，没有什么他愿欲作，一个相当的人的。他缺乏此智能，真理的爱，人身的威严的感觉，入于真实人格的组织中的道德的宗教的信仰，故自然之动作乃为人的仇敌。但若让人有这些智能等等，给他这些智能等等，自然将立即周旋于人之侧而供人之驰驱矣。除去限于人于他自己是一个仇敌外，自然决不是人的仇敌。”（见《M' Combie's Modern Civilization in relation to Christianity》pp.50,51）

在这些卷里，虽感有宿命论的倾向，而此改正的救济的真理，亦能不远而求得之。此真理被建立而应用于次卷。此卷明白的论关系于形成一民族的普通精神、道德、风俗等的原则的法则。蛮僇之民，于此种普通精神，或全属阙如，或仅稍与于一部分，结果将为物理的势力所左右，所决定，而莫能抗；若乃文明之民，则为一共通精神所普化，事实上这只是他的文明的全体的别辞罢了。此精神是民族生活的实体，是他们的行为的主要泉源。载着那些不知有此者和那些反抗乎此者沿着他的线路以行。除非徐徐为之，或由许多作用的辐辏，他是不能被变动的。法律所能对制他的，亦极微弱；而他却能很有力的影响及于法律，能使他

们(法律)被人敬重或被人蔑视。在此卷中,有此大原则的陈述、证明与多样的应用。此大原则是孟氏已经在《罗马兴亡论》里用很巧练的态度举过例证的。历史行程,全为普通原因所决定,全为广布而永存的倾向所决定,全为广而深的潜流所决定;而为单独的事变,有限的议论,特殊的制定,任何偶然的、孤立的各个事物,所影响者,实微乎其微,只在次副的附属的程级而已。这是一个开一新纪元的原则。此原则的承认,是历史科学可能的一个根本的条件。驳拒此原则,是无异于宣告那样一种科学是诞妄无稽;是认此原则,便是表明用必要的尽力,历史科学将不难兴起;依此以行,用此以行,即是努力于历史科学的组织。孟氏以其透辟的观察,澈悟此原则;以其后来未或能越过的天才与诚实表明之,于历史科学,实为一崇高的贡献。

其次四卷,于他们的对于法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上,论商业、货币与人口。此可与第十三卷论一国民的岁入、租税,与其国民的自由的的关系者对谈。此诸卷把经济的原素引入历史科学,不论这些卷里的经济论的误谬是怎么样,这已是一个绝大的贡献。把这个贡献的荣誉,归之于涂尔高(Turgot)、孔道西、桑西门、孔德诸人,未为允当。这个荣誉,当专归之于孟德斯鸠。固然,为的使归于他的荣誉不逾他所适当的分际,我们必须记取,当他著书的时候,经济科学方将活泼泼地植基于法兰西;Vauban、Boisguilbert、Dntot与Melon等,刊行了些关于经济学的著作;而Quesnay及其他有名的重农学派的创立者,亦多为其同时之人。事实上政治经济学,那时已经过经济学史上一个最有兴味的时期;这个时期,反映一个变革于社会本身的历史上,此种变革乃适应于一个伟大的国民运动,这就是法国的封建

的与神学的绊锁的打破，与跳向俗世的产业的政制的运动。孟氏论经济问题时，陷于数多误谬，而后来不久即被 Quesnay、Adam Smith 及他们的门弟子们明确的发露出来了；亦有数多真理未能观察清楚的，而后来不久即为他们明确的建立起来了。他在政治科学史上，占很重要的地位。但正值两类的经济的理想，两种制度，交混互遇，旧的未死，新的方生的时会。此于孟氏论商业、租税、货币与人口诸问题的观察中，所以发见许多矛盾与误谬也。旧原则与新原则，重商主义的原则与重农主义的原则，交相宰制于其心中，他于二者中不能作一个断然的选择。但他的智力的优越，即在经济学的局部中，亦明白的显露出来。他的关系于经济学的伟大而特殊的功绩，乃在他首先把经济的与历史的科学牵到一块儿，强他们在社会现象的说明中合作。他如斯以指出一条无尽的搜寻的新径路，陈于二种科学之前。

这两卷论宗教的信念与制度及于法律与政治的影响的，虽未能尽其论题之什一；而即在其论之范围内，亦见足称为明言达论焉。这两卷中的议论，承认宗教的必要与重要。反省与经验，提命孟氏觉出他早年关于此问题的意见与感情，缺乏公平与温和。与他的《Lettres Persanes》的口调的相对照，温暖的多，恭敬的多了。并且看出基督教的功绩，特别是他的贡献于社会的多大的。此二卷中的主要错误，与前卷论人口者同为关于实际者。

第二十六卷及二十九卷，关系于法理学者比关系于历史哲学的多。第二十七卷，是论罗马承继法者，是历史的，但殆无甚重要。

第二十八卷，论法国法律中民法的起原与革命。还有两卷论封建制度的，他的巨制，即以此终结。这亦是真正的有价值

的，其裨益于历史哲学者，亦不减于法律学者。虽然有许多事实与理论的错误，被指出于此两卷中；他们显出一种在孟氏时难得与希有的学术，并且显出一种在任何时代希有的历史的联合的创造与权威。他们有大影响于指导唤起研究法国中世社会与封建制度的起原、制作与组织，是无疑的。

孟德斯鸠未曾有建立历史哲学的志愿。象 Alison 之所为，宣称孟氏是历史哲学的建立者，是过度的赞美。即如 Comte、Maine、Leslie、Stephen 辈之所为，称孟氏为史学方法的建立者，亦似是言过其实的褒扬。他以大规模和最有力的方法指出法律、习惯与制度等，只有以他们实在是什么东西，以历史的现象被研究的时候，才能合理的被判断；指出他们当如本来是历史的一切事物不按一个抽象的绝对的标准，而以之为关系于一定时地将实体的实在关系于他们的决定的原因与境遇，关系于他们所属的全社会有机体，关系于他们所存在的社会的媒介受评量。柏拉图、亚理士多德、马基亚威理、鲍丹固皆当谆谆教人以历史的与政治的相对性；直到孟德斯鸠，才获见教化的欧洲承认此理。他的成功，大部分当归之于时代的成熟，但亦有几分是应归之于他自己的天才与技能，与历史的相对性一旦为人所认识；历史学派的崛起，历史方法的发展，乃至历史科学迅速的进步，自皆随之而起矣。

孟氏固未曾在进步论的使徒中点位置，进步论在他的心中未尝确立何把握，但他是在产生进步观念的智力的风土长起来的。他曾被养育于 Bayle 的溶解的辩证法，笛卡尔派自然法的陈述上的。他的著作所与的贡献，不是属于过去论的，乃是属于未来论的。

他企图着把笛卡尔派的理论伸张到社会的事实上去。他把政治的现象，同物理的现象一样，放在隶属于普通法则的地位。他既经认知此观念，他的最显著最重要的观念；当他著《罗马兴亡论》的时候（一七三四年），便即于其中实用此观念：

“我们从罗马史里，看出支配世界的不是幸运。有些普通的原因，动作于每个王朝中，兴起之，维持之，或颠覆之。凡所遭遇，都隶属于此等原因。设若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各同一个战争的偶然的的结果，曾经毁灭了一个国家；这里一定有一个使他灭亡的总原因，而从一个单独的战争结果了。简单一句话，本原的运动，牵引着特殊的事变随着他行。”

他既排斥了幸运，那么“天命”、“上帝的计画”、“最终的原因”等等亦当在屏弃之列了。而孟氏不能漠视的《罗马兴亡论》的效果之一，就是不信包绶的历史论。

他在《法律的精神》里，给我们以一个新原则，这就是普通原因的动作。但他只把道德的与物理的分清楚了，并没有把他们再细分类。我们实无保证他把道德的原因都枚举了没有；那些是本来的亦未由那些是取得的分清。孟氏给印象于读者的神智中最清楚的普通原因，是物理的环境——地理与气候的原因。

气候及于文明的影响，不是一个新观念。在现代我们所曾见的，如鲍丹，如丰田内列(Fontenelle)皆能知认之；如 Abbé de Saint—Pieire，曾用之以说明回教的起源；如 Abbé Du Bos，则于其《Reflexions on Poetry and Painting》中，主张气候辅助着决定艺术与科学的时期；如 Chardin，则在他的《Travels》（这是孟氏所曾研究过的一种书）中，亦曾觉得气候之重要。但孟氏引出一个对于气候的普通的注意。自他著此论后，地理的

情形，为所有的研究者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是一个最有势力的动因。他自己的关于此问题的讨论，未有什么有用的断案的结果。他没有决定物理的条件的动力的限度，读者不易知应视他们为根本的，抑为附属的；为决定文明的径路的，抑是仅仅搅乱他的。他说：“有好几个事物支配人、气候、宗教、法律、政治条令、历史的例证，道德、风俗，以什么东西形成一个普通精神 (*esprit général*) 为他们的结果。”这把气候与社会生活的成果平列，是他的无组织的思想的特色。但孟氏所去作的标点，是在指出一民族的法律与其普通精神间的相互关系；这个注意，是很重要的。这个点出一切社会生活的成果是密切的相关的理论。

在孟氏的时代，人们都在立法有几乎无限的力量，以限制社会条件的迷想之下。此例曾见之于 *Saint—Pierre*，孟氏的普通法则的概念，当为此信念的解毒剂。然而其效力及于他的同时的人，不为我们希望其所可有的那样多；而他们复利用孟氏说过法律影响于风俗的话，以张其所志。有些象孔德所揭论的，他不能给他的概念以何等的强固与气力，正因他自己亦在不自觉的过信立法行为的效力影响之下。

孟氏论社会现象的根本的缺点，在他把社会现象悬离于他们的时间上的关系。企于说明法律与制度对于历史的境遇的相互关系，是他的功绩；但他不曾分别或联结文明的阶段，如 *Sorel* 之所曾观察者，他颇偏于混同一切时期与组织。不论进步的观念的价值若何，我们可以赞成孔德的话，若使孟德斯鸠捉握住进步的观念，他必能产生一种更显赫的事业。孟氏之未捉握住进步的观念，亦孟氏之不幸也。

韦柯 (Giovanni Battista Vico) 及其历史思想

(一九二〇年)

韦柯 (Vico, 1668—1744) 南欧义大利人。千六百九十七年充修辞学教授, 颇著声誉。但他的学问的特点, 却不在修辞学, 而在其具有哲学的说明历史学的伟大的学力。他不只是历史哲学的先驱者, 简直是历史哲学的创造者。晚年的生涯, 纯是有光荣的历史学者的生涯。千七百三十四年, 为拿波利王室的史料编纂官。

他的名噪一世的著作, 是《关于国家的普通性质的新科学的原理》(《Principi di una nuova scienza d'intorno alla comune natura della nazioni》, 1725)。他的论文, 有经Ferrari为之说明而刊行者, 《Vico, Opere Ordinate ed illustrate da G. Ferrari, Milano.》(1852)便是。此外尚有 Ursuni-Scuderi 著的《晚近社会学创造者韦柯》(《G. B. Vico Come fonbatore della Sociologia Moderna, Palermo》1888), 义大利近世社会学泰斗 Cosentino 著的《社会学与韦柯》(《La Sociologia e G. B. Vico Savona》1899) 等书。而 Gumplowicz 著《社会学原理》亦于社会学的历史篇中, 认韦氏为先驱者。足征韦氏在近世社会学者界实占重要的位置。经济学者塞利格曼(Seligmann)于

所著《历史的经济的解释》中，亦称韦柯与孟德斯鸠是十八世纪许多主张外界对于人类事业有莫大影响的著作家中最著名的。

在义大利的社会学先驱者中，其社会学思想堪与孔德并驾齐驱者，得罗马诺西 (Romagnosi)、谷拉齐亚 (Grazia)、韦柯 (Vico) 三人。罗氏的社会学说中的《文明论》，实足以凌越基左，而与孔德比肩；谷氏发表历史三期说，足以唤起孔德的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实理的三段时期说。

孔德亦认韦柯于社会学有深远的造诣，是知二人的学说间必有共同的点。韦氏之为哲学的考察，不忘以历史的人间经验事实为其征验，与孔氏排斥神学上的存在与形而上学上的先天实在，纯征人间的论理性与人间经验的事象，而立关于人类社会的哲学的系统，实相符合。

韦氏为新立人类的科学，即社会的科学，所采用的方法为归纳法；而以经验派在义大利学界比重要的位置。Espinas 批评他说：“韦柯采取的方法，与笛卡尔氏采取的方法全相反对。由来欲建设社会诸科学，必从抽象的几何学的观念演译；至于韦氏，则全然相反。他从历史学、文献学所给与的实证的材料归纳，努力以图建设关于社会的新科学。”

Espinas 在所著《义大利经验哲学》，寻求经验哲学的根源于义大利，同时并觅社会的探究于义大利，而列举经验哲学派多家，韦柯亦在其中。

韦氏为经验哲学派。其专门的造诣，乃在历史，故能开拓历史哲学的新方面。韦氏曾说：“经验的知识比反省先进。”可见他非常的重视经验的征验力。他对于从来的哲学，极不满足。他说：“从来缺乏把人类历史与人类哲学合而为一的科学，哲学家

个文明时代。罗马帝国的瓦解与蛮人侵入而后，随着即是中世，在中世中，但丁当了何美儿的地位。现代的时期，以其强盛的王政，适合于罗马帝国。这是韦柯的反复的原则。使此理论而澈底，他的时代的文明，必仍废弛以归于半化，其周环又将复始，亦为应有之义。但他自己未曾直接的陈白此断案，或敢于为何等的证明。

他的学说很容易适用于进步的概念。在他的周环中，适当的时期不是一致的，不是实在类似的。不论何等相似的在都可被发见于早年希腊或罗马与中世社会间；但那不相似的点，益加繁多而明显。现代文明，在根本的方面，远大的方面，都异于希腊与罗马。假定普通的运动，把人重复带转回去，重复回到他所出发的点，是诞荒无稽。所以设法韦柯的反复说有何等价值，这只是指社会的运动可以视为螺旋的升高。故每一向上进步的阶段在一定普通的情状，适合于曾经被妨害的阶段。此种适合，是基因于人的心理的本质的。

一个此类的概念，在韦柯的时代或其次代，不能为人所领会。他的《新科学论》，放在孟德斯鸠的书库里，未曾用之。但在后来的法兰西，自然要发生兴趣了。因为德国的理想的哲学，那时在法兰西惹人注意；而观念学派的法兰西人，亦正在那里如韦柯本人一样寻求一个综合的原则以说明社会现象。虽韦柯的论点像他的方法一样，均异于德国的理想派；然他的想像，总有些是和他们的相共同的。以必然的决定行程的阶段的心性说明历史，是双方相似的。韦柯与他们不同的点，在德国思想家，求他们的原则于逻辑，而应用之由因以到果；韦柯求他的原则于实体的心理，从事于劳苦的搜索中，依历史的实际的与件，由果到因

以建立之。但是双方的想像，都提出人类发展的行程适合于精神的行程的根本的性质，不为天命的干与或人类意志的自由动作所移于一侧。

孔道西(Condorcet)的历史思想*

(一九二〇年)

孔道西在《法兰西百科全书》编辑者(Encyclopaedists)中是一少年,当时在断头台威胁之下为拥护人类进步的历史而奋斗。

孔道西是涂尔高(Turgot)的友人,并且是为涂氏作传记的人。孔氏以进步的观念的眼光开始为文明史的设计,受涂氏的暗示不少。他的原则,差不多都能在涂氏的学说里去寻。但这些原则,于孔氏都有些新意味;他为之附翼,为之加重,为之说明。涂氏是在考究者的沈静的精神中著作,而孔氏有所言论,则挟预言家的热情以俱来。他在死亡的影下豫言。他于一七九三年,在潜身匿迹之中,能写出一部乐观的《人类精神进步的史景撮要》(«Sketch of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oman mind»)。

孔道西是《百科全书》编辑者中的一人,而为《百科全书》编辑者的精神所贯澈。他对于基督教的态度,全与服尔泰(Voltaire)、狄岱鹿(Diderot)相同。涂尔高待遇其所领受的宗教笃恭笃敬。孔道西则认天命,虽其所让与于天命的领域,不过是一种文化发展的名誉主席,他是不加影响于议事录,可以消灭的;而

* 这篇文章曾题为《孔道西的历史观》,刊登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上,署名李大钊。——编者

其论到基督教的任务与中世文明，他的观察点与其朋辈的观察点间实有所差异。

这两个思想家间较为重要的差异，与两人著作时所处的环境不同有关连。涂氏不信有猛进的变更的必要，他想在现存制度下确固的改良于法兰西足为惊叹。革命以前，孔道西亦同此主张，但不久此主张便为他的热情所扫尽。美洲自由的胜利，反抗奴制运动的扩大，均足以提高他的自然的乐天主义，巩固他的在进步的教义上的信诚。

他自感生逢不辰，辄以方在孕育的将来自慰。彼时太阳将照耀于只有自由人生存除去理性无所谓主人者的大地，暴虐者与奴隶，僧侣并其愚蠢而伪善的器具，将一切归于消灭。他不仅以确认开明与社会幸福的无限进步的确定为满足；他自进而想出其本质，预示其方向，决定其标的，而强要辽远将来的探索。

他的奢望的设计，用他自己的话说出，就是要指出“人类社会上不断的变动，一刹那间所做出的及于次一刹那的影响，并那这样子不断的改正中人种向真理与幸福的前进。”这种设计，是不能实行的。其不可能，几与有人宣言欲为罗马英雄恺撒 (Julius Caesar) 着一由生到死的详细的生涯日记一样。他用那样的语言，陈述他的目的，适以显出他对于限域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的限制没有了解；就令他认出一个最合式最实用的纲领，他亦不能实行之。然而他的公式，则颇值得记取。

孔氏分文明的时代为十期，就中第十期，实潜存于将来。他不承认他的分类和他的新时代，在重要上不是同等的。而他的历史地图的排列，是以企图不依政治上的大变动而依智识上的重要步骤标其级段著称的。最初三期——原始社会的形成，继

之以牧畜时代,又继之以耕稼时代——以希腊的拼音文字终结;第四期,是希腊思想史,迄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时代科学上有限的分类;第五期,智识进步,在罗马统治之下,而遭逢蒙昧的厄难;第六期,是黑暗时代(dark age),一直继续到十字军兴;第七期的意味,是在人类精神上为一革命时代的准备;第八期,以因印刷发明而成就的革命开始,有些书的最良页,发展此种发明的伟大的结果,狄卡儿(Descartes)所影响的科学上的革命,又启发了一个新时代,此时代以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终结。

智识进步的观念,造成社会进步的观念,而留下他的基础。所以孔氏将以智识上的前进,为人种前进的线索,是逻辑的而不可免的。文化的历史,就是启蒙的历史。涂氏以形成各种社会的活动体样的结附,是认此原理;孔氏主张在智力的进步,与自由、道德的进步,并天赋人权的尊重间,有不可解的联合;并为破除偏见主张科学的效果。他断言一切政治上与伦理上的误谬,都起于与物理上的误谬或与对于自然律不了解有密切关连的虚伪理想。他在进步的新学说里,看出一个启蒙的工具,就是对于动摇不稳的偏见的建筑物,与以最后的打击。

在孔氏眼中,文明史的研究,有二用处:一使吾人能建立进步的事实;一将使吾人能决定其方向于将来,由是以增加进步的速率。

孔氏依历史的事实并这些事实所提示的论证,设法指明自然不曾于进步的人类能力的行程上,置有何等条件。向完全的前进运动,只有地球的存在期可与以限制。这运动在速率上或有变动,限于地球在天体中的现位依旧,而此天体的普遍法则,又不曾生出足以剥夺人种前此所享有的能力与富源的变动;他

将永不逆行，将永不至于退落到蛮荒的境界。对于此危险的保障，在物理科学上确实的方法的发见，我们若是确知启蒙的不断的进步，我们便可以确知社会的情状的不断的改良。

他说假如社会现象的普遍法则为人所知，预见事变，是可能的。这类法则，从过去的历史中能被查出。孔氏依此陈述，确认他所揭出的人类史的第十期潜存于将来为是；并且宣布那在次代为孔德所果成的理想。但不能说他自己考究出来社会发展的任何法则。他的未来的预见，是基于他的时代的理想与倾向。

除了科学的发见并那道德的发展所依赖的自然法的知识的散布，在他的预言的幻想中，还包有两事：一是战争废止，一是两性平等的理想的实现。至于今日，政治上的两性平等，在开明国家，均已次第见诸施行；而废止战争，亦为实践的政家所认为可以达到的地步。使孔氏至今犹存，当大夸其言已得胜利了。孔氏的社会学说，简括起来，只是平等论。两性平等论，亦系由普通平等论推论而出者。他认政治进步的标的，即在平等。平等是社会的努力的目的——革命的理想。

必须延入考虑的，是人类的众庶——工人的群众，不是那少数靠工人们的劳力生活的人。迄于今兹，工人们曾被历史家、政治家完全蔑视。人类的真实历史，不是少数人的历史。人类种族，是由些全靠他们自己工作的果实生存的家族的群众成立的。历史的纯正的主位，是这些群众，决不是几个伟人。

你可以用法律与制度建立社会的平等，但实际上所得享的平等可以甚不完全；这是孔氏所承认的，而归原于三个要因：（1）财富上的不平等；（2）生计确固并且得以传袭于其家族的人，与那靠自己工作为生并且限于一生涯的人间地位上的不平

等；与(3)教育上的不平等。他未曾提出何等急进的方法，以救济此艰难。他想此艰难虽不能完全消灭，可以时时渐次趋于减少。他受经济学派的意见的感染甚深，这些经济学派将为卢骚(Rousseau)、马伯莱(Mably)、巴布夫(Babeuf)诸人的学说所耸诱，以趋于拥护共产主义或私有财产的废止。

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多数个人间的平等以外，孔氏又冥想地球上一切人民间的平等——一种遍于全世界的统一的文化，并先进种族与未开种族间差别的消灭。他预言后进的民族，将爬上法、美的地位，因为无何民族当受责罚至永不能验试其理性。假使那人性完全不为任何制限所防圜的教义既经承认，这是逻辑上必然的推论。这是哲学家间流行的理想之一。

孔氏更不踌躇的为冒险的推测，以谓人的物理的组织可以改进；而依医药科学的前进，人的生命亦可得一相当的延长。又谓即使人类的大脑力的范围是不变的，而其精神的动作的界域，精密与速度，将由新器具、新方法的发明而扩大。

孔氏之世，撰著文明史的设计，固尚未熟；而欲产生任何相当价值的考究，尤须要一位吉彭(Gibbon)的装备方可。孔氏所受的装备，尚不如服尔泰所受之多；故其于撰著文明史的大业，不克奏其全功。然自孔氏认历史的解释为人类进展的键，此种精神在法兰西遂以支配次代关于进步的思辩了。

加般尼(Cabanis)是一位物理学家，为孔氏的文学管理者，并是一位诚信人类完成者。他纯自他自己的特别观察点观察生活与人，他在物理的有机体的研究中，看出人种的智力的和道德的进步的键。依人的物理的情状和道德的情状间关系的认识，人类能由能力的扩大，享乐的增加，达于福乐的境遇；如斯人能

依实现无限的进步的确定，把握住在短促生存中的无限。他的学说，是洛克(Locke)和康地拉(Condillac)的学说的逻辑的扩张。若是我们的智识全得自感觉，我们的一切感觉便全靠感觉的官能，而精神便成为神经系统的机能。

革命的事变，于他与于孔氏一样，不能抑止他们热望的信赖。他们都以为这于科学、于艺术、于人类的总进步，是一新时代的开始。他认当时是历史上伟大时代中之一，后世子孙将常回顾而动其倾慕的遐思。他曾说过：“你们哲学家，你们的研究，当被导于人种的改进与福乐。你们久已不怀抱虚影了。在希望的心情与悲惨的心情交替之中，既曾注意我们革命的伟大的光景；你们现在以喜悦看他的最后的行为的终结。你们将以大欢喜看此新时代。此新时代许与法兰西人者如兹其久，最后竟开幕了。在此新时代中一切自然的惠利，一切天才的创造，一切时间、劳力与经验的果实，将被利用以厚民生。一个光华繁盛的时代，在此时代中，你们哲学家的慈悲的热情，将依实现而终结。”

这是一个十八世纪对于十九世纪的多血的热情的而特质的祝贺。加般尼是生在新时代，注意他们自己的世代的理想，不要为反动的方兴的洪水所卷荡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人。

桑西门(Saint-Simon)的历史思想*

(一九二〇年)

(一) 桑西门(Saint-Simon)在 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

近世的社会主义，以马克思及恩格尔的社会主义划一新时代。他们以前的社会主义，为空想的社会主义；他们以后的社会主义，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这种名称，纯是为分类的便宜而加的，并没有褒贬的意味存于其间。有些人骤见“空想的”一名，便误认这是含有讥嘲的意思，其实“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不但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有一样重要的价值，而且科学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产儿。

空想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不同的点，就在两派对于历史的认识的相异——就是历史观的相异。

空想的社会主义者流的社会哲学，为十八世纪启蒙派的社会哲学。他们以为宇宙间有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绝对的真理在。只靠着诉于人间的理性，就是只要人间能理解此真理，把握此真理，无论何时何所，此真理都能实现。此真理实现之时，即是理

* 这篇文章曾题为《桑西门的历史观》，刊登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上，署名李大钊。

想社会实现之时。据他们的见解,为实现理想社会所必要的事,只在发见真理,而以此真理诉于人人之理性;为实现此真理的历史的条件,他们绝不看重。欧文曾说:“过去的世界历史只以表示人间的非合理性,吾人今始向理性的曙光,向人间的魂再生的时代,开始进行。”这话便含有人间的魂、人间的理性能改变历史的进行的意味。结局他们主张依人间理性的力量能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是空想派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的历史观。

科学的社会主义,把他的主张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其中发见历史的必然的法则;于此法则之上,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必然的到来。由此说来,社会主义的社会,无论人愿要他不愿要他,他是运命的必然的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

社会主义的思想,由马克思及恩格尔依科学的法则组成系统。以其被认为历史的必然的结果,其主张乃有强固的根据。社会主义的主张,若只以人的理性为根据,力量实极薄弱,正如砂上建筑楼阁一样。今社会主义既立在人类历史的必然行程上,有具有绝大势力的历史为其支撑者;那么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环绕太阳的事实一样确实了。

立在这由空想的社会主义向科学的社会主义进化的程途而为开拓唯物史观的道路者,实为桑西门。

(二) 桑西门与孔道西(Condorcet)

桑西门是一位浸染于福祿特尔时代的理想而同情于革命精神的自由人道主义者。他的主要师友,为孔道西和些生理学者。

桑西门崇奉此提议为教义，但在孔道西的非科学的方法上，预见几乎不可能。为了预告，这运动的法则，必须被发见。而孔道西则不但未曾立下这法则，抑且未曾寻求这法则。那些十八世纪的思想家，把“进步”当作一个立在一个极不充分的推论上的单纯的假设，遗留下来；他们的承继者乃依发见一个和引力的物理法则一样确实的社会法则，以求把他提到科学的假设之列，这是桑西门的目的，亦是孔德的目的。我们可以说桑西门是孔道西的承继者，孔德是桑西门的承继者。

（三）桑西门的历史法则

依桑西门的见解，宇宙一切的现象，形成一个有统一的全体。各种科学的任务，在各于其特有的范围内，发见其统一，即在探究现象间的因果关系。今于人类的历史，从来称为历史家的人们，把那些驳杂万状骤然一见似无何等联络统一的诸事实，照原样看作个个独立的事实，于此等诸事实中，以特记述说明君主战争等所谓显著的政治现象，就算毕了历史学的能事；此等态度，非全行改正不可。历史的现象，如以之为一个全体而观察之，则以个个独立象而表现的诸现象间，必有何等统一，必有何等因果关系。关于此点，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无何所择。恰如自然科学以发见现象间的因果关系为任务，历史学不能不脱于单纯事实记述的范域，而进到因果关系统一之点。换言之，即是不可不以历史为一科学。这样子历史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弄得明白的时候，历史的法则便能建立。依此法则，凡历史的过程，均能明快以为说明。不宁惟是，被确立的历史法则，不但说明过去

及现在,并且说明将来。即依此亦能预测将来的社会如何,将来的历史阶段如何。这样一来,历史的范围,实亘过去、现在及未来,而为一个一贯的法则所支配。

桑西门由历史抽绎出来的法则,为组织的时代与批评的时代的递嬗,亦可以说是建设的时代与革命的时代递嬗。中世是一个组织的时代。继续此时期的,乃是一个批评的、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到了现在才渐次终结。继续这个时代的,必是另外一个组织的时代。桑西门既于历史的行程中发见一条导线,他于是能为预告。因为吾人关于宇宙的知识,曾已达到或且现方达到一个在各局部久已不是推测的而是实证的阶段,社会将应之以为变迁;一个新物理学家的宗教将胜过基督教和自然教(Deism);科学家们将扮演中世僧侣所曾扮演的组织者的脚色。

能为桑西门的进步论与以完满的说明的,只有他的弟子巴札尔(Bazard)。他说:按桑西门的说,人类是被认作一个集合的生物,这个集合的生物,在累代的经过间接一种法则——进步的法则——显露其本性。这个法则可称为人类的物理学的法则。这是桑西门所发见的。这是为组织的时代与批评的时代代嬗而成的。他宣传一种对于进步的信仰,认进步为解释历史的关键,为集合的生活的法则。

依桑西门的解释,在一个组织的时代,人类认出一个运命,而协调其一切的能力以达此运命;在一个批评的时代,人类不知有一个标点为共同协赴的鹄的,人们的努力将以消涣与不调。在苏格拉的(Socrates)时代以前,希腊有一个组织的时代,继此时代,乃是一个批评的时代,至于蛮人侵入而止。继此而起的,又是一个组织的时代,此时代由 Charlemagne 至十五世纪末

止。复次又来一个新批评时代，此时代由路德时以迄于今日。现在是预备一个必须继起的组织的时代开始的时候了。

(四) 知的历史观与经济的历史观

桑西门有两个历史观：一为知的历史观，一为经济的历史观。他的知的历史观，很强烈的表现于他的初期的著作；嗣后他的思想发生变化，经济的历史观，乃以取而代之。

从桑西门的知的历史观，则横于历史过程的根底而决定其行程的，惟有知识；依人类知识的程度如何，而附与其特性于历史上的各时期。由一时期向一时期的推移，可求于知识程度的变化中。然人类的知识本身，虽亦能直接成为社会力以决定历史的进行；而在很多的时，知识常经由宗教云者的伟大社会力以于历史上发生作用。这就是说知识决定宗教，宗教决定历史。本此思想以解释历史，便是知的历史观，后来承继他的知的历史观而发扬光大之者厥为孔德。

桑西门曾本此思想以说明现实的历史，先从希腊说起，希腊以有筑在多神教上的社会，故希腊各邦间缺政治的统一；有许多互相歧异的道德系统，而社会的调和乃不能维持。然自苏格拉的出，遂开由多神教向一神教的道路。每当历史内一阶段向一阶段推移的时候，随着必有一次显著的社会混乱。由多神教向一神教的推移，遂以演成罗马晚年的社会的混乱，此混乱终依基督教的成立告终，基督教遂以造成中世纪的社会组织。厥后亚拉伯人科学的知识输入，基督教内部又发生混乱，中世末期的黑暗时代，又复出现；迨经路德的宗教改革，得与当时的知识调

和,基督教又被改造,新教时代,于是乎诞生。

厥后桑西门观于法兰西大革命及革命后的法兰西的经济情形,他的历史观,乃一变而重视经济的因子;但其方法论,即根本原理,固未尝有所变动。

法兰西大革命时,几多政治的激变,使桑西门确信国家与社会间有本质上的不同。革命时的法兰西,约二十五年间,遭十度政治的激变。虽曾变革其政治的构造,而于社会生活的根底,未有何等可认的变化。桑西门躬逢这种事实,乃以看出政治形式的如何,实于人类生活无何等本质的意义,于社会不过是第二义的。构成社会生活的根底者,又从而附与其特质于各历史阶级者,不是知识,不是宗教,亦不是建筑于知识宗教之上的政治,实是那致人类物质生活于可能的产业组织。他于是确立一种历史的法则,认历史过程,惟有经由产业组织的变化,才能理解;将来的社会,亦惟依产业发达的倾向,才能测度;这就是他的经济的历史观。后来承此绪余而建立唯物史观的学说者,厥为马克思。

桑西门主张为社会生活的根底而又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者,实为产业。他的历史观,就是建筑在这个主张上的。他的社会观,曾于他作的一篇小论文《寓言》(«Parable»)里,巧妙的表示出来。他的大意,是说假定法兰西突然丧失第一流的学者、艺术家、劳动者,其损失真不在小。因为那些人是法兰西人中最活动的人们,是掌重要的生产供给有益的劳动于科学、艺术、工业方面,致法兰西愈益丰富的人们。他们是社会的精华,于是邦也,贡献独多,资伟大的声誉,促进其文化的发达而致其繁荣。今骤失之,则法兰西直成为“无魂之体”(Corps sans ame),将不能与其

他国民竞争，而沈沦于卑劣的状态。法兰西在此等损失恢复、新人物产生以前，不能不屈忍于此种状态之下。由如此的不幸而谋元气的回复，至少亦要一时代的长时间；而且真能供应有用的劳动的人们，实在是例外的人们，自然不是滥行多多产出例外尤其是这种例外的。又设此等科学、艺术、工业方面的天才的人物，全部保有而无恙，而于一日之中，丧失了皇室宫廷、王公世爵、达官显位、国务大臣、国会议员、元帅、大僧正、大地主等等；荣华世界之中，突遭意外之厄，仁慈的法兰西人，固必有所不忍而顿兴悲悯，然由法兰西国民的生活上言之，此等享有高爵厚禄的人们，纵一时耗丧至于三万人之多，亦只能与国民以感伤的悲痛而已，国民丝毫不因是而陷于不幸。此果何故？其理极明。填此空位的人，实在易得，彼能继承而又想承继此优游阔绰的生活者，固不知其凡几也。

由他这一段话，可以看出他怎样的推崇科学、艺术、产业等，怎样的轻视政治或政治家、僧侣、贵族等了。但在此时，他的社会观，尚不能说是经济的；这里他尚认科学家、艺术家与产业者有同等的价值，以于社会生活有用的分子相待遇。后来著《产业者问答》，他的思想乃益趋于经济的，他才认只有直接从事产业的阶级，是社会的基本阶级；科学家、艺术家等，只有资健全的社会生活的副次的因子的价值。

什么是产业者阶级呢？在桑西门的意思，以为产业者阶级，是由为生产货财而劳动的农民并手工业者，以及立于此等生产者与消费者间从其需要而掌配给货财的商人，三大部分而成的。

桑西门认进步的标的，在社会的幸福。因为劳动阶级在社会上占多数而且极其重要，所以向此标的进行的第一步，应是劳

动阶级运命的改善。这是改造社会中的政治的主要问题，他主张以社会主义解决此问题。

桑西门认产业者阶级为社会的基本阶级，为历史的原动力。他以此阶级的发达及其社会的地位变动，说明法兰西的历史。据他看来，法兰西大革命，是中间阶级的懒惰的所有者阶级利用产业者阶级的实力，以之为台阶以反抗在社会上无何等实力的贵族阶级的支配势力，而图自立于支配者地位的变动。然其结果，被建设的社会，组织未能正当；所以革命以后，社会的混乱与不安，纷至迭起，此等混乱与不安，直到产业者阶级击破所有者阶级握政治的权力立在社会的最上层的时候，才一扫而清。因为产业者阶级实为社会的富与幸福的创造者，所以他于实质上于形式上都有支配社会的必然性，此为历史过程所证明的。旷观过去的社会历史，别的阶级都丧失其意义；惟独产业者阶级，其意义反以逐渐增加，吾人不能不由这种事实，断言产业者阶级毕竟是最大重要的阶级。

（五）桑西门的“黄金时代”观 及其世界的国家思想

拿破仑没落后，桑西门和他的秘书Augustin Thierry合刊一本小册子。在这小册子里，表示他的“黄金时代”观并他的世界的国家思想。他说：“诗人的梦想，以为只于太古蒙昧人类原始的时代，才有‘黄金时代’。抑知那却不是黄金时代，宁认他为铁时代尚为得当。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这是社会秩序的完全。我们的祖若父，未曾看

见过他；我们的子若孙，将有达到此境的一日；为他们开辟径路，是我们的责任。”他又在此小册子中重新提起Abbe de Saint-pierre 废止战争的理想，并且提议一种比 Pierre 的各国同盟更奢望更理想的欧洲新组织。当此时顷，他于那复位的布尔奔朝 (Bourbons) 在法兰西所建立的议会政治里，看出一个对于政治紊乱的统治权的救济。他想设若将此种政治组织引用到全欧各国，于维持和平的永续上将有长足的进步；设使敌国的英法，成立一个密切的联合，将比较的容易造成一全欧国家，如同英国的平民政治各州政府共戴一议会的政府一样。这就是“人类的巴力门”(Parliament of man)的理想新萌芽。

历史的发展，是由孤立向联合进动，由战争向平和进动，由反抗向协合进动。将来的计划，是依科学的原理组织成的协合。中世时代的加特利教教会给吾人以立在一个普遍的教义上的大社会组织的例证，现代的世界亦须是一个社会的组织，但那普遍的主义，将是科学的，不是宗教的。精神的权威，将不存于僧侣，而存于指导科学及公共教育的进步的学者。每一公共生活中的会员，都有应给他的地位与本分。社会由工业劳动者、学者和艺术家三级劳动者构成，各阶级优越劳动者的委任，将依其人的能力以为决定。谓各人的地位完全平等，是无稽之说；基于劳绩的不平等，是合理而必要的。不信任国家的权力，是现代的错误。为提出伟大的理想，图维进步上所必要的革新；一个指导民族势力的权威，是必须的。那样一个组织，将以增进各方面的进步；在科学则以协力，在产业则以望誉，在艺术亦然，因为艺术家将求所以表现他们自己时代的理想与情感。现在已有趋向几分属于此类者的象兆，他的实现，必不是由革命而得，乃是由渐进的

改革而得。

历史上显著而最可注意的事实，乃为协合精神的继续的扩张。由家族而都市，而国家，而超国家的教会，更进一步，而包括全人类的广大的联合。前面说过，桑西门派的历史哲学，谓历史实由批评的、破坏的和组织的、建设的二种时代递演代嬗。前期则支配的势力的原理，以战争主义无政府为特征；后期则为宗教所支配，而以服从、献身、协合的精神为特征。此种反拨与结合的精神，乃社会的二大原理。二者的盛衰，依时代的性质。协合 (Association) 的精神，渐次超越其反对的势力。在原始社会，强者对于弱者施以压迫，是当时主要的情形，这是联合的不完全的结果。但是他的继起的形式，显出一个渐次的和缓。食人风息，继之以奴隶制；奴隶制废，继之以农奴制；农奴制绝，最后又发生资本家工业上的榨取。强者对于弱者的压迫，最后的形式，全靠财产权。对此压迫的救济，在把个人的袭有财产权，由家族移转到国家。将来的社会，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协合的原理，是将来社会发展的键。社会的主眼，在生产生活必需品；社会生活的终局目的，“在地球的共同利用”。这是桑西门的世界的国家思想。

(六) 桑西门的宗教观及其门徒

桑西门于其晚年，发表一篇大著《新基督教》。他作此论文的目的，乃在欲把基督教醇化于单纯而又实质的要素。他于此书，揭明加特利教及普罗铁士坦特教所添附的独断、无用的形式和误谬，加以锐利而警透的批评。他认新信仰当以道德为最重要的东西。他说：“新基督教不可不把凡人皆宜为互为兄弟的行

为的原理推而及于现世的组织。”桑西门更以近世的语言，详细的说明新基督教。他说：“全社会不可不努力于改革最贫阶级的道德的及物质的状态，社会当以能达此目的的最善的法则被组织。”

最使他的门徒感激的，就是此《新基督教》。当他临终之际，他的友生孔德(August Comte)和罗德丽格(Rodrigues)围绕他的床头，他殷殷以此书的希望嘱托于他们。他说：“所有的宗教形式不可不消灭，因为加特利教的弱点与缺点既为人所证明，人民全为此教所骗了。宗教不能有自此世界灭亡的事，只是变化罢了。”

桑西门以为新社会的学说，必须不只是由教育与立法所传播的，必须为新宗教所裁决。从前的基督教，不能为此，因为旧基督教是基于物质与精神间的二元论(Dualism)而成者，而且加诅咒于物质。新宗教必须是一元论(Monistic)的。新宗教的原则，简举如下：神是一，神是全体，就是全体是神。他是普遍的爱，自显而为精神与物质。宗教、科学、产业的三界，适合于这个三体一致论(triad)。

桑西门死后，他的门徒巴札尔(Bazard)和恩范亭(Enfantin)辈，自结一社，成一家族的组织，在 Rue Monsigny 营共产的生活。厥后巴札尔派与恩范亭派分裂，至一八三二年，此宗遂归于消灭。但在当时，其影响所被，亦不为不广了。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 理恺尔的历史哲学

(一九二〇年)

哲学者，笼统的说，就是论理想的东西。理想表现于社会上，或谓以全体而为统一的表现，或谓以部分而为对立的表现。主后说者，谓理想之对立的表现者，为政治，为法律，为经济。所以社会哲学云者，有人释为论社会的统一的法则性的东西；亦有人释为政治哲学、法律哲学、经济哲学的总称。

把立于经济的基础上的政治、法律等社会构造，纵以观之，那就是历史；所以横以观之称为社会哲学者，纵以观之亦可称为历史哲学。具有历史的东西，固不止于政治、法律、经济等，他如学问、道德、美术、宗教等所谓文化的理想，亦莫不同有其历史。然普通一说历史，便令人想是说社会上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再狭隘一点，只有政治的历史被称为历史，此外的东西似乎都不包括在历史以内。这样子一解释，历史哲学由范围上说是社会哲学，而由内容上说便是政治哲学，这未免把历史哲学的内容太弄狭了。

今欲论社会哲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必先明历史的概念和社会的概念；今欲明历史和社会的概念，最好把马克思的历史观，略述一述。因为马氏述其历史观，却关联历史和社会。原来

中心者虽彼此各异，而其于以社会变迁为对面的问题一点可谓一致。

由马氏的历史观推论起来，以经济为中心横着考察社会的是经济学，同时亦是社会学。那么由此派历史家的历史观推论起来，似乎以政治为中心横着考察社会的，应该是政治学，同时亦是社会学。然于事实上，他们并不这样想。他们并不注意政治学、社会学的学问的性质，只认以政治为中心研究社会变迁的是历史学罢了。

今日持政治的历史观的历史家，因为受了马克思的经济的
历史观影响，亦渐知就历史学的学问的性质加以研考。依他们的主张，于历史研究社会的变迁，乃欲明其原因结果的关系。换句话说，历史学亦与自然科学相等，以发见因果法则为其目的。于此一点，与马氏的历史观，实无所异。依马氏的说，则以社会基址的经济关系为中心，研究其上层建筑的观念的形态而察其变迁，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其法则。此派历史家，虽在今日，犹以为于马氏所谓上层建筑的政治关系能发见因果的法则，此点实与马氏的意见不同。然其以历史学的目的为与自然科学相等存于法则的发见，则全与马氏一致。而于此点所受马氏的影响者亦实不为小。要之，马克思和今日的一派历史家，均以社会变迁为历史学的对面问题，以于其间发见因果法则为此学目的。二者同以历史学为法则学。此由学问的性质上讲，是说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无所差异。此种见解，结局是以自然科学为唯一的科学。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自时厥后，历史的学问，日益隆盛；于是有一派学者起来，以为依那样

的见解说明历史学的学问的性质,不能使他们满足,因为他们以为历史学虽依那样的见解升到科学的地位,但究竟是比附唯一的科学的自然科学而居于附庸的地位,乃努力提倡一种精神科学使之与自然科学对立,作这种运动的先驱者,首为翁特(Wundt, 德人),余如郎蒲锐西(Lamprecht)亦欲依此方法定历史的学问的性质。然翁特所主张的精神科学,由学问的性质上说,亦与自然科学相等,以法则的发见为其目的。固然依翁特的说,虽等是说因果的法则,而以为精神科学的目的者是内的法则,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外的因果法迥异。然自学问的性质上去看,二者之间无大差别。以是之故,虽在历史学上打上一个精神科学的印章,仍不能依是以对于自然科学给历史学保证独立的位置。于是有斥翁特的精神科学由学问论上主张历史学的独立而起者,则德国西南学派的文化科学是。

德国西南学派,亦称巴丹学派,此派在日本颇盛行。日本学坛一般把西南学派和北德的马尔布尔西学派合称为新康德派。然一言新康德派,普通即认为指海格尔学派分裂后以兴复康德哲学为目的而起来的一派而言,与今日的巴丹学派和马尔布尔西学派实为异派。于是有属于马尔布尔西学派的某学者自称其学派为新批评主义,以示区别。亦有人提议把德国的南北两康德派,都单称康德派。否则各用别的名称,固然在现今一言康德派,此二派外还有他派,然不是照康德哲学的原样一点亦不动的,只是以康德哲学的精神为哲学的基调的康德学派,即云限于此两派亦无不可。

西南学派与马尔布尔西学派,虽等是以康德哲学的精神为其哲学的基调,而其互相一致的点,只是关于先验的或批评的哲

学方法的部分,其关于概念、关于问题,二者实在相异的点,因之关于学风的全体,亦自有其所不同。例如西南学派,则始终于纯粹理论的方面;而马尔布尔西学派,则多关涉于实际问题。尤其是对于社会问题,马尔布尔西学派的哲学者,无论谁何,皆是一面批评,一面研究,所谓社会哲学,即是此派的产物;世间称为康德派的社会哲学者,即系指此。今就直接有关系的学问论考之,马尔布西学派,在认识论上考察的科学,似与康德相同,以自然科学为主;而在西南学派的学问论,则对于自然科学,高唱文化科学,即历史的科学,使与自然科学相对峙。

西南学派,创始于文蝶儿般德(W. Windelband),而理恺尔特(H. Rickert)实大成之,拉士克(E. Lask)复继承之。今则文氏终老,拉氏亦复战死于疆场,硕果仅存,惟有理氏一人为此派的唯一的代表者了!由学问论上言之,文化科学的提倡,首先发表此论者,虽为文氏,有造成今日此派在思想界的势力者,实为理氏。故一论及西南学派的文化科学,即当依理氏的说以为准则。依理氏的说,则谓学问于自然科学外,当有称为历史的科学,或文化科学者,此理一察自然科学的性质自明。自然科学的对象,便是自然;自然之为物,同一者可使多次反复,换句话说,就是同一者可使从一般的法则反复回演。如斯者以之为学问的对象,不能加以否认,因而自然科学的成立,容易附以基础。然学问的对象,于可使几度反复回演者外,还有只起一回者,这不是一般的東西,乃是特殊的東西,不是从法则者,乃是持个性者,即是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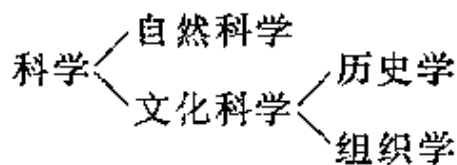
然则如何而能使历史与自然相等而为学问的对象呢?依理氏的意见,这只细味学问的性质便可知悉。学问云者,即是所构

踪马氏的一大功绩罢了。

理氏考察学问的对象，一方使自然与历史对立，他方使自然与文化对立。他于关于学问论的著作，共有两种：一为《自然科学的概念构成之限界》，一为《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第一种著作，由使自然与历史对立的论点出发，进而达于使自然与文化对立的论点；第二种著作，则由自然与文化的论点，进而至于自然与历史的论点。由二作的内容比较起来，第一种比第二种大，第二种乃为说明第一种的概要者，而于立论的行序，微有不同。他于一八六九年着手第一种著作时，欲由方法上明自然科学的限界。主张历史学或历史的文化科学的独立，故其考察学问的对象，亦由基于他所谓形式上的区别，自然与历史的对立出发，诚为不无理由；至于第二种著作的内容，乃理氏于一八九八年“文化学会”的第一次例会讲演时，欲以历史学或历史的文化科学的存立为既被证明者，使之与自然科学对立而叙述者，故其考察学问的对象，亦基于他所谓实质上即内容上的区别，自然与文化的对立，以展其立论的步骤，亦是当然的事情。其第一种著作出第一版时，实为一九〇二年，故视其第二种著作的第一版为稍迟。然其于第一种著作欲证明历史的文化科学的方针，至一九一三年出第二版时未尝少变。同时其于第二种著作，欲叙述历史的文化科学的方针，至一九一〇年出第二版、一九一五年出第三版时，亦全无改易。

理氏于一方使自然与历史对立，于他方使自然与文化对立；前者是以方法为主而考察学问的对象者，后者是以对象为主而考察学问的对象者；由前者生出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对立，由后者生出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对立。论者有谓科学根本的分

类，须为唯一不动者。固然，类别科学，或以方法为标准，或以对象为标准，均无不可；从而其结果生出不同，亦是当然的事，然因是之故，致科学根本的分类，生出二个的对立，似不适当。依理氏的主张，一方的自然科学，无论以方法为主而分类，以对象为主而分类，依然是自然科学；而谓地方的科学以方法为主时则为历史学，以对象为主时则为文化科学，是非表示自然科学存有学问的独立性，而他方的科学总有些地方欠缺独立性而何？果尔，则是他的历史的文化科学的论证，尚未能云得有确固的基础，于是觉得对于理氏的学问论非加以修正不可。日本文学博士铃木宗忠氏即持此见解者。铃木氏举其修正的要点，乃在关于科学根本的分类，承认理氏以对象为标准的对立，而由是引出以其方法为标准的对立，即是把科学大别为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而文化科学更分为历史学与组织学。



理氏把学问的对象一般称为现实界，以为那是依超个人的主观而被构成者。铃木氏关于此点，亦别无异议。理氏又依价值的附着与否，把现实界分为自然与文化。价值不附着的现实界是自然，价值附着的现实界是文化。然彼于此，并未明言如何引出此分类原理的价值。价值豫想主观，对于主观有意义者，斯为价值。理氏既以价值为标准分现实界为自然与文化以上，则不能不把他看作由主观引出者。然如斯以证，则此主观与那构成现实界的超个人的主观有如何的关联的问题，于是乎发生。铃木氏想此主观系个人的主观。固然此个人的主观，在认识论上

是离于理氏的超个人的主观则为无意义者；然当把学问对象的现实界分起类来的时候，有分别把他立起来的必要。原来由认识论上说，这是立于他的超个人的主观上者，然实在说来，这是存在于现实的主观。理氏虽于学问论立此主观，而于其认识论上的意味，似未把他弄得十分明白。

依铃木氏的见解，则个人的主观离自己而见的现实界是为自然，使关系于自己而见的现实界是为文化，离自己以观则现实界，只是共通于各主观的方面现出来的；此方面以共通于各主观之故，所以他被认为于主观全无关系依其自身的法则而生灭起伏者，于是得名之为自然。自然是被认作于主观无关系者，故其中不含有价值。反之，使关系于自己以观，则现实界只是于各主观特殊的方面现出来的，而不是于各主观共通的方面现出来的，惟其于各主观为特殊之故，此方面遂呈出恰如主观把他作出之观，故得名之为文化。文化与主观有特别的关系，故不得不云价值含于其中。他根据这个理由，基于个人的主观把为学问的对象的现实界，分为自然与文化，于是以以自然为对象者为自然科学，以以文化为对象者为文化科学，此二者为科学的根本分类，由方法上考察之，其理益明。夫学问既是把对象构成概念者，而概念构成云者，又不是说把对象照原样模写，是说把他改造，既云改造于此必要标准。然若只依一个标准以改造对象，合于是标准者即以为本质的东西，而被取入于概念，其不合于是标准者，即以为非本质的东西而被排斥。以故要想把对象毫无隐蔽的全都把握住改造的标准，只有一个，殊不足用，于是有立二个标准的必要。此二个标准如有矛盾对当的关系，则于一方以非本质的东西而被排斥者，于他方亦得以本质的东西而被取入，则现

实界得全体为学问的对象而无挂漏了。

然则关于现实界改造的二个标准，当于何求之？铃木氏谓一得求于自然之中，一得求于文化之中。自然是于各主观共通的方面，文化是于各主观特殊的方面，互相矛盾。今于二者之中，求改造的标准，则此二个标准亦自当立于矛盾的关系。被求于自然之中者，是所谓一般的法则的概念；被求于文化之中者，是所谓个性的价值的概念。自然科学于以一般的法则为标准改造现实界时，其方法为一般化的方法；文化科学以个性的价值为标准改造现实界时，其方法为个性化的方法。更由所谓价值的点言之，则自然科学的方法，为离价值的方法；文化科学的方法，为价值关系的方法。换句话说，就是以依一般化的方法研究法则的为自然科学，以依价值关系的方法研究一回起的事实的为文化科学。依铃木氏的意见，以对象为主的科学分类为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对立；以方法为主的科学分类，亦同为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对立。于兹成为问题者，乃为历史学的位置。理氏对于自然科学，称为历史学，历史学的科学，或历史的文化科学，而把历史学与文化科学看成一个东西。铃木氏对于此点，不表赞成。他认文化科学为可与自然科学对立者，而再由文化科学中导出历史学。

为自然科学的对象的自然，是于各主观共通的现实界的方面，其事当不依主观而有所异。自然不依主观而其所异云者，其意即云自然者，横观之，于庶多的主观同样的表现出来；纵观之，亦不依时间而生变化。彼依时间而生的现实界的变化，不妨名之为历史。由是言之，为自然科学对象的自然无历史。反之，为文化科学对象的文化，为于各主观特殊的现实界的方面，故是依主观而异，以是之故，依对于自然的矛盾对当的关系，不能不说

文化有历史。由此点观之，理氏以文化科学名为历史的科学，实为正当；然其以历史学与历史的科学、文化科学同视，似未尽妥。固然，文化依时代而变迁，为同一的东西只起一回者；过去的文化与现在的文化不能以学问的对象有同等的意义。第一，过去的文化，不过合全体而成为学问的对象；现在的文化，即此亦足为一学问的对象而有余。第二，过去的文化，以之取入于概念，使关系于含于其文化中的价值以决定事实，虽为绰有余裕；而在现在的文化，以之取入于概念的时候，则不可不使关系于可存于吾人的普遍妥当的价值，以组织事实。他于是主张分文化科学为二，而以研究过去的文化者为历史学，以研究现在的文化者为组织学。

此外还有一个应行讨论的问题，即是马克思派及一派历史家以社会的变迁为历史学所研究的对面问题是否适当。夫以社会的变迁为历史学的问题，是即以社会为有历史的。既以社会为有历史的，则社会之为学问的对象，不为自然而为文化。今世俗一般颇滥用“社会”一辞，其意义殊暧昧；即在以社会为对象的社会学，其概念亦因人而各异。大体说来，关于社会的概念的见解，可大别为二类：一以人间结合的形式为社会学对象的社会者，一以人间结合的内容为社会者。此项争论，在学问论上，兹无讨论的必要。今姑以为社会学的对象的社会为人间结合的形式。即在此种见解，由学问对象论言之，社会的概念亦有二种：一则以之为自然，一则以之为文化。以社会为自然者，即以社会学为研究法则的自然科学；反之以社会为文化者，即以社会学为组织的研究现在事实的文化科学。亦有人谓社会学概与心理学相类，同为研究心作用的学问。由结合方面观之，可为学问的对

象，即于个人上把他切断来研究，亦可为学问的对象：前者是社会学，后者是心理学。心理学是研究心作用其物的一般的法则的。社会学是研究心作用的结合其物的一般的法则的。心理学为自然科学，社会学亦为自然科学。此派论者，虽以心理学为自然科学，却研究现于心理学对象的心作用上的价值内容的所谓心理科学(Mental Sciences)，如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等为文化科学；虽以社会学为自然科学，却以研究现于社会学对象的社会结合上的价值内容的所谓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如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为文化科学。此派论者的理据，即认心作用有二：一为单独者，一为结合者；单独者即心理，结合者即社会。无论心理与社会，若以之为形式而考察的时候，不依时间而变化，为同一的东西可以屡次反覆回演者，故由学问对象论上观之，此不得不谓为自然；然现于心理及社会上的价值内容在美术与宗教，在法律与政治，皆为一回起的(或云一趟过的)东西，而有历史，故此不得不谓为文化。等是社会，由内容上观察，称为政治社会的时候，虽为文化科学的对象的文化；而由形式上观察，单指社会结合的时候，是为自然科学的对象的自然。这是本于理氏的理论的推论。

论者依据以上的推论，谓为社会学的对象的社会，既属于自然，不依时间而生变化，故无历史；而以马克思及一派历史家认社会为有变迁的，以之为历史学的对面问题，为不当。然马克思及其他历史家并未把社会分为自然与文化二方面以为考察，自不能以是相绳，且即以此准绳批判其说，彼等既以有变迁的社会为历史学的对面问题，则其所考察的社会，亦非自然而为文化，亦非此所谓社会学的对象的社会而为历史学的对象。社会科学的

随着基址的变动而变动，但绝不是把社会构造的整个全体，裂为零碎的东西，而以基址概全构造，以经济史概全文化史，概全历史学。我们承认历史学是各个特殊的历史学的总合，同时亦当承认经济关系在社会全构造中是其基址，承认经济在整个的文化生活中是比较重要的部分。

唯物史观在 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一九二〇年)

“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是 Karl Marx 和 Friedrich Engels 一八四八年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所发见的。后来有四种名称，在学者间通用，都是指此法则的，即是：(1)“历史之唯物的概念”(“The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2)“历史的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3)“历史之经济的解释”(“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及(4)“经济的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在(1)、(2)两辞，泛称物质，比马克思的说范围较广；因为他的说只是历史之经济的解释，若以“物质”或“唯物”称之，则是凡基于物质的原因的变动，均应包括在内，例如历史上生物的考察，乃至因风土、气候、一时一地的动植物的影响所生的社会变动，均应论及了。第(4)一辞，在法兰西颇流行，以有倾于定命论宿命论之嫌，恐怕很有流弊。比较起来，还是称马克思说为“经济的历史观”妥当些。Seligman 曾有此主张，我亦认为合理，只以“唯物史观”一语，年来在论坛上流用较熟，而本讲范围，亦不限

* 这篇文章曾刊登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上，署名李大钊。……编者

于马氏的经济的历史观，故用之。

科学界过重分类的结果，几乎忘却他们只是一个全体的部分而轻视他们相互间的关系，这种弊象，呈露已久了。近来思想界才发生一种新倾向：研究各种科学，与其重在区分，毋宁重在关系；说明形成各种科学基础的社会制度，与其为解析的观察，不如为综合的观察。这种方法，可以应用于现在的事实，亦可以同样应用于过去的纪录。唯物史观，就是应这种新倾向而发生的。从前把历史认作只是过去的政治，把政治的内容亦只解作宪法的和外交的关系。这种的历史观，只能看出一部分的真理而未能窥其全体。接着思想界的新倾向去观察，人类的历史，乃是在社会上的历史，亦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种种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活动，是故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包括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政治的历史，不过是这个广大的活动的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是社会生活的全体。以政治概括社会生活，乃是以一部分概括全体，陷于很大的误谬了。于此所发生的问题，就是在这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社会生活里，那社会进展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人类思想上和人类生活上大变动的理由究竟为何？唯物史观解答这个问题，则谓人的生存，全靠他维持自己的能力，所以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因为人类的生活，是在社会的生活，故个人的生存总在社会构造组织以内进动而受他的限制，维持生存的条件之于个人，与生产和消费之于社会是同类的关系。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此种学说，发源于德，次及于意、俄、英、法等国。

唯物史观的名称意义,已如上述,现在要论他在史学上的价值了。研究历史的重要用处,就在训练学者的判断力,并令他得着凭以为判断的事实。成绩的良好,全靠所据的事实确实与否和那所用的解释法适当与否。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历史学者,研究历史原因的问题的人很少。他们多以为历史家的职分,不外叙述些政治上、外交上的史实,那以伟人说或时代天才说解释这些史实的,还算是深一层的研究。Lessing 在他的《人类教育论》与 Herder 在他的《历史哲学概论》里所论述的,都过受神学观念的支配,亦不能与思想界的新运动以促动力。象 Herder 这样的人,他在德国与 Ferguson 在苏格兰一样,可以说是近代人类学研究的先驱,他的思想,犹且如此,其他更可知了。康德在他的《通史概论》里,早已窥见关于社会进化的近代学说,是 Huxley 与许多德国学者所公认的,然亦不能由当时的神学思想完全解放出来,而直为严正的科学的批评。到了 Hegel 的《历史哲学》,达于历史的唯心的解释的极点,但是 Hegel 派的“历史精神”观,于一般领会上究嫌过于暧昧,过于空虚。

有些主张宗教是进化的关键的人,用思想感情等名词解释历史的发长,这可以说是历史的宗教的解释。固然犹太教、儒教、回教、佛教、耶教等五大宗教的教义,曾与于人类进步以很深的影响,亦是不可争的事实,但是这种解释,未曾注意到与其把宗教看作原因,不如把他看作结果的道理,并且未曾研究同一宗教的保存何以常与他的信徒的环境上、性质上急遽的变动相适合的道理。这历史的宗教的解释,就是 Benjamin Kidd 的修正学说,亦只有很少的信徒。

此外还有历史的政治的解释。其说可以溯源于 Aristotle,

那么以自己的努力企图自救,便是至极愚妄的事,只有出于忍受的一途,对于现存的秩序,不发生疑问,设若发生疑问,不但丧失了他现在的平安,并且丧失了他将来的快乐。他不但要服从,还要祈祷,还要在杀他的人的手上接吻。这个样子,那些永据高位握有权势的人,才能平平安安的常享特殊的权利,并且有增加这些权利的机会,而一般人民,将永沉在物质道德的卑屈地位。这种史书,简直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用此可使一般人民老老实实的听他们采夺。

唯物史观所取的方法,则全不同。他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其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亦全与用神学的方法所得的结果相反。这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乃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而社会一语,包含着全体人民,并他们获得生活的利便,与他们的制度和理想。这与特别事变、特别人物没有什么关系。一个个人,除去他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以外,全不重要;就是此时,亦是全体人民是要紧的,他不过是附随的。生长与活动,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最要紧的,是要寻出那个民族的人依以为生的方法,因为所有别的进步,都靠着那个民族生产衣食方法的进步与变动。

斯时人才看出他所生存的境遇,是基于能时时变动而且时时变动的原因;斯时人才看出那些变动,都是新知识施于实用的结果,就是由象他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所创造的新发明新发现的结果,这种观念给了很多的希望与勇气在他的身上;斯时人才看出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他于是才自觉他自己的权威,他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而取一种新态度。从前他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否定的生物,他只是一个忍耐的试验品,于

于人生的影响乃适居其反。

旧历史的纂著和他的教训的虚伪既是那样荒陋，并且那样明显，而于文化上又那样无力，除了少数在神学校的，几乎没有几多教授再作这种陈腐而且陋劣的事业了。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只有公立学校的初级史学教员，尚未觉察到这样程度的变动，因为在那里的教训，全为成见与习惯所拘束，那些教员又没有那样卓越的天才，足以激励他们文化进步上的自高心，而现今的公立学校又过受政治和教科书事务局的限制。

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价值，既这样的重大，而于人生上所被的影响，又这样的紧要，我们不可不明白他的真意义，用以得一种新人生的了解。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

唯物史观在 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

(一九二〇年)

唯物史观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与前世纪初在生物学上发现过的运动有些相类。在那个时候，是用以说明各种形态学上的特征关系的重要，志在得一个种的自然分类，与关于生物学上有机体生活现象更广的知识。这种运动，既经指出那内部最深的构造比外部明显的建造若何重要；唯物史观就站起来反抗那些历史家与历史哲学家，把他们多年所推崇为非常重要的外部的社会构造，都列于第二的次序，而那久经历史家辈蔑视认为卑微暧昧的现象的，历史的唯物论者却认为于研究这狠复杂的社会生活全部的构造与进化有莫大的价值。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自己不能变化的，也不能使别的现象变化。其他一切非经济的物质的要件，如人种的要件，地理的要件等等，本来变化狠少，因之及于社会现象的影响也狠小，但于他那最少的变化范围内，多少也能与人类社会的行程以影响。在原始未开时代的社会，人类所用的劳作工具极其粗笨，几乎完全受制于自然；而在新发现的地方，向来没有什么意味的

治、伦理及种种理想上、精神上的现象都是),但这些构造中的那一个,也不能影响他一点。受人类意思的影响,在他是永远不能的。就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法律,他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中最直接的表示,也只能受经济现象的影响,不能与丝毫的影响于经济现象。换言之,就是经济现象,只能由他一面与其他社会现象以影响,而不能与其他社会现象发生相互的影响,或单受别的社会现象的影响。

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但这经济构造的本身,又按他每个进化的程级,为他那最高动因的连续体式所决定。这最高动因,依其性质必须不断的变迁,必然的与社会的经济的进化以诱导。

这最高动因究为何物?却又因人而异,Loria所认为最高动因的,是人口的稠庶。人口不断的增加,曾经决定过去四个连续的根本状态,就是最合奴隶所有,奴仆,(Servile)佣工。以后将次发生的现象也该由此决定。马克思则以“物质的生产力”为最高动因。由家庭经济变为资本家的经济,由小产业制变为工场组织制,就是由生产力的变动而决定的。其他学者所认为最高动因的,又为他物。但他们有一个根本相同的论点,就是经济的构造依他内部的势力自己进化,渐于适应的状态中变更全社会的表面构造。此等表面构造,无论用何方法不能影响到他这一方面:就是这表面构造中最重要法律,也不能与他以丝毫的影响。

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是合理的。许多法律,在经济现象的面前,暴露出来他的无能,十七八世纪间,那些维持商业平准奖励金块输入的商法,与那最近美国禁遏脱

拉斯(Trust)的法律,都归无效;就是法律的力量不能加影响于经济趋势的明证。也有些法律,当初即没有力量与经济现象竞争;而后来他所适用的范围却自一点一点的减缩至于乌有。这全是经济现象所自致的迁移,无与于法律的影响。例如欧洲中世纪时禁抑暴利的法律,最初就无力与那高利率的经济现象竞争;后来到了利润自然低落,钱利也跟着自然低落的时候,他还继续存在,但他始终没有一点效果。他虽然形式上在些时候维持他的存在,实际上久已无用,久已成为废物。他的存在全是法律上的惰性,只足以证明法律现象,远追不上他所欲限制的经济现象;却只在他的脚后一步一步的走,结局惟有服从而已。潜深的社会变动,惟依他自身可以产生,法律是无从与知的。当罗马帝国衰颓时代,一方面出现奴隶缺乏,奴价腾贵的现象;一方面那一大部分很多而且必要的寄生阶级,造成一个自由民与新自由民的无产阶级,他们的贫困日益加甚,自然渐由农业上的奴仆劳动,工业上的佣工劳动生出来奴隶制度的代替;因为这两种劳动全于经济上有很多的便利。若是把废奴的事业全委之于当时的基督教人类同胞主义的理想,那是绝无效果的。十八世纪间,英人曾标榜过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的宗教,到了资本家经济上需要奴隶的时候,他们却把奴制输入到美洲殖民地,并且设法维持他。这类的事例,不胜枚举。要皆足以证明法律现象只能随着经济现象走,不能越过他,不能加他以限制,不能与他以影响;而欲以法律现象奖励或禁遏一种经济现象的,都没有一点效果。那社会的表面构造中最重要的法律,尚且如此;其他如综合的理想等等,更不能与经济现象抗衡。

社会学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法则,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

据，俾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全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

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

(一九二〇年)

(一) 社会主义的定义

社会主义是由英语“梭雪立什姆”(Socialism)翻译而来的名词,本自拉丁语 Socius(同僚)的形容词 Socialis(同辈)而来。这名词的思想固极陈旧,然到十九世纪前半期,始以语言表示之。所以这个名词就沿革上讲起来,在英国是应用于欧文(Owen)的社会改造论,在法国是应用于圣西门(Saint-Simon)、傅立叶(Fourier)的学说中,德国学者寿亚罗亦是先创用 Sozialismus 的文字。然社会主义的意义,不仅在平常言谈中及政客所引用的意义各不相同,即经济学家及著名的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定的意义也不相同。

一八三三年有保贫党(Poor men's guardism)用这个名词。Socialism 对于 G. J. Holyoake 所著《合作史》中,谓此字的应用始于一八三五年《大英百科全书》,并谓凡用政治权力,以

* 这是一篇记录稿,署名:李大钊教授讲演、余姚邵纯熙笔记。讲演的具体日期不详,根据大钊同志的活动判断,大概是一九二〇年下半年在北大经济系开“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课时讲的(参见《李大钊传》第八十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四月第一版)。这篇记录稿是方行同志提供的,并由他和顾廷龙同志校订过;此次刊印,又由杨芹同志作了文字整理。——编者

变私有土地及资本为公有者，是为社会主义。以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相对说，非此处所讲的社会主义。彼所云者为用社会全体为本位，以遏止个人的自由。此处所云者，为社会主义的制度，是理想的，非已成熟可观的，而欲以之实现于现在及将来。然欲求社会主义的正确定义，不可不研究它的经过。此主义的初期，非政治运动，实为人道运动。盖见社会上许多可悲惨的事，吾人若以正当手段，而阻止悲惨的运动，则人类的幸福到了。诚相信社会中，有此真理。今则竟成为有力的政治运动，故不能仅专注意他的过程。

今人每将共产主义 (Communism) 及社会主义 (Socialism) 混谈，其实此二字大有区别，Edon and Ceder Paul所作之《Creative Evolution》，此书中谓此二字的区别曰：与其谓此二字为根本原理上的区别，毋宁谓为程度上的区别。在一八八八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Engles曾申明其非社会党之宣言。因其时讲社会主义者非仅包括劳动阶级一部，其中尚有中产阶级之故。此共产主义非只主张政治的改革，其中尚含有经济的革命。社会革命为整个的革命，非部分的革命。

当一八四七至一八七一年时，一般人对此二名词的态度，以社会主义为温和的，共产主义为过激的。照Engles等之解释，以为社会革命当纯由劳动阶级而作，故将此二名分别之。Engles作《〈共产党宣言〉(英文的)序》，发表后近三十年俄罗斯发生社会革命，缘俄人自称共产党。一九一八年中，德国人的革命自称社会党。一九一九年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开会后，此二主义更明，而名共产党称曰左翼，社会党称曰右翼(第二国际)。前者今已布全世界，后者则稍形散漫。以颜色代之，前者为赤

色，后者为淡红色。前者代表劳动阶级，后者代表资产阶级或半资产阶级。社会党主张 creative evolution，而共产党则主张 creative revolution。虽然如此，不能寻出具体的定义。从过程中以求之，亦未尝不得其一二。由智的方面观之，Socialism 此为现在存在之资本制度之批评指南。由情的方面言之，则为以新的、好的秩序，代替旧的、坏的制度。由意的方面言之，则使人发生努力，以平静寻秩序，代替旧秩序。就以上所言三项，故可知社会主义从吾人精神方面言之，可分为（1）智、（2）情、（3）意三项。然其所作运动，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根据，此根据必须是实在的，故从社会方面观察，可分为（1）政治、（2）法律、（3）经济三项言之。照政治方面言，必须无产阶级专政，方合其目的。所以社会主义，包含国家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两种。照法律方面言，必须将旧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废止之，扫除之，如私有权及遗产制，另规定一种新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将资本财产法、私有者改为公有者之一种制度。从经济方面言，必须使劳动的人，满足欲望，得全收利益。所以此种亦可分共产主义及集产主义两派。由上两方面观察的结果，既如是。乃再解释各方对此的误解。

（二）关于社会主义的种种误解

1. 有人误解社会主义为社会学，不知社会主义是改造社会的一种法则，促进社会改良的制度。社会学是一种科学，研究社会上各种现象及其原则与一切社会制度的学问，且用科学方法，考究社会是何物，发明一种法则，以支配人间的行动。所以社会

主义是社会学中应当研究的一部分，并非社会主义即社会学。此为第一误解。

2. 有人误解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为一物，实则社会主义者是要求政府有一种权力，使之伸张，以保障每人享受极大量的平等、自由。资产阶级是要求政府个人自由，是一部自由，限制政府干涉个人自由愈少，而彼级之享福愈大。无政府主义是主张无政府者，与社会主义绝对相反。资本主义适在两者之间。然世之研究社会学者，因为社会主义本身的学说，及运动派别过于繁多，所以彼等尚是意见纷纷，莫衷一是。有以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对立，不承认无政府主义为社会主义的一派；亦有视为同物者。有以社会主义的本质，专在革命方面；亦有视为民主主义一派者。所以第二误解，是照主张者之本意记之。

3. 又有人误会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一义，其实两者确有不同，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所用的手段与范围等均不同。又共产主义有无政府共产主义及宗教（有政府）共产主义。因此之故，所以现在俄国的社会主义与克鲁泡特金的共产主义分开。

4. 现在社会主义已到实行之地步，人咸以为实行社会主义之后，决不发生竞争。盖社会由竞争而进步，良好的竞争，是愉快而有味，无不可以行之。至于资本主义的竞争，使人类入于悲惨之境，此种竞争，自不可以。今社会主义毫无竞争，岂不令人枯死么？不知社会主义亦有相当的竞争，不过禁绝使社会上起极大之竞争，如现今的竞争使人犯罪等，故认社会主义为无竞争者误矣。

5. 再社会主义是无家庭者亦误。其实社会主义并非破坏家庭，实欲立国家内的家庭，比现在之家庭更趋完美，因有余暇，经

营家庭种种设备而得娱乐。又社会主义不是使人尽富或皆贫，是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所以列宁想工界电气化，使劳力小，享受利益多，即为此意。

6. 有人疑虑社会主义实行后，国家与社会权利逐渐增加，个人自由易受其干涉，遂致束缚。此亦误解。然过渡时代的社会主义，确是束缚个人主义的自由，因少数资本主义者之自由当然受束缚，不过对于大多数人的自由确是增加。故社会主义是保护自由、增加自由者，使农工等人均多得自由。

7. 有人言社会主义是破坏生产者，亦是误解。彼等所主张者以为在现在制度，可以生出许多财商，如社会主义实行，则生产制度破坏，绝不能如现在社会生产之易。然照其真正意义解释之，社会主义是由个人生产变为社会的生产，由手工的生产变为机器的生产，其进步是一线的，故社会主义不是破坏生产，是求进步的、适合的生产，即整理生产，使归统一，免呈纷乱之象。分配平均，使生产不致过度，社会上遂现一种新的秩序。此实是整理，非为破坏。

8. 又有人言社会主义是不道德者。因为此种主义是建设于愤懑、仇怨上面者，因此社会主义有此种势力，似乎不甚善良。但就实事考察之，压制资产阶级为怨仇，若就彼自己方面而言，是互助、相爱，不是谋怨仇，并为大多数人谋幸福。

(三) 社会主义与平民主义的区别

社会主义与平民主义在学理上当解释明白。社会主义不一

定要平民主义政府 Democracy 之下实行的，无论何种政体，如专制政体等，均可实行。但就两者精神方面言之，平民主义是种精神，社会主义亦是一种精神，两者是相接近而一致，均由平民而起者。

社会主义在资本制度中，必起种种之误解，因为二者是立于反对的地位，并且是一种新的制度，亦必使人起疑心及恐怖。社会主义又是须将现今制度，完全改革。其实质方面又须寻出一种新方法，代替旧式之私竞的经济秩序及组织，使社会上发见新的经济组织及秩序是正规而优良者，即主张协作的生产，并得真正平均的分配，此为其目的。至若实行其手段，各不相同。有谓必须革命者；有主张不必剧烈革命者；有谓渐渐进行改革达到目的，用平和手段者。

以上仅就社会主义和平民主义的区别，略为谈及。以下再谈谈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因中国受国际压迫（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各阶级是相同的，所以实行时应当与资本中等……阶级联成一气，使中国成一独立者，不受国际压迫者之国际压迫者之国家。惟最后应注意尚有国际资本阶级……亦应打破。社会主义的运动，当然以国际为范围，因为经济情形是国际关系之故。

（四）社会主义与学艺之关系

学问、艺术均须由个性而发展，若社会主义实行之后，则个

人的天才能力，必渐趋于平淡，黯然无色者，不能有所发达。故有许多人误谓社会主义是专为物质进步而设，至于美术、哲学，似不甚注意者。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以社会为整个的，不能分裂的，因以前道德、哲学、伦理等，与将来经济状况不合，所以再造出一种更好之道德等，决不是将道德废去。社会主义亦有许多美术家、文学家赞成及研究，彼等眼光既由社会主义涵养而出，故彼等希望艺术有真正的发展。如 Thomas More 著《Utopia》（《乌托邦》）一书，其内容托言 Raphael Hythloday 与有学问人的谈话，以发表其见解。全书用自问式。于一五一六年英国社会反应一种悖谬情形，其批评现今社会一段谓：有一人请其赴宴，问其盗贼如何消灭？Hythloday 谓未寻见犯罪之根本原因，然盗贼均因贫困而来，社会之所以发生贫困，实因私有制度中的富贵之家，多养游民不劳而食，且贵族的园地、牧场极大，耕地减少，而贫困因之发现。然贫困不去，盗贼不能免，故欲免去盗贼，必须免除私有制度，使人人劳动。当时有人问如私有制度废去，人人不劳动将如何？答谓尔全不了解乌托邦之观念。Hythloday 周游全世界，当时在南半球，遇见一岛，全岛之大，只一日路程可达。其都市社会组织，由农人举四个老成议会。三十家一首领，三百家有一检查官，其他尚有各种官职，务均由乌托邦者（即居此岛之人民）选举之。一切行政管理，务求合于卫生，引导入于道德。村市房舍，每家四十人，男女各半，两年村市互易其居。每家一公园，每家两门，一通于街，一通于公园，凡一切房舍、公园悉为公有。乌托邦制度，即社会上事务，是义务劳动，家庭上事务，是奋□劳动，每家可养二奴隶，做最不清洁而烦劳的工作。每日六小

时工作，八小时睡眠，其余十小时任意嬉乐。婚姻是有相当之限制，即取一夫一妻制。生育是不受限制，然分配多的地方于少的都市。都市人口，亦有一定限度，超其限度，即须迁移，若超过全地的限度，则须开拓新殖民地。以为社会非此组织，不能完全。William Morris著《News from Nowhere》（《无何有之乡》），因其欢喜读《乌托邦》之故。书中所言，不知钱是何物？无所谓困贫，婚姻是自由恋爱者，男女老幼均极活泼。与乌托邦相异之处颇多，即劳动亦不同乌托邦须受强迫者，因为此中人，觉得劳动是愉快者，亦无所谓奴隶制度，此二者之不同根本。此外，如John Ruskin, Oscar Wilde等均为艺术家。

社会主义与学艺，有许多人皆谓社会主义所建设之社会，是阻碍艺术，不能有所发展。然吾等考查社会主义之一种，不但不妨碍学艺，而且使之发展；至于资本主义反阻碍学艺，使之不能发展。William Morris以为资本主义使人生活上，渐趋于枯燥无味之境，学艺亦日见退化，于是发生反抗，得到美学的社会主义运动，即从根本上着想，人的本来之观念或性质而趋于此种社会主义者。其中代表为John Ruskin，尚有俄国经济学者Tugan—Baranovski, Morris，皆主张学艺在社会中可以表现人的感情，且以尊重人格根本观念出发，达到社会主义之目的。此冷酷资本主义，能使人生生活非常枯槁。Galton主张资本主义能使人的精神能力退化。故现今欧洲人精神能力比古代希腊人精神能力为劣，犹黑人之与欧人相比也。因为现今发掘古代艺术品极佳，文化殊为发达，至今反见退化，以此故也。固然资本主义在社会中有许多文化，如用机器生产，制造战品，似乎社会进步。然人类进步决不在此，宜在美的感受能力之增加，发见古物，不

过古人创作沧海之一粟，足使后人创造许多艺术品，此可证明也。伟大艺术品，在过度劳动之下，断无创生之机会。此一般人之主张资本主义，不但在人类生活经济上受其苦窘，即学艺上亦大受其压迫矣。

John Ruskin 之美术的经济观，有三要点：

- (1) 劳动宜最合理者之利用；
- (2) 劳动之结果的生产物品，宜保重之；
- (3) 分配物品宜合理而公平者。

彼之意思乃以美术练习人之性情，且认艺术品为至要的，因此美术家之创作，是正当合理之劳动，以美的方法整理经济的组织。Morris 认工作是喜悦者 (Joy of work)，彼谓资本主义将人之制作物品之喜悦，损毁甚多。一切制作物品，均充满营利之目的，此不仅使生产者工作者毫无喜悦，即使应用者，亦毫无喜悦也。彼极赞扬十四纪时，牛津 (Oxford) 地方之美术街市及作品，均为喜悦之美术家亲手制造者。故十四纪艺术品，极为精美，使人发现一种美感。在此种状况之下，欲使工作者喜悦，不能不推翻资本主义。一方面欲使工人快乐，当实行社会主义。Morris 因为自己行为冲动，以为无论何物，凡自己亲手制成者较为有味，即种种小事，设亲身为之，亦甚有味。盖自己工作时，使制造物易得满充喜悦之机会。此在吾彼自己栽花植木种蔬时，常得美满之趣味也。故彼主张人人均须以行为冲动，亲身自作，得到喜悦之幸福。彼对于民家困穷，极为悲观，彼并非因民家贫困而悲，实因为贫困结果，不能感觉工作上之喜悦，极为可悲。B. Russell 受 Morris 之影响，彼谓人有各种冲动，可分为个有的冲动及创造的冲动。彼主张人应尽量发展创造冲动而限除个有

的冲动。设大多数人无衣食，资本主义者，不过有衣可衣，有食可食而已，毫无美感之可言。有一人名 Naquet 谓共同团体的生存，一定有一种真正使命，此种使命，不在饮食而在学、知、发现。

盖衣食住为人生附属品，若仅为衣食住着想，则与动物何异。Russell 主张定有三点：

- (1) 技术练习——教育；
- (2) 发挥创造冲动之自由；
- (3) 公众的认识。

照(1)项言，主张教育自由，然按现在教育情形言之，凡家有资本可以远出求学，成为一学者。反之，贫困之人往往无机会读书，其中英雄豪杰，不知埋没多少。中国前清时代之书院，贫穷之人，亦有机会读书，人才亦有产出，今则改为学校，似乎反受了欧洲化资本主义之影响也。又给学者以奖励资金，使学生感觉到一种讨厌之观念，亦非所宜。故罗氏主张凡男女二十以下可以自由读书，不收费用，此种小损失，实可不必计较也。

照(2)项主张发挥自由创造，然有许多人因生活要紧之故，不能自由发挥创作，此实为环境所迫之故。如日本博士会制度，颇有阻碍创作之冲动的倾向。会中老博士恐后进者（大学毕业生）程度高，入会之后，恐推翻自己地位，或超出自己地位，故欲入博士会甚难，甚至先连通老博士，始得其门而入。此种妨碍创作冲动，罗氏甚反对之。

又社会中人给以最低限度的需要品。无论何人，均可得到奢侈品，然必须作有益于大家之工作。欲施行此种制度，使艺术家有挥发之冲动，虽一箪食、一瓢饮，亦不以为苦。惟此处亦有一疑问，设人人尽作美术事业，不愿作工，将如之何。不过此种

制度,工作不甚苦,亦无妨碍。

又关于著述出版事宜,亦当论及者。设有一种书籍,其言论是反对社中制度者,其出版自由权,不免失去,此显见之事也。其实不然,凡是行 Gide 之制度者,如有反对该制度之言论出版,此时著作者担任出版费,均可自由印刷出版,斯实发挥创造冲动之自由之精神也。

照(3)项言,使公众对于美的作品,认识鉴赏,尊重著作之人。诚以美术作品,为人认识,引起大家发挥创造也。在现今资本制度之下,固然有许多人,亦有尊重艺术品之能力,然自大体言之,终含有金钱主义之气味。出版物如为美术作品,均可得到稍高之价值。如此亦足阻碍真正的学术。在社会主义制度以下,使公众有认识鉴赏能力,消除一切观念。

劳动是苦抑是愉快?亦可申言之。若社会组织完善,劳动确为愉快之事,不然劳动固甚苦也。Ruskin 谓过度的劳动是苦痛,又谓人之精力宜发挥,不然亦是苦痛。少数人工作是苦痛,大多数人工作不是苦痛。彼主张四小时之劳动。Fourier 亦谓过度劳动是苦痛,羡慕动物的社会,因为动物是愉快者。彼以为在乎变换,工作地方宜美,使人劳动时感觉一种美的情感。同伴亦可择良友分工为之,按各人性情分班工作,如是能使苦痛工作化为愉快者。

(1) 工作时间问题

William Godwin 主张一半点钟工作。Owen 主张每日半日工作。Roopkin 主张一日四小时之工作。Morris 主张每日六小时。Cabet Icarie 旅行记内主张夏日七时工作,冬日六时工作。现今劳动工作主张八时,亦有主张六时工作者。又因为机器日

夜不停，工人可分四班工作，以资休息。因为人之精神富足，工作之结果必优美。以上种种工作时间之主张，各有不同，当依社会经济情形之若何，而后定之。

(2) 社会主义与宗教之关系

此问题有许多人反对，以为社会主义与无神论极有关联。实际在学理上言，此二者是两件事。社会主义派别中，亦有主张宗教者，不主张宗教者，不尽皆非宗教者，如耶稣教社会主义者，St-Simon 著有《新基督教》一书，亦赞成宗教，以此书嘱其弟子出版。

科学社会主义与宗教之关系。彼等从唯物史观应用观察社会，以为人非神造者，神是人造者。精神界现象，完全是人间社会物质经济情形之反映。认社会生活是整个者，有经济生活而表现宗教种种生活。如生理的生活、哲学的生活……由是言之，宗教生活亦是。宗教生活一部分亦由经济生活发生者也。社会主义者反对立在旧的经济组织所建之宗教。将来新的经济组织亦许发生新宗教。但此宗教是适用于新的经济组织。Saint-Simon 谓宗教在十七世纪时发生大事情，不过科学能替代宗教。所以彼主张新的宗教，近于科学方面。实行社会主义之俄国亦极重美学，戏剧是发达者。总之社会主义与宗教是两件事情。

(五) 法国十九世纪之社会主义家

法国大革命运动之后，劳动阶级之不自由，不平等，依然如故，困苦颠连，莫可名状。至十九世纪初期，法国发现两种空想之社会主义，对于生产及分配问题，有所主张。

(1) 派以圣西门(Saint-Simon)为代表;

(2) 派以傅立叶(Fourier)为代表。

圣西门(Saint-Simon)之学说

圣西门之史略 圣氏为法国社会主义之首创者。生于一七六〇年,为巴黎人。属于有名之圣西门公爵之支族,其祖宗霞列曼尼(Charlemagne)是贵族,祖父名 Louis François de Saint-Simon。其贵族称乎有二:(1)法兰西之贵族,(2)西班牙之贵族。据其所言,曾受业于他浪柏(d'Alembert)及省第奥塞(Cendovcet)。十九岁时,前往美国,投入革命军当志愿兵,共同抵抗英人,后任为联队大佐。此为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然圣氏之注意点,不在战争而在对于战争之目的,以为战争无甚趣味,故彼极喜研究政治。后回英国,英政府以其运动美国独立,逮捕之。后回本国,又至墨西哥,在 Nedriel 开辟运河事业。当圣氏在青年时,心中即抱极大之志愿。每日早晨嘱仆人告伊以警语曰:“先生,尔其记之,尔尚有许多伟大事业当为之。”一日梦见其祖宗 Charlemagne 预告之,谓伊必大得志于后日,故彼早年计划中,有一种是将大西、太平两洋,开一运河,以联结之。一种是开 Madrid 运河,达于大海。法兰西革命起时,因参加乱事,被捕入狱,故无显著之成绩。当一七八九年时,市中人民因其声明取消伯爵(伊以为贵族制度是极卑污者),欢喜其有平等思想,故举之为市长。但圣氏经营土地投机事业,积得十四万四千法郎,伊谓此不是为彼自己享用计,不过作为实行将来计划之资。所以不久财产荡尽,穷苦万状,每日只得水与面包而已。厥后每年得到四十镑之资金,借以维持生活,同时又写其著作,精神因之

不乐，幸蒙其老仆之扶助，时时救济之以资财。不料至一八一〇年，仆死，济给毫无，受饥寒之压迫，达于极点矣。当时著毕两种书：

(1) «Sur la science de l'homme» (《人类科学》)

(2) «Sur la gravitation universelle» (《宇宙重力》)

然无钱可以付印，乃致书于友人，说明苦况请求援助，略谓目下境遇，衣食毫无；然察出欧洲必有大危机，不得不实行彼所计划之制度，此时竟无一人相助，未遂其愿。当圣氏壮年时，因为欲扩充自己对于事物观察力，使之愈加精当，年未四十，即学竟各种科学，尽七年之力研究生物学与法律学，并且实验许多事实。然有一事为伊生平最不得意者，即与其妻结婚仅一年，两人性情不合，得其妻之同意，遂宣告离婚。至六十岁时，因各种事业失败，颇觉绝望，而家庭又不好，常想自杀。到晚年，方收几个热忱弟子。其平生著作如下：

(1) «Lettres d'un habitant de Genève» (《车列夫居民之书信》)，一八〇三年出版。其早年著作多半属于科学及政治方面。

(2) «L'industrie» (《工业》)，一八一七年出版。发表社会主义之意见。

(3) «L'organisateur» (《组织者》)，一八一九年出版。

(4) «Le système industrie» (《工业制度》)，一八二一年出版。

(5) «Catéchisme des industriels» (《工业问答》)，一八二三年出版。

以上后三种书，将社会主义之意见，加以阐明。

(6) «Nouveau christianisme» (《新耶稣教》), 一八二五年出版。此书为其生平最后而又最重要之著作, 彼本无神学之观念, 著此书时, 觉亦有神。

是年(一八二五)圣氏歿。其最得意之生徒是孔德(Comte), 后因与彼宗教意见不合, 遂分离。临终时, 彼召弟子名 Rodrigues 者(亦颇优秀), 以尊重之言辞, 告其生徒, 嘱其将 «La production» 杂志继续出版。此时彼精神不佳, 经一小时, 再言, 设我辈发印第二期杂志后, 一定使劳动阶级, 于十八小时内, 组成工党云云。

圣氏歿后, 其徒分为两派: (1) Bazard, (2) Enfantin (此两派之大意, 后当详言之)。

圣西门社会主义所处之地位 圣氏历史观, 前既言之, 今研究其思想与社会主义之关系。社会主义分两种, 即空想的社会主义及科学的社会主义, 彼之社会主义是属于空想者。但一般人均鄙弃空想社会主义, 因为不能实行之故。至于科学社会主义可以实行, 遂为人所重视。其实不能如是, 因空想社会主义是母, 科学社会主义是子, 故其关系颇切, 此二种主义不同之点, 即在历史观各有不同。如空想社会主义, 以为社会之进步, 由于理想。科学社会主义以为由于经济之条件, 若无经济条件, 无论有何种思想, 决不能使社会进步。然研究思想史, 不能因新的与旧的相反, 有所分别。尤不能信仰科学社会主义, 遂将空想社会主义放弃不顾, 要知空想者在科学上面亦有功绩。圣西门是生于由空想社会主义变到科学社会主义两者连结之时期, 实为二者中间人物, 故彼历史观, 先系主张智识之历史观, 后主张经济之历史观。承受彼智识历史观者是孔德, 承受彼之经济历史观者是马

克思。可知立于由空想的向科学的进化之程度而为开拓唯物史观之道路者，实为圣西门。彼是浸染于福祿特尔时代之理想，而同情于革命精神之自由人道主义者。此三人观念，以为社会是如何能进步，空想社会主义者之见解，以发见真理为实现理想社会必须之条件，故主张依人间理性的力量，能实现社会主义，此为该派的理想历史观。科学社会主义派，以其根据置在唯物史观之上，依人类历史上发展过程之研究，于其中发见历史必然法则，于此法则之上，主张造成将来之社会（包括经济的历史观，如经济问题不解决，则无希望）。然社会主义以理想为根据，极不稳固。以社会的经济条件为根据，较为稳固。社会改造及历史变迁，不能从人任意为之。十八世纪启蒙派之社会哲学为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依科学法则组成系统，认社会主义是历史造成必然之结果，其主张乃有强固根据。若仅以人的理性为根据，力量极为薄弱，如砂上建楼阁也。自科学社会主义发生以后，于是立在人类历史之必然行程上，有具有绝大势力的历史为其支撑者，则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绕日之一样确实。而圣西门不仅是唯物史观开拓者，且为社会学之航梯，又为历史学之先趋。

圣西门与孔道西(Condorcet)之比较 圣西门之主要师友为孔道西与几个生理学者。圣氏因之得到两种主要观念：(1)伦理与政治全以物理学为根据；(2)历史是进步者。其历史观即主张进步。孔道西以智识进步之运动解释历史，主张亦同。但其以为孔道西用此原理，似嫌狭隘。于是犯两种错误：(1)不了解宗教的社会意义；(2)谓中世纪是前进运动中无用之中歇。圣西门看出宗教有一白然而合理之社会任务，不能被认为单纯之害恶。孔道西之观察人类在社会上，关于一切现象均有互相联络

之理，谓宗教是由科学而决定，政治又由宗教而决定。故宗教之系统，适合于科学，宗教之组织，基于当世科学发展之态度；因之一代政治组织，适应于此宗教组织。孔道西又提议以为人生与历史，有何种关系，其价值乃给人以材料，知将来之情形如何。圣西门崇奉此提议为教义。但在孔道西之非科学方法上，预见将于不可能。为此预告，此运动法则必被发见。而孔氏不仅不立下法则，抑且未曾寻求此法则，故不指明如何供给吾人一种材料之方法，只遗留以为后学者之探索。是以在十八世纪之思想家，将“进步”作为立在极不充分之推论上之单纯假使，遗留于后世。彼辈之承继者乃欲象物理法则相同之社会法则，以求其科学假设之列，此是圣西门之目的，亦是孔道西之目的。故我等可称圣西门是孔道西之继承者，而孔德是圣西门之继承者。

圣西门之历史法则 圣西门之见解，以为宇宙一切现象形成一个有统一之全体。各种科学之任务，在于其特有范围内，发见其统一，即在探究现象间之因果关系。今人类事实是零碎驳杂，无系统者，普通历史家，将此种零碎事实记录出来，以特种记载说明君主、战争等所谓显著之政治现象，遂以为能事。此种态度，非改正不可。历史是活泼、整个者，虽无此种零碎之记载，而人类之种种生活仍是存在。故历史现象，如以之为一个全体而观察之，则必有何等统一，何等因果关系。关于此点，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无何所择，不可不以历史为一科学，探明白历史现象间因果关系之后，则其法则即能建立。因之历史过程，均能说明过去及现在，而且可说及将来，即依此亦能预测将来之社会如何，将来历史之阶段如何。如是，则历史之范围，实联系过去、现在及将来，而为一个一贯之法则所支配。

只能与国民以感伤之悲痛而已，国民丝毫不因是而陷于不幸。此何故？其理极明。候补者殊易得，能继承而愿继承者不知凡几也。综观其说，可以知其如何崇拜科学、艺术、产业，如何轻视政治家及贵族、僧侣。然在此时，其社会观，尚不能说是经济者，此处尚认科学家、艺术家与产业有同等价值。而《产业者问答》，其思想趋于经济方面，社会上之基本阶级则以产业为最，学者及技术人员则居其次，而产业阶级中之人物，则为劳动之农民、手工艺者及立在生产与消费者中间之商人三种人物也。凡社会大多数之幸福增加则社会进步，否则无进步。劳动阶级乃是一切财富的最大原动力，在社会上颇占重要位置。故欲改造社会，不得不谋劳动阶级精神与物质的幸福，方可增进全人类之福利。

法兰西之中产阶级利用无产阶级（劳动阶级）虽推倒封建贵族，增进自己之位置，然仍无好结果，劳动者仍未得到利益，故使劳动者执政，即可改造社会，使社会进步。

从上面历史观及社会观等观之，可知彼为社会主义者。

圣氏犹有黄金时代观，与其秘书 Augustin Thierry 合著一书，谓：“诗人曾有详述黄金时代。以过去言，此为铁之时代。彼谓黄金时代不是在我辈之后，是在我辈之前。故先人未见过，而子孙则或可见到，吾人乃其开拓者。”圣氏欲以全欧合成一国，则世界亦可联成一国，设英、法二国联成一气，则造成一种联合之国会。圣氏对历史以为有孤立方有联合，有反抗始有协和，有战争方有和平，欧洲中世极有效力，今应有一种标准，须立于科学之上。欲废止自由主义之经济组织，必依各人能力，从事劳动，按其成绩分配，此为合理之点。此与傅立叶之学说不同，因其信国家之权力来统治，以为国家有最高理想因势利导。然彼则以

此种改革，不在乎急进，在乎渐进者，因以历史上观察，则进步在乎联合与协和。彼有二种历史观：(1)破坏时代，(2)建设时代。

原始时代则为食人时代，渐变为奴隶制，旋变为农奴制，以后则发生资本家、雇佣劳动者。求此最后之方法，则为财产转移交国家，则将来一定发生社会主义国家。

圣氏以旧基督教教则是二元论，而吾人当创造一元论之新教义。彼则主张科学、宗教、产业之三位一体论。厥后其门徒则分为二派，到一八三二年一派消灭，然在当时势力甚大。

傅立叶(Franç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之学说

傅立叶之史略 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此三人均为空想之社会主义家，而以傅氏为最著名。圣氏与傅氏皆为法人，傅氏是一才具优长之人，于一七七二年四月七日生于一贝撒康(Besançon)，卒于一八三七年十月。彼是一火布匹商人之子，在本城学校读书，得了一种完善教育，傅氏对于学校功课均完全领悟。然因从事于商业，不得已舍去学业，在商店中度了青年光阴。其父死后，继承其父之遗产凡三千镑，以此资本在里昂(Lyons)经营商业。然当法国恐怖时代，里昂为Iacobins党人所袭，资产尽失，且被监禁，几伤生命。出狱后即投身陆军界中。越二年，又恢复旧生活，经营商业。后为人作买办，所得甚微。彼在辛苦生活中，而其改造社会之热诚是极高。读其著作，即可了解其人格，其为思想锐利之批评家，但其思想有神化之气味。彼谓将来人类之寿命，平均可以活到一百四十四岁。狮子可以耕田，鲸鱼可以使之拉船，河马、狼可以替人作奴隶，且甚忠实。海水是咸，将来可以变为极香之柠檬液体，南北极可以变为极温和者。此种

主张似有神化之讥，然其中确有表现梦想之特性。其改造社会之热忱，亦因之而表现。其中有些思想是极其精彩，吾等取其精者，弃其糟糠可矣。

傅氏在幼年时代，觉得当时商业制度之种种缺点。当其五岁时，有顾客至其父亲商店中购物，谓客曰：此物坏矣，望客不必买。其父亲责之曰：为商者应说坏者是好者来欺顾客。因此甚为怀疑。盖彼在小学时受诚实之教育，故主张诚实。彼至二十七岁时，住在马塞伊，当时法国粮食恐慌，适米商有大宗粮食，因遭饥荒，居奇不售，使社会上缺乏之后，即可重价而沽，然饥民饿死者多，而麦又腐败不堪，彼以为非烧毁之不可。盖其心中以为商业制度，含有许多罪恶及不道德之事情。彼受此二事之刺激，所以主张施行社会主义，设法补救各种恶制度。

傅立叶之社会思想 傅氏关于社会制度之思想，以为社会上有一种人生产财货，有一种人不生产财货——消费者。消费者可谓之是社会上寄生虫，其中可包括小孩子、妇女、婢仆、海陆军、管赋税之官吏、商人、赌博者、囚犯种种人，而以商人为寄生虫中之最利害者。商人于生产者及消费者之中间，管理流通商品之事情。人身流通是由于血液，商人亦以此自夸，其实彼等借此种口实，吸收社会之血。商人由生产方面言，可说是一种海寇，绑票诈财。由消费者言，可说是蛛丝网，专待不注意之飞虫，陷入其罗网。故彼以为商人始则用暴力之强夺作手段，现在则用欺诈来作手段。常人以欺诈为不名誉，但在商业上几以欺瞒为商业之道德。如商人中有经纪人、堆栈者及小买卖等，每样商品须经种种剥夺，则消费者负担甚重。彼对于商人如此严酷之批评，可以知其对商人恶感殊深。

各商人自私自利，故若辈实在无秩序、无组织、无政府状态之下，一面由大资本家独占，一面则小资本家被压迫而零落不堪，劳动者愈陷于悲惨之生活，故生产虽丰，而民生日以凋弊。

彼对于政治之主张，当法国大革命前，“民权”是极普通之口头禅，彼以为国家之最高主权在民，而民为真正之主权者，实“民约论”之影响也。此“民约论”在法国革命时极盛行，人民均说此语，当是人得此主权之最高者，无论好否，均须绝对服从，现在均不然矣。此种人民之主权论，究有相当之价值否？在社会阶级如此悬殊之时，人民主权论恐无相当之价值。

傅氏以为未来之社会论，建筑在宇宙调和之上。彼谓：社会是应该调和，而现今之社会是在极昏乱之状态。彼以为人民不知分配社会之法，所以始见混乱，若将法则明白，可使社会极调和。彼谓：人类极多欲望，此是人给人者，许多欲须任其自由发展，社会方见调和；人欲任其自由发展，此为宇宙极大之法则；人人均承认人欲是恶者，故作许多社会组织，而社会反发生混乱。

傅立叶之劳动理论 彼对于劳动者有极重要之理论，劳动者在工厂中如囚犯，而作工极为单调。若辈之精神身体，日坏一日。劳动者失业，实为分业之结果，因现今分业是大规模者，而失业者愈多。如美国人是极需要装饰品者，设其需要程度减少，在法国即有许多工人失业，陷于贫困状况矣。尚有一种是企业家，利用劳动者之失业，使劳动者之工资愈减低，失业情形，不但使失业者受苦，即不失业之工人，因此而工资减低矣。国家法律不能保护工人，不过使有钱者度享福之生活而已。

傅立叶之四种运动说 傅氏受牛顿(Newton)之影响，以为牛顿发见引力之定律支配世界一种运动，彼亦想以引力法使

道德界有齐一之法。著《四种运动说》(«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于一八〇八年出版。彼以为引力之定律是普遍者,足以支配世上各种运动,此种运动凡有四类:(1)物质、(2)机械(有机)、(3)心灵(动物)、(4)社会。此种命名,在道德界发明一种法则,与牛顿之引力法则相同,名曰感情的引力法则,或谓情欲之引力法则(Law of passional attraction)。彼以为情欲是本身之自然,然在社会中极受苦痛,故情欲为人生苦痛之渊源,故应造成自然法则,情欲自然活动,不宜阻碍之,庶得快乐之渊源,即可得情欲之调和。此种主张,起初不能引起大家注意,因此毫无势力,直到涡文及圣西门所倡之社会主义运动逐渐衰歇,其学说渐次得势。此外尚有重要著作:1.《家庭农业组合论》,2.《产业的引力论》,一八二二年出版。此外,天地开辟(宇宙原理(Cosmogony))是一种奇异制度中最奇异者。即彼相信世界只有八万年之存在,可分为四时期,前二期为向上者,后二期为向下者,最初一期为五千年,可说是幼年,最后一期亦为五千年,谓之老耄时期,其余七万年为黄金时代,方有幸福享。于是我辈推知傅氏之历史观是神化之历史观。同时可以察知八万年后,亦有循环之历史,彼以为人类须实行合作调和,渐入黄金时代。且谓人不必悲观,以为人是要轮回者(metempsychosis)。此说有人讥笑之。又谓此地球之生命终结,人类仍可移至别地球去。

傅立叶之华兰集团 彼之理想之社会主张,以社会单位之家族 Phalange 自一千五百到二千人之多,则自行生产,自行消费,组成 Phalanstery,内部除自住外,则有种种公共之建筑物,以之公共享乐一切,而内部分组,以人类有十二种感情,照每人愿意入某组则任其意。由组而成部,由部而成 Phalange。其

权，以法律限制人民，夫妻制之形亦成立，此时代亦可谓之骑士式之道德时代，如日本武士道以强侮弱为主旨；B. 产业的封建制度时代，为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反抗贵族，渐占优胜；C. 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力量渐大，可以左右社会。以上四时期加文明时代所包含之三时期，合成为七时期。历史学家亦常参考其说。

路易·勃朗 (Louis Blanc)

法国社会主义者，除圣、傅二氏外，尚有二人，可言及之。其一为 Louis Blanc(路易·勃朗)，其二为 Proudhon(蒲鲁东)。先讲路氏。吾等知圣氏与傅氏，是法国最重要之社会主义者，为社会主义之创始者，彼二人所注意是宗教之热心与“四海皆兄弟”之感情。自路氏出后，社会主义运动，即与法国国民接触实行之地步，当时圣、傅二氏之空想社会主义渐渐衰歇，而新的社会主义思想未曾发达，使之不中断者，全赖路氏一人之力。路氏以为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非常有关系，欲用政治之力量，实行社会主义方妙。路氏亦可称之为社会主义者，在此过渡时代，彼极为紧要之一人。

路氏于一八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诞生于马得里地(Madrid)。当时正值西班牙皇位不定之际，其父在西班牙 Joseph Banapart 之下为财政总长(或说是作会计)，日后 Joseph 失势下野，其父亲回国，携路氏归，因之路氏在乡村过少年生活。一八三〇年路氏至巴黎□□专门学校读书，法国大革命时，其父亲卒，陷于贫困之地位，一八三四年至《Le Bon Lens》杂志为编辑。此时法国大起铁路争执风潮，乃杂志主人主张铁路私有，而路氏主张铁路公有。两人意见不合，遂离去。彼年青时在巴黎

作新闻记者，极负盛名；至一八三九年创办一种进步杂志（«Revue des progrès»），此是民主党之机关报。路氏之最有名著作是《劳动组织论》，其内容渐渐在«Le Bon Lens»杂志上发表之，至一八五二年此书发行至第九版。又著《十年史，1830—1840》一书，首卷是一八四一年出版，至一八四四年出至十六卷即完成矣。至一八七四年此书在巴黎发行至第十六版。当时法国国家发生大变动，彼亦参与其事，故观察事情极透彻。彼著《十年史》以后，又有更大的著作发表，即为《法国革命史》，共有十二卷，彼以十九世纪之眼光评论法国革命之价值。一八四八年二月，与同事之工人 Albert 及与同事过之议员 Ledra-Rollin 作社会主义之法律工作，甚受法国当局之反对。当时彼供职法政府，彼想设劳动部，大家均反对之，彼即辞职，同僚挽留之，请其为卢森堡劳动会议议长。悬此虚名，无裨实际，彼虽热心作事，只是虚度光阴。此实法国当局想法不使彼离开，多出一反对党，故名之为会长，一面又要丧失其信用，谓其徒托空言，无裨于实用，以人民为试验，每每失败，使之无法施行其主张。路氏要求民主主义之国家，须设立许多工业联合会。彼谓此会为社会之工厂（国立工厂），可渐次代替私人之工厂。彼又以为人人均有劳动之权利（生存之权利），欲求生存必须劳动。此种学说在劳动组织之中发表者。政府方面之人顺其意设立国立工厂，实含有恶意，命其敌党 Cmille Thomas 为厂长。乃工厂不久即闭业。Cmille 捏造许多黑幕宣布之，使路氏对于公众信用丧失殆尽，彼对此事殊为愤慨，有几个明白之工人，亦非常抱不平，但彼得势不久，即丧失权力。彼虽表同情于劳动，但对于劳动界之暴动是不赞成，因之颇有一部分工人不满意。

彼既见恶于法国政府，不能安身，又到英国。到一八七〇年拿破仑败之之后，彼尚在英国，英人甚优待之。在英著《一八四八年之评论》，评论乃年之革命价值。一八七〇年九月八日由英回法，投身于政界，一八七一年二月八日被选为国会议员。彼因反对劳动革命，名望渐低，遂于一八八二年六月去世。社会大众表示哀悼，国会为之营行国葬。

其品格极纯粹，人与之接触，均羡慕之。彼以为人生目的是幸福与进步，欲觅人生之目的，宜由此出发，应当自此二方面之目的来组织社会。现今社会，根本上只是在个人之竞争，世人只知互相竞争，其实世界人类均为弟兄，以掌击人，似不合理。社会上免除个人之竞争，然后方能改革，社会之良者是以感情为基础的。

路氏学说中有几要点：（1）主张人人均有劳动权（生存权）。在社会上设立公共工厂，同时使个人私有工厂之组织，渐渐稀少。因国家设立社会工厂，比较总有利益。私有工厂倒闭，人人均投身社会工厂之间，则私有者均变为国有工厂；（2）国家须设劳动银行，以低利借给平民作资本；（3）各人工作均应各尽其能，因人之能力非人所私有者。圣西门以为能力大则报酬大，能力小则报酬小；路氏以为不然，各人各取所需为佳。其实能力与报酬问题，学说不一，迄今尚未解决。

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

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于一八〇九年生于法之柏桑爽(Besançon)，此处即为社会主义家傅立叶之产地。自法国经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后，平民阶级(被压迫者)立于支配者之地位。人类历史上可以任所欲为，即是时有许多社会思想，如

春日之花，均已怒发，美丽之颜色，骇人耳目。有主张社会主义者，有主张共产主义者，有主张无政府主义者，圣氏、傅氏与路氏等之思想，在此时极流行。

当时 Cabet 著书曰《Voyage to Icaria》，其思想亦有一部分信仰之。彼为共产主义者，因主张革命，不安于法国，出奔英，受英国乌托邦之影响，故归法后，乃著一书。此书流行于美国，大受影响，当时美国新村运动勃兴，均互相有关系者。蒲氏是当时之一人，其父亲有谓是卖糟酒之小商人，有谓是箍桶匠，总而言之，其父亲之工作是极微贱，然为人是极正直者。有一次蒲氏告其友曰：“余父是极诚实者，其为糟酒业，所定买卖之分量是极公平，不取过分之利。”如此结果，必入贫乏之途，其父亲终在贫乏中死去。故蒲氏幼时只过贫乏之生活，别人互助之，就本地学校读书。虽因家贫不能致书，然其却向同学借书，将所欲教之功课钞录之，以备应用。彼此时极有趣味之事，即其一日得校中多种奖品，回到家中，却无一点食物可以充饥。至十九岁即在一印刷局当排字匠，到二十七岁，其与朋友经营印刷工厂，越二年，其朋友即死去。当时彼无功夫研究学问，不过还时常至街上图书馆去读书。

至一八三七年，得到一种津贴，每年计一五〇〇法郎，以三年为期。此为柏桑爽（Besançon）学校用以奖励一般有望之青年。于是蒲氏得此奖励金，即至巴黎读书，当时著一书，名《何谓财产》，至一八四〇年彼将第一著作《财产是何物？》（《Qu'est ce que la propriété?》）付印。彼对此问题之有名答案是：“财产是赃物”（La propriété c'est le vol）。此书出版以后，蒲氏声望大超，舆论界亦注重之。柏桑爽学校对此种著作，自然是不甚赞

成，并且有一种谣言，谓将其津贴取消，然此事未见诸实行，仍照常得到津贴。法国教育总长亦以为彼为危险人物，在此时蒲氏即宣言彼为无政府主义者。一八四三年彼至里昂做运输事业。

至一八四六年，其最著名之杰作《矛盾之经济制度，或是贫困之哲学》（«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出世，此书之意为 Marx 所反对，Marx 著《哲学是贫困》反驳之。至一八四七年，蒲氏弃去商店经理人之职务，寄居巴黎，居然为一革新运动之首领。不久二月革命即起。当时著一本杂志，名《人名之代表》，厥后又著×××杂志。一八四八年六月，由巴黎市民选举伊为议员，即建议于政府，主张设立交换银行，此银行可以发行一种证券，无论何人持此证券，可以换银行所有存储之物（面包、用具等物）。同时银行负着一种责任，无资本者借给之，以资本营生意（不须保证）。但是此事完全失败，彼本欲要求五百万法郎，毕竟只得一万七千法郎。因其言词过于激烈，招忌于当局，遂在巴黎监禁三年。至一八五二年已过三年之刑期，即住在巴黎。一八六〇年又被罚三年监禁之罪，此次即奔到比利时 Brussels 避难去矣。后又返至法国，虽继续著书，然其康健已经坏矣。于一八六三年至□□□□养病，至一八六五年即去世。

蒲氏之思想如何？彼是革命之思想家，认私有财产制度是不正当的，不公平的，实为万恶之渊源。彼对此制度，思想何种方法代替之。

彼对于空想之社会主义者，加以冷酷之批评。彼谓财产是贼赃，是根据此种断言。彼以为财产是夺取别人勤劳之结果，以自己处分之。劳动者对于财产方有自由处分权及享受权，不劳

动者即无此权。细查夺取别人劳动的结果者，是土地所有者，资本所有者，此中人或是以土地取得地租，或是以资本取得利息，皆为分利者，只有劳动者方能生产。

彼谓现在时代第三阶级久已认为有道德者，其实是甚陋劣。此一点亦不必惊讶。将事实列举之，即可明白盗夺之情形。盗夺之形式约有十五种：（1）在街上杀人越货者；（2）杀人之主谋或共谋；（3）破坏人之帐簿；（4）窃取人家货财之行为；（5）欺诈取财；（6）官吏文书之伪造；（7）造假纸币；（8）纯粹诈；（9）用骗术骗人；（10）滥用信用；（11）抽签之彩票；（12）高利取息；（13）以地租或房租生活；（14）靠商业不正当取得钱财（因超过合法之报酬，亦是一种盗夺）；（15）以生产利息之过分者。以上所述均为不佳。至辩护私有财产制度者，约有三点：（1）占有；（2）民法；（3）劳动。蒲氏对此三点均调查过，一一反驳之。

（1）主张私有财产制度之人，对于“占有”一层，以为无论何人，不能任意使用所有者之权利，因土地、财产有占有一部分之权利。蒲氏以为不然，其地方应将生出多少人，与死亡多少人记载之，随占有者之数目，将其来变换，因数量是常常要变换，而人类在土地上占有之数目，亦常常变换。故占有之理甚不充分。

（2）其次所谓民法，据蒲氏说：民法并不是为保护财产而设，是为人类之财产平等起见而设。此种情形是民法所宜有，并不是当然之道理，因为民法根本之精神是在乎平等财产。

（3）尚有一点是劳动，有大多数人主张：无论何人赖劳动所成功之物，是彼所有之物。然蒲氏以为个人决不能生产何种物件，不必赖旁人援助之语，无论何人不能如此主张，如农夫似乎可赖一人生产，但细心研究之，决非一人所能办到，所住之屋有

赖于木匠、泥水匠之力，衣服须赖于裁缝……犁耙等须赖铁匠。故每种生产物是社会集合劳动之结果。

蒲氏之经济思想，极受 Pellegrino Rossi (蒲氏之师) 之影响。彼对于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均厌恶之，因此二者皆压迫自由者。而其学说之精华是自由，以为商业自由，教育自由，皆永远自由者。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课人民以劳动义务(强迫劳动)是侵害人之自由，并将人类个性，创造意志、爱情之趣味，均否定。由此一点，断定共产制度与私有财产制度，虽不同，而不平等之精神则一。在共产制度之下，无论智愚、贤不肖，均须同样作工。故彼以为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是强有力者压取弱者，在共产制度之下，使弱者压取强者而已。聪明才智之士均被压迫。故彼认共产制度，亦是奴隶制度。人类应当自由，而共产制度则压迫人之自由。人类应自由为别人服务，不愿受旁人之命令工作。此是蒲氏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观察。彼由消极方面，批评此二种制度，概括言之，彼以为人人均有平等占有权。然伊并不想永远作一批评家，故于一八四八年革命后，即建议于政府，设立交换银行。彼以社会问题，不能起于财富之生产，而起于财富之流通，换言之，即在分配。社会上经济组织，被立在奴隶状态之地位，是因为有二种物件，一种是货币，一种是利息。货币为物是交换之工具。有鱼者想得米，有米者想得鱼，货币在其中作交换之媒介，货币之作用是由此起。又利息之起，则由于资本家之剥夺，资本家取重利，即是给社会生产阶级一种极难堪之重负。资本家以放款取利息，极有害处，而平民阶级不能不需资本，因无资本，不能经营小买卖。资本家欲重利息，将已成就之生产事业，夺去极多。设社会上有一种制度，代替必需之资

本，则劳动阶级即可逃出资本家铁锁之下，而解放出来。彼欲设立交换银行，将货币、利息二者之弊害均免除之。（1）货币作用可以消灭；（2）以低利息借资本于生产阶级。至交换银行证券之办法，即凡制造者，将所造之物，可到该银行换证券，以此证券可以换得价值相当之物件。证券之价格则是实在者，而无某种余利，但定价格则由行内价格委员会规定之。

彼于革命临时政府时提议案，因有人以为扰乱财产之秩序。否决而后，彼自己以股份设立国民银行，后因被捕，事遂寝。

彼之政治思想，则为无政府主义，其观念立于自由及正义之上。故彼以为法律是束缚自由之物，并为保护权利所有者之利益而设。因之赖法律束缚人类，以死物束缚生物，实有害处。法律、国家乃违反正义及自由之物。所谓法律、国家，不过有产阶级之维持其地位者。彼以为无政府主义是为有秩序之状态，凡有违反自由与正义之物尽行废除，惟有契约则须遵守，但结契约与否须由人人自由之意志为归宿，然结契约后，则须遵守，盖尊重自己之人格及别人之人格也。所以彼主张联邦制度，许多团体可以由契约而联合。彼不主张主权集中制度，盖中央集权，必发生压制之事。无政府主义并不是否认一切之国家，不过须以自由之意志为结合而已。如许多小团体，互相结合而成一公共之国家，而关于外国或国内之特别制度，如关税、外交等等，则由公共管理之。

总而言之，彼有四种观念极为要紧：（1）自由；（2）协同；（3）平等；（4）正义。其经济思想，皆基于以上四种观念。

蒲氏之历史思想与孔德有相同者，孔氏分人类史为三期：（1）神学；（2）玄学；（3）科学。蒲氏亦分人类史为三期：（1）

宗教；(2)哲学；(3)科学(其实每种学问均须经此三期)。在宗教时期人人讲信仰；在哲学时期人人喜讲诡辩；在科学时期人人极讲方法。其实每种学问对于当时，均有相当之必要。在第一期，若无宗教，人类即不能生活。在第二期无哲学，人类可以永远留在幼稚时代。至今则科学因环境之需要是一定要发生者，而宗教、哲学不能存在矣。所异者，则在孔氏对于政治是主张集权，而蒲氏是主张分权者。

(六) 英国初期之社会主义者

英国初期之社会主义者为欧文(Robert Owen)。彼是一博爱家，亦为英国社会主义开创者，与法之圣西门、傅利叶同为空想之社会主义者，有并论之价值。彼于一七七一年生于北威尔士(North Wales)蒙果墨列协(Montgomeryshire)之新市(New Town)村中，时五月十四日也。其父有七子(彼为最幼者)。原籍 Welshpool, 后移住新市，是马鞍匠，兼事铁商。其母是新市农民之女儿。欧文幼时颇聪明，好读书之名，闻于乡里。十岁即赴伦敦，在某商店得点作事之经验。十八岁时移住满切司特(Manchester)经营纺织事业，此时方露出其作事之才能。本可得三千元之报酬。厥后又趋 New-Lanark, 该地有一纺织工厂，彼与厂主得尔(Dale)之女儿极有感情，自后即与之订婚。遂劝诱其各股东、前所认识者，购买 New-Lanark 工厂之股票。自与得尔之女结婚后，即住在 New-Lanark, 至一八〇〇年，作 New-Lanark 工厂之经理与股东。一生经营工业之成绩卓然可睹。彼所管辖之工厂中工人是极贫苦，目睹悲惨之情形，甚想救济之。

先教育工人及其子弟入手，颇有成效。英国王家闻 New-Lanark 厂之名，前来参观。于是彼之学说，有许多门徒信仰之，自己往美国经营“新村”(Owen 派新村)，因人类复杂，遂至失败。其一生之略史如此。

Owen 之社会思想，可分为三期：(1)主张温情主义(劳资调和主义)。彼在 New-Lanark 工厂纺织业时，对于劳动之教育，极为注意，并想改革若辈物质上之生活，彼向政府请求规定工厂法，想借此救济一般工人之困苦生活，自一七七一年至一八一七年之间彼均如此主张。(2)一八一七年以后之 Owen，即变成社会主义者。其原因与动机，是因当时彼目击工人失业之惨状，极力想法解决之之故。彼平常所主张之温情主义，还是不能解决此问题。New-Lanark 工厂之经营者，幸遇见涡文，方能如此待遇工人，其余各工厂之经营者，均为私利，工人之困苦，是不堪设想矣。况当时工厂以外，尚有千万之失业工人，更觉得难以救济，于是有共产村计划之发生。在共产村中，人人必须劳动，给以劳动证券，以此证券可向国民平衡劳动交换所，领得各种相当价值之需要品，彼并想实现其计划，竭力为之。彼之门徒曾在英国实行共产村之制度，未成，彼自己又往美国组织新之共产村，亦归于失败。至一八三二年，第二期之思想即停止矣。(3)第三期从事于著述《道德》，以了其余生，一八五八年卒，寿八十七岁。

涡文在第二期空想社会主义之思想，更详述之。涡文以为社会上种种事业，非为少数人计，应为大多数人之幸福计。据其观察，人生须有圆满之发展，方有幸福之可言。人初生时，性情可善可恶，如一白纸可染红色又可染黑色，故人性是无善无恶，

而教育可以改变人性。彼以为环境是极要紧，一人生活地之风土、气候及生活之资料，皆为一种环境。又财产之多寡影响人之善恶极大，无论何人，遇富厚之生活，受良好之教育，则其性情必佳。然仅命之度富厚之生活，尚不见功，因富家子弟常行恶事，可以想见，故非有良好教育不可。

涡文著有《人口论》，但其论调与马氏不同，马氏以为食物是照算学级数增加，人口是照几何级数增加，故人口增加甚速，而维持生活之食品不足用，因此人类可发生种种悲惨情形，如大战争，大瘟疫等。但涡文之人口论，以为人类可任其自然增加，决无人口不能维持生活之一日，故彼以为马氏是杞人忧天。实则马氏与涡文所处环境不同，始发生相异之论调。涡文主张组织新村，如新村人口增加，可分开再组织之。

涡文社会观之总结。人之性格是不善不恶，一面须改革其生活，使度富裕之生活；一面改革其环境，使受良好之教育，则乃人之性格必佳。从前旧观念，以为人类可创造环境，彼以环境可创造人类。当时英国社会发生失业之风潮，使平民均陷于贫困之境。然此事并不使之悲观，彼以人类有种机械之发明，产业界一定起大革命。彼谓：人类黄金时代，并不在久远之将来，是在吾辈之眼前。大规模之生产方法，可增加人类生产力，人人富裕矣，再加以相当之教育，人类即可达圆满地步。人人均将理性表现之，人类黄金时代，即可达到矣。又主张设学校教育工人，并设图书馆，使劳动界之智识，日增一日。彼努力于此种运动，使工厂法发表出来，其内容虽使之失望，不过工厂法竟于此时开始。

一八一五年左右，英国经济界大起恐慌，产业界尤甚，此种

恐慌是产业革命后第一次之恐慌。当时英国生产品增加极速。但是生产品虽然增加，如果不能出售，则不能换成金钱。英国生产品之销场均在欧洲大陆，如法国亦仰给之，英国方面商品出产益发达，而欧洲大陆之需要亦随之增加，于是英国劳动工人之数目，亦日增一日，在乡作工者，均赴大都市，叩工厂之门，想得稍多之工钱。厥后欧洲起大战争，英国工业界，尚是极活泼生产货物，但欧洲各国买商品之能力，渐渐丧失，于是英国大受影响。生产品堆积成山成林，无法销售，资本小者闭工厂之门，大者亦渐渐缩小而达闭门之地步。英国街市上均为成群结队之失业工人，漂流于都市，不能返乡。若辈只能流为盗贼、乞丐，或者饥饿以死，除此以外即无别种方法，英国政治家睹此情形，是甚为惊讶。大家呼号奔走之结果，亦不能救济于万一。Owen目睹此情形，故不得不将温情主义放弃，主张共产主义。又因彼只能知注意劳动界之生活，故成为空想之社会主义者，而不能成为实际之社会主义者。

从前湍文曾试验过之方法，不过适宜于工厂之内，但在乃种特别经济状况之下，则其思想不得不发生变化。当时英政府亦下购赎意见，其发表意见，大抵以为，机器发明之结果，则出产品无限增加，但货物堆积起来，不能以此遂谓人人之生活均享幸福。故欲人人均得幸福，则对于分配一层须注意，不然货物与人类之幸福无关。当时一般人消费力不能增多，即生产与消费不能保持调和之地步。生产货物是劳动者，而消费者大多数亦是劳动者。劳动者依工资为生活，如其工资多则生活程度可以提高，而其消费力亦随之增加。然现在情形则不然，机器发明之后，其结果使劳动者失业甚多，又加以妇女、小孩亦可作工，于是

企业家利用其地位，争雇小孩、妇女，于是劳动者之工资，不能增加，则消费力当然不能增加，故生产虽多，而消费力不足，货物堆积如山，而大多数之劳动者则颠连无告，当时之恐慌原因即在此。然则如何解决乎？即是增加劳动者之消费力，以消费生产过多之货物，使生产与消费保持调和步骤，最好能有共同生产及共同消费之组织而已。

彼理想中之共产组织如何？即协和合力共产村是。彼设平行四边形之村，村之最小者为一千英亩，大者为二千五百英亩，其人口则自一千至一千五百人，内有建筑物如工场、农圃、牧场等。村之中间则有公园之建筑，而右为教堂、幼稚园，左为学校、图书馆，又有新结婚之寝室。以四间房子成一家，每间房可容纳夫妇及子女各二人，小孩在三岁以下者随其母，越三岁则公育之，故有三岁以上孩儿之公育地。又有寄宿舍，专为超过生二个以上之儿童居住。又有养病室，尚有隙房，预备亲友旅行至此者所用。又有牧师住所及公共储藏室。村之四周，以竹篱围之。在此村内则生产之物适足供消费为原则，然不足时，可向外购之。村中居民，除非老年者、小孩、残废人可不作工，其余均须劳动。劳力所得之生产品，则收纳公共仓库内。此村中各个人之财产，不为必要，而注意分配之平均，则其生产与消费可以调和，而恐慌之忧虑可免矣。

能收容一千二百人之村，大抵须费九万六千镑，每人合中币八百元，如此则失业问题可以解决。此为便宜之事。但政府对此议案是不能实行者。厥后彼在演说会中传布，然无人能完成之。彼以为共产村不仅救失业者而已足，用此法可以改造全世界，将全世界分为许多共产村，以事改造。彼有此决心，不惜以

其资本组织共产村之事业(因其是资本家财产甚富)。后来又至美国组织是村,因环境之故,归于失败。

欧文于一八二四年到美国 Indiana 州,得面积三万英亩之地。此为 Rappist 教派所辟用,彼以十五万美金购之。集合九百余人,组织一新村,名为“New Harmony”。在此地完全按照其计划实行,然结果又失败。其原因则在所招集之九百余人中,国籍复杂。有了解其主义者,有仅为生活而来,不了解其主义者。欧文到美三次,每次均传布其主义。一八四五年至纽约召集国际党之会议。一八四六年又在纽约宪法会议中发表其学说。Owen 派之新村,在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均有组织,结果皆完全失败。但此失败之经验,不能使其灰心,仍然勇猛前进,而且热心运动。二年间将其经营纺织业所赚来之财产,完全用罄。厥后又设立劳动交换平衡银行。此种运动,彼以为现在社会组织,商人居间(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取得利益,彼遂发现此法,按经济上以人力所出之货物为经济财,即商品是。此种经济财有一定之价值,还当以货币计之。但此商品以何理由有此价值乎?彼谓:唯一之理由,即人加上劳动,故有价值。如一双鞋之价值为十元,即因为作鞋时,加上如此多之劳动力。与 Marx 之劳动价值说无异。由此观之,经济财之渊源为劳动。但现今社会对于经济财,均用货币之数目来计算,最好以劳动之分量,表示货物之价值。劳动是如何表现乎?即以作出此货物之劳动时间表示之。现在社会表明一切货物之价值,均用金钱,此即社会上发生弊病之渊源。作鞋一双用十点钟劳动,又假设作一件衣服亦需十点钟劳动,如是则以一双鞋可换一件衣服。但现在社会上衣鞋不能直接交换,非做鞋者,将鞋卖出,然后用钱买衣。占此中

间者,即为商人,从中取得一种利益,结果货物不能按照本来价值交换。如一商人从张某手中买十元鞋一双,又从李某手中买十元衣一件,彼卖衣与张,卖鞋与李,价值须十二元,被商人剥夺利益甚多。Owen 睹此情形,故主张设立劳动交换平衡银行(Equitable Labour Exchange Bank),在此银行中设一陈列所(bugaur),各人于十点钟所作成之货,存入其中,即给以十时之劳动交换券,即以此券可取十时作成之衣服。由此可将在中间剥夺利益之商人铲除。故此种银行可救当时一切之弊害。厥后彼按照此计划实行之,以为此种办法,无论何地均可仿行。其于最初在伦敦设立此种银行。然其缺点即在此银行内所作主要事务为物品交换事情,结果无论何物,凡来交换所即须收受,结果陈列所内有用之物用尽,而剩余无用物。不一年此种银行即解散矣。

劳动交换平衡银行所发行之交换券上用“钟点数”代替一元、二元之数(Owen 为银行之总裁)。管理人、书记为谁,于劳动交换券上记之。该银行总裁仅一人,管理人、书记则各地不同。其纸币中间书“真理”(truth),两旁书勤勉、诚实等字样。彼想用此法造成真理、勤勉、诚实。此时湍文已逾六十岁,仍为劳动阶级奋斗。厥后又组织“各国民各阶级协会”(Association of all classes & nation),在此团体中彼主张社会主义。一八三九年后此团体中人自己称为社会党人。当时英国政治上极受影响(英国工业联合会议,湍文亦出席)。彼于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卒,享年八十七岁。

湍文承认凡人受良好之教育,则人性善。又以为环境是最要紧。彼注重幼年教育,故其于教育学史上亦占重要位置。Be-

ntham 之功利主义, Owen 极受其影响。其人生观以为人之生活在幸福, 且必须在社会上大多数人得到幸福。其改造社会之思想, 主张强迫劳动, 劳动价值于现在社会主义上有极大之影响。其失败之原因, 在资本主义时代之环境, 各人之个人资本主义之观念太深, 故其实行不易成功, 而归于失败。

(七)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基督教社会主义中之最著名者三人: (1) 金斯黎 (Charles Kingsley), (2) 摩利士 (J. F. D. Maurice), (3) 卢得郎 (Londlon)。

金斯黎 (Kingsley) 生于一八一九年, 幼年时在私立学校, 厥后到伦敦 King's College, 又转入 Cambridge (剑桥) 大学, 一八四二年为副牧师, 一八四八年其最初著作为《圣者之悲剧》, 又出《二十村落之二十五演讲》。一八四九年始投身于社会运动, 并作民权党种种运动。看出当时工人贫民沉落于黑暗之环境, 生活殊为辛苦, 此时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均表同情于工人。故金氏亦拟以基督教主义、主张应用作社会主义, 以改良社会。当时有二种报: 一名《人民政治》; 一名《基督教》。彼投稿于此二报, 署名用 Parson Lot, 其著作对于民权党有所忠告。且著小说甚多, 有名者为《粗服与褴褛》, 将无产阶级 (工人贫民) 之困苦, 以沉痛之笔描写之, 作为社会上之贡献物。至晚年思想不免变更, 深悔青年时参加剧烈之运动, 乃改入宗教运动及卫生运动。一八六〇年为 Cambridge 大学校长, 一八六九年辞职至美国游行讲演, 一八七五年卒。金氏为牧师又为文学家。此其略史也。

Maurice 为宗教家亦为文学家。与 Morris 并非一人。一八〇五年生，为牧师之子，少年时亦毕业于 Cambridge 大学，得学士衔。一八三一年为牧师。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五九年之间参加于基督教社会主义之中，热心创设劳动大学及妇女大学。一八四〇年受 King's College 之聘，为历史学之教授，一八四六年为神学之教授。一八五三年对于宗教社会意见，不为大家所满意，遂免其职。一八六〇——一八六九年仍为牧师生活，一八六六年亦研道德哲学教育，一八七二年死于伦敦。此摩氏之略史也。

卢得郎 (Loudlon) 受 Maurice 之互助，同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曾有合作店之组织，关于生产合作多失败，关于消费合作多成功。此皆实际之运动，非空言者可比。彼相信论理上、精神上之努力，可以改造社会。由马克思派之眼光言之，是不认许，唯物史观与宗教是矛盾者。然英国于此种运动，对社会上颇有影响，不能一概抹杀。

John Ruskin (一八一九——一九〇〇) 与 Maurice (一八〇五——一八七二) 为同时英国之艺术的社会主义者，人皆注意之。J. Ruskin 诞生时，英国思想界情形，竟有人称其为静的英雄。十九世纪英国经济情形，或谓德国、意国是产生音乐家，英国是产生经济学家者。一八四五年 Marx 亡命于英，见英国当日情形，方有《资本论》之著作。英国经济学家之鼻祖为 Adam Smith，是资本主义之经济学者，此亦由环境所造成。其发表经济学，英国当时情形，正在自由主义流行之时，政治上主张人人平等，经济上主张自由竞争。其《原富论》于一七七六年出版，此时中古之干涉政策，尚未完全消灭，故斯氏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之学

说,是超时代者。其《原富论》有二要点:(1)即以全世界为单位;(2)主张自由放任主义。其缺点:(1)在计谋财富之增加,乃经济之使命;(2)计量富之价值为人生价值之标准。此缺点为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所指出。财富之增加,不见得社会上的较多之幸福,或因财富之增加,反引起恐慌,故分配问题实为重要。Bentham以为社会上财富之分配,愈不近平等,则社会全体所享受之幸福愈少。对于第二点,彼以为富之价值,为人生之标准。Ruskin谓 *There is no wealth, but life*。此可补救其第二缺点。然其学说为当时环境所演出耳。Malthus之《人口论》。马氏生在一七六六年——一八三四年之中。此时英国思想界在混乱时期,Comte、Bacon、James Mill、J. S. Mill、Bauson等均出于此时(而Malthus死前十五年 John Ruskin始生),在此时发生亦无足异。其发生之原因,是当时有一行卢梭之学说者Godwin著《政治道义之研究》一书,其中所言以为凡社会人生之困苦,均本政府制度不良。马氏反对之,以为人间所受之痛苦,不关于制度之良否,均为自然法则为之。人口总增加,食物增加不及人口,此乃自然之法则,结果一定要发生痛苦。二人因此发生争论。在其第一版中,以为灾害与战争可压止人口之发生;第二版中彼又以为可用道德之制裁,人为方法限制之。Godwin反驳之,以为承认道德制裁即承认可用政府人为制度裁改社会。Ricardo之《地租论》注意于分配问题。李氏于一七七二年生于伦敦。Bentham曰:“予可说是 J. Mill 精神上之父亲, J. Mill 是 Ricardo 之父亲,由是可说余是 Ricardo 之精神上的祖父。”J. S. Mill 生于一八〇六年,其思想将 Carlyle 之唯心论与 Comte 唯物论相会合而成。一八二一年 J. S. Mill 由法返英,

受其父亲之影响，同时受 Bentham 之影响后，与其朋友组织功利学派学会，一八二九年此会解散，当时影响甚大，其发明机关杂志。J. S. Mill 虽属于正统学派之一人，但亦为打破个人主义之信用最有力之学者三人中之一。三人即 J. S. Mill、Carlyle、Ruskin。Carlyle 生于一七九五年，正值欧洲拿破仑战争之后，经济非常窘凋，彼于二十四岁，即努力于劳动问题，以改良劳动界之生活及其经济上之境况。其著作《英雄崇拜论》、《过去与现在》、《法国革命史》、《民权主义》、《末年的小册子》，在英国文学界上，占重要之地位。彼富于冷静高尚之思索力，同时对于现在之希望，图改良社会，非常热烈。对于英之进步党 (Whig Party) 与保守党 (Tory Party)，不承认社会上之人为若辈所受累，因此二党完全是享乐主义之团体。Carlyle 对此，不甚满意。一八三七年法国革命起，英国颇受其影响 (Ruskin 适于此时产生)，正是悲惨之时期，C 氏过其青年之生活。当时朝野所注意者即解决社会上问题，其办法有二：1. 救贫法，2. 参政权。关于参政权问题，一般改革家，以为劳动者在议院中占重要位置，不能解决。有几个学者以为解决参政问题，即可解决面包问题，C 氏亦赞成此说。C 氏与 Mill 于一八三一年至伦敦时相识，遂成密友。C 氏是一极冷酷之批评家，以其热烈之情感，对于当时之改革思想，加以严厉之批评。当时 Ruskin、Kingsley、Froude，均以先生事之。

Ruskin 之略传 Mill 有自叙传，Ruskin 亦有此种传记，名之曰《Praeterita》，然与 Mill 所作者不同。Mill 之自叙传，是极有系统之记载，Ruskin 之自叙传，以极散漫之文学，出之以所能想象之逸话。关于别人为其作传者，则有 E. T. Cook 之《The

Life of Ruskin》一书，叙述较详。其先世关于军事上、文艺上，有许多名家。其祖父在爱丁堡作酒商，至晚年酒业失败，负债累累，未能清偿，即行去世。其父 John James Ruskin（一七八五——一八八四），其祖父命其父至伦敦研究经营葡萄事业。一八〇九年与其朋友二人，经营此业，其具有苏格兰人之特质（勤劳），有管理事业之才。厥后事业日盛，所得资财甚多，不但将其父亲之宿债如数还清，而且积有财产，于伦敦郊外，建一美丽之邸宅，且其父富有艺术，以度其一生。一八一八年与 Ruskin 之母结婚，时其父年三十三，其母年三十一，至一八一九年二月八日即生 Ruskin 于伦敦。其父慈而母甚严，但为善意者。R 氏幼时，母常命其朗诵《圣经》，且须背诵之，训练其有忍耐之性格，此种性格在文学上生有一种趣味之一部。当其四岁时，家住在伦敦郊外，该地风景殊佳，其受一种自然美之薰陶。四岁时即能作往来书信，七岁时能诗，二十岁时即有许多文学上之作品。自己批评其作品，并不甚佳，不能称为诗，觉甚惭愧。R 氏幼年时有三种品性：1. 平和（受其父之薰陶而来），2. 服从，3. 信仰，此为其母教所造成。因其家庭教育甚严，有一种专注之精神。十一岁时开始学希腊、拉丁语、图画。十七岁时从事于恋爱生活，中经一种悲惨离婚之事，颇受激刺，然彼于其女性并不咒咀，且以自慰方法，自慰其性灵。后作 Oxford（牛津大学）之学生，于一八三七年起，一八四〇年因病休学，一八四二年毕业。其父亲费巨资为其子求学亦所不惜。当其读书时，其母因爱子之故，至牛津大学附近居住。其父亲因事业之关系，只能于星期日至牛津看其母子。其父母常游览欧洲大陆之名胜地，Ruskin 随之游，鉴赏自然之美，受此感化甚深。一八三三年游阿尔卑斯

山及意大利。一八四〇年正在牛津大学因恋爱关系生病，为失意之时。其最初著作，而且最著名者则为《近代画家》（《The Modern Painters》）。此著作作为其艺术家生活之初步，著于一八四二年秋冬之交，每作成一部分，即对其双亲与堂妹诵读一次，其双亲甚为快乐。其著作之大意，以无忌惮之文，将以前所有之论断推翻，而阐明美之观念与 Bacon、Rousseau 等同。此三人在思想界上打破背谬间真理之路。B 与 R 主张自然，Ruskin 亦处同等之地位。一八四三年五月出版。以为古人之艺术不及今人。其父亲以为不必署真名，只署一假名“牛津大学一毕业生著”。论美一段云：“以为美之观念，表现人心最高尚观念之一。美常在一定之程度，常使人心高尚、清洁，渐渐增加，不断的受美之感化。其原因即由于天意人意，宇宙之间无一物不是传出一种美之观念。由正当知觉之心，观察一切事物，其美的部分较丑之部分为多。在自然中无丑之物，只有美者。在自然中所含之美不有多少之相差而已。丑是助美者，使周围之财物，宇宙之事物，愈显明，显尽宇宙间之美。”彼又谓：“青年之画家应以纯一之心情往于自然，如此，则尔宜想一想，方可描写出自然的真真之美意。宜以忠实的纯一的心情，与自然物之步骤相合，不宜以等闲视之，意不从事于自然，来放弃自然。”此自然之论调，在美术界及文艺界，有批评者，而赞扬者亦多。后由伦敦移住于 Denmark Hill，一八四一年（？）其母死时仍住此地。一八四四年五月其父生辰，其为父祝寿毕，携全家同至瑞士旅行，为第六次。其在旅行中，见意大利古时艺术品甚佳，遂起重视之心，以前对于古人艺术品常轻视之。一八四五年四月到各处旅行。由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间著《近代画家》第二卷，于一八四六年夏

发刊。一面将原稿交于印刷局，一面全家到□□山游历。厥后一齐出至第五卷，完成其著作。尚有一种著作作为《建筑之七灯》(«The Seven Lamps of Structure»)一八四九年著成。书中大意谓：建筑术是国民生活、历史、宗教，种种特质之反映出来，到建筑之民艺上。所以研究一民族之建筑术，即可知其历史、生活、宗教。其所谓七灯之光明，即是：(1)真、(2)美、(3)力、(4)牺牲、(5)服从、(6)劳动、(7)记忆，七种。在此书中，其谓美术是表现道德上、智力上、民族上、社会上之理想的方器。此种理论均在七灯上发表之。于此著作外，尚有《文尼斯之石》(«Stone of Venice», 一八五一年夏第一卷出版)，说明信仰、思想、习惯，种种民族之表现。即说明全民族之艺术。家庭或官室建筑反动之现象说明出来。彼谓一国国民之历史与其说记于书中，毋宁说记载在片石上，其对于碑、石、雕刻非常注意。彼以为伟大建筑物，即说明一国民道德之如何高，劣等建筑物即粗暴之民之不道德。此书即发明其艺术哲学与其社会改造结合之要领。当其书发刊时，英伦敦均开博览会，各国名士均来伦敦，大家对于其书加以赞赏。即Carlyle之冷酷之批评，亦称为奇绝秀绝，史之说教，谓其书是建筑学最良之书。如此之批评研究之目的与精神，方能说是现代之特征。并谓此书如新之文艺复兴，可知其价值之高矣。一八五二年 Ruskin 至 Venice，一八五三年春此书全部完成。此书之要点即指责出来，近来劳动者为机器之奴隶，将人之趣味，销毁于机器之中。机器工业于道德上、精神上均有缺点，彼将此缺点，一一指出。彼富有一种极富裕同情心，可说是美术之批评，社会改良家，同时尚说彼是多感情之教育家。其前半生是艺术家，一八五一——一八六〇年彼依然是

美术批评家，然其改良社会之新色彩，显露于其著作之字里行间矣。一八五一年后 Ruskin 往来于伦敦，作社交之生活，常同贵族往来，然归家后觉社交甚无味。一八五一年同时又有著作名《羊舍构造论》，书中论英国耶稣教会分立之弊端，想出许多方法以联合之。又有《拉飞尔前派论》(Pre-Raphaelism)。一八五三年开始作演讲生活，在爱丁堡演讲，可称之为处女作讲演。一八五四年与其父母同行至欧洲大陆旅行，又到瑞士，努力作《近代画家》之完成，将瑞士之近世画家均论及之。一八五七年著有《图画之真髓》(《Elements of Drawing》)，此书出后，大受社会之欢迎。一八五六年又出《英国之港湾》。一八五五年起刊行一种《绘画学年鉴》，均甚有用，颇受大家欢迎。从此常与名士交游，又常从事讲演。关于美术及改良社会问题居多数，而美术又为其特长。一八五七年在 Manchester 时讲艺术之政治经济，一八八〇年将此稿整理之，改名曰《永久之欢》(《A Joy for Ever》)出版(是书日本已有译本)。一八五八——一八五九年间，为其生活演讲最多之时期。在此时，有时到牛津或剑桥，以大学为中心，作平民之运动，极力游说。又到 Manchester 演讲，安慰劳动者或互助之，以传其学说。彼有一种信仰，以为艺术为健全个人或社会生活之表现。此观念从前即有，但经数年讲演后，自信益确。一八六〇年《近代画家》完成。关于改良社会方面之书，可看 J. A. Hobson: 《John Ruskin, Social Reformer》书中言运动及生活甚详。在《七灯》书中，彼相信在理想上固然是尊重劳动，即在事实上亦去改良劳动。以前基督教艺术社会主义创立劳工大学(Working men college)，为 Maurice、Kingsley 所立。在此大学中 J. F. D. Maurice、John Ruskin 不仅是理想艺

术社会主义,且为实行者,完成教务,虽夜深不倦。一八五〇——一八六〇年其艺术批评生涯终结。一八六〇年开始为社会改良家之生活,在此年后其著作甚多,其重要者有一八六二年《Unto this Last》讲经济学原理甚深,一八六七年《Time & Tide》书内,为寄劳动者二十五封信之集合。一八六九年——一八八四年为牛津大学美术讲师,听者甚众。一八七一年著有《Fors Clavigera》,对于英国工人陈述自己对于道德上、宗教上种种感想。晚年作自叙传,其父给以二百多万之财产,用尽于公共之运动中。一九〇〇年一月染时疫,经二十日死去,死时将其生平所最爱之物品及名人均环绕其畔,遂溘然长逝。

Ruskin 之恋爱史 Ruskin 之一生生涯,可说是悲剧之联续,以诗人来看与之生活一样。一八三六年当十七岁时,因恋爱不成之苦,受一打击,时住于 Herme Hill,其父友 Domecy 由西班牙携眷来此,住于其家,乃人有女四,长者名 Adele Chotilde Domecy, Ruskin 颇与之有感情,作小品《求友情》一首与之,然女士亦不以为意,置诸一笑。且其家族恐误事,遂移家至巴黎。Ruskin 缱绻不忘,作七页之长信与之,终无回音,惟 Adele 之妹 Elise、Caroline 二人,以信告之,谓其姊接信后,态度极为冷淡,并无何种表示云。Ruskin 虽不以为悲,然终有试验 Adele 之作品,如《Good Night》等诗,以表示其爱情。厥后 Adele 与法之贵族 Baron Duguesne 订婚,此消息传至后,Ruskin 之母,恐其子悲伤,不之告,后为 Ruskin 所知,于一八三九年作一诗《Farewell》末句有爱慕 Adele 之意。为何 Adele 不能与 Ruskin 成功结婚?其原因有二:1. 二人之性情不同,Adele 生在南欧,Ruskin 生在英国,性情因之不合;2. Ruskin 之母是加尔文新派

宗教, Adele 是加特立旧派宗教, 因此不成。一八四〇年五月 Adele 与法人结婚之消息传来, Ruskin 极受刺激, 因之而病, 漂泊于欧洲各旅馆中, 郁郁不欢。第二期之恋爱史: Ruskin 之母亲与其友 Withers 夫人, 有宗教关系, 故时相过从。乃人有女名 Charlotte 常在 Ruskin 之家玩耍, 时其年十六, 与 Ruskin 谈论, 有辩论之点, R 氏以长文驳之。时不久 Charlotte 又移去, 与一商人结婚, 与其夫意见不合, 不越二年而死。此又足使 R 氏, 加上悲伤也。Ruskin 经两次悲剧, 其母极力安慰之, 介绍女友 Wardell, 然极端不合。后又遇见一女, 与前 Charlotte 同名, 亦与之有情感, 然不成。一八四七年春 R 氏屡次受爱情之打击, 常住在 Herme Hill 与 Denmark Hill 与小孩玩耍, 接近于自然之生活矣。Ruskin 对于爱情常失败, 然不咀咒女性, 可见之于《Ethics of Dust》与《Sesame and Lilies》中, 极力赞扬女性, 并不侮辱之, 且其言曰: “吾决不违背母亲”。第三期之恋爱史: 一八四〇年 Euphemia Chalmers Grey 住在 R 氏之家。R 氏在此时曾作《The King of Golden River》一小说, 富有文学意味, 一八五一年出版。R 氏因其母亲勉强撮合, 与之订婚, 然其结果又加上许多悲剧矣。此种错误三方面人均须负责。1. 其母为安慰其子之悲哀计, 不问其是否合意, 勉强撮合; 2. Ruskin 顺从其母命, 勉强允许; 3. Grey 又不审慎, 亟亟于求婚。因之结果不佳。一八四八年四月十日, 在苏格兰二人结婚, 作蜜月旅行, 因□于野外而得病, 返至伦敦, 在 Park St 购得一房。当其病时, 其母爱子故, 作看护妇, 不免使新妇起不快之感。住伦敦七年, 对于结婚后之生活, 极不能表出真相。一八五一年春日有一艺术家 J. E. Millais 作一品, 为社会所攻击, Ruskin 作文以袒护之。故

M氏感谢之，时与R氏往来。一八五三年R氏偕其夫人Grey至Green Finlas避暑，邀M氏同往，二人时有争论，M氏常和解之。回家后，Grey又不告而行，回至父家，而R氏则自己旅行去矣。此后遂正式宣告离婚。当初R氏之友人来访，Grey常言不在家，友询何以不在家？则答云常为其母所保护，甚至云已与其母结婚，可想见其恨之深矣。离婚后，Grey于一八五五年与Millais结婚，伉俪甚笃。R氏经过此种悲剧后，仍赞扬女性，即Millais与其夫人Grey结婚，亦不恨之，且有许多作品，安慰其自己，并在报上介绍之，称赞Grey。第四期之爱情悲剧：一八五八年与爱尔兰之一女子Rosis Rose (Rosis原名Rose LaTonche) 教其书画及数学等课，此时Rosis年仅九岁，而R氏年已三十九岁，不久又发生恋爱，故有St. Grumpet之绰号。一八六一年彼等回故乡，R氏亦曾访问一次与Rosis谈宗教。一八六五年其姊出嫁，Rose安慰之。一八六六年提出求婚于Rose之父母，然Rose因宗教不同，拒绝之。Rose死后，Ruskin得到消息，觉得十分悲伤。Ruskin之生涯，在恋爱中，演出许多悲剧。其在失恋中，惟一之安慰者，是为自然之快乐。

Ruskin之美术的经济观 奢侈论。R氏对奢侈问题与欲望问题，虽为大家所注意，完全以私有财为中心而生者。其讨论此问题，将财分为两种：第一种财是直接与吾人生活必需者；第二种与生活之目的有必要者。一、即要有用财(used property)如营养而有功效之食物，保护身体之衣服、薪炭、煤及生产之土地，均属之。二、如美丽之衣服、精装之书籍、美丽图画等均属之。R氏解释劳动，由广义方面而言，不仅在肉体，又须包括精神的。根据广义之劳动观察点，可分财为五种：(1)不由劳动而

生产之财，如空气、水、土地属于第一种。因人生于世，当然为人所应有。惟在道德上，此财不可分开；（2）仅由劳动而得之财，此种财为人生活必要品，如简单之衣服、食物、住居、器具、作工所实用之家畜；（3）由劳动结果而能生产之财，但于维持生活无直接效用者属之，不过使吾人身体、精神之快愉及方便而已，如美丽之宝石及器具等；（4）亦由劳动而生产之财，亦不是直接维持生活效用者，而为满足智或情之愉快者，如网球场、图书馆、博物馆之标本、艺术品等有教育之趣味者；（5）代表之财（representative property），如证书、货币等。此五种中，何者为奢侈品？普通财论理虽可说是奢侈，然空气不能算是奢侈。土地与水有时有奢侈之现象，如滥用土地、水等，即生奢侈问题。其余由劳动而生产者可生奢侈问题，出生其对象。Ruskin 以为贫苦问题，不仅是科学经济之问题所能解决，宜以科学、道德、伦理各方面调和来解决。盖用经济观察，不足用也。彼谓奢侈品，无论是个人或全体，即足减少一国民用在必需品之力量。一民族之贫苦人，食未充足，此民族无享用奢侈品之权。彼又谓一国艺术品，仅供上流阶级独自享乐，此种艺术品之功用，不能普及人民，此国家一定灭亡。在历史上可举例以明之，西班牙有 Velesquez 之名，而西班牙随之灭亡。意大利北部艺术家 Leonardo 著名，而意大利北部灭亡。Raphael 美术多而罗马灭亡。有大艺术家，生命即传布国亡警告之钟声。人不可无生活，即不因劳役而贫乏，不因奢侈而腐败，以正当目的与美术行为，所占据之平和而满足者。其对于“经济”（economy）一字之解释，不是金钱消费之意思，亦不是节约之意思，而是聪明之处理调节的意思。详言之，即将人间劳力，用巧妙之处理，合理保存劳力之产物，并用

适宜的合理的以分配产物。 Ruskin 之学说甚多，谈到心的改造，又有许多地方承认心与物之支配，与马克思唯物史观有相同之处。其推崇自然，人类不能离开自然，自然是用人为其解释者，发挥其美，如社会为赞美自己美之人去解释时，自此社会成为健全社会。彼是心物调和改造论，以为健壮社会实现，必须健全之人，如健全人心，不得不要一种健全社会。健全社会如何产生？财物之分配，适得其宜之社会实为必要。现代社会是奢侈与贫乏相结合者。奢侈即缺乏调和。R 氏在其《Sesame and Lilies》著作中，论人类所应作事为何？其结论有三：1. 人类应当度朴素之生活；2. 人类应竭力作健全事情；3. 为竭力作极好事情，应用尽其财产。此三点是对于富者而言，其对富者奢侈与贫者奢侈均为绝对的。Rousseau 主张自然，然有反对奢侈之论，但其以为原始社会是自然的，现代社会是反对自然者，故以为悲观。Ruskin 以为并不悲观，可以改造者，但奢侈是比较之概念，并无一定标准。对此问题，德国学者 Rocher 亦言在此国为奢侈者，在别国即以为不奢侈。富家以为常，而贫者观之以为奢侈。Ruskin 亦主张此意。中国墨子反对奢侈，而在非乐之论中言之。但 Ruskin 并不反对乐。在现今不完全社会中，奢侈亦不调节分配不公平之办法。

Ruskin 在《时与潮》之著作中，谓：“尔可请一大画家 Paul Veroness 为尔作房子之画，亦可请极有名之铸金家 Benvenuto Cellini 为尔铸一杯亦可以，此均可由尔随意。然尔不能为尔自己作珠衣，使一百个潜水夫，至海中采珍珠。”此可表明 R 氏奢侈之思想。

Ruskin 之经济观 有人称 R 氏是社会主义者，亦有不

然者。在一九一九年其百年纪念时，J. A. Hobson 作一论文，谓 R 氏不仅在产业界是一引导者，并且是社会主义者。F. C. Me-storman 赞扬其社会改造论，谓列宁之学说近乎马克思，毋宁近于 Ruskin。社会改造亦有三：1. 人道社会改造家；2. 理智的科学的的社会改造家（马克思等）；3. 虚伪的社会改造家。人道的社会改造家重道德、精神，科学的的社会改造家重理智、科学，虚伪的社会改造家重艺术。Ruskin 兼第一、第三而有之。Ruskin 相信于美之一人。在十九世纪英国思想界之地位上，可与 J. S. Mill、Carlyle 鼎足而三矣。在维多利亚时期，Ruskin 反对个人自由主义，即反对正统派经济学家。其对于经济观念，即是 Economy = goods + good management。所谓 goods 即属于物质的问题，good management 即属于人的精神问题，将此二者结合即成为经济问题矣。

Ruskin 于一八四五年与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办理劳工专门学校，主张将基督教义应用出来，即是社会主义。又主张合作，反对激烈运动，如罢工（过度者）。主张工人于物质生活外，更应有娱乐与趣味之生活。彼所谓娱乐与趣味之生活，即指音乐与美术。此种物是感化者，于改造人心有莫大效力。音乐与美术之娱乐，含有道德与宗教之意味。美术家之制作，均为正当之劳动，不是奢侈之劳动。此种论调与 Morris 相同。彼谓：凡美术之物，一定是永久欢喜，凡永久美之物，应是一切人之欢喜（普遍之欢喜）。William Morris 之美术观说：美术不是特种阶级所特有之奢侈品，是为全人类所必需者，社会上并无将美术物从任何人手中夺去之权，应为大家所享受。关于此点，此二人亦相同。

Ruskin 主张劳动价值说，在其《艺术经济学》发表出来，使劳动者知劳动价值，并要使劳动者认识劳动之趣味。劳动者以锄、犁耕种，其为国尽力，与中流阶级之武士，以枪、刀在战场上为国尽力，文人以笔表现艺术为国尽力均相同。劳动者领受国家年金，应与中流阶级受同等待遇，因武士文人固然不可缺少，而在农田或工场作工之工人，更不可缺少。此说之目的，即使劳动者知自尊，同时使一般人尊重劳动。

Ruskin 亦承认资本家之掠夺(于一八五八年讲演)，载于其著作《两路》(«The two paths»)中，题为《人于自然美术与社会生活上铁的作用》。在此文中承认资本家有掠夺之事实。彼对于金钱是反对者，彼谓：在无金钱之社会制度中，社会是极有幸福者，及金钱成为社会制度，社会即发生种种不安之现象。有几处与 Tolstoy 之无抵抗主义相同，即反对暴动。再者 Tolstoy 以为音乐贵族化，一定是堕落者。Ruskin 也以为美术贵族化，一定是堕落者。彼谓人类生活之泉源有三：(1)美的衣服，(2)润泽的食物，(3)艺术。无论诗人之艺术家与美术之艺术家，想成真正之作品，一定须了解时代之精神，最优最美之作品，是以该时代作材料。

彼对于土地私有制度，甚反对之。Henry George 亦是反对土地私有制度，彼以为土地之不平等，是社会上一切不平等之渊源。Ruskin 在 «Time and Trade» 中发表，对于个人主义学说(John Mill 所主张)加以攻击。彼将贵族社会分为三种：(1)地主与军人，(2)资本家、商业家，(3)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第一类之贵族即地主。最要者即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中，尤以分配问题为要。土地分配有二种难点：(1)土地分配方法与入

数之关系；(2)有许多改革家均有一种个性，若辈以为假使土地分给人民，社会立有幸福。彼关于第一问题，以为土地分配方法虽好，然人口总是增加者，结果不必能成功，现在我辈不必讲人口问题，仅就分配问题立论。第二点彼主张于物质改造外，应有人心之改造。彼对于地租亦反对之。彼谓人之身体、水、空气，均不能当租之物，人无买卖人身之权利，空气亦不能出租，土地亦然。所以人利用土地不能禁止，然须有相当办法。其办法：1. 对于国家有信用之人，以其希望能将才能，领一部分土地，但国家须定法律来监督；2. 领有土地者，必须自己耕种，不能转租别人，征收地租；3. 借用土地之人，应得一部分收入，但应由国家定出一定之额数；4. 所有剩下来之土地，开辟为可耕种之地。

Ruskin 对于阶级斗争，是不赞成者。Marx 即主张阶级斗争者，以为欲改良劳动者之生活，只在阶级斗争。此纯由物质方面去改造。Tolstoy 主张从心的方面去改造。Ruskin 主张心物调节，故二者均须改造。

Ruskin 之乌托邦（理想乡）。其思想完全在圣·乔治商社 (St. George guild)，将其过去二十年的理想实现。为作此种运动，将其遗传下来之百五十万财产均牺牲矣。彼以为(1)无实际的宗教的文明，不能存在；(2)土地上之劳动，于人之生活最为重要，离开土地上之劳动，不能希望人类之繁昌；(3)人之幸福，须有正直、真实在内，否则无正直、真实即绝无幸福可言。彼以为此三种目的，组织 St. George guild，一八七一年，集合许多同志，其中有地主、佃户与劳动者，彼自己先出七万元，同时集资组织商社式之社会主义的小国家。彼谓：We may try to build a small piece of land to make beautiful a peaceful (吾辈

想将英国小块之土地，养成极美丽者，极和平者)。在此处完全适用农业，不用机器，有目的，有思虑者之人才能住在此地。除疾病、死亡外，是无懒惰之人。移住正可自由。大路一小时行四十英里，是不可能者。然可利用家畜之背与舟车之便利运输，而不用机器。在此处有极美丽之花园、菜蔬，田地有丰富美丽之谷物，又有音乐诗歌。彼想以此种物品，作模范之境界。此种新村(理想乡)运动，与日本武者小路之新村，极有相似之处。一八七一年发起此种运动，至一八七七年建设 guild，在英国 Sheffield 附近(郊外)得有十三 acre 土地来组成。Ruskin 为 guild master，凡捐金与土地者，均称为伙计(company)；佃户与劳动者，为居住者。在农业上，所谓人生种植必需的有形的物品：(1)新鲜空气，(2)水，(3)肥沃之土地。人人需用不加限制。彼主张家庭工业，奖励手工，纺织。彼关于美术亦极注意，彼在 guild 中组织博物馆，以使人心改造向上。现在此馆仍在，凡入社者须于下列六条条约签名后方可。

(1) I trust in the living God, father almighty, maker of heaven & earth of all things & creatures visible & invisible.

(2) I will strive to save Him and keep His law and see His work, which I live.

(3) I trust in the nobleness of human nature, in the majesty of its fulfilled, the fullness of its mercy, & joy of its love. I will strive to love my neighbor as myself, and even when I am not, will act as if did.

- (4) I will labor with such strength & opportunity as God give me.
- (5) Not to deceive, or cause to be deceived, any human being for my given or pleasure.
- (6) Not to kill nor hurt any living creature needlessly, nor to destroy any beautiful things.

(八) 费边社(Fabian Society)

费边社之意义,是采取罗马之有名将军 Fabius Maximus 与 Hannibal 战争,彼初时取迁延政策,后待机会临头,立即猛攻得胜。费边社所采取之态度,即是如此,故有此名。此社成立后,有一种极明显之规条上言:尔宜静待时机,取法于 Fabius Maximus 之战略,时机一到,一定须照 Fabius 之勇猛,激烈奋斗。此规条是社中共同遵守之格言。

此社成于一八八四年,起源由于 Thomas Davidson, 彼发起一“新生活社”vite neova (new life), 想寻一地方, 实行共产主义之生活。后来讨论结果,以无地点,即在英国社会上宣传理想,此为费边社之渊源。

新生活社,出一杂志名《播种之时》。其中 Frank Polmore 于一八八四年提议改为费边社。彼等之主张不同,有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主张国家社会主义者,后来大家成为一定的主张,反对马克思主义。然此种社会主义之发生,是受影响于 Marx, 彼等大致亦取其说,但政策上主张缓进,不主张革命。此可说是英国式之主张。对于社会制度,则主张集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

用缓进方法，将生产机关收为国有。有人批评谓 Fabian Society 主张中央集权，不免有其他思想家（如 Bernard Shaw）否认此说，否认消极的集产主义。彼等中著作家甚多，当时组织中多是少年，后来大多数成为有名之著作家，现美之 guild socialism 大多出身于费边社，如 MacDonald（现任英国国务总理）、Sidney Webb（夫妇均是费边社社员，主张工联主义）、Bernard Shaw、Sidney Oliver、Graham Wallas、Mrs. Besant、Hubert Bland、G. D. H. Cole.

宣传主义有二种方法，一种宣传，一种论著。彼等有七人著一《费边论集》，其影响甚大。其论著即经七人之研究讨论而发表之，至欧战以前三十年其影响于英政治甚大。欧战后，费边社之势力渐衰，至今为 Guild Society、Distributionism（分产主义）、Syndicalism 三种代之。于一九二〇年 Guild Society 代费边社之思想而起，Guild Society 袭 Fabian Society 之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之衣服而成。

由费边社宣言中，可以看出几种要点：现代制度，除本人以外与任何人无关系，将国家土地、资本变为私有财产，可使社会纷乱，变为无数之阶级。故彼等主张将土地、资本收为国有，乃大众之责任。又谓：资本主义能鼓励发明均分之说，亦无人相信矣。故主张资本归国有，又主张两性间宜平等政治权利，男子不能以政治势力压服女子（盖费边社中女社员极多之故，有此主张），又对于教育，亦极注重，当时对于大学有一种运动，即用浸灌之方法。

(九) 行会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

行会社会主义为英国特有之学说，亦为最新之运动，我人对之颇饶研究的兴味，据此兴味，而生此种社会主义如何发生之钻研焉。我人看现代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有统一之倾向，大体的方向群趋于马克思主义。德国学者宗巴时(Jombats)于其大著《社会主义运动》一书中，曾谓现代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渐有统一的趋向，此趋向为何？即竟尚马克思主义是也。由此言可证吾人观察之不误。夫此倾向固吾辈所宜知，然各国所有的特色亦岂可忽略。英国之特色，即此行会社会主义也。

此种最新的运动，于思想上运动的体积如何，固难确知；于实际表现上，尚有年月可存。从一九〇六年后发生，一九〇六年前无此运动。最近之可谈的是一九一一年后的运动，因一九〇六年虽发生，仍无何种效力，于一九一一年其势渐大。此主义为对英劳动党之反动，英劳动党采议会政策，取立法手段，达若辈之目的。彼等所认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可说是集产主义，与费边社主张大抵相同。Guild Socialism 是对于两种主义批评之结果而成。此种主义即一为集产主义的批评，一为工团主义的批评。从消极方面言，是批评集产主义与工团主义；从积极方面言，采集产主义之长，补工团主义之短，取工团主义之长，补集产主义之短，撷英摘华，取长补短，得成此特有之主义焉。

英国议会中有劳动党出现，始于一九〇六年之总选举。因此故，吾辈说行会社会主义为一九〇六年发生之运动，然吾辈又可言此是一九一一年之新运动。盖因一九一一年欧洲大陆法国

之工团主义输入英国，虽其年月不清，大体可说是于一九一一年。后 J. S. 受工团主义之影响，因当时英之劳动者，对于劳动党非常信任，此信任可说是一种过信。其结果劳动党发展速度不快，同时议会政策，露不满之现象，因此劳动者渐不信任，此时恰值工团主义输入。

工团主义与集产主义不同之处，即后者主张生产机关集中于社会与国家之间，由自治团体支配之。我辈可说其国家的社会主义或国家的资本主义。在此主义下，劳动者并未解放。在现代资本主义下，劳动者纯属奴隶之地位，而在国家的资本主义下，劳动者物质生活略得解决，而于精神方面仍属奴隶地位，劳动者并未管理生产立于主人之地位，与现代资本主义所差者不过由个人名义换个国家名义而已。再者集产主义所采之政策为议会政策，以为劳动者多得议席，即可解决一切问题；而工团主义与之相反，主张生产当归工团或劳动组合管理，采取直接行动，如同盟罢工、怠工等手段。集产主义可说是消费者的专制，工团主义可说是生产者之专制，在此制度下，一定不顾消费者之利益，无消费者参与，生产额完全由生产者决定，结果绝不易得正确之计算，此其缺点。再者彼否认国家，但实际上，主张由各国代表组织中央委员会，此会吾等可说与国家有异，况且由生产者举出代表管理事体，表面上，似生产者干涉事体，实际上由委员会组织，仍是外来之干涉，如煤矿能产出多少煤，其决定由于中央委员会，此委员会中一定有矿工的代 表，其余对于煤之关系均为消费者，因此仍是大多数消费者组合来解决，对其宗旨，岂不矛盾？此又其缺点也。即修正其缺点，采取其长处。工团主义于一九一一年输入英国，此时英国表现劳动不安（Labour

unrest), 此种不安可说是工团主义输入之因, 亦可说工团主义输入之果, 然于一九一一年前, 英国并无工团主义, 故此种不安, 不能说彼造者, 是因英有此种不安, 工团主义始乘隙而入, 故后说较为适当而合理。英国劳动者有代表出席议会, 早已有此举。于一八七四年时, 煤矿工二人到议会为代表, 但彼时以自由党资格列席, 不是以劳动党资格列席, 至一九〇六年, 始完全以劳动党之资格列席。英国劳动党由三种人组成: (1) 独立劳动党 (Independence L. P.), (2) 费边社, (3) 劳动组合。独立劳动党与现在之劳动党不同, 此为劳动党之一部, 不可混而为一。在一八九三年为 Hardy 所创立, 亦为标社会主义的团体, 由此劳动组合, 化为社会主义者, 此党尽力独多, 于是劳动党出独立代表之机会渐熟, 遂于一九〇六年劳动组合组织劳动代表委员会, 于是年总选举时, 推选候补者, 结果举出二十九人, 于一九〇七年不属于劳动代表委员会之煤矿工委员会有十二名, 两者相和, 共四十一人。此时改劳动委员会为劳动党, 劳动党之名称自此始。

英劳动党渐似社会主义, 但不是纯粹社会党, 与德之社会党不同。因其分子甚杂, 由独立劳动党与费边社别有劳动组合大多数及少数消费组合, 占势力大部者为劳动组合。按最近一九一二年统计, 劳动党包劳动组合人数为一百八十五万八千零七十八人, 社会主义团体会员为三万一千二百三十七人。于一九〇六年总选举为劳动党之成功, 结果使劳动者对于该党有过大之希望, 相信劳动解放, 完全可由该党手中作成, 但该党绝无如是之力量, 不能有如此巨大之成功。此话中含二意, 即劳动党议会中势力, 一定日增, 再者相信劳动党势力, 如有相当增加, 必能将劳动者完全解放, 换言之, 劳动者相信依赖该党之议会政策

立法的手段，即可满一切之要求。果然，该党成立即制订职业争议法，此制订后，可使劳动者对该党生起过信。所谓职业争议法者，即因有一案件，是劳动组合对职业有不法行为，要求赔偿责任，于劳动方面，有莫大利益。但劳动党纵有议员甚多，终不能防制社会上物价日腾，引起劳动者不安。此问题不能解决，后来又经两次选举，议员权不能增加，因此劳动者大失所望，遂不相信议会政策。此时工团主义输入，反对议会政策。

G. S. 之发生，由于当时一般劳动界对劳动党表示不满，尤于一九一一年因宪法争议为甚。是年一月选举，劳动党得四十人，十二月得四十二人，比第一次劳动党人数四十一名，无大进步。因对该党之手段上、目的上及发展无力上种种关系，均不满意于劳动界，适值工团主义输入，G. S. 遂于批评原有之集产主义与新输入之工团主义而成立焉。从正方面言，G. S. 为若何之形体？即一面批评集产主义，一面批评工团主义，以前者为消费者之专制，后者为生产者之专制。两者各有长短，G. S. 以其所长，补其所短，折衷二派而成新奇之一种主义。

G. S. 派主张如何？不可不研究之。费边社之健将 S. Webb 虽主张集产主义，但亦为在此制度下，有一种可怕的危险。彼一方面主张产业归国有、社会、市有，同时主张定一国之最小限度 (National Minimum)，保障国民之生活（指劳动者）。同时彼以为虽产业归公，然劳动组合运动，绝不可废止，借以提高劳动地位。盖因其看出集产主义权在消费者手中，在此制度下，仅将原来之企业家变为国家者，而劳动者仍立被动地位，故从物质生活上着想主张国民最小限度之保障，一面不要废止劳动组合，以补救专制之危险。然卫布虽看出此种危险来，仍不免受 Cole（主张

行会社会主义者)之批评。Cole 谓集产主义者虽能看出彼制下劳动生活之危险,因此若辈主张定出国民生活最小限度,保存劳动组合的运动,然此不过从物质方面救济而已。于精神方面,劳动者仍不自由,不能自管产业,仍立于从属地位,因在集产主义下工人制度依然存在,结果劳动者处在以劳动为商品去卖之地位,故仍不能解放。

G. S. 认定以人类为商品是不合者,反对买卖人口为奴隶。彼等谓奴隶是以终身为奴者,劳动按日、月、年为期之买卖,与以终身为期之人的自由买卖无区别。彼等以此二者罪恶相等,想废除人身之买卖制,须首先宜将雇主与被雇者间之阶级区别消灭之,非废除工人制度不可。S. Webb 谓产业之经营,无论在任何社会有三种紧要之问题:

(1)生产为何物,属何种类,其数量、品质若何?应归谁决定;

(2)生产之方法、材料、手段、技术、人员,应归何机关决定;

(3)生产者之工钱、时间与其别种条件,应归谁决定。

此三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下,均归营利之企业家决定之。在集产主义下,此三问题归:第一问题归国家决定,因国家代表消费者,不能归生产者决定,以其不易将生产额与种类计算精确之故。行会社会主义,对此问题亦同此主张。第二问题为集产主义与行会社会主义争论之焦点。集产主义以为应归国家决定,其理由为:此问题不能归生产决定,因为归生产者决定,则技术无进步,生产者习熟技术,喜用旧法,以新方法为不利于己,故劳动组合往往拒绝用新机器,于劳动运动史上之例甚多,如归彼等决定,恐现今我等航海,仍用昔日之帆船,旅行仍用一轮车,所

穿之衣服仍为粗布。据此理由，S. Webb 主张应归消费者决定，于是生产技术无进步之妨碍。关于此点，G. S. 派主张不同，彼等以为生产之决定，认属于管理生产方面事体，即应归劳动者决定，至于以劳动者偏于保守，有妨技术进步，是完全错误者。何则？彼等无有反对新机器之偏见，彼恐新机器用入，因而失业，或因用新机器，手艺不熟，因之工钱低落，如现在假定行 G. S. 制，则一切失业与工钱低落之危险无有，工人不致如此守旧拒新，此时以机器不是人类之仇敌，乃是良仆。在现代资本主义下，机器可以制人死命，为人类之仇敌，当然工人偏于保守之倾向，乃将此制改革之，彼等决不致于保守。第三问题无论集产主义与行会社会主义皆认定归生产者决定（劳动组合决定），因不然，恐受消费者之压迫。

主张 G. S. 著名之人，有 Cole、Hobson、Penty、Russell（即罗素是）诸人。Russell 以为 Cole 谓工人趋于保守一层，实大有可顾虑之价值，罗素提出一补救之方策，主张一种方法奖励新技术与发明，即于一定时间，许发明者所属的 Gild 一专利权，此法即可奖励技术之进步。

行会社会主义之制度。此主义为折衷集产主义与工团主义，用动力平衡而成。一种代表生产者，即 National Gild 组织 Gild conference。此外，其认定国家之存在，此点与工团主义不同。然后者主张设立中央生产局（Central Production Bureau），我辈以为与国家无异，前已言之。国家代表消费者，有两种会议，一种由地域所举出之代表，与以职业所举之代表开一联合会议，以决定生产事件。一种是行会代表生产者与国家代表消费者之会议，使一切生产事体，生产者不能独行专制，而得一平衡，国家

受社会委托,对生产工具有所有权,行会亦受社会委托来管理或支配生产事情。因此行会须受国家之掣肘,防生产者之专制,即由国家于行会中收一种租税,并定生产物价格,以防价格额外增高,因以此事由何机关定之,即由国家与行会组织—Joint Committee 定之。

行会社会主义能否实行于英国,尚待研究。然吾人以为此主义于理论方面尚饶兴味,于实行方面研究无大价值。何则?以徒尚空谈,于实行颇不易也。今不惮烦琐,略述其理由如下:

1. 当其最初发生之时,学说之宣传不广。一九一二年于《新时代》杂志中同人标一主张,此杂志(«New Age»)只在上流阶级流行,故其宣传力不及下流阶级。宣传学说不广遍,欲其实行,岂不甚难。此第一因也。

2. 英国劳动组合不十分整齐。旧有的组合,大抵为职业劳动界之组合。按劳动组合,有职业界与产业界之分。前者按职业性质而成的 Craft Unionism,如手艺劳动者为一工会,使用机器的劳动为一工会是也。后者 Industrial U. 属于一类产业之劳动,通合起来组一劳动组合,如矿工劳动组合、铁路劳动组合是也。如实行 G. S. 须劳动者管理产业,如劳动组合为职业界的是不易成事,以其无管理之能力,故须由职业界之劳动组合变为产业界的方可。但现在英国多职业式的组合,改变实属不易。此 G. S. 在英国不易实行之第二原因也。

3. G. S. 在英国带有平和性质,缺乏革命之性质。然在现代阶级争斗时代,想以平和手段,将生产完全归其管理,实属不易。此 G. S. 在英国不易实行之第三原因也。

Cole、Hobson、Penty 此数人之主张亦有不同之处。Cole 主

张国家加上基尔特来组织联合会机关经营生产事体。其主张多元主权论,主张职分原则(Principle of function),无论何者均有职分,在此职分内均有主权与自由权。Hobson主张 G. S. 专管经济方面,国家专管政治方面。Penty 著《Old world or new》一书,回想欧洲中世纪之手工业行会制度,反对大工业制,主张地方基尔特,不主张国民基尔特(National Gild);厥后彼自己承认国民基尔特,为达地方基尔特之阶级。

自由与秩序

(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社会的学说的用处，就在解决个人与社会间的权限问题。凡不能就此问题为圆满的解决者，不足称为社会的学说。

极端主张发展个性权能者，尽量要求自由，减少社会及于个人的限制；极端主张扩张社会权能者，极力重视秩序，限制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可以代表前说；“社会主义”(Socialism)可以代表后说。

但是，个人与社会，不是不能相容的二个事实，是同一事实的两方面；不是事实的本身相反，是为人所观察的方面不同。一云社会，即指由个人集成的群合；一云个人，即指在群合中的分子。离于个人，无所谓社会；离于社会，亦无所谓个人。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

试想一个人自有生以来，即离开社会的环境，完全自度一种孤立而岑寂的生活。那个人断没有一点自由可以选择，只有孤立是他唯一的生活途径。这种的个人，还有什么个人的意义！

试想一社会若完全抹煞个性的发展，那社会必呈出死气奄奄的气象。他所包蓄的份子，既一一的失其活动之用而日就枯亡与陈腐，更安有所谓秩序者！

由此看来，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

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个人是群合的原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真实的自由,不是扫除一切的关系,是在种种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宽裕的选择机会;不是完成的终极境界,是进展的向上行程。真实的秩序,不是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份子可以自由选择安排的;不是死的状态,是活的机体。

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

1921年1月15日

《少年中国》第2卷第1期

署名:李大钊

近来的倒戈运动

(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日)

段祺瑞命吴佩孚攻打西南，吴佩孚却倒戈回来铲除了段系；岑春煊派陈炯明攻打福建，陈炯明却倒戈回去驱逐了桂派；唐继尧、刘显世派顾品珍、王文华等征讨四川，顾却倒戈回滇，驱逐了唐继尧，王却倒戈回黔接替了刘显世。这是中国最近的倒戈运动。

1921年2月20日
《新生活》第45期

署名：孤松

堕落的法兰西文明

(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日)

十八世纪以来世界上很受了法兰西文明的赐，连这次战后中欧以东诸国的社会改造，亦是承袭法兰西革命潮流的系统而来的。但是今日的法兰西，却是日趋黑暗，在东方的法兰西人更是倒行逆施，不惜作些摧残自由悖反人道的事。吾们不禁叹息咨嗟，回想当年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如今那里去了！

1921年2月20日
《新生活》第45期

署名：孤松

民众的新年

(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日)

民国以来，改了阳历，这亦是中国人加入世界的生活的一端，我们并不反对。可是这几年来的感验，总觉阳历新年不如阴历新年热闹；阳历新年不如阴历新年趣味浓厚；阳历新年不过是少数官场学界勉强的庆祝的虚礼，阴历新年乃真是大多数民众无老无少从心坎儿里欢欣庆祝的第一令节。从这一点看，我还是爱这民众的新年。

1921年2月20日

《新生活》第45期

署名：孤松

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

(一九二一年三月)

人类之社会的观念和组织的的能力，和文化有相互的影响。文化高的民族，社会的观念和组织的的能力，固然也高；亦惟社会观念和组织的能能力既高，而文化始有进步。原始社会如猎群，战团，其组织之简单，较诸今日社会乃不可以道里计。然证诸十九世纪以来，政党之发达，则人类组织能力之进步，又极可惊。英、美政治纯受政党支配，其政党都有极繁复之机关，极妙之组织。所以势力雄厚，直与政府并驾，甚或称为第二政府。至于欧、美社会方面，只要有两人以上的共同行动，就成一个团体的组织，打猎钓鱼，旅行，音乐，茶话，都称为一个 Party。他们团体生活之习惯，几若出自天性，由小扩大，所以议会，政党，亦都行之若素。如儿童，妇女，慈善，教育，科学种种结社，非常的多，并且也有切实的计划，伟大的成绩，所以社会事业才能这样发达。

最近时代的劳动团体，以及各种社会党，组织更精密，势力更强大。试看各国罢工风潮，及群众运动之壮烈，不难想见。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活跃，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

中国人虽然也是社会动物，但几千年专制之压迫，思想之束缚，和消极的，懒惰的，厌世的学说之浸染，闹得死气沉沉，组织

的能力都退化了。然而中国腐败到这个样子，又不能不急求改革。改革的事业，亦断非一手一足之力。自然还要靠着民众的势力，那么没有团体的训练，民众势力又从那里表现呢？所以我们因渴想社会之改革，就恨中国人的组织能力太低，但是这也无怪。因为团体的训练和民众的运动愈发达，团体的训练才愈高明。换言之，没有经过民众运动的人民，团体的训练是不会发达的；毫无团体训练的人民，也不能产生有力的民众运动，可见这两件事是相待为用，相随俱进的。所以我们现在要一方注意团体的训练；一方也要鼓动民众的运动，中国社会改革，才会有点希望。

中国自满清道、威海禁大开之日，就有受些欧化洗礼的两个大党产生，一是同盟会，一是强学会。强学会的成绩是戊戌变法。同盟会的功业，是辛亥革命。他们都自有他们的价值。既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

近二三年来，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但是我们虽然厌弃政党，究竟也要另有种团体以为替代，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

五四运动以后，学生团体发生俨然革新运动中之惟一团体。其实学生虽有几许热心侠气，究竟还是团体的训练不大充足，其中缺憾甚多。到了现在又有“强弩之末”的样子，令人正自伤心无极。（闻最近北京学生会选举职员投票两次都未产出，照投票这样散乱看来，恐怕就是团体训练薄弱之一证。）

最近也产生了几个小团体，只是章程定妥之后，就算完事。

其中亦是学生居多。有人称呼“章程运动”，其言虽谨，亦自有理，尤足令人丧气。

闻特来中国讲学的某大学者，尝于私下对三两学生说：“中国这样政府，设有革命党千人，便有站不住了。”然而我们竟没有那样的人，竟没有那样的团体，说到这里我们只有惭愧。

我们的社会腐败到这个样子，整天口说改革，实际上的改革，半点没有。这总因为我们团体的训练不充足，不能表现民众的势力，而从事革新的运动。

然而没有团体，也没有地方可以得到团体的训练。所以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都有人了，最近谈Communism的也不少了，但是还没有强固精密的组织产生出来。

各国的C派朋友，有团体组织的很多，方在跃跃欲试，更有第三国际为之中枢，将来活动的势力，必定一天比一天扩大。中国C派的朋友，那好不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以与各国C派的朋友相呼应呢？

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1921年3月

《曙光》第2卷第2号

署名：S. C

社会主义下之实业

(一九二一年三月)

自从罗素说了一句“中国需要振兴实业”的话，就有人大吹振兴实业。诚然，中国经济之厄运已至，实业确有振兴之必要。但谓振兴实业而必适用资本主义，其谬已极。我也很想草一论文，讨论这个问题，不过业已有人指明，我可以省却这一桩麻烦了。我现在所要问的，就是俄罗斯是否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俄罗斯既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何还能振兴实业？单就铁路一端而论，苏维埃政府于过去三年间，添造铁路五千七百俄里（每里约三千五百英尺）。现在还派员四出测绘，预备再筑新路两千俄里，今年年内即可通车，此种新路连贯未经开采之各大森林，以为提倡木料实业之用。中国共和现在已竟十年，添造的铁路在那里？且俄国于改良农业，开垦荒地，都有切实之计划。中国以农立国，然而农业腐败得不堪过问。满蒙荒地很多，中国人又何尝有什么法子去开垦？至于现代文明下之工艺制造，中国人更不配开口了。照俄国说，社会主义于发展实业，实在有利无害。换言之，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因为资本主义之下，资本不能集中，劳力不能普及，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资本之功能以集中而增大，劳力之效用亦普及而加强。有此种资本与劳力，以开发公有土地之富

源，那愁实业不突飞猛进？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因为中国非无资本而苦于资本之散漫，寄放在外国银行里的，窖藏在地底下的很多。中国有钱的人，除少数有点知识的面外，却不肯拿出来振兴实业，一则因为前几年很受所谓实业家者之大骗，二则他们也不晓得资本利用之原理。所以只求死守一宗大款，父而子，子而孙的坐吃罢了。现在若果实行平民专政，先将这样资本强行搜集起来，一定可以大办实业。否则中国资本这样零碎散乱，那能振兴实业。恐怕今后中国实业之振兴，都要成外国资本家的掌中物了。我想那些非社会主义的提倡振兴实业者，也不愿闹到这步田地罢！其次中国劳动者，本来是价廉物美名驰全球的。但中国实业不发达，没有很多工厂雇用他们，颇有供过于求之观，所以他们都跑到外国去，替那些外国资本家做牛马未免可惜。至于中国的流氓，无赖，政客等游手放闲的人太多了。这种人物若仿照俄国办法，不工作者不得面包，他们也可变为有用的劳动家了。所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不愁缺乏资本，尤不愁缺乏劳力，以此而开发地大物博的中国富源，实业是大可发展的。且中国不实行社会主义，则官僚之势力太大，他们也是掣肘实业的人。中国实业界的人，没有不受官僚的操纵压迫的。既行社会主义而后，则此种掣肘实业的人，当然可以消灭了。我要说一句武断的预言：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

1921年3月《曙光》

第2卷第2号

署名：S.C

北京贫民生活的一瞥

(一九二一年三月五日)

日昨我同三五朋辈，到宣武门外长椿寺妙光阁一带，吊祭一位死友，很深的动了些生死别离之感。归途沿着城根走，看见铁轨上横着一辆车，载着些烧残的煤渣，几个苦工，带着满面的灰尘，一锹一锹的往下除。几十个贫苦的女人、孩子在那里拿着小筐在灰尘里滚，争着拣个一块半块的还未烧尽的煤渣。这也是北京的贫民生活的一瞥。

1921年3月5日

《新生活》第46期

署名：孤松

黄昏时候的哭声

(一九二一年三月五日)

北京市内，每到吃晚饭的时候，有一种极悲惨的声音送入市民的耳鼓，这就是沿街叫苦乞怜于阔绰人家的残羹剩饭的呼号。这种声浪，直喊到更深，还断断续续的不绝。一家饱暖千家哭，稍有情感的人，便有酒肉在前，恐怕也不能忍心下咽吧！

1921年3月5日
《新生活》第46期
署名：孤松

山 西

(一九二一年三月五日)

某报载有山西归客谈一则，把那“模范省”的内幕都揭给我们看了，我们很感谢他。但他批评他的话里，“武装教育”、“注重孔子教育以军国民主义辅之”的文句，未免太恭维了“模范省”的模范人物，太侮辱了“教育”、“孔子教育”、“军国民主义”这几个名词。

1921年3月5日
《新生活》第46期
署名：孤松

各国的妇女参政运动(续)*

(一九二一年三月五日)

(二) 英 国

(3) 三大派的鼎立

(a) 激烈派 这派在女子参政运动中,最为激烈。英国人称普通参政运动者为Suffragist(包括男女在内);而对于此派,则特称为Militant Suffragette。

代表这一派的,是潘哈夫人及潘哈女士,在一九零三年所组织的“妇女的社会及政治同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她们以为在现行制度之下,想获得女子参政权,是不可能的。于是从根本上着想,就主张对于男子阶级所建立之不平等的国家,正式宣战。她们宣言说,在法律范围内的活动,既无成效,就不得不诉诸暴力。至于暴力的结果怎样,她们是不管的。她们只知道无论如何,总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必使一般女子,得以同一条件,与男子获得对等之选举权。用此权利,来确立两性间的权利,并机会的均等,以谋增进社会上各种的幸福。”因为要达这个目的,所以同时就决定了下列的运动方针:

* 这里刊印的是一篇讲演中的一部分(前后部分均未找到),《北京益世报·女子周刊》刊登时题注:“李守常先生讲,均一记”。——编者

(一)与一切政党断绝关系,所有各党候补者,概不援助。

(二)如果女子能获得选举权,就与一切男子政党所组织之政府宣战。

(三)谋全国女子的团结,为自由而战。

(四)为打破法律上男女不平等的位置,不惜为猛烈的运动。

(五)普通平和的运动方法,如认为可取者,亦得并用之。

看了她们上面几个方针,就可以知道她们此后的运动,决不能再和前此那样的和平。在这个方针既经决定以后,她们就有以下种种的暴动:

(一)派人按户访问,其对于女子参政之意见,并强迫其赞同。

(二)于大选举举行人口调查时,女子拒绝其调查,并不许男子填写调查表(关于此点,温和派亦采用之,但不如此之甚,详见温和派条)。

(三)于讨论重要问题的演说场中,故意扰乱秩序,使其不能终会。一九零五年十月十三日,爱德华(Sir Edward Grey)在满切士达演说,潘哈夫人作怪声以妨害之,为警察所扶出,就是一个明例。

(四)示威的游行运动。一九零八年二月,集七千人,为参政权的后援。因爱尔葵斯首相之禁压,甚仇视之。其后有一老贵族,在车站上为一潘哈党所扑倒,即因为这位老贵族的背像,很和爱尔葵斯相似,以至误认的原故。同年六月,仍因内阁反对女子参政权案,又集一万人示威。此后如此类之示威运动甚多,不能详述。

(五)随时闯入议会,肆意骚扰。

(六)破坏财物。在大示威运动时,以铁器捣毁沿途之商店。又尝暗置燃料于邮局,焚毁各种邮件,并切坏电话、电线、瓦斯线。一九一四年,潘哈夫人在国立美术馆,破坏无数最可宝贵之名画。又入植物馆,破坏珍异花草。致使政府下令禁止一般人游览博物馆、美术馆、植物园,以防备她们闯入。

(七)抛掷炸弹。一九一二年,在某车站,抛掷炸弹。一九一三年,在英伦银行的中层,掷下炸弹。又在圣保罗寺院的床下,藏置炸弹。但并不伤人命。因为她们于每次抛炸弹时,总有一匿名揭贴,声明某日某时,将在某地抛掷炸弹云云。一般市民即相戒裹足,而警察亦严行戒备,故伤人之事甚少。她们的用意,就是要扰乱秩序而已。

上面这许多暴动,当然要激起政府的盛怒。据一九一三年的报告,只一九一二年二月至一九一三年二月,一年间,政府将这一派的人,拘留的有三百六十七,下狱的有三百十一。只是任从政府怎样拘捕,她们还是照样的做去,并且她们下狱后,就发明了一个同盟绝食的办法,大家都声言情愿饿死。政府起先订一强迫营养条例,强迫她们饮食,也是不行。恐怕激起社会的反动,就又订出一种条例来——叫做“猫鼠条例”(“Cat and Mouse Act”),于一九一三年四月公布。就是凡被捕的潘哈党,如果在狱内绝食,就可以把她暂时释放,使人监察她释放后行动,如果再有激烈行为,就再捕来。这条例公布后,毫无效力。因为那班潘哈党释放后,还是运动,再被捕,就再绝食。政府穷于应付,只好将这个团体——即“妇女的社会及政治同盟”——封闭。封闭的时候,是一九一三年六月。十月间,潘哈夫人赴美国,作他

种活动,十二月初旬归,即被捕,旋亦释放。欧战起,此派乃努力于维持国内之秩序,并为种种替代男子之服务,其所有前此之种种行动,乃于此终止。(未完)

1921年3月5日

《北京益世报·女子周刊》

中国的社会主义与 世界的资本主义*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日)

中国今日是否能行社会主义，换言之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在中国今日是否具备，是很要紧而且应该深加研究的问题。我且简单的把我的意见，陈述于下：

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再看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人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接人家的步数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

* 这篇文章发表时费觉天注：“此文系守常先生写信给我的，我就定此题，还请守常先生原谅。觉天”。 编者

在初步。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1921年3月20日

《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

署名：李大钊

俄罗斯革命之过去、 现在及将来*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近来人对于俄国主义，全是很注意的。我们从前知道，世界之谜，就是中国问题，将来如何解决，尚不敢定。各资本国正在注意要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解决中国运命的时候，俄国问题又发生了，现在想法要解决的就是资本主义的运命。

我们先把最近的俄史略说一说。俄国革命起于一九一七年，惹起世人的注意。并非单是一国政治变更，实在是世界的革命，是平民阶级对资本阶级的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于一八九八年，到一九〇三年，他们在布鲁塞尔和伦敦开第二次会议的时候，他们分成二派：一派主张中央集权，为多数派，列宁为首；一派反对中央集权，为少数派，马尔托夫为首。两派从前意见很不相合，此次革命成功，多数派占全盛的势力，全国大半都在多数派势力之下，少数派势力很小的。要说起俄国革命的来源，他们的革命，是很有目的，很有精神的。无论何派，皆具共同的目的，想法去发扬保持俄国的精神，再用俄国精神来建设新鲜的世界。温和派克伦斯基说：“革命底手段，是破坏的；彼底目的，是建

* 这篇文章刊登时题注：“李大钊讲演，李林昌笔记”。——编者

设的。”列宁底魄力更是雄厚，苟能建设新世界，即使俄国人民，受绝大的牺牲亦所不惜。有伟大的目的，抱悲壮的精神，去实行彼底主义。以前说的，是目下大概情形。现在再说说俄国革命的来源和经过的情形。

俄国的第一次革命，起于一八二五年；第二次起于一八六一年；第三次起于一八八一年；第四次起于一九零五年；最后到了一九一七年，现在成功的劳农政府就出现了。

俄国在一八二五年，受法国革命的影响，发生一部分改革家名十二月党。彼时亚历山大死，尼古拉斯第一即位。他们想把尼古拉斯第一推倒，再举一个比尼古拉斯宽仁的康斯坦丁（尼古拉斯第一的兄弟）做元首，布新宪法。此次运动没有成功，所有的首领，有罪的，有死的，有流刑的，这种凶暴的压制，一直到尼古拉斯死后始止。

尼古拉斯死后，继位的是亚历山大第二，猛烈的压制，渐渐好一点。许人民一点自由，司法渐渐改良，官厅的压制，渐渐宽和，行了两大改革：

一、农奴的解放（一八六一年）；

二、创一种地方选举会议制度（Zemstvo）及都市会议制度（Doumos）。

这两大改革，都没有实际的成功。农奴既被解放，必得自己负债、买地；负债既多，法律上虽不受资本家的支配，然在经济上已不能独立了。生活虽比以前稍微自由，但生活情形更坏。地方和都市会议，亦是有名无实。俄皇底自由主义，这样的衰微下去了；但人民因为得到一次的自由，看见点自由的曙光，对于自由的要求，越发强烈了。农民虽在经济上不能独立，在法律上究竟

自由；地方都市会议之权，虽受限制，但选举的机关，究能在政府的意思以外宣示一种意思。这两大改革，虽不能成功，得到的利益已然不少。

从这次自由运动以后，又进一步，要求自由的运动比从前更利害，发生了“虚无主义”(Nihilism)。党内有决心的人，渐轻思想上的运动，而重实际的运动，对于现行制度，有猛烈的攻击。后来亚历山大第二，又恢复了他父亲底压制手段，虚无党人极为愤激，又发生一种新活动，把精神上的惰性，完全去掉。振起精神来实行与恶势力奋斗，用暗杀的武器，为对敌的战争。一八八一年亚历山大第二想承认人民的自由，党人把他恨极了，终究被党人刺死。

亚历山大第二被刺以后，政府又用极严的手段对待人民，大为革命家所忌恨。当亚历山大三世及尼古拉斯二世的时候，俄罗斯分作两种大势力：一种是表面上的势力——俄皇和他底官吏军队等等皆是；一种是在地底下活动的革命党人。在一九一七年以前，两种势力，互相战争。这种情形，在历史上是无有的。在欧洲六十年以前，有两种势力，很和俄国底两大势力相近：一是奥国的梅特涅；二是意国的马志尼。梅特涅的专制，很象俄皇，但专制的魔力，不象俄皇的凶暴。马志尼是反对专制，很象俄国革命党人，但革命手段，不象俄党的利害。

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后来俄国败了。政府很受人民的不信任，国家也很危险。革命党人得了一个好机会，起了革命，结果居然公布了宪法，敷衍人民耳目，但独裁政治的根本，还未打掉，有机会还是可以回复的。

一九一七年二月，在欧洲大战中，这震动世界的大革命发生

了。俄皇不得已，让出皇帝的座位，共和国才算成功，独裁政治才算寿终正寝。接着操政权的，是温和自由党人克伦斯基 (Kerensky)，政治算有点进步，大赦党人。不久，列宁 (Lenin) 和托罗斯基 (Trotsky) 又起革命，十一月七日劳农政府正式成立，政权就由布尔雪维克 (Bolsheviki) 操持起来。俄国革命经过的情形，大概是这样。

俄国历次的革命，全与战争有关系；经过一次战争，便发生一次危机。一八一五年以后的革命，都是因为战争而发生的。一八七八年俄土战争以后，虚无党人屡次活动。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后，革命党人又起，政府公布宪法。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起后，于是这震撼世界的大革命才能成功。因为对外有战争，就可以乘着机会，去推倒政府。

现在有许多人，替俄国担心；以为于国家运命上，很有危险。其实这是过虑。他们底精神，不止于能维持本国，并可以代表世界无产阶级的精神。这次没法解决的欧洲大战，卒为俄国所征服。俄国不出一兵一将，就把他底主义传到德奥的大本营，德奥的侵略主义，忽然瓦解。你看他的力量大不大？我们替人担忧是忧的什么呢？列宁认为想建设新世界的组织，先有大破坏始有大建设。这种改造世界的新思想，是不是尽美尽善，是另一个问题；从事实上说，他们的精神是很好的，进步是很快的。现在俄国所行的政治是手段，不是目的；将来俄国改造成什么样子，还不能定。可是将来与世界改造有绝大的影响，是无疑的。

俄国土地很大，旧俄在未用圣彼得堡作都城以先，有三个地方做过都城：一诺佛格罗特 (Novgorod)；二儿富 (Kief)；三莫斯科 (Moscow)。这三个地方，都在大俄罗斯境内，是俄罗斯帝国

的核心，并不把芬兰和各属地包括在内。当尼哥拉斯第二的时代，看他的地图，俄国领土有很大地方，是一种颜色，疑俄国人是同一种族；其实不然，是极复杂的。斯拉夫种族以外，约有一万万人不受种族文明的支配。许多民族，混杂居住八百万方英里里面，有一百〇三种语言，可见种族是很繁杂啦；有小俄罗斯人，有高加索人，有芬兰人，有鞑靼人，有波兰人，有土耳其人，及犹太人等等。种族既然很复杂，所以全俄罗斯境内的人民的习惯风俗宗教等，自然不能相同。我们对于这些很复杂的民族，而找出一个共同的俄罗斯主义，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所以现在要研究俄国，惟有将大俄罗斯人为中心而观察，较为便当些。俄全国人口有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是农民。农民的气质，和中国人差不多，保守性重，沈沦在无情、愚昧、忍耐、服从的种种恶习惯，全是专制压迫的结果。农民除了土地的改革，种植的改良，稍微留心以外，旁的事全不管。他们有时候也不恨皇帝，可是有反对大地主资本家的；做革命中心的人，是工人、学生和爱自由的贵族们，职业阶级皆赞同革命，这些人占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八十，是不参加革命的农民。这些农民的情形和我国一样，与政治不发生什么关系。他们的进行怎样，就看革命的几种人的精神，就可以啦。有人以为贵族一定反对革命的，其实贵族子弟做革命事业的却很多，俄国革命祖母，加塞林·贝雷希古夫斯基(Catherine Breshkovsky)也是贵族出身，其余还有很多，如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都是。俄国许多人从前对于农民作革命事业，很有希望。并且以地方自治团体(Mr)作理想社会的基础，去改造俄国，其实不能成为事实，终归失败。希望农民革命是很难实现的。革命祖母加塞林作过一部小说，描写那时革命家运动农

民的情形，是很有趣味的。有些人主张“与其先要求得政治的自由，不如先改革乡民的心理，所以教育比革命要紧（与其先革命不如先讲教育）；求得政治自由以前，尽可以来教育无知识的农民。”又有人说：“把农民放在一边，靠受教育的少数人，为自由组织，先推倒政府，使农民渐渐觉悟；关于农民政治上和精神上的解放，可以俟之将来。”俄国文学家屠格涅夫(Turgonev)和他的朋友写信，讨论这件问题。他说：“你正在那里想革命的原素，在各个人民。其实这种见解是不可靠的，真正革命精神，只能存在于智识阶级的少数人。”俄国改造社会的使命，就在少数的智识阶级肩上负着。无论如何，俄国革命决不能靠全体的农民，少数智识阶级应该努力拿新思想灌输到农民的心理中，使他自己论断是非。在历史上，少数人作牺牲，多数人享幸福，几乎成了通例。作牺牲的人多半是智识阶级的人，智识阶级的责任真是重大，真是要紧。

我们再考察他们革命党的历史，大概分三种势力：一自由主义；二社会主义；三无政府主义。其初各党与各党的主义，色彩不分明，其共同目的，总是相同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最不相同的手段，在自由主义者主张先得政治的自由，再谋社会的改造；社会主义者主张，立时即起社会革命。当亚历山大第二解放农民时，自由派以为有皇帝也可以有自由，所以他们赞成这个政策。后来仍继续运动，要求全国国会，不料国会亦终于有名无实，自由派的企图终归失败。他们从前以为有自由到手，有皇帝也不要紧，譬如英国、意国，虽然有皇帝人民也算自由啦。自由到手，再希望公布宪法，这不就好了吗？那里知道宪法等于虚设，自由也是纸面文章，于是革命又起。一九一七年三月，推倒

政府，建立共和国，得到自由。再进一步，共产党即多数派又起革命，自由派政府失败。十一月，布党组织劳农政府，于是乎政权全握在社会主义派的手里。这是俄国革命过去和现在的情形。

至于前途情形如何，不敢断定。这是世界上很大的问题，以现在的情形看起来，就是资本国妨害他的发展。比如今年波兰和俄国打仗，不是波兰跟他打仗，是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他们许多资本家的国家，和俄国为难，想推倒劳农政府。东方有旧党谢米诺夫，反对劳农政府；其实谢米诺夫后边，亦有日本的扶助。不过他们资本国，从前出兵西伯利亚，终究不能把俄罗斯攻下，于是乎撤兵；可是日本始终不愿撤兵，其实不独无益，而且给俄国最深的忌恨。他们资本国因为有本国人民的反对，不敢明向俄国宣战，于是利用盗贼，去反抗俄国，又实行封锁政策，希望俄国人自己饿死。岂知他们种种鬼祟手段，全归失败，而劳农政府反日盛一日，俄国旧党渐次消灭，眼看就要统一。诸资本国不得已，又要和俄国讲和通商。可见俄国的力量真是可怕，可敬。将来他的结果，虽然不能推敲出来，但是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以后，支持到现在，不知道经过多少艰难、困苦。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大；各资本国虽用种种方法去防备他，去破坏他，然而一点用处也没有。将来实在有可注意的价值。罗素说：“俄政府对于资本家决不予以自由，先使他们渐渐化成共产主义一分子，将来再和别人享受一样的自由，恐怕这样办法不妥。”其实，这也不要紧，现在俄国资本家，已经渐渐倾向共产主义，为政府效劳的也很多，决无何等的不妥。

俄国这次大革命，不是独独代表俄国精神，是代表人类共同

的精神。比如法国革命，不独关系于法国，却关系于全世界。此次俄国革命，足以表示全世界人类共同的精神。他底办法，虽然不能认为终极的理想境界，但他是革命的组织，是改造必经的阶段，自由的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的。

1921年3月21日

《国民日报》副刊《觉悟》

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

(一九二一年五月四日)

五月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因为在那一天，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所以要把他当做一个纪念日。

我盼望中国学生界，把这种精神光大起来，以人类自由的精神扑灭一切强权，使正义人道，一天比一天的昌明于全世界；不要把他看狭小了，把他仅仅看做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我更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

谨祝中国学生界的进步无量！

1921年5月4日

《晨报》

署名：李大钊

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

(一) 俄罗斯革命史上的重要年代

俄罗斯大革命，是现代最足以惹世界全人类注意的一件重大事件，无论颂祷他的，咒骂他的，欢迎他的，恐怖他的，都不能不认识他的价值。但是这事件的由来，断非一朝一夕所能致。我们要想悬揣他的将来，必不可不认清他的现在；我们要想认清他的现在，必不可不溯迹他的过去。本文的目的，就在略述俄罗斯大革命过去及现在，以供留心俄事者的参考。

在俄国革命史上，我们可以寻出几个重要年代，就是一八二五、一八六一、一八八一、一九〇五、一九一七，这五个年代。

一八二五年，因为受了法兰西革命和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在俄国起了一团改革家，后人称他们为十二月党。他们乘着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1)逝世，尼古拉一世(Nicholas 1)即位的机会，运动那比较尼古拉一世宽仁些的康士坦丁(Constantine)代尼古拉一世承继皇位(康士坦丁是尼古拉一世的一个兄弟)，并运动颁布宪法。此等运动很容易的被镇压住了，许多的首领罹死刑的亦有，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的亦有，紧接着就来了一时期很凶猛的压制，直到尼古拉一世死了，此等压制才渐渐停止了。尼古拉一世死后亚历山大二世承继皇位，对于人民应许

了些顺合民意的事，一时亦曾实现了些；黑暗的法庭亦改良了些；对于自由主义的镇压亦松了些；并且施行了两大改革，就是农奴解放（一八六一年）与创行地方议会制度（乡村区域地方选举的议会为 Zemstvos、都市的议会为 Doumas），不幸这两大改革都没有成功。被解放的农奴，因为购买他们的土地负了很重的债累，在法律上他们虽然不受旧时主人的管辖，而在经济上依然受他们的管辖，境遇反比从前更坏了。地方议会和都市议会不久亦为一种反动风潮所颠覆。“沙”（Czar）的自由主义虽然渐就萎谢了，但是人民终究由此得着了点东西，一般农民虽难免于经济上的依赖，在法律上究竟算是脱了束缚。从前他们作农奴的时候，除了逃亡和法外人以外，全没有逃避的所在；如今在法律上可以不受这等拘束了。地方议会和都市议会虽然没有什么权力，有选举权的人民虽然很受限制，但他们于政府意思以外，总算有一种代表民意的机关了。

少量自由的允许，引起人民更进一步要求自由的动机。现代俄罗斯革命的实际运动，实自一八六一年起，以后每经十年势益加盛。虚无主义（Nihilism）虽在千八百四、五十年顷已经存在，但在彼时不过是思想上知识上的运动，在实行上没有多大的力量，对于现行的组织没有猛烈的攻击。后来亚历山大二世废弃了他的改革运动，回复了他父亲的压制政策，革命党人才起来实行一种新运动，以最勇断的决心向恶势力宣战。法律上的言论自由既遭剥夺，乃至请愿亦受限制，他们运动的唯一武器只有手枪与炸弹了。这地底下俄罗斯看不见的军队的举动那样的凶猛，“沙”几乎要承认人民的自由了，或者他正在计划着颁布一部宪法于俄罗斯人民的时候，亚历山大二世突然遭了暗杀（一八八

一年)。

亚历山大二世被刺身死以后，反动和压迫的势力比从前更凶，全和一八二五年以后并一八六一年以后一样。当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和尼古拉二世(1824—1917)的朝代，俄罗斯实是二种势力争斗的舞台；一为表面上的势力便是俄皇及其官吏的权力，背后有许多的警察和军队；一为地底下的势力便是那常存在常发长的潜藏暗动的革命。这两种势力无时不在激战之中。一九〇四年日俄战役起了，战败的俄政府大受人民的谤怨不信任，革命党人乃利用时机起了革命，居然获了胜利，一九〇五年竟允许了颁布宪法。但这不过给独裁政治一个打击，其实并没有把他推翻，他似乎还想回复他的势力。到了一九一七年三月在惨酷的战祸中起了革命，罗曼诺夫朝的命运就从此告终，新俄罗斯的纪元亦就从此开始了。

综观俄国革命的往迹，多与对外战争有关系。一八五〇年以来每次战争都给俄罗斯以一度政治的危机，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的克里米亚战役(Crimean War)以后，随着就是亚历山大二世的革新；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的俄土战役以后，随着就是天诛主义的运动和亚历山大二世的暗杀；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战役以后，随着就是宪法的颁布；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战中，又起了社会大革命。那样的无法解决的世界大战，就由此得了结束。这是俄罗斯革命史上可以注意的一点。

(二) 俄罗斯革命的中心势力

我们要考求俄罗斯革命的中心势力何在，须先就俄国的领土与民族略一观察。通常说俄罗斯民族，只是指俄罗斯的一部。大略言之，就是欧俄的北半部，不包括芬兰(Finland) 巴尔提

(Baltic)各州,或是下北极圈内的地方。这一部分是旧俄罗斯称大俄罗斯。在大俄罗斯境内有三个都城 (Novgorod、Kiev 与 Moscow)在未建都于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以前,继续着作政府所在地,这一部分实是从前俄帝国的核心。但是一翻一九一四年的俄国地图其疆域实远越大俄罗斯以上,只看这地图上统一的颜色很足以骗人,有时误认所有在尼古拉二世治下的全体人民都是同种的,其实不然,俄国全人口中大约有一万万不是斯拉夫族。“沙”的俄罗斯是一个极大极复杂的民众,全靠独裁政治的军权集合成的,在八百万方英里的面积内通行一百零三种语言,各民族间的风俗习惯传说血统宗教全不相同,在这些民众间寻不出统一的俄罗斯精神,因为他们只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专靠外界的约束才伏于“沙”权威之下的。

俄罗斯全人口中(大俄罗斯及各州均算在内)有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是农民,是业农者保守性极重,沈沦于俄罗斯人的无情、愚昧、忍耐、服从的生活之中,除去关于土地的改革,他们直与革命没有关系,或者还立于反对的地位,只有在都市上的工人、大学里的学生、贵族中爱自由的青年及职业阶级内,可以寻出俄罗斯革命的精神来。贵族的子弟加入革命运动,乍闻似很奇怪。其实在俄罗斯确是事实。象托尔斯泰(Tolstoy)、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和那革命的祖母 Catherine Breshkovsky,都是贵族出身。

俄国革命首领对于人民很抱一种热望,把他们的希望都放在农民身上,并常注意村会(Village Mir, 欧俄的民主的地方自治体),想把他当作将来的理想社会。但是运动愚钝的农民去实行革命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有许多革命的领袖郑重的主张“教育

比革命还要紧”，主张“一时期的迟缓而且艰难的教育运动，应在争政治的自由的努力以前”。此外亦有些人主张目前先把农民放在一边，专靠受过教育的少数人用革命的手段把俄罗斯弄成自由，至于农民的政治上精神上的解放可以俟之将来。屠尔格涅夫（Turgenev）曾寄书于一热烈的革命家说：“你想革命的要素存在于人民中，其实恰恰相反，我可以断定革命这样事体，从他的真意思、最大的意思解释起来，只存于智识阶级的少数人；设使我们自己不自起纷争以自殒灭，实在很足以有成……俄国智识阶级的使命，就在把文明灌输到人民中间，使他们由此可以自己判断何去何从。”当时俄国的人民总有一万万农民，极其守旧，故革命运动的事业不能不担在少数智识阶级的肩上，少数人作牺牲多数人享幸福，几乎是人类进化史上的公例了。

俄国的帝制既为革命的势力所颠覆，那从前为帝国的附庸亦都与罗曼诺夫朝的运命同时瓦解而裂为些小独立国，象那波兰、芬兰、Ukraine、Georgia、中央亚细亚、西伯利亚并他处的各部分，都相率独立以图自救，他们将来的结局或是成一种什么形式的联合，现在我们虽不能预测；但我们相信这些部分必能结成一种联合，目前我们应该只注意在大俄罗斯，因为他是这些附庸所环绕的中心。大俄罗斯自成一部分或存或亡都为一体，在他的六千万人口中约有百分之十是构成俄罗斯革命的要素的，其余都与革命没有关系，或是忠于现行制度的，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未加入革命运动。那些农民在全人口中实居大多数，他们并不是满足他们的境遇，但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在确保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而不在政治的改革，他们怨恨地主和官吏一流人物而不怨恨皇帝，所以革命的责任只落在看出自由俄罗斯的光景而决

(四) 劳农政府的组织及其中心人物

克伦斯基政府既为列宁一派所推倒——第二劳兵会乃于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晚九时召集第二次会议，选出一个新中央委员会，其中会员多数派实占大多数，以大多数通过一个建立新政府的决议如下：

“应即组织劳农政府名为人民委员会，以统治此邦直到宪法会议成立之日为止，一切国家行政都委于此人民委员会，会员须保障按本会议的政纲执行与一切工农男女的组织密切的协同动作，一切政权都在人民委员会，监督他们、更动他们的权都在本会。”

当时选定人民委员会衔名如下：

1. 会长 Nikolai Lenine (Vladimir Ilyich Ulianov)
2. 内务委员 A. I. Rykov
3. 农务委员 V. P. Miliutine
4. 工务委员 A.G. Shliapnikoff
5. 海陆军务委员 V. S. Ovsienko (Antonov)
N. V. Krylenko
F. M. Dybenko
6. 商务产业委员 V. P. Noghine
7. 教育委员 A. V. Lunacharsky
8. 财政委员 I. I. Skvortzov (Stepanov)
9. 外交委员 L. D. Bronstein (Trotsky)
10. 司法委员 G. I. Oppokov (Lomov)
11. 粮食委员 I. A. Teodorovich
12. 邮电委员 N. P. Avilev (Glielov)

13. 民族委员 I. V. Djugaghivili (Satline)

劳农政府就是这样成立了。这些人物，多是由中产阶级和知识阶级出身，是很可注意的一点。后来事务的分部和人选，都有更动。现在的组织和人员如下：

1. 会长 Nikolai Lenine(仍旧)
2. 内务委员 Dzerjinsky
3. 农务委员 Sereda
Zalejsky
4. 工务委员 Achmidt
5. 陆海军交通委员 Trotzky(前外交委员)
6. 商务产业委员 Rykov(前内务委员)
Miliutine(前农务委员)
7. 教育委员 Lunacharsky(仍旧)
8. 财政委员 Krestinsky
9. 外交委员 Tchieherine
10. 司法委员 Kursky
11. 粮食委员 Tsurupa
Hinchuk
12. 卫生委员 Semashke
13. 社会救济委员 Vinskurov
14. 外国通商委员 Gukavsky

现在把建设新俄罗斯的中心人物的履历一为略述。

一、列宁(Lenine)

列宁原名 Vladimir Ilyich Uliyanov。一八七〇年四月十日生于 Simbirsk 省。此省位置在俄人最亲热的慈母乌尔加

(Mother Volga) 河岸上。

关于列宁的出身在纪载里有不同的两说：一说他是农家子弟，一说他是贵族子弟。其实二说皆有根据。在旧时俄国一个人若做了海陆军的将佐或是民政官吏，自然成了贵族。列宁的父亲虽出自农家，而显达至于省政府顾问的地位，所以随著者的意思说他是出自农家亦可，说他出自贵族亦可。他的母亲名叫 Maria Alexandrovna。伊在 Kazan 省有点小财产。列宁父死后，他的母亲承受了一份养老金。

他的父亲历充过学校的校长或监督，是一位很热心的教育家，到处奖励文化上的兴趣。有子女五人，三男二女。一家人都能各精一艺，或善于音乐，或善于美术、文学、科学等。他们的家庭俨成一个小的大学校。这样一个有趣味的团体，自然生出一种亲热的家庭精神来，兄弟姐妹都相亲爱并都亲爱他们的父母，感情异常的深厚。

这样一个美满的家庭，对着四围很苦的民众，在他们的精神上自然都印了很深的迹象。他们自己家庭生活的甘美和那呻吟在帝王虐政下万家生活的愚暗与不幸，恰是一个绝好的对照，万众的愁云遮盖了一家美爱自由的光景。所以随着他们求得知识的热情，他们对于人民的热情亦开始增进，一个跟着一个的都自献身于工人农民的解放和教育的事业。

一八八六年五月二十日，发生了一场悲剧，给了列宁一个很深的印象。悲剧为何？就是列宁的长兄 Alexander 以谋杀皇帝罪被捕入 Schlüsselburg 牢狱。

他这位长兄具有一种奇特的精神与品性，酷好音乐，尝漫步森林中，荡小舟于 Volga 河顺流而下。他是一个勤勉优美的学

生，常冠他的同级，获得学校的金奖品。

他同着他的姊妹 Anna 入圣彼得堡大学，在那里读书，非常的奋勉，出席听讲，在实验室里研究，朝夕不辍，作了一篇《论昆虫的视觉官能》的论文，得到动物学的奖赏。读了很多社会科学的书，草了一通党纲，翻译了一本关于马克思哲学的著作，组织些团体，运动船坞工人，助贫苦学生，至于典当了 he 所得的金奖品。

他对于皇帝暴虐的反抗，一天激烈着一天，层出不穷的虐政，驱着他与革命党的营垒日益接近。他组织了一班人，去祭批评家 Dobroliubov 的坟墓，行至 Nevsky 地方，便为哥萨克侦缉队所冲散，许多学生被捕去了。亚历山大从此便与一虚无党人团体称为“民意”（The People's Will）的联合起来谋杀俄皇亚历山大二世，事为秘密警察所发觉，有十五个会员被捕，交法庭审讯。

英国著作家 Wilcox 说：“他被讯的时候，辞却一切法律上的援助，对于不利于他的话一句亦不驳，他第一的希望是要解脱和他有关系的人。首席辩护士说他自己承认了一切的罪名，差不多就是不是他作的事亦认作是他作的一样。”听说因他这样把他人的罪揽在自己身上，救出了他一位同志的生命。在他对堂上的演说里，声明过他的信念就是在俄国现下的情形，只有天诛（Terror）是政治竞争上可行的方法。到了宣读判决死刑的五人姓名的时候，Alexander Ilyich Ulyanov 亦在其中，其余的四人 是 Gueneralov、Andriuchkin、Ossipanov、Schevyriov。

将要行刑的时候，他的母亲得了许可来看望他。伊第一次来看他的时候，他匍匐在伊的足下，流着眼泪，恳求恕他为伊添

此烦恼的过处。但他对伊陈述一个人于报答两亲以外，还有更高的义务，而在俄国为全体人民谋政治的解放，而我就是这些更高义务中的一种。他母驳他说他的方法实在骇人。他答伊道这是不得已的手段，舍此还有别的方法么？伊又劝他自行悔罪以求赦免，但他坚不肯为此，说“那就是作伪了”，“我要杀人，所以人必杀我”。

他很想在他一息尚存的时候，把他生前未了的责任，就是极琐屑的小事，都要弄得清清楚楚，他还记得他欠一位朋友三十卢布，就请他母亲替他赎出他的金奖品，卖了偿还此债，并且请伊把他借来的书归还故主。怕他母亲过于悲伤，他特别提起他几个兄弟姊妹都已卒业，才能都很优越，以慰安他的母亲。他就这样死在 Schlüsselburg 的断头台上了。这是一八八七年五月八日的事。

他那一位兄弟 Dmitri 和他两位姊妹都一时曾受警察的监视。列宁曾在 Simbiirsk 中学肄业。那临时政府的领袖 Alexander Kerensky 的父亲 Feodor Kerensky 充当此校的校长。他断想不到他的儿子后来竟据过全俄的最高地位。他更想不到由他所管理的学校出身的学生，竟是取他儿子的地位而代之的人物，现在正以坚强的精神和手腕，指导全俄的运命，全世界大革命的运命，以与举世的仇敌相抗战。

一八八七年列宁在此校卒业，卒业后即加入 Kazan 大学。是年他的父亲去世，他的长兄遇难。他在此处的生活为时极短，因他在大学中宣传社会主义并参加革命示威运动被逐出校，并不许在 Kazan 省居住。

一八九一年，列宁入彼得堡大学研究法律经济。是时他才

结婚。在彼得堡大学肄业的期间，发布了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声誉顿起，那被称为俄国社会主义之父的 Plekhanov 读了他的著作说：“这位青年必有成为危险人物之一日”。

这时俄国的官吏亦颇注意列宁，看他是一个很危险的人物。因他对于学理和对于生命一样的有热情，并且专心一意的作社会党人运动的事业，等到他组织了劳工阶级解放联合会，他就变成一个有势力的工人首领了。

列宁并没有象他长兄一样，参与于天诛主义者的运动，他只在教育工人们以政治的、经济的、知识的事业上尽力。但从皇帝眼里看来，无论如何只要是为人民奋斗的人都是政府的仇敌，所以重重的拳击终不免落在列宁的头上。一八九五年他往 Geneva 与 Plekhanov 发生关系，旋即返圣彼得堡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文学与宣传，用 Tylin 的名义发表。一八九六年因组织社会民主党为法庭所控被捕，一八九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俄皇下了一道谕旨，把他发往西伯利亚去了。

他同着千万个最勇敢最优良的俄罗斯少年，经长途远越亚细亚的荒徼去了。但他决不令这一片冰天雪地静沉沉的西伯利亚于他没有什么意义。他想在这个地方，正可以有很富的机会让他去思去读。他在 Irkutsk、Krasnoyarsk 等处过了他的逐放期间，当他在 Sushenskoy 的村落里的时候，他曾自励用脑与笔不断的工作，所以他从此出来以后，有好多的著作出世，用 Ilyich, Tylin, Lenin 等名义发表。

列宁的流放期虽满，但在俄罗斯境内仍不能自由活动，政府仍不许他在工厂中心或是大学所在地的大都市里居住。他于是于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六日逃往西欧，作了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

员会的会员，在很重要的位置。一九〇一年他同 Plekhanov, Martov, Zaslulich, Axelrod 诸同志创立了一个报社，名为《Iskra》，译云《火花》。这报成立后，就成为亡命在外的俄罗斯社会党人活动的中心。列宁在这个热烈的革命家团体里增进了很多组织的能力，所有加入解放运动的青年都来集合于这个中心，所有在俄国境内革命的宣传都是由这个中心发动。

列宁因为避暗探的监视，常迁徙于 Munich, Brussels, Paris, London, Geneva 等处，他的夫人 Nadezhda Constantinova Krupskaya 是一个热心宣传家的女儿。伊充党中的秘书，尝用尽精力誊写那些用看不出的化学药水写的暗号信件，几乎毁坏了伊的健康。

一八九八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成立。一九〇三年，该党在 Brussels 与伦敦开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列宁主张把该党改为中央集权的组织，由一个中央集权体指导一切运动。他力持此说，争论甚激，该党因而分裂成为二派：列宁一派为多数派 (Bolsheviks)；反对列宁的一派为少数派 (Mensheviks)。少数派的领袖是 Martov，多数派的领袖就是列宁。

列宁既作了多数派的领袖，许多旧时负有声望的老前辈如 Plekhanov 亦在其内，都投票举他。后来他们才转到少数派里去，成了他的反对党。

列宁虽只身寄居异国，没有一点活动的方法，亦不失他的勇气，亦不抱悲观。他刊行了一部《经济学研究》的书，在俄国销行很广。他用以他这部书卖得的余钱，并赖 Lunacharsky, Bogdanov, Vorovsky 诸人的助力创了一种报，名曰《前进》(«Forward»)。

一九〇四年，俄国的革命运动复活了。列宁在是年的会议提出很多的问题，如那无产阶级专政、资本家财产没收、革命运动发展至于极度，俄罗斯革命是全世界国际社会主义者革命的乐令等等问题，都是可以决定他后来作劳农政府的领袖的。

一九〇五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爆发，列宁以大赦得归故国，指挥第二次国会里多数派的活动。不久反动又起，遂又逃往芬兰（一九〇六年），而瑞士（一九〇七年），而巴黎（一九〇八年）。此时他又创立了两种报：一名《社会民主党》（《The Social Democrat》），是一个宣传的机关；一名《无产阶级》（《The Proletariat》），是一个学理的刊物。他同他的同志住在 Cracow，距俄国边境很近，他在那里可以与俄革命党人接近，并且指挥他们的运动。

列宁于宣传运动外，还有美术的兴趣和著作的生涯。Wilcox 说他象马克思一样，欢喜英国的博物院。他对于这个机关有很热情的称誉，一谈到此便眼光四射，兴致勃勃。他在英时即住在博物院的附近，这是他最欢娱最足以慰安精神的乐土。

列宁译过一部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著的《产业的平民主义》（《Industrial Democracy》），成绩很好。他自己的著作重要的有下列的十九种：

- 一、《俄罗斯社会民主党问题》（一八九七年出版）
- 二、《俄罗斯资本主义发达史》（一八九九年在圣彼得堡出版）
- 三、《经济的札记和论丛》（同上）
- 四、《什么是要做的？（吾党运动的难问题）》（一九〇二年在德国出版）
- 五、《告贫乏的农民（为农民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宗旨而作）》

(一九〇三年在瑞士由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出版)

六、《进一步退两步(论本党的危机)》(一九〇四年在瑞士出版)

七、《民主革命中的社会民主党两个政策》(一九〇五年在瑞士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部出版)

八、《社会民主实业史略的大纲》(由一九〇五年至六年的文集)(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拉出版)

九、《解散旧国会和无产阶级之目的》(一九〇六年在俄国出版)

十、《一九〇五年至七年俄罗斯第一次革命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九〇七年著,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拉出版)

十一、《经验批评主义的唯物哲学》(一九一〇年出版)

十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末日》(一九一五年著,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拉出版)

十三、《俄国政党和无产阶级之目的》(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拉出版)

十四、《论进行方法的文书》(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拉出版)

十五、《革命的教训》(同上)

十六、《农业中资本发达律的新论据》(卷一论美国农务经济中的资本主义,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拉出版)

十七、《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拉出版)

十八、《苏维埃政府的要图》(一九一八年在彼得格拉出版)

十九、《无产阶级的革命与考慈基汉奸》(一九一八年在彼得格拉出版)

列宁的著作译成英文的,我只看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是

日判决剥夺公权，终身放逐于属于 Tobolsk 的 Berezov 城。一九〇七年二月二十日，他又由此处逃往瑞士。他在瑞士或云在维也纳用俄德文发刊《蒲拉达》(Pravda)报，又办一世界通信社以宣传俄国革命的消息于世界，并将世界的新潮输入于俄国。一九一〇年展转至于德国，在此著了一部《俄国第一革命史》。后以革命的言行为德国官吏所忌，被捕入狱，至大战前三月始被放释，遂移居于奥京维也纳。是时战云日迫，奥社会党安多鲁博士虑他以俄人居此恐遭危险，劝他去此，乃赴塞尔维亚，至则战端已开，塞地且为奥兵次第侵入，遂复还瑞士。不久俄社会党人在巴黎发刊俄国社会党报名为《Noshellvo》，招他往任编辑，他又任《Golos》的编辑。时有法境俄军以反对战争有戕杀法国将校的事，法政府处俄兵以极刑，他很不平，乃作一文历数法政府的罪状，托法社会党某君致之法政府，因此又被逐出巴黎。

是时欲返瑞士，瑞政府又因与俄不和，拒绝入境。欲走西班牙，西政府亦不许入境，在巴鲁沙罗地方被拘，旋逐出境外。他在欧洲算是穷途了，乃决往美洲，在坎拿大被拘了些日子，革命后取道英伦返俄。

他的身材高而细长，眼光明锐，鼻作弓形，口甚大，乱蓬蓬的黑发，一点滑稽的山羊式的下髯，挂在滑削的脸上。他有一种演说的才能，善作悲剧的作派，便利的口技，却能接近群众，精于德国的学问，操法语极流畅，亦少通英语。

他的著作，我所看见的有《多数派与世界平和》、《俄国革命史》和那同列宁合著的《无产阶级革命》三种，都有英文译本。他从前并不属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分裂后他归于少数派，后来他又介于两派之间，自成一“托罗慈基派”(“Trotskyite”)。

三、兰那查士基 (Lunacharsky, Anatole Vassilievich)

蓝那查士基亦名 Galerka, 又名 Voynov。家世很有声名, 是一位莫斯苦瓦政治顾问的儿子。一八九九年以在莫斯苦瓦工人间宣传革命, 为警察所探悉被控, 一九〇二年五月十五日判决流放到 Viatka 城二年, 受警察的监视。

一九〇四年他住在 Kief 地方, 他在那里为社会党地方委员会会员。一九〇六年他又被控, 一九〇七年一月初旬往柏林, 对于俄侨发出一篇含有革命意味的论文, 从此以后他便加入内外社会党人的运动, 到处出席于各种会议, 被派为法国国际社会党人机关报“Le Preletaire”的通信员。

蓝氏是劳农政府人物中的重要脚色。形容枯瘦, 眼光温和而神秘, 在他那和蔼的精神里艺术比意志力多, 他是一个优美的理想家, 是多数派里的教育家。

蓝氏于召还 Gorki 的事很尽力, 现在 Gorki 在彼得格勒指导文学局, 集合许多文学家从事于译 William Morris 与 Ruskin 的著作, 以启发无产阶级。

蓝氏于缓和宗教界的反感亦很有力, 因为他是一个希腊正教徒, 他能在教堂内唤起共产党的运动。他曾演说过“假使基督复生于今日, 他一定是一个共产党人”。

一九一七年, 蓝氏听说莫斯苦瓦起了骚乱并有焚掠情事, 心里很难过, 即提出一篇沈痛的文书辞人民委员会会员职。其文如下:

“我刚才听由莫斯苦瓦来的人说那市中发生事变, Blessed Basil 寺院及 Assumption 寺院尽毁于兵火。

现在那里搜藏了彼得格勒及莫斯苦瓦最贵重的美术珍宝的

围城已遭毁灭了，那里有无量的牺牲。

凶烈的竞争已达于兽性的憎恨的级段。

将来是何景象？弄到什么地步？

我不能忍此，我的器小，我晓得我自己不能止此丧乱。

在那些驱人于狂的思想和的重压之下活动是不可能的事。

这是我从人民委员会退出的理由。

我晓得此决定很重大，但我不能再留了。”

十一月三日他得了个好一点的消息，加以同志的挽留，不得不变更他的决定。他以公共教育委员的名义发了一篇恳切的请愿书。其文如下：

“朋友们，现在工人在此邦占绝对的优势了，天然的财产以外人民更承袭了伟大的文化的产业，宏丽的建筑物、博物院……全是人民的财产了。

所有这些东西，将有助我贫苦的同胞及其子孙变成新人……朋友们，我们须谨守这人民的财产。

你们曾骂那擅取他人货物的盗贼可羞，你们曾胁之以严罚，但是作人民的掠夺者，其可羞更加百倍。……固然你们是此邦的青年主人，就是现在你们很忙，有许多事要筹画，有许多事要作，你们亦该知道怎样保护你们美术的科学的财产。朋友们，现在莫斯苦瓦之所遭遇，是一个可怕的不能挽救的不幸内乱的结果，毁了无数的名域，焚了很多的宫室……人们在他们的权利竞争中，毁了他们光荣的首都。

在这猛烈的竞争与破坏的战争中，作人民教育委员特别的悲伤，我们唯一的慰安，在于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一个新的较高的文化的渊源似的，在我实重负着保护人民的美术的财产的责任。

知我自己不能继续主持我所无权的职司，我便提出我的辞意，我的同事们就是别的人民委员会，觉得我的辞职不能允许，我于是在你们寻得一位胜我的继任者代我以前，只得暂时留职。

但我求你们，朋友们，给我以你们的援助，为你们和你们的子孙保持我们祖国的美术，作人民的财产保卫者。就是那最后有教育的他亦曾不知不识的保全到那样长久，即此可以恍然大悟艺术是怎样伟大的一个快乐强健明慧的泉源。市民们，守住我们国民的财产！”

看这两篇沈痛的文告，已可以想见他的人格了。

四、布哈林(Bucharin)

布哈林是一个司法官的儿子，受过优良的教育。他并不是列宁的传话机，他在多数党里保有独立的地位，而未尝任过有责任的职守。在多数派中为反对 Brest 和约的主要人物。关于多数党的运动作过许多很有价值的小册子，那有名的《共产党政纲》就是其中之一。把多数党的真目的真精神都赤裸裸的表现出来了。他还不到四十岁，身躯短小，富有勇敢，他在学说上理想上比列宁还趋于极端。

五、康门聂夫(Kamcnoff)

康门聂夫在多数派里亦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年才三十七岁，须髯尽黑，他的形容比他的实在年纪还老些，和他的多数同志一样亦是个犹太人。他的真名为 Rosenfeldto。他是富家子弟，曾毕业于莫斯苦瓦大学。在学生时代已具社会党人的倾向，与多数俄罗斯学生一样，在二十岁以前即与警察成为仇敌。他是派往 Brest 代表团中的一人，作过一种书，论那争议最多的和约。Brest 和约成后他被任为驻奥京(维也纳)的多数派公使，但

因为芬兰人所捕未能赴任，芬人把他置之监狱直到一九一九年七月才释放出来，回国后被选为莫斯科瓦苏维埃会长。他为人尚学理不尚血气，他的主张比他多数同志温和的多。

六、几诺维也夫(Zinovieff)

几诺维也夫于一八八三年生于 Ukraine。幼时即从列宁，是列宁最密切的朋友，直到如今未曾分离的伴侣，在旧时帝政之下，他同别的多数派领袖一样受过监禁的苦楚，释放后即逐出国外。战前十年间他为多数派中央委员会很尽力的会员中的一人，作了党中的书记好几年。大战初起时，他同列宁在 Galicia 攻击交战国双方的军国主义甚力。从一九一四年至三月革命，他同列宁在瑞士刊行《社会民主党报》，责备那些助军国主义张目并那不极力抵抗他军国主义的社会党人不遗余力。后来在 Zimmerwald Berne 和 Quintal 各处会议都有他出席，与列宁同代表俄罗斯。前年三月多数派政府迁到莫斯科瓦，他留守彼得格勒为此方的首领。他身材短小，头及前额均甚大，一见知为聪慧的人物。他痛恨英国人，对于工人常说英国是永不能与俄罗斯调和的国。

七、斯佛德洛夫(Svordlov)

斯佛德洛夫，犹太人，一八八五年在 Nijni-Novgorod 生，受过普通中学的教育，后在一药铺里为化验师。一九〇二年他第一次被捕拘留两个星期，时年才十七岁，因为他参与学生的示威行列。一九〇三年受警察监视，一九〇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被判决监禁二年，好容易出了监狱，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他又因参与一个被禁止的会议被捕，并被判决流逐边远省份，因为健康不良，于一九一〇年四月二日被许出国，以后又在俄国被捕，一

九一一年五月五日判为流放 Narinsky 省四年，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七日从那里逃走了。他曾被选为劳兵会中央行政委员会即是全俄苏维埃会议的议长，如果列宁的人民委员会长的地位等于内阁总理，他的地位便等于共和国的大总统。据去年多数派传出的无线电报，他已经逝世了。

八、齐捷林 (Tehicherine)

齐捷林系贵族出身，承袭相当的财产，后来作了社会党员自愿弃之。少年时代曾为名誉政治顾问，又在外交部当过书记，不久他便辞去他不愿作的职务，于是献身于社会主义者的运动，与他别的同志一样曾被放逐到各处。一九〇七年他在柏林为柏林社会民主党机关部中央委员会会员，在他在那里宣传社会主义于侨居当地的俄人问，他不能逃于普鲁士警察的严重的监视。一九〇八年在 Charlottenburg 被捕，发现出来他有八十多个记号作他的变名，遂被逐出于普鲁士。后来他往 Geneva。大战初起时他在英国，与英社会党有极密切的关系，终为英国官吏所囚禁。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回俄。Brest 和约成后，他继托罗慈基任外交委员。他有语言学的天才，通英法德文字极精，旦夕都在外交部公事房阅电报文书精勤不倦，现年约四十岁。他在多数派占高级位置的原故，在于政治才能的方面少，在于人格纯正信仰坚定的方面多。他身躯短小，两肩低垂，眼小面赤，须发作砂色，不修仪饰。

九、喀拉罕 (Karachan)

喀拉罕 Armenia 人，主张排斥土尔其人，与中欧诸国没有好感情。他在多数派中属于相信笔墨比刀剑还有力量的一类，有许多外国多数派的军队在他保护之下，把许多小册子翻成各国

语言了。刊行了一种英语日报名曰“The Call”，志在分布于驻北部俄罗斯的英国军队。他的仪表很有丰采，须髯修整，衣装都丽，长于辞令，接待外宾，都是他的职任，是多数派人民委员中最漂亮的脚色，助齐捷林办理外交很有成绩。现年三十三岁。

十、诺格海音(Noghine)

诺格海音于一八七八年一月二日生，在俄国社会党中久负重望。一八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他在彼得格勒初次被捕，流放于Poltava省，刑期三年。一九〇〇年八月六日逃去亡命于英，十月一日返俄，又在彼得格勒被捕，判决流放于西伯利亚Yeniseisk省。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日，他从那里又逃走了。后来他变名来到于Nikolaief地方又被捕，流放于Archangel省。一九〇五年八月十日，又从这里逃走了。是年十月一日，他又因参加工厂工人本部派出的工联代表会议在莫斯苦瓦被捕，判决三年监禁。一九〇八年八月出狱，返莫斯苦瓦参与合作制度会议。八月十七日又被捕，流放于西伯利亚境内Tobolsk地方北部四年。一九〇九年一月他又从那里逃走，此后他便出国了。后来回到莫斯苦瓦作宣传运动，又被捕流放到Tobolsk。一九一〇年八月二日，他又从这里逃走。一九一一年他在Tula地方作宣传运动，是年三月二十五日又被捕了。这是他从前的历史。劳农政府成立后，他被任为商务及产业委员。

十一、斯佛卓夫(Svortzov)

斯佛卓夫是一师范院毕业生，曾充过教员。一八九五年因制造炸药材料，以天诛主义者第一次被拘讯，三年间受警察监视。一八九九年又因在工人间作宣传运动在Tual被捕，一九〇二年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三年。一九〇五年期满回来又因参

与革命的示威运动在莫斯科瓦被捕，释放后一九〇八年又被捕，不久又释放。一九一一年二月十八日又被捕，宣告流放于 Astrakhan 省三年。劳农政府成立后，被任为财政委员。

十二、亚威洛夫(Avilof)

亚威洛夫，人都知道他叫 Glielov。从前作过印刷工人，一九〇七年他因宣传革命处三月监禁的刑罚，自是他便作了莫斯科瓦秘密社(The Secret Society)的会员，后来逃往外国，应同社的要求，出席于意大利中北部 Bologna 学校听煽动家和宣传家所授的课程。劳农政府成立后为邮电委员。

十三、德儒加什维理(Dingashvili)

德儒加什维理是 Georgia 人。执过簿记业，以宣传革命被放于 Vologda 境内。一九〇八年九月二十九日逃走又被捕又逃去又被捕。一九一二年，判决流刑三年，是年九月一日又逃走。劳农政府成立后，曾为国籍委员。

十四、李果夫(Rikof)

李果夫一八八一年生于 Saratof，长育于正教教堂，作过外国语翻译员。一九〇八年被剥夺了居住国内的权利，但许他出国，后又回国。一九一〇年二月一日流放于 Archangel 省。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八日，由 Pinega 城逃走，不久又被捕，流放于 Marunsk 省。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日又从那里逃走。劳农政府成立后，曾充内务委员。以上所述，都于建设劳农政治为比较的重要人物，其余的人不更赘述了。

1921年7月1日

《新青年》第9卷第3号

署名：李守常

《西洋大历史》序

(一九二一年七月)

吾友李君泰棻，著《西洋大历史》，首卷已于客岁杀青行世，次卷今又赓刊，属序于余。余不文，何敢序李君之书？

顾晚近以来，聪明俊义之士，群向政治纷进之途，谁复以穷治学术自重者？而政局倏扰，变幻靡常，大邑名城，恒罹兵火，即有潜修之子，著作之家，亦皆转徙流亡于风尘湮洞之间，喘息未安，乱离踵接，又焉有从容以事著述之暇？以致学术销沉，图籍寥落，方之欧区，固非敢望，即视东瀛，亦愧弗逮。文化凌夷，滋可慨焉！

西史一书，本为常识所需，而当欧风东渐、汉土革新之时，尤宜资为借鉴。求之坊肆，乃无善本之可寻，即间有一二，亦皆病未详备，无足供研考。李君独能于颠沛流离中，斐然成兹制，钜以饷学者，是又安得无感哉？爰书数语，以壮其奋进之志，冀其益加奋励，自跻于世界作者之林。固知李君之成功，必不以是书自画，而是书之价值，亦不以余之一言为轻重也。

乐亭李大钊

1921年7月

《西洋大历史》增订3版(中华
印刷局印，武学书馆发行)

美国图书馆员之训练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一日)

一八七七年，伦敦的联合五国图书馆协会会议录中，有关于图书馆员训练的记载。这是最初的印行的记载。在此会议中，意大利国Crestadoro博士唤起对于此问题的注意，以为这即使不是必要的事，亦是可喜的事，并且说意大利近已颁布一种皇家条令，规定凡国家图书馆员必须训练，此项条令业已见诸施行。当时有美国图书馆长数人亦尝出席这个会议，便是他们注意这个问题的萌芽，从此图书馆员的训练问题，常常见诸图书馆月报，提出于图书馆会议。一八八三年图书馆学校委员会被委任了，一八八七年正月在Columbia College立了一个图书馆学校，这个学校的成立，多赖Melvil Dewey的提议与尽力，他在当时充图书馆长。出席于第一次讲习会的约二十人，此中有些有图书馆经验的，有些无经验的，会期历四个月。次年讲演会期延至七个月，又次年亦如之。一时反对形式的训练的偏见很强，但是渐渐的证明了这经过训练的，比没有经过训练的有条理有组织的多。

后来大家渐知图书馆学校的利益，图书馆学校亦渐次增加。一九一三年增至十一处，到一九一八年共计有十七处。可见美国图书馆教育的发达，因而促成图书馆学校的发达了。

现在把这十七处图书馆学校成立的略史约举于下：

(1)阿特兰塔卡尼基图书馆附设图书馆学校(Library School, Carnegie Library of Atlanta——在 Atlanta Georgia)

是校原名南方图书馆学校，创立于一九〇五年四月。其成立多赖Andrew Carnegie的慷慨捐金。一九〇七年四月更为今名。是年十二月七号，卡尼基氏慨允继续维持。Anne Wallace是该校第一任校长。是校自美国图书馆学校协会成立的时候，便为该协会的委员。入学须受试验，试验科目为通史、普通文学及一种现代语言等，学力必须具高等学校四年的课程者，年龄须在二十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课程一学年包含三十四个星期，分为三学期。学生以百分为满足，以七十五分为及格，以卡尼基图书馆为实验室。由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毕业生总数为一百二十人。

(2)波士顿(Boston)大学(事务管理学校)图书馆经济科(在 Boston, Mass)

这是波士顿大学事务管理学校新添的课程。是校是在波士顿大学图书馆长Ralph L. Power指导之下，由一九一七——一九一八的学年开始成立的。目的在造就一班管理关于实业和高等商校教员的图书馆，故其课程特别置重特殊图书馆的管理，即是特别关于实业的图书管理。

(3)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州图书馆学校(在California州)

是校是根据该州图书馆委员会的决议，在一九一三年九月四日成立的。入学试验很严，非有大学毕业或高等学校毕业的资格不可。经费由州图书馆基金中提用。课程一年终了。每岁加州各府图书馆在Sacraments开年会时，此图书馆学校的学生均出

席,借以接近实际问题。以加州图书馆为实验室,该图书馆中藏有特别关于加州的书籍及盲人用的书籍等。开办四年,毕业生计有五十二人,除六人外,均在各图书馆作事。

(4)伊林诺(Illinois)州大学图书馆学校

是校原是Chicago Armour学校图书馆学校,一八九三年创立,自始即在Katherine L. Sharp女士指导之下。一八九七年夏,此校由Armour学院的好意让与于伊林奈州大学。Sharp女士即成为伊林奈州大学的图书馆长,并充图书馆学校校长。初办的二年,课程以一年为满期,后改为二年。入学资格须具有高等学校毕业的程。办了二十五年,共有六百三十七个学生,五百五十七人是修完一年课程的,二百九十人是受了二年课程的^①,现在有四百二十五人从事于图书馆职务。此校亦是美国图书馆学校协会的会员。经费依校长的提议,评议会的认可,由大学基金中提用。不拘入学资格者,倘年在二十一岁以上,可允为特别生,不给学位。每班都有两三个特别生。该校学生,每年定有一星期的工夫去参观。过去十年来,每年都办暑期讲习会,目的在训练伊林奈州各图书馆员,而与以关于管理图书馆的初级知识。此项学生,亦不给学位。必须高等学校毕业生,而作过图书馆职务者,方允入学。此项学生共收录过一百六十五人,其中有一百二十三人是来自伊林奈州各图书馆者。

(5)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大学图书馆学校

加州大学于一九一八年即宣布添设图书馆学的功课,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间的一学年,只授书目题解及编目与

^① 数字有误,原文如此。

分类二课，以后又添授馆务行政与扩张及书籍的研究与选择二课。加州大学又设六星期的夏期图书馆讲习会，很予从事此业者及有志此业者以便利。

(6) Los Angeles 公立图书馆学校(在 Los Angeles, California)

是校原是一个见习班，由一八八八年开始的，继续至一九一一年，课程渐渐扩充，一九一四年，改组而成一图书馆学校。课程以一年为毕业期。经费由该公立图书馆供给，而酌收学费，以为补助。此校亦是美国图书馆学校协会的会员。入学资格至少须受过四年高等学校的教育或其同等的学力，年龄至少须在十九岁以上、三十岁以下。其三十岁以上者，除非有过办理图书馆的经验的，概不收纳。此校参考书的设备很完全，特别注重儿童读物。此校不办夏期讲习会，但每年总有公开的演讲，以利 Los Angeles 附近的图书馆员。到一九一八年七月，有四班学生，总数为六十二名，除少数有特别原因的以外，均从事于图书馆职业。

(7) 纽约州图书馆学校(在 Albany)

是校为 Melvil Dewey 所创立，时在一八八七年，地方在 Columbia 大学。当时此校实为 Columbia 高等学校的图书馆经济学校。一八八九年此校让与纽约州图书馆，现在是纽约州立大学的分机关，是美国图书馆学校协会的特许会员。入学资格必须是纽约州立大学所注册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年龄须在二十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并须谙一种外国语。课程以二年为满。夏期讲习会的时间，定为六星期；分作两期，两年交替。毕业于此校的，共有八百四十一人，其中一百六十七人为男子，六

百七十四人为女子。

(8) 纽约公立图书馆学校

是校创立于一九一一年, 经费为卡尼基及所捐助, 一切组织全是 Mary Wright Plummer 女士所筹画的。一九一六年女士去 Oberlin, 高等学校图书馆长 Smith Root 接理。设备很完善, 课程以二年为满。

(9) Carnegie 图书馆学校

是校乃为养成儿童图书馆员而设立的, 成立于一九〇一年, 原名为儿童图书馆员训练学校。创办人系 Carnegie 图书馆长 Edwin F. Anderson 及 Carnegie 图书馆儿童部主任 Frances Oleott。到了一九一六年, 改为今名, 而为卡尼基学院的一部分, 是美国图书馆学校协会的特许会员。课程以二年为满, 附设一年讲习所。十七年间, 学生共有三百五十二名。

(10) Pratt 学院图书馆学校 (在纽约 Brooklyn)

是校原是一个讲习班, 由一八九〇年春办起的, 创办人 Margaret Healy 女士, 伊系 Pratt 学院图书馆第一任馆长。至一八九五年 Mary Wvight Plummer 女士继任图书馆长时, 改为正式学校。一九〇四年 Plummer 女士辞了馆长的职务, 专办图书馆学校, 那时学校与图书馆已完全分离, 别为一个行政的单位。等到一九一一年 Plummer 女士离开该校, 该校遂与图书馆重行合并, 受图书馆长 Edward F. Stevns 的监督。Jasephine Adami Rathbone 女士自一八九五年以来, 便与该校发生关系, 到了此时, 便为该校副监督, 兼充事务主任。是校亦为美国图书馆学校协会的特许会员。学生总数达六百一十八名。

是校成立于一九〇三年，为西方保存大学的一部。经费靠 Andrew Ggrnegie 氏捐助基金的收入，而以学费补助之。一九〇四年九月开学。自始即与 Lleveland 公共图书馆有密切的关系。该图书馆的馆长 W. H. Bratt 便是此校的教务长。一九一六年正月以后，为美国图书馆学校协会的会员。学生由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共得二百四十八名。

(16) 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学校(在华盛顿 Seattle)

是校成立于一九一七年二月。原来该大学自一九一一年九月以来，便设了一个图书馆经济学训练部，因为为太平洋西北岸的图书馆长，很热心的想聘用些具有善良的普通教育并专门的训练的人，故华盛顿大学为适应他们的要求，曾予以图书馆员形式上的训练，这便是图书馆学校的基础。比较尚未为美国图书馆学校协会的会员。

(17) 威士康新 (Wisconsin) 大学图书馆学校 (在 Madison Wisconsin)

此校萌芽于一八九五年设立的图书馆学校，复期学校，至一九一一年以威士康新大学图书馆学校的名义，在法律上为州立大学的一部。此校为美国图书馆学校协会的特许会员。

以上各校的课目，虽略有出入，而大体则皆相同。其要目约举如下：

甲、行政类

图书馆行政

图书馆立法

图书馆建筑

图书馆簿录

购订书报

对于儿童的事务

图书馆运动

图书馆组织

借书课

研究室

乙、技术类

总目

分类

书架目单

标题

索引

字母顺序及书类整理

装订及修缮

丙、题解类

参考事务(政府文书)

图书馆史

印刷术史

外国语

商业题解

国民题解

问题题解

丁、批评类

小说鉴别

儿童文学

盲人用书

书籍选择及注释

戊、杂类

时行问题

图书馆界的调查

打字术

实习与参观

此外,还有夏期学校(Summer School)见习生班(Apprentice Classes)、图书馆讲演会及谈话会(Institutes and Round tabl)及师范学校内的训练等办法,都是补助图书馆员的训练和知识的。夏期学校的设立,乃因小图书馆不能出多薪聘用新式图书馆学校的毕业生,而这些小图书馆的效能亦必设法提高,故设夏期学校专为训练已经供职于图书馆的人员,此外概不收纳。此项夏期学校在美国共有多少,很难计算,因为许多州办此等学校并不是按定规的。历年都办的有:Wisconsin、Minnesota、Indiana、Iowa各州图书馆委员所办的,并那纽约州图书馆在Albany办的和那在Ghantanoqua私人试办的几个夏期学校。大图书馆的发展很速,所以事务一天比一天增加,因之所用人员亦渐增加,而且常有进退。而图书馆学校所造就的人,又不屑就低级补助的事务,小图书馆亦因经费的困难,不能出多薪聘用有经验的助理者,见习生班就是应这些必要而发生的。此项见习生班多在大图书馆办理,普通是能造就本馆需用的人员,但有时为应别的图书馆的请求,亦可用书翰推荐于别的图书馆。图书馆讲习会,乃因小图书馆不为有相当的时间与财力办夏期学校,故集合邻近村镇几个图书馆开两三次会,其中必一次是公开的,以引起

公众对于图书馆的兴味。此种讲演会，与其说是训练的方法，毋宁说是宣传的方法。至于谈话，则系邻近的图书馆员，自行集合三五同业，讨论日常发生的问题与困难的。在师范学校内图书馆的训练期的，乃在使各中小学教员得一点选择或运用书籍的知识，并些关于办理小藏书室的技术。在一九〇三年的时候，已有十二个师范学校办理此类事业，现在想必更见发达了。（去年北高曾办过一回夏期讲演会）

前月我在女高师国文部讲演这个问题，很引起他们对于图书馆的训练和职业的兴味，因为图书馆员的职业，于女子最为相宜。后来国文部主任胡小石先生和国文部诸生倒很想添设这门功课，可惜中国现在研究此种学问的尚少，教员实不易得人。但是有了这个动机，我相信在最近的将来，女高师的同人必能为中国图书馆运动史开一新纪元。这是可以预祝的。

1921年12月1日

《晨报》

署名：守常

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五——十七日)

今天的讲题,是“由 Democracy 到 Ergatocracy。”这 Ergatocracy 一字,出世甚暂,含义甚新,在字典上还没有受相当的待遇,明白一点说,就是在字典里还没有这个字,因为他是新造的字。今于讲解 Ergatocracy 之前,先讲一讲 Democracy。

Democracy 这个字最不容易翻译。由政治上解释他,可以说为一种制度。而由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去观察,他实在是近世纪的趋势,现世界的潮流,遍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几无一不是 Democracy 底表现。这名词实足以代表时代精神。若将他译为“平民政治”,则只能表明政治,而不能表明政治以外的生活各方面。似不如译为“平民主义”,较妥帖些。但为免掉弄小他的范围起见,可以直译为“德谟克拉西”。

现世界有种最大的潮流,而为各方面所极力要求实现完成者,就是“德谟克拉西”。以前表现于生活各方面的专制主义和大某某主义,到了现在都为德谟克拉西所战败了。这种主义所向无前底趋势,不独在政治上有然;即在产业上、思想上、文艺上,亦莫不有然。从前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是不适应于德谟克拉

* 这是一篇讲演记录,《晨报副刊》发表时题记:“李守常先生在中国大学讲,甘蛰仙记”。——编者

西的。平民文学，乃是带有德谟克拉西底精神的。所以平民文学与古典文学相遇，平民文学就把古典主义的文学战胜了。他如产业自治底运动，亦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的表现。

再看中国近十余年来底政治，愈可证明德谟克拉西有重大的势力。无论什么贵族，什么军阀，凡是附和德谟克拉西的，都一时得了势力，凡是反抗德谟克拉西的，都必终归失败或灭亡。

十年前的清室，政尚专制，滥使威权，借口预备立宪，卒无诚意。民间起而为德谟克拉西底运动，遂使三百年之清廷，失败于德谟克拉西之前。清室既亡，国家大权遂由清室移于北洋系军阀底手里。那时候该系中乘德谟克拉西的潮流而起的，就是袁世凯氏。袁氏顺应德谟克拉西的潮流，而赞成共和，所以能恢复他自身在政治舞台上已失的地位。但他不能尽忠于德谟克拉西，反而背叛之，所以终不免失败于德谟克拉西之前。

继袁氏而起者为段氏，段氏有时得胜利，有时落于失败。表面上似乎是他一人的成败，其实他有时能够顺应德谟克拉西，所以制胜。一转瞬间对于德谟克拉西有一种反抗底表示，马上就归于失败。最近吴佩孚氏所以能战胜段氏，亦因他能顺应德谟克拉西的潮流，首倡国民大会以反抗段氏的武力主义，如今吴氏又有蹈段氏覆辙之嫌，将来的失败恐亦不能避免。

由专制而变成共和，由中央集权而变成联邦自治，都是德谟克拉西的表现。德谟克拉西，原是要给个性以自由发展底机会；从前的君主制度，由一人专制压迫民众，决不能发展民众各自的个性，而给以自由。惟有德谟克拉西的制度，才能使个性自由发展。

地方之对于中央，亦犹民众之对于君主；民众各有其个性，

地方亦各有其个性。中央要是屈抑各地方的个性，使无自由发展底机会，那么，各地方必根于德谟克拉西的精神，发起一大运动，从前美之独立，最近爱尔兰的独立运动，都是此种例证。所谓联邦，所谓联治主义，亦是德谟克拉西底组织。此种精神及组织，决非武力主义所能摧残，而武力主义则终不免于失败，因为武力主义断不能抗德谟克拉西底潮流。

Democracy 这个名词，原由 Democ 与 Kratia 联缀而成。Democ 等于 People，即“人民”之意。Kratia 等于 Rule 或 Government，即“统治”之意。联缀而为 Demockratia 演化而为 Democracy，含有“民治”（People's rule）的意思。演进至于今日，德谟克拉西的涵义，已无复最初 Rule 之意了。Rule 云者，是以一人或一部分为治人者，统治其他的人的意思。一主治，一被治；一统制，一服从。这样的关系，不是纯粹德谟克拉西的关系。

现代德谟克拉西的意义，不是对人的统治，乃是对事物的管理或执行。我们若欲实现德谟克拉西，不必研究怎样可以得着权力，应该研究管理事物的技术。

德谟克拉西，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要尊重人的个性。社会主义的精神，亦是如此。从前权势阶级每以他人作为手段、为机械而利用之、操纵之，这是人类的大敌，为德谟克拉西及社会主义所不许。社会主义与德谟克拉西有同一的源流，不过社会主义，目前系注重经济方面：如男子占势力，而以女子为奴隶；贵族自为一阶级，而以平民为奴隶；资本家自为一阶级，而以劳动者为奴隶。凡此社会上不平等不自由的现象，都为德谟克拉西所反对，亦为社会主义所反对。

后德谟克拉西而起者，为伊尔革图克拉西（Ergatocracy）。Ergates 在希腊语为“工人”（Worker）之意，故伊尔革图克拉西可译为“工人政治”，亦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德谟克拉西。在俄国劳农政府成立以后，制度与理想全为创新，而却无新字以表章之，故政治学者创 Ergatocracy 一语以为表章此新理想、新制度之用。然俄国的政治现状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他们要由这无产阶级统治别的阶级，所以他们用“伊尔革图克拉西”，似尚带着统治（Rule）之意。大权皆集中于中央，而由一种阶级（无产阶级）操纵之；现在似还不能说是纯正的 Ergatocracy，不过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而已。他们为什么须以此种阶级专政为一过渡时期呢？因为俄国许多资本阶级，尚是死灰复燃似的。为保护这新理想、新制度起见，不能不对于反动派加以提防。将来到了基础确立的时候，除去少数幼稚、老弱、残疾者外，其余皆是作事的工人，各尽所能以做工，各取所需以营生。阶级全然消灭，真正的伊尔革图克拉西，乃得实现。这种政治完全属之工人；为工人而设，由工人管理一切事务，没有治人的意义。这才是真正的工人政治。

从实质上说，伊尔革图克拉西亦是德谟克拉西的一种。列宁氏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在莫斯科第三国际大会里曾说过：今之德谟克拉西有两种，一为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一为无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后来在《国家与革命》的书里，亦屡屡称道无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看来伊尔革图克拉西，亦是由德谟克拉西的精神蜕化而来的。

无产阶级另用伊尔革图克拉西，不乐用德谟克拉西，是鉴于德谟克拉西为资产阶级沿用坏了。博洪氏曾在所著一小册子里，

警告无产阶级的同志，劝他们勿再设平民政治，因为德谟克拉西底方法，已被资本阶级用坏了。他劝他的同志要用这伊尔革图克拉西的新语，表明工人政治。其后政治学者遂用伊尔革图克拉西，以别于德谟克拉西。

* * *

现在再讲一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

照现在的情形讲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很有分别。当一八四八年一月时候，昂格思(Engels)与马克思同作的《共产党宣言》发布了。其后一八八八年用英文发刊，昂格思作了一篇序文，郑重声明这是共产党宣言，不是社会党宣言。昂格思说，在一八四七年顷，所谓社会党人乃是那些在劳工阶级运动以外求援于智识阶级的人们。不论多少，只要有一部分自觉的工人，渐知只是政治的改革还是不够，从而主张有全社会改革的必要。这一部分工人可自称为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的运动，是中流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运动，是劳工阶级的运动。

由《共产党宣言》发表，到昂格思序文刊布时候，其间德谟克拉西和伊尔革图克拉西，两种名词用的非常混淆。到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国起了经济革命，这种革命家是无产阶级，他们自称为共产党人；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又有半有产阶级在德国，起了政治革命，他们却自称为社会党人。其区别愈益明瞭。一九一九年共产党在莫斯科开第三国际大会，代表共产党，以示别于代表中产阶级的第二国际大会——社会党。旗帜更见鲜明了。

我们用颜色表共产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不同，则社会主义者应为浅红色，而共产主义者为纯赤色。可是共产主义者却

称社会主义者为黄色的社会党，黄色的国际，而不以浅红色称之。

简明的说，社会党人的运动，是半有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社会主义的运动，是创造的进化；共产主义的运动，是创造的革命。社会党人是中央派与右派，共产党人是极左派。社会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二国际，是黄色的国际；共产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三国际，是赤色的国际。这是现代社会革命运动的两大潮流。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都尚在孕育时期，故在今日尚不能明瞭的指出他是一种什么制度。但在吾人心理的三方面，可以觅出他的根蒂：（一）知的方面，社会主义是对于现存秩序的批评主义。（二）情的方面，社会主义是一种我们能以较良的新秩序代替现存的秩序的情感。这新秩序，便是以对于资本制度的知的批评主义的结果自显于意象中者。（三）意的方面，社会主义是在客观的事实界创造吾人在知的和情的意象中所已经认识的东西的努力。就是以工人的行政代替所有权统治的最后形体的资本主义的秩序的努力。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学说的内容上没有区别；不过在范围与方法上，有些区别罢了。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亦复相同。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亦是这样。无论富者统治贫者，贫者统治富者；男子统治女子，女子统治男子；强者统治弱者，弱者统治强者；老者统治幼者，幼者统治老者；凡此种种擅用与治服的体制，均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所不许。不过德谟克拉西演进的程级甚多，而社会主义在目前，则特别置重于反抗经济上的擅用罢了。

这样看来,德谟克拉西,伊尔革图克拉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精神上有同一的渊源,在应用上有分析的必要,所以今天特别提出他们和诸君谈谈。很感谢诸君出席静听的盛意!

1921年12月15、16、17日
《晨报副刊》

今 与 古*

(一九二二年一月八日)

我今天所讲的题目，是《今与古》。今是现在，古是过去的时代。我们现在把今与古来对讲，是要考查现在的人与古来的人有什么不同之点？现在的人与古来的人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生活很是重要，所以来大略说一说。有人在文章上发表他的意思，常说：“世道人心，今不如昔”；“人心不古”；“现在的风俗道德人心，不如古来的风俗道德人心”。讲这些话的人，大半都是“前辈”“长者”。他不满意于青年，也不满意现在的一般人，于是发为感叹，而动其怀古的思想。但是我们想想，是不是今人真不如古人？是不是发这样感想的人错误？这是个很有趣味的课题。我们先考究他们所以怀古的原因：

(1)发此种感想的人，对于现在的人心，风俗，政治，道德，都不满意，感觉苦痛，因而厌倦现在，认现在都是黑暗的，没有光明的。这种厌倦现在的感想，并不是坏的感想，因为有了这种感想，对于各种事务，才都希望改进。有了希望改进的思想，才能向前进步，才能创造将来。若是不满意现在，而欲退回，把现在的世界回到百年千年以至万年前的世界，这不光是观念错误，并

* 此文是在北京孔德学校的课外讲演，吴前模、王淑周笔记。——编者

且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这是伤时之人厌恶现在，而触动他怀旧之心的一个原因。

(2)人大半是羡慕古人之心太盛，如古人在当时不过是一斤八两的分量，到现在人看来就有了千斤万斤的分量，这是受时间距离太远的影响，因而在心理上发生一种暗示，这种暗示可以把古人变成过于实在的伟大，如同拿显微镜看物一样。例如火在人类史上有极大的关系，因自有火的发明，而人类生活遂发生很大的变动；又如农业，也是人类史上一个很大的发明。不过火同农业的发明，是社会的进化，并不是所谓神农、燧人一二人的功德。而旧史却不认为是社会的进步，而认为是少数神圣的发明，这是年代距离太远，传闻失实所致。又如黄帝，古代有无其人，尚不敢必，但是世人尊敬他的心，比他本人值得我们尊敬他的分量，高的多多。又如某校请一位本国教员，并不见得学生怎样信仰，怎样欢迎，要请一位有与本国教员同等学问的外国教员，就非常的尊敬欢迎，就是出洋留学的，也觉得比不出洋留学的好些。谚云“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这是普通的心理。推想起来，这又是因为受了空间距离太远的影响。过分的崇敬古人，其理亦与此同。我们的子孙对于我们，或现在一般的人，所发生的尊崇心，是我们想不到的高厚，也未可知。

(3)社会进化，是循环的，历史的演进，常是一盛一衰，一治一乱，一起一落。人若生当衰落时代，每易回思过去的昌明。其实人类历史演进，一盛之后，有一衰，一衰之后，尚可复盛，一起之后，有一落，一落之后，尚可复起，而且一盛一衰，一起一落之中，已经含着进步，如螺旋式的循环。世运每由昌明时代，转为衰落时代，甚而至于渐灭。因而许多人以为今不如昔，就发生怀

古的思想,那里知道衰落之后,还有将来的昌明哩!

(4)随着家族制度,发生崇祀祖先之思想,也可以引起崇拜古人的观念。故崇拜祖先的礼俗,亦是使人发生怀古思想的一个原因。

(5)现在也有不如古来的,如艺术。艺术乃是有创造天才的人所造成的。艺术不分新旧,反有历时愈久,而愈见其好者,因此也可以使人发生怀古的观念。

怀古的思想,多发生于老年人之脑际,青年人正与相反。一派以为今不如古,总打算恢复三代以上的文物制度,一派以为古不如今,因此在学术史上就发生了争论。在十七世纪初期文艺复兴后,法兰西、意大利就有今古之争,于文艺(诗歌文学)上,此争尤烈。崇古派则崇拜荷马,崇今派则攻击荷马。这种争论,大众以为不过是文学上的枝叶问题。自孔德出,才以为这种争论,不光是在文学上如此,各种知识,都不能免,才把这种争论的关系,看得很大。这种争论,起于意大利,传至法兰西、英吉利,前后凡百余年。

在历史学上进化、退化的问题亦成争论。崇古派主张黄金时代说,以为人类初有历史的时期,叫做黄金时代,以后逐渐退落,而为银时代,铜时代,铁时代,世道人心,如江河之日下云云者以此。崇今派以为古代没有黄金时代,古时的人,几同禽兽,没有什么好的可说。现在是由那种状态慢慢的进化而来的,如有黄金时代,亦必在将来,现在或是银的时代,过去的时代,不过是铁时代、铜时代罢了。其说正与崇古派相反。布丹说:“崇古派说古来是黄金时代,全然错误;他们所说的黄金时代,还不如他们所说的铁时代的现在;假使他们所说的黄金时代,可以召唤回

来，和现在比一比，那个时代，反倒是铁，现在反倒是金亦未可知”。中国唐、虞时代，今人犹称羨不置，一般崇古的人，总是怀想黄、农、虞、夏、文、武、周、孔之盛世。但此是伪造，亦与西洋所谓黄金时代相同。他们已经打破黄金时代之说，我们也须把中国伪造的黄金时代说打破，才能创造将来，力图进步。这全靠我们的努力。这个责任我们都要负着。在中国古书里面，亦可以寻出许多今古的比论，如“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其语气在古代，似有新的意味，且近似进化说。《书经》上说：“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这又是人是旧的好，器是新的好的意思。

中国人怀古的思想，比西洋人怀古的思想还要盛。因为西洋科学早已发明。科学是在自然界中找出一定的法则，有如何的因，便有如何的果。他们能用科学方法证其因果，又能就古来的，而发明古来所未有的。这样，古人的发明，都有明了的法则，都遗留给后人，而今人却能于古人的发明以外，用科学方法有所新发明。中国科学不发达，古人遗留下的多是艺术的，创造全靠个人特有的天才，非他人所能及。故中国人崇古的思想，格外的发达，中国人对于古人格外仰慕，对于古人的艺术格外爱恋。

怀古思想发生之原因，及中外怀古思想不同之点，既如上述。现在我发表我对于这种思想的批评。

古代自有古代相当之价值，但古虽好，也包含于今之内。人的生活，是不断的生命（连续的生活）。由古而今，是一线串联的一个大生命。我们看古是旧，将来看今也是古。刚才说的话，移时便成过去；便是现在，也是一个假定的名词。古人所创造的东西，都在今人生活之中包藏着，我们不要想他。例如现在的衣服，其形式材料，及制造的方法，极其精致，古来次第发明的痕迹，都

已包藏在内。象古人所取以蔽体御寒的树叶兽皮，我们又何必去怀想他！

黄金时代说是错误的，因为人与自然有关系，如太阳光、空气等等。人离开自然，就不能生活。古时的自然产生孔子那样的伟人，现在的自然亦可以产生孔子那样的伟人。同一的太阳光，同一的空气，在古能生的人，在今又何尝不能生？古代生的人，如何能说是万世师表！崇古派所认为黄金时代产生之人，现在也可以产生出来，我们不必去怀古。怀古的思想，固可打破，但我们不能不以现在为阶梯，而向前追求，决不能认现在为天国。当时时有不满意现在的思想，厌倦现在的思想。有了这种思想，再求所以改进之方。如现在中国国势糟到此等地步，我们须要改造，不要学张勋因怀古而复辟，要拿新的来改造。他们是想过去的，我们只是想将来的。历史是人创造的，古时是古人创造的，今世是今人创造的。古时的艺术，固不为坏，但是我们也可以创造我们的艺术。古人的艺术，是以古人特有的天才创造的，固有我们不能及的地方，但我们凭我们的天才创造的艺术，古人也不见得能赶上。古人有古人的艺术，我们有我们的艺术。要知道历史是循环不断的，我们承古人的生活，而我们的子孙，再接续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利用现在的生活，而加创造，使后世子孙得有黄金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

1922年1月8日

《晨报副刊》

署名：李守常

现代的女权运动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八日)

二十世纪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时代，亦是妇女底解放时代；是妇女寻觅伊们自己的时代，亦是男子发现妇女底意义的时代。

凡在“力的法则”支配之下的，都是被压迫的阶级；凡对此“力的法则”的反抗运动，都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运动。妇女屈服于男子“力的法则”之下，历时已经很久，故凡妇女对于男子的“力的法则”的反抗，都为女权运动。这种运动，历史中包含甚多，名之曰“革命”并不过分。

妇女要想达到伊们完全解放的目的，非组织一个世界的大联合不可。这个指导的责任落在高嘉仙族(Caucasian Race)妇女底肩上，尤以北美合众国的妇女为先驱。在伊们运动之下，“世界基督教禁酒联合会”、“妇女国际会议”、“国际妇女参政联合会”这些团体相继成立。

就在白人所居的乡土，亦有多处女权运动才见萌芽。在东亚，在非洲，妇女底羁绊依然未全打破。但在此等地方，妇女的时代亦渐发见曙光了。

女权运动底国际的组织如下：妇女国际会议以各“妇女国民会议”底主席职员组成。一国底妇女俱乐部，为施行一定的普通政纲都可以加入一个国民会议。第一个国民会议，一八八八年

成立于北美合众国。随后在坎拿大、法国、瑞典、英伦、丹麦、荷兰、澳洲、瑞士、义大利、奥国、挪威、匈牙利等国，均有了这类的组织。

这妇女国际会议所代表的妇女数目，尚无统计。彼底会员大约将近千万人。国民会议只许以团体加入，不许以个人加入。构成妇女国际会议的各国民会议底会长，专以伊们的主席职员资格列席。

妇女国际会议是一个促进有组织的国际的女权运动的永久机关。这是一八八八年在华盛顿成立的。

妇女参政运动是女权运动的另一形态，亦同样地依国际的形式组织起来。但对于女权运动是完全独立的，妇女参政是为有组织的妇女所提出的最急进的要求，后来在各国为急进的女权论者所拥护。伊们认妇女参政是女权运动底入门，由此可以达于更远大的目的。所以国民会议会员底大部分，不能在一切情形之下都把妇女参政加入伊们的政纲。然至一九〇四年六月九日，国际会议在柏林关于此点已有可决了。

国际妇女参政联合会在华盛顿成立后，不久在柏林亦有一个代表八国的妇女参政同盟发生。这个同盟所代表的八国，是北美合众国、威多利亚、英伦、日尔曼、瑞典、挪威、丹麦与荷兰。这个同盟与联合会联络起来，从此以后妇女参政运动便成了女权运动中最昌盛的部分。这曾声言过要在五年终再召集第二次会议的“国际妇女参政联合会”，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九年间已经开了三次会议（一九〇六年在 Copenhagen，一九〇八年在 Amsterdam，一九〇九年在伦敦），会员扩张到二十一国（北美合众国、澳洲、南非洲、坎拿大、大不列颠、日尔曼、瑞典、挪威、丹

麦、荷兰、芬兰、俄罗斯、匈牙利、奥地利、比利时、义大利、瑞士、法国、勃加利亚、塞尔维亚、冰岛)。第一次的会长是加特夫人 (Mrs. Carrie Chapman Catt)。

女权运动底主要的要求在各国都是相同。此等要求可大别为四：

一、属于教育者：享受与男子同等的教育的机会；

二、属于劳工者：任何职业选择的自由，与同类工作的同等报酬；

三、属于法律者：民法上，妻在法律前应与以法律的人格之完全地位并民法上的完全权能。刑法上，所有歧视妇女的一切条规完全废止。公法上，妇女参政权；

四、属于社会的生活者：须承认妇女之家庭的、社会的工作的高尚价值与把妇女排出于各种男子活动的范围以外生活的缺陷、粗糲、偏颇与单调。

各国底女权运动，都是发源于中流阶级，劳动妇女底运动比较的后起。但女权运动与劳动妇女底运动，并不含有敌对的意味，而且有互相辅助的必要。在澳洲、在英伦、在北美合众国，这两种运动全无敌对的形迹。但在阶级争斗剧烈的国家，中流阶级的妇女运动与劳动阶级的妇女运动决然分离。这是因为中流阶级的妇女没有彻底的觉悟的原故。中流阶级底妇女应该辅助劳工妇女底运动。这个道理，与美国劳工团体宣言赞助妇女参政运动的道理全是一样。因为多数劳工妇女在资本阶级压制之下，少数中流阶级的妇女断不能圆满达到女权运动的目的。反之，劳工妇女运动若能成功，全妇女界的地位都可以提高。此外，劳工妇女的运动亦不该与劳工男子的运动互相敌对，应该有一

种阶级的自觉，与男子劳工团体打成一气，取一致的行动。

苏俄劳农政治下妇女享有自由独立的量，比世界各国的妇女都多，就是一个显例。第三国际的执行委员会，于一九二〇年指定 Clara Zetkin 为妇女共产党的国际的书记，计画着开一国际共产党劳工妇女会，示全世界劳工阶级妇女以正当的道路，以矫正大战开始后一九一五年在 Berne 开的第一次国际妇女大会的错误。这又为女权运动开一新纪元。

一个公正的愉快的两性的关系，全靠男女间的相依、平等与互相补助的关系，不靠妇女的附属与男子的优越。男女各有各的特性，全为对等的关系，全有相与补足的地方。国际的女权运动和国际的劳工妇女运动的起源就在全世界对于此等原理的漠视。

生活上职业的要求，使妇女有教育的修养的必要。女子教育机会的扩张似乎比承认参政权还要紧。Canon Gare 劝告英国工人道：

“除非你得了知识，一切为正义公道的热情都归乌有。你可以成为强有力与骚乱，你可以获得一时的胜利，你可以实行革命，但若把知识仍遗留于特权阶级的手中，你将仍旧被践踏于知识的脚下，因为知识永远战胜愚昧。”

这几句痛言我借以奉告世界上未曾解放而方将努力作解放运动的妇女，特别是中国今日的妇女。

1922年1月18日
《民国日报》副刊
《妇女评论》第25期
署名：守常

论 自 杀

(一九二二年一月三十日)

一、引 论

自杀是一种社会现象，与聋、盲、白痴、癲狂、贫困、疾废、衰老、失业或意外的变死，稍有不同。因为前者未尝不可避免，而后者则多为不能免的不幸。但自杀与恶习及犯罪却有相类的地方；因为这种行为，不但加苦痛于他们自己，有时且可以加苦痛于他人。但如加以自制，此等苦痛，可以避免。

自杀是任意的死，不是由于意外变故或疾病的死，同时又不是自然的行为，必有有力的原因，驱他为此。这个原因愈是有力，则自杀愈不是出于自杀者的本心，愈失了他的任意的性质。假若黄河的铁桥断了，或是长江的堤决了，有些人因之遭害，我们称这种死亡为意外的。但是一个男或女为不幸或失望所迫，以至于自杀，果然和桥断堤决是一样的不可抗么？果然是不可以人力抵抗的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以为自杀是一个社会的事实，是一种必须以他种现象解释的现象。如环绕这自杀者的物理的、人种的、社会的、心理的种种影响，都是必须就这些影响加以考察，才可以研究自杀是任意的，或非任意的行为。

自杀既与环境的影响，有这样大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知道自杀决不是完全出于任意的行为。但我们亦须承认自杀多少有几分是任意的行为，不能说他是单纯的环境的结果，不能说他是全由于外界的压迫。自杀常是受一时的冲动，当时设若稍稍有自为反省再思的余地，当不为此。我们可以承认环境常易使人以自杀为是，而不能承认自杀是不能避免的事实。无论由社会的方面改造环境，或由个人的方面抑制冲动，都可以使自杀的热狂，归于沈静，趋于减少。

自杀是智慧的结果，故独行于人类社会，其他动物社会则少有此。即在人类社会的野蛮人，犹不了解自杀这一种神秘的行为。雅岗人及昂德曼岛土人，无论如何总不了解自杀是怎么一回事。在他们的部落中，白人偶有自杀的，他们总是以为被他人杀害的，而大索其凶手。中部澳洲的土人，听着自杀的话，他一定说“这是说笑话吧”，而决不相信。但蛮人社会中亦有二三例外，那就是受人种的或宗教的影响了。

二、自杀时代

自杀激增，是世界各国普遍的现象。除挪威入本世纪以来，反见减少外，余若英、法、德诸国，均有年益增加的倾向。东方若日本，其增加尤为显然。据该国警视厅的调查统计，明治四十三年一一一二人，四十四年一一五七人，大正元年一二六八人，二年一三一二人，三年一三八九人，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警视厅所管辖的区域，只为东京市十五区和六郡八岛，一年间的自杀竟有一千三百之多，如果合各府县的自杀者算计起来，日本全国当

在一万人以上。查统计表之所示，明治四十四年日本全国自杀者为一万七百五十三人，大正元年为一万一千一百三十八人，其中男六九一五，女四二二三。这样看来日本全国，亦有增加的趋势。

著《自杀论》的名家莫西里 (Morselli) 详细的考察了些统计表以后，在他的名著《自杀论》里下了一个结论说：“自杀的频繁，表示一个发长的和均一的增加。总而言之，任意的死亡，自本世纪初叶以来，便已增加，并且还在增加不已。其度比人口或死亡总数，更速且猛。”其言可信，故有人称现代为“自杀时代”。

自杀的增加，随着文明进步而与之成正比例。因为愈是文明进步的人，欲望愈大；欲望若不得达，则与其苟生毋宁死。野蛮人惟在极端的饥饿或生理上的灾难重压之下，才诉之自杀。文明人则由羞愧、不名誉、悔恨不能达的奢愿等等感情而自杀。这些感情，都只存在于文化状态中，而非野蛮人所能想见者。

随着文明的进步，增加了许多知的进步，使人的神经系愈益精致而脆弱，愈益露出精神的失常，这或者是我们应该还给我们的文明一部分的代价。

文明社会征服自然的势力，远在野蛮社会以上。故在文明社会，为全社会的生存竞争并不剧烈。但在个人间的生存竞争，或者愈演愈烈。结果是多数为生存竞争所驱，以致失望的人，竟至蹈于自杀。

文明进步的结果，发生了人口集中的都市生活。都市生活与人以刺激与烦忧，并为移殖罪恶及荒淫的渊藪；所以更使自杀增多。

文明愈进而自杀愈增的文明，必有缺陷的地方。

三、自然及于自杀的影响

A、风土与景色

莫西里曾努力寻求过宇宙自然的势力及于自杀的影响。关于风土和地理的位置，没有最明确的法则，可以看出来的，只有两个著名的中心点，在那里的自杀率恒高，即是巴黎和撒克逊尼王国。在此中心点渐远，自杀率亦从而渐低。所以法国南部的自杀，比北部的少。撒克逊尼的普鲁士州的自杀率最大，而莱因州最低。在英伦的东南部最高，而在北部英伦和威尔士最低。以中央欧洲自杀率最高的地域为中心点，划一圆周，沿着这圆周的周围诸国，如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爱尔兰、苏格兰、芬兰及俄罗斯等国的自杀率都较低（此是从前的比较统计，欧战以来，俄罗斯的自杀率或有增加，但亦无详确的统计报告，可以稽考）。这种分配虽不是在各方面全然确切，但总算是很显然了。

日本的日光山中有一个著名的自杀场所，就是那华岩泷。自从一位叫藤村操的青年，因为对人生起了怀疑，遂在泷畔的树上题了“岩头之感”四个字，便投入这瀑布的怀中。以后每岁投入其中以自殒其生者，肩摩踵接。后来在此设了守望，围了铁栏，仍然没有效果。这固然由于模仿的心理的原因，有几分在里头，但据亲往该调查自杀者较多的原因者说：华岩泷表现一种大自然的姿态，足以使人发生一种心理，情愿投入此大自然的不息的流。人在此处倘若抱有人生问题的怀疑，或因他种关系怀有隐痛，不用说是很易受此大自然的姿态的诱惑。就是那来到这

里以前，丝毫亦未有自杀的念头，而突然投入的，亦常有之。这是自然的示唆力。故自然有时可以发生及于自杀的影响。

B、气候与季节

温度的变动，亦常影响于自杀。把每月的平均自杀数比较一看，便可以看出自杀的增加是很整齐的。由岁首起渐次至六月，达最高度。此后即渐减，至十二月达最低度。普通各国均有这个倾向。在德国我们可以取普鲁士、撒克逊尼、瓦田堡、巴顿、汉堡，从一八七二至一八八五年十四年间，含有八七四三九自杀的统计作证据，以每年一二〇〇即每月一〇〇为基础，按月分配之如下：

正月……七八	五月……一二二	九月……九九
二月……八五	六月……一二六	十月……九二
三月……九〇	七月……一二一	十一月……八〇
四月……一九	八月……一〇八	十二月……七〇

又据日本警视厅的调查：

大正三年	大正四年
五月……八〇	五月……一二一
六月……八八	六月……一一一
七月……九八	七月……一〇三

这样看来，自杀的倾向在盛夏的时候为最甚。这是因为温度的变动，影响于人的精神上挑拨他的感情，扰乱他的心的定静，使他对于生活易失希望，易生怀疑，容易驱他到死路上去，这亦是自然的诱惑。我们可以称由初春至盛夏间，这几个月为“自杀季节”。

随着生活难的压迫，年关亦成了生死关头。故十二月的自杀数，近来颇有增高的倾向，但此究赶不上“自杀季节”，而且是人事的关系，与气候无关。

欧洲男子的自杀，夏冬两季并没什么差别。至于女子，则夏季自杀者，多以入水为主。到了严寒的冬季，女子自杀者，极其稀少。

出国的军人，在炎热的地方的，比在寒冷地方的，自杀的更多。

自杀在每星期内何日较多，何日较少，亦可为统计的研究。在欧美普通以星期六为最少，因为这一天是支给工银的日子。次少者为星期日，因为这一天是安息与回复的日子。反之星期一和星期二则自杀的数较多，因为荒亡之乐已终，金钱之挥霍已尽，又感生活难的压迫了。这亦与年关自杀增加的趋势一样，是人事的关系，与自然无关。

四、人种及于自杀的影响

人种的气质不同，而自杀狂亦因之不同，这种倾向很大。条顿民族的血统，多含悲愁的气质，同时亦有理想的气质。所以易起感慨，而以自戕其生。那罗马语系的民族，心地却很开展，对于他的生活不易起厌弃的思想。征之自杀率，在中央日尔曼达于最高点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个倾向。那些纯粹日尔曼血统的普鲁士各部，显出最高率。而东部因为杂有斯拉夫血统的原故，其自杀率乃为最低。在瑞士日尔曼“康同”(Cantons)的自杀率，比法兰西“康同”、义大利“康同”的自杀率都高。在奥国日尔曼、

意大利的自杀率，比匈牙利的高。在意大利北部的自杀率较高，疑为那里日尔曼血统较多的关系。爱尔兰、西班牙、南部意大利、罗马尼亚、俄罗斯、芬兰诸国自杀率很低，因为受了Celtic、拉丁、斯拉夫血统的影响。但有一事是这种解释的难关，就是盎格鲁撒逊的英伦自杀率较低的事实。莫西里氏归于Celtic血统的交混，但梅约—斯密史(Mayo-Smith)则谓莫说适与历史学者的话相背。梅氏以为日尔曼血统的民族，有较大的自杀的倾向，是不可争的事实。但别的原因如经济的或政治的等，亦常能限制或变更这个倾向。像盎格鲁撒逊的英伦的自杀率较低，就是一例。

加母恰加人有胡乱自杀的倾向。妇因姑不吃伊作的饭亦自杀；老年人因为身体疲懒没有法子亦自杀；小女孩子一感着羞耻，脸上一发红，便须严加监视到伊全忘了这个羞耻的印象为止。加冷人晚间饮酒的时候，夫妇之间如有三言两语的不合，次晨夫妇二人中必有一人缢死。在那个地方，“吊死”的话很流行。日本人为全名节而剖腹的、情死的、因生活难而自杀的，层见迭出，这都有些是人种的影响。

五、生理与年龄及于自杀的影响

自杀在欧美都是男多于女，普通是三或四对一的比例。一八九一年在英伦自杀的男子一八六三，女子六二〇，这是三对一的比例。在普鲁士是三·七对一的比例。在意大利是四对一的比例。在法兰西是三·七对一的比例。男对女的比例，在英伦恒低，显出英伦女子比他国女子易犯自杀。日本亦是男多于女，

大正元年日本全国自杀者一万一千一百二十八人，其中男六九一五人，女四二一三人。男比女易犯自杀的原因，极其明显。就是因为男比女有较重的责任，较多的忧虑，并且有较大的野心，不肯甘于失败，而易沈溺于荒亡怠惰的行为，生理上更有较多的勇敢。

莫西里氏说脑筋组织的构造，使女子感觉气压的变动较速，所以春天的自杀增加，在女子中比在男子中多。他又说：都市中的自杀增加，在男子中比在女子中多。

自杀的数与年龄以俱增。儿童中的自杀很少，然有时亦有。在普鲁士从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八年学校儿童犯自杀的不下二八九，在大都市中常有此类的事。

法国纪录中的旧表，从一八三五年至一八四四年二五七六〇自杀总额中，有一个五岁小孩，两个九岁的，两个十岁的，六个十二岁的，七个十三岁的，两个十四岁的。

自杀的动机，就在成年的人亦不易确定；在小孩更难。在普鲁士学生中流行的动机，在高等学堂里，是考试与升级的失败。在低级学校里，是恐怕惩罚和精神的发狂。

测度自杀狂的确实方法，在将每一性与年龄时期的自杀数目，与那些在那个年龄生存的那一性的全人数相较。下列的表，给我们一个分配的例证。这个表指明普鲁士的每个年龄与性的，每一百万人中的自杀（一八七七）。

年 龄	男	女
十五岁以下	七	三
十五至二十	一五〇	七〇
二十至二十五	三二〇	八〇
二十五至三十	二八〇	六〇
三十至四十	三二〇	七〇
四十至五十	五〇〇	一〇〇
五十至六十	七五〇	九〇
六十至七十	七五〇	一四〇
七十至八十	六七〇	三〇
八十以上	四六〇	一二〇

从此表可以看出男子自杀狂的增加，在二十岁至二十五岁的时期为最显著。这是一个少年情欲发动而易堕落的时期。但直到五十岁至六十岁的时期，始达于最高数。女子的自杀最高数，比男子迟达十年。但亦有一个女子青年期自杀的比例比男子较大的例，就是英伦。英伦十五岁至二十岁期间的女子，因羞耻而自杀的倾向很大，其数实超过英伦十五岁至二十岁期间的男子的自杀。这种倾向由下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个表就指明一八六一至一八七〇年间英伦及威尔士对于一百个女性自杀的男性自杀数。

年 龄	0-15	15-20	20-35	35-45	45-55	55-65	65-75	75-85	85-全年龄
比 例	129	89	182	288	296	400	372	281	254 278

由此可以看出通例。对于每百个女性的自杀，男性自杀数为二百七十八。直到三十岁多比这个比例少。而当十五岁至二十岁间，对于女性的自杀的，男性的自杀数，只为八十九。

六、婚姻及于自杀的影响

独身者的自杀比例数，比结婚者的大。尤其是失偶者和离婚者自杀的比例数更大。例如意大利结婚者的自杀率为五六·四(十五岁及其以上)，失偶者为七二·八。

结婚的好影响，在女性中比在男性中少。有时已婚女子的自杀比例数，比独身者更大。在意大利若以一百表明男女中任何一性已结婚的自杀数，则独身男子的自杀数为一五三，独身女子为一一八，鳏夫为二七五，寡妇为一五七。这些比例，历年有加强的倾向。这可以表示出两种影响来：(一)本有自杀狂的人们，因为他们表现出来的精神失序，或狂暴癖性的征候，依自然淘汰的力量排出于婚姻之外。(二)结婚生活，辅助秩序与节制的好影响。有这二种原因交凑而成独身者自杀增加的倾向。寡居的妇人中自杀数较高的原故，是因为随着孀居发生的悲愁，经济的困难和忧虑。在妇女中结婚固然亦可于抑止自杀有点好影响，但远逊于男子。离婚者中的自杀率常是最高。但癖性的狂暴可以使之离婚者，往往亦可以使之自杀。有小孩的人于抑止自杀有些好影响。结婚的男子有小孩的比无小孩的其率低。在妇女中母爱的影响那样的深，故可以制胜孀居的反对影响。所以有小孩的寡妇，比结婚而无小孩的妇人其率低。

七、自杀之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影响

自杀亦与出生、死亡、结婚等，一样受经济情形的影响。经济

界萧条的时候，战争和商业的危机，可以增加自杀的数目。一八四六至一八四七年间，欧洲各国，除瑞士和巴瓦利亚外，都显出自杀的增加。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四年，普、奥、义的自杀均增加。英伦自杀的数目，因输出入的多寡而生变化。

自杀在都市中，比在乡村中流行。在普鲁士一八八八年，全州的自杀率为一九八，而柏林的自杀率，则为二八八。在一五〇〇〇有奇的居民的德国都市，从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一年的自杀数，每百万人中为二四六。欧洲大都会如柏林、考盆海金(Copenhagen)、士陶克浩冷(Stockholm)、费拉的儿费亚、纽约、格拉斯歌、维也纳、利物浦自杀的数都很多。都市中自杀增多的原因，是在罪恶及荒淫的移殖，和都市生活较大的刺激与烦忧。

习惯和生活状态，很与奖励或抑止自杀倾向以绝大的影响。宗教的信仰不同，而自杀的多寡亦异。欧洲自杀在新教(Protestantism)中，比旧教(Catholicism)中流行。那纯粹的旧教国，如义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自杀的数最少。而那差不多纯粹的新教国，如撒克逊尼、丹麦及普鲁士各处自杀的数最大。但此究竟是依于人种的不同，还是依于宗教的不同，尚是一个疑问。因为第一类是开尔特族与拉丁族；第二类则全系日尔曼族。最好的证据，当在人口半为旧教半为新教的国中去寻，莫西里氏曾为三十七个此类的比较，其中只有四个在旧教中的自杀率比在新教中的高，在巴瓦利亚与普鲁士在新教中的自杀率，两倍半于在旧教中的，这可以判明宗教的不同，亦与自杀以影响了。

自杀在囚犯中比在常人间流行，这个原因很明显。但是容许自杀的机会很少，所以实在的数表，大不足以为训。

职业及于自杀的影响亦很大。我们可以按著职业或社会的

地位，为自杀分十四类。但如不和每一种职业的全人数相比较，这种分类毫无价值。在义大利曾作过这一番功夫。此表虽不能说是十分确实，但亦指出所列职业的一般次第。这是一八八九年的数目，是依一八八一年调查的，每种职业内十五岁以上的一〇〇〇〇的男子作基础的。

警察、关税吏等……	八·〇
车夫或马车夫等……	二·九
军界……	六·二
面包工人……	二·四
书记和司账人……	四·五
铁工人……	二·二
商人……	三·七
担夫……	一·六
家内仆役……	一·二

此表不很可靠，因为职业的分类的不确定。自杀在军队间，比在平民间流行。在奥其率每百万中为一二二〇，在德为六七〇，在义为四〇〇，在法为二九〇，在比为二四〇，在英为二三〇，在俄为二〇〇。这个比例，比在总人口中同年龄的男人的比例高的多。自杀在下级军官中最流行，大约三四倍于平民，大概是因为职务太单调的原故。

教育与文化亦与自杀以影响。在文化较高教育较普的国，自杀率亦较高。欧洲如普鲁士与撒克逊尼，亚洲如日本，即是此例。他们的强迫教育，使自杀率达于最高。而在别一方面，西班牙与义大利不识字的人太多，故其自杀率最低。其故盖在随着精神的发展，增加神经失常的危险，对于精神的物质的苦痛感觉

他的书里，曾列过一个表，很有研究的价值。

由一千个自杀中表示的动机

	普(1873—1875)		法(1866—1875)		义(1872—1877)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精神失常	二二九	四四一	二五二	四一五	二八〇	四一七
生理上的疾病	六一	六四	一二七	一一八	八二	七三
生活疲倦	一二七	九七	四五	二九	四三	七
情欲	二七	六三	一七	四五	四九	七五
恶习	一二九	二一	一四九	五六	一二	一
家庭苦恼	四八	五一	一三八	一六四	九六	九〇
经济困累	四一	一二	六五	一八	一七〇	二七
不幸	三五	一八	四八	三六	一〇一	五二
羞悔及其他	一〇三	一〇八	六四	五二	四二	二七
失望及原因不明者	一九九	一二五	九五	六七	一二五	二三一

由此可以看出，精神失常是自杀的原因的其势甚普，他永不在全数的四分之一以下，而且常是全数的三分之一。同时主张发狂是自杀的原因的倾向，亦益加强。与精神失常有密切关系的，是由于意向的原因的自杀，如羞悔、失望、家庭苦恼等。比较不重要的是情欲、恶习和生活疲倦的原因。而生理的苦痛，如疾病不幸等，亦占相当的部分。各国间亦有特别不同之处，不幸之于义大利，精神失常之于日尔曼诸邦，都是特别有力的原因。男女间亦有特别的不同，精神失常之于妇女，生活疲倦、恶习及经济困累等之于男子，都是较为有力的原因。年龄间亦有特别的不同，情欲、羞悔，在少年时达于最高度。而精神的不快，恶习及经济困累等，则在壮年或衰老的初期较多。在妇女中羞愧被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特别在二十岁以下，而恶习与荒淫的原因，则在四十与六十岁间为最强。

自杀的方法，在各国久已有确定的趋势。除义大利外，自缢

似是最爱用的方法。次于自缢，便是投水。次于投水，便是用枪自击。妇女选择不甚暴烈的方法，所以投水的自杀，多行于妇女。而用枪自击，则多行于男子。就是择用相同的毒药，亦一年比一年有定规的趋势。在大都市里，用枪自击的，比乡村多。自缢的，则在乡村比城市多。实业的进步，引出自杀的新方法，例如火车轧死，吞食自来火，触电等等。木炭熏死的方法，起原于巴黎，很快的传播及于乡间。日本多火山，所以在那里跳入火山，亦是一个自杀的方法。中国多吸食鸦片者，所以在中国吞食鸦片，亦是一个自杀的方法。自杀的方法与场所，亦常受示唆与模仿的影响。

九、自杀的是非观

自杀在社会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所以从来各门宗教，各派哲学家，对之都要表示一个是或非的态度。近年来中国论坛，对此亦稍有论列。现在把他们的自杀是非观，约举于下：

(甲) 各门宗教及宗教家的自杀观

1. 耶教摩西十诫中有诫杀一条。不但诫杀人并且诫自杀。犯自杀罪者，不能到天堂。(非)
2. 回教以自杀为逆神的命令，比杀人的罪更重。故教中对于自杀，悬为厉禁。(非)
3. 佛教佛家虽要求断灭，但以为自杀不但不能断灭，而且意欲加强。故说自杀者死后当受惨苦。是生前的罪孽，死后还是不能解脱。(非)
4. 儒教以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而以“自经沟

渎”的事为“匹夫匹妇”的行为。(非)

5. 波罗门教因有死后而以崇敌的信仰，故认为复仇而自杀为勇。(有条件的是)

6. 奥格士提纽士(St. Augustinus)主张就是受污的女子亦不该自杀。(非)

7. 阿魁拿士(Thomas Aquinas)主张“自杀犯了三样罪，(一)违背好生恶死的自然性。(二)减损社会的分子。(三)侵犯上帝的生杀权”。(非)

(乙)各派哲家的自杀观

1. 柏拉图说：“不可责备困苦命运或难堪的耻辱而自杀的人”。(有条件的是)

2. 耶比库罗士说：“待死与自杀孰宜，不可不加以考虑。”(含有一部“是”的意味)

3. 康德以自杀为轻蔑存于人性的人道。(非)

4. 希腊禁欲派(The Stoice)说：“自杀可以解脱一切痛苦。”(是)

5. 菲西的以为欲保生命欲生，是吾人的义务。(非)

6. 海格尔以为人有左右自己生命的权利，是绝大的矛盾。故认自杀是一种罪恶。(非)

7. 休姆说：“人类处置自己的生命，若算是侵犯上帝的权利，那么人要延长上帝用自然法限定的生命，岂非亦不应该么？”又说：“我若是没有力量为社会造福，或是只为社会的累赘，或是因为我的生存妨害别人为社会尽力，那么我若自杀，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是)

8. 孟德斯鸠反对国家制定没收自杀者的财产和处罚自杀未

遂者的法律。(不认自杀是法律上的犯罪)

9. 福录特尔说：“若谓自杀有害于社会，那么屠杀生命的战争，何以各国的法律都认可？”(不认自杀是对于社会的犯罪)

10. 陶马士·穆阿(Thomas More)在他著的《乌托邦》里，主张人若罹不治的疾病，很以为苦的，得牧师或长官的同意，可以自杀。但牧师或长官须照自杀志愿者的志愿与疾病状，务求合于他的希望。(有条件的许可)

11. 叔本华以为自杀不是应该非难的行为，但是糊涂的行为。因为自杀只能灭绝肉体，不能灭绝本体(意志)。自杀的真正目的，在求得精神的平安，否定意志，是达此目的的唯一方法。否定意志，就是无我主义。其说与佛教的自杀观大致相同。(目的是而方法的非)

(丙)近年来发表于中国言论界的自杀观

1. 章秋桐先生主张以自杀之风，矫起社会颓废之气。说：“吾国之所大患，亦偷生苟容之习而已。自杀之风果昌，尚能矫起一二”。“匹夫沟渎之言，乃先民半面的教训，古今几多冯道、吴广^①之辈，依此以藏其身”。“今吾国之所患，不在厌世，而在不厌世。有真厌世者，一方由极而反，可以入世收舍己救人之功，一方还其故我，与浊世生死辞，极廉顽立儒之致”。(是)

2. 陈独秀先生认自杀是由于厌世的人生观的错误。(非)

3. 蒋梦麟先生说：“自杀是自示其弱”，“自杀是一个大罪恶”，“自杀算是杀了社会上一个好人，杀了社会上一个有用的人”。(非)

^① 吴广，疑为东汉时的“胡广”之误。——编者

4. 杜威夫人说：“我不自杀。我若自杀，必须先用手枪打死两个该死的人。”（非）

十、结 论

由以上研究的结果，我们可以断定自杀实受自然的社会的种种影响，而不是全然任意的行为。那么，我们若想课自杀者以社会伦理的责任，亦只能就这几分个人的自由意思加以判定。但自杀者所处的境遇，所具的精神状态，各不相同，故不能普通的说一切自杀是是或非。倘使自杀者因他的自杀与人以烦累，而其自杀又有几分属于自由意思的选择，那就对于社会，不能不负几分伦理的责任。然自杀者在伦理上虽应负有相当之责任，而在法律上终不能说他是犯罪。因为据统计上的考察，自杀与犯罪全没有关系。例如在义大利与西班牙有高率的犯罪者，而自杀并不流行。在犯罪最少的国，若丹麦与英伦，一则自杀率较高，一则自杀率较低。而且人在不与他人以迷惑与烦累的范围內，应该有他处分自己生命的自由。以国家的法律去禁止他、惩罚他、许可他、奖励他，都是不对的。

由自杀者的个人方面看，他们是生活上的弱者、失败者、落伍者，是看见生存竞争的潮流过烈，而无路可寻的人。他们劣败的原因，虽有时由于个人的。这里亦有由于遗传的缺点的，——而大部分则由社会的缺陷。我们对于他们的境遇，不能不与以同情。

日人茅原华山氏分自杀为二种：情死失恋哲学的烦闷，这一类的自杀，是诗的自杀，韵文的自杀。象那生活难一类的自杀，

是俗的自杀，散文的自杀。社会上若多韵文的自杀，固然亦可以反映出社会背景的缺陷。——如婚姻制度，教育制度之不良等。而在另一方面则可以表示自杀者对于人生的真挚。社会亦或由此而发生些感愤兴起的气分。若象北京报纸常常登载的某家某家因为生活难全家投河自尽的自杀，不断的表现于社会，那个社会真是大煞风景了。

由社会方面看，自杀是社会的不幸。因为一个人自杀，便是减损了社会的一分子。自杀在经济上，亦是一大损失。因为丧失了自杀者将来的生产力，并且丧失了扶养他成人所用的经济上的价值。但此殊不易计，因此全靠牺牲者生活的本质如何。

我们对于自杀者的个人，不忍加以苛责，说他们不道德。并且对于他们的境遇，要与以满腔的同情。我们对于自杀增加的社会，应细心考察自杀的社会的原因，而寻求那个社会背景的缺陷，以谋改造的方法，而为对于自杀的救济。在多因失恋情死的自杀的社会，须熟察那个社会婚姻制度的缺陷，而加以改革。在多因生活困难而自杀的社会，须熟察那个社会经济组织的缺陷，而加以改革。在多因恶习堕落而自杀的社会，须熟察那个社会风俗的缺陷，而加以改革。在学生多因考试不及第而自杀的社会，须熟察那个社会教育制度的缺陷，而谋所以改革之。自杀流行的社会，生活上必多缺陷。

这样讲来，自杀实有救济的必要。这个社会的灾患的救济，只在寻出那些原因，而去其可以去者，并使个人的品性加强。我的朋友陈独秀先生说：“救济厌世的人生观，是救济一切自杀的根本方法。对于人生根本的疑怀，有了解答，才可以和他说改良生活，反抗社会。”罗家伦先生的三个救济方法里，亦有“新的人

生观”一条，都是透宗之语。不过要想他抛弃了“厌世的人生观”，建立一个“新人生观”，非先使他个人品性的力量健强不可。作《自杀论》的莫西里氏有几句结束他的著作的话：“发展人所具有的秩序，整然的情操和理想的威权，依此以达一定生活的目的，简明的说就是给强力与势能于道德的品性。”我今借此以终本文，作为救济自杀的第一步。然后仗着这一班由极而反的人，与那些能够发展他所具有的个性的强健的权威的人，大家一同来改造这个缺陷的社会。

1922年1月30日

《学艺》第3卷第8号

署名：李守常

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 成立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

我今对于我们北大同学，发起这个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以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刚才胡先生说新闻事业，是要研究“活的问题”、“真的问题”，不希望诸位替人家做那“充篇幅”的事情。我现在更希望诸位对于新闻事业，是社会的事业，这一点也特别注意。因为社会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关系，要想把这不断的、发生的、多方面的社会现象描写出来，而加了批评或指导，非有相当的学问和知识不可。以前新闻界，所以有很多缺点，就是因为从事新闻业者的，眼光不能映注到全社会的生活上的缘故。现在我们北大同学从事新闻事业的，如此之多，将来必能“改造”、“提高”新闻界。因为大学是一个最高的学府，所研究的学问，是多方面的，故由大学出身的人，必有比较的多方面的知识，或有与多方面的知识界接近的机会，希望诸位同学出其所学，把新闻界在社会上的地位提高，给新闻界开一个新纪元。

新闻记者的责任，于纪述事实以外，还应该利用活的问题，输入些知识。胡先生说，新闻宜注意活的问题，不应单讲克鲁泡特金、马克思等等死的学说。这话诚然不错，但是材料虽是死

的，若是用当也未尝不可把他变成活的。譬如平日登些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人便全不注意，若当接到克鲁泡特金逝世的消息，那一天，把他的历史，他的学说，写出来贡献在社会上，便可以引起社会一般人的注意了。又如但丁的历史和他的文学，在平日登出来，充充篇幅，实在于一般看报的人，没有多大的意味，若在去年，有为他作六百年纪念的事实那一天登出，便可以引起社会一般人的兴味来。又如今天高师为达尔文一百十三周年诞生纪念，开博物展览会，并讲演会，北京的报馆，若有在今日把达尔文的历史、肖像和他的学说的概要登出来的，岂不是格外有趣吗？又如一八七一年三月的巴黎自治团，在平时写出来，人并不十分注意，若在去年三月十八、九日恰恰是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把这一段历史纪载出来，登在报上，岂不是绝好的材料吗？可见死的材料，若是随着活的事实表现出来，便是活的、有趣味的材料。最好的材料，若作平日充满篇幅之用，因为他与现实的生活不相关联，于阅者亦丝毫不发生兴趣。照这样子做去，一切的科学知识，都可以觅得机会，利用一种活的事实，输入给大家。例如新疆、甘肃发生地震，我们便去访问地质学家。太阳忽然现出红光，我们便去访问天文学家。某种政治问题发生，我们便去访问政治学家。请他就此事实为学理上的说明。此外如有各国学者来华，亦当随时访问，叩其意见，以转为介绍于社会。这是新闻界对社会灌输知识的职分与方法，这点诸位要注意的。

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历史是过去，旧的，社会状况的写真。现在的新闻纸，就是将来的历史。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记一方面的事情，应当是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但是现在新闻界，遇

着“督军的举动”，或“阔人的一言一行”，都是用大字，排在前几版，那穷人因穷自尽，或其他种种因为受环境压迫发生不幸的结果，乃社会上很大的变故，反用小字，排在报的末几版不注意的地方。这是旧习惯未退尽的一个最大的表现，也就是新闻界的一个大缺点。这一点也希望诸位同学注意。

我们北大同学，在新闻界的人，发生这样一个团体，是一件很有关系的事。胡先生说，不希望主张必定一致，希望人人能发挥个性固然不错。但是有了这个团体，总可以借此情谊，立在同一的、知识的水平线上，常有机会来交换各人不同的意见。遇有国民的运动发生时，我们总可以定一大目标，共同进行，以尽指导群众，而为国民的宣传的责任。

敬祝北大新闻同志会的进展无涯！

1922年2月14日

《晨报》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

今天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一次公开讲演。兄弟得乘这个机会来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大概讲讲,实在非常荣幸。

马克思的学说很深奥,我固然不能说了解他,我并且不敢说对于他有什么研究,不过乘这机会,同各位谈谈。

大家现在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都很想研究,但是真正能够研究他的很少。不但真正能够研究他的很少,甚至于关于他的著述,仅仅只看过一遍的,这样的人也不能找出。现在已经有个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了这会,想必可以引起大家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兴味。倘若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产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深奥。根据我所知的,提出他学说中的两大原理:

第一,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之下,资本家把劳动的结果怎么劫去;

第二,现代经济组织之趋势。

* 此文是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讲演记录稿。

在这资本家靠着资本主义的组织情形之下，劳动者仅仅得着一部分，而资本家则劫去剩余价值，这层已经说过。现在且讲剩余价值之来源。

马克思把资本分成两种：可变资本，不变资本。不变资本，只能保存其原价，可变资本，除此之外，还可另生价值。Adam Smith 称不变资本为固定资本，可变资本为流动资本。马克思同 Adam Smith 的分类差不多完全相同。其不同者，马克思所说的不变，不是资本的形状不变，乃是他的价值不变，Adam Smith 所说的不变，乃是形状不变，如机器。至其所谓流动资本者，包含着两部分。他把他包含进去的这一部分，就是形体虽变，而仅能保持其原有价值者。马克思把这部分归并在不变资本内，此为马克思与 Adam Smith 分类不同之点。据马克思的意见，这不变资本，在生产程序中，或者不如可变资本之重要。可变资本，除维持劳力外，更能发生新的价值。新的价值之发生，完全靠着可变资本。拿什么去维持劳力？资本家这样：从劳动分量内拿出一部分给工人，去维持他们的劳力。于是劳动的结果，全被资本家劫夺。资本家又利用这生产须靠资本的理论，可变不变的混状，拿他们的障眼法，暗中把劳动所得的结果完全掠夺。我们知道，资本家总是说，生产须靠他们的资本。但是资本又是什么？资本，他是劳动的结果！因为社会上有了私产制度，于是他们也拥有资本。他们有了资本，于是也有机会去劫夺劳动的结果。资本这个东西，在马克思看来，并不如何重要，最可靠的只是劳动者的劳力，因为他能产生新的价值。

有许多人讲，劳工既然是神圣，资本也是神圣的。不错，可以这样说。但是要晓得，资本是劳动的结果，资本神圣是因劳动

神圣而来。所以这神圣应该属于劳动者，而不应该属于资本家。——说到这里，资本家的秘密，我们又可从马克思的学说中把他揭破。

我们不妨再说一说资本家取利的方法。资本家取利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增加劳动的时间，一是减少劳动的工银。增加劳动的时间，便是增加剩余劳动、剩余价值。例如劳动者一天作八点钟的工，只要三点的工作即足维持他的生命，则剩余劳动、剩余价值为五点。倘若要作十二点，则剩余劳动、剩余价值为九点。剩余劳动、剩余价值越多，资本家的利润就越大。所以资本家极力的增加劳动时间。一方面，资本家想极力的增加时间，可是一方面，劳动者想极力的减少时间。在英国，劳动者有九时运动；在世界，劳动者有八时运动。八时运动，现在多已成功，近来又有六时的运动。六时运动，为资本家产业家所倡出，因为他们觉得六时工作于他们更有利。在现在机器时代，机器工作可以日夜不息，人去工作总有疲倦的时候；拿精神疲倦的人去作工，结果生产减少；生产减少，这是于资本家大不利的。所以资本家把昼夜分为四段，教劳动者换班工作。每人只作六点钟的工，自然精神很好；精神好，自然生产多；生产多，自然于资本家有利；于资本家有利的事，他们自然愿意作了。

资本家利在增加劳动时间，劳动者利在减少劳动时间，这层已经说过。但是资本家还有一个法子，是于他们有利的。什么法子？减少工银，减少劳动者生活费。他们利用妇女儿童，雇他们来作工，给他们很低廉的工银。有许多国家为保护妇女儿童的健康，定了一种工厂法，限制工作。但是资本家依然雇用妇女儿童，骗取他们的剩余劳动。从此，更可证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

说,揭破了资本主义下之秘密。

根据马克思的学说,一方面资本家骗取剩余劳动,一方面却又有一种新趋势。什么新趋势?“资本集中”。资本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于是资本家获利更厚,而小产业因此凋敝倒闭者亦复不少。从前在小产业中可以作事的人,既然受了大资本家的压迫,渐渐不能自存,于是小资本家亦不得不去劳动,而变为“无产阶级者”。大都市发生的大产业一天多一天,失业的“无产阶级者”也一天多一天,于是千千万万的“无产阶级者”齐集资本家之下,而形成社会上的两大阶级:

“有产阶级
无产阶级”。

我们知道,从前的劳动者很少集合的机会。自经资本集中,大产业发生之后,于是劳动者得着集合的机会。他们集合的地点,便是资本家的大工厂,他们有了“阶级自觉”,大家联络起来,和资本家作战,和资本家竞争。——这样,发达的资本家他们自己却产生了可以致其死命的敌人——无产阶级。这也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了。

马克思唯物史观讲,在资本主义发达中,产生了一种新势力。这种新势力,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发生,恰如鸡子在卵壳里发生一样。“社会主义”之想打破资本主义的制度,亦恰如鸡子之想打破卵壳一样。卵壳打破,才能产生一个新生命;卵壳打破,才能产生一个新局面。在这卵壳尚未打破的时期,是一种进化现状。到鸡子已经发生成熟的时期,便非打破这壳不可。“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到了已经发生成熟的时期,便非打破这资本主义的制度不可。打破卵壳,是革命的现象;打破

这资本主义的制度，也是革命的现象。有些人，愿意进化而不愿意革命；“但是我们也要知道，革命乃是我们更大的途程”。鸡子在卵壳里，长了眼睛，长了头，长了毛，既然非打破这壳不可，那么，“社会主义”到了他羽毛丰满的时候，自然也非打破资本主义不可。鸡子打破他的卵壳，“社会主义”去打破资本主义，这都是“革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从马克思学说理论方面讲，虽然有人说，资本、土地、劳力为生产的三要素，但马克思则以为一切生产都从劳力，都是劳动结果。资本、土地都是从劳力生的，都是劳动结果。如水，如煤，他们都没有什么价值。水一定要从海里搬到这地，才有价值；煤一定要从矿里搬到这地，才有价值。怎么去搬？靠劳力。所以一切价值都靠劳力，变地变形而生产之。在从前，虽然一切生产都靠劳力，但分配起来，纯由资本家作主——我们简直可以说，“从前没有分配”。

再从事实方面讲，在资本主义下，才发生“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发生，便要去推翻资本主义。这可以说，“资本家自己，产生了致其死命的东西”。

与资本家相对的便是劳动阶级。劳动阶级，当然是处于不平的地位。到现在他们有了觉悟，有了“阶级自觉”，去集合全世界的劳动阶级，成一“全世界劳动阶级的经济组织”。

有人说，中国劳动阶级没有经济的组织，不能同世界的劳动阶级联合。但我想，这不尽然。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受了外国资本家的影响，华工又散在全世界，不能说中国的劳动阶级不重要。——不过有一点可惜，就是我们东方劳动者，没有“阶级自觉”，常常拿很低廉的工银替人做工。因为这个原故，各国劳动

者很不高兴，美国已经排斥黄色人种，法国也把华工渐渐的送回。在俄国的华工，现在倒还没有遣送回国。我们想想，世界各国，劳动者与资本家都有一种对垒了的趋势。一些小产业受资本家压迫而变成无产的，他们却有集合的地点，他们却找得着资本家的门同他们对抗。但是中国的劳动者，情形就不相同，他们既没有集合的地点，更找不着资本家的门，同他们对抗！国内的小工业，因受外国资本家经济势力的压迫，渐就凋敝，无以为生。他们这种受他国资本家间接压迫的影响，比各国无产阶级者受他们资本家直接压迫的影响还要厉害。以至于流离失所，散而之四方，不晓得什么地方可去工作，可去集合。国内是这种情形，有这么多的无产阶级，我们再从全世界着想，还能说中国劳动者与社会无关吗？倘若还说与社会无关，恐怕不甚合理吧！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呵！你们联合起来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已经说过。现在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他们都有了觉悟，有了“国际组织”。他们为什么要有国际的组织？因为资本家想压制劳工，极力的增加时间、减少工银，劳工反对这种办法，遂以“同盟罢工”为武器起而与之抗，倘若他们没有“国际组织”，资本家便可利用这点去雇用别国的工人，这样，“同盟罢工”就会失败。譬如日本工人罢工，华工就可过去破坏，这便是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国际组织”。

“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不是没有。有“第一国际大会”，“第二国际大会”，“第三国际大会”。“第一国际大会”，到普法战后消灭了。“第二国际大会”，很有马克思的精神，但是欧战一起，里头的会员大多数弃其主义而从事于战事，名虽存而实亡。“第三国际大会”，曾在莫斯科开会，很能承继“第一国际大会”，

而有世界革命(World Revolution)的精神, 比较的还算进步一点。

近几年来, 劳动界的势力渐渐地大起来。英国共产党已经受了“第三国际大会”的命令, 而加入国内的劳动党。世界的劳动者, 现在差不多渐渐地都联合起来。他们的势力一天巩固一天, 革命的时期也一天逼近一天。这完全是受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影响。在中国, 有现在的这种情形, 也不能不说这是受马克思的影响。

马克思的大著作是《资本论》。第一集在他生时刊行, 二、三两集是恩格尔替他刊行。我们要去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只仅仅地读过一遍就不容易。有一个德国人讲, “一个人, 倘若他不到五十岁, 要说他能研究马克思的学说, 这一定是骗子”。而以我要说我对于马克思学说有了什么研究, 当然不能。不过稍微知道一点, 乘这第一次讲演的机会, 来与诸君谈谈。希望诸君听过这次讲演马克思学说大体之后, 能够引起点兴趣, 去研究他的学说, 将来把研究的结果发表出来, 指导社会, 这是我最盼望的。

1922年2月21—23日
《晨报》

署名: 李大钊讲
黄绍谷记

胶济铁路略史

(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

胶州湾被许为德国的租借地，是一八九八年的事。在一八九八年的条约里，又将山东省内重要的铁路、矿山和一切商业的、工业的优先权，统让于德国，胶济铁路亦是在这条约里许给德国经营的。

这条路由青岛至济南府，长约二百四十五英里，至博山矿场有一段支线，长约三十六英里，均于一九〇四年通行。

当初德人声言建设此路的目的，专在图商业的发展，并无占领山东土地的野心。按条约所规定，经营此路，须组织中、德合办的公司，在这个公司里华商、德商均可以投资，关于任命管理此路的人员，亦均可以参与。

一八九九年六月一日，山东铁路公司 (Shangtung Eisenbahn-Gesellschaft) 得了德政府的特许经营这条铁路。是公司德亚银行团所组织的，资本按照德政府特许的条件定为五千四百万马克，股东必须为中国人或德国人，须以百分之五的剩利分与胶州德国殖民行政部，并须以设备及组织上尽量用德国的材料。

一九〇〇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国官吏与铁路公司立了一种协定，规定这条铁路专由德国管理，如华股总额达于十万两时，

中国官吏可以参与。该公司如在山东省内设立分机关，中国方面可派官吏一员为代表，驻在该机关以资接洽。铁路公司购买土地，只限于铁路企业，并于其将来发展的必要范围内，得于车站设立收税所，铁路管理员须予以相当协助。外人在山东境内旅行或做事，必须持有中、德主管官吏签名的护理。铁路公司雇用的华人，若在租界地外犯了法律，必须服从中国地方官的制裁，在租借地百里的地带以外的治安，由山东行政首长派兵保护，不许外国军队经过驻屯。租借地内的治安，由德国驻在青岛的行政长官负其责任。

依一八九九年的条约，德国既已获得了山东的铁路敷设权，并矿山采掘权，德政府乃将此特权付与德亚银行团，使之设立山东铁路及山东矿山两公司。一八九九年六月十四日，山东铁路公司告成立，十月十日，山东矿山公司相继成立，以这两大公司为经营山东的大本营。

胶州湾本线与博山支线敷设后，收益渐次增加，而矿山公司则因坊子煤矿的计划，大归失败，历年的损失甚巨。至一九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损失至一百二十三万七千马克之多，德人鉴于独立经营终难恢复，一九一三年一月一日乃与铁路公司合并。

山东铁路公司自与矿山公司合并后，即于一九一四年改正章程，扩张公司的业务。此后他的业务的范围不止在经营山东的铁路，并可以做中国别的铁路的建筑营业，包办在东亚敷设的铁路的管理，设立保管货物的仓库，对于使他保管的货物发行仓库证券，并得在为山东铁路公司所许可的地域以外，经营采取土地生产物及矿物的事业，及其他关于必要的一切设施和增进公司利益的事业。这样子扩张起来的山东铁路公司的业务，几乎

与日本的南满铁道会社相同了。该路未落口人手中以前，公司分为铁路、矿山、制铁三部分，从事其中的德人，有一百三十二名之多。

民国三年顷，德人又获得由高密至徐州及济南至道口镇的铁路的敷设权，以期与津浦、京汉、陇海等线相联络。此二线告成，则胶济的地位，将又为一变，比以前更见重要。欧战既起，德人的势不暇东顾，日本遂得乘其敝以渔取之。占领以后暂归临时铁路联队管理。由民国四年三月六日以后，由山东铁道管理部接管，管理部职员，全系由南满铁道调来的。直到今日该路全在日本的掌握中。愿国人快快起来，集股赎回，使他脱离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复归故主，依平民的组织管理经营，为胶济铁路开一新纪元。

1922年3月5日

《新生活》第55期

署名：孤松

《黄庞流血记》序*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黄、庞两位先生的死，不是想作英雄而死，亦不是想作烈士而死，乃是为救助他的劳动界的同胞脱离资本阶级的压制而死，为他所信仰的主义而死。因此，我乃对他们的殉死表无限的敬意！

以前的历史，几乎全是阶级的争斗史。最后的阶级争战，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开始了。黄、庞两先生，便是我们劳动阶级的先驱。先驱遇险，我们后队里的朋友们，仍然要奋勇上前，继续牺牲者愿做而未成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在废除人类间的阶级，在灭绝人类间的僭擅。但能达到这个目的，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辞。要知道，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

中国社会运动史的首页，已由黄、庞两先生用他们的血为我们大书特书了一个新纪元！以下的空白怎样写法？要看我们的努力了！

1922年3月23日

《晨报副刊》

署名：李守常

* 这是为《黄庞流血记》写的序言。黄庞即黄爱、庞人铨，是湖南总工会的领导者，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被军阀赵恒惕杀害于长沙。——编者

失恋与结婚自由

(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

自从三月十九日《晨报》的社会新闻登出《两个恋爱的惨剧》的新闻一条，引起梁任公先生慷慨的义愤；又因梁先生的投书，引起了沈女士谢绝多管闲事的、强有力者的仗义的信，并引起了褚保衡先生对梁先生的辩证；又因褚先生的辩证，又引起了沈女士的自白，并对褚先生的质问。原来沈女士的婚姻问题，在原投稿中不过是一个枝叶，现在却成争论的正传了。我今亦欲就这社会的事实下一个批判。

(一)我不敢武断着说原投稿者“是一个极下贱的人”，“是最可恶的人”，是居心“造不道德的谣言毁坏一个妇人的名誉”的人，是“社会上横行无忌的坏人”，是“害群之马”，是“站在黑暗方面含沙射人的败类”。我可以推断他或者他是一位替那失恋者抱不平的人，是一位关心社会问题的人。这一条投稿的错处，在把女子方面爱情移转的原动力都归到“经济”、“势力”和“虚荣”上去，这未免太抹煞了女子方面新发生的爱情的力量和其他关系，蔑视女子方面的人格的意义未免太重了。至于那个投稿遇见男子便把姓名隐起，女子便大书特书，实在令人不能不疑这“是欺负女子的恶习遗传下来的毒”。但我推断这是因为投稿者的心理太痛心于女子的凉薄与负心的原故，他应该把男女的

失恋的女子，对他既是没有爱情了，当然有和别的有爱情的人订婚、结婚的自由。这与名誉丝毫无损。我们不可因为对于失恋者的同情，便厚责于女子方面。我们若承认女子有婚姻的自由权，若承认女子方面因爱情移转而解除婚约，并与女子方面的名誉无损，当然不必为之辩解，说是诬蔑与造谣。女子自身亦尽可赤裸裸的告白的恋爱不存、婚姻自解的理由，不必以此为耻辱。至于那失恋的人，亦要达观些。要知恋既不存了，那以前的痕迹都是些幻梦与泡影。为恋爱而牺牲而殉死是可以的，为幻梦与泡影而牺牲而殉死太不值得了。失恋的人啊！世间还有很多可以爱你的人等着你呢！

我望多情男女郑重着些，失恋的人自少。

1922年4月1日

《晨报》

署名：守常

记者足下：

前在贵报发表《失恋与结婚自由》一文，嗣经细读沈女士告褚君书，知郑君患病，在他提议解除婚约以前。那么，我所论的失恋问题与此事全不相干。特此更正。

守 常

1922年4月2日

《晨报》

宗教妨碍进步*

(一九二二年四月九日)

为什么组织反宗教同盟呢？关于这件事已经发表了宣言书，现在没有必要再作新的说明。我们坚信宗教是妨碍人类进步的东西，把所有的问题都想依赖宗教去解决，那是一种不承认科学文明的态度。换言之，这是不懂得进化论为何物。我们只是依赖廉价的宗教幻想是无法生活下去的。为什么把宗教称之为廉价的幻想呢？这是因为宗教不能探求真理，无论什么问题最后都说成是依靠所谓神的力量或佛的力量去解决的原故。因此，我们反对宗教的目的，并不是像一些人所想像的那样单单是反对基督教，而是反对阻碍人类进步的所有的宗教。然而，这次为什么突然组织这一同盟会呢？那是因为我们历来认为宗教对探求真理，亦即对人类进化上是非常有害的东西，为此我们曾利用一切机会来讲这个道理。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世界基督教学生大会，从各国来了很多人，使这个会变成了宣传的会议，这就更多地散布了宗教的毒害。因此，我们为了反对这种活动而便首先组织起来。更确切地说，在现代社会中，基督教是最发达的，

* 本文和后面的《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中日俄三国关系日益接近》，都是发表在日文《北京周报》上的谈话记录。这三篇日文稿均由周丰一译、贾植芳校；收入《文集》时，又参照其他同志的译稿作了修订。——编者

有最多的信徒，最大的势力，因此应首先反对这个最有势力因而流毒最广的基督教，随着必要也要反对佛教，或发动反对儒教和道教的运动。有的人说，基督教不是妥协性的，说基督在布教之初就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这种使人安于贫穷的说教，是要使他们卑躬屈从，而人的本性是决不甘于忍受贫穷的。也有人说，由于基督教徒的宣传，富人也具有这种心情不就可以了么？但是富人决不会无缘无故地来施舍他人的，这是不知人类本性的一种怪论。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看看资本主义是从何处发达起来的就可以完全明白了。资本家听了基督的“富人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还难”的说教，就真有舍弃自己钱财的吗？大资本家难道不是顶多拿出一点与自身无关痛痒的微不足道的财产吗？所以宗教是向人们宣传廉价的妥协性的东西，它妨碍彻底探求真理的精神，是人类进步的巨大的障碍，因而我们必须竭力加以反对。

1922年4月9日

《北京周报》(日文)第12号

署名：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

五一纪念日子 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

五一的历史,我曾详细的作过一篇《五一运动史》,想读者还能忆起,现在不再详述了。

五一 是工人的日子,是工人为八小时工作运动奋斗而得胜利的日子,是工人站起的日子,是工人扩张团结精进奋战的日子,不是工人欢欣鼓舞点缀升平的日子。在我们中国今日的劳动界,尤其应该令这个日子含有严重的意义,尤其应该不令这个日子毫无意义的粉饰过去。

我很诧异人家有一种含有进步的奋斗的活动的精神的制度、理想、风俗、典礼,一到我们中国人的眼里,便把他看作一个固定的、呆板的、安享的、静止的东西。譬如“平民主义”、“自由”、“平等”等理想,都是空明灵动的人生的态度,所能得到的只是一部分,而此一部分亦只是永无止境、进化不息的全程中的一个起点,或是一段过程,绝不是象面包似的现成的一件死东西,拿到手吃到口便算了事的。五一纪念亦是这样,在人家便把他作的轰轰烈烈,活活泼泼,一年过一回,一年有一年的意义,一回有一回的意义。所以各国资本阶级都是战战兢兢的过这一天,人称

此日是资本家的厄日。这个原故就是他们能够认明此日是工人表示态度的一日，——表示奋斗的态度的一日，不是他们表示满足的一日。试想！人家在这一天不知已竟得过几多的胜利，犹且如此，而我们在这样一个壮烈的日子，没有得过一点的成功，应该怎样的急起直追，仗着国际的同胞联合的声势，作点奋进的工作！依我看来，至少亦应该认清这日子是我们表示站起来的态度的一日。那料他刚到中国人的眼里，又把他看成了一个庆祝的、欢乐的、享福的、歌舞升平的日子了！

五一的标语是工作八小时，修游八小时，休息八小时。除休息八小时不用说明外，我且说说工作八小时、修游八小时的理由。

为什么要工作八小时呢？工作本是一件好事。而且人是动物中的一种，靠活动才能生存的。设使有人把我们关在一个地方，给我们吃，给我们穿，给我们睡觉的床，但不许我们动作，我们试想那是怎样的苦痛，与位置罪人的囚狱有没有两样的地方？但是动作若没有秩序，亦与人性相反；必是有秩序的动作，才能与人性相安，才能与人生有益。惟有工作的动作，是最有秩序的，而且有生产的结果，更能助人工作的兴趣。我们读那古代的劳动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何有于我哉！”工作的人们是何等的快活。那么，我们为什么又作减少工作的运动，又主张工作八小时呢？这有几个理由：（1）生产的工具和生产的组织都改变了。从前工作十六小时乃至其以上，所生产的结果，现在只用八小时便可生产了。这是由生产的分量上论，应该减少工时的理由。（2）从前的生产场所在农村，在山林，在牧场，工作的地方空气鲜明，景色优美，时时与自然相

接，可以减少疲劳与烦厌。现在的生产场所都在大都会的大工场，机声轧轧，人迹纷杂，虽然机械的力量代替了好些人力，而精神上的疲劳与烦厌，则有增加无减少。这是由生产场所的光景上论，应该减少工时的理由。(3)若是集合的生产的结果仍归个人的私有，那么资本家必且贪得无厌，不惜牺牲工人的辛苦，多换取些剩余价值。虽然工时延长的结果，实际上未必较以适宜的时间工作为良，而以资本家欲望的贪婪，可以蔽着他的对于事理的明察，而一意以为增加工时即是增加剩余价值的重要方法。这是由资本主义的产业的性质上论，应该减少工时的理由。(4)人体的健全，全在身体和精神得保平均的调剂的发展。有动作的时候，必须有休息的时候。而休息的方法，并不只是睡眠，有益身心的娱乐亦是调剂倦苦慰安疲劳的最重要的方法。而且智的情的方面的发展，与提高于工人的生活，亦为必要。这又是由工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健全上论，应该减少工时的理由。根于以上诸理由，工人应该自己起来作八小时工作的运动。

为什么要修游八小时呢？关于游玩这件事，新旧的观念不同。于前的旧观念，以为游玩是小孩子的事，成人不该游玩；而且有许多规规矩矩的成人，并小孩子亦不许游玩，以为小孩子亦应该把有用的时间作有用的事，游玩无用废时，亦不该令小孩子去作。近世纪以来，这个观念才大有变动。有人说游玩是过剩元气的表示。一个小孩子正在发长的时候，他的过剩的精神，都以游玩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游玩的观念一变。又有人解释小孩子游玩的进程的次序，恰与人群进化的次序相应，最初的游玩是度那未开人种的生活，其次对于那半开人种的生活很有兴味，再次玩那群兽的或合作的的游戏。这可以说是在游玩的发达上到了

(一)关于外交者

- (1)反对国际的军阀财阀的压迫；
- (2)要求与劳农俄国成立商约并即正式承认其政府。

(二)关于内政者

- (1)否认督军制及巡阅使制，一律改为国军，实行裁兵；
- (2)主张开国家大会，容纳各阶级的代表，制定国宪；
- (3)反对以人民为牺牲的内战的战争。

(三)关于改善工人境遇者

- (1)八小时工作，额外工作加薪；
- (2)假期停工给薪；
- (3)男女同工同酬；
- (4)含有危险性的工作应该格外优待，如矿路电等；
- (5)取缔童工；
- (6)要求公家在工人集合的地方多设正当娱乐的场所及设备。

1922年5月1日

《晨报副刊》

署名：李守常

马克思与第一国际

(一九二二年五月六日)

在一千八百三十六年的时顷，有一团德国的亡命客在巴黎组织一种秘密会，名为“正义者的联合”(The Federation of the Just)，或云“正义者的同盟”(The League of the Just)，后来移到伦敦。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他们在伦敦开一次会议，改称“共产党同盟会”(The Communist League)。马克思和昂格思合作的那《共产党宣言》，就是替这个同盟会作的。这个在名义上虽然亦是一个工人的国际联合，但事实上却是一部分亡命客，会员很少。马克思和昂格思合作的宣言，他虽接受，但不能了解，所以马克思和昂格思不久便脱离了这个团体，这不能算作第一国际的先驱。

第一国际的起源，实由于一千八百六十二年的伦敦国际博览会中英、法工人的接洽，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九月下旬在 E. Beesly 教授主持之下开了一次国际工人会议，第一国际就在此时诞生。

有一位流寓伦敦的法国亡命客名叫 Le Lubez 的，想出一个中央委员会的办法来，这委员会常驻在伦敦，而在欧洲各首都遍立支部，他的计画既得大家认可，便推定委员给他们以总理一切的权力。驻总会的委员英人最多，意大利人马志尼的秘书 Major

L. Wolff 及马克思亦均在內。在第一国际的公式报告里，马克思的名字初见于被选的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中，并且是在此名单的最下列。关于他加入第一国际的情形只有这个事实可以证明。但马克思自己曾有陈述如下：

“有位名叫 M. Lubez 的来问我愿否以德国工人的名义参与这次会议或推出一位德人为在会中的发言者等等，我令 Ekkarius 自己出席于讲坛上作一位替人，我知伦敦和法国的工人们主张实在的势力，以此理由决计变了我的惯行的主义，此次竟辞却了那样的招请。”

一位木工 V. R. Cremer 曾寄给马氏一书邀他到会的信，信文大略如下：

“马克思先生：

亲爱的先生！本会组织委员会敬请先生到会，携此通知来，便许入会场。”

即使不能说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创造者，至少亦可说他由第一次会即为临时总会指导的精神。

第一国际这个婴孩自诞生的时候以至后来遭了灾难，都不是因为没有人照管，乃是因为义父太多的原故。创造这第一国际的人们，几乎都同床异梦。英国的 Howell 和 Odger 两君想用第一国际把英国的工联制推行到欧洲大陆上去。在英伦的法国亡命客想用此以导人去刺杀拿破仑三世。意大利的马志尼想借他以恢复他们的已经消灭的秘密的共和国民的组织。只有马克思是想用他作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同时亦教育工人，联结工人，结局是马克思占了胜利。

在是年十月十一日，马志尼的秘书意大利人 Major Wolff

提议第一国际的中央委员会可采用意大利工人会的规则，马克思对于这个提议极力反对，以为若是这样无异于把第一国际变成一个秘密结社，此提议乃延搁下去，不到一个月，马克思把他自己拟出的第一国际的宪法草案提出，Major Wolff 的阴谋遂从此停止了。马克思这篇演说是他的小品著作中的佳构之一，起首用一个低声调引 Gladstone 的最近的演说，在此演说里他比较过英国的财富与英国工人卑贱的贫乏，从此使用一种强迫的逻辑，把读者放在阶级斗争的全学说上，这恐怕是马克思的特长。

Major Wolff 因为提出的宪法草案未能施行，愤而退出，从此多年，意大利实际上和第一国际断决关系，后来马志尼虽然屡次声明 Wolff 的行动与他没有关系，而且他并不仇视第一国际，不幸他的话竟不诚实，他从一八六五那一年便是第一国际的仇敌了。

十一月八日马克思的草案正式的被采用了，十二日在 Beehive 付印，第一国际遂定名为国际工人会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正式的宣告成立了。

兹将第一国际会议年表列下，并略叙马克思与历次会议的关系：（表见下页）

马克思将总会迁往纽约的提议，就把第一国际宣告死刑了。马克思为什么这样作呢？这有两个说：一说马克思苦于巴枯宁派的纷扰，故把他远远的移到美洲去，以避巴枯宁派的势力。可是第一国际往美洲一移，就丧失了他指导欧洲劳工运动的势力与便利，这个道理难道马克思看不到吗？一说马克思此时已竟看出第一国际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了，他想不要他而又不愿令巴枯宁利用他，故把他远远的送到美洲去，好令他寿终正寝。两说

会议次数	地 点	年 代	与 马 克 思 的 关 系
第 一 次	伦 敦	一八六四	马克思起草宪法。
第 二 次	伦 敦	一八六五	马克思指定宗教的影响为下届会议讨论的问题。
第 三 次	日 内 瓦 (Geneva)	一八六六	阅读伦敦总会的报告，这报告是马克思作的。
第 四 次	劳 山 (Lausanne)	一八六七	马克思因家族的疾病与穷饿未能到会。
第 五 次	不 律 率 (Brussels)	一八六八	马克思与蒲鲁东派争论。
第 六 次	贝 苏 儿 (Basle)	一八六九	马克思与巴枯宁派争论。
第 七 次	伦 敦	一八七一	两派的争益烈。
第 八 次	海 牙	一八七二	马克思动议把总会迁往纽约，巴枯宁派与马克思派分裂。

两派分裂后的会议年表：

马 克 思 派	巴 枯 宁 派
日内瓦(一八七三)	日内瓦(一八七三)
	不律率(一八七四)
费拉得尔菲亚(一八七六)	勃恩(Berne)(一八七六)
	卧儿威儿(Verviers)(一八七七)

以后说近是。到了最终的会议，就是费拉得尔菲亚的会议，只有由德国来的一位代表到会，其余的都是英国人。这就是马克思派的第一国际的末日了。巴枯宁派分裂后，亦开过四次会议，到会者亦寥寥，马上亦就消灭了。

1922年5月6日

《晨报副刊》

署名：守常

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

(一九二二年六月)

常听人说，某派宗教，颇含有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这等观察，适与我的观察相反。

先说宗教与自由。

宗教是以信仰的形式示命人类行为的社会运动，宗教的信仰就是神的绝对的体认，故宗教必信仰神。既信仰神，那么心灵上必受神定的天经地义的束缚，断无思想自由存在的余地。盖人类不容异己的意念，实从根性而发生，至于所重视的事物，其不容异己的意念更甚。所以笃信的教士，无论他属何宗派，恶异喜同的感情，几乎都是一样。欧洲宗教改革的发端，实因反抗罗马公教的压制而起，但其党同伐异的情形，新宗与旧宗相差无几。后来门户纷争的结果，只有分立，没有全胜，于是弱小宗派，乃揭崇信自由的旗帜以求自存。这样看来，真正的思想自由，在宗教影响之下，断乎不能存在。必到人人都从真实的知识，揭破宗教的迷蔽，看宗教为无足轻重的时候，才有思想自由之可言。我们的非宗教运动，就是要申明这个道理，使人们知道宗教实足为思想自由的障蔽。要想依自己心灵的活动，求得真知而确信，非先从脱离宗教的范围作起不可。那么我们非宗教者，实在是为拥护人人的思想自由，不是为干涉他人的思想自由。

次说宗教与平等。

宗教的本质就是不平等关系的表现。原来宗教的成立，多是由于消极的条件：（一）强力的缺陷。原人的生活，处处受自然力的支配，而不能支配自然，故常感自然力的伟大，而觉自己的力量缺乏，起先看见雷霆、地震、火山、洪水、暴风、天变、地异、日蚀、月蚀、猛兽、毒蛇等自然界的变象而发生恐怖，后来对于自然界的常态，亦生敬畏。这时有能对于这些变象有几分先知预见者，或自称能有几分先知预见者，或能对于这些变象有几分抵抗力者，又或在这变异时境中能泰然自若而有几分应付变异的成功者，便对于一般人民成为有不平等关系的优者强者，而得一般劣者弱者的敬仰。这是原始宗教起源之一。（二）身体的缺陷。人体的健康，常生变动，有时忽罹疾病，原人不知罹病的原由，辄归于神的降灾。这时有能对于病苦之将至为豫告者，或于救济病苦有几分成功者，便对于一般人民成为不平等关系的优者强者，而得一般劣者弱者的敬畏。古者巫医并称，如今宗教与医尚有密切的关系，便是明证。这是原始宗教起源之二。（三）生命的缺陷。人生的修短无常，病痛之极，乃至于死。原人对死，亦生恐怖，而常忧惧。故有能预告其死者，或对于死与一种慰安者，——如死后生活的保障亦是一种对于死的慰安——便对于一般人民成为不平等关系的优者强者，而得一般劣者弱者所敬畏。故宗教必谈死后，必说来者。这是原始宗教起源之三。（四）品性的缺陷。罪恶的自觉，自原人时代亦既存在，惟关于简单明了的事为然，特别是关于性的关系，尤为原人所重视。此时有能功之为罪恶的改悛者，有称为有能赦免罪恶的全权者，便对于一般人民成为优者强者，而为一般劣者弱者所敬畏。宗教家至今尤

重独身生活，即源于此，而忏悔一端，犹为今之宗教所注重，亦以此故。这是原始宗教起源之四。（五）运命的缺陷。人之处世，祸福无端，原人于此，往往疑有主宰，操人运命而能与祸福者。此时有能豫告祸至者，或能为祷告以免祸祈福者，均成为优者，而为一般人所敬畏。故宗教不能离于祸福观，而祈祷至今犹为宗教上的一种仪式，亦以此故。这是原始宗教起源之五。就是祖先崇拜的起源，虽由于“与自由有密切关系”的积极的条件，但其生前，实为家庭的长上，而于教养及其他生活上为优者。由此类推，伟人崇拜，英雄崇拜，国君崇拜，都现出优劣不平等的关系，这样看来，宗教本质全系不平等关系的表现，而欲依此以实现平等的理想，恐怕很难了。

再次说宗教与博爱。

宗教的教义，多有以神为介而阐导博爱的精神的。但我很怀疑，没有自由平等作基础的博爱，而能达到博爱的目的么？即如基督教义中所含的无抵抗主义，如“人批我左颊，我更以右颊承之”，“人夺我外衣，我更以内衣与之”，“贫贱的人有福了”，“富者之入天国，难于骆驼之度针孔”等语，其结果是不是容许资产阶级在现世享尽他们僭越的掠夺的幸福，而以空幻其妙的天国慰安无产阶级在现世所受的剥削与苦痛？是不是暗示无产阶级以安分守己的命示，使之不必与资产阶级争抗？是不是以此欺骗无产阶级而正足为资产阶级所利用？资产阶级是不是听到这等福音便抛弃他们现世的幸福而预备入天国？这是大大的疑问。

1922年6月

《非宗教论文集》

署名：李守常

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

(Democracy and Ergatocracy)

(一九二二年七月一日)

现代有一最伟大、最普遍的潮流，普被人类生活的各方面，自政治、社会、产业、教育、文学、美术，乃至风俗、服饰等等，没有不著他的颜色的，这就是今日风靡全世界的“平民主义”。

“平民主义”是一种气质，是一种精神的风习，是一种生活的大观；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实在是一个抽象的人生哲学；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理解的产物，实在是濡染了很深的感情、冲动、欲求的光泽。若把他的光芒万丈飞翔上腾的羽翮，拘限于狭隘的唯知论者的公式的樊笼中，决不能得到他那真正的概念。那有诗的趣味的平民主义者，直想向着太阳飞，直想与谢勒(Shelley)惠特曼(Whitmen)辈搏扶摇而上九霄。

我们怕把他的精神的广大弄狭小了，怕把他的精神的生机弄死僵了，姑称他为平民主义，称这种精神表现于政治上的为平民政治。

平民主义原语为 Democracy，在古希腊雅典政治家波里克鲁(Pericles)(纪元前四百九十五年生，四百二十九年死)时代，亦是一个新造语，当时亦曾遭嫌新者的反对，后来有些人觉得为表示一种新理想有立这个新名词的必要，故终能行用。至亚里士

多德时代，学者使用此语，取义还各不同，例如亚氏用之则当其民主政治(Polity)的变体，含有暴民政治的意味；而鲍莱标士(Polybios)用之，则当亚氏的民主政治(Polity)。

平民主义(Democracy)的语源，系由 Democ 与 Kratia 二语联缀而成。音转而为 Democracy。Democ 意为“人民”(People), Gracy 意为“统治”(Rule), 故 Democracy 一语，可直译为“民治”(People's rule or popular Government), 但演进至于今日，此语的意义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动，最初“统治”的意义久已不复存了。

马萨莱客(J. G. Masaryk)有几句话诠释现代的平民主义，可谓精当之至。他说：“平民主义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目的，乃在废除属隶与统治的关系。平民主义本来的意义是‘人民的统治’。但现代平民主义的目的已全不在统治，而在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的执行。这国家组织的新概念，新计划，怎样能被致之实行，这不仅是权力的问题，乃是一个执行的技术的难问题。”含有统治意味的平民主义，仍有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现代的平民主义全无对人的统治，只有对于事物的执行与管理。故欲实现现代的平民主义，不须研究怎样可以得到权力，但须研究怎样可以得到管理事物的技术。

普通诠释平民政治的人，都是说“平民政治是为人民，属于人民，由于人民的政治”(Democracy i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但是看破此语是虚伪的，不止马洛克(Mallock)一人。马洛克在他的“The Limits of Pure Democracy”里开宗明义即揭破此言的虚伪。

因为他们所用的“人民”这一语，很是暧昧，很是含混。他们

正利用这暧昧与含混,把半数的妇女排出于人民以外,并把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男子排出于人民以外,而却僭用“人民”的名义以欺人。普通所说的平民政治,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乃是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所以列宁(Lenin)氏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在莫斯科第三国际大会里演说,曾竭力为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与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的区分。后来在他所著的《国家与革命》里,并别的著作里,亦尝屡屡赞扬这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但列宁氏虽称道平民政治,却极反对议会政治。他以为议会制度纯是欺人的方法。此方法的妙处,在以人民代表美名之下,使此机关仅为晓舌的机关,为中产阶级装璜门面,而特权政治则在内幕中施行。列宁氏以为欲救此弊,要在使代表机关不但为言论机关,并须为实行机关。无代表制度固无平民政治,而无议会制度则依然可行平民政治,而且真实的平民政治非打破这虚伪的议会制度必不能实现。这样看来,现在的平民政治,正在由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向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发展的途中。在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下,自然亦没有两性的差别了。有人说,只有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才是纯化的平民政治,真实的平民政治,纯正的平民政治,就是根据这个道理。

从实质上说,这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虽亦是平民政治的一种,但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学者,因为此语在资本主义时代已为中产阶级用烂了,乃别立一新名词以代平民政治而开一新纪元。这新名词就是“工人政治”(Ergatoeracy)。此语出世不久,在字典上还没有他的位置。此语的创立,亦和“Democracy”是一样,借重于希腊语丰富的语源。希腊语“Ergates”是“工人”(Workers)的意思,故“Ergatocracy”意为“工人的统治”(Worker's rule),

故可译为“工人政治”。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的时期。在此时期，以无产阶级的权力代替中产阶级的权力，以劳工阶级的统治代替中产阶级的少数政治 (Bourgeois Oligarchy)。这一期的工人政治，实有“统治” (rule) 的意味，并且很严，大权全集于中央政府，以严重的态度实行统治别的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实行社会主义的精神，使之普及于一般，直到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的特色私有制完全废止，失了复活的可能的时侯，随着无产者专政状态的经过，随着阶级制度的消灭，Ergatoracy 的内容将发生一大变化。他的统治的意义，将渐就消泯，以事物的管理代替了人身的统治。此时的工人政治就是为工人，属于工人，由于工人的事务管理 (Ergatoracy is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workers, for the workers, by the workers)。因为那时除去老幼废疾者，都是作事的工人，没有阶级的统治了。这才是真正的工人政治。

鲍洪 (Bohun) 氏劝告他的同志们说：“不要再谈平民政治了。你们想你们是平民政治者么？但是你们不是。你们想你们要平民政治么？但是你们不要。你们是工人政治者，你们要工人政治。平民政治是资本主义破烂时期的方法，是一个被卑鄙的使用玷污了的名词。留下平民政治一语给那自由的中产阶级和那社会主义者中的无信仰者用罢。你们的目的是工人政治。”这一段话，可以表示他们弃平民政治而用工人政治的理由。

现在再讲一讲社会主义 (Socialism) 与共产主义 (Communism) 的区别。照现在的情形讲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很有分别。当一八四八年一月时候，昂格思 (Engels) 与马克思同

作的《共产党宣言》发布了。其后一八八八年用英文发刊，昂格思作了一篇序文，郑重声明这是共产党宣言，不是社会党宣言。昂格思说，在一八四七年顷，所谓社会党人乃是那些在劳工阶级运动以外求援于知识阶级的人们。不论多少，只要有一部分自觉的工人，渐知只是政治的改革还是不够，从而主张有全社会改革的必要。这一部分工人可自称为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的运动，是中流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运动，是劳工阶级的运动。

由《共产党宣言》发表，到昂格思序文刊布时候，其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名词，用得非常混淆。到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国起了经济革命，这种革命家是无产阶级，他们自称为共产党人。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又有半有产阶级在德国，起了政治革命，他们却自称为社会党人。其区别愈益明了。一九一九年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三国际大会，代表共产党，以示别于代表中产阶级的第二国际大会社会党。旗帜更见鲜明了。

我们用颜色表明共产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不同，则社会主义者，应为浅红色，而共产主义者为纯赤色。可是共产主义者却称社会主义者为黄色的社会党，黄色的国际，而不以浅红色称之。

简明的说，社会党人的运动是半有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社会主义的运动是创造的进化，共产主义的运动是创造的革命。社会党人是中央派与右派，共产党人是极左派。社会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二国际，是黄色的国际；共产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三国际，是赤色的国际。这是现代社会革命运动的两大潮流。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都尚在孕育时期，故在今日尚不能明

了的指出他是一种什么制度。但在吾人心理的三方面，可以觅出他的根蒂：（一）知的方面，社会主义是对于现存秩序的批评主义。（二）情的方面，社会主义是一种使我们能以较良的新秩序代替现存的秩序的情感；这新秩序，便是以对于资本制度的知的批评主义的结果，自显于意象中者。（三）意的方面，社会主义是在客观的事实界创造吾人在知的和情的意象中所已经认识的东方的努力，就是以工人的行政代替所有权统治的最后形体的资本主义的秩序的努力。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学说的内容上没有区别，不过在范围与方法上有些区别罢了。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亦复相同。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亦是这样。无论富者统治贫者，贫者统治富者；男子统治女子，女子统治男子；强者统治弱者，弱者统治强者；老者统治幼者，幼者统治老者；凡此种擅用与治服的体制，均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所不许。不过德谟克拉西演进的程级甚多，而社会主义在目前，则特别置重于反抗经济上的擅用罢了。

这样看来，德谟克拉西(Democracy)、伊尔革图克拉西(Ergatoocracy)、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精神上有同一的渊源，在应用上有分析的必要。

1922年7月1日

《新青年》第9卷第6号

署名：李守常

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国际少年日纪念会” 上的演说词^{*}

(一九二二年九月三日)

今日与诸君讨论的是“青年问题”。我们青年尤其应该明白青年所处的地位。现在社会的组织，犹是老年人和青年人。而老年人所有的精神是保守的，青年人的精神是进步的、发展的。因有这两种人在社会，所以一方面能保存固有的状态，一方面能发展未来的文明。我们青年所守的态度既然是进步的、发展的，那末“人”的未来事实，完全为我们青年的责任。进一句说，我们青年的群众运动，就是社会革命的先锋。近几年来政治所以弄得这般糟，良由我们青年着了旧时的观念，不喜过问。所以政治上都让一班无头脑的老人去干，让那些武人军阀去玩弄。总之，我们从前的观念是错误的，不能成立的。

前几年，人家以为教育与政治是两件事，不用妥协。到了现在简直受了此种误解而破产。须知政治不好，提倡教育是空谈的。从前蔡元培先生等即抱此种观念，决不干预政治。结果国立

* 这篇演说记录稿见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学生杂志》第九卷第十一期。这期《杂志》在一则题为“国际少年日纪念会”的消息中，报道了“九月三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请北大教授李守常等在中华职业学校开纪念大会”和发表演说的情况，并在消息的末尾刊登了这篇演说词的记录稿。——编者

北京八校竟有停办的危机。所以，我们决不能把政治离开不顾，任一般坏人去做。我们须要急起相持，非争到我们手里不止。

中国现在的特殊情形由来有两种：一种是外来的压迫，即受国际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支配；一种是国内武人军阀的压迫。要求从此种情形中解放，完全须由我们团结起来奋斗。五四运动是因外交问题激起的。但此次青年运动的结果，社会上受影响很不小。所以我们要政治运动，也要像军队似的团结起来，促进民主主义，做有步骤的进行。民国以来做此种政治运动，有国民党和进步党两个团体。而国民党的目标是民治的，所以比较上算是一个完全的政党。现在还有更和我们关系的团体运动，如劳动运动、妇女运动，都是民主主义的纯粹运动。

几年来战争不已。而每次战争的结果，何尝不是影响于我们人民的生活。所以我们此后对于政治，决不可再有默视的态度。国际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都是我们的仇敌。

1922年

《学生杂志》第9卷第11期

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七日)

在十月革命的火光里，诞生了劳农群众的国家和政府！这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

十月革命喊出来的口号是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用这种口号唤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唤起他们在世界革命的阵线上联合起来。

受资本主义的压迫的，在阶级间是无产阶级，在国际间是弱小民族。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既被那些欧美把长成的资本主义武装起来的侵略的帝国主义践踏摧凌于他的铁骑下面，而沦降于弱败的地位。我们劳苦的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

这个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十月革命，不只是劳苦民众应该纪念他，凡是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结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

我们在这严肃的、伟大的、壮烈的、仁慈的纪念日，要提议一

件我们全国人民应该注意的事,就是对俄外交问题。

我们有几句重要的话,要外交当局仔细听着:

要即日无条件的承认劳农政府!

要即日无条件的开始中俄会议!

不许一味仰承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团的意旨来办理对俄外交!

不许沿用媚强欺弱的帝国主义式的无耻的外交手段来办理对俄外交!

我们要严重的监视外交当局的对俄外交!

1922年11月7日

《晨报副刊》

署名:守常

国际的资本主义下的中国

(旧国际共管与新国际共管)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列强共同监督中国的倾向实显于一九〇一年义和团事件。外国管理中国关税的制度，无异于监督中国重要财政的渊源。此制行之至今，犹未变易。

列强间在中国伸张势力的竞争虽然极烈，而于保持增进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则全一致。

英国、日本并战前的德、俄，都曾得到可以使他们满意的庚子赔款。四国在中国都保有“势力范围”(Zones of Influence)，而美国则独向隅。

在本世纪初，美国既未于中国市场占有经济上的利益，所以对于是等现状不能满足，于是提出一种与“势力范围”互相抵抗的政策，曰“开放门户”(Opened door)。美国以为如欲在中国能与他国享有同等的权利与势力，非将他国的势力范围打破不可。他国的势力范围打破，美国才能从开放的门户跑进中国来。美国并未想打破列强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与权利，不过要想打破英、日、俄、德的势力范围的局面，别开一种“开放门户”的局面，使美国亦得与他们共享同等的利益。

欧战既平，德、俄无暇顾及中国，而英、日、法遂承其地位。美

国认此为绝好的机会，使他们容纳他所提出的开放门户的政策，建立一种列强共同对待中国的政策。这就是华盛顿会议的由来。

自然，从前已经获得的特殊权利，如英国在扬子江流域，日本在南满，美国须承认他们仍得保有之，英、日始肯与美国合作。美国外交家知道的很清楚，任各国自行在中国伸张势力，于他们是不利的，故极力主张一个列国一致的对华政策。

由华盛顿会议可以看出，美国舆论实欲把中国置于列强管理之下，而从共管铁路着手。但此议以惧引起中国排外的风潮，遂暂不提起。因为明目张胆的来管理中国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别寻一种避名取实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共管中国的关税。换句话说，就是共管中国的对外贸易与一重要部份的中国财政。那另外一个管理中国的工具，就是铁路问题，依四国的新国际共管得了解决。这新国际共管不但要管理中国的财政与铁路，并且干涉到实业的发展。这就是一个共管中国的国际的组织。

列强对于中国的共管运动可以分为两期。第一期可称为旧国际共管，第二期可称为新国际共管。旧国际共管实成立于一九〇八年英、德、法的银行团，目的在此三国对于中国借款的共同动作，但没有象现在的新国际共管所有的那样显明的独占的性质。美国政府和美国银行家马上晓得了，他们利用旧国际共管的用意，成立后随即加入。一九一一年的六百万镑湖广铁路借款，就是这四国银行团办理的。不多时，俄、日亦请加入，遂又变成英、德、法、美、日、俄六国的团体。这个联合直到一九一三年还没有什么变动，是年威尔逊氏当选为美国大总统，便对此团体取消极的态度，美银行团遂亦退出此组织。一九一三年的二

五,〇〇〇,〇〇〇镑善后借款,就是那五国的银行团借与的,其中不包有美国。

大战既起,旧国际共管不能继续存在了,美国尤不愿把中国放任给任何一国或数国去压榨。所以于一九一六年美政府即与当初曾参加旧银行团的少数银行家计画,请他们组织一个国民的银行团,以为战后投资中国的准备。这是很明了的,假使有个国际的组织成立,美国一定被邀而占主要的地位。因为美国是富于资本的国,这种新国际共管的计划,实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八日由美政府建议于英、法、日。我们要注意这最有关系的中国并未得与闻其事,直到二年以后,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才由美、英、法、日联名通知中国。

美政府原来提议的要点如下:

(1) 四国各组织一国民的银行团,只有加入此团者得交涉借款于中国,否则无此权利;

(2) 非经四国银行团的联合行动,不得承认借款于中国,或从中国承受何种让与;

(3) 把所有可能的现存的权利和借款合同置于此组织管辖之下;

(4) 四国银行团须注意借款于中国政府与地方行政官的用途,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担保其借款系为发达实业。

美国发出此提议后,经过多次意见的交换,英、法、日都赞成美国的提议,遂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各国代表在巴黎开第一次会议,议决在各该政府批准的条件之下,他们都赞成美国的原案。在此会议里,亦没有人想到应该问一问中国的意思,中国又没有被邀入会议。

英、美、法三国政府对此批准，当然没有什么异议。只有日本政府很怕他的在满、蒙的权利因此受了拘束，遂不能不费些踌躇，经过些交涉之后，其他三国宣告这国际共管不能伸张到南满铁路，他才答应批准。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五日，四国银行团代表在此合同签字以后，这新国际共管遂告成立。

我们要晓得，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的问题，这实在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这是中国在列强的国际的资本主义下被压榨的情形，特把他简单的写出来要大家注意。

1922年12月1日

《晨报副刊》

署名：守常

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周年纪念感言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我们很欢欣的很高兴的纪念这本校成立的第二十五年。

在这纪念日，本校同人合力预备些游艺、展览和讲演，固然是很有趣味的事。但我们自问，值得作一个大学第二十五周年纪念的学术上的贡献实在太贫乏了！这固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筹备的，可是我们却不能不在这一日立下一个宏愿，从学术的发明上预备将来的伟大的纪念品。

远的将来且不论。明年的纪念日，如能有些学术上的纪念作品，使全国学术界都能得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纪念赠品，那就是本校的光荣了。

我以极诚挚的意思，祝本校学术上的发展。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

1922年12月17日

《北京大学日刊》

署名：守常

社会问题与政治*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今天讲的题目是：《社会问题与政治》。未讲本题之前，且先讲社会与政治的关系。有的人说：社会不良，政治是不能好的。于是他们把政治完全抛弃，专作社会的事业；以为把社会改良好了，才能有好的政府。又有一派人说：政治不良，社会是不能好的；比如我们只顾做社会事业，不顾政治如何，惨淡经营，劳心劳力，不知费了多少时光，才有些成效；但政府不良，诸多掣肘，甚至为他所破坏，前功尽弃；所以当从政治下手，政治好了，社会问题，即容易解决。

这两派的主张，均是有理，但均系偏见。须知社会与政治，是互为因果的，不可偏重一面的。今从我国现状观察一下，自民国成立以后，专制政体虽被推倒了，然而政治仍旧是腐败。一般心理，都觉政治不可为，于是转过来纯作社会运动。可是政治愈无人改革，愈不能好，社会也愈不能改良，且许多年经营的社会事业，也许一旦被不良的政府破坏了。所以现在很有些人得到这种觉悟，以为拿政治作改良社会的手段，是“事半功倍”的。

但什么是社会问题？这个定义，实在难定。我们姑且略说

*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在中大哲学读书会讲，刘月林记。——编者

一句,就是:凡社会呈了不安的现象,而图解决之的方法都是。比如:劳工问题,妇女问题,人力车夫问题,鸦片,缠足等等问题,都是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所以不易解决者,大半因经济的关系,因为经济的不均与不安,许多问题,都从此发生。社会上小的问题,可以不说。至于大的问题,我们想解决他,非靠政治的力量不可!因为社会问题,往往混入政治问题。即如烟酒问题,若从小里看,似乎用不着政治;但若是视为和民族的强弱有密切的关系时,则不得不从政治法律方面去解决他,因为政治的力量很大,最容易收效果。

今天所讲的,不是广泛的社会问题,是和政治最有关系的问题。经济底不平等,我们在社会上,随时随地可以看出。想解决这些问题的人,现在可分为二派:

(一)社会改良派:因政治组织不良,拟徐图改善之;

(二)社会革命派:因政治组织不良,拟根本推翻之。

按这两派互有长短。怎么讲呢?第一派,徐图改善,故凡事要待有好机会,才去实行改革,易流为“等机会派”。第二派,专谋根本改革,必须待条件完备,才去实行;如条件不完备,虽小的机会,他也不屑进行,以致耽搁了许多机会。这是两派的各具毛病。

大凡党派,不外三种区别,就是急进、缓进和折衷(或左、右、中央)。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倾向,即前二派都超于折衷派(中央派),大有超越党籍而互相接近之势。这个新倾向,于社会改良上最为有利。就是在条件(经济)未完备以前,亦不专候,一方面向大的目标做去,一方面有小的机会亦不抛弃;既不象第一派专等机会,也不象第二派太失机会。

现在社会上有两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一) 妇女参政问题，

(二) 劳工问题。

这两个问题，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都想解决他的；现在都牵到政治问题了。因为妇女、劳工，在法律、经济上都不得平等，均已组织团体，向立法机关请愿，竭力运动。他们惟一的请愿机关，就是国会。但是不会这样容易成功，并且不是根本的解决。比方妇女问题，除参政以外，不平等的地方还有许多哩。前次女子参政协会等开会竟有警察来干涉，后来才查出警察法上，有女子不准集会结社一条。所以参政问题，办到与否，是一个问题；即能办到，也没有多少补救。劳工问题也是这样，只要求法律的认可，也是不中用的。

要想解决这两个繁重的问题，决非简单的平民团体所能办到；非组织强有力的政治团体去解决他不可！有了强有力的政治团体，则能握到政权。先得到了政权，则可以徐图解决自身问题。换言之，第一步先运动参政权，参政权得到后，即可在议会上列席，得以建议和监视。一方面组织强有力的政团，解决一切社会上不平等的问题。

但以上所举的两个问题，都是由于经济不平等而来。因此经济能力薄弱的人，受经济能力富强的支配，所以欲根本解决，非打破这个阶级不可。主张根本改革的俄国，最看重政治力，当劳工革命欲以无产阶级打破有产阶级，以造成世界底幸福以前，各妇女即和劳动者联合，组织团体，先取参政权、普选举权等。因为妇女和劳工，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应当和衷共济，组织平民团体。得到政治力量以后，再藉以解决社会问题。

中国现在虽然不能希望根本改革，但是点点滴滴的改革也非靠政治的力量不可。女高师学生到日本参观的时候，日本社会主义者，力劝伊们不要轻视政权。盖因有政权，改革社会才有力量，我想现在要改革社会的问题，最要者：

第一，先争得宪法上的平等权，如女子参政、劳工立法等，然后拿争到的政权去解决各种的问题；

第二，要作联合运动，妇女劳工固当联合，此外凡目的相同的都应该联合起来，一点一滴的去作。

现在我们可得一个结论，就是：欲改良社会，非靠政治的力量不可；因为政治的力量，可以改革一切的社会问题。

十二月十七日

1922年12月29日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平 民 主 义

(一九二三年一月)

(一) “平民主义”的潮流

现代有一绝大的潮流遍于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政治、社会、产业、教育、美术、文学、风俗，乃至衣服、装饰等等，没有不著他的颜色的。这是什么？就是那风靡世界的“平民主义”。

“平民主义”，崛起于欧洲，流被于美洲，近更借机关炮、轮船、新闻、电报的力量，挟着雷霆万钧的声势，震醒了数千年间沈沈睡梦于专制的深渊里的亚洲。他在现在的世界中，是时代的精神，是唯一的权威者，和中世纪罗马教在那时的欧洲一样。今人对于“平民主义”的信仰，亦犹中世欧人对于宗教的信仰。无论他是帝王，是教主，是贵族，是军阀，是地主，是资本家，只要阻碍了他的进路，他必把他们一扫而空之。无论是文学，是戏曲，是诗歌，是标语，若不导以平民主义的旗帜，他们决不能被传播于现在的社会，决不能得群众的讴歌。我们天天眼所见的，都是“平民主义”战胜的旗，耳所闻的，都是“平民主义”奏凯的歌，顺他的兴起，逆他的灭亡。一切前进的精神，都自己想象着是向“平民主义”移动着的。现在的平民主义，是一个气质，是一个精神的风习，是一个生活的大观；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实

在是一个抽象的人生哲学；不仅是一个纯粹理解的产物，并且是深染了些感情、冲动、念望的色泽。我们如想限其飞翔的羽翮于一个狭隘的唯知论者公式的樊笼以内，我们不能得一正当的“平民主义”的概念。那有诗的心趣的平民主义者，想冲着太阳飞，想与谢勒(Shelley)和惠特曼(Whitman)抃扶摇而上腾九霄。

(二) “平民主义”字义的解释

“平民主义”是 Democracy 的译语：有译为“民本主义”的，有译为“民主主义”的，有译为“民治主义”的，有译为“唯民主义”的，亦有音译为“德谟克拉西”的。民本主义，是日本人的译语，因为他们的国体还是君主，所以译为“民本”，以避“民主”这个名词，免得与他们的国体相抵触。民主主义，用在政治上亦还妥当，因为他可以示别于君主政治与贵族政治，而表明一种民众政治。但要用他表明在经济界、艺术界、文学界及其他种种社会生活的倾向，则嫌他政治的意味过重，所能表示的范围倒把本来的内容弄狭了。民治主义，与 Democracy 的语源实相符合。按希腊语 demos，义与“人民”(People)相当，kratia 义与“统治”(rule or government)相当，demo kratia，即是 Democracy，义与“民治”(People's rule or popular government)相当。此语在古代希腊雅典的政治家 Pericles (生于纪元前四百九十五年，卒于四百二十九年)时代，亦为新造。当时的人觉得有为新理想立一个新名词的必要，但亦曾遭嫌新者的反对，后来这个名词，卒以确立。惟至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时代，学者用之，诠义尚各不同，例如亚氏分政体为三种：一、君主政治(Monarchy)，二、

贵族政治(Aristocracy), 三、民主政治(Polity)。此三种政体, 又各有其变体: 君主政治的变体, 为暴君政治(Tyranny); 贵族政治的变体, 为寡头政治(Oligarchy); 民主政治的变体, 为暴民政治(Democracy)。是知亚氏诠释, Democracy不释为民主政治, 而释为暴民政治; 亚氏表明民主政治, 不用Democracy, 而用Polity。包莱表士氏(Polybius)则又用Democracy一语, 以当亚氏的polity。后来行用日久, 终以表示“民治”的意义。但此种政制, 演进至于今日, 已经有了很大的变迁, 最初“统治”(Rule)的意思, 已不复存, 而别生一种新意义了。这与“政治”(Government)一语意义的变迁全然相同。“政治”的意义, 今昔相差甚远, 古时用这个字, 含有强制或迫人为所不愿为的意思, 如今则没有分人民为治者阶级与服隶阶级的意思了。自治(Self-government)一语, 且与政治的古义恰恰相反。现代的民主政治, 已不含统治的意思, 因为“统治”是以一人或一部分人为治者, 以其余的人为被治者; 一主治, 一被治; 一统治, 一服从; 这样的关系, 不是现代平民主义所许的。故“民治主义”的译语, 今已觉得不十分恰当。余如“平民主义”、“唯民主义”及音译的“德谟克拉西”, 损失原义的地方较少。今为便于通俗了解起见, 译为“平民主义”。

(三) “平民主义”与强力

“平民主义”的政治理想, 在古代希腊, 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诸人已曾表现于他们所理想的市府国家。近世自由国家, 即本此市府国家蜕化出来的。在此等国家, 各个市民均得觅一机会以参与市府国家的生活, 个人与国家间绝没有冲突轧轹的现象;

因为人是政治的动物，在这种国家已竟能够自显于政治总体。政治总体不完备，断没有完备的人；一说市府的完全，便含有公民资格完全的意思。为使公民各自知道他在市府职务上有他当尽的职分，教育与训练都很要紧。亚氏尝分政治为二类：一为与市府生活相调和的政治，一为以强力加于市府的政治。前者，官吏与公民无殊，常能自守他的地位为政治体中的自觉的分子，觅种种途径以服事国家，没有一己的意思乖离于市府的利益。在这种国家，政治体由民众的全体构成，不由民众的一部，治者兼为民众的属隶。后者，官吏常自异于平民，利用官职以为自张的资具，一切政务都靠强力处理。把公民横分为治者与属隶二级，而以强力的关系介于其间，以致人民与官吏恶感丛生，俨成敌国。在这等国家，治者发号施令，为所欲为，属隶则迫于强力不得不奉命惟谨罢了。现代的“平民主义”，多与亚、柏诸人的理想相合；而其发展的形势，尚在方兴而未已。宇内各国，没有不因他的国体政体的形质，尽他的可能性，以日趋于“平民主义”的。“平民主义”的政制，本没有一定的形式，可以施行这种制度的，亦不限于某类特定的国家或民族。人民苟有现代公民的自觉，没有不对于“平民主义”为强烈的要求的，没有不能本他的民质所达的程域向“平民主义”的正鹄以进的。民主的国家，不用说了。挪威本是君主政治，亦濡染了平民主义的新色了。瑞士的“康同”，本是寡头政治，少数反对人民的执政与富豪，亦遭平民主义的打击而表示退败了。日本本是元老政治，今日亦栗栗危惧于平民主义气焰之下而有危在旦夕之势了。欧洲大战中及其以后，独裁帝制下的俄罗斯，一跃而为劳农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了。德、奥、匈诸国，亦皆变成民主共和国了。余如中欧一带，民主式的

新国，亦成立了很多。可见今日各国施行“平民主义”的政治，只有程度高低的问题，没有可不可能不能的问题。这种政治的真精神，不外使政治体中的各个分子，均得觅有机会以自纳他的殊能特操于公共生活中；在国家法令下，自由以守其轨范，自进以尽其职分；以平均发展的机会，趋赴公共福利的目的；官吏与公民，全为治理国家事务的人；人人都是治者，人人都非属隶，其间没有严若鸿沟的阶级。这里所谓治者，即是治理事务的意思，不含有治人的意味。国家与人民间，但有意思的关系，没有强力的关系；但有公约的遵守，没有强迫的压服；政府不过是公民赖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事务的工具罢了。马萨莱客 (T.G.Masaryk) 说：“‘平民主义’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目的，乃在废除属隶与统治的关系。‘平民主义’一语的本来的意义，是‘人民的统治’ (People's rule)，但现代‘平民主义’的目的，已全不在统治而在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的执行。这国家组织的新概念新计画怎样能被致之实行，这不仅是权力的问题，乃是一个执行技术的难问题。”这几句诠释现代平民政治的话，很能说出他的精要。可知强力为物，在今日的政治上已全失了他的效用。除在革命时期内，有用他以压服反对革命派的必要外，平时施用强力，适足为政治颓废的标识。

(四) “平民主义”与“多数政治”

有人说“多数政治”(Government by majority)即是“平民政治”。无论何种政治没有不是以强力作基础的。在平民政治下，多数对于少数，何尝不是一种强制的关系？威尔逊氏便有这

容“自由认可”发生。就使“自由认可”的动机，多少由于自己节制自己牺牲，亦均属自由范围以内的事，决与自己以外威制的强力无关。孟子说过：“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非心服者，即不生“自由认可”。凡事可以得人的“自由认可”，且可以称为心服者，必不是外来的强力的效果。服从的关系，若以强力的存否为断，那就是被动，不是自由；可以说是压服，不能说是悦服。压服的事，由于强力；悦服的事，由于意志；被动的事，操之自人；自由的事，主之自我。人为主动以施压服于己的强力一旦消灭，换句话说，就是非心服者的抵抗力一旦充足，服从的关系，将与之俱去。若说这种强力，必待所谓被治者的“自由认可”表示以后，始能发生，那么这种强力，不是多数人合致的强力，乃是多数人与少数人合成的国民公意。这种伟大的强力，实为人民全体的“自由认可”所具的势力；而人民全体的“自由认可”，决不是这种伟大的强力压迫的结果。我尝说过，“多数政治”不一定是圆满的“平民主义”的政治，而“自由政治”（Free government）乃是真能与“平民主义”的精神一致的。“自由政治”的神髓，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而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态度，为充分的讨论，详细的商榷，求一个共同的认可。商量讨论到了详尽的程度，乃依多数表决的方法，以验其结果。在商议讨论中，多数宜有容纳少数方面意见的精神；在依法表决后，少数宜有服从全体决议的道义。“自由政治”的真谛，不是仗着多数的强力，乃是靠着共同的认可。取决多数不过是表示共同认可的一种方法罢了。由专制向“平民主义”方面进行，多数表决正是屏退依力为治而代之以起的方法。欧美有句谚语：“计算头颅胜于打破头颅。”（It is better to count heads than to break

heads.)正好说明这个道理。威氏又说：“今世常说‘舆论政治’‘民声政治’，这些名词，于描写发达圆满的平民政治容或有当，然在今日，那作成舆论的多数所恃以制胜者，不在少数的理屈，而在少数的数弱。换句话说，就是多数所以排斥少数，不特用他们众多的声音，并且靠着他们众多的势力。这是很明了的事实，不容讳言的。多数所以能行其统治，不是他们的智慧使他们能够如此，实在是他们的势力使他们能够如此。多数党苟欲把他们的意见致之施行，他们所需的势力，与专制君主所以压服其民众的，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由威氏之说，可以反证出来今日所谓自由国家的平民政治尚未达于发达圆满境遇的事实，而切不可由此遽以断定真正平民政治的基础，亦在多数之强力。若把平民政治，亦放在“力的法则”之下，那所呈出的政象，将如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云：“虽有民主，而操权力之国民与权力所加之国民，实非同物。其所谓自治者，非曰以己治己也，乃各以一人而受治于余人。所谓民之好恶，非通国之好恶也，乃其中最多数者的好恶。且所谓最多数者，亦不必其最多数，或实寡而受之以为多。由是民与民之间，方相用其劫制。及此然后知限制治权之说，其不可不谨于此群者，无异于他群。民以一身受治于群，凡权之所集，即不可以无限，无问其权之出于一人，抑出于其民之泰半也。不然，则泰半之豪暴，且无异于专制之一人。”“夫泰半之豪暴，其为可异者，以群之既合，则固有劫持号召之实权，如君上之诏令然。假所谓诏令者，弃是而从非，抑侵其所不当问者，此其为暴于群，常较专制之武断为尤酷。何则？专制之武断，其过恶显然可指；独泰半之暴，行于无形，所被者周，无所逃雪，而其入于吾之视听言动者最深。其势非束缚心灵，使终为流俗之

奴隶不止。”(从严译)专恃强力的政治,不论其权在于一人,抑在于多数,终不能压服少数怀异者的意思,其结果仍为强力所反抗,展转相寻,无有已时。“平民主义”的政治,绝不如是。现代的“平民主义”,已经不是“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的政治”(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而为“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的执行”(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不是对人的统治,乃是对事物的管理。我们若欲实现“平民主义”,不必研究怎样可以得着权力,应该研究怎样可以学会管理事物的技术。

(五) “平民主义”与解放及联治

现代政治或社会里边所起的运动,都是解放的运动。人民对于国家要求解放,地方对于中央要求解放,殖民地对于本国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解放,农夫对于地主要求解放,工人对于资本家要求解放,妇女对于男子要求解放,子弟对于亲长要求解放。这些解放的运动,都是平民主义化的运动。

有了解放的运动,旧组织遂不能不破坏,新组织遂不能不创造。人情多为习惯所拘,惰性所中,往往只见有旧的破坏,看不见新的创造,所以觉得这些解放的运动,都是分裂的现象。见了国家有人民的地方的解放运动,就说是国权分裂了;见了经济界有农夫、工人的解放运动,就说是经济的组织分裂了;见了社会里、家庭里有妇女或子弟的解放运动,就说是社会分裂了,家庭分裂了;见了这些分裂的现象,都凑集在一个时代,凡在这个时

同团结。这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这两种运动，似乎是相反，实在是相成。譬如中国的国旗，一色分裂为五色，固然可以说他是分裂，但是这五个颜色排列在一面国旗上，很有秩序，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成了一个新组织，也可以说是联合。北京正阳门的通路变少为多，妇人的髻、女孩的辫变奇为偶，一面固可以说是分裂，一面又是联成一种新组织、新形式，适应这新生活，表现时代精神的特质，发挥时代美。中国大局的分裂，南一国会，北一国会，南一政府，北一政府。俄国当此社会根本改造的时候，这里成立一个劳农苏维埃共和国，那里成立一个劳农苏维埃共和国，一时也呈出四分五裂的现象。奥国、匈国、德国都是这样；一方面象是分裂，一方面方在改造一种新组织。这种新组织，就是一个新联合。这新联合的内容，比从前的旧组织更要扩大，更要充实；因为个人的、社会的、国家的、民族的、世界的种种生活，不断的发生新要求，断非旧组织旧形式所能适应的，所能满足的。今后中国的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不能把其他四族作那一族的隶属；北京正阳门若是照旧只留一条路，那些来往不绝的车马，纷错冲突，是断乎不能容纳的。方今世界大通，生活关系，一天比一天复杂，个性自由与大同团结，都是新生活上新秩序上所不可少的。联邦主义于这两点都很相宜。因为地方的、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单位，都和个人一样，有他们的个性；联邦主义能够保持他们的个性自由，不受他方的侵犯。各个地方的、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单位间，又和各个个人间一样，有他们的共性，联邦主义又能够完成他们的共性，结成平等的组织，确合职分的原则，达他们互助的目的。这个性的自由与共性的互助中间的界限，都以适应他们生活的必要为标准。

照此看来，联邦主义不但不是分裂的种子，而且是最适于复合、扩大、殊异、驳杂生活关系的新组织。许多的国家民族间，因为感情、嗜性、语言、宗教不同的原故，起过多年多次的纷争，一旦行了联邦主义，旧时的仇怨嫌憎，都可涣然冰释。看那英人与法人有几世的深仇，当那英国的政治家引诱坎拿大人创造一种联邦，确定地方自治权的时候，英法二民族间也曾起过战争；到后来坎拿大行了联邦主义，法国人的坎人变成了忠于英国的人民，英国人的坎人，亦甘愿服从法人为坎人的首领，两个民族却相安无事了，他们激烈的冲突，就是这样了结。有一位劳利耶翁 (Sir Wilfred Laurier) 是法国的旧教徒，多年居坎拿大的政枢，到了英国各部间起了巩固结合运动的时候，大家都承认这位法国人的坎拿大政治家是热心英国联合巩固的一个重要人物。再看那南非洲的英国人与荷兰人也曾起过复仇的战争，一旦有了联合，作自治的基础，那英、荷二国人就和好如初。勃亚人 (Boers) 因为享了点比较的自治的生活，也就忠于英国政府了。中国自改造共和以来，南北的冲突总是不止；各省对于中央，亦都不肯服从；那蒙、藏边圉，不是说自主，就是说自治。依我看来，非行联邦主义不能造成这个新联合。又如，俄国那样大的领域，那样杂的民族，想造成一种新联合、新组织，亦非行联邦主义不可。果然这新造的俄罗斯社会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亦是一种联邦的组织。象俄国这种联邦共和，就是一个俄国各部及各族的劳动者的自由联合。他与英国的联邦、瑞士的联邦迥乎不同。俄国的联邦苏维埃共和，是由俄国各部劳农组织而成的社会共和，倘为苏维埃所联合的各部分的劳农想互相分离，无人可阻当他们这样做法。但是英国的联邦，还是靠着强力来维持的。

英国对于非洲、亚洲、澳洲的人民及勃亚人，多少还是有些压服的关系。就是爱尔兰的自治运动，新芬党亦曾费了多年努力奋斗的工夫，才能脱了英国的一半的羁绊。英国资本家今尚夸言，我们有一联邦，就是万邦联合国。但是不论何时，倘若这联邦的人民，想离不列颠的压迫，那不列颠的中级社会，将用武力征讨他们。从前对于美国，最近对于爱尔兰和印度，都是明显的例证。英国的联邦组织，将来必不免有些变动。瑞士的联邦共和，是一个许多的“康同”(Cantons)的联合。但这联合亦是靠兵力造成的。瑞士的“康同”，苟有欲与瑞士脱离关系的，必遭瑞士共和军的讨伐。大战终结后，奥、匈也改成民主联邦了。德国的联邦，原来是几个君主组织的，够不上称为纯粹的联邦。经过这一回的革命，把那些君主皇族总共有二百七十八人，一个一个的都驱逐去了。那普鲁士的霸权，也根本摧除净尽，才成了真正的民主联邦。美国是一个纯正的民主联邦国，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可以断言现在的世界，是联邦化的世界，亦是“平民主义”化的世界；将来的世界组织，亦必为联邦的组织，“平民主义”的组织。联邦主义，不过是“平民主义”的另一形态罢了。

(六) “平民主义”与国际运动

上古时代，人与人争，也同今日国与国争全是一样。以后交通日繁，人人都知道长此相争，不是生活的道路，于是有了人群的组织。到了今日，国际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多，你争我夺，常常酿成大战，杀人无算，耗财无算，人才渐悟国与国长此相争，也不是生活的道路，种种国际主义的运动于是乎发生。现代国际主

义的运动，可大别为二类：一类是中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运动，象那盎格鲁日尔曼协会、盎格鲁奥特曼协会，是为增进国际上友谊的团体；象那海牙平和会议、海牙仲裁裁判、新世界共和国代表五年会议、平和与自由同盟、妇人同盟、基督教联合同盟、民族联合同盟、威尔逊提议的国际大同盟和这回哈丁氏提议的太平洋会议等国际的组织，不是为反对战争，就是为解决国际间的纠纷问题。有些人对于这种国际主义的运动，抱很大的希望，以为有了增进国际间友谊的、解决国际间纠纷问题的、反对国际战争的的国际的团体，那国际间的误解与战祸，自然可以减免很多。特别是对于威尔逊提议的国际同盟，希望更大，以为这种组织，便是世界的联邦的初步。本来邦联与联邦的区别，不过程度上的差异，邦联就是各独立国为谋公共的防卫、公共的利益所结的联合，加入联合的各国，仍然保留他自己的主权。这联合的机关，全仰承各国共同商决的政策去做。古代希腊的各邦，后来瑞士的“康同”，德国的各邦，美国的各州，都曾行过。联邦就是一国有一个联合政府，具有最高的主权，统治涉及联邦境内各邦共同的利益，至于那各邦自治领域以内的事，仍归各邦自决，联合政府不去干涉。那采行一七八九年宪法以后的美国，采行一八四八年宪法以后的瑞士，都是此类。美国的联邦，是由一七八九年以前各州的邦联蜕化而成的。这邦联是由一六四三年四个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同盟蜕化而成的。将来世界的联邦，如能成立，必以这次国际同盟为基础。由现在的情势看，恐怕这只是一种奢望。资本主义存在一天，帝国主义即存在一天。在帝国主义冲突轧轹之间，一切反对战争的企图，都成泡影，一切国际的会议，都不过是几个强国处分弱小民族权利分配的机关罢了。帝国主义之

下，断没有“平民主义”存在的余地。不是“平民主义”的联合，决不是真正的联合。一类是劳动阶级的国际主义的运动。这种运动，与中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运动大异其趣。他们主张阶级争斗。他们不信并且不说“全人类都是兄弟”。必欲讲这一类的话，只可说“全世界的工人都是兄弟。”劳动阶级的国际主义，不是为平和，乃是为战争。他们全体有一个国际的公敌，就是中产阶级。这一阶级，遇有必要，都联合起来，和劳动阶级宣战。象那毕士麦助捷尔士(Thiers)反对巴黎的康妙恩(Commune of Paris)，象那德国和协约国联合反对俄国的布尔札维克(Bolshevik)，都是显例。劳动阶级为对抗中产阶级的联合，必须有一个劳动阶级的国际联合。不但于日常发生的产业的争议，和防止国外破坏罢工同盟的人，这种联合很是有用，就是在革命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工人，亦能阻止他们的执政者予革命成功的地方以打击。劳动阶级的国际主义，其目的不在终止战争，而在变更战争的范围，而在使战争不为国家的，而为阶级的。他们认战争不是恶性的结果，不是国际间误解的结果，乃是现代帝国主义的结果。这帝国主义，在他的基础上，是经济的，和资本主义有不可分的关系。战争必到资本家阶级停止存在的时候，才能绝迹。劳动阶级的国际团体，有一八六四年成立的“第一国际”(The First International)，巴黎康妙恩失败后，渐归渐灭；有一八八九年成立的“第二国际”(The Second International)，至一九一四年，停止了他的存在；有一九一九年成立的“第三国际”(The Third International)，现方蓬蓬勃勃势力日大，组织亦比从前的国际团结愈益巩固，愈益完密，有常设的执行委员会。这两种国际主义的运动，——即是中产阶级的国际联盟与

劳动阶级的第三国际，——必有一种为将来国际大联合的基础的。看现在的形势，后者比前者有望的多。

本于专制主义、帝国主义的精神，常体现而为“大某某主义”(Pan……ism)。持这个主义的，但求逞自己的欲求，以强压的势力迫制他人，使他屈伏于自己肘腋之下。这样的情形，在国家与国家间有，在民族与民族间有，在地方与地方间有，在军阀与军阀间有，在党派与党派间亦有。于是世界之中，有所谓“大欧罗巴主义”，有所谓“大美利坚主义”，有所谓“大亚细亚主义”；欧洲之内，有所谓“大日尔曼主义”，有所谓“大斯拉夫主义”；亚洲之内，亦有所谓“大日本主义”；近几年来，中国之内，亦有所谓“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同在北方主义之下，亦有两种以上的大某某主义在那里暗斗；同在西南主义之下，亦有两种以上的大某某主义在那里对峙。以欧战的结果，和中国的政情来看，凡是持大某某主义的，不论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个军阀，一个党派，一个人，没有不归于失败的。反乎大某某主义的，就是“平民主义”。故大某某主义的失败，就是“平民主义”的胜利。一个是专制主义，一个是自由主义；一个尚力，一个尚理；一个任一种势力的独行，一个容各个个体的并立。凡是一个个体，都有他的自由的领域。倘有悍然自大，不顾他人的自由，而横加侵害的，那么他的扩大，即是别人的削小；他的伸张，即是别人的屈辱；他的雄强，即是别人的衰弱；他的增长，即是别人的消亡。一方的幸运，即是他方的灾殃；一方的福利，即是他方的祸患。那扩大、伸张、雄强、增长、获幸运、蒙福利的一方，固然得了，然而在那削小、屈辱、衰弱、消亡、罹灾殃、受祸患的一方，其无限的烦冤，无限的痛苦，遒郁日久，亦必迸发而谋所

以报复与抵抗。且人之欲大，谁不如我，苟有第二个持大某某主义的来与他争大，按之物莫能两大的道理，争而失败的，二者中间必有一个。故持大某某主义的，不败亡于众弱的反抗，即粉碎于两大的俱伤，其结果必失败于“平民主义”之前而无疑。

(七) “平民主义”的开端

在妇女没有解放的国家，绝没有真正的“平民主义”。现代欧美号称自由的国家，依然没有达到真正的“平民主义”的地步，因为他们一切的运动、立法、言论、思想，都还是以男子为本位，那一半的妇女的利害关系，他们都漠不关心。即使有人对于妇女的利害关系稍加注意，那人代为谋的事，究竟不是真能切中妇女们本身利害的，决不象妇女自己为谋的恳切。“人民”(People)这个名词，决不是男子所得独占的，那半数的妇女，一定亦包含在内。从前美国女权运动的领袖，主张妇女应有参政权的原因，就是根据《美国独立宣言》的精神及《北美合众国宪法》的解释。他们说在《美国宪法》里，实无一语一句，拒绝妇女在州或国的选举权。《美国宪法》的前文有云：“我们合众国的人民……为北美合众国制定此宪法。”(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do ordain and establish this Constitu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这“人民”(People)里，当然包有妇女在内。那么人民在宪法上应享的权利，妇女当然和男子一样享有。这是他们的堂堂正正的理由。费烈士(Brougham Villiers)说：“纯正的‘平民主义’不是由男子所行的民主民权的政治，是由人民全体所行的民主民权的政治。”(The formula of democracy is not gov-

ernment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men but by the people) 费氏郑重的申明“不是由男子所行的”，“乃是由人民全体所行的”，就是主张男女两性在政治上当有平均发展的机会。社会上一切阶级，都可以变动；富者可以变为贫，贫者亦可变为富；地主与资本家可以变为工人，工人亦可以变为地主资本家。社会若经适当的改造，这等阶级都可归于消泯，惟独男女两性，是个永久的界限，不能改变。所以两性间的“平民主义”，比什么都要紧。况且“平民主义”，本是母权时代的产物，故平民主义为女性的。后来经济上生了变动，母权制渐就崩坏，“平民主义”即随之消亡。父权制——男性中心的家族制——继之而起，专制主义于是乎产生，故专制主义为男性的。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只有男子活动的机会，把那一半的妇女关闭起来，不许伊们在社会上活动，几乎排出于社会的生活以外，那个社会，一定是个专制、刚愎、横暴、冷酷、干燥的社会，断没有“平民主义”的精神。因为男子的气质，有易流于专制的倾向，全赖那半数妇女的平和、优美、慈爱的气质相与调剂，才能保住人类气质的自然均等，才能显出真正“平民主义”的精神。中国人的一切社会生活，都是妇女除外，男女的界限，异常的严，致成男子专制的社会。不独男子对于女子专制，就是男子对于男子，亦是互为专制。社会生活的内容，冷酷、无情、干燥、无味，那些平和、优美、博爱、仁慈的精神，没有机会可以表现出来。若想真正的“平民主义”在中国能够实现，必须先作妇女解放的运动，使妇女的平和、美、爱的精神，在一切生活里有可以感化男子专暴的机会，积久成习，必能变化于无形，必能变专制的社会为平民的社会。没有“平民主义”化的社会，断没有“平民主义”的政治。

世界各国的女权运动，本有很长的历史。先驱者的责任，早已落在高加索人种(Caucasian Race) 妇女的头上，就中尤以美国的妇女为最活泼猛进。在伊们指导之下，成立了许多的妇女团体。一八八八年成立的妇女国际会议，及国际妇女参政权联合会等国际的联合，都多赖美国妇女的尽力。但女权运动的成功，则以北欧诸国为最早。一九〇一年诺威的纳税妇女，已取得市政机关选举权。至一九〇五年，诺威离瑞典而独立，妇女运动，益见进步。一九〇七年，诺威的纳税妇女，取得了中央议会选举权。芬兰的妇女，自一八六七年，妇女即取得地方机关选举权，至一九〇六年，地方与中央各项议会，均与男女以同等的普及的选举权。一九一〇年，中央议会选举时，男女投票的人数几乎相等，妇女当选者十七人，约当男议员十分之一。丹麦的妇女，于一九〇八年，取得地方机关选举权。一九一五年，丹麦新宪法又与妇女以中央选举权及被选举权。该宪法规定凡品行端正的女子及男子年满二十五岁者俱有参政权。一九一八年，丹麦举行议会选举时，妇女参加选举者为数很多，当选者共有九人。瑞典的妇女，未婚而纳税至若干额以上者，于一八六二年，即取得地方选举权。至一九〇九年，一切品行端正的妇女，对于地方机关俱享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一九一八年英国的新选举法，以中央议会选举权授与妇女。按照这新选举法，凡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殆皆享有选举权，妇女则须年满三十且有独立住所者，始有选举权。一九一八年，英国议院又通过一个《妇女资格赋与案》(《Qualification of Women Act》)，承认妇女与男子对于中央议会有同等的被选资格。是年十二月，中央议会选举时，妇女投票，甚形踊跃，有些选区妇女投票者竟多于男子。但

通国当选的妇女，只有一位爱尔兰女子，且因伊是新芬党人，有政治革命的罪案，虽当选而无效。英领纽吉兰(New Zealand)自一八八三年，凡成年的妇女，俱得本邦中央议会的选举权。澳洲亦自一八九五年以来，各邦陆续授妇女以选举权。至一九〇八年，各邦妇女对于中央议会，与男子享有同等的选举权。但纽澳各邦的妇女被选举权，大都尚未取得，故该处的妇女参政运动，尚在激烈进行中。美国自一八六九年至一九一七年，共有十九州妇女得有选举权，至一九一八年正月，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一种宪法修正案，明定“联邦及各州选举权不得因男女的差别而有歧异”。这修正案于一九一九年通过联邦参议院，于一九二〇年得联邦各州全体的四分之三以上的批准，美国各州的妇女，遂与男子有同等的选举权。一九一八年，苏维埃俄罗斯社会联邦共和国的新宪法，承认男女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九一九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宪法，承认男女完全平权。那一年的联邦议会的选举，妇女当选者有三十六人，有二十一人属于社会党。一九一九年奥国国民制宪团体中，已有女代表参加。瑞士的各“康同”中，亦有以参政权授与妇女者。一九一九年五月，法国众议院亦曾通过一案，承认妇女与男子享有同等的选举权，但未得上院通过。中国广东、湖南、浙江等省制定省宪，亦规定了男女平权。这种运动，都与普通选举运动同是向“平民主义”进展的运动。

自劳农俄国成立后，政治学者乃为这种新式的政治，立了一个新名词。这新名词，就是“工人政治”(Ergatocracy)。这个名词，创立未久，在字典上还没有他的地位。创造此新语，亦须借重于丰富的希腊语源。希腊语 Ergates，意即“工人”(Worker)；

与 cracy (Rule) 相联缀, 训为“工人的统治”(Worker's rule)。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 这种政治, 的确含有统治 (Rule) 的意味, 而且很严, 大权集于中央政府, 实行统治别的阶级, 这就是以一阶级的权力, 替代他一阶级的权力, 以劳工阶级的统治, 替代中产阶级的少数政治 (Bourgeois oligarchy)。这是在革命期间必经的阶级。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经过, 那 Ergatocracy 一语中的要素 (cracy) 的意义, 将生一广大的变动。原来社会主义的目的, 即在破除统治与服属的关系。故当中产阶级平民政治的特色私有的规制完全废除至全失其复活的可能, 社会主义的精神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普及于一般的时候, 真正的“工人政治”, 便自然的实现。那时事物的管理, 代替了人身的统治, 因为除去老幼废疾者外, 人人都是作事的工人。这种政治, 就是为工人属于工人, 而由工人执行的事物管理。这里所谓工人, 当然没有男女的差别。随着阶级的消灭, 统治与服属的关系亦全然归于消灭。

“工人政治”, 亦是本于“平民主义”的精神而体现出来的。故有人说这“工人政治”, 才是纯化的“平民主义”、纯正的“平民主义”、真实的“平民主义”。而列宁氏 (Nikolai Lenin) 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在莫斯科 (Moscow) “第三国际”大会里演说, 亦曾极力辨明中产阶级的“平民主义” (Bourgeois democracy) 与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 (Proletarian democracy) 的区别。后来又在他的“国家与革命”并别的著作里, 屡屡赞美这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可见“工人政治”, 在本质上亦是“平民主义”的一种。共产主义的政治学者, 所以必须另立新名的原故, 乃是因为“平民主义”的名词, 已为资本主义的时代用烂了, 已为

卑鄙的使用玷污了。是“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意思。鲍洪氏(Bohun)劝告他的同志们说：“不要再说‘平民主义’了。你们想你们是平民主义者么？但是你们不是的。你们想你们要‘平民主义’么？但是你们不要的。你们是工人政治派，你们要工人政治。‘平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破烂时期的方法，是一个被卑鄙使用玷污了的名词。留下‘平民主义’这个名词给自由派的中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中的无信仰者用罢。你们的目的是工人政治。”这几句话，可以表明他们的态度，可以表明他们避开“平民主义”一语的理由。

(八) 总 结

总结几句话，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凡具有个性的，不论他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地域，是一个民族，是一个个人，都有他的自由的领域，不受外来的侵犯与干涉，其间全没有统治与服属的关系，只有自由联合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才是平民的社会；在这样的平民的社会里，才有自由平等的个人。

1923年1月《百科小丛书》
第15种，商务印书馆出版
署名：李守常

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

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大别为理想派与科学派。无论为理想派为科学派，均相信有一个新时代存于将来。这个新时代，就是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欧文说：“过去的历史，都只以示人间的非合理性，我们今才向理性的曙光进展。”是欧文理想中的新时代，乃为合于理性的时代。马克思说：“人类的前史，都是阶级争斗的历史。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演成最后的阶级战争。人类的前史，就随着阶级告终。”是马克思理想中的新时代，乃为阶级消泯的时代。马克思一派的经济的历史观，尤能与人以社会主义必然的实现的确信。

欧洲大战酿成荒乱的现象。这种荒乱的教训，及荒乱复兴的预防，使人发不可不急谋改造的深省。改造的新局面，必为带着社会主义的倾向的局面，是确切无疑的。改造的机运，虽然日形迫切，而改造的方案，则于一般人的意想中尚欠明了。一般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组织既不明瞭，而社会主义者亦因制度的复杂，又把实现此主义的障碍看得过大，致使社会主义的运动遭过困难。免除这些困难，是社会主义者的责任。

* 本篇是在北大经济学会的讲演。——编者

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经过三阶段：一、政权的夺取；二、生产及交换机关的社会化；三、生产分配及一般执行事务的组织。

政权的夺取，有两种手段：一是平和的，一是革命的。采取平和的手段，大抵由宪法上、议会上着手。但是因为战争的影响，农民渐富，他们都不愿牺牲他们偶得的富裕，其他商人反动派及政府，均能与此运动以莫大的障碍，任你社会主义者如何宣传，终不能使选民及代议士都变成社会主义者，故此种运动常归于失败。有许多社会主义者鉴于平和的手段的失败，乃悟改造的事业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革命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这种革命的运动，有失败的，有成功的。失败的如德奥是，成功的如苏俄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布尔扎维派的新发明。一八七五年马克思论《Gotha Programme》的信里说过：“在资本主义者的社会与共产主义者的社会间，有一个由此入彼的革命的过渡时代。适应乎此，亦有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当此时期的国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济组织是怎样呢？

（一）生产交换机关的社会化

除去一部分的有土农夫，凡大资本的企业：铁路、矿山、轮船公司、承办运输事业、大规模的制造业、大商店，收归国有，在人民会议代表人支配之下，照常办理。

自国家银行以下所有的银行，均收归公有，而停止其从前的业务，有限的归于消灭。因为信用机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久已不必要了。

中间的中介人、代理人一类的职业均被抑止。

小工商业及运输机关，亦渐次收归国有。

生产行于大工厂。分配集中于大中心。市场运输归于国营。在被抑止的企业里的雇工，转业于国营的生产事业及分配事业。

除去有土农夫所有的土地以外，土地亦收归国有。但在新组织之下，他种职业未觅得以前，此项农民仍准续理前业。

住房由地方会议遵照中央会议的条例执行，将来设专机关管理之。

(二) 生产的组织

私营的生产机关既经废止，一切生产事业都归国营，则小工厂都合并于大规模的工厂，俾收事半功倍的效果。从前私营的经济组织之下，有许多很重要的生产事业，或因利益不多，或因效果难期，而置之不理者，今则国家都一律举办，依极经济的组织与方法，把资本、劳力与天然均成经济化，利用自然力开发富源，俾利国用。有需国际的共营的事业，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间亦可共同举办，但此实有利无害，断非现在什么中日合办、中英合办的种种事业可比。在这种经济组织之下，无论工农生产事业均渐扩大，生产自然增加。此时最经济的运输法日渐扩张，既便于材料的供给，又便于成品的分配，于生产事业、分配事业均有利益。

社会主义的精神，固极主张民族自决。倘使经济情形已能自立，如印度、朝鲜等，自应任其自主。而若经济进化过于低浅，苟非于经济上助其开发则永不能达于自决的境界，社会主义

的国家当然有提携掖进的义务。近来有人大惊小怪的说有社会主义的侵略，这话大错，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能有侵略的意味。社会主义的国家间，苟有旷土，不许闭户自封，依社会主义的民族平和的解决。

社会主义之所成，就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下 尽资本主义的强度，亦断不可能。其原因有四：（一）小企业报酬少；（二）经过多次中介人、代理人的消磨；（三）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无政府的，不能齐一努力；（四）资本主义的目的在于得利润，有许多公用的大事业，利润相离太远，不确定而不充分。

此时除去用于必要的生产的工作以外的剩余工作，可用以美化人们的生活。过劳的工时可以缩减，使得复苏娱乐的机会。此时科学上有所发明普及的工人，才能得到他的惠利，以代少数人享福、使多数人失业或受伤的结果。

（三）劳动的组织

工人执政后，工联没有存在的必要，可以合作替代之。工人虽执掌政权，但实际上不能指挥工师、技匠、实业家。此时阶级既废，好意的前资产阶级自当许与合作。

社会主义的制度，是以事物的管理代人的统治的制度。此时所欲解决的，不是政治问题，乃是经济问题。所以农部委员必集合农业专门家，组织高等会议，分部实行指导农民，以图农业生产的改进。工部委员及其他委员亦然。

(四) 分配的组织

生产品不就是为了消费的，有直接分配于消费者，有分配于他业者。后者不过记一记账，前者则须代价。金银纸币流行，可以换取所需的物品。

国家将生产品经过一回中心市场，使有货币者得以换取所需的物件，售价适应于此期流行的货币。

生产为消费者的需要所轨制，计算应绰裕一点。国家用科学的方法，制定工作日的期间，使生产恰合于公众的需要。

每月支用货币的项目：一、薪俸，二、恤金（鳏、寡、孤、独、废疾者），三、前资产阶级的年金赔金，四、农产物的代价。

假定甲，付直接生产消费品者，及乙，付生产农作品者，共计三十亿。a 付生产交给他业的物品者，b 社会恤助金，c 付前所有者，共计二十亿。（一个月）那么，那些生产品的总售价应定五十亿。国家银行每月应筹五十亿货币，国家物品所每月应备价值五十亿的物品。定物价的标准，应以生产费并加生产费的三分之二，譬如一百二十元的生产费，应加入八十元为二百元；五十四元的，应加入三十六元为九十元。

以上所述，是社会主义下经济组织的要点。其余关于经济的问题尚在多，如外国贸易及租税信用等问题，俟后有机会时再与诸君共同研讨之。

1923年1月16日
《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

署名：李守常

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康妙恩”*

(五十年的回顾 社会革命的先声)

(一九二三年二月)

距今恰恰五十年,就是一八七一年的三月十八日,巴黎人民起来反抗一个卖国的政府,并且宣告了市府的独立、自由、自主。

这回中央政府的推翻,并没有经过普通革命的阶段,没有动炮火,没有流血。当人民武装起来、出现于街衢间的时候,那一班统治者早已逃走,政府的军队早已退出巴黎城,那民政官吏们早已携着他们所能携的东西急忙退到卧塞儿(Versailles)城去了。这样演成的变动,巴黎的人民在“巴黎康妙恩”(The Commune of Paris)名义之下开始了一个自由的新时代。

这个事变是起在普法战争将要终结的时候。普法战争的发生,固然不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而由经济上去解释,这次的战争实是两个资本主义国的斥埃战。法国对普宣战是在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五日,普国得德意志联邦各州的援助,军势非常的浩大,以数计之,约有八十五万人,一举而侵入法境,连战连捷,围拿破仑于塞塘,由开战之日起不过六星期间,使拿破仑不能不树降旗。

* 从文章的内容看,此文当始作于一九二一年。——编者

九月四日此消息传到巴黎，政府惊愕万状，巴黎的群众则在卜郎魁派(Blanquists)导率之下，占领了下院，宣布共和，于是中产阶级共和党和温和的共和党出而组织政府，但普军乘胜仍长驱而围攻巴黎。

当时法国正在产业发达的过渡期，各阶级间的利害关系极其复杂，农民军队和大资本家结为王党，都会的小工业者和工人则结为共和党。共和党中又分为绅士阀、急进的议会派共和党、工人半革命的共和党和极左派的共产主义共和党(卜郎魁派)。当帝政废止的时候，率领群众执行直接行动的是极左派，而政权则落于右翼的共和党手中。

法国国民自卫的政府方在游戏的时候，巴黎已被围困，继续着到了冬天，政府的防备极其缓慢，似乎他怕劳工阶级的实力比怕德军的侵入还甚。劳动阶级才悟新政府与旧政府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屡谋颠覆之，而“康妙恩”遂渐接近。

在巴黎“康妙恩”的大悲剧以前，巴枯宁预备了一个喜剧的揭幕者。无政府主义并不奇怪，这里昂(Lyons)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康妙恩”才是奇怪。一八七〇年，巴枯宁(Bakunin)、李嘉德(Albert Richard)同着布澜(Gaspard Blanc)带了很多的徒党，侵入了里昂，占据了里昂市政府(Lyons Hotel de Ville)，宣告国家已被废止，地方工厂的工钱提到一日三佛郎，然而还未出这一天，这国家已以中产的国民军的形式回来了，巴枯宁派遂从那里逃走了。这一幕喜剧就是这样的告终。

次年(一八七一)一月二十八日，政府私与普军结休战条约。正在爱国的愤怒中的巴黎，以是被激怒了巴黎国民军(民主的组织成的市民军)，认为卖国而大起反对。二月八日，一个缔

结平和的议会被召集了，介尔士(Thiers)实执其牛耳。这个会议议定的临时和约，于二月二十六日在卧塞儿签字，普法战争算是告结束了。

新选的国民议会，只巴黎及其他二、三都会，共和党占优势，此外各地方则到处都是王党占了胜利，七百议员中王党占四百五十人。新就政府首位的介尔士得国民议会的承认，采取巴黎与地方间的分离政策。他先任命复辟派的将军为巴黎国民军司令官，国民军则表示反对，而自选中央委员会以指挥权畀之，拒受将军的命令。议会方面则拒绝共和国的承认，把首都由巴黎迁到卧塞儿，制定种种法律，在经济上予以重大的打击，劳工阶级的生计全失，巴黎破产革命的机运迫在眉睫了。

三月十七日介尔士密令他的部将夜袭国民军，而谋取他们的大炮，并占领城中各要地。按照与普军订立的休战条约，大炮应交普军，而国民军不肯。只把这大炮夺去，介尔士便可以把国民军打得粉碎，以后便可以高枕无忧了。鲁昆德将军受了密令，三月十八日拂晓率步兵一联队并补充军队攀登坂道，夺取大炮，午前六时果然没有什么抵抗，便把那有名的大炮捕获了。是三月的早晨，寒光凛冽，街上没有人影，所以没有什么人知晓，这大炮便眼看着要被他们搬去了，但是大炮很重，没有马，亦没有炮车，由高坡往下运很是费事。此时红日东升，街上渐有人影，其中亦有在袭击的时候仅免于难的国民军兵士。到了七点半钟的时候，教会的钟丁丁的乱打，沉默忽然破了，在丘陵的麓际召集国民军的大鼓亦冬冬的响了，喇叭的声音亦起来了，一刹那间国民军出现了，驰马身着武装，整队而行，鲁军的周围看热闹的人们多是妇女与小孩，象黑山一般的来相集合。

声势汹涌的群众两次为鲁军所威吓而退，那中间队伍有为群众遮断者。鲁昆德将军大惊，随即发令向群众开炮。兵士方在踌躇，群众中的妇女此时喊着，向兵士说，“诸君，向我们、向我们的丈夫和小孩开炮吗？”士官威吓伊们，忽有一军曹喊着说，“弃了武器吧！”鲁军皆弃武器，群众喊声大震，而突进鲁军与国民军握手了，这是午前九时的事。

鲁将军被捕了。午后在解往他处的途次为震怒的群众所杀。攻击巴黎的总司令威诺阿见势不佳，狼狈而退，逃向塞奴河对岸去了。政府当局者惊愕不知所措，仓皇向卧塞儿逃走。

巴黎政府的官吏逃走后，经了二、三日的混乱，国民军的中央委员会以外没有权威了。但他们未能理解这新事实的意义，中央委员会下给总司令刘立耶(Lullier)的命令极其普通，不顾那命令怎样能够实行，所以刘司令不能闭塞城门，不能解散反革命团体，不能占领扼巴黎西部的洼雷里昂要塞(Mont Valérien)。委员会到二十一、二日顷，尚不自觉他自己是唯一的巴黎的支配者，看他为那替政府谋画的市长等所操纵，便可以知道他是怎样的旁观，怎样的没有组织的权力了。委员和市长等商量举行巴黎市会的选举，极力置重和他们一致，至任他们把那选举延期到二十六日。当这委员会忙着去图保持法律形式的时候，失了正好占领巴黎各要塞的机会，那卧塞儿的政府常是比他们的反对党——劳工阶级——觉悟的快的多。介尔士很喜欢巴黎的委员会以种种交涉自为消遣，他好可以有功夫去预备军队，使与外界隔离，以适宜的政策用心训练。当他这些准备将要完成的时候，他静以待时。但他似已早有决心去行一回大杀戮，即使他弄弱了，他以杀戮还答巴黎“康妙恩”自治体宣言的决心，那个议会在

那里亦必使他为此，在那个时候那个议会几乎以一动物园自居了。

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巴黎市会选举办完了，结果革命党占绝对的多数。其中有十一位是第一国际党员，取名为 Commune 掌握政权。Commune 者，法国市町村等自治体的通称，唯在巴黎，他是可以令人想起有一七九二年的光荣的历史的“康妙恩”，于多数民众，是有“对于君主政治的民主政治、对于专制的自治”的意味的。

然在少数共产党的心中藏了新观念，只此新观念才是“康妙恩”的真髓。“康妙恩”就是劳动者的共和国。巴黎的全劳动阶级、小商人，和当时尚在无产阶级的地位的手工业者，都有把政权握于自己手中的觉悟。“康妙恩”尚未成立前的三月二十日的官报有云：

“巴黎的无产阶级确认在支配阶级的失政与背信中，自己等当取公事的指挥以救济时局的时机来了。……无产阶级知道正逢对于他们的权利的永久的威胁，正当的热望的绝对的拒绝，并祖国及其一切的颓废，执权力而自握其命运于掌中，且确操其胜算，是其无上的义务、绝对的权利。”

劳动者握权力的事情——这就是“康妙恩”。因此“康妙恩”才是伟大，于支配阶级才是危险，因此他还有生机而为历史所记忆。

“康妙恩”被宣告的三月二十六日，幸福与再生的洪涛吞没了巴黎，欢喜的热情扩张及于资产阶级，劳动者、资本家都是欢天喜地的，见过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的老人喜极而悲，至于咽泪。是青年，是妇女，是小孩都高兴的了不得，花也撒开了，赤旗也翻

开了，歌声震天，似乎自由平等的新生活马上就要开始了。卧塞儿的侦探看见这种情形，报称巴黎以“康妙恩”发狂了。

巴黎“康妙恩”的宣言影响于法国各处，引起革命的运动有好些地方，都一样的为“康妙恩”的宣告，但都因受不住政府的压迫，次第解散了，就有一二处竭力抵抗，到了四月五日亦都不能支持了。

当时介尔士身居卧塞儿，亲自指挥一切，努力于反革命的宣传与训练。温和的共和党等的有志者，奔走于巴黎与卧塞儿间以为调停，斡旋于其间，但结果归于徒劳，“康妙恩”方面尚以比较的好意迎纳他们，而介尔士方面则全然拒绝调停。介尔士由是更把巴黎与地方间的一切通信交通遮断了，发布些造谣的告示，说巴黎已全陷于无政府的状态，杀人与掠夺的事情肆行无忌，更使议会里的多数党压迫左翼的言论，通过剥夺巴黎自治权的法令。至四月二日介尔士就命令开始巴黎总攻击，巴黎西部激战亘二月之久，合全国军队都来攻巴黎，那观望形势的卑士麦更答应了介尔士的要求，送还法国的俘虏，援助攻击军。

“康妙恩”内部亦有多数党与少数党，就中以卜郎魁派与一八四八年的急进派合为多数党。第一国际党员与属于他派的九人合而为少数党。这并不是对于中产阶级急进派社会党人占少数的意思。第一国际党员与别的少数党一样在社会主义的理论上，并不反对多数党，他们只是反对多数党的政策，或是无政策。卜郎魁派因其首领卜郎魁(Blanqui)为政府所捕，就象航海的孤舟失了罗盘针的一样。卜氏的政策是以集权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独裁与对于绅士阀彻底的挑战者。他非难一般社会主义者的政策论，他不问主义理论的善恶，专选傲慢而忠实的服从者集于自

己的周围，故他能集合些勇敢的革命战士，组成一个强固的团体。不幸他一旦为介尔士政府所拘捕，他的信徒顿失指导的明星，便茫茫然无所适从，至此始悟这种组织之不良，魁领一失，无人能继其后，全党即为之动摇，然而晚了！现在的希望惟有设法取回卜郎魁氏，大有“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的样子，他们向介尔士提出以在“康妙恩”手下的一切的人质换回卜郎魁氏，但介尔士不许。

不只是卜郎魁派有这无定见的短处，“康妙恩”的多数人都有一种短处。因为这回的选举是仓卒之间举行的，所以被选的人很混杂。多数派既因卜郎魁氏的被捕，失了他们的指导者，少数派亦全没有一定的政纲，只是主张些共产的自治和分权的空浮理论。少数党中属于“第一国际”的人们，比别人总算实在些。这“第一国际”即是马克思氏指导的“万国工人协会”，在法国以强有力的劳动组合联合会表现出来，普法战前即认为与国家有危险而遭解散，解散前的会员殆有四十万人。照“第一国际”的政纲，资本主义的产业应该移归由劳动组合发达而成的工人自治团体管理，一方面政治的国家应该是地方分权。当此危急存亡之秋，第一国际党人过于拘泥其理想的国家，不能善应时势。

多数党自限于一七九三年的迟滞的模仿，他两次让权于无能而且愚蠢的公安委员会的手中。他容忍了各种公务机关的无秩序与无能力，即军务机关亦包括在内。他以弱者佯作倔强的拙笨的愤怒，替代了训练并一个有统系的政策。他命令了国民军以应行的职务，而不问他实行了没有。他压迫了些反对“康妙恩”的报纸，而允许他们用别的名义复活。他捕了些不重要的不足为患的反动派，而对于卧塞儿的侦探反倒置之不理。他的命

令一律是象征的，他们不过是摆大作派罢了。这样子所以“康妙恩”的成绩可记者甚少，计算起来不过是废止议会的破坏经济秩序的法律，对于工人免除一切地租为生活的保障，支给国民军的俸给，发还贫民当入当铺的财物，推倒为拿破仑一世纪功的宛达母柱(Vendome Column)，减少“康妙恩”的官吏的俸给到一年六千佛郎，使教会与国家分离，没收教会的财产，由教育削去宗教科目，寥寥数端而已。这是因为时势所迫，不能不以全力防御外敌，所以没有功夫致力于新社会的建设。

“康妙恩”的财政、粮食、司法、教育、外务、公安、劳动、军事等委员功绩卓著的也有，全无能为的也有，其中以劳动委员的成绩最值得记录。

劳动委员是奥国的工人弗兰克儿(Leo Frankel)，他是一个第一国际党员，他能于最短的时间实行第一国际的政纲。第一国际的政纲就是减少私营的生产，拥护在国家监督管理之下的自治的行会与产业组合，最终的所有权为国家所保有。但是劳动组合的废灭使他的这种事业进行很困难。四月十六日他对于各职工会(其数有三十四)发表一种宣告，令他们组织一个委员会，好安排着去管领那些锁闭的工厂。在“康妙恩”沦没以前，在五月十日及五月十八日这委员会集合了两次，但他们的决议的记录全然无从查考了。那时有三十四组合，四十三个生产组合，和十一个各种劳动者团体。他的对抗雇主的计划，是使雇主若雇属于“康妙恩”者时，必须支给正当的工银，并禁止面包房的夜工，禁止雇主对于工人的减薪与罚俸等，八时间工作制亦被提议，但未实行。总之劳动组合现在又开始复兴了，把产业移归劳动团体管理，算是开了端绪。他又使“康妙恩”发布一切契约应

与劳动团体交涉的法令，结果国民军的补充亦要经劳动组合办理了。

但在“康妙恩”以雍容的态度慢慢的施行他那象征的法令的时候，死亡已以长足的大步向他接近了。“康妙恩”方面因为醉酒的司令刘立耶 (Lullier) 将军的失策，当四月二日还答介尔士袭击的时候，没有占据住 Mont Valérien 要塞，这是一个大大的失算。卧塞儿方面正在起首枪决那些被他拘囚的人们，“康妙恩”方面亦捕获了许多的人质，其中包含着些巴黎的大僧正，声称如枪决革命党一人，即枪决大僧正三人，以为恫吓。卧塞儿方面的杀戮果然停止了，“康妙恩”方面以罗塞儿 (Rossel) 替代了刘立耶，这又是一个无能的领袖。国民军亦称为联合军，虽出全力以为抵抗，但介尔士军人多炮利，众寡不敌，终有螳臂当车的势子。卧塞儿方面知道硝烟弹雨之后有平安，所以从容进行。联合军方面的 Issy 和 Vanves 两要塞，在他们舍弃之前已经粉碎了。Maillot 要塞在 Mont Valérien 的炮力支配之下，亦已沦为灰烬。“康妙恩”失败的悲剧中最惨伤的事是那炮手的死尸，不死于敌兵之手，而死于自己方面久已没用的大炮和那与径口不合的子弹。“康妙恩”的败亡日迫一日，而介尔士的势力亦日增一日，到了五月念二日卧塞儿军遂长驱侵入了巴黎，此后便是一星期间可恐怖的巷战了。入夜因为双方的纵火焚烧很多的屋宇，火光烛天，人声鼎沸，枪声炮声夜夜都成恐怖。卧塞儿在前进中，杀了他们所拘囚的人们，“康妙恩”方面眼看没有法子可以止住他们的屠戮，亦把那些为救那些被捕的而捕的人质都枪毙了，许多大僧正亦在其内。到了念六日，大势全然去了，远隔的 Vincennes 要塞亦降服了。

但是战争虽然完了，杀戮却尚未完，大杀戮却方在开始。政府军侵入巴黎的时候施行了近世史上绝无仅有的大屠杀，所杀的人不只是俘虏，凡在巴黎的男女老幼无论何人，只要你是参加防御的人，侍候过受伤者的人，喂养过受饿者的人，都不能幸免，甚至醉酒的兵士，眼中看出的嫌疑者，问答稍有差池，亦都逃不了无情的弹刃。Lobau Barracks和Rue des Rosiers等处流血成河，兵士在那里站着，都没了他们的胫骨以上，塞奴（Seine）河水呈出暗褐色，尸骸暴露，悲声惨切，不忍闻睹，有人描写当时政府军残酷的情形，说：

“你该死，不论你作什么！倘你在你手中被搜出武器来——死！倘你用武器——死！倘你求情——死！不论你向何方面，左、右、前、后、上、下——死！你不但在法律以外，并且在人道以外，年龄和性都不能救你与你们。你该死，但须先尝一尝你的妻、你的姊妹、你的母亲、你的儿女就是方在摇床的儿女的死亡的苦痛。在你的眼前，那受伤的应该由野战病院被曳出来，受枪弹的打击。他应该活着被曳着他的受伤带血的手足象呻吟痛苦的废物包一般委之于沟壑。死亡！死亡！死亡！”

在这悲剧中有多少人横罹惨戮呢？两万人呢？三万五千人呢？没有人能够说出一个确数来。

“康妙恩”以后巴黎有十万余的工人不见了，这是政府军的大屠杀，这是国民军的大牺牲，这是阶级战争的初幕。

政府军胜利以后，“康妙恩”算是消灭了。法兰西的社会主义，随着社会主义者的被杀，一时受了重伤。第一国际受了这次的打击，不久亦遂灭亡了。国民议员决议赠介尔士以感谢状，卧

塞儿军的总司令被选为大总统。谁知五十年巴黎“康妙恩”的种
子，又在Volga河流域放了灿烂的鲜花，得了光荣的胜利！

附言 《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属我作一篇《五十年来世
界的劳工运动》的论文，我觉得此题太大，便自己缩小了些
范围，改作《五十年来世界工人的国际运动》，不料琐事牵
累，竟未得暇，乃纪述与《申报》殆同时诞生的巴黎“康妙
恩”的一段历史，以塞此责。

1923年2月

《申报之最近五十年》

署名：李大钊

李大钊君讲演女权运动*

(一九二三年二月四日)

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昨日(星六)下午七时至九时，特请李大钊先生在寒期演讲会演讲现在世界四种妇女运动之潮流及性质，并中国妇女运动进行之方法。由谢崇端女士介绍出席，听讲员一致鼓掌欢迎。李先生致词答谢毕，即演说谓所称四种妇女运动者：(一)宗教的；(二)母权的；(三)女权的；(四)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先将四种运动的性质说明于后。

宗教的妇女运动，类分妇女青年会、妇女救世军及其他慈善性或救济性的妇女运动之团体，皆在其列。此种运动，系鉴于现代社会上有种种不安宁或困难及痛苦之现象，特出而救济，为最有价值且为必要的一种运动，然亦有缺点。凡事必先固本，为此种运动者，只知于社会上有不安宁或困难及痛苦之现象发生后，临时讲求救济之术，究竟所以发生不安宁或困难及痛苦之由来，则毫不过问，舍本逐末，必将有防之不胜其防之隐忧。

母权的妇女运动，在北欧极盛，以社会学者额列克里主张最力，其唯一理由，以为妇女在社会上应有一种特别权利，国家亦当为极充分之保护。盖女子为人类之母，于子女教育之责比较

* 此文是明丙写的一篇报道。——编者

男子既格外加重，是故母权实为一种特别之权利。主张此说者，对于女权，亦甚注意，与纯粹良妻贤母的主义，实不相同。

女权的妇女运动，为中流阶级的妇女运动，即资产阶级的女子，其居于社会之地位，虽亦有较男子为高者，但实际考察，仍不免有极不平等之现象，故必毅然突起，为两性平权之运动。

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对于那种阶级的差别，绝不过问，只求同阶级中之人类，俱得享有同等之权利，并不承认社会现象中有压迫与被压迫两种阶级之事实，极力主张无产阶级的妇女，应与男子同等加入人权运动团体中。换言之，其所主张者，确在男女两性都不处于压迫与被压迫之地位。

女子参政同盟会，与女权运动同盟会，就形式言，似无区别，如就实际上观察，前者似专注重在宪法上所享之权利，后者实包含母权、女权、无阶级的妇女运动三项而言，其中组织的分子，以中产阶级者居多数，无产阶级比较为少。以中国现在妇女运动之情状看，不是单独进行，可以完全收效的，须包含母权、女权及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联络一气，通力合作，方有效验。今姑从法律上归纳而言之，应改革者，如左之数种：（一）宪法上之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应平等；（二）民法上之亲权、财产权、行为权及其他种种不平等之规定，俱应加以修正；（三）婚姻法也应该规定；（四）刑法上一方定有重婚罪，一方解释纳妾不为罪，大伤人道，极不平等，应修改；（五）买卖妇女在刑法上应厉禁；（六）同意年龄提高问题，在美、奥各国女权运动史上考察起来，极为注重，今中国刑法，尚付缺如，应要求国家增定之；（七）行政法上为官吏之权，女子应不受限制；（八）女子应有同受教育之机会；（九）职业平等，亦为极属重要之问题，女子苟脱离家庭之拘束，欲求有

经济独立之权，其第一步则在有独立之职业，谋独立之生活，工作报酬之不平等，不仅中国然，美、奥两国，前亦均有此等事实，如在学校为教员者，男子多而女子独少，其适例也；（十）此外，一切男子之职业，女子可以参加者，均须有同等参加之权。

女权运动之性质，既如上述。中国现在切须注重者，首宜结合最有实力之坚固团体，以为将来实际竞争之着手。譬如参政权，纵然宪法上有一纸空文之规定，苟无选举之实力，代议院中，未必就有女子参政之表现。吾甚希望各省县都有此种女权运动的团体，吾更希望此种团体有极坚固之结合。无论是女子参政同盟会，抑属女权运动同盟会，于社会上有公益团体之组织，须毅然加入，力尽其责，夫然后势力才能扩张。美国妇女运动之能全收实效者，第一优点，即能与男子同负社会之责任。欧战发生后，奥国女子，每当男子临战之际，凡国内有何公益团体之发生，必乘机参加，甚至驰赴临战地境，救护伤军，对于国家所尽之责任既大，功劳既高，以故所得权利亦最高。

总而言之，中国现当军阀专横之时代，欲为民权的运动，无论那种团体，都须联络一致，宗教的、母权的、女权的、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可合而不可分，可聚而不可散，可通力合作而不可独立门户。能如是，方能打倒军阀，澄清政治，恢复民权。能如是，则今之为女权运动者，始得曰成功！

1923年2月5、6日
《江声日刊》

马克思经济学说*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二日)

从前正统派的经济学说，以为生产有三要素：一土地，一资本，一劳力。三要素缺一不可，分配起来，当然也相同，就是地主得地租，劳动者得工银，资本家得润利。这话一时听去，似乎很公平，其实是不对的，不过给资本家所利用而已。

马克思说，劳动不单是价值的标准，同理由，且也是价值的本体。

有人说效用是价值的必要条件，马克思虽不否认此说，但他以为说明效用的价值，虽是一个理由，然仅以效用来说明价值，理由究竟不十分充分。每做一个交易，两样物品必定要有共同的原素，一致的等级。但这个所谓一致，决不是效用的结果，因为每样物品的效用等级必皆不同。因为效用不同，所以交易存在。性质不同的各种物品，所含的共同原素，就是这物品所含的劳动分量的多少。物品价值的多少，都随着劳动分量的大小而定，譬如十小时工作所产生的煤，要与另一物品交换，也必要同是十小时工作产生出来的物品。资本家把工人生产的物品售脱，必按实在的价值，但他给劳动者工银，则只有这实在价值的

* 这是一篇讲演。发表时题注：“李守常先生讲，孙席珍笔记。”——编者

几分之几，只好给劳动者做他的必要的维持生活费。

譬如十小时的工作，就得有十小时的价值，但他仅给工人五小时或者竟不抵五小时，给他维持一日的劳动力；还有五小时就是剩余劳动，剩余劳动所生产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剩余价值本来完全是劳动者所有的，现在资本家靠自己站在资本制度之下，便无形中都被掠夺了去。

这剩余价值说，是根据于他的《资本论》。他将资本分为两种：一种是不变的资本，一种是可变的资本。这种分法，同亚当·史密斯把资本分为固定的和流动的这种分法，好象是相同，其实是不同的。亚当·史密斯的固定资本是指形态不变，如机器等。马克思的不变资本，是形态变价值不变。亚当·史密斯的流动资本，包含两部分：一部分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不变的资本；一部分是用以维持劳动者的生活的，马克思把这部划归可变的资本。马克思的意思，是不变资本在生产程序中，只能保持其原来的价值；必定要靠可变的资本才能产生新的价值。这新的价值就是劳动者的结果；所以也可说资本是劳动者产生出来的。不幸都被资本家夺了去，只给他自己所产生的一部分，而资本家还要用一种障眼法，说劳动者完全受他赡养的恩惠。

有人说劳动是神圣，其实资本也是神圣。资本是劳动者产生出来，——资本神圣由劳动神圣而来。然而资本也不该为资本家所有，应当属于劳动者。

资本家要得劳动者的剩余价值，须得竭力增加时间。譬如八小时的工作，而三小时的价值已经足维持劳动力了，则其余五小时的价值，仅为资本家所得。故由八时增加至十时、十二时，则能得七时、九时的剩余价值；时间越增多，资本家所夺得也越

厚。但劳动者则起而反抗，于是有减少工作时间的运动。英国当第一国际的初年有九时运动；现在的八时运动，差不多可说已经成功了。最近又有所谓六时制，这是资本家自己所提议的，但他的动机完全是自利的；他们从经验而知八小时的人力，远不及六小时的机器，因机器可以不必休息，每昼夜分为四班，用精神焕发的人轮流运用昼夜不停的机器；如是则工人精力不致疲乏，而资本家所得也越多。资本家要多得剩余价值，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减少工银。把劳动者所必须的维持生活的分量竭力减少。利用妇女和小孩子作工。因为妇孺的工银，比较成年的男子少。为防止这层起见，有的国家设工厂法去防止他。

根据马克思的学说研究起来，现在一种趋势，就是：现在科学艺术的进步很速，大规模的生产组织也天天加多。资本的势力越大，而小资本小产业越加不能生存，渐渐为大资本所并吞。劳动者既大受压迫，就是小资本小产业从前能够独立营业的，也渐渐流为无产，只得寄住于大资本之下。许多无产阶级群起而要求工作。因此社会也显然分成两大阶级：资本阶级和劳动阶级，即无产阶级。几成阶级之大战。但工厂的发达并非都于无产阶级无利，就是他们在工厂中有联络的机会，聚集的机关，可以促进阶级的自觉，准备和资本家奋斗。社会主义是由资本主义中发育完全的，好象一个鸡蛋，蛋里面本有新的生机，等到孵养成熟，小鸡自然破壳而出。阶级斗争的新生机，原动力就是社会主义。推翻资本制度的力量，完全在资本主义的积威之下，随着进化的程序自然而然养成的。这是我们要承认进化论的地方。但到了时机成熟，新生命已经发育完全，就是资本家势力发达到极点，非采用社会主义去推翻资本制度不可的时候，那就必定要

用革命的手段——无论如何，革命总是必须的，必经的，无可避免的。

马克思的学说的要点，大体言之，从理论讲，生产全靠不变的和可变的资本混合起来，才能有经济的价值。现在不变资本固已为资本家所占有，就是可变的资本，也被资本家用障眼法，欺哄工人，说是他的恩惠。生产完全是劳动的结果。生产不是完全创造的；自然问没有的东西，劳动者如何创造得出来？不过借劳力为之变地或变形。所谓生产就是如此。不过生产虽全由劳动者的力，而分配的时候，则全为资本家夺去，只分出一小部分仅足以维持劳动力的给与劳动者。

从事实讲，则资本主义发达的结果，就引起劳动者的反抗，适足以自制其死命。

劳动阶级在这种状态之下，乃有世界的阶级觉悟。近来有人说中国没有资本阶级，马克思的学说与中国没有关系。这话实在不对。中国因为实业不发达，劳动者虽受压迫，而没有相当场所容他们工作，所以没有团结的机会；适外国工人有反抗资本家之举动，于是便以廉价招中国工人出去工作。中国工人无阶级的觉悟，应募而往。这样，外国的资本家虽然很合意，但将他们有组织的与资本家对抗的团体破坏了，劳动者很不欢迎；怀恨在心，便有排斥黄人之事。中国劳动者受间接的压迫，既没有工作可做，又没有团体的结合，真是流离失所。所以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全世界的劳工都该团结起来，须要有国际的组织。全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其唯一的最大的武器，便是同盟罢工。但资本家能利用劳动者无国际的组织，凭你怎样罢工，遇必要时就得雇别国劳工而去。欧美的资本政府，往往这样。

因此，所以劳动者有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组织。现在第一国际早就消灭了，第二国际也无形中同消灭一样。最后才有第三国际的继起，承继马克思的精神；自俄国革命成功后，就以莫斯科为大本营。英国的共产党也受了第三国际的命令加入劳动党。世界的革命一天快似一天了，全都受了马克思学说的影响，中国人岂能单独除外。

研究马克思的学说，须得先把他的重要著作《资本论》有系统的研究起来。曾有德国人说：人若不到五十岁，而研究马克思的学说，说是完全懂得，总是骗人的；因为单独读完他的著作，便须二三十年的工夫哩！所以我们所讲的，也不过随便说说罢了。

1923年3月12日

《时事新报》附张，上海职工俱乐部特刊

《合作》周刊第52期

演化与进步(内容简述)*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

演化是天然的公例，而进步却靠人去做的。我们是立足在演化论和进步论上，我们便会象马克思一样的创造一种经济的历史观了。我们知道这种经济的历史观，系进步的历史观，我们做人当沿着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快快乐乐地创造未来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不是在我们背后的，是在前面迎着我们的。人类是有进步的，即就文艺论，也不是今下于古的。所以无论如何，应当上前进去，用了我们底全力，去创造一种快乐的世界，不要悲观，应当乐观。

1923年4月17日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署名：李守常

* 这是在上海大学讲演的摘录。——编者

史学与哲学*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十九日)

今日所要和诸位商榷的，是史事及史学与哲学的关系，主体是讲史学。

凡一种学问，必于实际有用处，文学、史学都是如此。但是，用处是多方面的。得到了一种知识，以此知识为根据去解决一种问题是用处；以所有的学识成一著作与学术界相商榷，以期得到一个是处，也是用处。但是最要紧的用处，是用他来助我们人生的修养，却有极大的关系。人们要过优美的高上的生活，必须要有内心的修养。史学、哲学、文学都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并且都有他们的好处。从不同的研究，可以得到同的结果，与我们以不同的修养。哲学、文学在我国从前已甚发达，史则中国虽有史书甚多，而史学却不发达。这不但中国为然，外国也是如此。因为史学正在幼稚时代，进步甚慢。但他于人生有极大影响，我们不但要研究他，且当替他宣传，引起人们研究的兴味，以促史学的进步。

* 此文是在上海复旦大学的讲演记录稿(黄维荣、温崇信记录)。讲演的具体日期不详，根据大钊同志的活动情况判断，当在一九二三年三、四月间(参见《李大钊传》第一四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四月第一版)。——编者

一、历史一辞的意义

《说文解字》说，史是记事的人（即是书记官），“史”字从中从又，“中”是中正的意思。文字学家说，“又”字是象形字，“中”字不是中正的“中”，乃是“册”的象形字。“史”字有书役的义，即指掌记事者而言。日本训“史”字有フヒト，以之为归化的人而专从事于文笔的事者的姓。此“史”字遂辗转而有记录的意思。英语称历史为 History，法语为 Histore，意语为 Storia，皆由希腊语及拉丁语从 Historiai 而起，本意为“问而知之”，把“问而知之”的结果写出来，即为纪录，即是 History。德语称历史为 Geschichte，荷兰语为 Geschiedenis，原皆指发生的事件或偶然的事变而言。各国文字的本义都不相同，今日使用的意义也复各异，所以发生了混乱错杂的见解了。

我们日常泛言历史，其涵意约有三种：（一）譬如说吾汉族有世无与伦比的历史，这并不是指记录而说，乃指民族的经历或发展的过程，所以四千年的历史一语，可以说是文化进化的代名词；（二）又如说吾国无一可观的历史，其意乃指见识高远、文笔优美的历史书籍而言；（三）又如问一友人，以君所专攻的科目是什么？答云历史。此“历史”二字，乃指一种科学的学问而言。中国并不没有普通的记录，而专攻历史，以历史为一门科学的，却是没有。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就是成为一种科学的历史究竟是什么？

二、历史的定义

关于史的定义,史家不一其辞。因为各人目光不同,定义也因此各异;而现在史学又不十分发达,所以完全妥当的定义,竟是没有。今且举出几个定义中,我们或者能得到一个史学的概念。

Felint 的史的定义

弗氏谓历史学即是历史哲学。他说:“历史哲学,不是一个从历史事实分出来的东西,乃是一个包蕴在历史事实里边的东西。一个人愈能深喻历史事实的意义,他愈能深喻历史哲学;而于历史哲学,也愈能深喻于其神智。因为历史哲学,只是些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质与根本关系的意义,合理的解释、知识罢了。”这里他所说的历史哲学,史学也包括在内。

Lamprecht 的史的定义

郎氏在他的《什么是历史》一书中说:“史事本体无他,即是应用心理学。历史乃是社会心理学的科学。”

Vanloon 氏的史的概念

万龙氏作有《人类史》一书。他的序文中有几句警句:“最善的点,乃在环绕我们的光荣的过去的大观,当吾们返于吾们日常的事业的时候,与吾们以新鲜的勇气,以临将来的问题。”

又说:“历史是经验的伟大楼阁,这是时间在过去世代的无终界域中建造的。达到这个古代建筑物的屋顶,并且得到那全部光荣的利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非青年的足是健强的,这事才能做到。此外,绝无人能登临。”

内田银藏博士的史学的要义

内田银藏博士是日本的史学者。他说：史学有三要义：

(一)随着时间的经过，人事进化不已。研究历史，当就其经过的行程而为考察。社会一天一天不断的发达进化，人事也一天一天不断的推移进行。就其发达进化的状态，就是就其不静止而移动的过程，以遂行考察，乃是今日史学的第一要义。

(二)当就实际所起的情形，一一搜察其证据。考察历史，须不驰空想，不逞臆测，应就现实发生的事例，依严密的调查考察，证据的手段，以究明人事的发展进化。这是历史的研究的特色。

(三)不把人事认作零零碎碎的东西去考察他，应该认作为有因果的、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现在的历史的研究，不能单以考察片段的事实为能事。须把人事看做整个的来研究，就其互相连锁的地方去考察他，以期能够明白事实与事实间相互的影响和感应——即是因果。但零碎的事实，也很要紧的。没有零碎，便没有整个。所以当就一个一个的零碎为基础，而后当做整个的而观察他的因果的关系。不过此一个一个事实，必须考查精确。假使是假的，误差的，那么由此而生的整个，也靠不住了。但太致力于烦琐的末节，而遗其大端，那也是不足取的。

梁任公氏的史学定义

最近梁任公氏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在那本书里所下的史的定义是：“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的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资鉴的是史。”

以上所举的，不过是供吾人参考的资料。我甚希望诸位参考诸家的说，自己为史学下一个比较的完全确切的定义。

三、史学与哲学及文学的关系

讲到史学与哲学、文学的关系,最好把倍根的分类先来参考一下。关于人生的学问,本不能严格的分开,使他们老死不相往来的,因为人生是整个的。但现在为分工起见,所以不得不分成多种专门的学,以求深造。但学问虽贵乎专,却尤贵乎通。科学过重分类,便有隔阂难通之弊。所以虽然专门研究,同时相互的关系也应知道。专而不通,也非常危险,尤以关于人生的学问为然。史学和哲学、文学的来源是相同的,都导源于古代的神话和传说。虽然我们分工之后,同源而分流,但也一样可以帮助我们为人生的修养,所以也可以说是殊途而同归的。

倍根的分类,见于他所著的《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05)及以拉丁文著的《the Dignity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23)。这二书都是讲当时的思想的发展的。在此二种中,他把学问分为三大类:(一)历史;(二)诗;(三)哲学。这是按照心的能力而分的。因为心的能力也有三:(一)记忆;(二)想象;(三)理性。记忆所产生的是史,想象所产生的是诗,理性所产生的是哲学。这个分类,在今日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他只是指他那时代的学问状况而说的,但我们正好借用他的分类,说明史学、文学、哲学三者的关系的密切。

他把历史分为自然史、人事史,而人事史又分为宗教史、文学史等。

哲学也分为三类:(一)关于神明的;(二)关于自然的;(三)关于人的。哲学二字的意义,也与现在不同。他所说的哲学,是

穷理的意思；此外又有第一根源的哲学，包括三部的本源的普遍的学问。

诗也不是专指诗歌而言，凡想象、假作而叙事的文学都是，不必定为韵文。

诗与史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要考察希腊古代的历史，必须读荷马的《史诗》，因为他的诗中包蕴很多的史料。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是史，他说诗亡而后春秋作，也可见史与诗间大有关系。即如《诗经》一书，虽是古诗，却也有许许多多的史料在内。要研究中国古代诗，不能不把此书当作重要的参考书。郎氏（Lamprecht）谓：“史有二方面：（一）取自然主义的形式的一——谱系；（二）取理想主义的形式的一——英雄诗。谱系进而成为编年史，英雄诗进而成为传记。”这都可证明诗与史的关系密切了。

哲学与史的关系的密切，也很容易证明。譬如老子是哲学家，但他也是个史学家，因为他是周的史官。“班志”说：道家出于史官^①。可见哲学与史学也是相通的。

倍根之后，孔德、斯宾塞、冯德诸家，各有另立的分类。不过倍根的分类，与我们以特别有关系的材料，所以借来作史学、哲学、文学的关系的证明。

四、历史与历史学的关系

以历史为中心，史学可分二部：记述历史；历史理论。记述

^①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班固著《汉书·艺文志》）。——编者

的历史的目的，是欲确定各个零碎的历史事实，而以活现的手段描写出来，这是艺术的工作。历史理论的目的，是在把已经考察确定的零碎事实合而观之，以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的，这乃是科学的工作。

此外，又有历史哲学一项，但从系统上讲起来，宜放置哲学分类之下。

五、哲学与史学的接触点

哲学与历史相接触点有三，即是：哲学史、哲理的历史及历史哲学。

哲学史是以哲学为研究的对象，用历史的方法去考察他，其性质宜列入哲学系统中。哲理的历史，是用哲理的眼光去写历史，是属于史的性质的，但太嫌空虚。历史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哲学是于科学所不能之处，去考察宇宙一切现象的根本原理。历史事实是宇宙现象的一部分，所以亦是史学所研究的对象的一部分。

六、哲学与史学的关系

哲学仿佛是各种科学的宗邦，各种科学是逐渐由哲学分出来的独立国。哲学的领地，虽然一天一天的狭小，而宗邦的权威仍在哲学。

科学之所穷，即哲学之所始。两者的性质上区别虽经确立，不容相混了，然而两者的界限，却并未如长江大河为之截然分

界。二者之间有一中区，譬如历史与哲学虽各有领域，而历史哲学便处于二者之间，不能说完全属诸史学，也不能完全属诸哲学。

立在史学上以考察其与哲学的关系，约有四端：

(一)哲学亦为史学所研究的一种对象。史学底对象，系人生与为人生的产物的文化。文化是多方面的，哲学亦其一部分。所以哲学也为史学家所认为当研究的一种对象。

(二)历史观。史学家的历史观，每渊源于哲学。社会现象，史学家可以拿自己的历史观来考察之，解释之。譬如现在的女权运动和打破大家庭的运动，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都可以一种历史观观察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历史观的一种。他以为社会上、历史上种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其原动力皆在于经济，所以以经济为主点，可以解释此种现象。此外，圣西门有知识的史观，以为知识可以决定宗教，宗教可以决定政治。此外，还有宗教的史观、算术的史观等等。或谓史学家不应有历史观，应当虚怀若谷的去研究，不可有偏见或成见，以历史附会己说，才可算是好史学家。或者说史学家应有历史观，然后才有准绳去处置史料，不然便如迷离漂荡于洋海之中，茫无把握，很难寻出头绪来。这话是很对的。史学家当有一种历史观，而且自然的有一种历史观，不过不要采了个偏的、差的历史观罢了。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很受海格尔的辩证法的影响，就是历史观是从哲学思想来的明证。

(三)就历史事实而欲阐明一般的原理，便不得不借重于哲学。

(四)史学研究法与一般理论学或知识哲学，有密切关系。

现在再从哲学方面来考察他与史学的关系：

(一) 历史是宇宙的一部分，哲学是研究宇宙一切现象的，所以历史事实亦属于哲学所当考量的对象之中。

(二) 人生哲学或历史学，尤须以史学所研究的结果为基础。

(三) 哲学可在旁的学问中，得到观察的方法和考量的方法。所以哲学也可以由历史的研究，得到他的观察法和考量法，以之应用到哲学上去。

(四) 要知哲学与一般社会及人文的状态的关系，于未研究哲学之先，必先研究时代的背景及一般时代的人文的状况。所以虽研究哲学，也必以一般史识为要。

(五) 研究某哲学家的学说，必须研究某哲学家的传记。

(六) 哲学史亦是一种历史的研究，故亦须用历史研究法的研究以研究哲学史。

历史哲学是研究历史的根本问题的。如人类生活究竟是什么？人类的行动是有预定轨道的，还是人生是作梦一般的？我们所认为历史事实的是真的呢，还是空虚的？人类背后究竟有根本大法操持一切的呢，还是历史上种种事实都是无意义的流转、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呢？人类自有史以来，是进步的，还是退化的？人类进化果然是于不知不识中向一定的方向进行呢，还是茫无定向呢？国家民族的命运及其兴衰荣枯，是人造的，还是人们无能为力的？种种事实，纷纭错杂，究竟有没有根本原理在那里支配？这都是历史哲学的事。因为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只能到一定的程度为止；科学所不及的，都是哲学的事了。

七、史学、文学、哲学与 人生修养的关系

我们要研究学问，不是以学问去赚钱，去维持生活的，乃是为人人生修养上有所受用。文学可以启发我们感情。所以说，诗可以兴，可以怨；又说，兴无诗。文学是可以发扬民族和社会的感情的，哲学于人生关系也切。人们每被许多琐屑细小的事压住了，不能达观，这于人生给了很多的苦痛。哲学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个注意于远大的观念，从琐屑的事件解放出来，这于人生修养上有益。史学于人生的关系，可以分知识方面与感情方面二部去说。从感情方面说，史与诗（文学）有相同之用处，如读史读到古人当危急存亡之秋，能够激昂慷慨，不论他自己是文人武人，慨然出来，拯民救国，我们的感情都被他激发鼓动了，不由的感奋兴起，把这种扶持国家民族的免于危亡的大任放在自己的肩头。这是关于感情的。其关于知识方面的，就是我们读史，可以得到一种观察世务的方法，并可以加增认知事实和判断事实的力量。人名、地名，是不甚要紧的，能够记得也好，不记得也不妨事的。二者帮助人生的修养，不但是殊途同归，抑且是相辅为用。史学教我们踏实审慎，文学教我们发扬蹈厉。

此外，历史观与人生观亦有密切的关系。哲学教我们扼要达观。三者交相为用，可以使我们精神上得一种平均的调和的训练与修养。自马克思经济的历史观把古时崇拜英雄圣贤的观念打破了不少，他给了我们一种新的历史观，使我们知道社会的进步不是靠少数的圣贤豪杰的，乃是靠一般人的；而英雄也不过

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的新时代，全靠我们自己努力去创造。有了这种新的历史观，便可以得到一种新的人生观。前人以为人们只靠天、靠圣贤豪杰，因此不见圣贤出来，便要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叹声；因此生逢衰乱的时代，便发出“昊天不吊”或“我生不辰”的叹声。在此等叹声中，可以寻知那听天认命的历史观影响于人们的人生观怎样大了。现在人们把历史观改变了，这种悲观、任运、消极、听天的人生观，也自然跟着去掉；而此新的历史观，却给我们新鲜的勇气，给我们乐观迈进的人生观。

从前的历史观，使人迷信人类是一天一天退化的，所以有崇古卑今的观念。中国如此，西洋亦然。他们谓黄金时代，一变而为银时代，更变而为铜时代、铁时代，这便是说世道人心江河日下了。这种黄金时代说，在十七世纪时为一班崇今派的战士攻击的中心。当时，今古的争论极烈，一方面说古的好，他方面说今的好。倍根等都是赞成新的、崇尚今的。他们说：以前的圣贤的知识，并不如我们多，今世仍旧可以要出圣贤豪杰的。二者相争甚烈，在法、意等国两派都有极烈的争论。诗人的梦想，多以前代、过去的时代为黄金时代。中国的《采薇》、《获麟》诸歌和陶渊明一流的诗，都有怀思黄、农、虞、夏的感想。黄、农、虞、夏之世，便是中国人理想中的黄金时代。新历史家首当打破此种谬误的观念，而于现在、于将来努力去创造黄金时代。因为黄金时代，总是在我们的面前，不会在我们的背后。怀古派所梦寐回思的黄金时代，只是些草昧未开、洪荒未阔的景象，没有什么使我们今人羡慕的理由。我们试一登临那位时先生在过去世代的无止境中，为我们建筑的一座经验的高楼的绝顶，可以遍历环绕我

们的光荣的过去的大观，凭着这些阶梯，我们不但可以认识现在，并且可以眺望将来。在那里，我们可以得到新鲜的勇气；在那里，我们可以得到乐天迈进的人生观。这种娱快，这种幸福，只有靠那一班登临这座高楼的青年们，长驱迈进的健行不息，才能得到。这是史学的真趣味，这是研究史学的真利益。

1928年4月17—19日

天津《新民意报》副刊《星火》

普遍全国的国民党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八日)

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国民党应该有适应这种需要，努力于普遍全国的组织和宣传的觉悟。

五六年前，有一位中国人在俄国境内旅行，偶过一个人家，客厅中悬挂一幅中山先生的小照，主人指点此小照，告此旅行过客的中国人说：我甚敬佩此人，因为他能在海外创造一个中华民国。我们从这句批评赞扬的话里，可以看出国民党的根萌植在何处了。

国民党的根萌，实际上是培植在海外华侨散在的地方，和中国南边华侨母国的广东一省。第一革命后，虽然一时全国到处都有了国民党，但这些虚浮无根的花，只是那几株栽植在南方的广东和海外华侨散在的地方的“国民党”树上所开的花，一阵风来吹遍大地旋即萎谢了。然而那几株在社会上有根柢的树，还是远在南天孤孤零零的长着。

中国的疆域太辽阔了，中国内地的政治景象太枯燥了，那样稀稀零零遥在南方或海外的几株树，实在润泽不过、荫蔽不过这样阔大的一个沙漠似的中国来，我们要多多的播布这树的种子，若使他普遍全国，在中国到处植下了根基，任他沙漠似的狂风烈日，也吹不荒晒不荒中国政治的田地了。国民党是中国今日政治的国民的花，在广东和海外的栽植者啊，要努力传播他的种子

于荒凉满目的全中国!

“推倒满洲”是一个早熟的果实,因为这个早熟的果实,反以迟缓了国民运动的发育。自从第二革命后,国民党受了北洋军阀重大的打击,一般懦弱的国民,不敢去参加国民党,国民党亦因此自懦,荒废了并且轻蔑了宣传和组织的工夫,只顾去以武力抵抗武力,不大看重民众运动的势力,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的错误。

几年以来,北洋军阀造下的罪孽,使这一般懦弱的国民,亦渐渐觉悟了,亦渐渐知道要一个国民党作他们反抗军阀的大本营了,呼唤国民党的声音,随时到处都听见了。今日的国民党,应该挺身出来,找寻那些呼唤的声音,去宣传去组织,树起旗帜来让民众——反抗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是工人、是学生、是农民、是商人,那集合在国民党旗帜之下,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

一个政治革命的党,必须看重普遍的国民的运动。要想发展普遍的国民的运动,必须有普遍的国民的组织。国民党从前的政治革命的运动,所以没有完全成功的原故,就是因为国民党在中国中部及北部,没有在社会上植有根柢的组织。国民党现在惟一要紧的工作,就在向全国国民作宣传和组织的工夫。要使国民党普遍于全中国,不要使国民党自画于广东;要使全中国为国民党所捉住,不要使国民党为广东所捉住;要使国民党成功一个全国国民的国民党,不要听他仅仅成功一个广东和海外华侨的国民党。

1923年4月18日

《向导》第21期

署名: T. C. L.

工人国际运动略史

(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

(一) 工人的特色

工人的国际运动,和一切别的国际运动不同。从前和现在,都有些增进国际上友谊或反对战争的国际团体,象那“平和与自由同盟”、“妇女同盟”、“仲裁协会”、“遏战同盟”、“基督教同盟”、“民族联合同盟”及其他这一类的团体,多少都曾为暂时的存在。他们的目的都是一类,都是消极的,他们要反对战争,要消除战争的特定的原因。不论何时,国际间发生危机,他们便忙迫起来,用祝福的话,调和的话,斡旋于其间。他们想增进“四海皆兄弟”的感情,扫除人种间的差别。他们看各民族间的争杀和一家兄弟自相残害的愚昧一样。他们企图用种种说法指出平和的福利和战争的祸厉。工人的国际团体是个全与他们的概念相异的概念。阶级的基础的采用,就是和中产阶级的平和主义最大而最终的分裂。旧时的标语“全人类都是兄弟”已经停止了,他的真实工人的国际党不说并且不信“全人类都是兄弟”。必欲讲这一类的话,只可说“全世界的工人都是兄弟”。工人的国际联合不是为平和,乃是为战争。他们有他们全体必须推倒的国际的公

敌，就是中产阶级到了必要的时候都联合起来和工人们——就是无产阶级——宣战，象毕士麦助 Thiers（普法战争终结时法国的政府当局）反对巴黎“康妙恩”，德国和协约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苏维埃俄罗斯”，都是明显的例证。工人们——就是无产阶级——为对付中产阶级的联合，必须组织一个工人的国际联合。这种联合，不但于日常发生的产业界的争议和防止国外破坏罢工同盟的人很有效用，就在革命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工人，亦能阻止他们的执政者对于革命成功的地方加以打击。别的国际运动的目的是减少或终止战争，工人的国际运动的目的不在终止战争而在变更战争的范围，而在使战争不是国家的而是阶级的。他们以为战争不是恶癖性或国际间的误解的结果，乃是现代帝国主义的结果。这帝国主义在他的基础上是经济的，和资本主义有不可分的关系。战争必经由资本主义才遭打击。一切战争到资本家阶级停止存在的时候才能绝迹。所以工人的国际运动只能出现于现代资本主义者情境之下。一个小所有主的国际团体，不能有怎样的活动力。且在实际上，工人的国际运动的起源恰恰与现代无产者实力的表现相合。工人的国际运动可以分作三个时期：（一）第一国际，（二）第二国际，（三）第三国际。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在历史上都曾尽过他们所负的使命而依次归于消灭，只有第三国际是现在工人国际运动的正统而为其势力的中心。此外，第二个半国际及第四国际不过是些枝节罢了。

兹将此等国际的团体成立的年代列举如下：

- 第一国际……………一八六四——一八七〇
第二国际……………一八八九——一九一四
第三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莫斯科成立
第二个半国际……………一九二一年二月在维也纳成立
第四国际……………一九二一年十月在柏林成立

(二) 工人国际运动的起源

工人国际运动的起源，实肇始于一八三六年住在巴里的德国亡命客所组织的秘密结社，此结社的名称为“公正同盟”，奉共产主义的原理。因为参加一八三九年的巴里暴动，他们乃被追放移居伦敦，北欧诸国的劳动者多来集于此处。“公正同盟”乃因以成立而含有国际的性质。他们知道光是靠着零碎的秘密结社或是革命的暴动不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要想达到他们的目的，非以国际的运动遍全世界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的变革不可。他们很感觉着有宣传这个道理的必要。马克思实为此运动的指导者。一八四七年的伦敦会议，马克思和他的朋友恩格尔躬亲出席，为该同盟起草学理的实际的纲领。“公正同盟”改称“共产同盟”就在那个时候。马、恩二氏合草的纲领实于一八四八年一月公布，距法兰西革命才几周耳。《共产党宣言》的末句就是那“万国无产阶级啊，团结起来啊！”的口号。这正是工人的国际团结的最初的宣言，在历史上有特殊的意义。但此宣言该同盟虽然接受了他，但是不能了解他，结果马、恩二氏不能不奔

而之他。

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以法兰西为中心而波及全欧，结局至为反动政治所压，一般的无产运动顿形凋落。此种国际运动，亦不能不随着受一顿挫。

到了一八六二年伦敦开国际博览会，给了第一国际成立的一个好机会。此时法国劳动者代表得了拿破仑三世的许可，渡英参观博览会，因得与英国劳动者交欢握手，努力于国际的联合。至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伦敦圣马丁馆（St. Martins Hall）开万国劳动者大会，马克思亦出席于此会，第一国际于是乎诞生。

· （三）第一国际

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圣马丁馆的会议是第一国际的第一次会议，司会者为 Beesly 教授。马克思氏亦出席是会，以新协会规约的起草的事付临时委员会去办。此委员会由五十名各国代表组织而成，多半数为英国人。起草此规约的任务初由意大利人马志尼当之，因他缺乏经济的知识，不能胜任，卒由马克思代之。

第一国际的事务所设于伦敦，各国派委员驻在该处。在该处的指导者和努力者，当然为马克思和恩格尔。

第一国际由成立的日起至一八七二年的海牙会议马克思派与巴枯宁派分裂止，实为工人国际运动的中枢。兹将第一国际会议年表列下：

会次	地点	年代	记要
第一次会议	伦敦	一八六四	开成立会。
第二次会议	伦敦	一八六五	马克思提出宗教问题，预备下届讨论。
(原定在 Brussels 开会，因比国政府干涉，不果， 乃在伦敦开一非正式会议)			
第三次会议	Geneva	一八六六	采用马克思起草的规约，一致赞成劳动时间渐次减至八小时。
第四次会议	Lausanne	一八六七	议决主张交通运输机关概归国有，排斥大公司的独占，奖励产业组合。
第五次会议	Brussels	一八六八	议决矿山、森林、土地当与交通运输机关同为社会全体即民主的国家的共同所有。惟共同团体为一般福利，得使用生产机关。全世界的劳动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第六次会议	Basle	一八六九	讨论土地所有权问题，提议废止遗产权，但未得多数赞成。
第七次会议	伦敦	一八七一	一八七〇年预备在巴黎开会，因为普法战争的影响，遂尔中止。 是年巴黎康妙恩运动起，法国会员有参加此运动者。
第八次会议	海牙	一八七二	马克思派与巴枯宁派分裂。

自海牙会议后，第一国际遂分裂为二派，一为马克思派，一为巴枯宁派，两派残存数年，遂都消灭了。

马克思派

分裂后的第一次会议	Geneva	一八七三
分裂后的第二次会议	Philadelphia	一八七六

巴枯宁派

分裂后的第一次会议	Geneva	一八七三
分裂后的第二次会议	Brussels	一八七四
分裂后的第三次会议	Berne	一八七六
分裂后的第四次会议	Verviers	一八七七

(四) 第二国际

第二国际始于一八八九年的巴里会议，到一九一四年大战勃发的时候，实质上归于消灭。兹将其会议次数及年代列表如下：

第一次会议	巴里	一八八九
第二次会议	Brussels	一八九一
第三次会议	Zurich	一八九三
第四次会议	伦敦	一八九六
第五次会议	巴里	一九〇〇
第六次会议	Amsterdam	一九〇四
第七次会议	Stuttgart	一九〇七
第八次会议	Copenhagen	一九一〇
第九次会议	Basle	一九一二
第十次会议	维因纳(因大战勃发未果)	一九一四

(五) 第三国际

第二国际既与大战勃发同时归于消灭，第三国际乃与苏俄

的革命同时崛起。执世界工人运动的牛耳。兹将其会议的次数及年代列表如下：

第一次会议	Zimmerwald	一九一五
第二次会议	Kienthal	一九一六
第三次会议	Stockholm	一九一七
第四次会议(第一次正式会议)	莫斯科	一九一九
第五次会议(第二次正式会议)	莫斯科	一九二〇
第六次会议(第三次正式会议)	莫斯科	一九二一

第二国际的残余，尚图再建，而第二个半国际及第四国际亦各拥一小部分会员别树一帜。去年第三国际欲与第二国际及二半国际、第四国际等组织联合战线，虽未能成功，然支流殊派终当汇流宗海。吾信工人的国际运动的联合战线，终有成功的一日。故当本年的劳动节，为介绍工人的国际运动略史如此。

1923年5月1日

《晨报副刊》

署名：T.C.L.

纪念五月四日*

(一九二三年五月四日)

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是学生加入政治运动之纪念日，也是学生整顿政风的纪念日。因为政治不澄清，使我们不能不牺牲求学之精神，而来干涉政治。民国到现在十有余年，革命事业，还未成功，这些继续革命事业的人，就是我们。但是我们做这种事业，必须抱定目的和宗旨。以现在学生应该做的事有二种：(一)组织民众，以为达到大革命之工具；(二)对现政府立于弹劾的地位。因为我们光组织民众是不行的，他们是可以破坏我们组织民众的事业。望学生对于以上二事努力去做，则将来自有极大之效果。

1923年5月5日
《晨报》

* 这篇短文是一九二三年五月四日在北京学生联合会召开的“五四”纪念大会上的演说摘录，见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晨报》的“昨日之五四纪念大会”的报道。题目是编者加的。——编者

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

(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七日)

临城事件发生以来，欧美人士和我国人士对我国现状议论纷纷，因而过去就常说的裁兵问题，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突然叫喊得更加厉害了。但是，现在的状态是，一言以蔽之，中央没有真正的实力，也可以说，其他的方面也没有显示出有真正的力量；更确切地说，在发生不论什么事变的时候，都没有充分力量来镇压的现状下，频频地叫喊裁兵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大概不会有这种情况，即各督军中如果有赞成裁兵的，而且果断地付诸实行了，那么情形将如何呢？在现在这样的状态下这样作，岂不是只是使土匪增加吗？今日已是不堪土匪之患，而使土匪增加的这种议论却多了起来，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感到实在是听到一件意外的意见了。

但是叫喊裁兵的人们会说，那些军人完全让他们去参加实业界劳动就可以了。如果把现在的兵士用在那些方面，由谁来当监督呢？而且，这些兵士都只是很短时间地训练过一下而已，习惯自由和任性的人能够矻矻于劳动么？我这样一说，或许有人会误解我是反对裁兵的也未可知；其实我是老早以前就反对养兵的，时常注意我言行的人们，应该很清楚我是不赞成养兵的。然而我为什么现在反对裁兵的呼声呢？那就是因为很多人

的议论过于表面，没有深思熟虑，一时冲动的议论太多之故。

虽然很早以来就很清楚，我国必须实行根本改革是对的；但是我国很多人，对此并没有下工夫研究过。最近在商会等处，仿佛有就裁兵问题发表意见的，究竟那些人们打算如何裁兵，裁兵后对多数兵士和更行增加的土匪怎样办呢？而且外国人中也有裁兵论者，那些人们对实行裁兵后的警备工作有充分的自信没有呢？究竟这些人怎样取缔土匪及其他呢？我很想听听具体的办法。但是迄今所听到的只是裁兵和其他种种动听的话，关于实行方法，还没有听到过有与此相应的具体方案。

为了要进行举国上下的根本改造，光靠打倒军阀、埋葬政客这种表面上堂皇的口号，那是很不可靠的事情，而且也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根本性的改造，无论哪个国家都必须有其中中心不可，我们首先要创造出作为中心的东西，然后再采取进行改造的程序才可以，单单凭靠堂皇的口号，是为真正的行动家所不取的。

请看各个最近改造中的国家吧，德国的改革是以社会民主党为中心进行的，现在仍着着向前迈进着。震撼全世界的俄罗斯的大改革是以共产党为主而进行的。虽是旧话，日本维新改革，也是以“萨州”和“长州”为中心进行的。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国家，没有形成一个中心而能进行大改造事业的尚无其例。因此，象我国现在这样，想要改革也是无从着手的。如上所述，裁兵是一种很好的事情；但是在裁兵以后，由谁来取缔四散的兵士们呢？即在现在也无法减少频频发生的匪害，不可能取缔更加增多的兵士那是很清楚的事情。尤其关于裁兵问题，很多人将大督军等称之为军阀，其实就因为我国没有含有真实意义的

军阀，因而改造就更为困难。举日本军阀为例来看，在日本军人的主张中，有很多对现代社会不恰当的议论，但其根本精神则是在于为国家这一点上。而我国军人则并不是如此，看看军人中二三有势力的人物就十分清楚。我国的军人并不是为了国家而尽力的，而是一切为了自己，除自己以外别无所虑，因此对国家的前途问题根本不予考虑。劝这些人去裁兵是无用的，而且依靠这些人求得保护这种想法，也到底是实现不了的。

因此，势必需要作为改造的中心的東西。到底什么是需要的呢？以我个人的见解，就是首先以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心，除了使它更大更有力量以外，一点其他道路都没有。现在的国民党还没有什么实力，然而这个团体尚有容纳我们考虑问题的包容力。而且孙文氏具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加上我们对它的不适当之处的改良，从而使该党形成为更加有力的团体，那么其他督军中之有力者，就不能反抗它而不得不加入它了。只有达到这种状态，才能开始进行实际改革的事业，仅仅只凭空想的议论是作不到实际的改革的。希望大家充分地考虑这一点。

1923年5月17日

《北京周报》(日文)第66号

署名：北京大学教授李守常

中日俄三国关系日益接近

(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

俄国驻远东外交委员加拉罕氏已于二日来到北京。对新任该氏，各方面皆表示欢迎。日期虽然忘了，但头一个召开该氏欢迎会的是中俄交涉使王正廷氏，其次是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氏，然后是吴景濂氏八日在紫禁城的传心殿开欢迎会。北京大学是九日晚在第二院召开的，学生们是同日中午在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召开的，京师总商会则在十二日开了欢迎会。

北京大学在开欢迎会时，做了俄国的新国旗，中俄两国的国旗一起并排挂着。想来，悬挂俄国的新国旗恐怕在北京，不，在全中国还是头一次吧？是否头一次不甚记得，但我是第一次见到该国的国旗的。旗子的大小纵长是四尺的话，横宽是八尺，就是横倍于纵的比例。地是红色，左上方用白线隔开，用金黄色写着俄国文字“СССР”，即埃司埃司埃司埃尔。这并列的三个“С”字，据说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Р”字就是共和国的意思。国旗不知是何时规定的，可是在北京二条胡同远东外交委员的驻处，好象也从没见过。

这次加拉罕氏到北京，好象是为了召开中俄会议的。人们以为不久就要开会了。因为加拉罕氏到京不久即访问了外交总长顾维钧氏，翌日顾氏以个人名义回访了加拉罕氏。据称当顾

把与俄国提携的事向之提出的政府的困难状态。

同时,我想因为没有同俄国交涉或提携的政府,而感到遗憾的不仅是学生们而已。关于这个中俄会议或联盟等问题姑置不论,我觉得最近中俄之间与日俄之间彼此非常接近起来了。换言之,人们感到俄国、日本与我国之间互相甚为接近。尤其是日本,以这次东京地方大地震为划一时期,认为不象以前与英、美及其他各国那样,对我国已不作为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国家了似的。就是说,日本对我国一直是采取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态度,我认为这个是由于受到英美及其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而不得已才用和那些国家相同的态度来对待我国的。今后日本即使非全然改变,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态度必会大大减弱,这是因为与非资本主义非帝国主义的我国有利害一致之点。由此来看,远东的中日两国和俄国渐次接近提携之日已临近。否,我希望及早实现。就这件事,我打算最近写稍长的文章发表一下意见。

1923年9月16日

《北京周报》(日文)第80号

署名:北京大学教授李守常

“大国民”的外交

(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

常常听见国人说：如何才是“大国民”的态度？现在我们要在对于惨劫后的日本的态度上和对于苏俄的承认问题上，寻求这句话的例证。

日本是我们的近邻，种族上、文化上、利害关系上都有密切的关系。只因日本的民族，在东方的“鲁卫之邦”里是一个神智较为敏捷，精力较为活泼的民族；他的地理的关系，又与帝国主义的压迫接触较早，在势不得不首先站起来以谋自卫。不幸，这个孤立的东方民族，采取了“以毒攻毒”的政策，用帝国主义的手段与国际帝国主义者，在东方被压迫的区域内，争取并驾齐驱的地位，他下力量便不知不觉的集注在中国身上，这样子种的了中国和日本两民族间的恶感。这种恶感使中国人认定日本是中国惟一的仇敌，使中国人忽视了在中国横行的帝国主义的策源地，并不在日本的事实。

这一次天灾地变，使日本遭空前未有的惨劫。在我们自诩为“大国民”的中国人，自不忍隔岸观火，自不应在这种人间惨劫中，想到以前民族间的仇恨。就从利害关系上想，今后的日本，至少在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中已经不是一个强者了，而且天灾之后，日本的政治上发生变动亦不是意外的事，这亦是为中日

两国接近的媒介。假使我们看到这一点，不但在这几天内要打几通热烈的同情的电报，从今以后，恐怕要改变从前排日仇日的态度。我们不欢迎从前的日本打出帝国主义的旗子，来替我们东方的鱼肉民族，张一张威风，亦能在我们身上与欧美的帝国主义者机会均平的分一杯羹；我们却欢迎这一位不能再打帝国主义的旗子的日本，投入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里，作一个先驱。

苏俄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是我们被压迫民族的好朋友。此次加拉罕代表东来，备受我国社会各方面的欢迎，足以证明我们国民已经认识了苏俄是我们的好朋友。既然认识了他是我们的好友那么，中俄交涉的根本问题，即在缔结中俄两国的亲交，中俄亲交的第一步表示，就在承认苏俄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经解决，其他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了。

我们应该把承认苏俄这件事，作为纯粹友谊的表示，不该把他作为商卖式的外交交换品。只有力能承认苏俄的政府，才能接受并保有苏俄退还中国的权利。但是，这件事如何是那“替人家看守大门”的、“维持国际现有之地位”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地位的外交家所能做得到的呢？

国人近来常说国民外交，我们要从对日对俄的外交态度上看一看，我们的国民外交是不是“大国民”的外交？

没有国民的政府，那有国民的外交？这一点亦望大家注意！

1923年9月16日
《努力周报》第70期
署名：S·C

时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一日)

今逢《晨报》第五周年纪念日，吾乃就“时”的观念发生种种感想。“晨”为日之始，新鲜的朝气，清明的曙光，都随“晨”的时光以俱至。“晨”出吾人于长夜漫漫的暗域，“晨”导吾人于生活迈进的前途。一生最好是少年，一年最好是青春，一朝最好是清晨。周为岁之满，天运人生周行不息，盈虚消长，相反相成。逝者未逝，都已流入现今的中间，盈者未盈，正是生长未来的开始。时是无始无终的大自然，时是无疆无垠的大实在，为“晨”为“周”，都是这大自然大实在流露出来的一体。

时是伟大的创造者，时亦是伟大的破坏者。历史的楼台，是他的创造的工程。历史的废墟，是他的破坏的遗迹。世界的生灭成毁，人间的成败兴衰，都是时的幻身游戏。

时是什么东西？吾曾以之问于玄学，问于认识论，问于心理学，问于数学，问于物理学，问于天文学，都只能与吾以一部分的解答，不能说出他的真实的全体。有的物理学者说，他与“以太”有关。但是“以太”云者究为何物？仙乎神乎，百般捉摸，不能得其正体。近来物理学者努力的结果，已知“以太”云者，本无是物。欧洲有一种学问，名为 Chronology，译成国语曰编年学，曰纪年学，曰年代学，亦曰时学。我欲以时为何物，问之Chronolo-

gy,但这不过是研究时的计算,并未涉及时的根本问题。心理学家又来告我,时是心造,因境而异。同一时间,欢娱则每恨其短,痛苦则每厌其长;怀人则一日三秋,乐生则百年旦夕。地质学家从旁窃笑,谓史学者把几千几万年间的经过,分成上古、中古、近古诸期,其间盛衰兴亡,纷纭热闹,杳乎久矣,而在地质学上看去,这不抵一朝暮间的事。“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吾侪尽自懵着头过这朝菌、蟪蛄的生活罢了。时的问题不能研究,且亦不必研究。说来说去,言人人殊,时的问题,真是不可思议。

哲家者流,究时之义,竭虑殫思,不能得其象迹,乃有拟于空间以为说法者。谓时如一线,引而弥长,既被引者,平列诸点,有去来今。但以此喻说明时的递嬗,亦不合理。因此一线,既已引者,悉属过去,未曾引者,当在未来,现今之点,列于何所?我们知道,三世代迁,惟今为重,凡诸过去,悉纳于今,有今为基,无限未来,乃胎于此。如兹说法,消泯了现今,亦即无异丧失了人生的奥秘。凡诸过去,将于何托?凡诸未来,于何承接?此种说法,不能使人满足。我乃沉思,更得一义:既引的线,确属过去,未引的线,确在未来。然此线之行,实由过去,趋向未来,必有力焉,引之始现。此力之动,即为引的行为,引的行为,即为今点所在。过去未来,皆赖乎今,以为延引。今是生活,今是动力,今是行为,今是创作。苟一刹那,不有行为,不为动作,此一刹那的今,即归于乌有,此一刹那的生,即等于丧失。本乎此理,以观历史,以观人生,有二要义,务须记取:时的引线,与空间异。引线于空间,可以直往,亦可以逆转,我们可从北京来到上海,又可由上海返于北京。至于时间,则今日之日,不可延留,昨日之日,不

能呼返。我们能从昨日来到今日，不能再由今日返于昨日。我们在此，只能前进，不能回还的时的途程中，只有行动，只有作为，只有迈往，只有努进，没有一瞬徘徊的工夫，没有半点踌躇的余地。你不能旁观，你不可回顾，因为你便是引线前进的主动。你一旁观，你一回顾，便误了你在那一刹那在此不准退只准进、不准停只准行的大自然大实在中的行程，便遗在后面作了时代的落伍者。于是另有一义，随之而起。凡历史的事件，历史的人物，都是一趟过的。无论是悲剧，是壮剧，是喜剧，是惨剧，是英雄末路，是儿女长情，都是只演一次的。无论是英雄，是圣贤，是暴君，是流寇，是绝代的佳人，是盖世的才子，在历史的旅途上，亦只是过一回的。垓下的歌声只能听得一次，马嵬坡前的眼泪只是流过一回，乃至屈子的骚怨，少陵的悲愤，或寄于文辞，或寓于诗赋，百千万世的后人，只能传诵他们，吟咏他们，不能照原样再作他们。就是我们糊里糊涂一天一天的过去的生活，亦都为一往而不可复返。看到此处，真令人惊心动魄了。人生既是这样可以珍重的东西，那么朝朝都有晨光，年年都有周岁，光阴似箭，一去不还，我们应该如何郑重的欢天喜地的行动着，创造着过去。凡是遇在这一进不退一往不返的、只能见一面的、只能遇一遭的时的旅途上的人们，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弟兄，我们应该如何郑重的握着手，欢天喜地的亲爱着、互助着，共赴人生的大路。我们不要迟疑审顾的误了好时光，更不要此猜彼忌的留下恶痕迹。机会不可复得，因缘永难再遇。我们在这万劫长流中，大家珍重，向前迈进，走此一遭，必能达到黄金世界的境域。

在空间论前后，前在我们的面前，后在我们的背后。在时间论前后，却恰与此相反。一说前日，便是指那过去的一日；一说

后日，便是指那未来的一日。这样说来，后日却在我们的面前，前日反在我们的背后。日常云用，毫不觉异，此果何故？我尝细思，这等言语，很可以表示我们时的观念的错误，历史观的错误，人生观的错误。寻常设想，总以为时的首脑在于古初，时的进行的方向是向广漠无涯的过去奔驰，吾人只是立在一旁，屹然不动，回过身来，向着过去方面看，这太古的机关车带着这些未来连续不断的时的列车，滔滔滚滚的，似水东流，直向荒古方面奔去，所以误认过去的一日转在吾前，未来的一日反在吾后了。这种时的观念所产生的历史观、人生观，是倒退的，是静止的，是背乎大自然大实在进展的方面的，是回顾过去的，是丧失未来的。要知时的首脑，不在古初，乃在现在，不是向广漠无涯的过去奔驰，乃是向广漠无涯的未来奔驰。吾人是开辟道路的，是乘在这时的列车的机关车上，作他的主动力，向前迈进他的行程，增辟他的径路的，不是笼着手，背着身，立在旁观的地位，自处于时的动转以外的。我们要改变这误谬的时的观念，改变这随着他产生的误谬的历史观、人生观，要回过头来顺着向未来发展的大自然大实在的方面昂首迈进，变倒退的为顺进的，变静止的为行动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奋兴鼓舞的历史观，乐天努力的人生观。

在中国的思想界，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本来很盛，根深蒂固，不可拔除。至于今日，又有反动复活的趋势。虽以论坛权威如章行严、梁任公两先生者，亦有退反于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章先生则一面说，从前衣服既由宽大而趋于瘦小，今则复由瘦小而返于宽大，以证史相的反复循环；一面又说唐碑不如魏碑，魏碑不如汉碑，以证人文的愈趋愈下，似为一种循环的而

又退落的历史观。梁先生则虽犹回顾其《新民丛报》时代的进步的历史观而不忍遽弃，但细味其为文，行间字里，几全为悲观的论调所掩蔽，全为退落的历史观张目，而于进步的历史观深致其怀疑。我本崇今论者，深惧此等论坛权威将为怀古论者推波而助澜，用特揭出“时”的问题以与贤者相商榷，冀其翻然思反，复归于进步论者之林，与我们携手提撕，共到进步的大路上去。这是区区此文的微意。总之，我认时是有进无退的，时是一往不返的，循环云者，退落云者，绝非时的本相。即让一步，承认时的进路是循环的，这个循环亦是顺进的，不是倒退的，只是螺旋的进步，不是反复的停滞。历史的事件与人物，是只过一趟的，是只演一回的。我们今人设若郑重的过这一趟，演这一回，安见不及古人？安见不能超越古人？即让一步，承认古人有非今人所能及的，有非今人所能胜的，他也只是在历史上过一趟的，演一回的，不能因为今人的崇拜与怀思再来一次。我们只有随着这有进无退的时的流转，郑重的过这一趟，演这一回。“要知此一趟的经过，此一回的演行，乃永久存在，永久传流，贯注于人类生活中，经万劫而不朽！”

十二，十一，一。

1923年12月1日
《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
署名：李守常

社会主义释疑*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今天是苏维埃俄罗斯革命成功的六周年纪念，又是本校的“社会问题研究会”的成立日，所以我在此要与诸位作几句谈话。

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人，对于社会主义不明白，有许多怀疑地方。这种怀疑，实在是社会主义进行上之极大障碍。现在所要说的，就是要解释这几种怀疑。

一、社会上有些人，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是穷苦的，不是享福的，因此他起来反对社会主义。不知道在资本制度之下，我们永远不会享福，不会安逸；能够安逸享福的，惟独那少数的资本家。资本主义制度能使社会破产，使经济恐慌和贫乏，能使大多数的人民变为劳动无产阶级，而供奉那少数的资本家。社会上到了大多数是穷的，而那少数的富人也就不能永久保有他的富了。

社会主义就是应运而生的起来改造这样社会，而实现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社会主义是使生产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样一来，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

* 本篇发表时题注：“李守常先生在上大社会问题研究会讲，陈物，张湛明合记。” 一编者

照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

二、有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成立之后，人民就要发生怠工的现象，因此他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施行。他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做工，是很愉快的，很舒服的，并不象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非常劳苦，同那牛马一样，得不到一点人生的乐趣。从前乌托邦派托莫斯·莫阿，他描写了一种理想的社会，他认劳动是最苦而可怕的，所以主张强迫工作。因他目睹资本主义制度底下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是那样黑暗，所以发生这种观念。一般人以为工作是苦事，亦是拿现在生活下的眼光，去观察那将来的社会。其实社会主义实行后的社会的劳动，已和现在的社会的劳动不同了。

如莫理斯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美感的社会主义。他常说：工作能使精神感觉愉快，这就是“工作的喜悦”。即我们日常生活上的喜悦，也多从工作中来。比如烹调，自己弄的东西，总觉比别的好吃，倍觉津津有味。这都是因为自己经过一番工作，含有一分愉快之故。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是永享不到工作的愉快的。

莫理斯最赞美的，是欧洲十四世纪的艺术品，而最鄙视的是现代的艺术品。因为十四世纪的艺术品，都是那时代能感觉着“工作的喜悦”的工匠作出来的。艺术家最希望发表的是特殊的个性的艺术美，而最忌的是平凡。所以现在有一班艺术家很怀疑社会主义实行后，社会必然愈趋平凡化，在平凡化的社会里必不能望艺术的发达，其实在资本主义下，那种恶俗的气氛，商贾的倾向，亦何能容艺术的发展呢？又何能表现纯正的美呢？那

么我们想发表艺术的美,更不能不去推翻现代的资本制度,去建设那社会主义制度的了。不过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要注意保存艺术的个性发展的机会就是了。

由以上所说的看来,我们的工作是要免除工作的苦痛,发扬工作的喜悦的,那里有象现在劳动的劳苦,有怠工的现象发生!

三、又有一般人,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是不自由的。他不晓得经济上的自由,才是真的自由。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底下,那里有劳动者的自由,只有少数的资本家的自由,高楼、大厦、汽车、马车全为他们所占据,我们如牛马的劳苦终身,而衣食住反得不着适当的供养。所以我们想得到真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更该实现那“社会主义的制度”,而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

我们要改造这样的社会,是寻快乐的,不是向那穷苦不自由的地方去,前边已经说明白了。

但是社会上人有一种惰性,这也是我们讲社会主义的人,不可不先注意的!

一九二三年九月七日下午于上大^①

1923年11月13日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① 此处之九月,疑为十一月之误。——编者

研究历史的任务*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我们研究史学，第一先要研究的就是，什么是史？

在中国能找出许多关于史的材料来，什么《史记》咧、《汉书》咧、《三国志》、《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在西洋也可以找出什么《罗马史》咧、《希腊史》咧……等等的书。这类的书，就是史吗？

这类的书，固然浩如烟海，但这不是史，而是供给吾人研究历史的材料。从前许多的旧历史学家，都认这是历史。其实这是研究历史的材料，而不是历史。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不是死的，固定的。

吾人研究有生命的历史，有时须靠记录中的材料。但要知道这些陈编故纸以外，有有生命的历史，比如研究列宁，列宁是个活人，是有生命的。研究他，必须参考关于列宁的书籍，但不能说关于列宁的书籍，便是列宁。

明白了这点，那历史和历史材料的异点，便可以知其大概了。

我们再讲历史学的发展。历史学是起源于记录。英文的史

* 这是在上海大学的讲演，张湛明笔记。题目为编者所加，原题是《史学概论》。——编者

字(History)是问而知道的意思；德文的史字(Geschichte)是事体的意思。发生事件而记录起来，这是史学的起源。

从前历史的内容，主要部分是政治、外交，而活动的事迹，完全拿贵族当中心。所以福理曼(Freeman)说：过去的政治就是历史，历史就是政治。他把政治和历史认成一个，不会分离。

这样解释历史，未免失之狭隘。历史是有生命的，是全人类的生活。人类生活的全体，不单是政治，此外还有经济的、伦理的、宗教的、美术的种种生活。他说历史就是政治，其余如经济、宗教、伦理、美术的种种生活，能说不算是人类的生活吗？可以把它们放在历史以外吗？

及后到了马克思，才把历史真正意义发明出来，我们可以从他的唯物史观的学说里看出。

他把人类生活，作成整个的解释，这生活的整个便是文化。

生物学当然是研究生物的，植物学当然是研究植物的，人类历史也当然是研究人类的生活，生活的全体——文化的了。但文化是整个的，不可分离。譬如这座楼，可以分出楼顶、楼身和基础来。假使基础摇动，楼身、楼顶全得摇动。基础变更，楼身、楼顶也得跟着变更。文化是以经济作基础，他说有了这样的经济关系，才会产生这样的政治、宗教、伦理、美术等等的生活。假如经济一有变动，那些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随着变动了。假使有新的经济关系发生，那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跟着从新建筑了。

他不但发明文化是整个的，他并且把历史和社会的疆域分开。他说：人类的社会，按时间的，纵起来看是历史；按平面的，空间的，横起来看是社会。他又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不但

过去的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即是现在、将来，社会无一时不在变革中。因为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的范围不但包括过去，并且包有现在和将来。

至于什么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希腊的历史学家后世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陀德(Herodotus)已经告诉过我们：

一、应当整理记录，寻出真确的事实；

二、应当解释记录，寻出那些事实间的理法。

据此，历史家的任务，是在故书笈中，于整理上，要找出真确的事实；于理解上，要找出真理。但同是一个事实，人人的解释各异。比如实在的孔子过去了，而历史的孔子，甲与乙的解释不同，乙与丙的解释又不同，昔人与今人的解释又不同。人人解释既然不同，他整理以后，找来自以为真确的事实，当然又不同了。

须知历史是有新鲜的生命，是活动的、进步的，不但不怕改作和重作，并且还要吾人去改作、重作。信手在我们中国历史里边找出几个例来看：

一、在中国历史神话期中，说我们的衣服器具有许多是半神的圣人，给我们在一个相距不远的时代，一齐造出来的。这样记录，我和在座诸君在十年或二十年前，或者都以为真实的。现在我们若拿新的历史眼光来看，知道那些记录完全是荒谬的。现在借着科学的知识，发明一种新机器，也得费若干年月，在那蒙昧时代，怎能这样迅速！

据人类学家，考察人类的起源，是因人从前有四条腿，和别的动物一样。女性的人，怕他的孩子被他兽残杀，乃习用其前足抱子而奔。人是这样渐渐的进化，才成了用手用胸用两足走路

的动物。人类渐渐的站起来用足走路以后，腹部因蔽体的毛稀薄，感畏风寒，乃渐取树叶遮盖；后来旁的地方怕受风寒，也会想法去遮盖了。这就是衣服的起源，由树叶到衣服进步更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月！

由茹毛饮血的生活而渐进于游牧的生活，由游牧的生活而进于畜牧生活，而进于农业生活，手工业的生活，机器工业的生活，这里边有很悠久的历史，并不会一时得到的。我们现在根据进化论去解释这些记录，比在数十年前的观念已大不同了。

二、中国古代的姓，如妫、媯、姬、姜等字，都从女旁，这些字何以都从女？前人的解释，多谓人因地而得姓。例如某某的母居姜水，故姓姜；某某的母居于妫水，故姓妫。但由我来解释，不是这样。我以为妫水、姜水的地方，是因人而得名的。因为有姓姜的在那里居住，所以名为姜水；有姓妫的在那里居住，所以名为妫水。姜、妫的姓都从女旁，是因为那个时候，是母权时期，所以子从母姓。我们再就社会的现状观察，姓张的村子叫张家村，姓李的庄子叫李家庄，都因所在的姓氏而得名，决不是因为住在张家村才姓张，住在李家庄才姓李的。那些妫水、媯水、姬水、姜水的名称，也因为古代的人好临水而居，那水也就各因其姓氏而得名了。

我们拿着新的历史眼光，去观察数千年前的故书陈籍，的确可以得着新的见解，找出真确的事实。

三、就近二十年来，河南所发现的古物，更可以断定旧日史书的虚伪。中国经济学上的名词多从贝，如货字、买字、贾字等都从贝。按历史学家考察，最古的时期中，经过一种靠贝为生活的时期。中国旧史的记录的，中国在太昊、神农时，已有金属铸

造货币。但现在按河南发现的龟版文字，一为考察，那些上面所刻的字，并无从金边的字，而只有从贝的字。果然当时已是用金器时代，何以不能发现一个金字？

中国古书固然伪的很多，然在较为可靠的《书经》的《商书》篇亦是说“具乃贝玉”，当时贝玉并称，而不说具乃金玉。果然当时已有金属制品，何以在殷代以前，不发现一个“金”字？

到了后来《诗经》上才发现许多“金”字，往往“金”、“玉”并称，便有“金玉其相”一类的话了。

就此可断定，旧史所纪是虚伪的。在殷代以前，还是靠贝的生活，还是石器时代；殷代以后到了周朝，才入了铜器时代，才有金属的制品了。

这样的例举不胜举，我们按这许多例，可以断定往日记录有许多错误，是可以改作重作的，是必须改作重作的。但我们所改作的重作的，就敢断定是真实的、一成不变的吗？历史是有生命的，僵死陈腐的记录不能表现那活泼泼的生命，全靠我们后人有了新的历史观念，去整理他，认识他。果然后人又有了新的理解、发明，我们现在所认为新的又成了错误的，也未可知。我们所认为真实的事实，和真理的见解并不是固定的，乃是比較的。

希腊历史学家格罗忒(Crote)出，又有人说，他的《希腊史》比希罗陀德的好，第一因为希氏缺乏批评精神；第二因为希氏喜欢什么，便注意什么真实。但我们要说公平话，他所注意的未必是对，在希罗陀德时代，能够得到那样结果，已经很难的了。我们不能因见了格罗忒，便来非薄希罗陀德。格罗忒的《希腊史》，果然就是最完全的吗？这也不过是比較的真实的罢了。

所以历史是不怕重作改作的，不但不怕重作改作，而且要改

作重作，推翻古人的前案，并不算什么事，故吾人应本新的眼光去改作旧历史。很希望有许多人起来，去干这种很有趣味的事，把那些旧材料旧记录，统统召集在新的知识面前，作一个判决书。

从前的孔子观念，是从前人的孔子观，不是我们的孔子观。他们的释迦观、耶稣观，亦是他们自己的释迦观、耶稣观，不是我们的释迦观、耶稣观。他们本着迷信为孔子、释迦、耶稣作传，辉皇孔子、释迦、耶稣为亘古仅有天纵的圣人，天生的儿子，说出许多怪诞不经的话。我们今日要为他们作传，必把这些神话一概删除。特注重考察他们当时社会的背景，与他们的哲学思想有若何关系等问题。历史原是有生命的，不是僵死的；原是进步的，不是固定的。我们本着新的眼光，去不断的改作重作，的确是我们应取的途径了。

以上的话，归结起来：记录是研究历史的材料；历史是整个的、有生命的、进步的东西，不是固定的、死的东西；历史学虽是发源于记录，而记录决不是历史。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指出吾人研究历史的任务的是希罗陀德。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

- 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
- 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

1923年11月29日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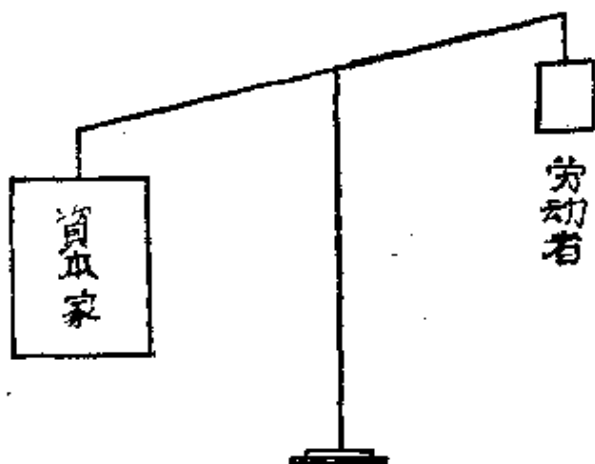
劳动问题的祸源*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四日)

劳动者为什么发生问题呢？凡是发生问题的，一定是知道不对了，须要设法改良的。譬如说，火车发生问题了，那一定是出轨了，或是两辆相撞了；否则，火车好好地轨道上驶行着，说它有问题了，那不是笑话吗？所以劳动者倘使生活安宁，那就没有问题了。现在为了有意外的事，有病了；但既有病，他的病源在哪里呢？现在且把劳动问题的祸源详细地说一说：

(一)工银制度 工银制度就是卖买劳力，资本家是买主，劳动者是卖主；工银是价格，劳力是商品。固然，卖买劳力，要是双方平等的，那也没有什么反对的，因为互相平等的，可以卖，可以不卖；可以买，也可以不买的。譬如到商店里去买东西，他们的商品和价格相等，那我是可以买，可以不买的。这些平等的卖买，我们原是不反对的。但是为什么要反对卖买劳力的工银制度呢？因为它制度下面，有(一)经济自由，(二)个人订约，两个要素的。因为在工银制度下有经济自由的，所以倘使有了一百万的资产，他就要了不得的。那政治、法律又是帮助有产者，保护资本家的。因此，无产的劳动者受到莫大的毒害。因为在工

* 这篇文章是“劳动问题概论(二)”讲演中的第一章第二节，前后部分均未找到。——编者



银制度下有个人订约的，不承认团体的，所以一个无财无力的劳动者和一个拥有百万财产的资本家订起合同，哪能够平衡？劳动者哪能不吃亏？一个劳动者不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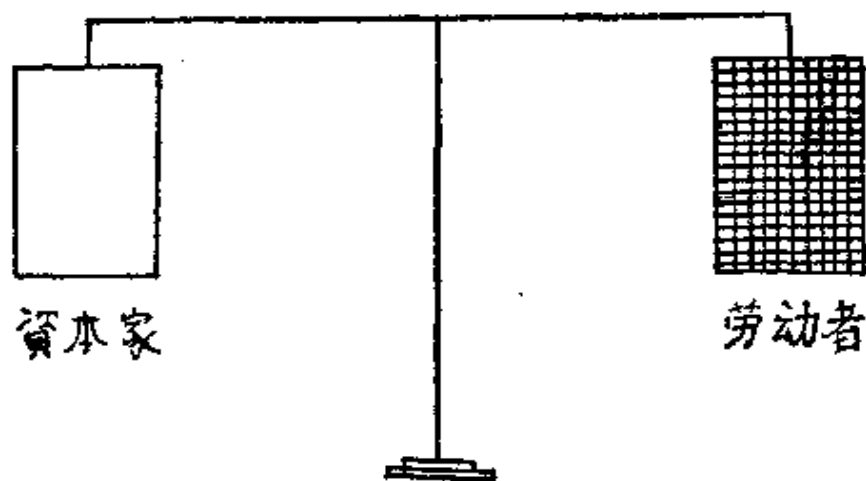
是一个资本家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和那资本家相比较，不相等势力的订约，结果，都是把劳动者劳力的报酬减削下去，由几千元减至几角钱也有，还有减到不能维持生活的！譬如一个二十岁的工人，他在二十年内至少也要用去二千元吧，倘使每年以一分利率计算，那他也要有每月二十元的工资，可是现在只有二元！这是何等的苛虐呵！劳动者其实只要做六小时工作就可生活了，但资本家要他作十二小时十四小时的工作，才给他生活费，勉强的能够生活！并且资本家有时竟可使劳动者不能生活，因为资本家可以不买劳动者劳力，而劳动者却不能不卖劳力的。所以在工银制度下的劳动者，简直不如牛马！牛马有了疾病，主人还要设法去医治的，因为牛马是主人财产的一部分，失去了牛马就是失去了他财产的一部分。但是对于劳动者呢，一些没有什么顾惜的，合则留，不合则去，随你有什么病，什么患难，和他是没有关系的。劳动者的价值真是牛马都不如呀！在工银制度之下。

社会主义者，不论最激烈的到最和平的，都反对工银制度，但是有些实际的改革家，好象霍勃孙(J. A. Hobson)这些人，以为工银制度可以奖励人类向上和进取的精神，倘使没有了奖励，

人们就不做工了。要增加人们的工作，不能不实行奖励的工银制度。工银制度虽是有许多坏处，但有一个最有益的好处，就是行奖励作工，使社会上的文明，也一天一天的进步。霍勃孙又主张由工银制度变成合作的性质，这个不是社会主义的主张。社会主义者主张统统合而为一，由国家管理的；那主张合作的，不过把工厂内合而为一罢了。但是这个仍是不能算彻底的办法。

补救工银制度的祸害，只有二个方法：（一）舆论的鼓吹；（二）劳动者的团结。这是无论对付什么问题所必需的方法。罗素在他的《宣传和文化》里，他主张以舆论来改造一切的制度的，那舆论的力量的大，也可想而知了。美国工人不但和资本家发生卖买关系，并且还要被迫信仰他们所信仰的宗教，赞成他们所赞成的党派。在入一工厂做事的时候，他们有一张表格，内中开列许多问题，强迫你要答出来的，倘使你和他的信仰不同，意见不同，简直不能工作的。这种不正当的干涉，也惟有靠舆论来改革！

现在那些资本家对于劳动者有些畏惧心，完全是为了劳动者还有一些团结力罢了。劳动者合了几千个或是几万个去和一



个资本家争，那也可得到好的结果。譬如右面的天平似的，百个劳动者不及一个资本家，那可加到千个，倘使能够再加到万个，终有平衡的可能了。“合则存，散则灭”，真是宝贵的格言呀！倘使许多团结的劳动者和一个资本家争，那社会必能表同情于劳动者的；因为社会是以多数为是的，一个和许多，许多的终容易得到社会的同情心的，为了得到社会的同情心，更容易和资本家相争得胜了。倘使一个工人和一个资本家争，那资本家在社会上势力当然比劳动者要大的多，社会当然容易同情于资本家了。所以劳动者的团结，实是不可忽略的。

舆论的鼓吹是社会的外力的补救法，劳动者的团结是内力的补救法。这两个方法，都是非常重要的。

(二) 资本制度 二十世纪的文明，是从资本制度产生出来的，它的有益于社会，固是很大；可是照现在看来，它的罪过于功了，我们再也用不着它了。资本制度是科学家和劳动者所造成的。它的资本是什么地方来的？简单地说，就是“生之者众，用之者寡”罢了。自从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勃兴，到现在，在这三百年内，大部分的劳动者生产的很多，在用去的却很少。自然，少数的资本家常常浪费浪用，但终比不过劳动者生产之多。好象一个劳动者，他有十分的生产，他自己只用去〇·五分，余的九·五分被资本家拿去，但是资本家也不过用去了一·五分，还有八分余下的。这个余下的，就是资本，造成资本制度的原素。科学家利用劳动者造成的资本，尽力地去研究、发明，造成现代的文明。但是资本制度越发达，在资本制度下的文明越进步，劳动者越受苦痛呢。资本制度发达了，各种大规模的组织日渐增加，各种机械也是一天一天的新发明，于是从前要十百人在长时

间内做成的，现在只要一二人在短时间内做好了，无数的劳动者都因此失业了；就是有不失业的，也不能不迁就资本家的意志了。不但劳动者受害，就是小资本为了无力购买机器，也不能不附和大资本家了。这样，资本只是集中于少数的大资本家手里了，其余的人，都是生活漂摇不定呢。从前在独立工作的时候，劳动者非常利便，好象一个皮匠，他挑了一副担子，在人家门口来往，倘使有人要他补双皮鞋，他就停下来，讲了价钱，倘使价钱讲不对，他就挑了担子到别处去了，这是何等自由。但是后来渐渐扩大了，开皮匠店了，……设立了工厂了，那时候就不能随皮匠的便了。资本家说，你要来作工，每天二角五分，你不愿意就不必来。但是他不能不到工厂里作工了，否则便可饿死！就是开学校，现在也不容易。从前蒙馆的时候，一个先生随便弄间房子，教教书，可是现在不能了，小学教员要检定，教员要有资格，学校要有设备，而且还要有基金。倘使不能合式，就要勒令封闭呢！现在再说，劳动者生产的资本，被资本家收括去，那我们果然要反对的。但又有些人说，劳动者的生产不是属于资本家，是属于社会的，我们人类是社会中的一分子，那何必去反对自己的社会有资本呢？但是这也不对的。社会，横的方面有许多阶级，纵的方面有许多职业。现在的资本，不是在全社会手里，而在少数的高阶级的某种职业的资本家手里罢了，所以我们也不能不反对的。为了资本集中于少数人手里，就成了利害截然的劳、资两阶级的仇疾，酿成现在很难解决的劳动问题。

（三）工厂制度 工厂制度是资本制度下的产物。既然知道资本制度的罪恶，那又何必再说工厂制度呢？不过工厂制度实有特别的罪恶的，不能不详细地说一说；

一、儿童和妇女的工作问题 儿童不去工作，也是要在学校里读书的，现在不过不去读书到工厂工作。妇女在从前的时候，在家庭里也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忙得一天到晚的，现在有了工厂制度，不过舍了家庭里的工作，去到工厂工作。渠们的工作仍是一样，那有什么问题呢？可是儿童们为了要工作，失去读书的机会，失去预备将来的大事业的机会了，而且他们身体没有发育完全，劳力过度，妨碍了身体的康健。妇女们为了要工作，失去家庭的快乐，在家庭里虽是也工作的，但都是互相帮助，快意的，而且为了生活所迫，在孕育期内也不能不去工作，因此有流产的，甚至伤及性命，那不是悲惨的景象吗？儿童们、妇女们，自从工厂制度勃兴了，劳动者失去了讨价的能力，收入骤然减少，为维持家庭经济起见，不能不也到工厂里去作工，但是他们的体力那能及得男子和成年人呢？那些男子和成年人无论什么粗力的、污秽的事都能够做的；但那些微小而瘦弱的儿童和妇女们要去和他们比较，那能及得？在学校里读书，同学们是和善的、愉快的、相爱的；在家庭里作工，家人是互相帮助的；可是一到了工厂，和善愉快的空气散去了，相爱相助的精神淹没了，只是满布着刻薄、相竞，……的厉气，洁白的儿童、柔弱的妇女，那能够接受呢？于是渠们精神上都受到不可言状的痛苦了。

二、工业上之危险 工厂里作工比从前家庭工业危险得多，意外的生命危险，在工厂中常常听得。机器是无情的，一个不留心，就可送命。开矿的也常常有死了许许多多的。化学工厂中的许多药品，都可使人们的生命危险的。不但这样，那些儿童和妇女，常常为了空气的不流通，食物的不卫生，……使他们生命发生危险。大概自然的工作是很好的，而那超过人力的工作

是容易使人生病的。工人的寿命比农夫要短三分之一呢。在工厂里，四十岁的或是五十岁的工人，很少很少的。田家的白发老农夫，是常在每一村子里能找到的。——中国人常称农夫叫老农的，那可见农夫寿命的不短了。在工厂里的工人，固然为了机器的、空气的各方面，以致危及生命，但工厂设备不完善，也是一个原因。

三、失业问题 资本家只以赚钱为目的，所以有不能赚钱的工厂，不讲这工厂需要不需要，就关起门来，去做别种事了。这样，工人们忽然失业了。上海纱厂工人近来有十几万失业。日本大灾后，中国要想运华工去做工，可是他们却不要我们去，他们说，食粮也好，衣服也好，却不必运工人来。可见日本虽受了大灾，死了许多人，但还没有缺少工人之患，这全因原来失业者太多，工人过剩的缘故。工人过剩了，失业者多了，社会秩序因之愈为紊乱。欧洲有人以为劳动者失业问题，应由政府去负责的。

四、工厂规则的严苛 工厂规则完全是保护资本家的利益的，对于工人们底幸福方面，剥削殆尽！工人的独立人格，工人的自由权，在工厂规则里，完全淹没了！不愿意做的，也要做，有些完全无关于他的工作的事，也要叫工人做，甚至在工厂亏了本的时候，也要在工人身上想法。所以工人在工厂不感觉什么乐处，只是觉得不自由。行动不能自由，衣食也不能自由。吃水是不准的，于是有些人渴得不开交；吃烟也不准的，于是有些人带了烟草来吞下，结果成了肺癆。工厂规则，真严苛呵！

（四）社会上少数人的统治权 商业渐渐地发达了，资本家操纵社会经济权，同时，一切的政权也被他们少数人握住了。因

为政治是跟从经济状况而变更的，政权只是有经济权者所执的。经济阶级是直接的或间接的也可以控制我们政权的。中国所以十二年还没有革命成功，因为经济阶级没有受到痛苦，不想去革命。他们——握有经济权的商人——只是唱着和平，所以革命终不能成功。好象辛亥革命时，全国经济阶级都相助了，便能成功。经济阶级可以左右国家最高议会的。一切的政治，都是经济阶级造成的。大家想，美国钢铁大王，在什么选举，他手下常有一百多万的票子，所以选举大总统的时候，只要几个实业大王不愿选那人，那人就不能当选大总统了。在实业大王下面的人，政治能力都失去了，只是唯大王之命是听的。在资本制度下面的劳动问题所以成为世界上难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了资本家有政治上的势力的缘故。

1923年12月4日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李守常

王著《货币论》书后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八日)

效文吾弟！

大著已草草读过，匠心之作，有功经济学界非浅；惟关于古代货币史料，据我搜集之所得，颇有足资吾弟参证者，特裁陈如下：

中国春秋时代，贵族间的馈赠礼聘，都用兽皮，昏礼亦用鹿皮纳征，似亦有以兽皮为币的痕迹。

英语资本为 Capital。Capital 亦训头，故称首都。说者谓系古代以牛为币的遗迹。

牛在中国古代，似为一种重要财产，曾经用为货币，亦未可知？《说文》：“半，物中分也，从八，从牛；牛为物大，可以分也。”又“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物之大于牛者多矣；物从牛，分物为半亦从牛，似非因其大而始有所取于牛也。以我释之，牛在农业社会，为主要财产，曾充货币（即交易中介）之用，亦未可知？故半、物皆从牛。

中国古代，金属铸造货币之起原，果在何时？此实一值得研究之问题。人类最初之居所，实为森林；至于冰期，草木因严寒而凋萎，食物顿遭缺乏，不得不徙居水滨，依贝鱼为生，人们在这里生活甚久，所遗留下的贝壳，堆积地上，占很广的面积，在每个

大陆沿着河滨海岸都可以寻得。考古学者称之为贝陵 (Shell heaps), 亦曰贝冢 (Kitchen middens); 故古代人民多有用贝为货币者。中国用贝为币的痕迹, 尤其显著。《说文》: “贝, 海介虫也。居陆名蜃, 在水名蜃, 象形, 古者货贝而宝龟, 周而有泉, 至秦废贝行钱。”我们试看凡经济学上的名辞, 全从贝字, 足证中国在石器时代以贝为主要的货币; 从贝的字, 如财、货、买、卖、贵、贱、贷、负等皆是。由殷墟掘发出来的遗物中, 只有以石或骨仿造的贝形物, 绝无金属货币及其他金属物; 而掘发出来的龟版文字, 迄今所能辨读者, 只有贝字, 或从贝的字, 而绝无金字及从金的字。又考《尚书》中的《商书》五篇, 惟有贝字及从贝的字, 而金字及从金的字, 则未一见。有金字及从金的字, 自《尚书》中的《周书》及《诗经》始。《商书·盘庚》: “兹予有乱政同位, 具乃贝玉”不曰金玉, 而曰贝玉。《诗·大雅·棫朴篇》: “追琢其章, 金玉其相”。便云金玉, 不言贝玉矣。又《商书》中, 全不见金属器物的名称, 至于《诗经》, 则数见不鲜。如“钟鼓乐之”(《关雎》), “庠乃钱镈, 奄观铎艾”(《臣工》), 足证周代已渐入铜器时代, 而金属铸造货币之起原, 似当在周代以后, 周以前似尚未有金属货币。所谓五帝时, 已有铸造的金属货币之说, 恐不足信。《商书》在《尚书》中, 为比较可信之部分; 《诗经》亦非伪书, 故颇可置信。又证以发掘物, 此种论定, 似不为过于武断。故就所知, 以质吾弟, 倘能汇集史料, 进而为精细之研究, 不惟有裨货币学, 即史学亦获益非浅。斯不能不望之吾弟矣! 匆匆不尽白。

大钊敬书

1923年12月8日

《时事新报》副刊《商学》第33期

《清代通史》序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愚尝谓一切历史的记录，皆不过为研究史学之资料已耳！此等编册档案以外，吾人固俨然有一延续永存之活历史在。历史学即以此活历史为所研究之对象者也。一切史书皆为纪述解释此活历史而作，故皆为此活历史所据之领域。综而别之，史学可分为普通史、特殊史两大类，而普通史与特殊史，又各有其记述之部与理论之部。记述的普通史，为个人史(传记)、氏族史、社团史、民族史、国民史、人类史等是；记述的特殊史，如经济史、伦理史、艺术史、文明史等是。

夫历史既为延续永存生动无已者，则其迁流于健行不息之时间，新陈代谢，兴衰迭现，绝无一瞬间停歇；则吾人关于史实之搜求、纪录、解喻、说明之业，亦当精勤弗怠，追从此滚滚不尽之史潮以进，而无一瞬间停歇；俾史料少所散佚，史观益趋正确；此真史学者之盛业，而亦不容旁贷之大任也！盖历尽万劫，史乘之作陈于人间者，悉无完成，悉无终结，时间之推演愈深，即史料之产生愈益繁富，史实之解喻愈益正确；所以一切史书皆不惟重作，且必须重作。故史家之责任，一方宜勤求关于现在发生之史实，载之纪录，勿使散佚，为后世存留较为详确之史料；一方宜就过去之史实，依新史料、新史观，以为改正修补，匡其谬而足其

阙。史演无已时，即史业无已时。积累代学者之绩业，必能发见足以解释一切史象之法，而与人生进路以豫见之导星，此史学之所以有大效用于人生也。

萧子一山，以绩学之余，著《清代通史》一书。书成，执以示愚，愚受而读之。知其书之性质，为有清一代之中国国民史，置之史学系统中，当为普通史中之记述的国民史；取材既极宏富，而于文明与政治诸象，统摄贯通，以为叙述，且合于社会诸象悉相结附、不能分离之史理；愚故乐为之序。冀著者之益精厥业，以此著为重作中国各史之先声也！

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李大钊

1923年12月
《清代通史》初版本

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

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江大河，有时流到很宽阔的境界，平原无际，一泻万里。有时流到很逼狭的境界，两岸丛山叠岭，绝壁断崖，江河流于其间，曲折回环，极其险峻。民族生命的进展，其经历亦复如是。

人类在历史上的生活，正如旅行一样。旅途上的征人所经过的地方，有时是坦荡平原，有时是崎岖险路。老于旅途的人，走到平坦的地方，固是高高兴兴的向前走，走到崎岖的境界，愈是奇趣横生，觉得在此奇绝壮绝的境界，愈能感得一种冒险的趣味。

中华民族现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在这一段道路上，实在亦有一种奇绝壮绝的景致，使我们经过此段道路的人，感得一种壮美的趣味。但这种壮美的趣味，是非有雄健的精神的，不能够感觉到的。

我们的扬子江、黄河，可以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扬子江及黄河遇见沙漠、遇见山峡都是浩浩荡荡的往前流过去，以成其浊流滚滚，一泻万里的魄势。目前的艰难境界，那能阻抑我们民族

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要知在艰难的国运中建造国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

1923年12月20日

《新民国》第1卷第2号

署名：李守常

十八年来之回顾*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今日是母校十八周年纪念日,就是母校十八岁生日的一天。母校的生日,好象母亲生日是一样。母亲生日的那一天,同胞兄弟庆祝一堂,是很高兴的。我们母校的生日,我们同学大家也欢聚在这个礼堂,和庆祝母亲的生日是一样的高兴。所以我今天说不出是怎样的快乐!发生了许多的感想,只好就这个题目——十八年来之回顾,说出我的感想来。

十八年世界上的事情很多,若件件去讲,是办不到的。只能回顾与我们有关系及重大的事,还就着我所知道的说,那我不知道的,只好待别位同学来讲,那没有关系及不重要的也得丢开一边。那么,就分二部去讲:一部是人民运动的经过,一部是本校同学运动的经过。

人民运动的经过,又分我国与外国的事情。现在先说我国的,讲完了以后,再把外国的重大事情,简单说明。

母校诞生在光绪三十二年,即西历千九百零六年。回顾光绪三十二年,不禁又想到三十一年,即母校诞生的前一年。当三

* 本文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在直隶法政专门学校十八周年纪念日庆祝会上的讲演记录。原题注:“李守常先生讲演,邢有森、杨景濂笔记”。——编者

十一年时候，前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吴樾在东车站放炸弹，要把五大臣炸死。他的意思是阻止前清的假立宪。霹雳一声炸弹响，那革命历史就开始了。孙中山在海外组织同盟会，作革命的运动。同时母校也随着这声炸弹响，产生下来。

光绪三十二年前清颁布假立宪，正母校诞生的时候。革命运动很激烈，而前清政府防止的也很厉害。母校成立，从我们一方面看，是预备革命和改造的运动；从前清政府一方面看，是拿我们一般人作假立宪局面的点缀，或说是为假立宪造就人才。随着这两方面不同的意思，母校于是乎诞生。

光绪三十三年即西历千九百零七年，是母校诞生第二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在安徽起义，结果失败，同志死难的很多。清廷一面防止不测，一面敷衍人民，人民则为积极的改革运动。改革运动有主张请求立宪，有主张革命，而有立宪派、革命派的分别。立宪派的人就联络海外华侨，请求清廷立宪。清廷看人民的要求，不得不敷衍，遂饬各省设立咨议局。革命派的人，象孙中山先生也联络同志，在云南起义，结果归失败。一年之内，清廷对于人民要求(立宪派)取敷衍主义，对于人民反抗(革命派)取防止主义，禁止人民聚会开会演说及学生参与政治运动。

光绪三十四年即西历千九百零八年，光绪死，罢免袁世凯职，清廷由摄政王摄政。各省人民都起来要求开国会，运动很激烈，清廷不得已允人民要求。这一年母校的同学也参入要求开国会。清廷命各省咨议局开会。是年宣统即位(宣统元年)。

宣统二年，北京资政院及各省咨议局开会，外患有安奉铁路问题发生。在天津方面遂引起学生的激烈的政治运动，我们同学也参入运动，也分立宪派、革命派。立宪派运动的结果失败，

温世霖被发往新疆。革命派运动，象本校教员白雅雨先生，奔走于滦州第二十师军队中，后殉于难。这是本校最紧要的一年，详细情形，留在回顾本校同学运动的经过，再为细说。

宣统三年，三月间黄克强先生率青年同志，归自海外，在广州起义。死难的很多，有七十二烈士，其实死的不只七十二烈士。七十二烈士都葬在黄花岗，其初名字不全，到了民国十年，才把七十二烈士名字填清楚。我曾到过黄花岗，起一种特别感想，殉难的都是纯洁的青年，作政治运动的大牺牲，这黄花岗与民国产生很有关系。这次虽遭失败，却是后日成功之母，而一般革命家都因之而起。清廷又下令收川汉铁路为国有，而黎元洪等起义武昌，各省响应。我们同学当时也参加革命运动，有奔往滦州的，有奔往徐州的，细情也留到回顾本校再说。后来革命成功，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宣布约法，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蒙古宣告独立。

民国元年，清帝退位，参议院成立。女子同盟会要求女子参政权。

民国二年，革命元勋宋渔父先生，极力主张把同盟会扩张成国民党，受袁世凯的嫉妒，暗使人把宋渔父先生刺杀在上海。汪精卫先生很反对这事，他愿意维持同盟会，以为同盟会是革命党的根源，在革命没有成功以前，不应该把同盟会解散，组织国民党，把不纯粹革命分子拉进来，至今汪先生尚以此事行为遗憾。宋先生在上海被刺，有主张平和解决的，有主张用武力与袁世凯解决的，于是遂有二次革命起于南京，结果失败。国会正式开会，各省省议会也开会。因有二次革命的缘故，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宪法起草委员会自行解散，江苏省议会解散。

民国三年，袁世凯解散参众两院，停止各省省议会开会。欧洲大战发生。

民国四年，筹办“筹安会”，伪造民意，佐袁世凯为皇帝，意欲推翻共和，重建帝制。日本乘机于五月七日提出“二十一条”，迫中国承认。当时蔡松坡先生在京，袁世凯监视甚严，后来蔡先生逃至云南，与唐继尧起义。

民国五年，西南诸省宣布独立，反对袁世凯称帝。袁不得已取消帝制，忧愤而死。副总统黎元洪又召集各省省议会，重开国会。这年内有最可纪念者，黄克强先生死于上海，蔡松坡先生死于日本，民国伟人又弱了两个！

民国六年，罢免段祺瑞职。山东、福建、江苏等省，反对国会。黎元洪辞职，冯国璋继任。西南诸省反对解散国会，宣告独立。张勋率兵入京，拥宣统复辟，推翻共和。段祺瑞在马厂誓师，打败张勋，重建共和，段祺瑞又重掌中央政权。西南诸省组织军政府，召集非常国会，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统。吴佩孚在岳州开会，主张与南方用武力解决。

民国七年，南方军政府重新组织，反对北方徐世昌为总统。北方召集新国会，举徐世昌为总统。段祺瑞练参战军，以备与德国开战。

民国八年，学生反对“直接交涉”，作“五四运动”，驱逐曹、章、陆。南北两政府在上海组织和平会，南北议和。段祺瑞所练参战军，改为边防军。

民国九年，直皖战争，结果直系胜，皖系败。北方政府解散学生会，阻止学生参入政治运动。南方军政府瓦解。

民国十年，南方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川鄂宣布自治，吴佩孚

君年纪本小就哭起来了。诸位同学对他很表同情，就同黎监督交涉，一方面学生在现在没有被火烧的东大讲堂（现在已改成图书馆）开会。斋务长看见学生开会，恐怕有政治上运动，走告黎监督，黎监督也不问所以，往藩台臬台衙门去报告，带来许多的兵把学校围住。学生推举了八个代表去讲话，八个代表的名字记不清楚，讲话以后也没有甚么结果，无条件的，就把八个代表都斥退。别位同学很不平，以为我们举出来的代表无故斥退，我们无颜再在校内居住，于是大家都搬在外边旅馆。黎监督劝阻大家，拿很和蔼的态度，没有效果。又经绅士劝解，劝大家回校，八个代表是不能回校的，诸位可替他们介绍别的学校。后来都回在校内，推出代表来，白愷亚先生等和监督打官司，也没有甚么结果。

这次风潮其初原因很小，不过为酱油而已。到了后来，拿兵围起学校，斥退代表，闹了个很大，学生方面有不得不如此的原故。这次风潮影响是怎样呢？风潮影响于我校是很大的，是很恶的！早先斋舍整理的很好，秩序很整齐，经了这次风潮以后，都变坏了。风潮的结果没有好结果，只得到恶结果。所以外人对这次风潮很不满意，我们对他也觉很不幸的！希望我们同学，以后不要以小故而起绝大的争端。倘若遇见这样事情，务请和平解决才对。

政治运动分二派：一是立宪派，一是革命派。那时中国北部政治运动的中，心首推天津，天津以北洋法政学校为中心。所以我校在政治运动史上，很关重要。我们今天要谈谈，以后还怕没有人知道。时当宣统二年，日本要强迫攫取安奉铁路，东省代表来津求援，天津学生在东马路开会欢迎，共举温世霖为会长。

本校同学立宪、革命两派，立宪派公开运动，革命派秘密运动。同学多数属于立宪派，少数属于革命派，于永滋、王德斋两位先生是革命派中心人物。立宪派打算全体往北京请愿，要求政府开国会。本校同学在东大讲堂（现改图书馆）开会，同学秦广礼断指写血书，激扬民气。同学孙可君断肘，大家非常激烈。孙君断肘之后，全身为血所染，许多同学鼓掌叫唤，都以泪相见。此时同学只以血泪相见，李监督、邓和甫都劝大家不必自杀，可以积极想法就是了。那种悲惨激昂的光景，我终身不能忘！大家闹了一天，夜间开会，相约明天黎明整队到广东会馆开会，作请愿的运动。过河的时候，碰见李监督，李监督善言相劝，教大家回校再商议，学生不肯。平时学生对监督谈话时非常客气，这时候也不客气了。一直到了广东会馆，商议上府院请愿。全天津学校的校长及提学司也都来到广东会馆，劝阻大家不要走，大家不听，把诸位校长及提学司围在中间。这时候的群众心理，那里还可以理喻？若工夫一大必有不测。李监督为人聪慧机警，见这般光景，实有不了之势，他就站在台上，对众嚷道：“你们要请愿，我们帮着你们。”众鼓掌。“大家出发的时候，必须有秩序。”众鼓掌。“我们要先走一步。”众鼓掌。于是，各位校长及提学司得免于难。大家全体出发，电车也停了，到了府院衙门前都坐下，要求立时给北京打电报，使其立宪开国会，还要立时等回电。又整队往省议会去请愿，在道上碰见道台坐着马车，大家把道台打了个不亦乐乎，马车也碎了。后来同学劝止，才把道台放走，逃了一条命！这是大众的狂热，于事业上没有多大效果，但当这时候也没法劝止，后来学生各归本校。

风潮闹完之后，当局方面以为风潮起的原因，都因为会长的

鼓动，于是把温世霖放逐到新疆去，学校方面提倡提前放假。当时大家没有出息，见学校里提前放假，都归家去了！象这狂热的政治运动，不一时就消灭。这次风潮的结果，大家把温世霖先生送到新疆，谁也不闻不问了！

这次风潮，算立宪派运动失败，而革命派进行越发有力，从此立宪派的人也都倾向革命派，大家都觉得对温先生义气上过不去，只好再等机会。革命派组织秘密团体，上海的《克复报》、福建的《民心报》、香港的《中国报》，对于革命思想，充量介绍。同学订阅该报不少，大家都抢着看报，情愿不上班，也得看报，于永滋、王德斋先生亲往邮局去取。同学奔走革命的，白雅雨、于永滋往滦州，王德斋往徐州。白先生平时很古板的，这时也作革命的运动。滦州革命失败，同学以为白、于二先生不免于难，恶耗传来，大家悲伤得很！后来才知道白先生确乎身殉于难，于先生幸免。给白先生开追悼会，就在这个礼堂上。那追悼白先生挽联的字句，今天我来在这礼堂上，还仿佛有人念给我听！当天津学生政治运动正在昂激的时候，上海《民立报》上天天有一段时评，告诉我们学生，应该作甚么样运动。后来清廷起用袁世凯的时候，袁世凯在河南即打电给天津督署严防某法校，就是本校。可见本校当时很受官府的注意。河下驻扎有兵，是监视本校同学的运动。当时有两位日本教员，一系吉野作造，一系今井嘉幸，在本校当教授，后来两位归国都极力鼓吹平民主义，介绍民治思想，作民权运动，教导他们国民，日本国民很受他的恩泽。剪发运动也很有趣味，同学黄君首先剪发，那时剪发的很少，都以为希奇，当黄君进食堂的时候，大家哄然笑他，监督知道了，给黄君为剪发记了一过。

而今回顾从前加入政治运动的同学,已经有些死亡凋零了,真是不堪回想!白先生雅雨在滦州革命的时候就死了,断肘的那位孙先生在二次革命也死了,还有许多死了我不晓得。那末,同学参加政治运动的死去了大半,而民国建设还没有成功,有许多责任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开出路子来,觉着非常的惭愧,只好把我们没有尽的责任,推到后来诸位同学身上。早先我们的历史是很短小的,算不了甚么,光华灿烂的历史还在后边。我今天说的这些,不过是本校历史的“破题承”,那本校历史的正文,不知道将来有多少人,象我站在这地方,给大家讲那本校有声有色的历史。现在本校历史是很幼稚,但历史没有不继续的。我们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离了本校在社会上去作事,那发扬本校的精神,尽国民的责任,希望诸位后来的同学,在学校极力培养自己的学问,赶快去担负那些责任,不要回顾,不要踌躇,一往直前。高先生所说国家是工具,我们要知道怎样应用,有许多法子,利用国家不出流弊。我到母校以后,一方感慨,一方乐观。感慨的是,参加政治运动的同学,死去大半,不能再相见了!牺牲他们大好生命,而民国的国家,天天在昏迷不醒之中。早先食堂里饭桶声,也听不见了,食堂的房舍,也改变了。乐观的是,校中树木早先很小,现在都森郁起来,那种焕发活泼的气象到处弥漫。我们母校里历史,也是象这样发展的,越发展越大。同学也是新陈代谢,老同学凋零,担不起他们的责任,同时新同学来替他们,担他们的责任。象东楼不戒于火,尽成灰烬,是很不幸的。但旧的已去,新的才来,旧的给新的让位置。这样看来,我们的历史,不过是小小的本校历史的序文,本校历史的正文在将来。我希望以后的同学齐心努力,给本校历史正文第一页第一章下

头一笔。整顿我们的国家，恢复我们的民族，专赖诸位同学，齐心！努力！

原载《直隶法政专门学校
十八周年纪念特刊》

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

(一九二四年一月)

诸位同志们：兄弟深不愿在本党改造的新运中，潜植下猜疑与不安的种子；所以不能不就我个人及一班青年同志们加入本党的理由及其原委，并我们在本党中的工作及态度，诚恳的讲几句话。

兄弟们到广州来，承本党总理及党中先进诸同志欢悦的接受，令我们在国民革命的工作上得有尽其绵薄的机会，我等不能不敬服本党总理及党中先进诸同志热诚的促进负有国民革命的使命的国民党的精神。但有少数先进的同志终不免对于我等加入本党致其怀疑者，使此怀疑不能涣然冰释，则于本党改造的新机中，即预伏一种妨害将来发展的危机，此断非吾辈之所愿，想亦非先进诸同志之所愿。用是不能不将我等加入本党的理由，开诚布公的讲出来，以求得一共同的了解，而消除那方在潜萌的危机。

我们相信在今日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也就是本党总理所说的次殖民地的中国，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革

* 这篇《意见书》是大钊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编者

命运动不可。若想完成此国民革命的事业，非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我们认在这种国民革命运动中，不宜使国民革命的势力分歧而不统一，以减弱其势力，而迟阻其进行，非以全民族之心力，集中于一党不可。我们环顾国中，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只有国民党；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能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党来。我们觉得刚是革命派的联合战线，力量还是不够用，所以要投入本党中，简直编成一个队伍，在本党总理指挥之下，在本党整齐纪律之下，以同一的步骤，为国民革命的奋斗。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因为在今日经济落后沦为帝国主义下半殖民地的中国，只有国民革命是我民族唯一的生路，所以国民革命的事业，便是我们的事业，本党主张的胜利，即是我们的胜利。我们以此理由，不但自己愿来加入本党，并愿全国国民一齐加入本党。这种发展本党的责任，是要先进诸同志与我们共同担负的。

有一部分同志疑惑因为我们加入了本党，本党便成了共产党，这亦是一种的误会。我们加入本党是来接受本党的政纲，不是强本党接受共产党的党纲。试看本党新定的政纲，丝毫没有共产主义在内，便知本党并没有因为我们一部分人加入，便变成共产党了。

又有一部分同志提议：本党章程应规定不许党内有党，党员不许跨党。这或者亦是因为我们加入本党而起的。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

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的组织。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这一班的个人,不能容纳我们所曾加入的组织的团体。我们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去从事于国民革命的运动,但我们不能因为加入中国国民党便脱离了国际的组织。我们若脱离了国际的组织,不但于中国国民党没有利益,且恐有莫大的损失。因为现代的革命运动是国民的,同时亦是世界的,有我们在中国国民的组织与国际的组织的中作间个联络,作个连锁,使革命的运动,益能前进,是本党所希望的,亦是第三国际所希望的。由此说来,我们对于本党实应负着二重的责任:一种是本党党员普通的责任;一种是为本党联络世界的革命运动,以图共进的责任。所惧我们的才力不胜,不能担当此任,还望先进诸同志不吝指导而匡助之,是我们的欣幸。

总之,我们加入本党,是几经研究再四审慎而始加入的,不是胡里胡涂混进来的,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土尔其的共产党人加入土尔其的国民党,于土尔其国民党不但无损而有益。美国共产党人加入美国劳动党,于美之劳动党不但无损而有益。英国共产党人加入英国劳动党,于英之劳动党亦是不但无损而有益。那么我们加入本党,虽不敢说必能有多大的贡献,其为无损而有益,亦宜与土、美、英的先例一样。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

的举动。不过我们既经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我们所希望于先辈诸同志者，本党既许我们以参加，即不必对于我们发生疑猜，而在在加以防制。倘认我们参加本党为不合，则尽可详细磋商，苟有利于本党，则我们之为发展本党而来者，亦不难为发展本党而去；惟有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自今以往，我们与先辈诸同志共事之日正长，我们在本党中的行为与态度，当能征验我们是否尽忠于国民革命的事业，即以尽忠于本党，愿我先辈诸同志提携而教导之。

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

(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

今天是追悼列宁同志及“二七”工友。列宁同志是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他的死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与民族，尤其是东方被压迫民族若中国，一件莫大的损失。

列宁同志一生的事业，大家大概都晓得。现在只拿出一点来说：俄国自革命后，非常困苦，常人只有一餐过日，列宁同志也一样。据我由俄回国的朋友说，列宁同志自被人枪击后，病中须多些调养费，但薪水甚薄，不得已增加——但还没有两百元，其刻苦俭朴精神，真可为吾侪国民革命者的模范！关于其他事略，鲍先生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但是今日何日？就是中国劳动界为人民争自由、为无产阶级向军阀争自由流血的纪念日。去年“二七”前几天，兄弟适因演讲事情到汉口，亲看同志为集会结社自由做很大的运动，又见如狼似虎的军人残杀工人，及在船上又知道流血的事情，今天回想起来，实在难过。军阀压迫工人何等残酷，为自由而战的劳动同志何等壮烈！现在还有许多工友们在那里流离失所，保定监狱里还有工人同志，长辛店还有许多同志家属非常可怜，这些都

* 本文是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在广州工会联合会等联合举行的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大会上的演说辞。——编者

是我们后死者的责任！至于他们为什么要死，他们不是为自己利益而死，实为全国工人争回集会结社的自由，为争自由而死，与在军阀底下争自由都是很壮烈的。现在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今日纪念会当中，有一位林祥谦同志，当时被军阀拿去，迫他开工，但他不肯，说“非有工会命令，头可断而车不可开”，军阀遂将他的头砍下。又有一位施洋律师，他为保障工人的正当利益，也被军阀杀了。施洋同志的死，在我尤为伤心，当我在汉口时，曾见他一次。这一次会面是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的见面。

国民革命中，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与“二七”死难工友有同一的价值，京汉路流血与黄花冈七十二烈士流血同埋下第二次革命的种子，将来不久是要爆发的。“二七”被难同志虽然死了，然“二七”同志们仿佛常常在我们面前，他们的精神，还是象车轮——京汉火车的车轮不息的在工友方面转，好象指导我们后死者要不断的前进。

列宁同志与“二七”工友皆已死去，然他们精神尚引导吾人向前革命，以打倒军阀并国际帝国主义！

1924年2月16日《新学生》第14期
“纪念‘二七’并追悼列宁号”

署名：李大钊先生演辞
张善铭、著裕业记

列 宁 不 死

(一九二四年三月三十日)

列宁逝世，全人类的损失，真不在小，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损失了一个这样重要的朋友，更使我们感伤无已！

列宁的功业，在人已如日月炳天，江河行地。他的主义，亦经体现于全人类。革命的组织，日在发扬滋长中，以完成人类在历史上重大的使命，故列宁的躯干虽死，列宁的精神不死。

列宁是弱小民族的良朋，是被压迫者的忠仆，是献身于世界革命的一个仁勇的战士。他曾说过：“苟能成就世界革命，即使俄罗斯民族蒙莫大的牺牲，所不敢辞！”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列宁的精神气魄，何等仁勇！何等悲壮！

这样一位仁慈忠勇献身于全人类的人，在他的生前不知蒙了多少怨谤，被了多少恶名；直到死后，大家才渐渐的认清了他的为人。可见，说出真理者之遭世僂辱，自古已然，而真理之终能昭著于人间，必恒在说出真理者之为举世所谤毁以后，亦几为人类历史上的常例。

列宁为主义而遭狙击，连年卧病，其薪酬之薄，至不足以维持他的病中的生活。国家虽屡为增加，而迄死之日，每月薪俸终

不过二百元左右。就此一点,已足使我们惭愧无地。

1924年3月30日

中华民国国民追悼列宁
大会刊行的《列宁纪念册》

署名:李守常

这一周

(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

这一周有好几个纪念日。

(一)是“五一”纪念日。这是世界劳动者，为减少过度的工作时间向资本阶级进攻的纪念日，亦即是被压迫阶级向压迫阶级抗争自由的纪念日。这是个国际的工人的日子。全世界的劳动者，在这一天都要举行一个壮烈的示威运动。我们中国的劳工阶级，在今天应该深深感知这个纪念日的国际的意义，我们中国的全民众，应该在这个纪念日加添些民族的意义。

(二)是“五四”纪念日。这是中国全国学生膺惩中国卖国贼的纪念日，是中国全国学生对于帝国主义行总攻击的纪念日，亦即是被压迫的民众向压迫的国家抗争自由的纪念日，这是国民的学生的日子。我们在今天应该把国际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痛史，细数从头，把“五四”运动的精神，牢牢记住，誓要恢复国家的主权，洗清民族的耻辱。

(三)“五五”纪念日。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硕宿，亦是社会革命的先驱马克思的诞生纪念日。我们在这一天，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

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

这种研究的答案，自然是“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形，完全是国际帝国主义侵入的结果，中国全民族应该并力反抗那侵入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作民族独立的运动，从列强压迫之下，把中国救济出来。”倘能循此途辙，以达于民族独立的境界，那么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他的誕生日，必更值得我们纪念了。

(四)“五七”纪念日。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提出致我死命的二十一条款，威迫袁世凯政府，使之屈服于日本“哀的美敦”之下的国耻纪念日，亦即是帝国主义压迫我民族的纪念日，这是个国民的耻辱的纪念日。我们在这一天，应该回思过去一切的痛史，以作国民的薪胆，大声疾呼的向国民喊道：“国际帝国主义是我国民惟一的仇敌！”在民国十三年“五一”纪念日的示威运动中，我的国民的呐喊，是：

被压迫民族及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

反抗国际帝国主义！

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

不要忘了临城案的压迫！

不要忘了列强因为海关问题在广州的示威！

这都是我们最近的民族的痛辱。

1924年5月1日

《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第24期

署名：守常

史学要论

(一九二四年五月)

(一) 什么是历史

吾人自束发受书，一听见“历史”这个名词，便联想到《二十四史》，《二十一史》，《十七史》，《史记》，《紫阳纲目》，《资治通鉴》，乃至 Herodotus, Grote 诸人作的《希腊史》等等。以为这些便是中国人的历史，希腊人的历史。我们如欲研究中国史，希腊史，便要在这些东西上去研究；这些东西以外，更没有中国史、希腊史了。但是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连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東西。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

不错，我们若想研究中国的历史，像那《史记》咧，《二十四史》咧，《紫阳纲目》咧，《资治通鉴》咧，乃至其他种种历史的纪录，都是很丰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须要广蒐，要精选，要确考，要整理。但是他们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纪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这些卷帙，册案，图表，典

籍，全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这活的历史，固屹然存在于这些故纸陈编的堆积以外，而有他的永续的生命。譬如我们要想研究中国，或是日本，固然要尽量蒐集许多关于中国或日本的纪载与著作，供我们研究的材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现代中国，说这就是中国；指某人所作的现代日本，说这就是日本。我们要想研究列宁，或是罗素，固然要尽量蒐集许多关于列宁或罗素的纪载与著作，供我们研究的资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列宁传》，说这就是列宁；某人所作的《罗素传》，说这就是罗素。那纪载中国或日本的事物的编册以外，俨然有个活的中国、活的日本在；那列宁或是罗素的传记以外，俨然有个活的列宁、活的罗素在。准此以推，许多死的纪录、典籍、表册、档案以外，亦俨然有个活的历史在。从前许多人为历史下定义，都是为历史的纪录下定义，不是为历史下定义；这种定义，只能告我们以什么构成历史的纪录，历史的典籍；不能告我们以什么是历史。我们当于此类纪录以外，另找真实的历史，活的历史。

什么是活的历史，真的历史呢？简明一句话，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今欲把历史与社会的概念弄得明白白，最好把马克思(Karl Marx)的历史观略述一述。马克思述他的历史观，常把历史和社会关联在一起；纵着看人间的变迁，便是历史；横着看人间的现在，便是社会。马克思的历史观，普

通称为唯物史观,又称为经济的历史观。唯物史观的名称,乃是马克思的朋友恩格斯(Engles)在一八七七年开始用的。在一八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里,和在一八六七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里,都含着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而公式的发表出来,乃在一八五九年的《〈经济学批评〉的序文》。在此《序文》里,马克思似把历史和社会对照着想。他固然未用历史这个名词,但他所用社会一语,似欲以表示二种概念;按他的意思,社会的变革便是历史。换言之,把人类横着看就是社会,纵着看就是历史。譬之建筑,社会亦有基址与上层;社会的基址,便是经济的构造(即是经济关系),马克思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社会的上层,便是法制,政治,宗教,伦理,哲学,艺术等,马克思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基址有了变动,上层亦跟着变动,去适应他们的基址。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大体。他认横着去看人类,便是社会;纵着去看人类,便是历史。历史就是社会的变动。以经济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变革的,为历史学;对于历史学,横着考察社会的,推马克思的意思,那便是经济学,同时亦是社会学。

依上所述,历史既是整个的人类生活,既是整个的社会的变革;那么凡是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各体相,均为历史的内容所涵括。因为文化是一个整个的,不容片段段的割裂。文化生活的各体态、各方面,都有相互结附的关系;不得一部分一部分的割裂着看,亦不得以一部分的生活为历史内容的全体。普通一说

历史，便令人想是说社会上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其实道德、学术、宗教、伦理等等，所谓文化的理想，亦莫不应包含在历史以内。说历史只是政治、法律和经济，已经算是狭隘了。还有一派历史学家，只认政治的历史为历史，此外的东西似乎都不包括于历史以内。他们认以政治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变迁的，是历史学。像那福利曼(Freeman)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就是这种观念。以政治为中心，即是以国家为中心；国家的行动，每依主权者的行动而表现；故结局他们认以主权者或关系主权者的行动为中心以考察社会的变迁的，为历史学。中国旧史，其中所载，大抵不外帝王爵贵的起居，一家一姓的谱系；而于社会文化方面，则屏之弗录。这样的史书，就是本于历史只是政治，政治只是主权者的行动的见解而成的。马克思认以经济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变革的，为历史学；则对于历史学横着考察社会的，乃为经济学，同时亦是社会学。由此类推，这一派的历史家，既认以政治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变革的，为历史学；则对于历史学横着考察社会的，亦应该为政治学，同时亦是社会学。但在事实上，他们并未想到此点。他们并不注意政治学、社会学，在学问上的性质如何。这一派的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历史观相同的点有二：（1）同认历史为社会的变革；（2）同认历史学的目的，在与自然科学相等，发见因果律。政治史观派虽有此与马克思相同的二点，其说亦终是站不住。因为政治是次级的，是结果不是原因，不能依此求得历史上的因果律。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这样子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一方面把历史与社会打成一气，看作一个整个的；一方面把人类的生活及

其产物的文化，亦看作一个整个的，不容以一部分遗其全体或散其全体。与吾人以一个整个的活泼泼的历史的观念，是吾人不能不感谢马克思的。

这样讲来，我们所谓活的历史，不是些写的纪的东西，乃是些进展的行的东西。写的纪的，可以任意始终于一定的范围内；而历史的事实本身，则永远生动无已。不但这整个的历史是活的东西，就是这些写入纪录的历史的事实，亦是生动的，进步的，与时俱变的。只有纪录的卷帙册籍，是印版的，定规的。纪录可以终结的，纪入纪录的历史事实则没有终结；纪录是可以完全的（在理论上是可以完全的，在事实上则完全的亦极少），纪入纪录的历史事实，则没有完全。不但那整个的历史正在那里生动，就是一个一个的历史的事实亦天天在那里翻新。有实在的事实，有历史的事实；实在的事实，虽是一趟过去，不可复返的；但是吾人对于那个事实的解喻，是生动无已的，随时变迁的，这样子成了历史的事实。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解喻是活的，是含有进步性的；所以历史的事实，亦是活的，含有进步性的。只有充分的纪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亦只是暂时的，要时时定的，要时时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的真实有二意义：一是说曾经遭遇过的事的纪录是正确的，一是说关于曾经遭遇过的事的解喻是正确的。前者比较的变动少，后者则时时变动。解喻是对于事实的知识，知识是天天增长的，天天扩大的，所以解喻是天天变动的。有实在的过去，有历史的过去；实在的过去，是死了，去了；过去的事，是做了，完了；过去的人，是一瞬长逝，万劫不返了；在他们有何变动，是永不可能了；可以增长扩大的，不是过去

的本身，乃是吾人关于过去的知识。过去的人或事的消亡，成就了他们的历史的存在；自从他们消亡的那一俄顷，吾人便已发见之于吾人想像中，保藏之于吾人记忆中；他们便已生存于吾人的记忆中、想像中了。吾人保藏之愈益恒久，即发见之愈益完全，即解喻之愈益真切。实在的孔子死了，不能复生了，他的生涯，境遇，行为，丝毫不能变动了；可是那历史的孔子，自从实在的孔子死去的那一天，便已活现于吾人的想像中，潜藏于吾人记忆中，今尚生存于人类历史中，将经万劫而不灭。汉唐时代人们想像中的孔子，与宋明时代人们想像中的孔子，已竟不同了；宋明时代人们想像中的孔子，与现代人们想像中的孔子，又不同了；十年以前，我自己想像中的孔子，与今日我自己想像中的孔子，亦不同了。所以《孔子传》，《基督传》，《释迦牟尼传》，《穆罕默德传》，不能说不要重作。没有一个历史事实，能有他的完满的历史；即没有一个历史事实，不要不断的改作。这不是因为缺乏充分的材料与特殊的天才，乃是因为历史的事实本身，便是一个新史产生者。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去年的真理，到了今年，便不是真理了；昨日的真理，到了今日，又不成为真理了。同一历史事实，昔人的解释与今人的解释不同；同一人也，对于同一的史实，昔年的解释与今年的解释亦异。此果何故？即以吾人对于史实的知识与解喻，日在发展中，日在进步中故。进化论的历史观，修正了退落说的历史观；社会的历史观，修正了英雄的历史观；经济的历史观，修正了政治的历史观；科学的历史观，修正了神学的历史观。从前的史书，都认天变地异与神意有关，与君德有关；

现在科学昌明，知道日食一类的事，是天体运行中自然的现象，既不是什么灾异，亦不关什么神意，更不关什么君德了。从前的史书，都认火的发见，农业及农器的发明，衣服的制作，为半神的圣人，如燧人氏、神农氏等的功德；都认黄虞时代，为黄金时代；而由进化论及进步论的史观以为考察，此等重大发现，实为人类生活一点一点的进步的结果；在原人时代，不知几经世纪，几经社会上的多数人有意无意中积累的发现与应用的结果，始能获享用此文明利器。旧史以之归于几个半神的圣人的功德，宁能认为合理？前人为孔子作传，必说孔子生时有若何奇异祥瑞的征兆，把西狩获麟一类的神话，说得天花灿烂；我们若在现今为孔子作传，必要注重产生他这思想的社会背景，而把那些荒正不经的神话一概删除。本着这一副眼光去考察旧史，必定忍不住要动手改作。一切的历史，不但不怕随时改作，并且都要随时改作。改作的历史，比以前的必较近真。Grote作的《希腊史》，比 Herodotus 的《希腊史》真确的多，就是这个原故。这不是 Grote 的天才，比 Herodotus 的天才高；亦不是 Herodotus 比 Grote 爱说谎；时代所限，无可如何。Herodotus 在他的时代，他只能作到那个地步，再不能更进了；Grote 在他自己的时代，固然算是尽其最善，但亦不能说是作到完全。我们固然不能轻于盲拜古人，然亦不可轻于嘲笑古人。历史要随着他的延长，发展，不断的修补，不断的重作。他同他的前途发展的愈长，他的过去的真实为人们所认识的，愈益明确。中国古人有句话，叫做“温故知新”。普通的解释，就是一面来温故，一面去知新。温故是一事，知新又是一事。但这句话要应用在史学上，便是一件事。温故是知新的手段，知新是温故的目的。改作历史，重新整理历史

的材料,都是温故的工夫。在这温的工作中,自然可以得到许多的新知。我们还可以把这句倒装过来说,“知新温故”这就是说拿我们日新月异所进步的知识,去重作历史。“故”的是事实,“新”的是知识。人们对于实在的事实的认识,终不能完全,所以要不断的温;人们对于事实的认识,是一天一天的进步,所以以此去不断的温故的事实,亦必不断的有些新见解涌现出来。这样子我们认识了这永续生存的历史,我们可以用几句最明了的话,说出什么是历史:

“历史不是只纪过去事实的纪录,亦不是只纪过去的政治事实的纪录。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换句话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再换句话说,历史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那些只纪过去事实的纪录,必欲称之为历史,只能称为记述历史,决不是那生活的历史。”

(二) 什么是历史学

在今日寻历史的真义,虽如上述;而历史这个名词的起源,则实起于纪录。汉文的“史”,其初义即指秉持典册,职掌记事者而言,再转而有纪录的意义。“历史”在英语为 History,在法语为 Histoire,在义大利语为 Storia,三者同出于希腊语及拉丁语的 Historia,其初义本为“问而知之”;由是而指把问而知之的结果写录出来的东西亦云,遂有纪录的意义了。历史在德语为 Geschichte,在荷兰语为 Geschiedenis,有“发生的事件”的意义。综起来看,“历史”一语的初义,因国而异;而行用既久,滋义甚多,则中国与欧洲诸国同然。但是概括观之,“历史”一语的初

义，都是指事件的纪录而言；足征历史学的起源，实起于纪录的历史。纪录的历史，是由记可以流传后世的言行而发生出来的；然其所以记的动机则不必相同：或为使其言行、功业及其所造的事变，永垂诸世勿使湮没；或将以供政治上的参考，俾为后世的模范与戒鉴；或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以应其知过去明事物的来历的自然的要求；或以满足其欲知邦家种姓的盛衰兴亡，非常人物的言行、经历及其运命的兴味。而其所记的事，又必是有些地方具有特异的性质的：譬如现于水平上的岛屿，耸于云际的山岳，最易惹人们的注意；寻常琐屑的事，则恒不见于纪录。然此种见解，非可适用于今日的历史的情形；欲适用之，则必须附以新解释。今日的历史，不但记述偶然发生的事变，而且记述状态的变迁与沿革；不惟注意例外异常的情形，抑且注意普通一般的事象。历史总是记述以何理由惹人注意的事，至于如何的事才惹人注意，则今古不同。此处所云的历史，是说记述的历史。此类历史，原是现实发生的各个情形的记述，故其本来的性质，不在就某种事实或对象而为一般的研究，明其性质，究其理法；而在就一一实际的情形，详其颠末，明其来历。即在今日，普通的历史方犹保存此本来的性质；然而今日史学所达的进程，则已不止于单为个个情形的记述与说明。比较的研究，在史学上曾被试用，而历史理论的研究，其目的尤在为关于历史事实一般的说明。

今人一言历史的研究，辄解为沿革的研究，这就是因为认历史是述事物的来历，明其变迁沿革的经过者。通俗谈话，“历史的”这一个形容，表示几种意义，因用的时地不同，而意义亦从之各异；有时单有“过去的”的意味，有时更含有“可记忆的”即“显

著”、“卓越”、“可传于后世”的意味，如称某人为“历史的”人物，即是此例。把他当作学术上的用语，就是表明一种考察事物的观察法。这种观察法，专寻事物的起源及过去的变迁、沿革；简单说，于生成发展的关系考察事物，答怎样成了这样的问题，即是历史的考察法。今日论史学的性质，首当注意者，乃为专就生成发展上所研究的事情，即其考察法的“历史的”事情。虽然，只此不能说算是把史学的性质能够充分的明确的决定了。因为史学固有一定的考察法，史学亦有一定的对象。所谓历史考察法，不只能用于人事，即于自然现象，亦能适用之：譬如讲地球的发达，考生物的由来，亦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考察；然而那样的研究，不能认为属于史学的范围。史学非就一般事物而为历史的考察者，乃专就人事而研究其生成变化者。史学有一定的对象。对象为何？即是整个的人类生活，即是社会的变革，即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类生活及为其产物的文化。换一句话说，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

人以个体而生存，又于种种团体而生存；故人生有为个体的生存，有为团体的生存。人的团体的生存，最显著的例，即是国民的生存；今日史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似为国民的生存的经历。记述为个人生存的经历者，谓之传记；讨究文化的发展者，谓之人文史，亦曰文化史；传记与文化史，虽均为历史的特别种类，然而个人经历与文化发展的研究，亦不能说不是史学范围以内的事。有人说，史学是专研究关于团体的生活者，而不涉及个人的生活。是亦不然，个人生活与团体生活，均于其本身有相当的价值。团体生活的荣枯兴衰，固为吾人所急欲知，所急欲解喻

者；而个人的经历与运命，又何尝不一样的感有此兴味？此等要求，盖为吾人自然的要求。且个人生活的研究，不但于其本身有必要；即为团体生活的研究，有时亦非研究个人生活不可。盖个人为构成团体的要素，个人的活动为团体生活的本源，个人在团体的生活中，实亦有其相当的影响，即亦有其相当的意义，故史学不能全置个人于度外。我们固然不迷信英雄、伟人、圣人、王者，说历史是他们造的，寻历史变动的原因于一二个人的生活经历，说他们的思想与事业有旋乾转坤的伟力；但我们亦要就一二个人的言行经历，考察那时造成他们思想或事业的社会的背景。旧历史中，传记的要素颇多，今日的史学，已不那样的重视个人的传记；因为团体的生活，在历史上的意义渐次加重了。然为团体生活的研究，似仍有为传记的研究的必要。

人事的生成发展，不能说不能为演绎的推理的论究，即设某种假设，在其假设之下看如何进行。此种研究法，亦非不可试行于史学；不过史学发展的径路，当初只是沿革的研究，直到今日，才渐知为推理的研究；所以人们多认史学是以事实的研究（沿革的研究）为主的。史学由个个事实的确定，进而求其综合。而当为综合的研究的时顷，一方欲把事实结配适宜，把生成发展的经过活现的描出，组之，成之，再现之；于他一方，则欲明事实相互的因果关系，解释生成发展的历程。由第一点去看，可说史学到某程度其研究的本身含有艺术的性质（不独把历史研究的结果用文学的美文写出来的东西是艺术的作品，就是历史研究的本身亦含有艺术的性质）。由第二点去看，史学的性质，与其他科学全无异趣。实在说起来，所谓事实的组成描出，即在他种科学，亦须作此类的工夫到某程度；所以到某程度含有艺术性质的事，

亦不独限于史学，即在地质学，古生物学等，亦何尝不然？

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以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此种思想，久已广布于世间，这实是史学界的新曙光。

这种严正的历史科学，实际上今尚未能完成其整齐的系统。一般人对于历史科学的观念，仍极泛漠。此种学问所当究论的问题，究竟为何？似尚未有明确的决定。且历史科学（即历史理论）若果成立，他与历史哲学亦必各有其判然当守的界域；直到如今，二者之间并未有明了的界域可守，以致名词互用，意义混同，律以治学明界的道理，似宜加以分别才是。

历史科学能否于最近的将来完成他的系统？历史科学一旦成立，果为如何的性质？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究有若何的关系？其界域若何？其考察法的相异何在？历史科学所当研究的事实为何？这都是治史学者所当加意研考的问题。

史学原以历史的事实即是组成人类经历的诸般事实为研究的对象，故调查特殊的历史的事实而确定之，整理之，记述之，实为史学的重要职分。就历史的事实为科学的研究，诚不可不基于就特殊情形所为事实的观察与征验；故特殊史实的精查，乃为史学家的要务。然史学家固不是仅以精查特殊史实而确定之，整理之，即为毕乃能事；须进一步，而于史实间探求其理法。学者于此，则有二说：一说谓史家的职分，不仅在考证个个特殊的史实，以求其明确；而寻史实相互的联络，以明其因果的关系，固亦为必要。然考其联络，明其因果关系，以解释史实，说明其发达

关系，就个个情形理解之，说明之；再进而于理解说明个个事实以外，又从而概括之，推论之，构成一般关于其研究的系统的理论。史学发展的途程，亦何能外是？史学方在幼稚的时期，刚刚达到就各个事实而为解释说明的地步，自与其他已经达到概括的为理论的研究的科学不同。但此之不同，是程度上的不同，不是性质上的不同；是史学的幼稚，不是史学的特色；只能说史学的发展，尚未达到与其他科学相等的地步，不能说史学的性质及观察点，与其他科学根本相异。

史学既与其他科学在性质上全无二致，那么历史科学当然可以成立。史学的要义有三：（1）社会随时代的经过发达进化，人事的变化推移，健行不息。就他的发达进化的状态，即不静止而不断的移动的过程以为考察，是今日史学的第一要义。（2）就实际发生的事件，一一寻究其证据，以明人事发展进化的真相，是历史的研究的特色。（3）今日历史的研究，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不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東西；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在这种研究中，有时亦许要考证或确定片片段段的事实，但这只是为于全般事实中寻求普遍理法的手段，不能说这便是史学的目的。

有些人对于史学是否为一种科学的问题，终是有些怀疑。他们说历史的学问所研究的对象，在性质上与自然科学等大异其趣，故不能与其他科学同日而语。盖人事现象，极其复杂，每一现象的发生，大抵由种种原因凑合而动，种种事情，皆有交感互应的关系。于一时会，人类的心理有甚不定的要素存在，其

理法不易寻测，其真实的因果关系，不易爬梳；故学者说历史是多元的，历史学含有多元的哲学，今欲于多元的历史的事实发见普遍的原则或理法，终属难能，因之史学一般理论的构成，亦殊不易。此等论难，亦未尝无几分真理，顾吾人所谓史学，与其他诸科学同其性质，一其步调者，亦只是就其大体而言。各种科学，随着他的对象的不同，不能不多少具有其特色；而况人事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可全然同视，人事科学的史学与自然科学自异其趣。然以是之故，遽谓史学缺乏属于一般科学的性质，不能概括推论，就一般史实为理论的研究，吾人亦期期以为不可。人事现象的复杂，于研究上特感困难，亦诚为事实；然不能因为研究困难，遽谓人事科学全不能成立，全不能存在。将史实汇类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通的形式，论定其一般的性质，表明普遍的理法，又安见其不能？且在心性的学问，如心理学及经济学、法律学等人文诸科学，颇极发达，各就其所研究的对象，为一般理论的研究的今日，而犹以人事现象复杂难测为理由，主张就史实为一般理论的研究之不可能，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世界一切现象，无能逃于理法的支配者。人事界的现象，亦不能无特种的理法，惟俟史家去发见他，确定他了。况且依概括的推论以明一般的理法，较之就个个特殊情形一一讨究其凑合而动的种种原因，其事或尚较易。就个个特殊现实的情境，充分的与以解释与说明，史学亦既冒种种困难而为之；今于超乎随着个个事例而起的复杂错综的关系以外，而就全般考其大体以为理解，论者乃视此比较容易的事为不可能，宁非异事？且我们所谓一般的理法，自指存于人事经历的理法而言，非谓于个个特殊事例，常以同一普遍的形态反复表现。在现实个个特殊的时会，种种事情

纷纭缠绕, 交感互应, 实足以妨碍一般的理法以其单纯的形态以为表现。以是之故, 此理法常仅被认为一定的倾向。此一定的倾向, 有时而为反对的势力所消阻。虽然, 此理法的普遍的存在, 固毫不容疑, 不过在人事关系错综复杂之中, 不易考察罢了。

依上所述, 我们知道史学的目的, 不仅在考证特殊史实, 同时更宜为一般的理论的研究; 于专以记述论究特殊史实的记述历史以外, 尚有讨论一般的性质、理法的历史理论, 亦不可不成立。历史理论与记述历史, 都是一样要紧。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 同时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而今观于实际, 则治史学者, 类多致其全力于记述历史的整理, 而于一般史实理论的研究, 似尚置之度外; 即偶有致力于此者, 其成功亦甚微小, 以致历史科学尚未充分发展至于成形。固然, 关于考证个个史实的研究, 虽在今日, 仍不可忽视; 因为历史的事实, 总是在发展中, 进步中, 没有一个历史是完成的。一个纪录的本身, 可以始终于一定的范围作一结束, 而其所纪录的史实, 则常须随着人们的新智识, 新发现, 加以改正; 所以记述历史, 亦要不断的改作才是。今日关于考证个个史实的研究, 虽然有显著的进步; 然就大体上看, 犹有极重要的事实遗剩下来, 未能充分的以为讨究者, 尚不在少; 人们所最欲确知而不得其证据者, 尚不在少; 以是知学者对此之努力, 仍不可一日懈。且个个事实的考证, 实为一般理论的研究必要的材料。必个个事实的考察, 比较的充分施行; 而后关于普遍的理法的发现, 始能比较的明确。有确实基础的一般理论, 必于特殊事实的研究有充分的准备始能构成。于个个事实的研究多尚未能作到比较的充分的今日, 而望历史理论的系统完全成立, 实在是很难。故在今日, 于

一般理论必要的准备未成的时候，不能认有确实基础的一般理论完全构成。科学不是能一朝一夕之间即能完成他的系统的。历史科学的系统，其完成亦须经相当的岁月，亦须赖多数学者奋勉的努力。有志于历史理论的研究者，宜先立关于其结构的大体计画，定自己所当研究的范围，由与记述史家不同的立脚点，自选材料，自查事实。历史理论家欲图历史理论的构成，必须抱着为构成历史理论的准备的目的，自己另下一番工夫去作特殊事实的研究。这样子研究的结果，才能作历史理论的基础。同时又须采用生物学、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及人文科学等所研究的结果，更以征验于记述历史，历史理论的研究，方能作到好处。今日一般所作的关于特殊事实的研究，乃是专为整理记述历史而下的工夫，合于此目的者便去研究，否者则不蒙顾及。于为整理记述历史毫无必要的事实，容或于构成历史理论非常的要紧；而且同一的事实，在理论史家看来，其观察法与记述历史家不同，必须立在他的特别立脚点以新方法为新研究，方于自己的企图有所裨益。然则为整理普遍记述历史所要确定的个个事实，即悉为充分的调查与确定，以供之于理论史家，那样的材料，亦于理论史家无直接的效用。所以理论史家为自己的企图的便利起见，不能不自己下手去作特殊事实的研究；或于记述史家所未顾及的事实加以考证，或于记述史家所曾考证的事实，更依自己的立脚点用新方法以为考察；当自辟蹊径，不当依赖他人；这样的研究下去，历史理论即历史科学，终有完全成立的一日。历史理论实为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直接的基础，故史学的成立，于人生修养上很有关系。即于记述历史的研究，亦能示之以轨律，俾得有所准绳，其裨益亦非浅鲜。真挚的史学者，幸共奋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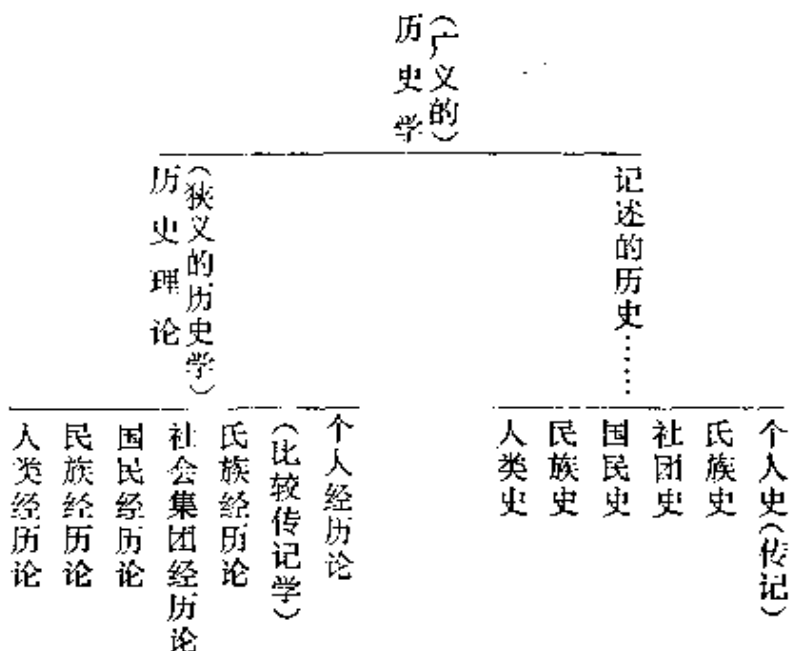
以肩负此责任!

(三) 历史学的系统

论到此处，我们要论一论历史理论的系统是由些什么部分组成的了。前边说过，历史理论是以一般就种种史的事实研究其普通的性质及形式，以明一以贯之的理数为目的的。史的事实为何？简约言之，便是构成人类经历的诸般事实。在历史理论上所研究考察的事物全体，即是此人类生活的经历。此处所谓人类生活的经历，不是指那作为一个动物在自然界的人类生存的经历而言，乃是指那为意识的活动的一个社会的生物的人类生活的经历而言。此种意义的人类生活的经历，其性质决非单纯，实为一种复杂的组成物。人类的经历，是一个概括的名称，包括人类在种种范围内团体生活的总合。人类在社会上，为一个人而生存，为氏族的一员而生存，为各种社团的一员而生存，为一国民的一员而生存，为民族的一员而生存，又为全人类的一员而生存。故吾人有个人的生活，有氏族的生活，有种种社团的生活，有国民的生活，有民族的生活，又有人类的生活。人类生活的经历，即由这些种种生活相凑泊相错综而成。我们要想了解人类经历的总体，不能不就此种生活下一番剖析分解的工夫，一一加以精细的研究。

最广义的历史学，可大别为二大部分：一是记述的历史；一是历史理论，即吾人之所谓历史学。严正的历史科学，乃是指此历史理论一部分而言。在记述的历史中，又可分为个人史（即传记）、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六大部分。在历史理

论中,亦可分为个人经历论(即比较传记学)、氏族经历论、社团经历论、国民经历论,民族经历论,人类经历论六大部分。列表如次:



现代史学家多认历史所当治的范域,以社会全体或国民生活的全般为限,故有人谓历史是社会的传记。如此解释,吾人以为失之太狭。个人的生活,氏族的生活,种种社会集团的生活,民族的生活,乃至全人类的生活,都应包括在历史的范围内。

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其考察方法虽不相同,而其所研究的对象,原非异物。故历史理论适应记述史的个人史、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亦分为个人经历论、氏族经历论、社团经历论、国民经历论、民族经历论、人类经历论等。为研究的便利起见,故划分范围以为研究。那与其所研究的范围了无关系的事项,则屏之而不使其混入;但有时为使其所研究的范围内的事理愈益明了,不能不涉及其范围以外的事项,则亦不能取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态度。例如英雄豪杰的事功,虽当属之个人史,而以其事与国民经历上很有影响,这亦算是关于国民生活经

历的事实，而于国民史上亦当有所论列，故在国民史上亦有时涉及个人、氏族或民族的事实。反之社会的情形，如经济状况、政治状况及氏族的血统等，虽非个人史的范围以内的事，而为明究那个人的生活的经历及思想的由来，有时不能不考察当时他所生存的社会的背景及其家系的源流。

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有相辅相助的密切关系，其一的发达进步，于其他的发达进步上有莫大的裨益，莫大的影响。历史理论的系统如能成立，则就个个情形均能据一定的理法以为解释与说明，必能供给记述历史以不可缺的知识，使记述历史愈能成为科学的记述；反之，记述历史的研究果能愈益精确，必能供给历史理论以确实的基础，可以依据的材料，历史理论亦必因之而能愈有进步。二者共进，同臻于健全发达的地步，史学系统才能说是完成。

此外尚有种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史学家于其所研究的事项感有特殊兴趣者，均可自定界域以为历史的研究。例如政治史、法律史、道德史、伦理史、宗教史、经济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都是。此种特殊社会现象的历史，自与从普通历史分科出来的个人史、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等不同。个人史、氏族史等皆是考察叙述活动的主体的人或人群的经历者，与政治史、法律史等不同。政治史、法律史等乃考察一种社会现象本身的经历者。但在以叙述考察人或人群的经历为主的普通历史中，亦未尝不涉及此类特殊的社会现象。例如在国民史中，不能不就国民生活经历的各方面为普泛的考察，自然要涉及国民经济的生活、宗教的生活、伦理的生活等，但在此时，不是以研究经济现象、宗教现象、伦理现象的本身为本旨，单是把经

有文学；对于哲学史，则有哲学；对于美术史，则有美学；但对于综合这些特殊社会现象，看作一个整个的人文以为考究与记述的人文史或文化史（亦称文明史），尚有人文学或文化学成立的必要。

现代史学家方在建立中的历史理论，当分为六大部分，已如上述。我们现在要进而略论这些部分的内容了。

（第一）人类经历论，是研究记述人类总体的经历的部分。但此一部分理论，非到人类史的系统完成后，不能着手研究。将来记述历史分科的研究，日益发达，终能促进人类史及人类经历论的实现。现在有所谓世界史者，其内容与此处所云的人类史不同。这种世界史，不是并叙各国史，即是叙说列国关系的发达；其内容仍为研究国家经历的事实，在学问的性质上，这不过是国民史的一种，决非吾人所说的人类史。传记里边有只叙一人的，亦有并叙数人的；世界史只是一个并叙数国的传记，故宜列入国民史。各部分的研究，实为总体研究的基础；人类史的研究，又为人类经历论的根据，故人类史及人类经历论，是最后成立的一部分。

（第二）民族经历论，是比较种种民族的经历，研究普通于一般民族经历的现象的部分。其所研究的范围，举其要者，如民族的盛衰兴灭，其普通的理法安在？原因为何？民族的迁徙移动，本于何因？发生何果？如何的天然情境，人事状态，有以促进之，或妨阻之？其移动常取若何的径路？民族间的交通接触与杂居，于文化上发生若何的影响？民族与民族接触后，若者相安于和平，若者相残于争战，其因果若何？杂居以后，必生混合的种族，混种之影响于文化者又何若？先进民族与浅化民族相接触，在浅化民族方面，发生若何的影响？这都是民族经历论所当研究的

问题。

一个民族都有一个民族的特性，即各民族都有其特别的气质、好尚、性能。此民族的特性，果与民族的经历有若何的关系？亦为民族经历论所当研究的事项。我想一个民族的特性，可以造成一个民族的特殊历史。民族特性，即是使各民族各有其特殊的经历的最有力的原动力。而在别一方面，各民族于其生活经历中所起的种种事变，种种经验，有时或助长、养成、发达潜在于该民族特性中固有的特色；有时或反阻抑其发展，甚或有以变化之；故在民族经历论，不可不于此点加以详密的考察。或谓民族特性实为受地理的影响而成者，然此亦非以简单的原因所能解释。一民族特性的成立，固受地理的影响不少，但此外如人种的、经济的关系，亦不能说全无影响。历史是多元的，不是简单的，此理应为史学家所确认。

又如民族经历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亦为民族经历论所当论及的问题。民族文化者何？即是民族生存活动的效果，包括于其民族社会发展的人文现象的总体。民族文化的成立，民族的经历实有伟大的影响；迨民族文化既已发展成熟，却又为决定民族将来经历的重要原素，其间实有密切的关系。民族经历论应细为比较，以明其理法。

民族经历论与人类学、人种学不同，又与民族心理学亦各异其性质。人类学是人类其物的理学，是关于人类的本质、现状及其由来，所为的一般的学术的考究；人种学是考查现在诸人种的特质及其分布，并其相互关系的学问；皆与历史理论中的民族经历论不同。民族经历论，不是研究人类，亦不是研究人种，乃是关于在民族经历中所显现象的性质及其理法的学术的研究。亦

有同一的事实，在民族经历论里要研究他，在人类学里要研究他，在人种学里亦要研究他；但其所研究的事实虽同，而其所以研究的目的各异。例如“移住”这一个事实，在人类学，是为解释人类何以有今日，才去研究他；在人种学，是为说明现时诸人种地理的分布及人种的相互关系，才去研究他；在民族经历论，则是把他当作构成民族经历的事实，而研究其性质与理法，以明其与别的民族生活上的事实的关系。民族心理学是研究有没有可称为民族的精神的东西？若认定为有，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的学问？他是以征验于神话、言语、文学及其他民族文化的种种要素，为其研究调查的主眼；以民族内的生活现象，为其研究的目的。民族经历论所研究者，乃为民族的外的生活，即构成经历的事实。民族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种，民族经历论是历史理论的一部。

（第三）国民经历论，是就一般研究说明普通于国民生活的现象的部分。兹所谓国民者，即是依政治的统一所结合的人民的集团。于国民经历论中所当论究的问题甚夥，举其要者，略如下述：

国民的成立有种种的原由，其发达状态的主要形式为何？国民的盛衰兴亡，与国土天然的形势，对于他邦的位置，人口的多寡，人民的性质，详细一点说，就是人民的道义、智识、好尚、经济的能力、政治的能力、军事的能力等，有如何的关系？又与政体社会的编制，国内统一调和的程度，宗教、教育、风俗、习惯并财富的分量及其分配的状况，交通机关的整备，有如何的关系？英雄豪杰的出现，于国民的发达进步上，有如何的影响？这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很应该在国民经历论中讨论的问题。余如由国际的关系、国民平和的交际及轧轹争斗等所生的种种结果若何？国

民的感情、国民的意志之发展进化，与国民的经历有如何的关系？国民文化即所谓国粹的性质若何？并其基因于过去的国民经历者若何？影响于将来的国民经历者若何？亦应在国民经历论所当研究的范围内。

一国民所认为共同生活的大目的，亦因时因所而有差异。或对于外来的攻袭仅为防卫的准备，或整军经武将以征服人种灭亡人国，或奖励探险以为拓土开疆的远征，或为经济上产业上的侵略以图压服他国，或不求外展只努力于维持国内的平和，凡此者皆因时因地因境遇的不同而常有变迁。又如国体、政体，亦因国而有不同；同一国家，又因今古异势而有变化；凡此变迁，其主要的原因为何？乃至国民的言语、文字、信仰、思想、风俗、习惯的一致，特别是同民族的观念，影响于坚结国民团结的精神上者有如何的效果？这些亦都是应该在国民经历论里所当比较对照以为研究的问题。

国民经历论与政治学亦不相同。政治学的用语，其性质范围，固不可以一概而论；而从其最广义的解释，政治学就是国家学。国家学是专研究国家的学问，他的目的在专以究明政治的现象。在国家学、政治学中，多少亦有论到国民的地方，但此不过是为明政治的理论，附带着言其概略，并不专在研究国民的经历。且政治学每置重于直接应用的方面，专在研究适应于现时社会状况的政治组织及其运用，特别注重发达进步的国家编制而详加考察。国民经历论则反是，广搜古今东西的事实而比较对照，以为研究就一般以于国民的经历考究普遍的现象。国家学、政治学，虽与国民经历论有密切的关系，国民经历论的发达与国家学、政治学的研究以确实的基础，但二者决非同物，在学

问的性质上，不可混而为一。

(第四) 社团经历论，是研究氏族生活、国民生活、民族生活以外的种种社会集团的生活的部分。这些社会集团，其成立的原因有种种，其发达的程度亦有种种。宗教的团体如教会等；关于政治、学术、文艺、社交的结社，如政党、学会等；为经济的关系而设立的团体，如组合、公司、堂、公所等；这等集团比国民的生活较为薄弱。即有结合较为坚固者，亦不过隐然成为一体，感共同利害，有共同意识，为一致活动到某一定的程度而止。亦有没有巩固的体制的社会集团，例如一国有农民阶级或武士阶级，皆属此类。社会集团有只限于国内者，有为国际的组织者；其范围有极狭隘者，有极广漠者。例如几多的邦国圈，同在一个人文圈内；那个人文圈内的几多国民，像一体似的营共同生活到一定的程度，自然有国际的社会集团发生；就是那个人文圈虽然没有确固的体制，仍不失为一种的社会集团，这就是范围极广的社会集团。把这些种类的社会集团为适当的分类，就构成此等社会集团经历的事实为一般理论的研究，就是社团经历论。在社团经历论里所当研究的问题，就是人在种种社会集团的生活。其所研究的事项，不外种种社会集团的性质，其发生的因由，其主要的形式，因时因地其形态的种种变化，助成或妨碍种种社会集团的成立及其发达的种种要素。

(第五) 氏族经历论，就是于血族或可看做血族者的集团生活讨论普通现象的部分。吾人于个人的生活以外，尚有在氏族的生活，研究此在氏族的生活的性质，考察组成氏族生活经历的事实的理法，即是氏族经历论的任务。此研究当自考察家族及氏族的组织，其编制的进化，其结合的维持，所以强固其团结的

种种要素,及其致分裂离散解体的种种情状开始;而于关于民族的盛衰兴亡,民族的繁殖力等问题,尤宜慎审周详,以为翔实的研考。此外生理上、心理上遗传的现象,于氏族生活上的关系,民族的世袭职业资格等,及于其经历上的影响;同氏族者的相互扶助及其对外的联带责任,因时势的变迁如何以为沿革?氏族内部的编制即族长家长与其所属的关系,并一般尊属亲与卑属亲的关系如何?于种种的国家社会组织氏族自治的范围若何?相异氏族间的相互关系如何?族的独立自存与婚姻进化的关系若何?乃至关于族的分布、迁徙、隐居、养子等问题,均当研究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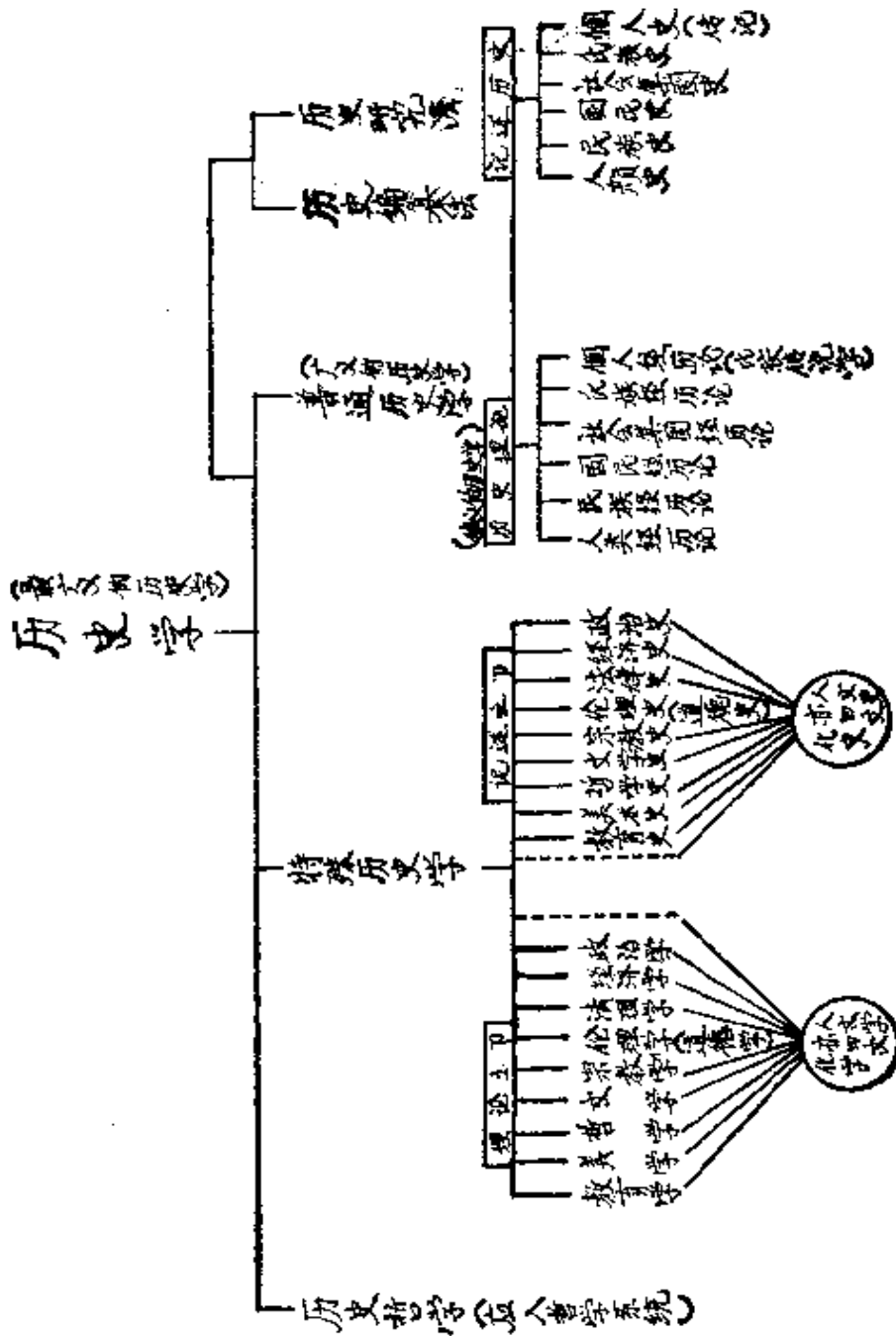
(第六)个人经历论,是研究个人生活的普遍现象的部分。就是传记的一般理论,亦可称为比较传记学。凡人的寿命的长短及健康的如何与功业的成否有如何的关系?人生由生理上、心理上、社会关系上可分为若干期?早熟或晚成?因男女性的不同经历的差异如何?个人的性格与其经历间有如何相互的关系?都是于个人经历论所必要调查的事项。个人的生涯人各异趣,几乎千别万差,实则于其差别中亦有一致的点、平等的点。个人生活云者,一般从大体的途径进行,其经历,自有某种普遍的形式,又有在其经历中起于一定阶段的一定的现象,此普遍的形式、一定的现象如何?各人的经历在大体上虽有一致的点,而于细目则有千别万差,果由如何的原因?人的体质、气质、性能、教育、社会上的位置、职业、所与交际往来的人物、所遭遇的国家社会的状态,于其经历上有若何的影响?对于此等疑问,尽力与以解释的,即此个人经历论的主要任务。

在研究的次序上,应以个人经历论为着手点。因为个人的生活,视其他诸种的共同生活为单纯的而根本的,故先详察为诸

般共同生活的原素的个人生活经历，然后渐及于关系益加复杂、范围益加广大的种种共同生活的经历，其事简而功效易收。且个人的生活经历，为吾人所亲验习知的事，有无数的实例，陈布于吾人的面前；而个人生活的期间，在较短的时期终结，故得详考其始终而察其因果；以视在民族国民的悠久的生活中寻求因果者，其难易实大悬殊；许多学者从事于此种研究，颇能得利用统计的方法的便利。

历史理论应包含此六部分，而随着分科研究的发达，在此六部分内或可再分细类，如法律之分为民法、刑法、商法等。今将上述的史学系统，列一详表如次：（见下页）

历史理论与历史研究法决非同物，但此二者常易相混。有谓历史研究法上的议论为历史理论者，又有称历史研究法为史学原理者，此皆非是。称一种学问的研究法为其学问的理论与原理，实不妥当。学问的理论与原理，是说明一种学问对象的一般的性质、形式、理法者。例如经济学即经济理论，是说明经济现象的一般的性质、形式、理法的；历史学即历史理论，是说明历史现象的一般的性质、形式、理法的；不得云经济理论即是经济研究法，历史理论即是历史研究法。一种学问的研究法，是说明怎样去研究那种学问对象的性质、形式、理法的方法的；其性质、范围与一种学问的理论，纯为二物。例如历史研究法，是说明历史学所研究的材料都是些什么？怎样去采集他们，选择他们，编制他们，整理他们？怎样去就史的事实，一一的加以考证，与以确定？怎样去考察事实相互间的因果，而说明之，解释之，明其所以然的道理？怎样去汇类全般的史实，而考察其一般的性质、普通的形式、普遍的理法？更依此理法以为说明与解释，



这都是历史研究法的任务。此外还有一种历史编纂法 (Historiography), 是说明怎样去依学术的方法以编纂记述的历史? 怎样去编制图表? 这亦可附属于历史研究法内。由是言之, 历史研究法中有一部分是历史理论的方法论, 但历史理论的方法论与历史理论的本身, 迥非同物, 此理不待辨而自明。固然, 在历史研究法中, 亦当有论及历史理论的地方; 但不能据此以为历史理论应该附属于历史研究法的理由。历史研究法是教人应依如何的次第、方法去作史学研究的阶梯学问, 是史学的辅助学问。历史理论则非别的学问的辅助与预备, 实为构成广义的史学的最要部分。当兹历史理论的系统尚未完成确立的时代, 每易使人致疑于历史理论就是历史研究法; 历史研究法以外, 别无历史理论存在的必要, 这不能不与以辨明。一以证历史理论之宜独立的存在, 一以明二者学问上的性质, 告人以不可混同的理由, 故特附数言于此。但有一事望读者幸勿误会, 我这一段议论, 却不是扬理论而抑方法。兹所云云, 亦惟在明其性质, 毫不含有价值轩轻的意味于其间。研究一种学问方法论的讨论, 亦为极要, 而且甚难。吾侪治群学、史学者, 不可不于史学研究法多多致力。

(四) 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

史学、哲学、文学, 可称为三姊妹的学问, 关系极为密切。溯其原始, 三者皆起于古代的神话传说, 渐进而流别各殊, 然其间终有互相疏通的自然倾向, 大有朝宗归一的趋势。

进化的程序, 大抵由浑之画, 由简之繁; 学问的分科别部以

为研究，亦是学术进化的必然的结果，于是学者各分疆域，于自己所研究的范域内，专其力以精其业。顾其流弊所趋则于“专”“精”之义做到十分，而于“贯通”之义，几付之阙如。学者于此，类皆疆域自守，老死不相往来，以遂其专一的责业，深造的工夫，殆无博征广涉的余暇。即就史、哲、文三者而论，其关系如兹其接近，而欲通其界域，以成相辅相益的关系，犹非易事，况于其他！

文、哲、史三者并举，始自倍根(Francis Bacon)。倍根以西历一五六〇年一月二十二日生于伦敦 The Strand 街约克馆(York House)。所著《学术的发展》(Advancement of Learning) (此书的详名为 The Two Books of Francis Bacon, of the Proficiency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Devine and Humane)，实以一六〇五年秋出版。其时倍根年四十六岁。彼于此书，博观学问的全体，详述当时学问的现状，更论今后尚要于如何的方面益进而为研究。厥后倍根晚年，更以是书为基础，加以补订，于一六二三年复以拉丁文公之当世，即 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 (of the Dignity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是。倍根曾把全体学问，分为史学、哲学及诗，鼎足而三。其说即见于上述的二书中。

以其前后二书比较对勘，所论不无异同，缺于彼而见于此者有之。今据其拉丁文本，倍根认依心的能力类别学问为最良的方法，而先分之为历史 Historia (History)、诗 Poesis (Poesy)、哲学 Philosophia (Philosophy) 三者。其意盖谓心灵有三种能力：一曰记忆 Memoria (Memory)，二曰想像 Phantasia (Imagination)，三曰理性 Ratio (Reason)；而以历史为关于记忆者，诗为关于

想像者，哲学为关于理性者。彼可分历史为二类：一为自然史 *Historia Naturalis* (*Natural History*)，一为人事史 *Historia Civilis* (*Civil History*)；此外如宗教史 *Historia Ecclesiastica* (*Ecclesiastical History*)、文学史 *Historia Literaria* (*Literary History*)，倍根则悉纳之于人事史中。倍根视文学史极为重要，以为尚未曾有。他说无文学史，则世界的历史将无特能表现其精神与生命者，正如 *Polyphemus* (*Cyclopes* 岛的首长出何美儿 *Homer* 诗) 的像没有眼睛一样。故彼以文学史宜作，而尝论其研究编纂的方法。顾倍根之所谓文学史，非今世所云的文学史，乃为一种学艺史。从倍根的说，则哲学宜分为三部分：其一关于神明 *Numen* (*the Deity*)，其二关于自然 *Natura* (*Nature*)，其三关于人 *Homo*；此外尚须有一为此等部门的本源的普遍的学问谓之 *Philosophia prima*。 *Philosophia Prima* 者，即第一根源的哲学。倍根之所谓诗，似非韵文的意味，乃指某一种类的文学，即想象假作而叙事者。又其所谓 *Philosophia* 者，从通例亦译为哲学，实则译作“穷理”，较为稳当。

“*De Augmentis*”，在西洋思想史上为特可注意的一种；而史、哲、诗的鼎立论，亦于欧洲学问分类法的历史上特别的显著。随着时代的迁移，思想亦生变化。学问发达的程度，既代有不同，从而关于学问的分类，各种学科的位置，自生新的见解。史、哲、诗的三分法，不足以适应当代学问的分类，则有孔德、斯宾塞诸子，起而别创新分类法，以求适应当代学问所达到的程度。即专就历史与哲学而论，今人解此二者，与倍根不同；古时用哲学一语，义颇含括，今则限制谨严，不容泛假，普通所谓科学者，则另外认其存在了。历史一辞，偶有用于关乎自然事物者，即今

亦非全无；然在今日，通例一言历史，人即认为专关于人事；且以历史为关于记忆者，哲学为关于理性者，亦为今人所不能满足；古今人关于此二者的解释不同，亦不容含混过去。

史学在欧洲中世以前，几乎全受神学的支配；以为人间的命运，全依神的命令而定；历史的行程，惟以神意与天命为准。那教父奥古士丁(Augustin)的思想，即是这种历史观的代表。所著《神国二十二书》，即是发表这个思想的。其思想直至今日，尚为全世界的基督教所代表。他说历史是由魔国移向神国人间努力的过程。个人于兹世的生活，以应神的思召者为最有价值；国民的活动，亦以尽力于建神的国于地上者始有价值。厥后谷灵蒲(George Grupp)著《文化系统及历史》，即宗此说。在此等时代，神学而外，几无科学之可言。到了十六七世纪顷，宗教的权威，随着文艺复兴的运动，渐归渐灭，所谓启蒙思想，盛行于时。十六世纪中，已有哥白尼(Copernicus)及凯蒲儿(Kepler)出，推翻天动说，建立地动说。入十七世纪，加理略(Galilei)见灯笼摇动，而有摆动法则的发见；奈端(Newton)见苹果落地，而有引力法则的发见。依据引力法则，可以解释一切自然界的现象，唯物论无神论的宇宙观、人生观，于是乎发端。到了康德的时代，他已经想望当有凯蒲儿及奈端其人者，诞生于史学界；迨经孔道西(Condorcet)、桑西门(Saint-Simon)、孔德(Comte)、韦柯(Vico)、马克思(karl Marx)诸哲，先后努力的结果，已于历史发见一定的法则，遂把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历史学遂得在科学系统中占有相当的位置。

孔道西认历史是进步的，以智识进步的运动解释历史。他说历史的价值，在供给可以预见将来的材料，但必须发见一种运

动的法则，始能据为预见的准则。而孔氏则不惟未曾立下这法则，亦且并未寻求这法则。

桑西门是孔道西的承继者，亦如孔德是桑西门的承继者一样。桑西门继孔道西起，认宇宙一切的现象形成一个统一的全体。吾人于自然现象既可依一定的法则寻出其间的因果关系，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何择？何以不能寻出一种如引力法则一样的法则，以于驳杂万状零碎无纪的历史事实中间考察其间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为要把历史学作成一种科学，不可不尽力为历史法则的发见。依此历史法则，不但可以说明过去及现在，并且可以说明将来。他认历史的联续，实亘过去、现在及未来而为一个一贯的法则所支配。

桑西门由历史抽绎出来的法则，为组织的时代与批评的时代的递嬗，亦可以说是建设的时代与革命的时代的代嬗。在苏格拉的(Socrates)时代以前，希腊有一个组织的时代；继此而起的，是一个批评的时代，至蛮人侵入的时候止；继此而起的，又是一个组织的时代，此时代由 Charlemagne 时至十五世纪末止；继此而起的，又是一个新批评的时代，此时代由路德时起，以迄于今；继今而起的，必又是一个新组织的时代。

桑西门初受孔道西的影响，把知识的历史观，很强烈的表现于他的初期著作，谓历史的进动，其动因在知识的进步。知识决定宗教，宗教决定政治，故知识决定历史。后来承继这种历史观而发挥光大之者，实为孔德。

厥后桑西门观于法兰西大革命及革命后法兰西的经济情形，其历史观乃一变而重视经济的因子；但其根本原理，即其方法论，并未有所变动。他看革命时的法兰西，政治上虽屡遭激

变,而于社会生活的根底,未尝有何等可以认出的变化。以知政治形式的如何,于人类生活无何等本质的意义。政治于社会,不过是第二义的;构成社会生活的根底而决定历史者,不是知识,不是宗教,亦不是那建筑在知识上、宗教上的政治,实是那致人类生活于可能的产业组织。他于是确立一种历史的法则,认历史过程惟有经由产业组织的变化才能理解;将来的社会,亦惟依产业发达的倾向才能测度,这是桑西门的经济的史观。后来把此说发扬光大集其大成者,厥为马克思。

孔德承桑西门的绪余,从知识的进步上考察历史的法则,以成他的“三阶段的法则”(Law of three stages)。孔德认历史的发展,实遵此三阶段的法则而进。不但全个的历史行程是如此的,便是一个知识,一种科学,或是天文学,或是社会学,莫不遵此法则以为进步。所谓三阶段的法则,就是说社会的进化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神学的阶段,或云假设的;第二时期,是玄学的阶段,或云抽象的;第三时期,是科学的阶段,或云实证的。第一阶段,是人智发展的开端,第三阶段是人智发展的终局。这是孔德实证哲学的根本论法,亦即是孔德的学术系统中的社会学的根本理法。

可与桑西门、孔德,并称为历史学、社会学的先驱者,还有韦柯。他是个义大利人,生于十八世纪。在那个时代,他的学说并未发生若何的影响。后世学者说他的思想,在十八世纪是太早的“时代错误”(Anachronism)。所著《新科学论》(Scienza Nuova),直到十九世纪法兰西革命后,才由 Michelet 译成法文,他的思想在史学界才发生了影响。

韦柯立志想把社会的研究,放在那依笛卡儿(Descartes),

奈端辈的成绩所确保的确实基础上。他的根本观念，在谓社会历史的发明解释，须寻之于人类精神。世界与其说先是想出来的，不如说先是觉出来的，这便是生存于自然状态没有政治组织的原人的情境；第二期的精神状态，是想象的知识，亦可说是诗的智慧，英雄时代(Heroic age)的半开社会，恰当于此境；最后是概念的知识，适当于开明时代。这亦可以说是韦柯的“三阶段的法则”。他认各种社会皆须经过此三期，每一期的知识状态，可以决定那一期的法律、制度、言语、文学并人类的品德与性质。他主张社会是一期衰退，一期昌明，依螺旋状的运动(Spiral Movement)，循环着向前进步。

唯物论的历史观，有两派可以代表，一派是海尔革(Hellwald)及席克(Seeck)等的进化论派，一派是马克思及恩格尔(Engels)辈的经济学派。

海氏著有《自然的发展上的文化史》(一八七五年)，席氏著有《古代世界衰亡史》(今已出至五卷，一八九四——一九一三年)，都以生物学上的根本法则解释历史。

马克思一派，则以物质的生产关系为社会构造的基础，决定一切社会构造的上层。故社会的生产方法一有变动，则那个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学艺等等，悉随之变动，以求适应于此新变动的经济生活。故法律、伦理等不能决定经济，而经济能决定法律、伦理等。这就是马克思等找出来的历史的根本理法。

这样子历史学在科学上得有相当的位置。治史学者，亦得有法则可循。后来有一派学者起来，不以此为满足。他们以为历史学虽依此得有在科学中的位置，但此位置终系比附自然科学而取得的；于是努力提倡一种精神科学，使与自然科学对立。

作这种运动的先驱者，首推翁特(Wundt)，余如兰蒲瑞西(Lamprecht)，亦欲依此方法定历史的学问的性质。然翁特等所主张的精神科学，由学问的性质上说，亦与自然科学等是以法则的发见为其目的。固然，依翁特的见解，虽等是说因果的法则，但为精神科学的目的者是内的法则，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外的因果法则迥异。然自学问的性质上看，二者之间，终无大差。这个运动，仍不能给历史学以对于自然科学得有独立的位置的保证。于是又有继翁特精神科学的运动而起者，则德国西南学派的文化科学运动是。

德国西南学派，亦称巴丹学派，与马尔布尔西学派同以新康德派见称于世。此派创始于文蝶儿班德(W. Windelband)，而理恺尔特(H. Rickert)实大成之。余如梅理士(G. Mehlis)、拉士克(E. Lask)等，皆为此派的中坚。今也，文氏终老，拉氏亦复战死于疆场，西南学派的重镇，屈指数来，不能不推理、梅二氏了。

此派的历史哲学，亦称为新理想主义的历史哲学。这种运动，就是主张于自然科学外建立历史的科学，即文化科学的运动。自然科学的对象，即是自然。自然为物，同一者可使多次反复，换句话说，就是说同一者可使从一般的法则反复回演，如斯者以之为学问的对象，不能加以否认；因而自然科学的成立，亦易得有基础。然学问的对象，于可使几度反复回演者外，还有只是一回起一趟过者；这不是一般的东西，乃是特殊的東西；不是从法则者，乃是持个性者，是即历史。应该于自然科学外，另立文化科学，即是历史的科学以研究之。自然科学的对象为自然，文化科学的对象为文化；自然是一般的東西，故须用一般化的方

法研究之，文化是持个性者，故须用个性化的方法研究之；自然不含有价值，故用离于价值的方法，文化含有价值的意味，故用价值关系的方法。他们不把历史看法则学，却把历史看作事实学。这文化科学能够成立与否，现方在学者研究讨论中。这是史学在科学系统中发展的径路。

(五) 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

与史学有较近的关系的学问，大别可分为六类：

第一类，言语学，文学。

第二类，哲学，心理学，论理学，伦理学，美学，教育学，宗教学。

第三类，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统计学。

第四类，人类学，人种学，土俗学，考古学，金石学，古书学，古文学书。

第五类，关于自然现象的诸种科学，及其应用诸科学（包含医学工学等）。

第六类，地理学。

在右所举的与史学有关系的学问中，我只择出文学、哲学、社会学三种，说一说他们与史学的关系；因为这三种学问，与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

甲，史学与文学

古者文史相通，一言历史，即联想到班、马的文章，这是因为文史的发源，都源古代的神话与传说的原故。这些神话与传记载的记载，即是古代的文学，亦是古代的历史；故文史不分，相沿下

来，纂著历史的人，必为长于文学的人。其实研究历史的学者，不必为文豪，为诗人；而且就史实为科学的研究，与其要诗人狂热的情感，毋宁要科学家冷静的头脑。至于记述历史的编著，自以历史文学家执笔为宜。因为文学家的笔墨，能美术的描写历史的事实，绘影绘声，期于活现当日的实况。但为此亦须有其限度，即以诗人狂热的情热生动历史的事实，应以不铺张或淹没事实为准。这样子编成的历史，含有两种性质：一方是历史的文学，一方是历史科学的资料。

现代报纸，其性质亦与史相近。有人说在某种意义，历史可以说是过去的报章，报章可以说是现在的历史。这话亦有些道理。作报的人要有文学的天才，亦要有史学的知识。这样子做报，那作出的报章，才是未来史家的绝好材料。

乙，史学与哲学

史学与哲学的关系，得从两个异点考察之：第一，史学与哲学，伊古以来曾于实际有如何的关系？二者之间，事实上有何相互的影响与感应？第二，二者由其研究的性质上有如何相互的关系？前者谓之历史上的关系，后者谓之性质上的关系。今欲研究二者历史上的关系，其事非我的能力所能胜。兹但就其性质上的关系，由二者的立脚点分别以为观察。

1. 以史学为主对于哲学的关系

(1) 史学的对象，既为人生与其产物的文化，则为文化一要素的哲学，当然亦在史学的对象中。研究历史者，有时要研考一时代的文学、美术、宗教、道德、法律、政治、经济，有时亦要研考一时代的哲学思想的由来及其变迁沿革，并其与其他文化诸要素发展进化的相互关系，乃至其及于国性民德的影响感应等。

(2) 史学家应否有一个一定的历史观，言人人殊。或谓史家宜虚怀若谷，以冷空的智慧，观察史实；不宜豫存一先入为主的历史观。此言殊未尽然，史实纷纭，浩如烟海，倘治史实者不有一个合理的历史观供其依据，那真是一部十七史，将从何处说起？必且治丝益棼，茫无头绪。而况历史观的构成，半由于学问智识的陶养，半由于其人的环境与气质的趋倾，无论何人，总于不知不觉之中，有他的历史观在那里存在。夫历史观乃解析史实的公分母，其于认事实的价值，寻绎其相互连锁的关系，施行大量的综合，实为必要的主观的要因。然则史学家而有一种历史观，其事非概可指斥，不过要提防着过于偏执的或误谬的历史观就是了。然则历史观果何由而成呢？这固然与其人的气质，癖性，所处的境遇，所遭的时势有关；而过去或当代的哲学思想，直接间接有以陶熔而感化他的力量，亦不在少。然则哲学实为可以指导史的研究、决定其一般倾向的历史观的一个主要的渊源。

(3) 历史理论为寻得究竟的假设，与一般原理的阐明，不能不求助于历史哲学，有时尚不能不求助于一般哲学。

(4) 史学研究法与一般论理学(含有认识论及一般方法论)或智识哲学有相关涉的地方。

2. 以哲学为主对于史学的关系

(1) 哲学要巨人生界、自然界宇宙一切现象为统一的考察。历史事实既为人生现象，当然属于哲学考量的对象中而为其一部分。若于一哲学系统中，不列入历史事实，则其系统决非完全。

(2) 哲学门中，人生哲学或历史哲学，特有关于历史事实。

其研究虽与特殊科学的学科异其考察法，其性质亦不相同；然非以特殊科学的史学的研究为基础，适当的斟酌采取其结果，则其根据决不确固。

(3) 凡于特殊科学的研究上所能得的一般的见解，常有含蓄哲学的要素或暗示哲学的思索者，其影响感应每能及于哲学。哲学固能对于特殊科学供给一般的原理及根本观念，特殊科学亦能供给哲学以某种观察的方法，思考的方法。这些方法，多足以启示其新进路。哲学由数学、物理学乃至生物学的发达进步所受的影响感化，盖不为少。史的研究（虽称为国家学、社会学的研究者，苟其性质为历史的，即以纳于史的研究中为当）的发达进步，亦有给新观察法、思考法于哲学的思索而助其进步的地方。

(4) 某一国家某一时代的哲学，恒与其国家其时代的社会情状一般人文的形态有密切的关系。欲明此关系，正当的理解过去及现在的哲学系统的位置，与以适当的评判，以有一般历史的确实知识为必要。

(5) 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与其人的体质、人格、教育、环境及一般的经验均有关系。苟欲澈知其人思想的由来，必须就其人的气质、品性、家系、血统乃至亲缘、师友，一一加以考察。此等考察，即传记的研究，为史学上的研究之一种。其研究方法，须合于史学研究法一般的原理。

(6) 哲学史即是历史的一种类。关于哲学思想的生成、发展的研究，其性质亦为一种历史的研究，而属于史学研究法所能应用的范围中。

综上所述，则知史学与哲学，实非漠不相关。二者于研究的

性质上，有互相辅助的关系。

今为明了其关系起见，特为列表如下：

史学与哲学 学的关系	
历史上 的关系…… 於哲学	性质上 的关系…… 於史学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史学亦以哲学为其研究的对象 2 史学家恆由哲学得来历史观 3 历史理论求其究竟的假设一般原理的阐明於哲学 4 史学研究法与一般论理学或智识哲学有关涉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历史事实属于哲学应该考量的对象中 2 人生哲学历史哲学尤须以史学研究的结论为基础 3 哲学可由历史的研究得来某种观察法与考量法 4 为明哲学与一般社会及人文状态的关系以一般历史的知识有必要 5 为知各哲学家的学说与其人物的经历的关系有施行传记的研究通用史学研究法的必要 6 哲学史的研究亦为一种历史的研究

史学与哲学在学问上的接触，实集中于两点：一为哲学史，一为历史哲学。

哲学史普通虽看作哲学的学科之一，同时亦可以说在史学的范围内。其所研究的对象，虽为哲学，而其观察法，则为历史的。由其研究的性质上言之，亦实为一种的历史，只以其所研究的对象与普通历史不同，故人们觉着他似与普通历史大异其趣。

然欲研究哲学史，必先搜集史料，下一番选择批判的工夫，由是而确定事实（凡所表明的思想、所主倡的学说均包含之），综合之以明其生成发展的关系，其研究亦为一种史的研究，与他种历史上的研究大体上毫无差异。

哲学史的主要史料，当为学者的著书。凡关于著书的真伪，笔写校刊时所生的字句的变动，窜入，脱误，撰述的年代，地方，原因，动机，种种研究，皆与一般史料的研究同其性质，可以适用同一的研究法。

哲学史家欲一一考察哲学家的为人及其经历，欲知其与其所怀抱的哲学思想有何等的关系，须为传记的研究。当此时会，与普通作传记的研究的历史家立于同样的地位，作同样的工作。

一个哲学家考察一般文化的状态、社会的情境与哲学思想的关系，不止于研究哲学思想的本身，同时亦有就一般研究的问题行某程度、某范围的研究的必要。为应自己研究的特别目的，就一般历史上的某特别事项，不能得到精细确实的依据时，有时亦要自己下手，搜集根本史料，作一番新研究。这样看来，哲学史家同时要具哲学家、史学家的二种资格。

把哲学当作文化的一要素去看，哲学的历史当然为构成文化史的一部分者；由哲学与诸般科学的关系上去看，哲学的历史当然是学术史、思想史的主要部分。但哲学史不但可以包括于此等范围更广的历史中，即其本身亦固有可以独立的存在的理由。

历史哲学是由统一的见地而观察历史事实者，是依哲学的考察，就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为根本的说明、深透的解释者。

在严密的意义上的历史哲学，不当视为属于一个特殊科学

的史学，当视为构成哲学的一部分者。于科学的考察与哲学的考察间，当立区别，而防二者的混同，这固然不错；然欲截然分清，则亦势所难能。盖以二者关系的亲密，方有事于此科的研究，自然的易涉及于彼科的研究。

历史哲学一语，若于严正的意义用之，则为哲学组织的一部分，非能离于哲学系统而别自存在者，即非可属于一个特殊科学的史学范围内者；然于严正意义的历史科学（即历史理论），亦非能为哲学组织的一部分，非可存于哲学系统中，而当与记述历史等共包括于广义的史学内。从来习例，哲学一语，每致被人泛用；故于历史哲学，亦常有人以广义解之，漠然视为泛称关于历史事实的理论的考察者。如傅林特(Flint)所称的历史哲学，其概念即极其广泛。兹将其为历史哲学所下的定义，抄译于下：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s not a something separated from the facts of history, but a something contained in them. The more a man gets into the meaning of them, the more he gets into it, and it into him; for it is simply the meaning, the rational interpretation, the knowledge of the true nature and essential relations of the facts.”

“历史哲学不是一些从历史事实分离出来的东西，乃是一些包蕴在历史事实里边的东西。一个人愈深入于历史事实的意义中，愈能深入于历史哲学中，即历史哲学愈能深喻于其理智；因为历史哲学纯是些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质与根本关系之意义之合理的解释之智识而已。”

有些史学家则谓历史哲学一语不宜泛用。夫既于自然科学

外认心性及人事诸科学存在，而此心性及人事诸科学，纵令与哲学有极密切的关系；而以既已看作为离于严正的哲学而存在者以上，则为指示一个当属于人事科学的研究，而用哲学一语，终不妥当。关于历史事实的理论的研究，若为科学的，则不称之为历史哲学，而当以他名锡之，此说颇有道理。为划清学问的界范起见，似宜限定历史哲学的意义，使与历史科学分开，不相混合，以避误解。

哲学的考察与科学的考察，本来不同。哲学的考察，是就一切事物达到某统一的见地，由其见地观察诸般事物的本性及其原则者；而科学的考察，则限于必要时，假定某原则定理，专本于特殊研究以说明某种特定事物的性质及理法者。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则于就历史事实的哲学的考察，即是历史哲学，与就历史事实的科学的考察，即是历史科学间，亦不可不加以区别。

严正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间的关系，恰如严正的自然哲学与物理学间的关系。翁特认自然哲学为其哲学系统的一部。此以哲学系统的一部而存在的自然哲学，与以一特殊科学而存在的物理学，自不能不异其趣。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之关系亦然。从前亦有人用自然哲学一语为物理学的别名者，今则无之；而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的界域不清，名辞互用，虽在今日，犹尚有然。

吾人于科学之外，还要哲学，还要攻究世界的原理就全体而与吾人以统一的智识关于一切事物为根本的说明之哲学。在哲学的完全组织中，基于世界的原理，由统一的见地，特就历史事实与以根本的说明之一部分，亦为不可缺者。故吾人于历史科学之外，承认为哲学组织的一部之历史哲学存在，承认二者不可

偏废。研究历史哲学，是哲学家的责任；研究历史科学，是史学家的责任。然二者之间，固有极密切的关系，其互相辅助互相资益的地方甚多。历史哲学，有时要借重历史科学研究的结果，利用其所供给的材料；历史科学，研究到根本问题的时候，亦要依据历史哲学所阐明的深奥高远的原理，以求其启发与指导。惟以于研究的性质，于考察的方法，有所差异的原故，不能不加以区别。

傅林特则谓科学与哲学二语互相代用亦无不可，于二者间严立界域，不惟不能，抑且不可；因为区别二者过严，则有混视科学与哲学的亲密关系的顾虑。夫谓科学与哲学，不能截然分离，固亦未尝无相当的理由；然为研究的便利起见，而限定其性质与范围，似亦科学分类上之所许。

有一派哲学家，于哲学问题中特别看重智识的批评之问题。这一派人自然要认历史的智识的批评为历史哲学的主要问题。此事曩不为学者所注意，近始注意及之。这批评的论究，即智识学的论究，今后将日益精微，诚为最堪属望之一事；然若以历史哲学的任务，为专在论究历史的智识的批评，即形式的批评，此外更无其他应当研究的问题，则未免强历史哲学的广大范围以纳于狭小的局部，而没却其本来的领域，殆非通论。不错，这种形式的批评的论究，于实行历史哲学实质的建设的论究，亦诚为必要；其应该存在，亦为吾人所承认；但他只是历史哲学之准备的研究，入门的初步，不能说他就是历史哲学的全体。

历史哲学所当究论的问题，到底是些什么问题呢？大体言之，历史哲学所当究论的问题，应是些比在历史学上所究论的，更普遍，更渊深，更根本的问题。历史学与历史哲学间的差异，

如果止于此点，人且疑为这仅是程度上的事；抑知二者之间，尚有更重要的性质上的差别在。原来科学之所穷，即哲学之所始。凡历史事实之非历史科学所能探究、所能解释的问题，都归历史哲学的领域。即凡历史事实之须从哲学的见地基于世界全体的原理以根本的说明其本性及其原则者，都为历史哲学所当研究的问题。例如历史事实究竟的本性如何？历史事实的根本原则如何？历史事实或于各个或于全体究竟有如何的意义？这些问题，都是历史哲学领域内的问题。

史学是研究人生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哲学亦是研究人生根本问题的学问，二者原有密切的关系。吾人对于人生现象，有时只靠科学的说明，不能满足；则进而求之于哲学，以期得一比较普遍而根本的解决，这亦是自然的要求。例如由统一的见地去看人生果为如何者？于个人、于氏族、于国民、于民族乃至于人类的人生，各为构成全体的部分，果有特定的意义吗？果有特定的天职吗？人类的经历果有一个前定的轨道吗？宇宙间果有一个能预想的大意匠吗？人生果不能说是和作梦一样吗？所谓历史事实，吾人所认识的，果是真实的？还是幻妄的？人事的现象，果真有如吾人所认识的形式与内容吗？人事果然是受一定的主宰者的统制，遵着他的根本大法以为运行的呢？还是乱哄哄的瞎碰一气，漂流在那无计画无方向的运命的海里，“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呢？一个人，一氏族，一国家，一民族，乃至全人类的荣枯，兴亡，盛衰，隆替，果然是命也如此，无可如何呢？还是祸福吉凶，惟人自召呢？茫茫人事，果于不识不知中，由某点进行向某点归宿吗？人生果有目的吗？历史果有目的吗？人事的纷纭变化，果然是依单纯原理的发展而表现出来的吗？所

谓历史于世界的进步者，毕竟可认为有何价值有何意义而可理解吗？吾人于纷纷扰扰的生活中，少一驰思于物外，凝想于心中，这些问题，必要自然的发生而不能遏止。骤见之虽似空漠无用，其实皆为关于人生最切要的问题，吾人亦安能忍而不思求一解释？关于此等问题的解答，宜先根据认识论上一般的考察，精察其何者为人智所终不能知，何者可试为推论思议到如何的程度。于其终非人智所及知者，则说明其所以不能为人智所及知的理，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于其可试为推论思议到某程度者，则进而为推论思议至于其所能几的程度。这正是哲学家的任务。此等关于历史事实的根本原理原则的研究，应归入历史哲学的范围。被历史哲学的名辞于此等问题的研究，最为稳当。此等属于哲学家范围内的研究，史学家固不必强为包揽，而哲学家则宜引为己任。至若史学家于就历史事实为科学的研究之余暇，亦欲试为历史哲学的研究；或以哲学名世之人，亦欲就历史事实试其科学的考证，皆为无妨，而且必要。不过为明学术分界以图是等研究的健全发展起见，不能不立历史学与历史哲学的区别而已。

丙，史学与社会学

史学与社会学有密切的关系，其理至明，无待赘论。现今所要论的，是历史学与社会学是否同物？倘非同物，其异点安在？既有了社会学，历史理论的一学科，还有没有成立的必要？设使历史学（即是历史理论）这一学科一旦完全成立，那与他性质最近的社会学，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某学者说历史不是汇集过去所起的各种类的事件的东西，乃是人类社会的科学。近顷世人虽造出社会学一语，然此与 *Histoire* 实为同物。历史是研

究社会事实的学问，所以就是社会学。虽然，吾人终认二者之间，有些不同，终以为不可认作全为同物。不错，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社会，历史学所研究的对象亦是社会；社会学的起原，实亦起于历史上理论的考察，是由欲于历史寻出理法的动机自然发生出来的东西。桑西门是寻求理法于历史的一人，所以他又是一个社会学先驱者；孔德是寻求理法于历史的一人，所以他亦是一个社会学先驱者；韦柯亦然，但吾人不能以此而遂不认其间有相异的性质。历史学的目的，在考察人类社会生活的经历及其变革；而社会学乃在人类社会生活的结合及其组织。历史学是就人及人群的生活经历为理论的研究，以寻其理法者；社会学是就人群的共同生存的一切社会现象，为理论的研究，以寻其理法者。简明的说，历史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纵起来研究的学问，社会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横起来研究的学问。吾人若欲把人事现象充分的施行科学的研究，二者悉所必要。自其学问的性质上说，二者有相资相倚的关系，自不待言。

（六）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

凡是一种学问，或是一种知识，必于人生有用，才是真的学问，真的知识；否则不能说他是学问，或是知识。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自然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史学既能成为一种学问，一种知识，自然亦要于人生有用才是。依我看来，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很大。第一，史学能陶炼吾人于科学的态度。所谓科学的态度，有二要点：一为尊疑，一为重据。史学家即以此二者为可宝贵的信条。凡遇一

种材料，必要怀疑他，批评他，选择他，找他的确实的证据；有了确实的证据，然后对于此等事实方能置信；根据这确有证据的事实所编成的纪录，所说明的理法，才算比较的近于真理，比较的可信。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这种求真的态度，薰陶渐渍，深入于人的心性，则可造成一种认真的习性，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史学的影响于人生态度，其力有若此者。因此有一班学者，遂谓史学的研究日趋严重，是人类的精神渐即老成的征兆。在智力的少年时期，世界于他们是新奇的，是足以炫夺心目的，使他们不易起热烈的研究世界的过去的兴味。生活于他们是一个冒险，世界于他们是一个探险的所在，他们不很注意人间曾经作过的事物，却注意到那些将来人类所可作的事物。为的是兴奋他们，历史似应作成一种传奇小说的样子，以燃烧他们的想象；无须作成一种哲学的样子，以启悟他们的明慧。这样的奋往向前欢迎将来的少年精神，诚足以令人活跃，令人飞腾，然若只管活跃，只管飞腾，而不留心所据的场所是否实地，则其将来的企图，都为空笔，都为梦想。本求迈远腾高，结局反困蹶于空虚的境界，而不能于实地进行一步。而在有训练与觉醒的老成的精神则不然，他们很知道世界给与吾人以机会的俄顷，必有些限制潜伏于此机会之下以与之俱。这些限制，吾人必须了喻，有时且必须屈服。所以他们很热心的去研究过去，解喻人生，以期获得一种哲学的明慧，去照澈人生经过的道路，以同情于人类所曾作过的事而致合理的生活于可能的境界。史学的研究，即所以扩大他们对于过去的同情，促进他们的合理的生活的。研究历

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奇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这种智力的老成,并于奋勇冒险的精神,不但未有以消阻,而且反有以增进,一样可以寻出一种新世界,供他们冒险的试验。立在过去的世界上,寻出来的新世界,是真的,实的,脚踏实地可以达到的;那梦想将来所见的新世界,是虚的,假的,只有在“乌托邦”“无何有之乡”里可以描写的。过去一段的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这一座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踏践实地的健足,才能拾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级、所陈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我们登这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无限的未来世界,只有在过去的崇楼顶上,才能看得清楚;无限的过去的崇楼,只有老成练达踏实奋进的健足,才能登得上去。一切过去,都是供我们利用的材料。我们的将来,是我们凭借过去的材料、现在的劳作创造出来的。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科学的态度。这种科学的态度,造成我们脚踏实地的人生观。从前史学未发达的时代,人们只是在过去的纪录里去找历史,以为历史只是过去的事迹。现代的史学告我们以有生命的历史不是这些过去的纪录。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

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旧历史观认历史是神造的，是天命的，天生圣人则世运昌明，天降鞠凶则丧乱无已。本着这种史观所编的历史，全把那皇帝王公侯伯世爵这等特权阶级放在神权保护之下，使一般人民对于所遭的丧乱，所受的艰难，是暴虐，是篡窃，是焚杀，是淫掠，不但不能反抗，抑且不敢怨恨，“臣罪当诛，天王明圣”，无论其所受的痛苦，惨酷到如何地步，亦只能感恩，只能颂德，只能发出“昊天不吊”的哀诉，“我生不辰”的悲吟而已。在这种历史中，所能找出来的，只是些上帝，皇天，圣人，王者，决找不到我们的自己。这种历史全把人们的个性，消泯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只有老老实实的听人宰割而已。新历史观及本着新历史观编成的历史则不然，他教吾人以社会生活的动因，不在“赫赫”“皇矣”的天神，不在“天璽”“天纵”的圣哲，乃在社会的生存的本身。一个智识的发见，技术的发明，乃至把是等发见发明致之于实用，都是象我们一样的社会上的人人劳作的结果。这种生活技术的进步，变动了社会的全生活，改进了历史的阶段。这种历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即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

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出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这是由史学的研究引出来的舜人亦人感奋兴起的情绪。自然，随着史学研究的利益，亦有些弊害影响到我们心性上的。例如治史学的人，临事遇物，常好迟疑审顾，且往往为琐屑末节所拘，不能达观其大者远者，这不能不说是随着史学研究发生的弊害。但若稍窥哲学的门径，此等弊害，均能以哲学的通识达观药之，稍一注意，即能避免。吾信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自己，吾故以此小册为历史学作宣传，煽扬吾人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兴趣，亦便是煽扬吾人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兴趣。

1924年5月

《百科小丛书》第51种，
商务印书馆出版

署名：李守常

人 种 问 题*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三日)

人种、民族与国民 讲到人种问题,必先分辨“人种”、“民族”与“国民”这三个名词的意义。何谓国民?国民的意义是从政治、法律的概念中发生出来的,故不问人种与民族之同异,只须在一种政治之下所形成共同生活的人们便叫做国民。何谓民族?民族的区别由其历史与文化之殊异,故不问政治、法律之统一与否,而只在相同的历史和文化之下生存的人民或国民,都可归之一民族。例如台湾的人民虽现隶属于日本政府,然其历史、文化都与我国相同,故不失为中华民族。至于何谓人种?则更不问政治、法律之统一,历史、文化之同异,只就人类学的范围,从生理上考察其特征而发生的概念,便是人种。

人种与民族之关系 在不同的各种族之间,自然要发生一种“异视”的感觉。这是种族的本能。英国白徠士(Bryce)男爵于一九一五年二月在伦敦大学的讲演中,指明这种本能有下列各重要之点:

(一)这种“异视”的本能,在原始时代糅杂的种族之间,往往存在,一到相同的种族间,就似乎立即消灭,看不出来。

* 这是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三日在北大政治学会的讲演,刘伯青记。——编者

(二)在文化进步的时期内,政治上的竞争和宗教上的冲突,各本其所有的“确执”,往往把人种的“异视”的冲突压倒。

(三)人种中“异视”的冲突,有如海中的暗礁一般,时时存在海底,却不表现于海面。然在异种的政治或宗教的冲突激烈时,这种“异视”的作用,能使此冲突扩大而强烈。

不过,近世民族感情之发达,并不根源于这种“异视”的作用,而是依据于言语、文学及历史传说之共同而后成立的。在十八世纪的末期已有人承认此说了,至于十九世纪,更因民族感情的迅速增长而光明显著。可见人种的差异,确是民族冲突之附要的原因。

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民族冲突中带有人种差异的色彩,由此就可以看出民族与人种的关系。从前人种竞争以至于人种斗争的种种学说并不盛行,例如德国,在一八八〇年有人讲到这类问题,一般人都以为无关重要,不加重视。但在现在,凡谈世界大势的学说或问题,无不言及人种,无不与人种有关系,就可见其重要了。

我们于同种之中也能寻出争斗的事实,更可证明人种差异的“异视”实在是一切斗争的附因。白禄士更以为民族观念发生显著的原因,又由于法国革命的影响。因为自法国革命成功以后,欧洲各国人民发生政治生活的感觉,对于国内国外的政治压迫,群思抗拒,因此遂发生国民统一的要求。这种要求不免又牵动了人种的枢纽,于是就发生人种的关系,又因此而发生民族同异是以人种为中心的观念。所以民族独立,无论在欧亚各洲的各民族主义运动,均是特别激昂。

在德国一八四六年人民自治运动,不过为要求在民族国

家之下的政治统一。至于现在科学发达,商业进步,愈使民族观念日益强烈。又兼有各民族的文学家、诗歌家以及美术家的作品,往往激动起各民族自尊自雄的精神。从此民族间就因之发生竞争,甚至于战斗。俄国革命运动就含有这种民族主义的意义。

民族主义 民族之成立由于甚么?有以为由于统一的语言的;有以为单凭统一的语言不足为成立之原因,而要更兼有主观的事实,要在相互的意识之承认及精神上认为同族之后而民族才能成立。此外有以为民族之成立纯由地理(Nation)的事实使然,其以言语、文字、政治和宗教之统一系统,不足以为民族成立之原因。法国 Odysse-Barot(新闻家)、Elise Reclus(地理家)、Justin & romner(新闻家)三人都拥护这派(地理的)学说。有以为法国民族是单纯的民族者,Barot 驳之,而指明法国之民族由于法国的地理使然。欧洲除葡萄牙、瑞典……等国外,都有单纯的民族所组织的国家。就如英国虽小,也由于威尔士(Wales)、爱尔兰(Ireland)、苏格兰(Scotland)、英格兰(England)的民族组合而成。至于法国,则为 Romandy、Proochce、Giuenne、Garcony、Larraine、Brittany 等小民族所组成。各民族的特性质,都各自保存,不稍渝灭。Barot 以为现在欧洲的民族,其以言语、文字……的统一为成立的原因者,不过是暂时间人为的民族,将来必至崩裂瓦解。所以他主张自然的国家,是以小民族的国家代替欧洲大民族的人为的国家。他的意思,只有依地理上山川形势的天然分划,才可为民族成立的根据。但是,果真依照他的学说做去,英国就不仅分为四国了!于此也可见他的“地理的”民族学说,不能自圆。

欧洲人的世界观 欧洲人以为他们的文明，除了基督教之外，再没有别的可说。他们对于世界的观念，以为只有白人的世界。法人 Theodor Jouffroy 以为野蛮人将来能进化到文明的地步，其系统可分为三：(一)基督教；(二)回教；(三)婆罗门教。只有基督教是进步的，改化不已而能适应世界潮流的。其余二者与基督教相比，是懒性的，迟滞不进的。因此构成基督教的国家，只有日渐进化，日益文明。其余的国家，只有退步，只有堕落。倘若基督教长此不发生其他特别原因，则世界将变为基督民族的世界！现在德、法、英三国各以其科学的、哲学的和实用的民族特性引导文化的进步，实在可算是构成欧洲文化的先驱，一切欧洲战争，将来也一定可以停止的。这是依据历史的事实所得的断定。不过，Jouffroy 的结论，总以为世界完全是白人的，未免言过其实了。

白人在世界居于引导文化的先驱，视异色人种为低下阶级而自居于高上的地位，因此人种在世界上也成为阶级的问题，于是世界上就形成了相对的阶级。人种的斗争于将来必定发生，这是可预为断定的。而且这斗争或许为白色人种与有色人种的战争而与“阶级斗争”并行哩！我们于俄国革命的事实可引为例证。俄国革命虽然有白色人种，然而参加有被压迫阶级的有色人种，其目标则同是反抗压迫阶级的白色人。可见低下阶级的有色人种与高上阶级的白色人种之“阶级斗争”已粗具雏形，其进展则方兴未艾。

一九一〇年英人辛博森 (Putnan Weale) 著《毛色之争》(Contest of colours) 一书，他以为万物皆有此性，人为万物之一，故人亦有此性——因毛色的不同而发生的冲突。但有因

嗜好的原故，能相调和的，如中国人虽为黄色，然性喜白色，或即此例，也未可知。据 Weale 调查各色人种的数目，有如下表：

白色人种

欧洲	四五三,五〇〇,〇〇〇
北美	八五,〇〇〇,〇〇〇
澳洲	六,〇〇〇,〇〇〇
南美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非洲	一,五〇〇,〇〇〇
附杂白色人种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合计	五六六,〇〇〇,〇〇〇

黄褐及黑色人种

亚洲	九四七,〇〇〇,〇〇〇
非洲	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太平洋诸国	二,〇〇〇,〇〇〇
北美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合计	一,〇九九,〇〇〇,〇〇〇

白色人种的总数与黄褐及黑色人种的总数比较起来，后者多于前者。据上段的推述，人种斗争将来必与阶级斗争同时表现出来，其胜利者亦可依此比较而预断为有色人种。法人 Gobineau 著《人种不平等论》（一八五〇年出版）略谓人种既然不同，优劣亦自不免。据他的判断，以为亚利安人种为最优，而代表亚利安人种的尤以日耳曼族为最。但是他持一种悲观论，以为优的总要坠落，而将来多数劣级人种相联合来与少数优级人种相斗争，后者必败，前者必胜，亦是理所当然。此外，尚有许多历史学者也承认其说为的当。

至于法人 Oictor Cousin (哲学家, 其思想很受黑格尔的影响), 他的论点, 完全立足于地位 (Place)。他以为这种优胜劣败的事实与地位有重大的关系, 如人与自然, 都是在同一地位之下才发生的, 如一民族所在地之山川形势, 于历史上即为各时代的民族舞台。他分历史进化为三时期: 在第一期的, 以无限制的力量观念的为生活, 完全信赖上帝; 在第二期为有限的; 在第三期为前二者混合起来的。故第一期的舞台常在广大辽阔的平原, 有汪洋溟渺的海水为疆界——这在亚洲, 即东方文明。第二期的舞台很窄小, 在希腊、罗马等处。第三期的舞台是在有内海的大陆, 如现在的欧洲便是。由此可以寻出不同的民族各有其不同的文化; 这不同的文化之发生又各由其不同的地位了。然而一民族的特性必代表其一时代的理想, 但须于这时代的总精神之下乃能了解。因为同一时代, 各民族所代表之理想其相同的比相异的还多。不过各民族之相异的特殊理想都可认为真识, 而不是完全的真理。若用哲学的眼光, 把他们这些真识合而为一, 乃为完全的真理。

不同的民族所代表之理想至于冲突、爆裂, 于是发生战争。故战争不过是民族理想不相调协的象征。因此于胜败的结果必有强弱的理想可以表示出来: 昨日的真理, 到今日可为错误了。战争显得是真理与错误之决斗; 胜利也就是真理战败错误的凯旋。故胜败不是听天, 而是必然之理——即真理必胜。因此又于战争的胜败可以测定民族精神和其特性的价值的高低。——这是 Oictor Cousin 附带的战争论, 也可引为谈人种问题的考证。

我们革命的先锋孙中山先生自从提倡三民主义 (民生主义

其目的；民族主义是达到这目的的手段，是三民主义的主干；至于民权主义，乃运用民生主义的方法）以来，关于民族主义，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解释略有更变。其在未革命时（辛亥以前），所谓民族主义，不过是对汉满民族而言的意义；其在既革命（辛亥）以后，所谓民族主义是指合中国汉、满、蒙、回、藏五族为一家，只不过稍有汉族为中心的意义。至去年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开会，关于民族主义又有新的解释。这解释系分对外、对内两方面：在现世中国的民族，为要独立而反抗其他任何民族的侵略与压迫，这是对外；同时在国内经济生活不同的民族要使其解放，自决而独立，这是对内。国民党的民族主义经了这番新解释，其意义也更新而切当了。

这种民族主义的新意义与人种问题很有关系，诸君可于上述的理论中看出来。同时，又是我们中华民族应对世界民族加入阶级战争的准备，这也是我们要特别注重的。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贡献，大都以为是老大而衰弱。今天我要问一句，究竟他果是长此老大衰弱而不能重振复兴吗？不的！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已经感觉得这民族复活的动机了。但我要再问一句，这民族究竟真能复活吗？时机倒也到了，只看我们是怎么的奋斗和如何的努力！我们如能使新的文化、新的血液日日灌输注入于我们的民族，那就是真正新机复活的时候。但是，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现在所有的现象：无论甚么团体，时间不过许久，其中就发生一些无谓的争执与乎卑鄙的猜忌……种种鬼鬼祟祟的怪现象，这是很可悲观的啊！但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猛力勇进，要在未来民族舞台施展我们的民族特性，要再在我们的民族史以及世界史上表扬显着我们的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今天

提出这个人种问题来与诸君谈谈的意思。望大家从此努力!

1924年6月20日

《新民国杂志》第1卷第6期

署名：李大钊

新闻的侵略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

前此北京及全国，一时均轰传中山先生逝世，于是全国震惊，京中有数家报纸且为文哀悼。造中山先生逝世之谣言的，是路透社与广州中国银行，可是后者的电报仅达于北京，而路透社之谣言则传播于全世界。自此项消息传出以后，除各地都受影响外，一时广州市面顿呈扰乱不安之象，人心惶惶。造谣者得此结果，自然是心满意足，乐不可支。而中国人的无事自扰，不能不说是食造谣者之赐了。我对于路透社造谣，又另有一种感想。

自经此次中山先生逝世谣言之传播，我们应明了外国的通讯社在中国宣传之可惊。路透社恃其在华之优越地位，仅发布一消息于中国各地，即可使全国革命分子的人心浮动，广州市面惶然不宁。它的魔力可谓很大的了。而我们看中国遍地尽是外国通讯社的宣传机关，如东方、路透、中美等，他们挟资本雄厚的优势，在内地时时操纵新闻，传播于己有利之消息，暴露华人之弱点，以图引起国际公愤；表彰外人在内地之言论及事业，以坚华人对西人之崇拜。有时造谣惑众，如此次硬诬中山先生逝世，图乱广州时局。但是外人在中国的新闻事业之发展，还不在此。最近如日、美争在中国建无线电台，亦是利用传播敏捷消息的便利，在平时图操纵中国的金融、商业；战时亦利用以供军事通

讯，帮助中国一派军阀得到胜利。国人习焉不察，每忽视外人在华之新闻宣传事业。实在，各国中从无许外人在内地自由传播消息的事（俄国即是一例）。此种新闻的侵略，只在中国才有。所以广州政府于此次谣言传播后，即毅然驱逐路透记者出境，不可谓非对人散播谣言的罪恶的正当处罚。但我以为路透社记者不仅在广州的应该驱逐，中国政府应根本取缔外国利用通讯社在国内各地宣传，应将那些造谣生事的、侮辱中国的外国新闻记者，驱逐出境，一个不留，才是正办。

六月十一日北京

1924年6月13日

《向导》第71期

署名：T.C.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

同志们，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拟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从那时起，东方各国共产党便依照这一决议的原则进行了斗争。

中国人民一方面遭受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又遭受中国军阀的压迫。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权力决定了中国军阀的存在，因为后者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所以，中国的民族运动应该是既反帝又反军阀。首先，我们谈一谈外国帝国主义最近在中国的活动，然后，再谈民族运动的发展情况。

近一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嚣张到极点。我来叙述几个最重大的事件。

一、张家口的卡门事件。美国商人卡门预先同美国驻张家口领事商妥，企图从该城私运价值六万美元的白银给中国投机商。按照军事当局命令，要对他进行搜查。卡门抗拒搜查并开了枪。中国士兵则开枪还击，因而卡门受了致命伤。于是，美国大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照会。结果，北京政府不得不赔礼道歉，赔偿了五万美元，惩罚了几个官员。

二、汉口纺织工人案。在一家英国纺织厂中，因组织工会，

有三百来名工人被解雇，三名工人代表被捕。被解雇的工人举行游行示威，被英国军队驱散。冲突进一步扩大，有许多工人受伤。接着，英国军舰也上场了，威胁要袭击城市。结果，三十三名纺织工人被捕，其中三名领导者被英国驻汉口领事判处监禁五个月，其他人监禁两个月。

三、法国金法郎事件。由于义和团起义，中国应付给法国的赔款相当于一亿五千四百七十万九千五百八十二海关两。因法国法郎贬值，法国政府要求中国用黄金，而不用纸币法郎交付欠款，这样便出了五千五百万海关两的差额。法国人已征得北京政府同意这样做。原来反对这样做的议会，因得到政府贿赂，现在也改变了立场。

四、旅顺口和大连。旅大的租借权，从沙皇俄国转给了日本。1923年已期满，但日本拒绝归还，因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中，有一条规定了重行租借。

五、临城案。此案最清楚地说明了帝国主义者的特性。去年，有一群土匪，为给北京政府制造外交上的麻烦，在临城袭击了列车，劫走了一百名中国人和二十名外国人。英、美、日、法、意等国大使立即向北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当时情况特别紧张，帝国主义列强企图乘机取得对中国铁路、航运和财政的控制权。外交团要求：1. 赔偿每个被劫持的外国人八千七百美元；2. 组织由外国军官指挥的护路队；3. 撤销山东督军、驻军司令、铁路警长等人的职务。这些要求激起了人民的抗议，但是总统曹锟为取得外国列强的承认，满足了这些要求。

六、棉花出口。外交团强迫中国政府撤销出口棉花的禁令。北京政府无视华商抗议，同意了这一要求。

七、烟草消费税。利用中国烟草在华制造香烟的英美烟草公司免交消费税，因而中国人民每年损失二亿美元。各省当局打算征收消费税，但北京政府因该公司抗议，禁止征收。

八、广州的关税。广州国民党政府，为使广州的关税收入不致落入北京政府的腰包，开始自行征税。为了对此事进行报复，英国派了二十艘军舰去广州，要求取消税收。但由于孙中山的态度坚决和人民的示威，这一要求未获满足。

九、列强的海上联合舰队。帝国主义列强已达成协议，建立由十一艘英舰、十艘日舰、八艘美舰、六艘法舰及两艘意舰组成的长江联合舰队。目前，列强仍企图迫使北京政府同意这一做法。

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事实。这一切都证明，帝国主义者始终力图利用微不足道的借口来扩大其势力及特权。北京政府完全被他们控制了。在承认苏联的问题上，帝国主义者也在千方百计地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尽管北京政府已同加拉汉同志签订了条约，帝国主义者并未停止其挑拨离间的活动。

在帝国主义列强无耻行径不断出现的同时，以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为首的民族运动也在不断发展。我们的同志正在领导这一运动。起初，国民党人只力争借助武力扩大地盘，不懂得搞群众运动。改组以后，在我们的影响下，国民党开始接触群众，发表了宣言，号召推翻国内的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我们党认为，在象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必须发动一个能联合所有群众活动的统一的政党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所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我党党员和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其目的是为了改组它，改变它的纲领，并使它能够密切联

系群众。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左翼决定根据我们的建议改组这个党。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的改组，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今年一月在广州举行了国民党代表大会，有二百名代表参加，其中我党同志占百分之二十。大会所通过的宣言、决议和纲领，是由于我党党员和左翼的共同努力，才得以通过的。“左翼”同“右翼”进行了顽强斗争，使后者不致反对我们。我党的一位同志发表了声明，阐明我们对真正的民族革命所抱的观点。孙中山也发言专门谈了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大会奠定了建立集中组织的基础。在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里，我党同志占八分之一，在候补委员中占十七分之七。大会所通过的政治纲领，最重要的有下列几点。

对内政策方面：

1. 普遍选举制；
2. 集会、出版、言论和信仰自由；
3. 用外国列强交还租界地后的收入消除盗匪活动；
4. 实行工人立法和保护工人组织；
5. 改组农业体制，改善农村生活条件；
6. 交通运输国有化。

对外政策方面：

1. 取消同外国签定的一切关于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及外人在华政治权力的不平等条约；
2. 不承认不负责任的北京政府所欠的外债。

代表大会之后，民族运动进入新阶段。国民党员分赴各地。我党同志和国民党左翼到处都在积极工作，在南方是开展合法

工作，在北方则进行秘密工作。富有的华侨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热情地加入了国民党，南方的工人也加入了国民党的行列。

五月一日汉口举行了纪念施洋同志的大会，他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期间被枪杀了。甘肃、四川、山东等省和天津市举行了游行。广州有一万多人参加游行，孙中山还发表了讲话。当北方政府在外交团的压力下拒绝同苏俄缔约时，国民党在北京组织了游行。警察驱散了这次游行而且还宣布了戒严。这一切都证明国民党开始领导群众了。

但很快反动势力就抬头了。北方政府慑于国民党与日俱增的影响，开始对其采取镇压手段。五月间，汉口的两个秘密组织被破获，因此有五人被捕，其中两名是共产党员。他们后来被吴佩孚枪杀了。此后，北京很快地又有五人被捕，张国焘（我党北方工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便是其中之一。被捕者囚禁在军事监狱，但未向他们提出任何控告。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我们加入国民党能够加速民族革命运动的开展。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是真正的革命先锋队。不久前，国民党发表了反对反动派的宣言。我们的秘密工作在继续进行。

最后，我想指出，我们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引导他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军阀。在国民党内部，我们将其左翼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并以此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尽管反动势力阻碍工人运动的发展而遇到一些困难，北方的工人组织仍在我们掌握之中。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中有相当的影响，但我们的策略是掌握

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大。它的战线很长,因为它同时领导着工人运动和民族运动。我们一直根据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统一战线的决议进行工作。我们希望第五次代表大会特别关注中国问题,并给予中国党有关今后工作的指示。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第 668—672 页,苏联国家出版社 1925
年版

署名:季华(中国)

按《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 3
月第 1 版)刊印

苏俄民众对于中国 革命的同情*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记者足下：

入俄以来，忽已数月，以道途修阻未尝通讯于足下，而国中朋辈亦多以未接音书为念者，兹特借与足下通问之便，一述我漫游中所得的印象，能假大报余白为之披露，获以间接告其近状于朋辈，幸何如之。

曩昔披读地理，一说到西伯利亚，辄联想及于遐荒万里绝无人烟的景色，以为其地必终岁封于冰雪，荒凉枯寂，无复生气，乃今一履其境，却有大不然者。自满洲里以迄莫斯科，森林矗立，高接云霄，火车行于长林丰树间，入眼均有郁苍伟大之感。景致之最佳处，为贝加尔湖畔山巅的白雪，平野的青松，与湖里的碧波相与掩映，间有红黄的野花点缀于青青无垠的草原，把春、夏、秋、冬四季的景物都平列于一时一处，真令悬想西伯利亚为黄沙白草终岁恒寒之域者，不能不讶为绝景也。

自满洲里来莫斯科，约经七昼夜可达。在此漫漫长途中，只有手一卷以为消遣，偶或探窗以观此幽深伟大绵延万里的长林，故亦不觉旅中的倦苦。抵莫京时，正值全世界五十余个民族的

* 本篇发表时，原编者按：“李守常先生从赤都寄来的通信。”——编者

共产党代表集于此赤色的都城，参与第三国际第五次大会。他们与弟相值，辄询及中山先生的健康如何，广东革命政府的近情如何，颇有一种诚敬的钦感及浓厚的同情自然的流露出来。俄人卫林士基，现执笔于真理报，近著“孙逸仙及其主义”一书，曾以一册赠我，属为批评，我以不谙俄文，未能览读，故至今犹无以应。据留俄青年告我，当路透电告中山先生噩耗的谣言时，消息传来，俄都各大报自“真理报”以下，均著论哀悼，把中山先生的肖像刊于论首。这可以看出中国革命的老祖孙中山先生在世界上的位置了。

暑中无事，曾到莫京近郊的马拉霍英卡一游。此地从前为莫京贵族及资产阶级避暑的处所，故有多数别邸建立于丛深的松林间，今皆为政府所没收，多为工人及儿童避暑之用了。东方大学于此处亦领有房屋数所，有学生百余人和儿童数十人来此避暑，中国留学生之在东大读书者亦与焉。我因中国朋友之介绍得在此小住数月，一观童子军及少年团的生活。其时正值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十周年纪念，我曾随同童子军及少年团到一农村看他们的宣传工作。当他们报告大战惨状的时候，环立而听的妇女有涔涔下泪者，盖有不堪回首之感矣！报告毕，有一双已逾中年的工人夫妇，抱着一个刚刚弥月的小孩，亲手授之于一少年共产党员，说他们愿将此子送给党中入“红十月”的队伍，稍长即入少年共产党的队伍。当日即为此事举行庆祝礼也。礼成，有童子军表演大战的故事，描写前次大战完全是因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而起的。演完，已夕阳西下，他们便整队出了农村，一幅华美的赤帜临风飘扬，引着 International 的歌声，他们归去了。苏联的少年组织分为三部：九岁以下者为“红十月”，以苏联

的劳农国家诞生于十月革命故云，九岁至十五岁者为“先驱”，十五岁至二十三岁者为“少年共产党”。这一班小孩子，都是在革命的风土中开起来的鲜红的花，其精神气度完全与旧社会里产生的人划一新时代。他们的宣传力特别伟大，听说有许多资产阶级的儿童，看见他们的队伍，听见他们的歌声，便想跑进队伍跟着他们去，他们的父母关不住了。这些小孩的小手，不但可以打破他们的旧家庭，实在可以打破全世界束缚人类的一切锁链。

九月初，我和一位同志陪同一位海员代表到列宁堡（旧名圣彼得堡）去参观，我们沾海员的光，住在一个“国际海员之家”里。这是一个海员俱乐部，其中设有图书馆及种种娱乐的设备，每日由下午五点到十一点开门，凡停泊列宁堡的船上的海员，都可到此读书玩赏。管图书馆者为一五十岁左右的女子，能操英语，曾到过中国上海等处。其中欧文书籍不少，日文书籍仅有一本，至中文书籍则绝无。据此女子云，两个月前，曾有中国海员二人到过此地，很希望我们送点中国书来。我们在此住了一周。兹将列宁堡所与我的印象略述一二。

列宁堡街路宽阔，建筑的规模宏大，不知道怎样，他可以使游人起一种历史的感情诗的兴味。最大的街为“十月街”，我甚爱此街的建筑。此地的人情生计，似均有超越莫斯科的点，往来街市的男男女女，大都衣履朴素而大方，不似莫斯科街上新经济政策下的暴发户的女子千奇百怪的样子。以莫斯科与列宁堡相较，我爱列宁堡。

我们承“海员之家”的办事人介绍，我们到列宁堡的劳动宫和主席团的一位见面，具述前来参观之意。此君首先示我们以一通列宁堡职工苏维埃打给英国职工大会的电稿，大意系唤起

英伦的职工起来反对马克丹诺政府干涉广东革命政府，电中并声明系代表列宁堡四十万工人的意思。某君告我们说，此电已用无线电打过去了。某君派人陪我们在劳动宫里略一游览，时正在修缮各建筑物，预备图书馆博物院等等设置，因时间已晚，未能观毕，即在宫中匆匆午餐毕，即由劳动宫备一汽车送我们往红三角橡皮制造工厂去参观。这工厂有八千工人，是列宁堡第一个大工厂。在厂中略一参观，即参与他们的工人代表大会，为报告英美帝国主义者干涉中国革命政府的近情，举座皆为愤慨，随即通过一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议决案。

列宁堡的近郊有一儿童村。此地原为皇家村，俄皇的夏宫在此，其附近皆为贵族的别邸故名。今皆没收为国有矣。此地有十七处儿童及少年的住所，我们为要参观儿童的生活，所以特往一游。我们只参观了一所，中有儿童六、七十人，由一位管理儿童的女子导领参观毕，伊殷殷的囑我们努力于改造世界的运动，伊在那里为我们训育后备军，并告我们以赴皇家花园的去路。我们便遵路往花园去。在花园中遇见赤军兵士三人，很恳切的询问中国革命的状况，并云“去年此际我们望眼欲穿的盼望德国的革命，惜竟未实现，今又盼望中国的革命了。中国何时为革命而需要吾人者，吾人当立往，吾人执戈待命也久矣”。我们握手谢谢他们革命的同情而去。

我们在列宁堡的时候正值少年国际的纪念日。是日有十数万的工人并少年男女，整队作游街的示威运动，冬宫前有一高台，示威行列都经行其下。台上每遇一队经行其下，即高呼“世界少年革命万岁！”等口号，该队亦高呼万岁以应之。我们因为去参观海口来冬宫稍晚，已经行过半矣，至则多人拥我等到台上

的中央，群众便狂呼“中国革命万岁！”

是晚复在五一公园开一盛大的晚会，俄、德的少年演说中，均道及同情于中国革命及反对英美干涉中国的话。待我们回到莫斯科的时候，知道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员马克曼努斯，法国共产党执行委员特润及美国共产党代表亚门特儿合电中山先生，攻击英、美、法三国的帝国主义。全俄职工联合会对于英国职工会大会关于此事有所建议。此种运动在莫斯科及其他诸大城均是一样的热烈，“从中国收回手去”的呼声，全俄皆是，到处组织此等团体，天天都有集会，报告中国的事，同声一致的赞助孙逸仙的革命政府，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干涉中国。最近东方大学特为此问题开一示威运动大会，英国少年共产党代表杨君演说，攻击英国政府甚力。前晚在大剧院又有数千人的集合，英国共产党领袖马克曼努斯及中国、法国、美国、日本的共产党代表均出席演说。马克曼努斯演说中，说到他曾记得当中国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英伦的时候，在满切士特有一示威运动，庆祝中国孙逸仙所领导的革命成功。马克丹诺曾有演说祝贺孙逸仙的革命成功，此种声音尚在人耳。曾几何时，而马克丹诺的所谓劳动政府竟自干涉孙逸仙所领导的革命政府了。云云。（演说详稿容觅得寄去）当全世界革命的青年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狂呼奋斗的时候，中国的青年应该怎样的激昂，在悲愤中跃起奔赴于我们中国的革命老祖孙中山先生旗帜之下，去和那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战斗，我们远在莫京引领以盼此消息。余容续白。

九月念四日守常在莫斯科

1924年11月10日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上海的童工问题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近读大阪《编军英字日报》和上海《密勒氏评论周报》第二九卷第八号，内载有关于上海童工问题的资料，颇值我们注目。兹为约叙其要如次：

上海的外人自治会，曾为调查和研究上海的童工组织一委员会。委员会费了一年的工夫，研究这个问题。据其调查的结果，系把上海市分为十区，共得雇佣童工的大小工厂二百七十五个。童工总数有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人；就中含有十二岁以上的男工四万四千七百四十一人，女工十万零五千九百二十一人；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四千四百七十五人，女童工一万八千一百三十五人。这二百七十五个工厂厂主所隶之国籍：日本三十二，英国二十四，美国十二，义大利七，法国五，葡萄牙、瑞典、比利时各一，英美合办者二，其余一百九十厂均为华人所营办。

兹更按其所分十区调查的结果，统计之如下：

(一) 哈尔滨路(Harbin Road)区

工厂数	73(日4、英2、美1、葡1、华65)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	2,675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	3,036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	0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	83
合计	5,794
(二) 提篮桥区	
工厂数	73 (英 5、日 2、美 2、华 64)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	8,321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	8,300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	433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	310
合计	17,364
(三) 杨树浦区	
工厂数	31 (日 15、英 3、美 1、华 12)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	11,757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	29,793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	1,254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	3,327
合计	46,131
(四) 小沙渡区	
工厂数	34 (日本 10、英 3、美 2、瑞典 1、华 18)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	17,206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	30,363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	1,087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	1,934
合计	50,590
(五) 西虹口区	
工厂数	11 (英 5、义 3、法 2、华 1)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	389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	4,936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	1,454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	6,794
合计	13,573

(六) 新闻区

工厂数	7 (英 1、义 1、华 5)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	306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	4,472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	0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	90
合计	4,868

(七) 虹口区

工厂数	3 (比 1、华 2)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	150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	1,950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	0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	200
合计	2,300

(八) 中央 (Central) 区

工厂数	2 (英)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	450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	1,000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	0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	0
合计	1,450

(九) 闸北区

工厂数	38 (美 6、义 3、英 3、法 3、华 23)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	1,038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	15,802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	0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	5,079
合计·····	21,919

(十)浦东区

工厂数·····	3 (日1、英美合办2)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	2,449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	6,269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	247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	318
合计·····	9,283

又据他们的调查,上海的下层劳工(如苦力、人力车夫等)的所得,比中国任何地方算是较高的。平均计之,苦力月得十五元,人力车夫月得八元,而一人及其妻眷的生活费,最苦的月亦须十六元,方能过活,今其所得,最多者且不过十五元,上海苦力及人力车夫生活的苦况,可想而知了。中国乡下儿童的身体尚好,至于都市儿童的身体,都在西方各国的准位以下,含有结核性的病症,流行极多,而以上海为尤甚。上海工人在身体上精神上都受极重的损伤,而童工为尤烈,这都是长时间工作疲劳过度之所致。童工被佣于家内铺店、小工厂、家庭工业、洗衣房、并建筑业及大工厂等。女童工间有沦落而为娼为婢者。徒弟的年龄,以工作的性质而有不同,其期限则依惯例为五年。在此期间,普通多不给报酬,即偶有给与报酬者,其数亦极少。很多的不过六岁的童工,在大工厂里作工,十二小时内,仅给他们一小时的工夫去吃饭。他们大都是站立着作工。分日夜两班换班,

直到一星期终了的时候，才停一班。工钱只按工日给与。一天的工钱，至多不过二角。工作场所的卫生设备极坏。那些儿童，多由包工者(Contractor)由乡间招来，一个月只给他们的父母银二元，而包工者则一个月由工厂主得到银四元。那些儿童们的衣食住，均极惨苦，而不得一钱。作了工厂主和包工者的小奴隶，听他们的剥削而不自知，真可怜啊！他们在各种工厂里的生活状况，大要如次：

(甲)棉厂 通气卫生的设备不良。一班十三个半或十五个小时。无夜工。有的在一定的时候，给以一小时的工夫去吃饭，有的则令择空闲的时候去吃饭。纺纱部童工最多。长时间站立着作工。许多的工厂，当夜工的时顷，有些小孩子，在喧闹的机器声中，被放在摇篮中，或睡或醒。有些儿童太疲乏了，辄藏在屋角或棉花堆里，偷尝一点香甜的睡乡的滋味。此类工人生活准位较高，十二年前他们有百分之七十是着不上衣履的。据说日本组合，在中国有很多的纱厂，设备些初级教育机关。这不过是资本家想要造就些更有用的奴隶，还可以猎取温情主义的美名罢了。

(乙)丝厂 丝厂中的工人，几全为女工及青年女工。常听人说，“一个小孩可当两个成人”，这句话可以表示资本家欢迎童工的态度了。小女孩子们在那里作些刷茧、去障碍、剖出丝纤的工作，为机工作预备工夫。此苦工作，须临于盛着沸水的盘盆前边，他们的小手，须和沸水相接，以致手受痛伤，显出粗丑的样子。一定的工时，是由上午六时至下午六时。夜工亦偶有之。这些小女孩子们，须先十五分或二十分钟到厂，报告他们的工作。早餐给与十五分钟，午餐一小时。一气要站立五点或六点钟的

工夫。室中的温度，在常准以上，为湿气所包孕。久在炎蒸湿气之中，精神殊易疲敝。他们的工钱，一日由二角至二角五分。他们在身体上、在精神上都是很不幸的，有时且受成年工人不良的感染与虐待。

(丙)烟厂 烟厂童工不甚多，且情状较棉厂、丝厂好。工作时间较短，通常由上午九点至下午十点，吃饭的时间不在此内，他们常坐着作工。工钱一日由二角至三角。夜工不象纺纱业那样常有。

(丁)火柴厂 火柴厂的童工，九枚铜板一天。有不过五岁的小孩，作的非常的快的。白磷有毒，殊害卫生。听说上海官吏，将于来年禁用。工厂内无防火的设备。作火柴盒的外工，多系母子。每千个盒的内部九枚铜板，每千个盒的外部七枚铜板。一个妇人同两个小孩，一天能完成二千至三千个部分，以补其丈夫赚钱养生之不足。该委员会调查既毕，随着亦有所建议。其要点如下：

1. 禁用十岁以下的童工。
2. 年龄的决定，与其根据出生的证据或他项文书的证明，毋宁依据明定的身高尺寸。
3. 此条例施行后四年以内，须将年龄的限制提高到十二岁。
4. 禁止用十四岁以下的童工，在任何二十四点钟的时间内，超过十二点钟以上的工作。每一个十二点钟内，必须休息一点钟。每一个十四天的作工时间内，至少要拿二十四点钟来休息。
5. 禁止用十四岁以下的童工，作危险不安全的工作（如机器或场所含有危险性等），或于儿童有伤的严重工作。
6. 在租界内暂不禁止童工的夜工，此事留待四年后再议。

7. 设监察机关，违禁者查明处以惩罚或罚金。

北京政府所发布的条例，无监察的机关，无处罚的办法，而此则无此缺点。但租界内的外人行政机关，一方受资本家的驱使，一方复观望北京政府在江浙间如何施行其所发布的条例，一切皆是“以待来年”攘鸡办法。残民的北京政府和租界的外人行政机关，断乎不会施行那为保护童工利益的行政的。为拥护这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人的利益和免除他们的损害，非赖上海的劳工团体的本身不可；为帮助他们智能的发育，娱乐的得宜，非赖上海的献身于无产同胞的青年团体不可。吾侪身在苏俄，目睹工人儿童的幸福，娱乐，教育，不禁想起这一班沦于黑暗生活中的十七万多的幼年群众。因特函述其要，愿贵报记者及留心社会的青年同志们，看一看你们的小朋友们的生活状况，是如何的悲惨，如何的痛苦，而设法以改进之。幸甚幸甚！余容续白。

守常九月二十八日在莫斯科

1925年4月

《中国工人》第4期

吴佩孚压迫京汉劳工 运动的原因

(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

帝国主义者卵翼的军阀与民众的结合根本不相容。因为民众一有结合，便有一种力量抗拒他们的阶级的民族的仇敌，那作外国帝国主义者代理人、卖国殃民的军阀，焉有不时时堤防民众运动、压抑民众结合的道理。

英、美帝国主义者所扶持的军阀吴佩孚，当那京汉路工运动初起的时候，似是很想用他曾经用过的以“国民大会”的口号诈骗民众的伎俩来诈骗工人群众和全国民众。后来渐渐看清工人群众的结合，能够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形成一种纪律紧严、勇力雄厚的中坚势力，他便骤然揭破那副假面，拿出凶残的手腕来压迫工人的集会。等到京汉工人因为争集会结社自由，举行全路大罢工，在军阀大本营的第一火线上和他短兵相接的时候，他更惊心动魄，知道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运动中最勇猛、最有力的先锋队，他的惊讶和恐怖更坚增了他那用辣手摧残工人的决心。

在一段工人流血的历史中，已经显出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和位置。现在吴佩孚的势力虽然烟消火灭了，那些凶残的帝国主义者，仍旧在制造军阀来摧残我们的民众。京汉路工热烈奋勇战斗的精神既已开了国民革命和阶级革命的第一

幕，我们工人阶级和那些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们，更要奋勇万倍的高扬着鲜红的旗帜，踏着先烈的血路，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进攻！我们要誓告全国的民众道：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国民革命万岁！

世界革命万岁！

1925年2月7日

《“二七”二周年纪念册》

署名：守常

挽孙中山联

(一九二五年三月)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子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夺，经济侵陵，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黯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党员 李大钊

1925年3月

孙中山《哀思录》

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

(一九二五年八月)

要明白英日帝国主义者之侵略中国，当先看帝国主义者如何进中国。广州是中国的唯一门户，尤为中国潮流荟萃之地。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人降服清朝，知识阶级当时虽说知道，但是被于利诱，都不可靠了，所以这种种族思想，全保存在下级工农界，被迫而全聚于南方，成一种秘密结社，这是一种种族思想的潮流。

在当时还有基督旧教流入中国，亦先从广州进来。到清初这两种思想结合，加上明末之遗民，成了痕迹，后来就造成清朝第一次的民族革命运动——太平天国。

帝国主义是什么？就是资本主义发展之结果。因为它要向海外找殖民地作它自己的贸易场和原料地，因为又要保护，便要武装起来，所以武装之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英国是资本主义，即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亦即帝国主义之发源地，至今英国仍是世界之大资本主义，所以仍是大帝国主义者。它最先到东方时，先侵略印度，因为印度地大人多，正是个最好的殖民地，中国较印度更好，在它得到印度以后，当然要谋及中国。所以它不畏

* 这篇文章是一九二五年夏作者在开封期间的讲演，员生笔记。——编者

艰难,经过许多困苦和牺牲,要来拿到手中。

吾们看英国未来之历史,当先考中外交通史。一四九七年,葡人发现南洋群岛,认为最好之殖民地,乃以宗教之力,先宣传后开辟,作商业侵略之先锋,后复设总督,于是马拉克诸岛遂尽归之。一五一六年(明正德十一年),葡人复驾帆船至中国。一五一七年(明正德十二年),葡人复要求中国与之订商约,设海关,来船八只,态度极好,中国人与之感情亦甚好,后以其贪乃副上川岛与之(门外一小岛也),以后葡人在沿海一带来往经商,尤以宁波、澳门等处为最活动,此时在历史上最要者,亦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要者即为澳门,后来经过许多波折,中国人不堪其扰,乃划澳门与之,其余各处,则一概闭关自守。

当时日本亦然,对西洋也取关门政策,划平户出,与中国同。当时中国所以只限澳门者,其说甚不一致。据日人记载,系葡人在中国内地,颇有暴行,中国乃均遣之海口。据中国记载,则谓日本之商家宗社,奉日大内艺兴之命来华通商,同时有僧人西川高欲争此权,迁瑞佐亦来,然无明之信符,二人相争于宁波,华人晏之,瑞佐以事先贿通市舶太监及市舶使(明之掌通商之官)竟得上座。宗社大怒,于是起大冲突。明帝得奏,遂废市舶官司,尽逐外人而送之澳门,行封门政策。然当时各种人均有,且中日关系尤密,公商既不准通行,于是私商乃出。彼私商兼营海盜,于是有倭寇之乱,即禁止通商结果。扰乱既久,更置教士于电泊县。一五三六年(嘉靖十四年),中国指挥黄庆,始许在濠统(即澳门)通商。自是澳门遂成通商口岸,定澳门为外人居留地。至此生租借关系,每年纳金五百两,至今遂为葡人殖民地矣。

当一五二二年,西班牙亦来开航路,先至菲律宾,一五五六

年(嘉靖三十五年),西占菲律宾岛。在马尼拉有华侨被虐待,中国海盗李有奔率中日两国人击之,大败,西班牙遂得占之。一五八〇年(万历八年),西班牙派人来华,要求通商,葡人欲专利,战不得要领而去。后荷兰人脱离西班牙时,亦来华,因与葡不和,乃设东印度公司——即商国所靠侵略东亚之机关,初实起于荷兰,——付以宣战、媾和等全权,此为西洋人征服亚洲之始。成立后荷人东来不绝,至一六〇二年,荷政府更允安置军队及一切行政权,在爪哇一带势力甚大,后驱西班牙及葡人,至今爪哇仍属于荷,后英国亦组织东印度公司为英帝国主义侵略之经济组织,于此吾人可知经济侵略政策之可怕。

此时荷兰在日本亦如此,至一六〇九年,更为发达,与日人感情亦好,日本之得西方文明,即在此时,至今日人犹称西学为兰学即由于此。至一六二二年,荷葡争澳门,荷兰先占爪哇,然葡萄牙至终不让,荷人无法,乃转赴福建附近,至澎湖群岛,及台湾一带。一六五六年,复派使来华,与中国交涉通商,中国允该国商船八年可来一次,每次只准四只。当时荷虽占台湾,在明末时候,中国郑成功自福建逃至该处,又将荷人逐去,后荷人怀恨,时谋报复,而终未能,直至清兵到时,荷乃帮清人铲郑之势力,仅借以泄愤而已。一六六四年(康熙三年),荷人再派使臣来华,商定条约,而未得大利,故始终态度均好,且朝见时仍必行三跪九叩礼。然须知以上来者,均为小国,对中国无大害,此后英国即已来矣。

英国本与荷同来,当初英国最注意印度,然当时以敌人太多,即西、荷、葡均已先来,故必与本辈争斗始可获得地位。一五八八年,先与西班牙舰队海上相持,结果败之,始得称霸。然

以西葡合邦，且西班牙之财富多仰给于葡，故英欲进而颠覆葡之根本势力，而自树其在东方之商业势力，后颠覆荷兰在南洋之势力。一五九九年英人遂筹设东印度公司，一六〇〇年成立，代以前之东印度公司起而侵略，然当时规模极小，仅有一万几千镑，此为第一合资公司，亦英帝国主义侵略东亚之先锋。

且看以后如何侵略。一六二四年，英使来华，在海上遇险未达；一六三七年，葡人允英国可至澳门，但不能得势，后又被拒，乃改而据虎门；一六六四年，东印度公司与反对清室之郑成功之子郑经订约，英甚得利。吾人须知，此时英帝国主义者之侵略手段，已开始施用矣，其利用某部势力而寻门户，预备侵入内地，此时英国已有所谓领事裁判权，然中国关门甚紧，故终未得逞，但不久郑经又败，约遂失效。一六七七年（康熙十六年），英人在厦门建商馆；一六八五年，清廷下令开放海口；一七一七年，中国总兵陈昂，上奏言：“广东有红毛，即英商也”；一七二三——一七三五年，英人欲谋减税，另赴浙江谋定海，于是海门以外皆有红毛馆；一七五五年，英商由广东至，要求中国开放浙江门户，以闽粤总督之抗议未准；一七五七年，清廷令所有通商之外人，只限粤省一处，一面更在浙增税一倍，更毁红毛馆，以为抵抗之法。时英商洪化辉不服，走天津交涉，复被中国政府逮捕送之澳门监禁，至一七五九年复派人赴粤调查。一八〇二年（嘉庆七年），葡人以税率轻重不同，压制英人，盖当时只有澳门一处为各国通商处也。英人借口防法，派兵占澳门，十年英使至广州，盖防法之离间也。于此吾人可知英法之冲突，实已甚久，后来在中国、日本、土耳其始终未曾和谐也，即最近亦然。此时英国战船既来，即武力、经济同时俱到也。一八〇八年，英将兵白安尚来，伺澳门，在

中国谢绝之，英兵愤，走虎门夺黄埔，——即今革命军所在地，劫当时广州特许通商之十三洋行，后由华兵打退，中国即对英及各国停止贸易。此盖中国对外之唯一方法也，因外来华之目的，本在经济侵略也。后英人以吃亏太大，遂又变软，此潮乃解。

在一七九三年，英人曾二次来华，至北京，被中国朝廷斥以冒昧，旋即退回。一七九六年，英舰又来，至天津，挂贡旗于船上，并赐以九叩礼，英人不肯，又被遣广东，与中国要求订约，中国又不准。后在广东，以中国人不准西洋女子居住问题，几生大冲突，后外人托故治病，始了结。故当时中国之限制外人，实严之极。后英人卖鸦片于中国，借治病口实，然遭中国人嫉恨，于是中英战事未久即开。中英鸦片战争之近因，为林则徐之焚烧鸦片，其远因盖在英国必欲在中国打开一门户，然后借条约限制，以保护彼之商人，得行其经济侵略政策。自一八四二年鸦片战后，英之势力，长驱直入，打进中国来，南方以经济压迫最烈，于是失业人数加多，社会上顿起不安之现象，此不安现象，终成太平天国。故太平天国，乃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而使中国农民失业之影响，而以民族思想及耶教观念相合所成的大运动。此时外人以宗教主义彼树起反清之旗帜，爰外人之指导，以抗清，以谋外人之利益，同时更有英法联军直打入北京，来恐吓清廷，及清廷以“宁给友邦，不给家奴”之话，来对外人说出，造成最大之不平等条约。此时英人以目的已达，乃转而帮同清室，来打太平天国。诸位知道当时有所谓长胜军者，用新军火加入中国军队，在江南一带，大破太平天国，终而灭之，自是轰轰烈烈之民族运动，遂屈服而消灭于大英帝国主义势力之下！而英人遂得操纵清室在中国任意横行矣。

自此以后，帝国主义者之侵略中国，盖完全采此手段，——即利用反革命势力以压制革命。中国革命之所以至今不能成功者，此即其大因。这种方法，即不用自己力量，只是假借人家力量，又可得最大利益，所以在他们看，这是最好的妙法。义和团本以民族革命运动，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北方后，社会经济上发生变动，以先以油灯，尽成洋油势力，机声、纺织声都被洋布压下，中国人愤恨之结果，造成一呼即应之义和团。不过农民知识简单，对于事情，不能观察，起一种仇洋的观念，于是弃洋枪大炮而不用，全以中国东西来抵御，而乡间所奉为唯一武器之孙悟空、关羽等神，遂相继出而应战矣。后卒以外人之压迫而消灭，更有八国联军之最大坏果，使中国人永远不能抬头，故至武昌革命起时，必首先宣言维持外人权利，始可成功。然以尊外人，不能对外，故更造成十余年，只能埋头内争之结果，外人以利此机会，处处压迫革命势力，对于南方更为显著。历年广东之乱，俱为英人在内作祟也，彼盖以北方已有军阀，代彼压制，故不足虑。此次沪粤诸案，英人对广东所以极硬者，盖即彼之传统政策也。

我人之民族革命运动，第一次为太平天国，唯后杂入污物，故不甚好。洪秀全一八五一年起事，一八六四年灭之，正英法联军之时也。日本此时，与中国相同。孙中山先生即生于一八六六年，太平灭亡之二年。先生生于民族运动之发源地，于是一洗以前之污点，卒成造成民国，至今民族解放运动，还正迫行不止，孙先生言：“革命如山顶之石，不动则已，一动则非直滚至山脚不止。”故在此时期，大家绝无幸福可言，绝不能希望太平，任何事都作不成，只有大家都参加这种运动，以期早日作成。日本革命时，唱尊王攘夷复古三口号，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及民族解放，

宣一十七年，费许多牺牲，当中曾换过十二次外交大臣，大隈并被炸伤，当时因帝国主义者正注重中国，故日本可乘机容易翻身。现日本已成帝国主义来侵略中国了，中国翻身将更要难，所以我们非全民觉醒不可。吾人之运动口号为尊重民权，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三条。再进一步言之，即非仅中国之问题，乃世界之问题也。帝国主义已至一定程度，将来中国革命成功之一日，即世界问题解决之一日，即世界革命成功之一日。所以我们希望中国的青年诸位，全都起来，参加现在之国民革命运动，使之早日实现。孙先生死时，嘱我们保存遗体，就是孙先生一眼望着我们的革命成功之后，他才安心的。诸位，我们大家当如何努力，才可对得起我们的先哲，我们的革命首领，为国奋斗四十年而劳死的孙先生！

笔记者附注：

一、此篇未经先生校阅，错误之处，想必极多，望读者诸君见谅！

二、原来此文甚长，因时间限制，李先生只能讲这些，唯闻先生言，他日当写出，供大家阅看，记者固极望能如愿也。

1925年8月
《雷火》第8期
署名：李守常

从印度航路发见以至辛丑条约 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大势年表

(一九二五年九月九日)

一四九七年 明弘治十年

葡人发见印度航路，葡萄牙势力渐及于印度、苏门答腊、爪哇一带。

一五一六年 明正德十一年

葡人附帆船来华。

一五一七年 明正德十二年

葡人来请缔约，并测中国海湾。葡船及马来船八只来广东，国人以葡人态度驯良，许其于上川岛通商，自是葡人居留地遂勃兴于粤、闽、浙沿海一带。

一五二二年 明嘉靖元年

西班牙人开辟航路，经略斐律宾群岛。

一五二四年 明嘉靖三年

中国迁外商于澳门（一名濠镜）。因日本大内艺兴改派僧宗设，细川高贡派僧瑞佐及宋素乡来宁波通商，两派互争优先，以致鬪杀，大掠旁海乡镇，给事中夏言奏请罢市舶司互市，遂移于南澳，有一定期间，逾期不准停留。一说系因葡

人暴行,遂有此举。

一五三六年 明嘉靖十五年

指挥黄庆受贿,始许葡人岁输二万金在澳门互市,后竟扩地域,设官守,减租至五百金,俨然视为领土。

一五五六年 明嘉靖三十五年

西班牙人占领斐律宾,有虐待麻尼拉华侨情事。

一五七五年 明万历三年

海盗李马教进征斐岛,闽督派舰侦之,西班牙人因得附船来华,是为中班交通之始。

一五八零 明万历八年

西班牙派使来华,请通商,为澳人所间,不得要领而去。是年西班牙王菲利普,兼葡萄牙王统。

一五八一年 明万历九年

荷兰脱离西班牙独立,是时葡京里士本为欧洲与亚洲通商百货集中之地,西王乃禁止荷人通商里士本以苦之,于是荷人感有自辟商路之必要。

一五八八年 明万历十六年

西班牙无敌舰队,为英人所破,英人夺取西班牙海上霸权。是时西葡合邦,故英人更欲进而颠覆葡人在东洋之商权,对握南洋商权之荷人,亦羡慕之。

一五九五年 明万历二十三年

荷京亚母士特丹诸商人,创立私立东印度公司,资本六十万镑,自是荷船东渡者不绝。

一五九六年 明万历二十四年

英耶利扎卑士女王,遣使来华,中途遇风,未达目的。

一五九九年 明万历二十七年

伦敦商人发起组织东印度公司。

一六零零年 明万历二十八年

东印度公司成立，资本七万二千镑，为耶利扎卑士女王所特许。此为英国合资公司之肇始，竟成为侵略东方之急先锋；经营印度，推翻葡人在印度之势力，葡人屡败之余，至许英船得出入澳门。

一六零二年 明万历三十年

荷兰政府许东印度公司有在殖民地置兵、除吏及与所在国宣战媾和之权，荷人遂在爪哇一带逐葡人而代之。

一六零九年 明万历三十七年

日本德川幕府许与荷兰通商，荷兰在海上之权力，盛极一时。

一六二二年 明天启二年

荷人与葡人争澳门未得，遂据澎湖，又移于台湾，后又为成功所逐。

一六三七年 明崇祯十年

英人率舰队来澳门，至则葡人又翻前约，不许英船出入澳门。英人乃转与粤吏交涉，葡人又问之，英人乃由澳门入广州，炮击虎门，冲突之结果，许于河口通商。

一六五六年 清顺治十三年

荷兰遣使自爪哇来京，请互市，清廷许其商船八岁一至，以四艘为限。

一六六四年 清康熙三年

荷使扶助清覆郑之功，来京议约，未得偿愿以去。

东印度公司派船一只到厦门。

一六七零年 清康熙九年

台湾郑经(郑成功之子)与英人订约通商。

一六七七年 清康熙十六年

英人谋在厦门建立商馆,清廷未许,但允其商船以时间至。

一六八五年 清康熙二十四年

清廷下诏开海禁,英人始来互市于浙东。

一六八九年 清康熙二十八年

英始正式派商船来广州。

一六九七年 清康熙三十六年

移宁波海关于定海,在定海城外建立红毛馆一区,招待外商。

一七一五年 清康熙五十四年

东印度公司设商馆于广州,有独占中国贸易权。

一七一七年 清康熙五十六年

总兵陈昂始奏称粤东红毛,有英圭黎诸国,英国名见于中国公牋自此始。

一七二三——三五年 清雍正元年——十三年

英商在粤苦关税重,运动减税,后又运动移浙互市。

一七五五年 清乾隆二十年

英商泊定海,洪任辉、喀喇生等运动浙互市甚力,闽粤总督抗议,因移浙则粤海关收入顿减。

一七五七年 清乾隆二十二年

清廷恐宁波成为第二澳门,下诏外人通商限于广州,每年夏秋交,由虎门入口,浙关视粤关则例增加一倍。东印度公司

在厦门初建之商馆，旋即废止，定海城外之红毛馆，已遭毁灭，洪任辉等到浙江旋即被逐；又之天津，讦粤吏规弊，以违禁来津被押，送澳门圈禁三年。

一七九三 清乾隆五十八年

英王佐治三世派人来华，要求仿俄例派使驻北京管理商务，许英商至宁波、舟山、天津、广州贸易，求于舟山附近得一小岛，俾商人得以收藏货物，并求于广州附近得一小地方，俾英商居住，或准令居住澳门之人得以自由出入等项，清廷将佐治三世及其使节大加申饬，令即速返粤东回国。

一七九五 清乾隆六十年

英使又至广州，由粤商船转递国书，仍欲议订商约，又未遂。

一八零零年 清嘉庆五年

因英商轮入鸦片毒品日增，清廷下诏严禁。

一八零二年 清嘉庆七年

英兵舰六艘泊香山之鸡颈洋窥澳门，意欲争得葡人所享之特权，托言防海，旋即退去。

一八零五年 清嘉庆十年

英使又附商舶来粤。声明英已胜法，仍以防法离间中、英为言。

一八零八 清嘉庆十三年

英人度路利来自安南，以兵舰九艘窥澳门，仍言法将袭取澳门，此实为大班喇佛所嗾使，中国以防守澳门由中国自任，无须英人代劳。度怒，踞市楼，粤吏调兵防御，英兵舰三只，径入虎门、黄埔以民船入省城，寄京商馆，扬言将劫十三洋

行,黄飞鹏击之,始退。大班索商欠退货以示抵制,船主来,甚怒大班,自行转圜,风潮乃息。

一八一零年 清嘉庆十五年

英大班诉苦,请减税。

一八一五年 清嘉庆二十年

清廷下禁鸦片令,时英商输入鸦片年达三千箱。

一八一六年 清嘉庆二十一年

英遣使来华至津,清廷派员招待,为悬英国贡使旗于其舟,并赐宴,令行跪拜礼谢宴,英使不从,清大员与之为难,抵圆明园,不使国书及礼服,与之俱至,而遽召见,英使称病,又召副使,亦称病,清廷怒其无礼,乃迫令即赴粤。后查知真相,仅备聘物送粤,属致意英王,议约事又不得要领。

一八一八年 清嘉庆二十三年

广州十三洋行中有京裕洋行司事谢某,以肩舆与英妇人乘之,华吏重申禁外国妇女居留广州,几致决裂。

一八二二年 清道光二年

两广总督阮元疏禁鸦片,时鸦片输入中国年以万箱计。

一八二三年 清道光三年

清廷定察禁鸦片条例。

一八三零年 清道光十年

清廷定查禁内地行销鸦片章程。是年四月,英人商馆有妇人来访,十一月又有归国妇女来粤,皆以违禁起纷议。

一八三四年 清道光十四年

东印度公司被解散,英派律劳卑来华为贸易监督官,中国不允,仍视为大班,英遂以炮舰二艘攻虎门,进泊黄埔。

一八三六年 清道光十六年

英派义律来华。

一八三八年 清道光十八年 日天保九年

英派海军少将梅特兰率兵舰来华，清廷烟禁益厉。荷兰人来日本，密告英人莫利逊将至日本。

一八三九年 清道光十九年 日天保十年

林则徐焚毁英商鸦片一万九千一百七十九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共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下令沿海州县绝英人薪蔬食物，义律以军舰炮击九龙。

一八四零年 清道光二十年 日天保十一年

英帝国主义以炮火攻破中国门户，是为鸦片战役。

一八四一年 清道光二十一年 日天保十二年

英帝国主义者挟战胜之威，迫我偿军费六百万元，割香港，我不允，和议又裂。广东三元里乡民奋起平英团，集众数万。

一八四二年 清道光二十二年 日天保十三年

英帝国主义者迫我缔结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许英人通商及居住，割让香港，开协定关税之渐。是年冬，粤人闻广州开港信，聚数万杀英人于市，焚其商馆。

一八四四年（二月） 清道光二十三年 日天保十四年（癸卯十二月二十七日）

日本朝野闻英人莫利逊将至，甚恐，拟炮击英人。兰学者高野长英著《梦物语》，渡边华山著《慎机论》，以风当局，痛陈盲目排外之危险。以是触当局下令逮捕，华山被捕后，长英

亦自首。荷兰王威廉麦塔致书日本，请以华事为前车，速开海禁。

一八四五年 清道光二十五年 日本弘化二年

英人谋入广州，粤民举行团练，每户三丁抽一，百人一甲，八甲一总，旬日间城乡镇市灯旗相望。粤绅潘士诚延法造船炮水雷，谋战守，英人惧，不敢入城。

一八四六年 清道光二十六年 日本弘化三年

耆英与香港总督台威士私约，不割让舟山列岛于他国，而将英人入广州城之要求，约以延期二年，再为实行。

一八四九年 清道光二十九年 日本嘉永二年

香港总督以兵舰入粤河，迫中国践耆英延期二年之约，要求准英人入城。两广总督徐广缙集乡团十余万于河干，自诣英舰，告以粤民不可侮，英人谋扣广缙以为质，两岸乡团呼声震天，英人惧，不复言入城事，改定广东通商专约，永禁英人入城。

一八五零年 清道光三十年 日本嘉永三年

洪秀全起义于金田。

一八五一年 清咸丰元年 日本嘉永四年

太平军据永安，洪秀全自称天王。

一八五三年 清咸丰三年 日本嘉永六年

英国提督彼理率军舰四艘来日本浦贺，旋由浦贺入江户湾，迫日本通商互市。俄提督普嘉青率军舰四艘来日本长崎，要求日本通商互市。太平军攻克南京，英国全权公使普衡至南京通牒太平军，严守中立。三点会占据厦门，旋即被逐。又占上海与太平军通款，上海法帝国主义者助清军以武力

干涉之。

一八五四年 清咸丰四年 日本安正元年

香港总督鲍灵率英海军与清总督兵联合保守广州，追击太平党兵船，视为海盗。是年英人更在上海干涉太平军。美提督彼理再率兵舰九艘来日本浦贺，将入神奈川，江户湾，日本幕府全权代表与彼理在横滨开始谈判。神奈川条约签字，是为最初之日美条约。日本吉田松阴因犯国禁欲航美，入狱。日兰条约在长崎签字，日俄条约在下回(关)签字。

一八五五年 清咸丰五年 日安政二年

三点会在上海因受美法联军之压迫，粮绝出城，惨遭屠戮。

一八五六年 清咸丰六年 日安政三年

英人以亚罗船事件构衅，兵陷广州，放火焚衙署，英兵退，粤民乃焚美、法、英各商馆，及十三家洋行。日本设立讲武所、蕃书调所，在大阪两川口筑炮台，美使哈尔利思来日本，驻下田。

一八五七年 清咸丰七年 日安政四年

英、法联军陷广州，英军掳叶名琛去，遂据广州，英使额尔金、法使噶罗、美使利得、俄使布恬廷至上海，连名致书清大学士裕诚，请派员赴上海商善后，清廷拒之。日俄、日兰追加条约签字，幕府全权议定美使提出之条约草案，约以翌年正月五日幕府开江户、大阪、兵庫、新泻，两都二港通商。

一八五八年 清咸丰八年 日安政五年

英、法联军北犯，俄、美遣舰从之，陷大沽炮台，清廷遣大学

士桂良、尚书花沙纳赴天津议款，六月与英法定天津条约，英约五十六款，法约四十二款，除增开口岸、赔偿军费、允准传教外，凡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制、最惠国条约等，均于此条约规定焉。时广东佛山镇绅民办团练，悬赏购巴夏礼头并谋以团练攻广州联军，不果。是年订中美通商条约，凡十款。英公使额尔金巡扬子江，自上海至汉口，过南京不遵太平军定则，以炮艇尔伊号前行，不通知附近炮台，遽驶入港，太平军开炮，英海军还击，翌日竟攻击炮台，历一小时半，太平军知系英舰，不再回击。

一八五九年 清咸丰九年 日安政六年

英法公使赴北京，强由大沽入口，轰击大沽炮台。日本开横浜、长崎、函馆三港。

一八六零年 清咸丰十年 日安政七年

英、法仍以额尔金、噶罗为特派全权公使，英遣格兰特、法遣蒙地板，合将海陆军二万五千人北犯，破天津，北京僧格林沁、胜保军先后败溃，清帝避热河，英军纵火焚圆明园，遂于是年十月与英、法订北京条约，除实行天津条约外，又增天津为商埠，并赔偿英、法军费各八百万两，是年始设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太平军攻克无锡、金坛、宜兴、嘉兴、湖州等产丝区域，后李秀成即督师攻上海。英人卜罗斯以通商大臣资格，通告以武力干涉中国内乱，保护上海，太平军李秀成致书各国领事，声明如再助清，惟有停止本国境内与外人一切贸易。

一八六一年 清咸丰十一年 日本文久元年

英海军大将何伯训令亚柏林舰长干涉太平军入上海或吴淞

境内，干涉太平军攻击宁波，并与太平军关税冲突，但宁波卒为太平军占领。柯伯再至南京，要求太平军再缓一年用兵上海，太平军不许。

俄舰至日本对马，图占领。长井雅乐至日本京都，奏《开国论》。

一八六二年 清同治元年 日本文久二年

英舰在长江为清军输兵士，并接济军火。英、法联军干涉太平军用兵上海，与太平军开衅。太平军为英法联军所败，英将何伯伤腿，法将卜罗德阵亡。英海军助清军夺回宁波，英人与清恭王勾结，组织中英舰队。美人华尔战死，所练之华兵改隶英国陆军。清廷与英续订长江通商章程七条。日本岛津三郎发江户，其从士在生麦杀遮断行队之英人。高松晋作、久板立瑞等烧品川御殿山新筑中之英国公使馆。

日本幕府以攘夷敕旨达诸侯，征意见。

一八六三年 清同治二年 日本文久三年

任英人赫德为总税务司，自是迄一九零九年始归英管我海关全权，凡四十余年，同时实清廷一最高之外交顾问。又是年李鸿章以英将戈登，统常胜军助平太平天国。

日本天皇祈攘夷，长井雅乐自杀。

幕府对英支付生麦事件，赔款四十五万元。长藩兵炮击通过马关海峡之英船，又在马关炮击法船，又炮击兰国军舰，又在马关炮击美军舰，法军舰炮击马关，长藩兵与之战。英舰七只，入鹿儿岛湾，要求生麦案赔款，萨藩不听，遂开战。幕府派池田筑后守等使欧谈判锁港。日瑞通商条约签字。

一八六四年 清同治三年 日本元治元年

太平天国之洪秀全自杀。

日本水户尊攘党唱议攘夷,池田筑后守等报告各国,不容锁港。英、美、法、兰联合舰队十八只,炮击马关,长藩与之战,败而讲和,幕府赔款四百万元。

一八六五年 清同治四年 日本庆应元年

英、法、美、荷四国公使等率军舰九只到日本兵庫,迫批准条约,虽允批准条约,而兵庫开港未许。

一八六六年 清同治五年 日本庆应二年

孙中山先生诞生。

列国公使等迫日本幕府改正税则。

一八六七年 清同治六年 日本庆应三年

英人苏哲兰发起创办汇丰银行。

日本明治天皇即位,敕许兵庫开港。下讨幕密谕于萨长。救谕王政复古。

一八六八年 清同治七年 日本明治元年

各国公使觐见日皇,英公使巴库斯为暴徒所要击。

一八七一年 清同治十年 日本明治四年

日本派外务大臣岩仓突视为全权大使,赴欧美提议修改不平等条约。

一八七二年 清同治十一年 日本明治五年

清廷与日本改订商约。

一八七五年 清光绪元年 日本明治八年

英人欲从印度侵入西南各省,印度政府遣大佐布罗,率印度、缅甸兵士百余人,谋从缅甸入云南,北京英公使威妥玛遣书

记官玛加理为布罗助，是年二月玛加理为云南土人所杀。

一八七六年 清光绪二年 日本明治九年

因玛加理事件与英订烟台条约，除赔款、谢罪、增开商埠并重申领事裁判权外，又以专条规定英国得遣人由中国内地或印度入西藏，英人侵略西藏自此始。是年郭嵩焘使英。日本神风党乱作。

一八七九年 清光绪五年 日本明治十二年

日本井上馨为外务大臣，向列强提议修改不平等条约。

一八八四年 清光绪十年 日本明治十七年

法帝国主义侵略安南，清廷下诏与法国宣战。

一八八五年 清光绪十一年 日本明治十八年

清廷与法国议和，订越南新约十款，开龙州、蒙自、蛮耗为商埠。清廷与美国订烟台条约专条十款，与日本订朝鲜撤兵条约三款。

一八八六年 清光绪十二年 日本明治十九年

清廷与法议定越南边界通商条约十九条。英灭缅甸，清廷与英订缅甸条约五款，承认缅甸为英国属地。

一八八八年 清光绪十四年 日本明治二十一年

日本大隈重信为外务大臣，依国别谈判法与列强谈判，废止不平等条约。

一八八九年 清光绪十五年 日本明治二十二年

英灭哲孟雄王国，并逐在哲孟雄之西藏军，谋西藏益力。

日本大隈重信因向列强交涉收回领事裁判权，略事让步，为舆论所不满，来岛恒喜以炸弹狙击之，大隈被炸去一足。

一八九零年 清光绪十六年 日本明治二十三年

与英订藏印条约八款,正式承认哲孟雄属英,并规定西藏哲孟雄界线,及藏哲通商事。

一八九二年 清光绪十八年 日本明治二十五年

日本陆奥宗光为外务大臣,继续向列强提议废止不平等条约。

一八九三年 清光绪十九年 日本明治二十六年

与英订藏印续约九款,开西藏之亚东为商埠。

一八九四年 清光绪二十年 日本明治二十七年

日帝国主义侵入朝鲜,中日开战,日英改正条约成功。

一八九五年 清光绪二十一年 日本明治二十八年

清廷派李鸿章与日本议和,订马关条约十一款,另约三款,割辽东、台湾,开沙市、苏州、杭州为商埠。台湾宣告自立,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还辽东半岛。

一八九六年 清光绪二十二年 日本明治二十九年

俄占旅顺,法占广州湾。

一八九七年 清光绪二十三年 日本明治三十年

德国教士在山东曹州被杀,德海军占领胶州湾炮台。

日本国民废止不平等条约运动完全成功。

一八九八年 清光绪二十四年 日本明治三十一年

德租胶、澳;俄租旅、大;英租卫海卫、九龙。

一九零零年 清光绪二十六年 日本明治三十二年

义和团运动起,八国联军入京,大屠杀,清帝后出奔西安。

一九零一年 清光绪二十七年 日本明治三十三年

列强迫我订辛丑条约,赔款四百五十兆两,拆毁天津城垣、

大沽炮台,允许外人在京津一带驻兵。

(辛丑以后年表当续登^①)

1925年9月9日
《政治生活》第50期
署名:猎夫

^① 辛丑以后年表未见续登。——编者

民众势力发展中的国内战局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国内战争的形势，是一个三角关系的形势。形成这三角关系的三个势力(国民军、直系、奉系)，相互的每个势力都有两个仇敌。惟其如是，所以他们中间的离合变化的关系，异常的复杂而各有顾虑，同时由他们中间关系所推演的时局进展，亦异常的迂缓而不明了。

孙传芳发难以来，奉系军阀所以着着北退的原故，固然在战略上是为求缩短战线；而其中心所怯惧者，乃眈眈虎视于其旁的国民军。奉军第一步的战略，是以徐州的防御交给张宗昌，而以其主力军屯驻于京津一带以监视国民军，尤其对国民第一军特别严重的注意。徐州一败，不但没有转移奉系的主力军于援助徐州的方面，而反使之对于国民军尤其是第一军更由监视而进于压迫。奉系的压迫国民军，可以说是对于国民军真实态度的试探。这一试探果然探出冯玉祥的态度与决心，探出第一军退守南口的战略，探出国民军恢复保大以完全京汉京绥二路的连络，划出天津为公共使用海口之期于必达的要求。这些事实既经依奉军压迫京畿而探出以后，在奉军一面，表面上乃不得不暂示妥协以为展缓；战略上似仍集中其主力军于赤峰，在热河方面骤现益趋严重的形势。在国民军一面，沿京汉路北进和沿各要路由

河南向山东北进的军队，听说还在浩浩荡荡的前进而并未停止。

段祺瑞明令各派军队都回原防，而以防护京汉全线铁路的责任交给冯玉祥和岳维峻，这明明是于国民军有利的。冯玉祥已通电表示接受此命令，同时传说第二军的军队已经占据了保定，可是别一面又说奉军仍在保定一带正掘战壕。这样一种形势，只能说是战局酝酿的推移，不能说是和局告成的结束。国民军与奉军的破裂，在保定方面，热河方面，仍然是在一触即发的形势之下。

山东奉军败退之余，已不堪再战。在最近期内山东不归国民第二军，即归直系，可以断言无疑。孙传芳占领徐州后，似不愿再行北进，其原因大约有四：（一）不愿离开在全国中独擅精华的江浙；（二）闽军因广东革命军追击入闽之陈炯明故急急退回；（三）苏军内部不甚安靖；（四）以山东与国民二军，使与奉军接触。而由国民方面言，二军之在河南者，久已有人满之患。从前三军入陕，即为就食；不料入陕之后，军食之难，亦复如故。现在因为时局紧急，陕北各军及国民三军，均皆相继出关。这样浩大的就食无地的军队，都聚集在河南一隅，自然的要向山东发展，有不可遏抑的势子。

综观时局的现象，在北方，奉系军阀已经神气沮丧于民众威力所指导的反奉联合阵线之前。奉军所以不敢逼入京畿的原故，民众反奉的气势，亦颇与有力。反之，国民军因为得到民众的援助，虽然尚未加入战争，而所处的地位，比从前已较为强固。直系军阀，此次乘民众反奉的怒潮而再起，其初虽借口于奉系军阀之如何压迫民众为其发难的理由，但其自身在沪、汉各处的行动，压迫民众，仍与奉系军阀同其行径。全国民众对于照样压迫

民众的直系应即提出严重的抗议，切实的指出直系压迫民众的事实，要直系知道他如不改易其类似奉系军阀的行动，民众将以其曾经反抗奉系者以反抗直系，则直系亦终于继奉系之后为民众所征服而后已。在南方，广州革命政府指挥下的国民革命军，于荡平东江之后，西江以及南部，亦将指日肃清了。这些事实，都是民众势力发展的验证，亦是民众势力作最后胜利以结束国内战争的朕兆。

1925年11月18日

《政治生活》58期

署名：猎夫

土地与农民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

一 中国历史上平均地权运动

在中国历史上,自古迄今,不断的发生平均地权的运动。关于井田制度,虽尚有人抱是否曾经实行的怀疑,然自周秦以来,为谈政者一种理想的土地制度,则确为事实;而原始经济的状态,有一个土地共有的阶段,亦确是人类生活的普遍现象。井田制的根本要旨,乃在收天下土地为公有,而均分之于各家,使他们收益使用,是一种比较完满的土地国有,平均的授与农民耕种使用的制度。中国古代,似亦经过此阶段,直至春秋战国时,土地私有制才渐次确定。

汉时,土地兼并的风潮盛,贫富日趋悬绝,故武帝时,有一种行限田制的建议,而迄未能实行。至王莽时,依据《周礼》名天下的田地为王田,作为公有,而禁止买卖,规定一家占有额不得过一井九百亩,有余田者,分与九族乡党,犯法者处死刑。不久反动起,故当时的土地问题终于未能解决。

晋代的占地制度,乃在应人民的男女年龄,课以一定额的土地,使他们耕作。无主的土地,亦使人们工作,同时且限制王公官吏的占有额。此其目的,乃在增加税源,故豪强兼并土地的问题

题,依然无法解决。

后魏孝文帝容纳李安世的建议,设均田法,要把天下的田地,均分给人民。均田法的大要,是把田地分为露田与桑田二类。民达十五岁,男子给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女子给露田二十亩,奴婢准于良丁。牛,给露田三十亩。露田,即种谷的田。民年及七十,或身死,则归还于官府。桑田,是种桑榆的田,身死不必归还于官,许为其家的世业。土地的还受,在每年正月调查人时举行。此等土地政策,皆因大乱以后,人民离散,土地荒芜,豪强跋扈,税制紊乱,乃谋所以安插游民,奖励稼穡,以荒闲的土地给与贫民,以图增加税源的方策,而非根本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

唐武德七年,立租庸调税法。依此法则,男子达十八岁,每人给田百亩,其中以八十亩为口分田,以二十亩为永业田;六十岁以上以迄老死,给口分田的一半,即四十亩;笃疾废疾者,给四十亩。女子在原则上不给土地,但寡妻妾,给三十亩。其为一户者,更增给二十亩,皆以其中的二十亩为永业田,余为口分田。奴婢与牛不给田。口分田同于露田,种谷。永业田同于桑田,植桑、榆、枣等树。田地的授受在每岁十月农闲的时候举行,是为班田法。班田法又谓集晋以来田制的大成,但其目的,并不在没收富者的田地以给贫民,而在整理租税,故许民迁徙,所分田均得买卖,而其给与亲王郡王以下的永业田,乃至百顷六十顷五十顷之多,形成一种阶级制度。故农民仍多失产流亡者,豪强乘之,以行兼并。至安禄山乱,班田制遂废。此种土地阶级制的根萌,后来流衍而为庄田制,形成一种封建的大地主阶级,用种种手段,兼并贫民土地,既夺其土地,复以重大负担,加于贫民。

宋代谋行限田制,以图稍加制止而终未著效果。金元崛起,

挟侵入民族的威力，夺田甚多，致启民族的重大的恶感。明代庄田滥设，引起豪强兼并土地的事实。至武宗时，皇庄达三百余处，勋戚庄田，尚不在此数，一庄有达二万顷者。富农多献地于王公，借庄田之名，以避赋役，管庄官及庄头，假威以雪民。清代因之，除将一部还于故主外，悉以之分给于满蒙汉军各八旗兵，更用跑马行圈的方法，圈地甚多，是皆谓之旗地。雍正年间，又于京兆固安县行八旗井田制，将官有地均分给八旗贫民。此不过为一部分征服民族，立一种保障特权的土地制度，而非解决全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

太平运动兴，实含有农民革命的意义。观于首事诸人，多为烧山种田的农夫、农村中落第的士子，并其攻下南京后（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即宣布一种含有均分共有性质的土地政策，足以证明。此种土地政策，自然亦随着太平天国的灭亡归于消灭了。

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其中心亦在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惜其所拟的平均地权办法，未能及身而见其实行。

二 中国今日农民破产的趋势

中国今日的土地问题，实远承累代历史上农民革命运动的轨辙，近循太平、辛亥诸革命进行未已的途程，而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工农阶级依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

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

中国的农业经营是小农的经济，故以自耕农、佃户及自耕兼佃为最多（看第一、二、三表）。此等小农因受外货侵入、军阀横行的影响，生活日感苦痛，农村虽显出不安的现象，壮丁相率弃去其田里而流为兵匪，故农户日渐减少，耕田日渐荒芜。据农商部第九、第十次农商统计，因有兵乱省分未报不能得有完全的统计比较。但就京兆、直隶、吉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十省区合计农家户数耕田多寡别，由六年至九年间的统计比较以观，则知十亩未及十亩以上、三十亩以下的户数，著见增加；三十亩以上、五十亩以下的户数，略见增加；而五十亩以上、百亩以下及百亩以上的户数，则著见减少。由此现象，可以看出中农破产的趋势。盖五十亩以上百亩以下，及百亩以上的户数减少，即其间有些破产而流为小农者，而小农户数的增加以此。由此趋势以推，则由小农完全丧失或弃去其土地，而或流于都市，投身于工厂，投身于人力车夫，或流为兵匪者，更不知凡几了。但五十亩以上百亩以下，及百亩以上的户数减少，一方面是中农破产而为小农的验证，在另一方面，亦有豪强兼并土地集中的意义。因为百亩以上者，可以自含至千亩、万亩乃至百万亩，而此百亩以上的各级户数，在统计上并未分别等差为之表出，此其中必有连阡连陌新兴的大地主阶级，吸收多数中农而集中其土地者等户数不必加多，而土地之量可以增至甚巨，此不可不注意者（看第四、甲乙二表）。且此统计完全的十省区，尚为秩序未大破坏的省分，其趋势犹且如此；其他西南各省，兵战连年的地方，农民困苦流离，其度更不知倍益几许啊！我们再把九、十两年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六省区合计起来的农家户数及农田亩数统计表比较以观，可以看出十年的自耕农、

佃农，以及自耕农兼佃农户数，并自耕田、租种田亩数，逐渐减少。此殆由于十年以来，内战区域已扩至北方各省，故北方农民亦骤受与南方农民同样的影响。由此更可证明水潮似的全国农民破产的潮流，正在那里滔滔滚滚的向前涌进而未已（看第二、三表）。

附 统计表

一、民国七年农商部统计中国全国农家户数表：

农户总数	自耕户数	佃农户数	自种兼佃
43,935,478	23,381,200	11,307,432	9,246,843

依此统计，自耕农民之数多过佃农一倍。其中相差最甚者，为江苏、安徽、湖北等省。江西、福建、浙江等省，则所差极微。此统计表不包涵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

二、民国九、十年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六省区合计农家户数统计比较表：

	农户总数	自耕户数	佃农户数	自种兼佃
九 年	43,966,632	25,178,773	10,514,915	8,272,944
十 年	16,887,751	3,050,603	4,538,798	3,298,350

因九年、十年农商统计只此六省区可以完全比较，故只就此六省区统计比较而概观其倾向。

三、民国九、十年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六省区合计农田亩数统计比较表：

	农田总数	自耕田数	租种田亩
九年	138,639,358	929,255,093	457,124,265
十年	566,625,293	380,256,864	186,368,429

园圃亩数不在此内，兼涵水旱两种田地。

四、京兆、直隶、吉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各省区合计农家户数耕田多寡别累年比较表：

	十亩未満	十亩以上	三十亩以上	五十亩以上	百亩以上	计
六年	10,014,232	2,507,719	4,978,728	3,052,774	1,855,960	22,409,413
七年	9,829,771	7,088,663	4,506,783	2,770,266	1,514,617	25,710,100
八年	10,689,877	7,610,145	4,673,203	2,997,940	1,375,054	27,346,219
九年	10,387,275	7,758,652	4,716,276	2,951,564	1,402,048	27,215,815

三 农民中最多数最困苦的阶级

——自耕农与佃农

在小农中，以自耕农为最多。据金陵大学《农业丛刊》第八号芜湖一百零二农家之社会的及经济的调查，按农场面积而分组如次表：

农场面积分组	十亩以下	十一亩以上	二十一亩以上	三十一亩以上	总数或均
各组在全数中所占之百分率	13.7%	50.0%	16.7%	19.6%	100%
农场数目	14.0	51.0	17.0	20.0	102
平均面积	7.9	15.9	25.1	59.8	24.9

(佃户十三家) (农场甚小)

据上表则知此一百零二家中以十一亩以上者为最多的户数，几占户数的一半。又据某机关在河南荥阳等县的调查，八个农村中的农民，亦以小自耕农占多数（看第五表）。由芜湖百零二农家生活调查，可以看出农场大小与场主的利益有密切的关系。有十亩或十亩以下之场主中能得五十元以上的工作进款者，仅居百分之七，而那些有三十一亩以上的场主中，能得五十元以上的工作进款者，竟占百分之五十。就田产权方面说，田主的农场平均每家二十亩，半田主平均每家三十八亩，佃户的农场平均每家十五亩，此三者中以半田主一类的农民为最有利。盖因他们除自有的田地以外，尚租种他人的田地，故其农场面积较其他二类农人为大。而其工作进款的数目，在此三类农人中，居于最高，平均为每人一百五十六元，故其生活状况亦较自耕农佃户为享乐。其原因则由于农场面积的大小，对于使用人工、畜工、农具等的效率，亦有一种确定联带的关系。在面积较大的农场，其工具设备的效率皆较高。其率如下：

大农场男工的效率，等于小农场男工效率的二倍；在十亩以下的农场中，每人仅能做五亩，而在三十一亩以上的农场中，则每人能做十亩。大农场畜工的效率，几等于小农场者的三倍；在十亩以下的农场，每畜仅做一〇·六亩，而在三十一亩以上的农场，则每畜可做二八·八亩。其他农具设备之用于大农场者，其效率等于用于小农场者的二倍。准此则知此组农民之需要土地，需要较大的农场，为最迫切。因为农具设备效率增大的结果，可以增大场主的利益，可以稍舒此级农民的痛苦（看第六表）。

五、河南荥阳五村、密县二村、汲县一村农民生活要项调

查表:

所在地		河南荥阳 周沟村	河南荥阳 王庄	河南荥阳 鹿村	河南荥阳 水磨村
户数		35	20	110	200(又一调查为250户)
亩地		600亩(大略)	250亩	1,600亩	2,000亩
人口		150 男: 80 女: 70 壮丁: 50	170 男: 90 女: 80 壮丁: 40	800 壮丁: 200	800 男: 450 女: 350 壮丁: 200
农民种类	富农	150亩(一户)	100亩(一户) 家口二十人	100亩以上 (一户)	100亩以上 (四户或 云五户)
	中农	70亩以上 (三户) 50亩以上 (二户)	50亩以上 (二户) 20亩以下 (五户)	50亩以上 (五户)	70亩以上 (十二户) 50亩以上 (八户)
	小自耕农	10亩以上 (十户)	20亩以上 (四户)	50亩以下 (六十户左右)	10亩以上 百余户
	佃农	二户其租地 十亩, 无地 者二户	四户 无地者五户	三十余户, 无 地者十余户	佃农四户, 无 地者二十五 户, 雇工三十 人
税额		正税每亩五 百文, 杂税八 百文	正税每亩五 百文, 杂税约 六百文	正税每亩五 百文, 杂税本 年二千文	正税每亩五 百文, 杂税本 年二千文
地主与佃户		佃户须向地 主纳每亩夏 二斗、秋二斗	每亩须纳一 斗半, 有减让	佃租每亩须 纳二斗	与周沟村同
雇工工银	每日平均		约三百文		约四百文
	每年平均		约二十八串		平均工资二 十串
银		河南每串核银三毛八分三			

(续)

河南荥阳镇	河南密县村	河南密县庄	河南汲县村
200	100	65	80
2,000亩	1,300亩	830亩	700亩
1,600	500	330 男: 161 女: 169 壮丁: 50	1,200
100亩以上 (四户)	上富百亩户 数未详	无	占全人口十 分之一 (120)
70亩以上 (三户) 50亩以上 (二户)	中富五、七 十亩间户数 未详	90亩者二户, 61亩者一 户	占全人口十 分之三 (360)
50亩以下约 百户以上	下富三、五 十亩共八户	自耕农三十 五户,亩数未 详	占全人口十 分之三 (360)
佃农八户,雇 工约五十人, 租地百余亩	佃农三户,雇 工六人,租地 约十余亩	佃农十七户, 约五百十人	占全人口十 分之三 (360)
正税占全收获 百分之三(每 亩),杂税占百 分十一,合计 占百分之十四	纳税约需岁 收百分之十 二	正税每亩二 百五十文,每 亩五千	每粮三亩纳税 六百文,近则 附加捐征大约 每亩即出税一 串四百文
未详	未详	佃户每亩三斗, 不减让。佃户多 赔,不敢抗租, 放债利息三分	村中土地多与 佃户分种,秋 收后地主与佃 户各分一半
			三五百文或 一串左右
七十串左右			七十串左右

六、佃户、自耕农、自耕兼佃周年进款比较表，

(甲)农家周年现款收入的比较

半田主	267.15 元
田主 (即自耕农)	120.05 元
佃户	63.43 元

(乙)农家自用农产品价值的比较

半田主	269.55 元
田主	171.81 元
佃户	125.19 元

(丙)合农家现款收入及自用产品价值而成的农家周年进款

半田主	536.70 元
田主	291.86 元
佃户	188.62 元

四 耕地农有

在这种情形之下，“耕地农有”便成了广众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怎样能耕地农有致之实行呢？每一农夫或含有一定人口的农户应有多少耕地？倒是一个极需讨论的问题。据前清

乾、嘉、道、同诸朝的官家册簿，中国本部的耕地，大体以由七百万四十万顷至八百万顷计，而欧人中推定中国耕地地积者有说是四十亿亩的，有说是二十四亿亩的。日本酒勺农学博士曾推定中国本部的耕地地积是一亿四千万町步。此等推算皆不能认为精确足信。夫全国总耕地地积及人口总数并其分布既不得正确的统计，则欲知农耕地对全国版图总面积的比例，与对一农民耕地亩数的比例，无从推算而得有确准。一九一一年日人所出的《支那调查报告书》曾就长江沿岸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五个比较明瞭之省分试为考核，其结果如次：江苏对农民一人的耕作亩数为三亩强，安徽为二亩余，江西及湖北为三亩欠；湖南亦为三亩强。长江流域地沃人众，此比率虽未见足为全中国的准则，然大体固可以供我们的参考。又以距今八、九十年前清廷钦定的户部则例所载，十八省的耕作地积，分配于按民国十一年邮政总局所调查十八省的农民（按全人口百分之七十计），每人平均只得耕地二亩四分四厘有奇。若分省计算，则除甘肃每人仅得耕地八分，贵州每人仅得耕地三分，福建每人仅得耕地四分外，余则由一亩至四亩不等（看第七第八表）。至于多少亩足供若干人口的农户生活，则又因地质的良否而异。兹就一九二三年十月至一九二四年三月间华洋义赈会调查概算起来，较沃的田地每五口之家需十五亩至二十亩始能生活，较劣者则需三十亩乃至四十亩。这样算来，平均每一人口所必需的耕地应为四亩至五亩。若以上述长江沿岸五个较为明瞭省分的调查为标准，则耕地实觉不足，而对每一农民的耕地为量亦不为多。可是现今的中国农业不但没有进步，而且却有退步，实在有复振或改进的余地。如果水利稍加整理，则农民生活必较今宽裕数倍，而

且沿边省分待垦的田地以及内地各省为豪强所兼并或为兵匪所蹂躏而荒芜废弃的土地尚多。国民革命政府成立后，苟能按耕地农有的方针，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使小农场渐相联结而为大农场，使经营方法渐由粗放的以向集约的，则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增，历史上久久待决的农民问题，当能谋一解决。

五 农民的要求及我们怎样在农村工作

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已日趋于绝境，重以兵祸连年，流离失所。入民国来，苛捐杂税，负担日重，各省田赋，有预征至数年后者。佃农及雇工所受的压迫，比自耕农更甚。凡有大地主地方的佃农，处境尤其苦痛而艰窘。有些地方的雇工工银极低，几乎决不能维持其生活，尤其在小自耕农众多的地方，更不易寻觅工作，只有流为兵匪，或流于都市去作苦力。试一考河南之农民生活调查，及华洋义赈会在直隶、山东、安徽、江、浙等省之调查，均可看出农民常有移徙，生活变动日益转下，遇有婚嫁，即须负债之不安现象。乡村中旧有的农民团体，多为乡村资产阶级的贵族政治，全为一乡绅董所操纵，仅为乡村资产阶级所依为保障其阶级的利益的工具，不惟于贫农的疾苦漠不关心，甚且专以剥削贫农为事。在此等组织中，贫农几无容喙的余地。若想提高贫农的地位，非由贫农、佃农及雇工自己组织农民协会不可。只有农民自己组织的农民协会才能保障其阶级的利益。在乡村中作农民运动的人们，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

随着帝国主义所造成军阀土匪扰乱范围之扩大，一般农民感有组织农民自卫军的必要。例如直隶、热河等处的保卫团及民团运动，均甚普遍。虽是等地域，前曾在奉天军阀支配之下，民间枪械多为奉军所搜去，而是等事实愈足引起一般农民组织民团之兴趣与希望。奉系军阀崩溃以后，各处民团运动一时呈出极盛的现象。此外如哥老会、红枪会等皆为旧时农民的自卫的组织，革命的青年同志们，应该结合起来，到乡村去帮助这一般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随着乡间的组织工作，当注意到乡间的文化提高问题。到乡间去的同志们，应知利用农闲时间，尤其是旧历新年一个月的时间，作种种普通常识及国民革命之教育的宣传。为使此项工作多生效果，图画及其他浅近歌辞读物，均须预备；并须要联合乡村中的蒙学教师，利用乡间学校，开办农民补习班。年来广东的农民运动，已著有成绩。陈、洪、杨、刘之败灭，以及国民政府之巩固，得农民之助力不少。最近河南的农民运动亦颇著有成效。直、鲁一带农民自卫运动亦方在萌发中。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附 统计表

七、中国本部十八省地亩及人口表：

省 名	地 亩	人 口
直 隶	688,410 顷 64 亩	34,186,711
山 西	532,845 顷 01	11,174,951
山 东	984,729 顷 46	30,803,245
河 南	718,208 顷 64	30,831,909
江 苏	647,547 顷 27	33,786,064
安 徽	340,786 顷 33	19,832,665
江 西	462,187 顷 27	24,466,800
福 建	128,626 顷 64	13,157,791
浙 江	464,120 顷 26	22,043,300
湖 北	594,439 顷 44	27,167,244
湖 南	313,042 顷 73	28,443,279
甘 肃	335,366 顷 21	5,927,997
陕 西	258,420 顷 12	9,465,558
四 川	463,819 顷 39	49,782,810
广 东	343,939 顷 09	37,167,701
广 西	89,601 顷 79	12,258,335
云 南	93,177 顷 09	9,839,180
贵 州	26,854 顷 00	11,216,400
共 计	7,486,121 顷 38 亩	421,551,940

全国农民数目(以全国人口十分之七计算)二九五、〇八六、三五八人,每人平均能耕之田二亩五分五厘,此表共计本部十八省之数目

八、各省对于每一农民耕作地积表:

(以农民占人口总额百分之七十计)

直隶	每人平均二亩八分有余
湖北	三亩一分……
山西	一亩四分六…
湖南	一亩五分七…
甘肃	八分……

山东	四亩五分……
陕西	三亩八分……
河南	三亩三分……
四川	一亩〇分四…
江苏	每人平均二亩七分……
广东	一亩三分……
安徽	二亩四分……
广西	一亩〇分八…
云南	一亩三分……
江西	二亩六分……
贵州	〇亩三分三…
福建	〇亩四分一…
浙江	三亩……

1925年12月30日—

1926年2月3日

《政治生活》62—67期

署名：守常

青天白日旗帜之下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

今当民国十五年元旦，中国国民党在北京举行升旗典礼的日期，我们很是欢欣，同时我们又很是伤感。欢欣的，是这青天白日的革命旗，已经很庄严的飘扬在中国首都的北京，作北方民众革命的指导；伤感的，是我们这一班同志在今年此季以热烈的情感共同庆祝升旗典礼的时候，不由的要追思那已经离开我们的总理孙先生。前年此季，总理正在广州，于军书旁午的时顷，他还很忙碌的指挥同志们筹备国民党改组的事。记得总理那时曾命廖仲恺同志告我说：总理要和京津的青年同志们谈话。总理把他们召集在面前，奋勉他们，鼓励他们，要他们努力于首都革命的运动；并且约他们留在广州的期间，多来听总理训话。有一个同志问总理道：“总理每日政务军务很忙，我们什么时候来见好呢？”总理说：“政务军务无论如何忙迫，都可以暂搁，你们何时来，我便何时接见，因为党务比政务军务都要紧。”更有一位青年同志，问总理道：“广东的军队，何以不称为革命军呢？”总理说：“革命军这一个名称，不能轻易的被在目前纷杂的军队的身上，因为他们的无纪律，无政治教育，徒引起广东人民的怨恶，丧失革命军的面目。这一个好好的名称，还要留待给那方在创立中的黄埔军校所造成的军队用。你们有志的青年，可以加入黄

埔军校所造成的军队，才配称得起是真正的革命军。革命军的徽名，不能轻以加诸无纪律无政治教育的军队，致为所糟塌。”由这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总理是如何的倚重北京的青年同志们担负这首都革命的责任，是如何倚重那黄埔的军校培成这可称为人民的武力的党军。可是从那时到今天，不过有两年的光景，广东的党军已经将广东全省的反革命势力肃清，这一幅表现国民革命精神的青天白日旗，也居然在首都革命的凯歌声中，飘扬在北京的空际了！假使总理在世，他看见我们举行升旗的典礼，该如何的欢喜？如今他却同仲恺同志都离开我们了！我们如何不伤感呢？

我们再回想去年此季，总理抱着满腔的热望来到北方，要和全国民众商量解决召集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二大问题，不料那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百般阻梗，以善后会议阻挠国民会议，以“外崇国信”的谬论，阻挠废除不平等条约。其时不幸总理又以积劳成疾，国事遂误于媚外军阀之手。犹忆总理在病榻上，一听到“国民会议”及“党军在东江胜利”的消息，便色然喜；一听到“善后会议”及“外崇国信”的话，便怒不可遏。如今屈指以数，总理离开我们，已快到一年了！我们的旗帜虽然高树在北京城，而国民革命的障碍，尚残存在政治中枢的地方，未能根本铲除，这又是我们于伤感之余，觉着有未能告慰总理在天之灵的。

我们的欢欣，我们的伤感，都能激动我们革命的情感，使之凝结而成为革命的勇气。我们总理的革命精神，是地久天长的如青天白日一般，降临着我们，指导着我们，随伴着我们。我们只有鼓舞勇气，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牵起手来，向革命的战线上前进。

帝国主义者及反革命的势力给我们的黑暗，只不过是过眼的云烟，民众的革命精神，正如皎洁的青天白日一样。民众要团结起来，站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打破帝国主义及反革命的黑暗势力！黑暗的势力，遮不住青天白日的光辉。

国民党改组以来，因为共产派的参加，党内有一部分人发生了误会。但我们相信这些误会转瞬即能消释；因为凡是革命者的襟怀必定是光明磊落的，必定能够肝胆相照，披诚相见。即有些微的误会，决阻隔不住革命者的声应气求，正如几点浮云，决遮蔽不住青天白日一样。我们国民党中的同志，不论他是共产主义者，抑是非共产主义者，都应该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披肝沥胆的提携起来，把由内部发生的误会或敌人挑拨的造谣而生的疑云障雾，一扫而空之！

蒋介石同志在他所作的《〈黄埔军校同学录〉序文》中，有几句最沉痛的话。大意是说：“我们所能告慰先烈的，就在我们有总理遗留给我们的一系相传的国民党内共产主义者与非共产主义者凝结而成的血统，继续国民革命的大业。我们从未问过那些殉死的先烈们，是为共产主义而死呢？抑为三民主义而死呢？但是我们可以替他们回答道：他们直接是为总理的三民主义而死，间接即为国际的共产主义而死。”我们同志们应该谛听介石同志沈痛的话，本着我们党内三民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凝结而成的精神，踏着他们提携前进的血路，为革命的工作努力，把一切的猜嫌疑忌扫除净尽！

帝国主义者及反革命派，尽管在那里造谣，以图减低民众对我们的信用，煽起我们内部的纷争；让我们保持住青天白日的光辉，照澈他们鬼蜮的伎俩。

近人评论现代的中国军人，每把“北冯”与“南蒋”并举，说中国军人以他们俩最有希望，亦惟他们最易有走入歧途的危险。他们所谓“歧途”即是赤化。我们要知道一般人所以感觉他们俩有希望的原故，正是因为感觉他们有走入赤化的“危险”。因为赤化不是旁的，就是民众化，就是武力的民众化。

又有人挥着青天白日的旗帜，喊出“青白化”的口号，来对抗赤化，反对赤化，似乎青白化与赤化是相反的东西，其实这是大错。青白化是革命的象征，赤化亦是革命的象征；赤色旗是世界的阶级革命的旗帜，青天白日旗是中国民族革命的旗帜，是东方被压迫民族革命的先驱。

在近来每次北京的民众运动中，布满全城的，不是青天白日旗，便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五色旗则独不多见。中外人每起一种怀疑是，说中国民众已经废弃了国旗。殊不知这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正是国民领袖孙中山先生手订的国旗。这是中国国民党联合中国工农民众完成中国国民革命的象征，亦就是中国民族联合全世界弱小民族及无产阶级企图世界革命的象征。

全国革命者联合起来！

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

（中华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元旦）

（中国国民党在北京举行升旗典礼之期）

1926年1月8日

《国民新报》副刊第31号

署名：守常

新帝国主义战争的酝酿

(一九二六年一月六日)

世界大战的血幕，依凡尔塞的条约掩闭了，紧接着就是国际联盟的创立，和华盛顿军备缩小会议的开会，仿佛像是靠着这些可以保住世界的平和似的，然而事实上却正相反，资本主义存在一日，决不能有真正的平和，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常常有战争的危险潜伏着。尤其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他最后的阶段帝国主义时代的今日，战争的危险更是一天一天的逼紧。

一九一四年那样惨酷的大战，只是英、德帝国主义间利润之争的结果。现在各国帝国主义者间利润之争，亦必然的要造成第二个世界大战，它的危机一天一天的迫切。

这未来的新帝国主义战争，恐怕要以中国及太平洋为中心。因为现在世界的资本主义都先要求他的安定，特别是曾为交战国的欧洲各国，拚命的努力回复其在世界战争中被夺去的东洋市场，想更把它扩大起来，使其自国的资本主义安定；而在另一方面，那乘交战国的欧洲各国埋首战争不暇东顾的时顷获得了东洋利权的英国，亦一样的拚命努力以图保持其既得的权利而勿失，且更以在大战中所得极大的利权，发展其自国的资本主

义,以其巨大的金融资本,垄断东洋的市场。日本的资本主义在大战中曾很快的发达起来,战后的大恐慌继以大地震结果,使资本急速的集中,金融资本的势力替代了从来的工业资本而增大起来,发展到少数金融大王独裁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了。帝国主义的特征不是单纯的生产品的输出而是资本的输出,日本的帝国主义若不靠着输出资本于中国,即是投资于中国以获得在中国的利权,到底不能维持,不能发展。由这个事实看来,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为了获得在中国的利权,当然不能不发生冲突,冲突的极端,就是新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

现在各国尤其是英、美、日本三国都在那里很忙迫的准备这方来的大战。英国谋筑要塞于新嘉坡,美国在太平洋举行大演习,日本把师团的数目减少,表面上装作像是实行缩小军备的样子,其实全然相反,他废止了几个师团乃是由于大战而生的武器革命、战术变更的结果。为补上师团废止的缺,正在那里施行对于一般民众的军事教育,十五岁以上到二十岁的青年则入青年团,过征兵期间一直到四十岁的人入在乡军人会,受军事的训练;同时更在中等以上的学校施行军事教育。现在日本文部省(即教育部)为行军事教育于未满某一定年龄的青年,定了四百五十万圆(日金)的预算,更定了国家总动员的计划,使民间工场制造多量的新兵器,靠着兵卒新闻等鼓吹军国主义;在另一方面则以治安维持法抑压无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可以明明白白的看出各国的资产阶级正在准备那拿无产阶级大众作牺牲的新帝国主义战争的情形了。

这未来的新帝国主义战争,要以中国及太平洋为战场。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中国,即是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中国的民众

应该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民众，起来反对这残忍的战争。

1926年1月6日

《政治生活》第63期

署名：守常

在列宁逝世二周年 纪念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同志们！列宁先生已去世二年了！他的死是世界的大损失，而且他给了我们很重的责任。今天我们追悼他，就回想到我们的中山先生。前两年我们在广州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列宁的噩耗传到广东，先生亲自出席大会来报告这不幸的消息，曾经有很沈痛的演说，使得到会的同志都有感动，都不能忘。去年今日，我们的中山先生便呻吟在床褥之上，我们那时抽工夫来纪念列宁，而我们的领袖也就没有希望不能把他的抱负发展了！所以我们同时感觉列宁的死是个损失，中山先生的死也是我们的损失。二年以来，国民革命的局势如何紧迫，而两次死去我们的领袖，损失何等的重大，我们的责任更如何的重大！我们所以不能不联想到中山先生，而感觉自己的责任更应该努力！

因列宁先生想到中山先生，我们就可以比较的看他们。中山先生的人格伟大，无论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敌，都没有不承认的。列宁的人格伟大，也无论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敌，都没有不承认的；在俄国的人民非共产者，他们往往

* 这篇演说从《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纪事》的报道中摘出来的。——编者

反对共产，却对于列宁个人非常崇拜。他们的革命精神，两人也有相同之点：列宁遇到反动不灰心不失望，中山先生亲自说过二次革命失败亡命东京的时候，手下人人灰心，先生以为革命党人并没有损失，不必灰心，再干好了！这样，列宁精神就是中山精神，就是革命者的精神！我们应该服膺这种精神！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策略。中山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理论策略。在理论上，中山主义与列宁主义是可以联合成一贯，策略上也是能联贯一致的。所以，列宁主义者可说就是中山主义者；中山主义者也就是列宁主义者！他们的主义同是革命的主义。假使中山生在俄国，他一定是个列宁；假使列宁生在中国，他也一定是个中山！他们主义表面看起来不同，实在是他们环境的不同。中山先生与列宁的目的相同，可是惜乎环境不让他实现得如列宁那样成功！他最初想联合菲列滨，先帮助他们革命成功，再来实现中国的革命。中国国民党最初有日本的革命党人。这都是他主张联合世界革命的表现，与列宁的主张相同。他们主张以党治国，列宁主张以无产阶级的党治国，中山主张以国民党。党的制度是集权，两两相同。何以列宁能够在俄国革命中表现出他主义的成功，而中山先生不能呢，这全是环境的不同，我们的经济落后。他们两人的思想和人格的伟大，全无异点。

前年广州大会追悼列宁，中山先生演说，非常沉痛。他说：“列宁死了，俄国决不危险，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很完密坚固的组织。假使我死了，你们看中国如何？我们的党如何？”我们听了非常悲伤。他当时的遗言，现在如何？他那时就教我们好好组织，就把革命责任交给了我们！即如把共产党加入组织，就是他

自己将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亲手给连接起来了。他的主义，我相信现在还没有把光华发扬得出来，将来全世界的革命成功，才是中山主义的胜利！我们那里好分出什么此疆彼界来，谁是中山主义者，谁是列宁主义者？现在无论列宁主义者或中山主义者都不应该两下分离！等到中山主义胜利的时候，也就是列宁主义胜利了！在坐的同志们，你们不管是列宁主义信徒，中山主义信徒，应该紧紧的联合起来！

1926年1月27日
《政治生活》第66期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 革命史上之位置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由一八四〇年英人炮火击破中国的门户，强行输入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中经英法联军之役、中法之役、中日之役、庚子联军之役、日俄之役、日德之役，一直到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来，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沙面、汉口、九江等处，对于中国民众的屠杀，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

由一八四一年，广东三元里乡民因愤英人挟战胜的余威，迫我偿军费六百万元，割香港，集众数万，奋起平英团。一八四二年粤人听到英迫我缔结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开五口通商，割香港，留下协定关税的根萌的消息，聚众数万，反抗英人，焚其商馆。一八四五年粤民举办团练，抗拒英人复入广州。一八四九年，粤人集乡团十余万于河干，拒禁英人入广州城。中经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三合会、哥老会覆清仇洋的运动，乃至白莲教支流义和团扶清灭洋的运动，强学会、保国会的立宪运动，兴中会、同盟会的革命运动，一直到由“五四”到“五卅”弥漫全国的反帝国主义的大运动，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

这一条浩浩荡荡的民族革命运动史的洪流，时而显现，时而

潜伏,时而迂回旋绕,蓄势不前,时而急转直下,一泻万里。他的趋势是非流注于胜利的归宿而不止。简明的说,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只在压迫中国民众的帝国主义完全消灭的时候,才有光荣的胜利的终结。

孙中山先生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民族解放全部历史中,实据有中心的位置,实为最重要的部分。他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而把那个时代农业经济所反映出来的帝王思想,以及随着帝国主义进来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净尽。他整理了许多明季清初流下来以反清复明为基础,后来因为受了帝国主义压迫而渐次扩大着有仇洋彩色的下层结社,使他们渐渐的脱弃农业的宗法的社会会党的性质而入于国民革命的正轨。他揭破满清以预备立宪、欺骗民众的奸计,使那些实在起于民族解放运动而趋入于立宪运动的民众,不能不渐渐的回头,重新集合于革命旗帜之下。他经过了长时期矫正盲目的排外仇洋运动,以后更指导着国民革命的力量,集中于很鲜明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他接受了代表中国工农阶级利益的共产党员,改组了中国国民党,使国民党注重工农的组织而成为普遍的群众的党,使中国国民运动很密切的与世界革命运动相联结。他这样指导革命的功绩,是何等的伟大!他这样的指导革命的全生涯,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要想了解中山先生的思想及其事业的重要,必须先考一考他的时代及境遇。先生的生存期,是从一八六六年到一九二五年,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酷烈的时代。先生的诞生地是广东省的香山县,距广州很近,广州是中国开放海禁最早的地方,这是帝国主义最初侵入中国的门户。西历纪元四世纪时,印

度南洋一带,已有闽粤人的足迹。十世纪至十三世纪间,是广州的繁盛时代,最初来广州的是亚拉伯人,欧人是西、荷等国人。一七八四年美舰“中国皇后”号到粤。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前,广州成为澳门的季节出張所,外国在那里设立商馆,只准经过行商的手,与中国贸易。中国对于居留广州的外人,设有种种的限制。一六〇〇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以来,伊利查别兹女士特许其有对华贸易独占权。到了一八三三年,对华贸易权才由东印度公司,转移到私人商业手里。在这东印度公司有对华贸易独占权的期间,英帝国主义者只是羡慕葡人先占的澳门,只是常常在广州的门户以外徘徊着,想伺一个机会进来占据广州,象葡人占据澳门一样;但是因为广东民众严密的监守,强烈的抗拒,终于没有能够偿了他的愿望。所以一八三〇年以前,中英商业的平准,还是于中国方面有利,银币不断的由印度、英国、美国输入中国。在那个时顷,英棉及一定限度的羊毛亦输入了少许。一八三三年以后,英棉及羊毛继长增高的以巨额输入于中国。鸦片的流毒,象潮水一般的涌进来。中国的银币,亦象潮水一般的流出于印度,几乎耗尽了中国民族的膏血。在那一世纪,英国政府的收入有七分之一靠着卖鸦片于华人,同时印人需求英国的制造品,亦全靠在印度的鸦片的出产。那时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输出于印度的商品额量日以增高,则其取自印度而需要卖给华人的鸦片额量,亦必随着增高。英国此时需要打破中国门户,不仅是为印度出产的巨额鸦片谋一尾间,并且是为那在他本国畅旺出产的制造品谋一销售的市场。英人为达此目的,乃于一八四〇年用猛烈的炮火,攻击中国南方不给外人开放的门户——广州,以武力强挟鸦片及其他商品等经济势力,压迫中

国。结果英国的炮火打破了中国的门户，帝国主义遂由广州侵入了中国。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门户洞开，外国商品因得以畅行输入而无阻。这个外国制造品的引入，对于本国的制造品自然要发生破坏的影响。此时这个影响于中国与其曾影响于小亚细亚、波斯、印度者，全是一样。在外货竞争之下，中国的纺者织者遭遇了最大的艰难，社会生活随着外货压迫的比例，呈出不安的现象，发生了破产的手工业者及农民的大众，加以鸦片的不生产的消费，因鸦片贸易而生的贵金流出，鸦片战争的对英赔款，以及关于鸦片贩卖的贿赂公行，以及公家行政的弊端百出。总此诸因，增加了巨大的人民负担，新税增设，旧税增额，遂以酿成太平天国的大革命。

太平天国的运动，是并合明亡以来“反清复明”的民族运动，随着外力侵入中国的耶教运动，以及骤变帝国主义政治的、经济的压迫而发生的国民革命运动三大系统，汇注而成的。有明既亡，许多孤臣遗老，亡命南来。在闽粤一带的下层民众，留下了秘密组织，把反清复明的民族思想，深深的撒布在中国民族最深最下的层级，希图保存其种萌，而待时以发育，这个藏留民族思想于下层阶级的事实，足以昭示吾人以革命的力量，常含蓄于工农阶级的下层民众之间，并且预示吾人以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多半要靠工农民众的努力。闽粤一带以及海外的三合会（一名天地会）即是这种反清复明的秘密团体。太平天国的运动中，亦曾容纳了三合会的一部。太平党与三合会的宗旨不能尽合的地方，约有二点：（一）太平党信耶教，而三合会信道教与佛教。（二）太平党主张于颠覆清朝以后建立新朝，而三合会则主张恢复明

们所认为洋兄弟的，可以摇身一变而为扶助满清、扑灭太平天国的长胜军。

一八五〇年顷，英国产业有猛烈无比的发展，有濒于产业危机的征象。即有大规模的移民出国，即有加里佛尼亚与澳洲，仍不能调剂英国产业的伸张与市场扩大的平衡。当时英国茶税的减低，希望以增加茶的输入，奖励增加对华制造品的输出，就是为了开新市场扩旧市场的必要。太平天国动乱，缩小了英国制造品的市场，可以使英国产业危机的迫至，加速社会的革命。大师马克思在当时说过，英国造成了中国的革命，中国的革命将要反响于英伦，经过英伦，反响于欧洲。所以英国对于太平军动乱取两面的态度，一面利用这次动乱，与法国联军压迫满清，使他放弃那天朝上国妄自尊大的态度，而不能不降服于帝国主义之前，许与增开口岸，为帝国主义者扩大市场；一面以武力干涉太平军，使之不能入重要的港口，援助满清，以消灭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观于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成立以后，英公使巡游长江过南京时，以炮艇轰击南京太平军的炮台。一八六〇年李秀成攻上海时，英人卜罗斯以通商大臣的资格，通告以武力干涉中国的内乱。一八六一年英海军大将何伯训令亚柏林舰长，干涉太平军入上海或吴淞境内，干涉太平军攻击宁波，并与太平军关税冲突。一八六二年英舰在长江为清军输送兵士，及接济军火。英法联军以武力干涉太平军入上海。英海军助清廷夺回宁波。英人与清恭王勾结组织中英舰队。一八六三年李鸿章以英将戈登统所谓长胜军，助平太平天国。至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亡。

这样看来，太平天国的灭亡，不是亡于满清，乃是亡于英法帝国主义者。满清降服于帝国主义者，以中国民族的权利，贡献

于其前。他们遂助满清，扑灭了含有民族革命性的太平军。自是以来，援助反动势力以扑灭民族革命运动，遂成为帝国主义者宰制中国民族的传统政策。

在太平天国的动乱中，英法忙于侵略中国的时候，美国的势力，遂压迫到日本，以后各国踵至，日本民族亦受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

这是太平天国时代帝国主义压迫东方的大势。

太平天国虽然灭亡，可是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未即此而中断。太平天国灭后二年——一八六六年孙中山先生诞生。由一八六六年到中山先生逝世的一九二五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总在那里蓬蓬勃勃的向前涌进。中山先生在这个运动中，是个惟一的指导者。他以毕生的精力，把中国民族革命种种运动，疏导整理，溶解联合，以入于普遍的民众，革命的正轨。他那临终的遗嘱，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

先生所生的时代及其环境，在在都使他自觉其所负民族的历史的使命的伟大；英法帝国主义的跋扈，太平天国的痛史，在在都足以激动他革命的情绪，而确立其决心，帝国主义对于中国进攻加紧一步，他的革命的奋斗猛进一步。

先生承接了太平天国的革命的正统，而淘汰了他们的帝王思想、宗教思想。整理了三合会、哥老会一类的民间的民族的结社，改进了他们的思想，使入于革命的正轨，一九〇〇年合并了兴中会与三合会、哥老会而为中和党、兴汉会。一九〇五年，又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二次革命失败后，又在东京改组中华革命党。一九二四年又在广州改组中国国民党，容纳

中国共产党的分子,使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联成一体;使民族主义的秘密结社,过渡而扩成现代的工农团体,一体加入国民革命党,使少数革命的知识阶级的革命党,过渡而成为浩大的普遍的国民的群众党,这都是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继往开来,铸新淘旧,把革命的基础,深植于本国工农民众,广结于世界革命民众的伟大功绩。

1926年3月12日

《国民新报·孙中山先生
逝世周年纪念特刊》

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

(一九二六年五月)

马克思批评当代历史事实的论文，是无产阶级研究马克思的人们绝好的材料的宝藏。我们现在要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就中国现在的民族革命运动寻求一个显明的分析，最好是一读马克思当时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文。从此我们不仅可以得到他的公式，我们更可以看出他怎样的应用他的研究的方法，以解剖那赤裸裸的历史事实，整理那粗生的材料，最后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

前年莫斯科无产阶级政治论坛，曾有一度勃兴了研究中国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的狂热，拉荻客在《真理报》上发表论文，谓太平天国的变乱，恰当马克思生存的年代，何以偏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找不出关于此事的评论？近者美国出版的《工人月刊》载有马克思《中国及欧洲的革命》一文，这是非常重要的材料。足见马克思的著作，还有很多埋没在图书馆的故纸堆中的，真是可惜！马克思这篇论文是一八五三年六月在《纽约日报》发表的。^①原来马克思充该报的外国通信员，是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

^① “一八五三年六月”，原误为“一八六二年八月”。按：马克思的这篇论文（今译《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写于一八五三年五月二十日，作为社论载于一八五三年六月十四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三七九四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五月第一版）。——编者

二年的事，而太平天国的年代恰恰是由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四年，正与马克思在《纽约日报》上发表论文的年代相值。这一篇论文，说明太平天国的变乱实为大英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第一次中国国民革命的大运动，并且指出中国的革命将要影响于英国，经由英国影响于欧洲的关系。这实在值得我们的注意研究，尤其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普遍全国、英国发生空前未有的大罢工的今日。以下便是马克思论文的译述：

“一个探求支配人类运动原理的深玄的想象家，惯称两端相接的法则，为支配自然界奥秘的原则。在他看来，俗谚所云‘两极相遇’者，在人生的每一方面，都是一个伟大而有力的真理。这一个原理，哲学家用之可以执简驭繁，如同天文家用Kepler的法则或Newton的伟大的发见（引力的法则）一样。

两极相遇，是否是那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勿深论。而此原则之显明的表现，是可以在中国革命似将影响于所谓文明世界的结果看得出来的。说欧洲人民的未来暴动，和他们的为共和的自由与政府的经济的未来运动，其系于现所经历于此天朝帝国者将远胜于现存的任何其他政治原因，抑且胜于俄罗斯的威胁，以及从而发生的全欧战争之似有可能。这似乎是奇而妄的推论，但此并不谬妄，只一细察此事的实状，便可洞明无余了。

不管什么是他的社会的原因，不管他们听的是什么宗教的、朝代的、民族的形式，他产生了慢性的变乱，过去约十年间存在于中国，现在集合起来成了一个可惊的革命。他的暴发的机会毫无问题的是那强制输入麻醉毒品叫作鸦片的的东西于中国的英国大炮所给与的。在英国炮火之前，满洲皇统的权威，扫地无灵了；天朝永世的迷信，全然打破了；封锁未开与所谓文明世界未

曾接触的孤立，骤被侵入了；东西交通的开发，从此以后，在加利福尼亚州及澳洲的黄金的诱引之下，很快的进行。同时这个帝国的银钱，——他的生命膏血——开始流出于大英帝国的东印度了。

一八三〇年以前，中外贸易的平准，还是中国方面站在有利的地位，银货不断的由印度、不列颠、北美合众国输入于中国。一八三三年以后，特别是一八四〇年以后，则银货由中国到印度的输出，几乎耗竭了这个天朝上国。于是中国皇帝严令禁止鸦片贸易，但是所得的还答是对于他的法度与以更强的抵抗。除去直接的经济结果以外，关联于鸦片密输的贿赂公行，将中国南方各省国家官吏的风纪完全腐化。如同把皇帝看作全国的父亲一样，皇帝的官吏，亦被看作是对于各该属县邑的维持亲长关系者。但此父权的威力，是维系国家全局惟一的道德纪纲，渐为以默许鸦片密输、自饱私囊的官吏的腐败所蚀毁了。此种情形，曾多见于发生变乱的南方各省，鸦片遂适如其分以获得了御中国的主权，而皇帝及其官派十足的臣仆，乃以丧失其所自有的主权了。这好象历史于他把中国全民族从其遗传的愚昧中拯救出来以前，先使他们沉醉一回似的。

英国棉花的输入，从前几乎没有，英国羊毛的输入亦只有少许。至一八三三年以后，则二者输入于中国，很快的增加。这是由东印度公司把对华贸易独占转移到私人商业的时期。至于此等物品大规模的输入中国，乃在一八四〇年以后，这是其他各国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北美合众国）在中国贸易亦获得一份的时期。这个外国制造品的引入，影响到本地的产业，同他从前曾经影响到小亚细亚、波斯、印度一样。在外国竞争之下，中国国

内有许多纺者织者，都遭受了很大的艰苦，而社会生活，亦随着外货侵入的程度呈出不安的景象。

一八四〇年不幸的战争以后，赔款必须付给英国。那巨额的不生产的消费的鸦片，随着鸦片贸易而生的贵金属的流出，外国竞争对于本地制造品的破坏的影响，公共行政的腐败情形，产生了两件事物：旧税益加烦累，新税又见增设。这样，在一个一八五三年一月五日由北京发出的皇帝诏令里，我们可以察知有些命令颁布给武昌、汉阳等处以及南方各省督抚，令他们减轻或延缓人民的纳税，特别是无论如何不许强取以逾定额。诏令上说，倘不这样，则‘贫苦人民将何以堪’？诏令上又说：‘则当举国艰忧之时，如此吾民或能免于苛吏诛求之祸矣’云云。这样的辞语和这样的宽假，我们犹忆在一八四八年顷曾从奥地利听见，那是日耳曼的中国。

所有这些集合起来从着中国的财政、道德、产业及政治构造而行动的崩解的动因，在一八四〇年英国炮火之下，领受了完全的发展。这个炮火，打落了清朝皇帝的威灵，强迫了这天朝上国与俗野的世界相接触。完全的孤立，是老大中国保藏的原状，那个孤立，必须依英国的媒介来一强制的终结。分解必定随之而起，这与谨藏在封固的棺中的木乃伊，不论何时，一与空气相接，立即分解一样，是确然的。现在呢，英国已经造成了中国的革命，问题是那中国的革命怎样的迟早将其反响及于英国，经由英国以及于欧洲，这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一八五〇年以后，读者常被唤起，使其注意及于英国制造品不平行的发长。在那最可惊的繁荣中间，不难指出一个逼近产业危机的显明征候。虽然有加里佛尼亚州和澳洲，虽然有浩大未

曾前闻的移民出境,苟无任何特别事变,在一个相当时期,迟早总有一天,市场的扩张,不能齐驱并驾于英国制造品的扩张。这种不相比齐,必要造成一个新危机,其确定与过去所曾经历者全无异致。但是假如大市场中之—忽然变成缩狭,那么危机之到来,亦必因之而加速。目下中国的变乱完全有此影响及于英国。开新市场或扩大旧市场的必要,是英国茶税低减主要原由之一,期于以茶的增加的输入,谋对华制造品的增加的输出。现在每年由联合国(The United Kingdom)输出到中国的价值,在一八八三年,①东印度公司所享有的贸易独占权废止以前,总额只为600,000磅;在一八三六年,总额达于1,326,388磅之数;在一八四五年②,又增加到2,394,827磅;至一八五二年,则达于约3,000,000磅了。至于由中国输入于英国的茶的总量,在一七九三年,尚未超过16,167,331磅③;但在一八四五年,达于50,714,657磅④;在一八四六年,则又达于57,584,561磅⑤;现在(一八五——一八六二年),已超过60,000,000磅⑥以上了。

上季的茶收获超过前年的额不下2,000,000两,已经为上海的输出表所明示。这个超过,有两个情由可以说明:一方是一八五一年终的市场情形很是低减,多量剩余下来的过剩物品,移入于一八五二年的输出;在另一方,是那关于茶输入的变更的英国立法的近顷报告,传到了中国;使所有的有利的茶,都以极贵的价钱,上了预备市场。但是关于来季的收获,则情形大异了。这

① 原误为“一八三四年”,据《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校正。——编者

② 原误为“一八五四年(此年代疑有误)”,据《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校正。——编者

③④⑤⑥ 原误为“两”,据《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校正。——编者

可以从伦敦某大茶庄的通信中，摘录下来的下列语句证明：

‘在上海，恐慌已达于极点。金价涨了百分之二十五，银的缺乏至于一点亦不能不见得以还付英船对于中国应付的税款，这于出港许可是必须的。因此阿尔阔克(Alcock)君曾同意于负有对中国官吏交还这些税款的责任，而以东印度公司的票据或其他认可的担保的领收为质。设若着眼于商业的最近的将来，则贵金属的缺乏，乃为最不利的景象之一。因为此种空虚，适值于他们的使用最是需要的时候会，以致茶丝的购买者深入内地影响于他们的购买，因为此等购买，须以正在腾涨的金银块付价，以致那些生产茶丝者得以尽操纵的能事。’

‘历年此季，开始办理新茶以为常。可是在现时除去保障人身与财产的方法而外，什么亦谈不到。一切交易都已截止。……设若在四、五月中不能应用那些保护茶叶的方法，这黑茶、绿茶一切纯良种类均包含在内的早期收获，将成为同在复活节尚未成熟的小麦一样的损耗。’

现在保护茶叶的方法，一定不是英、美、法等国的舰队驻在中国海中可以给与的。可是因为他们的干涉，这些却很容易产生象那可以切断产茶内地与输茶海港间一切交易的纠纷情形。如此则于现在的收获，一个价格的腾起是可以预期的（投机已经在伦敦开始了）。即于次季的收获一个大的缺乏，亦是同样的确定。不宁惟是，中国人亦同在革命的震动时期中的一切民族一样，虽然准备着将他们手下的那一切笨重物品卖与外国人，而如东洋人在大变动的恐怖中所惯作者然，亦欲置之于贮藏。故于茶丝的取偿，除硬货的钱币外，则多不愿受。英国于是乎可以预期他的主要消费品中之一的价格的腾起，金银块的流出，出售他的

棉花和羊毛制品的一个重要市场的缩狭，即那一切威胁商业社会沉静精神的事物的乐天祝咒家的‘经济学派’，亦不能不作如下的语句了：

‘我们不要自信觅得一个为我们输出品去到中国的市场，其广大一如从前。……我们对于中国的输出贸易将遭蒙损害，满切斯特(Manchester)及古拉斯哥(Glasgow)的生产，将有一个减少的要求，这是最可能的。’

切勿忘记了象茶那样一种必需的物品，象中国那样一个广大市场的缩狭，将适合于一个西欧的歉收，从而发生麦谷和其他农产品价格的腾贵，于是缩狭了制造品的市场。因为每一种首要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腾涨，依一个相当的对于制造品的需要的低减，相为消抵以保内外的平衡。迩来大不列颠各处，时闻关于收获减色的叹声，‘经济学派’关于此问题有云：

‘在英伦的南方，不仅有些土地尚未耕种，并有许多已种的田，亦呈出恶象，或则谷实的发育不良。预定种小麦(Wheat)的濡湿下田，正在发生损害的征候，已极明显。种恭菜(Mangel-wurzel)的时期，现在可以说是已经空误了，种植的很少。而那预备植种芜菁(Turnip)的田时，看看亦迅将过去。为这样一种重要的收获的任何充分的预备，亦没有安置妥当。……燕麦的耕种，被雨雪妨害了不小。及时下种的燕麦很少，迟种的燕麦，少有能得丰厚的收获的。……在许多区域内，饲养的羊群间的损失，其价值亦不在少。’

谷以外的农产品价格，比去年的增高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甚且有百分之五十者。在欧洲大陆，谷较在英伦腾高，而在比利时及荷兰，则菜麦(Rye)高涨了一倍。小麦及他种谷物，亦从其

例。

在这种情形之下，因为普通商业范围的大部分，已为英国的商业所荡尽。我们可以很稳当的卜知中国革命将掷其火星于现在产业制度积载过多的地雷上，而致此长期准备的总危机的爆发。这个广播海外的总危机，将为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所紧接。中国送来骚乱于西方世界，而西方列强方由英、法、美的战舰载着所谓‘秩序’到上海与南京。这是一个伟壮的奇观。这些将要援助那动摇的满洲皇统的秩序贩客的列强，忘记了对于外人的憎恶并驱逐外人出此帝国，从前只是中国的地理的人种的位置的单纯结果，而自满洲鞑虏征服此邦以后，才成为政治制度了么？在十七世纪末，那互相竞敌，争着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间的纷争轧轹，给了满洲所采行的排外政策——很大的助力，是明显无疑的事实。此外这个新朝因恐外人或将袒右那当中国人民被征服于鞑虏的上半世纪间在大多数华人间存在的不平，而益促其采行排外政策也更剧。根于这些顾虑，当时外人遂被禁止而不许与华人交通。外人只准经由一个离北京及产茶地方甚远的都市广州，与华人通商。而外人的通商，又只限于与行商交际。行商是政府特许公开的从事外国贸易的商人，为的是使其余的人民得以避免与那可憎的远人相接触。无论如何，西方各国政府对于中国的干涉，此时只能致中国革命愈益猛烈，愈益延长商业的停滞而已。

同时关于印度有须注意的，是那个世纪的英国政府，足有他的岁入七分之一，是靠着售卖鸦片于华人的。同时印度人的大部分，又靠着在印度鸦片的出产，以需求英国的制造品。华人对于鸦片的使用的非难，并不减于德国人的禁绝淡巴菇（Tobac-

co)。但是因为这位新皇帝知道赞助罂粟的培植及在中国自己境内鸦片的预备，很明显的将立刻予印度的培种鸦片事业、印度的岁入以及印度斯坦的财源，以绝大的打击。此种打击，虽不能立刻即为与此有关的利害关系所感觉，经过一个相当的时期，将必显其效用，将必加厚并且延长这普遍的财政危机。这危机是我们已在上文卜定其运命的。

自从十八世纪开始以后，在欧洲未曾有过激烈的革命而不先朕以商业和财政的危机者，此理证之于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与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悉无二致。这是实在的，不仅仅我们每天看见那些统治的权力者与其人民间，国家与社会间，各阶级间，冲突的胁迫征候，一天一天的加多，便是现存的各强国间的冲突，亦似乎将达到图穷匕见的程度；最后谈判的机运亦且若现若隐了。在欧洲各国的都城中，每日都有关于普遍大战的飞书相告，一到次日，此等消息，又复消灭了，似乎又有半个星期的平和的确保了。虽然，我们的确知道，欧洲列强间的冲突可以达到无论如何的极度，外交界的情形可以显出无论如何的危迫，由于这个国那个国的些个狂热的党派，无论如何的运动都可以企图，可是那些王公的忿怒，人民的愤慨，都一样的被那繁荣的呼吸销沈下去。战争与革命，都一样的不能令欧洲争哄起来，除非是一个普遍的商业的和产业的危机之结果。这个危机的信号，与夙常一样，必要发自英国，他是世界市场中欧洲产业的代表。

注意政治的关系是不必须的。就以英国工厂有未曾前闻的扩张，英国的公开政党全然瓦解，法国的全部国家机关变成了广大的诈骗投机买卖的商馆，奥地利的财政濒于破产，招人民仇恨的错误层层叠叠到处都是，反动的列强间的利益冲突，和那曾

经一度显露于世的征服世界的俄罗斯迷梦等等事实看来，在这些时候，那样一个危机必定产生。”

我们读了马克思这篇论文以后，应该很明确的认识出来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和事实。在世界革命的运动中，中国和英国所居的地位，最为重要；因为英国是世界市场中欧洲产业的代表，中国是英国帝国主义销售商品的重要市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扩大，就是英国帝国主义销售商品的市场的缩狭；这个缩狭，可以促起普遍危机的迫近，加速世界革命的爆发。这种英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造成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更以其影响还答于英国，经由英国还答于欧洲，造成了英国革命，欧洲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关系。在马克思生存的时代，就是太平天国动乱的时代，是如此；即在今日，中国全国爆发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时代的，亦还是如此；直到世界革命完成的那一天为止，总是如此；不过这种关系的暴露，一天一天的明显，由中国革命以趋于世界革命的倾势，一天一天的逼近罢了。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主潮，自从太平天国动乱以还，总是浩浩荡荡的向前涌进，并没有一刹那间的停止。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的压迫，只有日益增加；故中国民族之革命运动，亦只有从之而日益强烈。现在怎么样了？帝国主义者与从前一样？否。现在更百倍于从前，日惟用其驻华军舰载来所谓“秩序”——大屠杀，由上海而广州，而九江，而汉口，乃至北方的北京、天津、济南、青岛、旅顺、大连，到处都有中国民众被屠杀于他们所谓“秩序”之下的血迹，即到处都有中国民众反抗列强的斗争。因为对于压迫的还答，只有反抗；对于他们镇压我们的“秩序”的酬应，只有我们反抗他们的骚乱，这便是革命。依“礼尚往

来”的礼让，这个骚乱，亦必然的要输运到欧洲去，输运到一切帝国主义的国家去。帝国主义者倘如横来干涉中国民众的运动，马克思说的好，这个干涉，只能使中国的革命运动日趋于凶猛，只能致列强在中国的商业日趋于停滞。屈指一算，现在距马克思作这论文的时候，已经七十三年了。中国的革命运动，一天一天的扩大，欧洲的危机，一天一天的逼近。最近两年间，中、英两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大有一日千里的势子；在全世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竞赛中，有首屈一指的进步。现在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普遍全国的今日同时，英国工人号召了一个几百万人参加的空前未有的大罢工，正如铜山东崩，洛钟西应，这是不是英国资本阶级以其用军舰装来的“秩序”，由中国换去的骚动？这是不是中国革命的火星，已经进入欧洲产业制度积载过重的地雷上，将要产生一个大爆发？那逼在眉睫的革命的历史事实可以证明。

1926年5月

《政治生活》第76期

署名：猎夫

日本帝国主义 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日本帝国主义最近在中国的活动，采取积极进攻的方策。第一，他与英帝国主义结成联合阵线，撮合张、吴间的讨赤联盟；勾结国民党右派，组织工农党，使与日本的劳动农民党及第二国际发生关系，以破坏中国的以工农阶级作主力军的国民革命运动；勾结上海的资产阶级，以图共同对抗中国的劳动运动并缓和中国的民族运动；勾结黄攻素、彭绍贤、林可彝一流的反动分子，与谢米诺夫等发起亚细亚民族同盟，欺骗亚东的弱小民族，一面对亚洲民族自雄，一面对白种民族示威，在骨子里头，更深深的布置了一个反俄的阴谋，破坏世界革命运动中东方弱小民族革命的联合阵线。第二，他急愿离开英美的关系，要单独的和中国订立一种条约，至少在满蒙境内，实行取得那二十一条里所规定的土地所有权，以树立他那所谓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的基础。

关于第一项方策的进行，我们所得的证据如下：

甲、当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开会以前，林森、邹鲁等在京谋占据北京执行部的时候，日本驻京公使芳泽氏曾设法与邹、林等接洽。

乙、最近东京方面传来秘密消息，日本政府曾训令其驻中国

重要都市的外交官，设法与当地国民党右派勾结，进行破坏国民党的工作。

丙、日本驻北京的外交机关报告日政府，谓在北京仅得一资望地位较浅的右派分子。但如资以经济助力，使他能够赴上海活动，亦可收相当的效果。

丁、在得到此项消息的同时，在京的日本机关报《顺天时报》，即大书特书的登出赴上海孙文主义学会总代表巫启圣的像片。

戊、七月十八日在北京发行的和文日刊《新支那》上，有下列一段的记载：“国民党右倾派劳动先觉者马超俊氏，得孙传芳氏等的谅解，有在全国组织农民劳动党的计划，举出十二名起草委员，纲领起意书正在制作中，设本部于上海，派遣组党员于全国二十二省，设支部于各省，与日本农民劳动党谋提携，并在香港与第二国际及美利坚劳动会谋联络。”

己、七月二十三日北京《晨报》载，电通社上海电讯：“国民党工人部长马超俊，刻在该党右派及留沪日侨后援之下，从事工农运动，以反抗共产派之劳动运动。”

庚、上海商人虞洽卿等游日本的时候，日本朝野有组织两国实业家混合委员会的提议。东京《日日新闻》希望此委员会对于关税会议、中日互惠条约一类的问题充分的交换意见，诉之两国舆论，进而各促动其政府，努力以求其实现。大阪《每日新闻》谓，去年夏间上海日本纱厂罢工的时候，曾依上海总商会的斡旋，将以解决，足征上海的华商团体是有指导的力量，因之对于中日关系委员会的活动，抱有厚望。

辛、据日本在华的英字机关报《华北正报》所载，所谓亚细亚

明确更坚固的解决。所谓商租，所谓会办，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攘夺中国土地的变相的名辞。

B. 日本资产阶级那样一个聪明伶俐的方案，还不易为一般帝国主义者所赞许，乃有日人久问猛作了一篇《满蒙土地商租问题》的长文，在一个和文日刊叫作《京津日日新闻》报纸上于六月十日顷，亘数日间连续的发表。他在那文的后段里说：“关于这满蒙商租问题与支那的治外法权问题，如大阪《朝日新闻》于二月十八日揭载社说，倡言顾念日支亲善的大局，除旅顺、大连外，宜将我租借地的全部返还于支那，以解决多年的悬案。由吾人看来，这未免过于极端了。溯及条约上的既得权，而轻易的主张放弃租借地，这难称为慎重的大新闻的态度。我关东州及铁路附属地，与列国在支那的租界地异，而有历史的因缘。……欧战以后，此因为国际协调主义所倡导，而于另一方面，国家主义国民主义的实行，亦系极明了的事实。国际联盟的进行中，法国占领鲁尔，厥后又大利又占领菲麦及哥尔府，美国占领桑多曼哥，乃至英国之在埃及，不是各自都发挥伟大的国家主义吗？……”看这一段话，可以知道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满蒙进攻的步骤，第一步是要取得土地所有权，第二步是大规模的移殖，第三步就是占领满蒙，同法国占领鲁尔、义大利占领菲麦一样。

C. 七月十五日北京《晨报》伦敦特讯，《满切斯达保护报》北京通讯员云：中国近时所发生之排英举动，日本宣传员应负其责任……日人之宣传目的，即在掩饰其乘中国倏扰，不欲实行华府会议决议之意。日本对于将来在华之经济，深怀恐惧之念，对直系首领重起主持大政，大抱惊骇之感，故不惜出此破坏关会之伎俩。……日本在关会之战略，一方欲坚持华会原案，同时并欲推

行其政治家之建设政策。所谓建设政策者，即中日另行缔结条约，中国对日本予以让步，而日本即以允许取消治外法权为交换条件。这里所谓“中国对日本予以让步”，即指承认日本人在华得以享有土地所有权而言。

D. 据奉天长春方面的通讯：最近日本人及朝鲜人移住满蒙者，纷至沓来。日本人则多携妻带子，赴北满一带屯垦。其朝鲜人的来满，关系因大批日本人来到朝鲜，强占土地，逼朝鲜人不得不弃井离乡，流散于中国境内。以日本人侵占朝鲜人的土地，而以朝鲜人挤入中国，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妙策。

E. 七月八日《国立晚报》载东京专电：日本政府现定加重关东司令官军队召集权。如在满常备兵不能维持在满侨民之生命财产及国防第一线时，该司令官可不待政府训令，召集在满预备兵，直接供其指挥，并在满设兵器弹药被服库，以利供应。现日本外务省正与各关系方面商酌，一俟商妥，即于八月一日实行。

综合以上所述，日本帝国主义最近在中国的进攻，异常的凶猛。日前张作霖躬往大连，与日本关东州儿玉长官会见，亦颇含有重大的意义。全中国民众尤其是北方民众啊！在全国民众号召各地的国民革命军讨伐勾结英日帝国主义的张、吴的战争中，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的注意和监视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中国国民革命阵线及其侵略满蒙的阴谋和行动。

1926年7月22日
《政治生活》第79期
署名：猎夫

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

(一九二六年八月八日)

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扰乱中国，以致内乱踵起。影响所及，日益扩大，其结果，遂使中国全国的农民生活不安定，以急转直下的趋势，濒于破产的境遇。北方直接遭受兵祸最厉害的省分，如山东、河南、陕西、直隶等处的农民，以不堪兵匪的骚扰，乃自然的有武装自卫的组织——就是红枪会的运动，这个运动在山东、河南、陕西尤为普遍。

在山东有红枪会、白枪会、红沙会、黄沙会、五煞会、黑枪会，在河南有黄枪会、绿枪会、白枪会、红枪会，在陕西有硬肚、白枪会、红枪会等名目。红枪会所用新式武器，如机关枪、迫击炮、来复枪等，故名，至如红沙、黄沙、五煞等名目，则带有阴阳、五行、沙语、符咒一类迷信的色彩，行动颇有类似义和团的地方。

这个现象可以证明中国的农民已经在那里觉醒起来，知道只有靠他们自己结合的力量才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所造成的兵匪扰乱之政局解放出来，这样的农民运动中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

红枪会名称的由来，乃是因为他们所用的武器多系长矛，在长矛上系以红缨，其起源实发于山东，而渐流衍于豫、陕。溯其渊源，远则为白莲教的支裔，近则为义和团的流派。其蔓延的猛

迅，完全是因为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兵匪所压迫所扰乱而自然发生的反响。红枪会的运动，既这样普遍，其间自然的亦要发生分化，军阀利用土豪，土豪利用农民，其结果于纯粹农民自卫的红枪会外，更产生了匪化的红枪会。因为土豪要想以农民为牺牲，以达其升官劫财的目的，第一步就是设法使红枪会匪化。这种匪化的红枪会，自然要与纯粹农民的组织为仇。河南荥阳农民协会委员长张虎臣全家十一口惨遭屠杀，即是这匪化的红枪会徒所为。可是概括的说起来，红枪会确是一种武装自卫的农民团结。山东汶上、宁阳的红枪会据城七月，所住的地方都是庙宇学校公共机关，所吃的东西都是自己携带的大饼馒头，丝毫不扰及人民。洛阳的红枪会，当冯毓东为警备司令时，在城内清街查匪，在城外保护行旅，均是红枪会负责，并且红枪会所驻的地方格外安静。河南通许县知事下乡劝告绅民勿勾结红会，绅民向知事质问道：“要叫我们不信红会很容易，只要地方不见土匪，军队不扰乱，官府不派苛捐杂税，完粮纳税收用纸币，便可不奉红会。”这都是可以证明大多数的红枪会，是农民自卫结合。通许绅士答知事的话，更可反映出来红枪会是代表农民利益为防备兵匪，反抗苛捐杂税而组织的事实。

河南的红枪会可以消灭国民二军的军阀势力，陕西的红枪会可以消灭刘镇华的军阀势力。而且同样的红枪会分子当其在洛阳列入民众队伍的时候，则可以战胜国民二军，可以抗拒其他的军队，而一为刘镇华所改编，带入陕西形成军阀势力的时候，则为陕西红枪会所困败；反之陕西农民编入国民二军在河南形成军阀势力的时候，则为河南红枪会所困败，而那留在陕西组织农民自卫团的农民，则可以使刘镇华、麻振武一班军阀的军队屈

服。这可以证明农民阶级的力量可以制胜军阀，可以崩溃军阀的军队，尤可以证明同一农民，守着他的阶级，则可以战胜一切军阀；离开他的阶级，则将与军阀同趋于灭亡的命运。

农民的乡土观念颇含有其阶级觉悟的质素，农民不忘其乡土，便是没有忘了他的阶级，即在军队中的农民似乎亦还没有完全与其阶级断绝关系。看那河南军队中助本省兵士不助国民军，和那山东兵士不愿在张宗昌军队中当兵而愿回到他的家乡，投入红枪会，反抗张宗昌，便可以证明兵士们与其本阶级——农民阶级尚未全然断绝关系。

武装农民自卫运动的发展，不但可以用他的阶级的力量打败军阀的军队，并且可以用他的阶级的力量召还军阀营垒中的农民，使之回到他们的乡井，保卫他们的闾里，这样子不但可以增加农村的壮丁，并且可以崩溃军阀的势力，根本的破坏军阀的营垒。

红枪会有几个显著的特征：（一）反洋人，（二）要真主，（三）迷信。但这都是外国帝国主义压迫下落后的农业经济生活反映出来的自然现象。

红枪会反对洋人，便是农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表现，因为他们感觉着自有洋人入中国以来，便给中国带来些不安和扰乱，便给中国农民带来些困苦和艰难。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洋人在他们的认识中，便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我们应该给他们以正确的解释，使他们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把他们的仇恨转移到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剥削中国农民的行动和工具上去，以渐渐的消灭他们狭隘的人种的见解，知道全世界革命的工农民众，都是他们的朋友。

红枪会要求“真主”便是农民要求政治的安定的表现，他们以为政治上的扰乱与他们的生活上以莫大的痛苦，如果有“真主”那样一种东西出来把中国政治弄好，把那洋人和奸臣们镇压下去，才有日子好过，他们还不知道自己起来革命可以自救，不能够认识民众政治的实现，可以结束中国政治的纷乱，故只模模糊糊的希望一个“真主”。我们应该告诉他们，只有工农民众自己团结起来，才是他们得到生活安定的唯一出路，“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不是神仙亦不是皇帝，谁也解放不了我们，只靠自己救自己”这一类的歌声，应该常常吹入他们的耳鼓。

至于迷信一端，亦是客观的事实自然的反映。自从现代的武器随着兵匪的扰乱入了农村，一般农民便不得不起来谋自卫。可是农民要想自卫，自然需要武器，但是他们的武器不外是些竹竿、木棍、刀、枪、剑、戟，乃至锹、叉、锄、镰等，他们也感觉着这些还不够，于是那些农业社会流传下来的术士拳师，便来教他们打拳练气用工夫，好补刀剑棍棒的不足。这些还不够，他们便把农村生活中所有的家当，如那学房牌位上的孔子，庙中偶像的关帝、观音，以及道士口中的太上老君，土地庙中的土地爷爷，《三国演义》中的张飞、赵云，《西游传》里的猪八戒、孙悟空，巫医符咒，乩台沙语，阴阳卜筮，八卦五行等等都搬出来，以为这回该可以吓退他们的敌人了。一边是些符咒拳术，一边是些机关枪大炮，自然是敌不过，自然在事实上与以很痛楚的教训。加以农村中有些农民曾经入过军阀的队伍，知道怎样的运用那些机关枪、大炮等利器，于是使他们有极猛进步，毅然弃却那些妖魔鬼怪的迷信，采用现代的武器。他们有了机关枪、大炮，便用不着孙悟空、猪八戒了，便用不着画符念咒了，现代的武器入了他们的

手中，五行八卦的迷信，便渐渐的失了效力。

红枪会采用现代新式的武器，这一个事实，将要在我国农民武装自卫运动史中开一新纪元，可以说这是中国农民运动的一大进步，同时亦可以认作乡村中少有产者起来反抗兵匪一个表征。

落后的农业经济反映而成一种农民的狭隘的村落主义、乡土主义，这村落主义、乡土主义可以把农民运动分裂，可以易受军阀土豪的利用，以致农民阶级自相残害，山东的白戟会与红枪会的冲突，河南洛阳红枪会城内派与城外派的冲突，陕州一带白枪会与红枪会的冲突，沁源一带黄枪会与绿枪会的冲突，吴佩孚唆动河南红枪会与樊鍾秀冲突，乃至刘镇华利用河南的红枪会去残害陕西的红枪会，吴新田更利用陕西这一部分的红枪会杀戮陕西另一部分的红枪会，都是极鲜明的事例。这个事例是目下武装农民运动中一个极大的危机。我们应该使一般农民明了其阶级的地位，把他们的乡土观念，渐渐发展而显出阶级的觉悟，知道农民的团结应该是扩大的而不应该是狭隘的，应该是联合而不应该是一村落或一县邑的分立的，甚至于自相冲突的。为的使他们消免相互间的冲突，应该使他们有集中的组织，联络的关系，否则一有冲突，必有一方为官府或土豪所利用，以蹂躏另一方的农民结合。

军阀改编红枪会，是一个消灭武装农民组织最毒的政策。因为把红枪会改编成他的军队，便可以使他们离开乡土，一面可以除去一部分人民的武力，一面增加一部分军阀的武力调往他处去残杀他处的人民。本地土豪以及土匪首领，最喜为军阀牵线，把本地的红枪会出卖给军阀，农民变成了猪仔，土豪作了大官。

结果武装农民每以离开自己的阶级而终于自蹈灭亡。这一类的土豪，是出卖农民的贩子，是农民运动的仇敌。河南红枪会多被改编，便是吃了这一班人的亏，洛阳的刘镇华、张治公便是这一班人的代表者。应该使农民们深切的了解红枪会改编军队的害处。吴佩孚、刘镇华等诱骗农民牺牲农民的种种事实，应该可以使他们知所醒悟了。要知道乡村是他们的营垒，他们应该守着自己的营垒而固着于乡村，严防为兵匪一类离开乡土的运动所浮动，须知军阀们土豪们骗他们去当兵或是当匪，便是骗他们出自己的营垒去送死。随着新式武器的使用，对于上述的危险更多，故宜多加提防。因为有枪有人更易为军阀土豪所居为奇货，我们的口号，是武装农民自卫的组织，应该是属于乡村大多数群众而从事于守望相助的，而不是供军阀、土豪、流氓、土匪所驱使，而离开农村化为兵匪的。

农村中觉悟的青年们，乡下的小学教师们，知识分子们，以及到田间去的农民运动者，你们应该赶快的加入红枪会的群众里去，开发他们，辅助他们，把现在中国农民困苦的原因，和红枪会发生的必要，解释给他们听，让他们很明了的知道农民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很明了的认识出来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很明了的了解红枪会的性质及其应走的道路，然后这一种澎澎渤渤的农民大运动，才不至于走到错路上去，才不至蹈袭以前失败的复辙，才不至于为军阀、土豪所利用以诱出其自己的营垒而归于消灭，才能脱去那落后的迷信的蒙蔽，变旧式的红枪会而为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变旧式的乡村的贵族的青苗会而为新式的乡村的民主的农民协会，才能真正的达到除暴安良，守望相助，阻御兵匪，抗拒苛税，抵制暴官污

吏，打倒劣绅土豪的目的。同志们，水深火热的沟洫中，倒卧着几千百万倒悬待解的农民，他们正在那里渴待着你们去导引他们走出这个陷溺，转入光明的道路。

1926年8月8日

《政治生活》第80、81期合刊

署名：猎夫

守常政治报告

(一九二六年九月八日)

此次西北国民军之退却，并不是原于战败，乃是原于西北军内部有张之江作奸细。在国民军未退南口之前，京畿一带有三万以上的军队，相约于十二日一致动作，解决吴佩孚，并截断奉鲁军后路，乃张之江故意弄错，致国军未能届时出来，功败垂成，反在张家口假装疯魔，痛哭流涕的说人家骗钱失信，至十四日他便大举撤兵了。我们看日本东京、大阪各大报所载，十日北京发的电通社电说，张家口方面主和派（非战派）的秘使赴奉，又张的秘书长某致某君函云，以后如有关于与广州接洽之事件，可径函鹿，关于与奉天接洽之事件，可径函张之江，便可知道这次撤兵的黑幕了。张之江于自觉的或非自觉的反革命外，还是一个最无能力的东西，所以撤兵之顷，弄得一塌糊涂，冲车失火，毁损甚巨。昨家兄接到包头方面电音说，这次国军退却，实为一大失败，丧失精锐兵士及器械无算，这不是因为战争失利，而是因为主帅之无谋，退至包头后，张之江命一部分入新疆，一部分入甘肃，一部分入陕西，包头情形不佳，惟一的希望在冯即日回包，还可重整旗鼓，否则万事将败于张之江之手矣。

此间国校政委曾以个人联名方式致电于冯，请即出兵陕西，经富谷县、葭县、延川、洛川、耀县攻取同州直扑潼关，一则可以

阻吴败退入陕之路，一则可以解西安、三原之围，不知此电能达否？近据某陕籍将领接到家信，似方振武、徐永昌军已过榆林，并岳秀被迫南下，计程国军此时已可抵西安，奉派报亦载有太原专电谓国军已入陇南，占领天水等处。

于须在西伯利亚遇李鸣钟、刘骥等，觉彼等思想大变，颇有革命的倾向。嗣又在莫与冯谈，觉冯思想更进步，从前于冯不甚相得，此次则融和无间矣。冯在莫归志不决，徐季龙乃电于往劝冯即归国革命，于抵莫与冯谈，冯即毅然归，于于十日行，冯于十七日离莫，关于十九日尚在上乌金斯克与史任等相值，似此他们在听到国军退却讯后，必等候冯一同回库伦。闻冯已与于商定，由于带二三军残部并一部分国一军经陇南入陕，冯在乌拉山车中致家兄侍称同志，谓此次归来，系要革命，措辞极其恳切，系亲笔写的，似此则国军退却之损失，虽不在小，而经此一番折磨，一番淘汰，卷土重来时，必又多一层革命色彩矣。

武汉下后，对孙对奉似不宜同时宣战。近据四日顾孟余由广东来电，似革军对江西已下动员令，则对奉的折冲已不可缓，对奉的交涉，向由石曾、寅村去办，他们所接头的有三部分人，一系代表张学良的胡若愚等，一系代表张作霖的梁叶郑等，一系代表杨宇霆的郑谦等，综合这些日期接洽的结果，可以说是没有结果。他们先说老张已派人赴粤了，可是去了没有，去的是谁，均不可知。后又说要派一个姓梁的去，但至今尚未成行。最近梁叶又表示奉方希望粤方先派代表或打电与奉接洽（此事自然要等一等再说，特别是武汉下后的现在）。小张最热心与粤接洽，杨宇霆则主战，对孙对粤一个一个的打，至于张宗昌则力主援吴，名为援吴，实则要夺取保大及河南地盘。现在英、法两使均

在奉，嗣又闻法使已往大连开会议，大要不外排俄与援吴二事，张褚赴奉亦系与奉张商援鄂取豫事。安福方面消息，奉张已决出款百万，张宗昌已派定褚玉璞为援鄂总司令，王栋为总指挥，王已赴保，褚由奉归即起程，又闻张宗昌秘印小册多本，系宣布孙传芳罪状及其谋鲁阴谋等，柏烈武曾托人与张宗昌谈询对粤态度，张答我们与粤这些年宗旨不合，但究竟如何，须在奉决定，谈罢即匆匆赴奉去了。

日昨石曾、烈武、寅村等与家兄讨论，结果大家仍主张对奉继续接洽，可以与之相约，分东南地盘，军事解决后再商政治。

预测中国政局，将有南北分裂之势，家兄谓此为于革命进行上最理想的局面——一边是国民革命政府，一边是张作霖政府，任列强择其一，以与之交涉，任人民择其一，以为之合作，是白是赤，是暗是明，皎然并列，何等分明！

看锺兄致粤特委函，主政府仍留粤，不必迁武汉。弟以为此在武汉局面未固以前，自然应尔，但武汉局势稍固，把政府迁到武汉来，不但意义重大，而且更有必要。因为国民政府迁到武汉有三个利益：一以塞武汉之地位，免野心者别谋树立；一以空北京政府，使之丧失中国政府的位置；一以树革命政府北进之声威。此策所关甚巨，幸锺兄详加讨论决定之。

1926年9月15日

《中央政治通讯》第3号

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 与世界革命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自始即是世界的一部。中国革命的成功，将与伟大的影响于欧洲，乃至全世界。在太平革命(太平天国事件)时期，马克思即是这样的观察。太平革命(一八五〇——一八六四)的年代，恰是马克思为《纽约新闻》(New York Daily Tribune)作通讯员的时期(一八五一——一八六二)，故马克思曾有一篇通讯，分析中国革命的因果关系，并其所与于欧洲的影响。

马克思在这篇文中指出中国革命将要影响于所谓文明的世界，欧洲民众的下次暴动，为共和制、自由政府与经济的下次运动，所靠中国现在的革命(太平革命)的经过，比其他任何政治的原因(如俄国的威胁以及全欧大战的将要发生等)都多。在一八四〇年英国炮火之下，许多的分解的要因凑合起来，日益发展，以影响于中国的财政、产业、政治与道德，皇帝的权威遂不能不崩落，自命天朝的上国，遂不能不与人间的世界相接，闭关自守的老支那遂为英国的炮火结束了他的孤立的生活。恰如保存在神秘的固封的棺中的木乃伊，一与空气相接自然的便要解体。英国造成中国的革命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革命怎样影响到

英国，经由英国影响到欧洲。太平天国的灭亡在一八六四年，一八六六年孙中山先生诞生，由孙先生诞生到现在，刚刚六十年，这六十年间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仍在继续着向前涌进，孙先生的主义，便是指导革命进路的南针。

第一国际时代在法国有一关于“天地会”的记录，这是一个中国人的第一国际的支部。会员以百万称，蔓延遍于全中国及印度。“天地会”是太平党人失败后所组织的革命的秘密结社，会员多散处于中国南部及南洋、印度、美洲各处，这一个天地会与第一国际发生关系的事实，可以证明太平革命是含有阶级性的民族革命，可以证明中国革命自始有与世界无产阶级提携的需要与倾向。

中山先生所创立的兴中会的前身，便是太平失败后继续中国革命系统的团体。兴中会的宣言里已经说明，外国人同情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者，亦得为会员。同盟会的时代，有许多的日本同志为中国革命牺牲了。中山先生曾与日人宫崎滔天等共同援助过菲列滨人的革命运动。中山先生并且说过，我们先援助菲岛的革命，等到菲岛的革命成功，他们必来援助中国的革命。这可以证明中山先生早已看清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及全世界的革命者，均有互相联合的必要。

列宁说：“四万万落后的亚洲人，达到自由的境地，对于政治生活觉醒了，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由愚昧觉醒起来，向着光明前进，运动争斗。”孙中山先生便是亚洲人向着自由与光明奋斗的领导者。

列宁又说：“在亚洲一个有威力的民主主义的运动正在发长与延扩，那里的中产阶级尚与民众站在一边去反抗那反动势力，

几万万人民觉醒起来，要生活，要光明，要自由。这种世界运动振奋于一切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胸怀中是怎样的喜悦……但是那‘前进’的欧洲呢？他是正在掠夺中国，在中国援助民主主义的敌人，自由的敌人。”孙中山先生正是亚洲的民主主义运动的代表者，他的一生的事业在指挥中国民众向那掠夺中国，在中国援助民主主义和自由的仇敌进攻，他的躯壳虽然死去，他的主义尚在中国民众革命的运动中生动着，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中山先生认中国国民革命为世界革命的一部的信念愈益坚确，使中山先生把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接起来的努力愈益猛烈。换句话说，中国民族革命的潮流，直到中山先生晚年的奋斗，才真正确定了他那接近世界革命潮流的倾向，而完全汇合一起，就是依了中山先生的指导，才入了世界革命的正轨，以达于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建设。

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奋斗，已经唤起了沉睡的亚洲，中山主义所指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亦必要影响到英国，经过英国影响到欧洲，到全世界。马克思和列宁的话，必能由中国民众革命的努力经由中山主义的道路一一证实。

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

中山主义万岁！

列宁主义万岁！

1926年11月《政治生活》

守同志来信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

……侧闻鲁张颇以南方与鲁性质上冰炭不相容，终难谋妥协。以言似张曾以告杨度者，但彼既不得一新同盟者，则叛奉实有所不敢。不敢叛奉，则其一切举措不能不一唯奉之决策是从。现在时局之推移，靳田魏倒吴，对奉之运动已使京汉线上酝酿新变化；而杨宇霆眼看鲁张要把肥美的江苏独吞下咽，心殊不甘，且恐鲁张之长腿飞扬易惹新战祸，故又放心不下，遂大拉孙传芳，使之再度南下。一以避党奉两军之马上直接冲突；一以杜奉张之勃勃野心，眈眈虎视。这样一来河南问题更形重要。我以为目下的策略应该是：（一）如能接近鲁张，仍当怂恿他赶快去吃江苏这一块肥肉，驱孙而拒杨；（二）收纳靳田魏等，使之北拒奉，东拒鲁，西向潼关与国民军携手；（三）联络阎锡山，使之消极的不与奉合作。关于第一策，在北京方面，只好令石曾常常与杨度接头，有机可乘即照此进行。关于第二策，前接汉口来信，据云靳田魏寇等派有代表到汉连袂，向总司令部接洽，当时由邓演达、王励斋出名招宴他们，当场声明靳等如能赶走吴，通电声明服从国民政府，则可实行接济。他们的代表等谓此次回去报告再答复。最近吴有下野之说，似靳等已与南方已有一种协定亦未可知。如中央以为此策可行，即请去函汉口推进此事，无论如

何总不使靳等归奉。据此间所接确报，靳已两派代表来津谒奉张，所上两函皆含有拒奉出兵河南之意味，其第二函已公然说出联唐的事来。于此应注意的是：（一）所谓“联唐反蒋”是否为一种辞令或事实；（二）靳二这种的态度是否故意作出来的，为靳大要总理，为自己要河南督办，此点须要谨防扒手。关于第三策，此间早已进行，在一个月以前我便托人向晋阎的驻京代表说：“国民党中央驻京负责的人很想知道晋阎对于国民党的真实态度为敌抑为友？”他的代表听了此话含糊其辞，便急忙跑回太原，在太原住了二十天，回来托人告我说，晋阎决与国民党合作，至时彼唯从党令动作，但此时幸为严守秘密云云。其余关于晋阎对于国民军之态度，彼所告者，全与我们及包头方面的消息若合符节，以此证其代表某或不吾欺。最近奉张压迫晋阎令其合攻国民军，当时提条件凡三：（一）是否能将绥包一带之冯部驱除净尽；（二）是否能向甘陕进击冯军；（三）如一二两项办不到，则请以京绥全线让之奉方，奉方将单独进攻。阎复电谓一二两项均办不到，三则请雨帅自由施行，晋愿将京绥全线交给奉方。在此时倾，晋阎驻京代表复托人告我说，冯在包头大张旗鼓的作起来，颇令晋方为难。党对此有何善策，我即着人答他说：“晋阎自第一次革命即督山西，于今十五年矣。革命以来，历督一省而始终未遭更动以迄今日者，百川而外宁复几人？然百川之苦心孤诣历尽，事齐事楚之艰难，而不惜卑身屈节以保此位置者，岂仅为身家一己之尊荣乎？抑将守此以有待，而为吾国家民族完成革命之大事业乎？如使为一己，则吾于百川复有何言，如为民族革命之大事业者，则百川今日所处之境，真所谓千载一时之良机，不容或失者矣。现在革命军之势力已足控制长江，国民军亦

且雄视西北，倘来岁春深反奉战起，百川果能率其十数万健儿加入我革军方面作战，则榆关以内胡骑全清，易如反掌耳。冯在包头知公为难，刻已旌麾西指，赴平凉督战矣，幸勿介意也云云。”其驻京代表说，据以电阎，阎复电云：“本号（暗指山西）与田君（暗指国党）同行，早具决心，幸为转达，惟照（暗示焕字）章作法太差，令我为难，现已决由奉方单独解决，我军除留一军二旅留驻绥远外，悉数调回晋境，此外还有由国军改编之晋军二万余人。”闻奉军近已进至平地泉，向晋索取晋北十三县，国军之未改编及已改编者均已退至包头布防。以国军方面之人推测，奉军决不进击包头，因晋阎之态度奉方决不放心，故不敢深入于黄沙白草无人烟之原漠，以穷进国军也。昨有蒙古同志归自包头，沿途所见知国军已由绥远退至包头，京绥路上之晋军，除一师余人驻绥者外，确皆调入晋境矣。西安之围已解，国军已进至潼关，冯于间关系似无问题，于现在西安，实际上已为援陕军总司令，即入陕一军亦皆受其指挥。新疆之杨增新确已故去，国军对新似已有一部分入新。伯坚在冯处已渐引起冯左右之妒嫉。闻伯坚临行曾对留守副司令张允恭说了一段话，隐含讽劝张对于革命理论应该多加研究，因现所具有者尚感不足，意谓 C. P. 人们来此工作不是为升官发财，乃是为革命云云。张答以：“请你不要注意我，我将来或者还可以入 C. P.，你只注意冯就够了，因冯时有动摇之倾势，你说你不是为升官发财而来，可是你的地位比谁都高，你须注意，不可太出风头了。从前有个刘牧师，当时冯极宠信之，以致人人侧目，后来就是冯总司令亦不能拥护他了。”又闻冯近来对于政治工作之成绩，颇露失望之色。因人材分散，不集中，不够用，故无成绩，除画报外，无成绩可观。在未接兄信

以前,已致信伯坚请其注意,并告以须令人材集中于最好之一师或一旅,俾冯及其部下将领得以睹其成效,俾知政治工作之确有成绩,吾党之政治工作者确能作出成绩,倘若人材够用,人材分配得当;现在成绩所以不能卓著的原因,全是因为人材不够用的缘故,并不是政治工作不生效,政治工作者不得力。

1926年12月15日

《中央政治通讯》第14号

狱中自述*

(一九二七年四月)

李大钊，字守常，直隶乐亭人，现年三十九岁。在襁褓中即失怙恃，^①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幼时在乡村私校，曾读四书经史，年十六，应科举试，试未竟，^②而停办科举令下，遂入永平府中学校肄业，在永读书二载。其时^③祖父年逾八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不久，祖父弃世。

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④是校为袁世凯氏所创立，收录全国人士。钊既入校，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学，随

* 《狱中自述》共有三稿，收入《文集》的这一篇是第三稿。三稿的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文字有详有略。有些情节在初稿、二稿中有所叙述而为三稿所略者，皆于有关段落中加注说明，以资研究参考。——编者

① 初稿中为“在襁褓之中，即丧父母”。——编者

② 初稿中为“甫经府试”，二稿为“府试中”。——编者

③ 初稿中“其时”之下有“祖母去世”四字。——编者

④ 这一段在初稿中为“钊感于国势之陵夷不振，颇起（二稿为“慨然起”）深研政治以期挽救民族（二稿下有“振奋国群”四字）之思想，遂与二三同学，乘暑假之便，赶天津投考学校。其时有三种学校正在招考：一系北洋军医学校；一系长芦银行专修所；一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军医非我所喜，故未投考。银行专修所我亦被考取，但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二稿在此下为“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法政。”）乃决心投考法政专门学校，幸被录取。”——编者

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新时代之政策，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因此，我乃决心加入中国国民党。

大约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变，避居上海。钊曾亲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①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翌年夏，先生又召我赴粤一次，讨论外交政策。又翌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钊曾被孙先生指派而出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前岁先生北来，于临入医院施行手术时，又任钊为政治委员。其时同被指任者，有：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诸人。后来精卫回广州，政治委员会中央仍设在广州，其留在北京、上海之政治委员，又略加补充，称分会。留于北京之政治委员，则为吴稚晖、李石曾、陈友仁、于右任、徐谦、顾孟余及钊等。去年国民党在广州开第二次全国代

^① 初稿在“亘数时间”之后，尚有“先生与我等畅谈不倦，几乎忘食”之语。——编者

表大会，钊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北京执行部系从前之组织，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已议决取消。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中之全党最高中央机关，现设于武汉，内分组织、宣传、工人、农民、商人、青年、妇女、海外等部。政治委员会委员长系汪精卫，从前只在上海、北京设分会，今则中央已迁往武汉，广州遂又设立一分会。北京分会自吴稚晖、于右任等相继出京后，只余李石曾及钊，久已不能成会。近自石曾出京，只钊一人，更无从开会起矣。钊所以仍留居北京者，实因不得稳妥出京之道路，否则久已南行。此时南方建设多端，在在需人。目下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亦只设法使北方民众了解国民党之主义，并以增收党员而已。

此外，则中外各方有须与党接洽者，吾等亦只任介绍与传达之劳。至于如何寄居于庚款委员会内，其原委亦甚简单。盖因徐谦、李石曾、顾孟余等，皆先后任庚款委员，徐谦即寄居于其中，一切管理权皆在徐、顾，故当徐、顾离京时，钊即与徐、顾二君商，因得寄居于此。嗣后市党部中人，亦有偶然寄居于此者，并将名册等簿，寄存其中，钊均径自允许，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盖彼等似已默认此一隅之地，为中国人住居之所，一切归钊自行管理。至于钊与李石曾诸人在委员会会谈时，俄人向未参加。我等如有事须与俄使接洽时，即派代表往晤俄使。至如零星小事，则随时与使馆庶务接洽。

中山先生之外交政策，向主联俄联德，因其对于中国已取消不平等条约也。北上时路过日本，曾对其朝野人士，为极沉痛之演说，劝其毅然改变对华政策，赞助中国之民族解放运动。其联俄政策之实行，实始于在上海与俄代表越飞氏之会见。当时曾

与共同签名发表一简短之宣言，谓中国今日尚不适宜于施行社会主义。以后中山先生返粤，即约聘俄顾问，赞助中山先生建立党军，改组党政。最近蒋介石先生刊行一种中山先生墨迹，关于其联俄计画之进行，颇有纪述，可参考之。至于国民政府与苏俄之外交关系，皆归外交部与驻粤苏俄代表在广州办理，故钊不知其详。惟据我所知，则确无何等密约。中山先生曾于其遗嘱中明白言之，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如其联俄政策之维持而有待于密约者，则俄已不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尚何友谊之可言？而且国民党之对内对外诸大政策，向系公开与国人以共见，与世界民众以共见，因亦不许与任何国家结立密约。

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之用款，向系由广州汇寄，近则由武汉汇寄。当徐谦、顾孟余离京之时，顾孟余曾以万余元交付我手，此款本为设立印刷局而储存者。后因党员纷纷出京，多需旅费及安置家属费，并维持庚款委员会一切杂费及借给市党部之维持费。数月间，即行用尽。此后又汇来数万元，系令钊转交柏文蔚、王法勤等者，已陆续转交过去。去岁军兴以来，国民政府之经费亦不甚充裕，故数月以来，未曾有款寄到。必需之费，全赖托由李石曾借债维持。阳历及阴历年关，几乎无法过去。庚款委员会夫役人等之月薪，以及应交使馆之电灯、自来水等费，亦多积欠未付。委员会夫役阎振，已经拘押在案，可以质证。最近才由广州寄来两千元，由武汉寄来三千元，除陆续还付前托李石曾经借之债，已所余无几，大约不过千元，存在远东银行。历次汇款，无论由何银行汇来，钊皆用李鼎丞名义汇存之于远东银行，以为提取之便。

党中之左、右派向即存在，不过遇有政治问题主张不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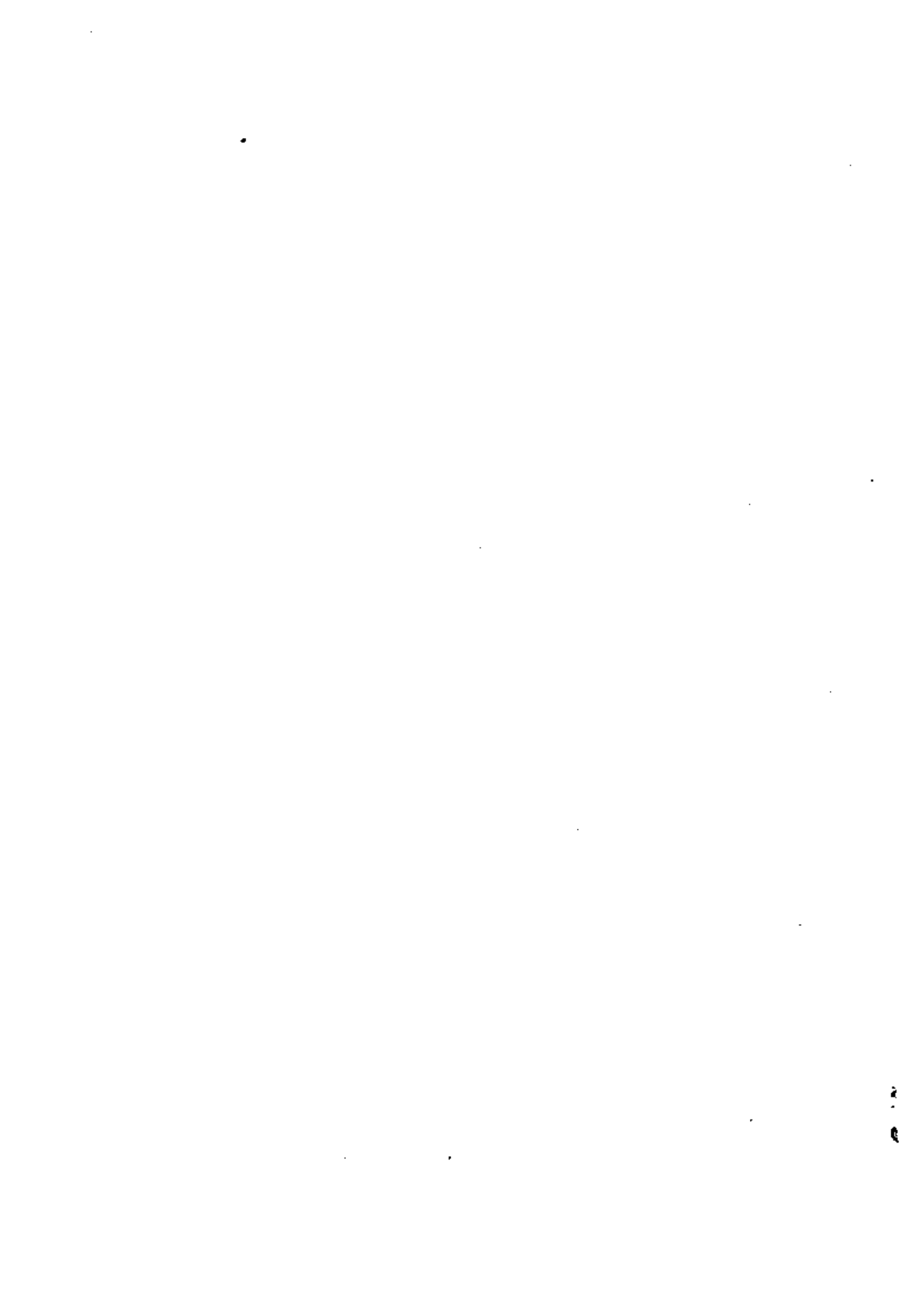
时，始更明显。其实，在主义之原则上原无不同，不过政策上有缓进急进之差耳。在北京之党员，皆入市党部，凡入市党部者，当然皆为国民党员。市、区党员之任务，乃在训练党员以政治的常识。区隶属于市，积若干区而成市，此为党员之初级组织，并无他项作用。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只有党之组织，而无工会之组织。在国民军时代，工人虽略有组织，而今则早已无复存在。党籍中之工人党员，亦甚罕见。近来传言党人在北京将有如何之计画，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望当局勿致轻信，社会之纷扰，泰半由于谣传与误会。当局能从此番之逮捕，判明谣逐之无根，则对于吾党之政治主张，亦可有相当之谅解。苟能因此谅解而知吾党之所求，乃在谋国计民生之安康与进步，彼此间之误会，因以逐渐消除，则更幸矣！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又有陈者：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谨呈。

李大钊

按原件刊印



诗 歌

登楼杂感* (戊申)

(筑声剑影楼剩稿)

一

荆天棘地寄蜉蝣，
青鬓无端欲白头。
拊髀未提三尺剑，
逃形思放五湖舟。
久居燕市伤屠狗，
数觅郑商学贩牛。
一事无成嗟半老，
沈沈梦里度春秋。

二

感慨韶华似水流，
湖山对我不胜愁。

* 这两首诗注明“戊申”，当作于一九〇八年。“筑声剑影楼”，是作者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时自用的斋名。筑声，出于战国时代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的故事。大钊同志将自己读书写作的小楼命名为“筑声剑影楼”，表现了当时他忧国忧民，崇尚侠义，立志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的强烈愿望。——编者

惊闻北塞驰胡马，
空著南冠泣楚囚。
家国十年多隐恨，
英雄千载几荒邱。
海天寥落闲云去，
泪洒西风独依楼。

1913年9月1日

《言治》月刊第1年第4期

署名：李大钊

哭 蒋 卫 平* (辛亥)

(筑声剑影楼剩稿)

一

国殇满地都堪哭，
泪眼乾坤涕未收。
半世英灵沈漠北，
经年骸骨冷江头。
辽东化鹤归来日，
燕市屠牛漂泊秋。
万里招魂竟何处？
断肠风雨上高楼。

二

龙沙旧是伤心地，
凭弔经秋祇劫灰。
我入平山迟一步，
君征绝塞未曾回。

* 这两首诗注明“辛亥”，当作于一九一一年，是为纪念作者的同学蒋卫平而作。蒋卫平(1882—1910)，河北永平府蒋家庄人(今属滦县)，是李大钊在永平府中学读书时的同学，后因抗俄被俄军杀害。

玉门魂返关山黑，
华表人归猿鹤哀。
千载胥灵应有恨，
不教胡马渡江来。

1913年9月1日

《言治》月刊第1年第4期

署名：李大钊

岁晚寄友*

一

江山依旧是，
风景已全非。
九世仇堪报，
十年愿未违。
辽宫昔时燕，
今向汉家飞。
岁晚军书急，
行人归未归？

二

几载不相见，
沧桑又一时。
廿年餘壮志，
千里寄新诗。
慷慨思投笔，
艰难未去师。

* 这两首诗，疑作于一九一一年末或一九一二年初，即辛亥年的岁末。——编者

何当驱漠北，
遍树汉家旗。

1913年4月1日

《言治》月刊第1年第1期

署名：李钊

题蒋卫平遗像

斯人气尚雄，
江流自千古。
碧血几春花，
零泪一杯土。
不闻叱咤声，
但听呜咽水。
夜夜空江头，
似有蛟龙起。

1913年6月1日
《言治》月刊第1年第3期
署名：李钊

筱舫、寿山将往阿尔泰， 诗以赠之*

一声笳咽一腔泪，
万里城环万仞山。
最是多情今夜月，
共君犹自出边关。

1917年4月1日
《言治》季刊第1册
署名：李大钊

-
- * 筱舫、寿山，均为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同学。筱舫，原名厄鼎云，河北任县尼家庄人。寿山，原名刘锡龄，字绶珊，又名寿山，河北滦县古冶王辇庄人。辛亥革命期间，沙俄趁机入侵我国。一九一三年夏天，大钊同志与其友筱舫、寿山等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北京政府陆军总部派厄鼎云、刘锡龄等押运一批军火送往科布多，是用大车运送的，途经潼关、甘肃，出嘉峪关，经过一年多时间，到达哈密。大钊同志赠友人的这首绝句和下一首《前意未尽更赋一律》，当是一九一三年秋天写的。——编者

前意未尽更赋一律

策马玉门关，
不为儿女颜。
悲歌辞易水，
壮志出天山。
白草千层雪，
黄河九曲湾。
遥知肠断处，
应有雁飞还。

1917年4月1日
《言治》季刊第1册
署名：李大钊

咏 玉 泉*

(筑声剑影楼诗)

玉泉流贯颐和园墙根，潺潺有声，闻通三海禁城等处，皆溯源于此。

殿阁嵯峨接帝京，
阿房当日苦经营。
只今犹听官墙水，
耗尽民膏是此声！

1918年11月1日

《言治》月刊第1年第6期

署名：李大钊

* 题目为编者所加。——编者

有 感

(筑声剑影楼诗)

愁尽人天唤奈何，
高楼风雨黯笙歌。
伤心人有伤心泪，
洒向红颜薄命多。

1913年11月1日
《言治》月刊第1年第6期
署名：李大钊

南天动乱，适将去国， 忆天问军中*

(筑声剑影楼诗)

班生此去意何云？
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国徒深屈子恨，
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
戎马江南羽檄纷。

* 一九一三年三月，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四月，袁世凯政府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善后大借款合同，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五月，袁世凯唆使由一批官僚政客组成的共和党、民主党等合并改组为进步党，以便在国会中对付国民党；六月，袁世凯下令撤免国民党在江西、安徽、广东三省的都督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同时，派军南下，以武力消灭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和乘机兼并异己势力。这时，国民党被迫应战，在孙中山、黄兴的领导下发动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由于袁世凯的反动势力还比较强大，国民党内部的不统一，和由于一年多来的无原则妥协已使国民党力量涣散，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二次革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完全失败。孙中山、黄兴被严令通缉，他们被迫再一次逃亡日本。袁世凯对革命党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中华民族又经受着深重的灾难，人民群众仍饱尝着无边的痛苦。是年冬天，作者到日本留学，这是他在出国前夕，借忆念在军中的友人天问（郭厚庵）之际，写下的一首感时伤世的七律诗。（参见《李大钊诗浅释》中有关这首诗的注释。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五月第一版）——编者

无限伤心劫后话，
连天烽火独思君。

1913年11月1日
《言治》月刊第1年第6期
署名：李大钊

吊圆明园故址*

(筑声剑影楼诗)

夕阳影里，笳鼓声中，同友人陟高冈，望圆明园故址，只余破壁颓垣，残峙于荒烟蔓草间，歔歔凭吊，感慨系之。

一

圆明两度昆明劫，
鹤化千年未忍归。
一曲悲笳吹不尽，
残灰犹共晚烟飞。

二

玉阙琼楼委碧埃，
兽蹄鸟迹走荒苔。
残碑没尽官人老，
空向蒿莱拨劫灰。

1913年11月1日
《言治》月刊第1年第6期
署名：李大钊

* 题目为编者所加。

黄 种 歌*

黄种应享黄海权，
亚人应种亚洲田。
青年！青年！
切莫同种自相残，
坐教欧美着先鞭。
不怕死，不要钱，
丈夫决不受人怜。
洪水纵滔天，
只手狂澜。
方不负石笔铁砚，
后哲先贤。

* 此诗见于李墨卿(翰章)之《墨园随笔》下卷第四九七页，是李大钊同志留学日本期间所作(见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北京晚报》连燕堂《李大钊佚诗〈黄种歌〉》一文)。——编者

乙卯残腊，由横滨搭法轮 赴春申，在太平洋舟中作*

浩淼水东流，
客心空太息。
神州悲板荡，
丧乱安所极。
八表正同昏，
一夫终窃国。
黯黯五采旗，
自兹少颜色。
逆贼稽征讨，
机势今已熟。
义声起云南，
鼓鞞动河北。
绝域逢知交，
慷慨道胸臆。
中宵出江户，

* 乙卯残腊：乙卯为公历一九一五年，腊月为阴历的十二月。这首诗是一九一六年一月作者从日本横滨回上海途中在轮船上作的。——编者

明月临幽黑。
鹏鸟将图南，
扶摇始张翼。
一翔直冲天，
彼何畏荆棘。
相期吾少年，
匡时宜努力。
男儿尚雄飞，
机失不可得。

1917年4月1日
《言治》季刊第1册
署名：李大钊

神州风雨楼*

丙辰春，再至江户。幼蘅将返国，同人招至神田酒家小饮，风雨一楼，互有酬答。辞间均见“风雨楼”三字，相约再造神州后，筑高楼以作纪念，应名为“神州风雨楼”。遂本此意，口占一绝，并送幼蘅云

壮别天涯未许愁，
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
高筑神州风雨楼。

1917年4月1日
《言治》季刊第1册
署名：李大钊

* 丙辰春，即一九一六年春。是篇当作于此时。题目为编者所加。

送 相 无*

幼蘅行未久，相无又去江户，作此送之

逢君已恨晚，
此别又如何？
大陆龙蛇起，
江南风雨多。
斯民正憔悴，
吾辈尚蹉跎。
故国一回首，
谁堪返太和！

1917年4月1日
《言治》季刊第1册
署名：李大钊

* 题目为编者所加。——编者

寄 霍 侣 白*

一轮舟共一轮月，
万里人怀万里愁。
正是黯然回首处，
春申江上独登楼。

-
- * 霍侣白，广东人，作者留学日本时的友人，后曾与作者办《晨钟报》。一九一六年初夏，作者由日本回国参加反袁运动，临行前夕，霍赠他一诗云：“当年相遇即相知，抵掌谈心恨见迟。今夕离别却无语，独吟风雨一楼诗。”当大钊同志途中到长崎时，给霍寄了一张明信片，说：“濒行蒙惠佳作，但对此好山好水，诗句却迟迟不来，盖由心绪恶劣所致。昨对泽民（张泽民——引者）言：‘古人爱屋及乌，今则憎人及物，此心绪所以恶劣也。俟抵沪后当再奉酬。’”在他到上海的第二天，便又以明信片，往东京寄了这首诗。——编者

复辟变后寄友人*

复辟变后,仓皇南下,侨寓沪上,惺亚时在赣江,赋此寄怀

英雄淘尽大江流，
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声华空醉梦，
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
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到万山无语句，
只应共泛五湖舟。

1918年7月1日
《言治》季刊第3册
署名:李大钊

* 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张勋率领他的辫子军占领北京,把已经被推翻了的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重新扶上宝座,演出了一幕复辟帝制的丑剧。此时,大钊同志仓皇出京,避难上海。这首诗就是这次寓居上海时写的。惺亚,即白坚武,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同学,河北交河县泊镇人,曾与大钊同志过从甚密。据白坚武《惺庵日记》原稿记载,民国六年八月六日收到守常从沪来函,并寄见怀诗一首,日记中也抄有这首诗,并评论说:“浩气凌云,悲歌斫地,如见其人。惟哀愤稍过,会当有以慰勉之。”白当时在江西督军李纯部下任顾问兼书记处秘书,后又在吴佩孚手下当幕僚。“二七”惨案后,大钊同志与之绝交。这首诗的题目为编者所加。——编者

山中即景*

一

是自然的美，
是美的自然；
绝无人迹处，
空山响流泉。

二

云在青山外，
人在白云内；
云飞人自还，
尚有青山在。

* 这三首诗的前两首，曾发表在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上（署名李大钊），后一首见于白坚武日记一函第七册。白在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九日的日记中记载：“接李守常函一件并白话诗三首，为记之。《山中即景》：（一）自然的美，美的自然；绝无人处，流水空山。（二）人在白云中，云在青山外；云飞人自还，依旧青山在。（三）一年一度果树红，一年一度果花落；借问今朝摘果人，忆否春雨梨花白？”——编者

三

一年一度果树红，
一年一度果花落；
借问今朝摘果人，
忆否春雨梨花白？

悲 犬^{*}

我初入山，
犬狂吠门前；
我既入山，
犬摇尾乞怜。
犬哉！犬哉！
何前倨而后谦？

* 见于白坚武日记一函第七册中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九日的记载。——编者

岭 上 的 羊

我在古寺门前站立，
小羊的声音来自天际。
看啊！岭上的羊，白的掺着黑的。
一个一个的都爬上山去。
羊啊！我细听你的声音里，
纤弱带着仁慈，悲哀带着战栗，
你不曾伤过别的东西，
你不曾害过你的伴侣；
天天只傍着那山水，
吃些草叶或草子；
只有你怕人，没有人怕你。
我不但不怕你而且怜你；
我不怕你，而且怜你，就是你的胜利！

1919年9月15日

《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

署名：李大钊

山 峰

一个山峰头，
长着几颗松树。
片片的白云，
有时把它遮住。
白云飞来便去，
山峰依然露出。

1919年9月15日

《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

署名：李大钊

山中落雨

忽然来了一阵烟雨，
把四山团团围住，
只听着树里的风声雨声，
却看不清云里是山是树？
水从山上往下飞流，
顿成了瀑布。
这时前山后山，
不知有多少樵夫迷失了归路？

1919年9月15日
《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
署名：李大钊

欢迎独秀出狱

一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二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惜，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象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三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1919年11月1日
《新青年》第6卷第6号
署名：李大钊

歌 谣 选*

一

瘦马拉搭脖，糠饭秕子活。

——直隶乐亭一带，地主多赴关外经商，农事则佣工为之。此谣乃讽地主待遇工人不可太苛，言地主以糠饭食工人，则工人所作之工活，亦秕子之类。

二

春鳖秋鳊，白眼割谷。

——乐亭滨海，产鱼。鳖、鳊、白眼，皆鱼名。春时最肥美者为鳖，秋时为鳊，割谷时则为白眼。

三

不剃辫子没法混，剃了辫子怕张顺。

——入民国以来，乡间盛传此谣。张顺殆为张勋之讹。

1918年10月3日至6日
《北京大学日刊》

* 这三首乐亭谣谚发表时署名：“文科教授刘复编订，本校图书馆主任李守常先生来稿。”——编者

谚 语

—

雁叫一声，穷汉子一惊。

二

高粱晒红米，鳞膀（鱼名）不给你。

乐亭（守常）

1919年9月28日

《新生活》（通俗周刊）第6期

书信



致庶务主任李辛白先生*

辛白先生：

“同文”待印“周报”，木版尚未取来，昨日派人去取，彼未等回信。现在号房没有上街的人，今晚又非用不可。乞我兄设法差人到《晨报》去取，取到即交“同文”。此问

近安！

弟钊顿首

* 原信未署日期。疑写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每周评论》创刊时。——编者

致 李 辛 白*

辛白兄：

上海有位日本人佐原笃介君愿订《每周评论》，自第一号起长期续订，报费若干开单寄去，他必照数汇来。他的住址开在下面：

上海虹口密勒路六号佐原笃介(殿)

弟 钊 敬 白

* 原信未署日期，疑写于一九一八年底、一九一九年初。——编者

送呈李辛白先生*

辛白吾兄先生：

郭楞仙寄来邮票三角奉上，乞即照寄；外有殷汝耕君住址一纸亦望收存，由第一号起按期赠报一份，以吾社拟请殷君任驻东通信员也。

此颂

春禧！

弟钊顿首

二日

* 原信未署年月。从信中的“此颂春禧”来判断，疑写于一九一九年春节期间。——编者

致李辛白先生*

辛白吾兄先生：

乞检出第一号至第九号的《每周评论》二份寄赠东四四条胡同张岱杉先生，以后按期续寄。 此颂

刻安！

弟钊顿首

* 原信未署日期。按：《每周评论》第九号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出版，第十号于二月二十三日出版。据此推断：此信当写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之间。——编者

致北京大学学余俱乐部函

学余俱乐部诸先生均鉴：

鄙人事忙，不胜庶务干事之任，乞另选。

此颂

公安！

李大钊

1919年3月19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336期

致 胡 适*

适之吾兄先生：

听说《新青年》同人中，也多不愿我们做《新中国》。既是同人不很赞成，外面又有种种传说，不办也好。我的意思，你与《新青年》有不可分的关系，以后我们决心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为文学革新的奋斗。在这团体中，固然也有许多主张不尽相同，可是要再想找一个团结象这样颜色相同的，恐怕不大容易了。从这回谣言看起来，《新青年》在社会上实在是占了胜利。不然，何以大家都为我们来抱不平呢？平素尽可不赞成《新青年》，而听说他那里边的人被了摧残，就大为愤慨，这真是公理的援助。所以我们愈该结合起来向前猛进。我们大可以仿照日本“黎明会”，他们会里的人，主张不必相同，可是都要向光明一方面走是相同的。我们《新青年》的团体，何妨如此呢？刚才有人来谈此事，我觉得外面人讲什么，尚可不管，《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顾。不知先生以为何如？

弟大钊

* 原信没有署明日期。从信中所说的“从这回谣言看”（即：一九一九年三月，北京军阀政府企图摧残新文化运动，通过反动报纸散布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因《新青年》鼓吹文学革命而被驱逐出校的谣言）与《新中国》杂志创刊于一九一九年五月来推断，这封信大约写于一九一九年四月。——编者

复 注 册 部*

敬复者：陈君德荣在校果系何名，鄙人亦不得知。请函询具名函请蔡先生保释之诸生便知。此颂
公绥！

弟李大钊

* 这封信未署明日期。从信的内容判断，疑写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中。

致沈士远先生*

士远先生：

陈德荣君事，弟探询之结果不得要领，我想由校出一保呈亦无何妨。他们盼望很切，乞即属文牍处拟稿如何？

弟李大钊

十七日

* 这封信未署年、月。从信的内容判断，疑写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中。——

致 胡 适*

适之兄：

杜威先生和柯先生的信送上，乞为代覆。杜威先生一信，大致系感谢杜威先生指示我们的厚意，我们自然应该把教育比个人看得更重，不过政府并没有正式向我们表示他愿和解的意思，而且正在那里制造加害我们代表的材料。以后进行，还希望他多多指教。

弟李大钊

此信不妨稍详，兄可加入些意思。

* 原信未著日期。疑写于一九一九年五、六月间，杜威来中国讲学时。——编者

致若愚、慕韩

若愚、慕韩两兄：

我到山中已将旬余，未能修函来告，实以交通不便之故（此间离城十里许，信到京只须一二日，惟此十里许之交通甚缓）。

我所居的地方名叫五峰，距昌黎车站十里左右，在山腹树林深密处，东南可览大海，五峰环抱如椅，韩文公祠在其怀中。守祠人为一双老夫妇，年近七旬，为我们烧茶煮饭，不辞辛苦。山中饮的是泉水，烧的是松枝，一草一木都有幽趣。兄等盍来此一游乎？夜间八时由京登车，次晨天明即到，车票三等票现金四元余即足到此，生活费甚简，弟可作主。东行二三站，即是北戴河、山海关，大可一游。

弟钊白

1919年8月15日《少年中国》
第1卷第2期[会员通讯]

致 郁 宪 章*

入山以来，晨莫呼吸烟霞，日必攀松披榛，寻登绝巘，白云从足下飞去飞来。梨树正值果熟，一枝低压，盈千累百，所至憩息，园主辄赠十数颗，坐石啜食之。泉自高山流下，激动碎石，声响清越，举手仰吸，儗然有羽化登仙之概矣。深泉濯足，长歌采薇，回山去也。此中佳趣正多，不敢向人间泄漏，恐山灵见怪，且惧兄等羨煞也。名山挚友，不得作一时胜游，孤灯石室，颇有所忆，成长歌一首，盖怀兄及天问兄也。诗肃天问函中，馀不白。此致宪章兄

弟钊顿首

* 这是从五峰（位于昌黎城北碣石山中）寄给郁斌（宪章）的信。信未署日期，疑写于一九一九年初秋。——编者

为哲学系学生刘仁静 缓交学宿等费写的担保条*

哲学系学生刘仁静君学宿等费由鄙人暂为担保，一俟家款寄到，即行缴纳不误。此上会计课

李大钊

* 原件未署日期。——编者

致宫崎龙介*

拜启：

九日晚八时顷，请来弟处一谈，为禱！

宫崎兄

李大钊七日晚

* 此信信封上写：“东城新开路共同通信社转宫崎龙介殿北京大学李”未署年月，疑写于一九一九年。——编者

致宫崎龙介*

拜启：

十月七日午十一时，假座香厂六味斋与同志一谈，乞光
临为幸！

宫崎龙介兄

小弟李大钊

* 此信信封上写：“本京新开路共同通信社转宫崎龙介殿快信”。未署发信日期，疑写于一九一九年十月。——编者

面递宫崎龙介先生*

拜启：

久未通讯，至以为歉！新绿之际，敬祝新运动的隆盛与时俱进。

敝校毕业生方豪、孟寿椿、黄日葵、康白情、徐彦之诸君，赴贵国观光，调查 贵国诸大学的学制，并与 贵国青年文化团体中诸同学相握手，关于文化上的提携交换意见。诸君多是《新潮》、《少年中国》、《国民》诸杂志的关系者，乞介绍于 贵国新派学者、社会运动者，乃至各文化团体中的青年有志。不胜切盼！
宫崎龙介兄

陈启修

陈传贤

李大钊

九、四、二十七。

* 从原件的笔迹看，这封信系大钊同志所写。——编者

致 启 明*

启明先生：

Malon与他的《Integral Socialism》，我从经济字典上查得一点，兹译出寄上，供参考。

弟大钊

Benait Malon(一八四一——一八九三年)

生于中央法兰西的一个小村，曾在巴黎当过工人，一八六六年加入万国工人协会(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在帝政末年间，同盟罢工与共和党人的运动中，多有他的活动。他是一八七一年巴黎Commune中的一个党员。失败后逃往Genoa，研究社会学者及经济学者名著。他最佩服的是 John Stuart Mill，那时他才起首作关于社会问题的论文。后回法国，创立《Revue Socialiste》，他作编辑人，是法国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杂志。

《Integral Socialism》

Malon作过一本书叫《Le Socialisme intégral》，他是法国集产社会主义派的一个代表者。他对于Marx说的那“现在的工人阶级全作资本主义的牺牲，这资本主义是完全根于滥用工人生产结果的一部分”的道理，很赞成。但是对Marx的唯物史观，是说人类的历史全部永为纯粹经济的或

* 原件未署日期。——编者

物质的原因所决定，却甚反对。他说理想的动机也常可以诱起历史的大运动，所以他主张社会主义的改革，必须是“integral”，换一句话说，就是对于人类精神中所宿有的一切情感的、道德的势力都与以满足。他的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一切生产的动因，都成社会主义化。

致 注 册 部*

启者：今日“唯物史观”，因事请假，乞宣布。此上
注册部

李大钊
二十七号

* 一九二〇年十月初，大钊同志在北大开“唯物史观研究”课。这个请假条，大概写于此后。——编者

复 胡 适*

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但如果不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我对于改归北京编辑之议亦不反对，而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办比分裂还不好。

守 常

-
- * 五四运动后，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开始逐渐分裂。到了八卷一号（一九二〇年九月一日出版）《新青年》改成党的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新青年》编辑部也由北京移到了上海，实际上它已成为上海共产主义者组织的机关。这时，上海的“新青年社”与在北京的《新青年》社员，虽然还经由陈独秀保持联系，但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却已经越来越貌合神离了。在《新青年》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的宣传后，遭到了胡适的坚决反对。他说：“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即《苏俄》周刊，是一种当时在纽约出版的进步刊物，《新青年》上译载过它的材料较多。——引者），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术的杂志。”（见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胡适给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诸人的信）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陈独秀于去广州的当天，从上海给胡适、高一涵的信中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

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胡适在给陈独秀的复信中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于是胡适提出来“三个办法”:①“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②“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③《新青年》“暂时停办”。胡适的意见遭到陈独秀的反对,于是他又给北京“新青年社”的同人写信,解释陈独秀对他的“误会”,再一次申述他的“办法”,“并请对于此议下一个表决”。大钊同志的这一段话,就是对此问题表示的意见。时间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下旬。——编者

致 胡 适*

适之兄：

信已传到我手。我因为昨天想到你那里去，好带给你看，故未传给他人。不意那位办《北京晓报》的方先生到辛白先生处邀我去谈，所以未得到你那里去。前天见了玄同，他说此事只好照你那第一条办法，但关于研究系谣言问题，我们要共同给仲甫写一信，去辨明此事。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象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点醋意，真正讨嫌！启明、豫材的意见，也大致赞成第一办法，但希望减少点特别色彩。我三两日得了工夫，一定去看你，好和你谈谈。

守常

* 这是关于《新青年》问题写给胡适的信。原信未署日期，时间当在一九二一年一月末或二月初。——编者

致周太玄*

太玄吾兄：

久不通信而心常相念，想知己当不以此见怪也！兹有女高师学生林君宝权、苏君梅等赴法入里昂大学，到法时务乞为照拂一切。两君皆研究文学者，关于学问上有所质询，亦请随时赐教为幸！京中教潮已告解决，愚生方在京，不日当回川也。专此，即颂
旅安！

弟李守常

八月初二日

* 此信疑写于一九二一年。——编者

致 蒋 梦 麟*

梦麟先生：

滕君统音在图书部专司各系参考室事，昨接星枢先生信称已由聘任委员会存记为助教，此事前曾在总务会议提出两次，均议决以须查明聘任委员会是否通过再下聘书，今既查明已经通过，请即致送聘书为祷！又，装订室校役王君建中（曾在高小毕业）已拨在第二院典书课充试用书记，请通知杂务课及文牍处从停止校役工给之日起，按初级试用书记发薪。又，新聘本校德文系学生向景君为编目课临时书记，专理德文书籍，月薪十五元，自十月六日起来馆办事。兹将启书呈上，乞查收。但敝处尚有事务员高君仁山及书记刘君瑞昌、赵君增选，并未接到此项函件，即希补发至祷！此颂
公安！

李大钊顿首

* 原信未署日期。——编者

为图书馆职员马家骧改薪函*

敬启者：图书馆职员马家骧君久已改为助教，聘任委员会及总务委员会议均皆通过，乞即将薪簿马君名下改为助教为禱！

李大钊敬上

* 原信未署日期，从信的旁批辨认，此信疑写于一九二二年三月。——编者

致 胡 适*

适之吾兄：

学潮如何结束？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洛阳对此，可表示一致。中山命议员即日返京。昨与溥泉、仲甫商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 (Democratic front)，与反动派决裂。伯兰稍迟亦当来京，为政治的奋斗。《努力》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弟于明日与仲甫赴杭一游，一二日即回沪去洛返京矣。余容面谈，请将此情形告知梦麟、一涵诸同人。

弟李守常

* 原信未署日期。按：一九二二年八月大钊同志曾经上海去杭州，参加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的会议，会后又回上海，同孙中山先生“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给胡适的这封信，是在从上海去杭州之前写的。

致 胡 适*

适之吾兄：

前者路过上海，曾往西友寓所访兄，以已去杭未遇。尊恙已痊愈否？念念！

蔡和森君所著之《俄国社会革命史》，《世界丛书》内可否纳入？和森很穷，专待此以为糊口，务望吾兄玉成之。如何？盼你赐覆。校中已决于九月十日举行开学礼，但上课恐须至下月了。

弟李大钊

* 原信未署日期，但从此信信封上的邮戳看出，信是一九二三年九月七日发出的，寄自北京石驸马后街三十五号，署名李守常，胡适之的收信地址是浙江西湖烟霞洞。——编者

致 胡 适*

适之兄：

前谈和森君所编之《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已由和森将所取材之书列成一表，现在把他同原稿送交先生，如能收入《世界丛书》，即希示复，以便转达和森！

弟李大钊

* 原信未署日期。——编者

致柏文蔚、王法勤、 徐谦、顾孟余函*

烈武、励斋先生均鉴
季龙、孟余

兹随吴渊同志赴汉之便，特将所有重要材料汇上报告，阅后即刻送交中央政治会议作为参考。此间经费困难，阳历年关即由弟及石曾借贷勉强过去，迄今月余，屡电中央而并一字之答复亦不可得，真令人不解。现在旧债已负约未还，而阴历年间又复迫人，为吾党所补助之机关将交迫而来索款，究不知从何应付？此外，《心声晚报》将谋重刊，前《国民新报》已由达尔逊与美国人 Fox 商妥在京编辑、在津刊行，亦因经费茫然不可靠致生迟滞而不能进行。中央以为北方工作均当停止，即望代请中央明白告知。长此消极对北京分会不合作，不是一个好办法。又，中央向来不与我们以任何政治消息，亦是令人起奇异之感！例如，此次移都南昌问题何等重大，听在武昌和南昌的中执同志争持甚烈，而京分会同人并消息亦不得知，以此可知中央如何看待我们了。夫国民政府定都何所，中外观瞻所系，岂能朝令夕更，视若儿戏？以今日论，广州为革命根据，武汉为全国中心，不居于广

* 此函见《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九)4669》。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者

州，必迁于武汉，百思而不可得可以迁移南昌之理由？如为集中起见，如果不为一时军事上的必需，即介石同志及总司令部亦宜坐镇武汉，今忽轻易的提起移都南昌，致令外交团对我内部频生怀疑，以为我之内部中有危机，不然何以遽弃武汉耶？至于敌党报纸如《晨报》则讽嘲迭出，画一旅行的箱子，上书党政府，贴上些广东旅馆、汉口旅馆、九江旅馆的条子。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这真是我们自取之侮了！自移都南昌的消息传入北京，吾党同志骇然莫释。尚望公等力持大计，毅然决计设都武汉，以定人心，而安国本，则党国之幸也！敌军内部较受吾党之影响，至如详细情形，此时应守严重秘密，故暂不报告，只好事后再请中央追认罢了。胡政之君不久当赴汉口，他的《国闻社》和《大公报》对于吾党表示相当的好意，望兄等与为比较的亲切之接洽。康心之同志为人明快干练，将来高培五旅如须派政治委员时，望兄等荐之于邓演达同志。又，吴渊同志亦至老成稳妥，亦望予以相当工作。又，北京市党部选举均已商洽就绪，似无偏倚不平之处，故可望无纠纷发生。南中军政消息有须等等知道的，幸兄等时电好音，吾侪企领以盼。所不能得于中央者，只有望于兄等矣！童冠贤同志来京助益我等之处实多。数月以来，所还至感，后于中央者惟此而已！匆匆不尽。望于武汉择一最妥当的通信处，便中示知。

弟李大钊

一月廿四日